自　序

本书原是给中文系的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上课准备的讲稿。我在讲授古典文学或古代文论时，总感到当前的学生，传统文化根基甚为薄弱。为了帮助学生打好坚实的治学基础，时常回想起先师郭绍虞、朱东润教授的教诲。二师认为，中文系学生的专业不可分得过细，或是单科独进，而应学习古人，文史哲不分家，具有通才本领，打下雄厚的传统基础以后，才能左右逢源，无所不达，获得畅游学海的自由。先师虽早作古，但薪尽火传，庭训犹在耳边。因此，我对所教的学生，特别是博士生，要求他们在学期间，必须各选经、史、子、集一部精读，然后上下贯通，左右横串，以便对于传统思想文化，有个比较具体生动的印象。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教学行之有效。经部之中，《周易》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巨大，古往今来，无论是学术文化、政治经济、教育卫生、文学艺术，甚或军事思想，各家各派或多或少蒙其影响沾溉，其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种种联系；加以《周易》卦画的特殊形式及其巫风弥漫的神秘性，成了既诱人又读解艰难的古代典籍。因此，学生大多要求教师给予一些辅导讲解。正是这一缘故，作为教师的我，终于被“逼上梁山”，勉为其难，对自己所不熟悉的《周易》领域进行摸索，和同学们教学相长。韩愈《师说》称引孔子“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之训，并发挥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在课堂讨论时，经常听到意气风发之莘莘学子的侃侃而谈，不仅让我明白了学

生缺什么、要什么，而且进一步给我以有益的启发。这样，从1987年起始至今，在和一届又一届的同学们的教学研讨中，我的备课笔记不断修改，日渐充实，终于增强了自信心，感到自己似乎也有所提高，对于《周易》领域不再陌生，作为一个爱好者，深深地爱上了这门新学问。于是，凭着一个古典文学教师的兴趣和审美感受，在新领域中自由地闲荡，既领略享受那“异域”风光之美，同时又尽情地汲取中华古人的智慧琼浆。

在我们师生共同学习《周易》的过程中，弟子们的问题千奇百怪，激发了教师的深入思考。他们从《周易》的阴阳虚实出发，要求教师讲授《周易》，不仅要有虚的理论抽象，而且要求具体落实到六十四卦，把每一卦每一爻，以及卦与卦、爻与爻、卦与爻之间那千变万化的复杂关系，理出个头绪来。他们运用易学术语，戏称这就是虚实相生之术，并以此来考验导师。作为人师，面对这批思维活泼的学生，既感到骄傲和幸福，又深感压力和艰难。要上好一门课并非易事。有关《周易》课程一旦开设，就要对学生负责，面对纷至沓来的疑问和要求，自己只能边教边学。这就使自己如“履虎尾”（《履》卦辞）而求平安一样，明知最终道路亨通，但仍然是战战兢兢，不敢稍有闪失，以免误人子弟。教授《周易》，谈虚不易，落实尤难。这就逼着我必须把六十四卦，一卦卦，一爻爻，逐一梳理清楚，最后由实入虚，通过具体卦画的讲解，来检验“虚”的理论概括是否合乎实际。如此这般地“虚实相生”，虽然折腾闹人，但是学生对于《周易》，却也不再视为畏途，而是越来越感兴致勃勃。这就是我“演说”六十四卦成为本书（《周易演说》，以下简称《演说》）的缘起。

从“虚”的方面说。时下易学大潮波翻浪涌，研究著作成百上千，日新月异，其中不乏有份量的力作；但也掺杂了若干水分盛溢的江湖杂说，阿世媚俗，哗众取宠，以《周易》为迷信的老祖宗。他们的所见所闻，仅是其占筮问卜功能而不及其他，并且美其名曰为“《周易》预测学”——把算命迷信当作科学来骗人。如此“研究”，实是自欺欺人，误人误世。在古代，《周易》的确有其占筮功能。但如《易·系辞传》指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筮占算命，只是《周易》的四大功能之一端。《周易》中寓有中华古人许多先进的文化观念：“以言者尚

其辞”，后代的语言修辞及文学美学受其沾溉；“以制器者尚其象”，启发后世生产工具及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发展；“以动者尚其变”，阴阳变化，矛盾运动，表现了古人的深邃哲学思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这些智慧结晶和优良传统，为什么不去努力学习并积极发扬，却偏要食糟粕而弃精华呢？中华古人的易卦占筮，的确含有迷信的巫术成分，在科学落后的上古时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却变本加厉地发挥易卦算命的迷信功能，实在令人大惑不解。的确，《周易》卦爻的运动变化之中，具有某种预测吉凶悔吝的科学成分，但是，这和算命迷信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故意混淆二者，居心何在？可以断言，搞易卦算命的某些人，是在和自然及社会的激烈竞争中，丧失信心，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一种可悲表现。如此“研究”，无论是理论之“虚”，或议论之“实”都一样是无益有害。在给学生上课时，一定要态度鲜明地加以指出并予以批判，以免青年上当受骗而误入歧途。力图较为全面而科学地阐述《周易》的性质、精神及其功能，在努力恢复其历史原貌的同时，加以批判继承，以资借鉴。求科学，反迷信，这是我们师生教学讨论中明确的坚定方向。

而从“实”的角度言。有的专家教授，常是不忌“虚”却怕“实”。为什么？因为事情一旦落实，就不可能敷衍了事。落实到具体描绘六十四卦，以及卦与卦、爻与爻、卦与爻之间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联络图，就是对于教师最严峻的考试。如是著书立说，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尽可避开不提，读者也无可奈何。但教师面对活生生的学生，却是无计回避。你要小聪明胡诌一卦一爻，当属可能；但下一卦下一爻又将如何自圆其说呢？学生善于思考，问题接踵而至，令人喘不过气来。开始我总是引用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之言来对付，但面对学生诚挚的目光，你忍心永远搪塞过去吗？学生的热切求知欲望，启发了教师的职业良心，对我是个有力的鞭策。我和学生一起学习《周易》，力求尽快缩短从不知到知的距离。于是老老实实坐了下来，参阅了《四库全书》中的《易》类丛书及今人著作，认真地思索和整理。这样，从1990年始，一卦卦一爻爻地写来，直到1998年元月10日划上最后一个句号，其艰辛犹如八年“抗战”，《演说》终于告竣。《演说》可说是在日积月累的岁月流逝中被逼出来的。被“逼”的日子是难挨的，但被“逼”出以后，破涕为笑，

却也是内心洋溢着欢乐和幸福。在我的诸多著作中，此书或许不能带来什么荣誉，但我却将特别珍惜它，这不仅是因为我为之长期耗费心力，老老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同时凝聚了众多学生和师友的智慧和心血。

在撰写《演说》时，我时常考虑它应有自己的特点。先师朱东润教授曾告诫我们，学术著述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不要炒冷饭。称引别人的意见和成果，要老实地注明。这些话我牢记在心并力求付之实践。时下《周易》译注之作如林，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写他作甚？讲《周易》不可能完全撇开哲学，但我们师生不是哲学家，从本体、本源或是认识论的方面来构设其理论体系，非己所长。不过，我是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师，中国古代学术，常是文史哲不分家，因此，中文系的教授多为“杂家”：专攻精深哲学虽有欠缺；但是旁搜博采，或能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古典文学是古代社会人生的形象描绘，其反映面相当广阔。为了揭示古典文学那隐藏在作家作品及其语言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我们不能不寻幽探微，钩深致远，广泛涉猎。韩愈《进学解》云：“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生之良也。”良医如此，文学家何独不然？上自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只要有用，都是采取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来读《易》，必然不同于哲学家。我们讲《周易》，虽然无法绕开其思想哲学，但力避其艰深的哲学术语，而尽量代之以古今历史生活中的生动故事，或是《二十五史》，或是诗词文章，甚或笔记小说，取精用宏，博采约取，化生为熟，无所不用。总之，力求严肃的学术性和生动的通俗性的完美结合，让高深玄妙的《周易》，从人类高层的文化沙龙，逐渐进入寻常百姓人家，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至于这一愿望能否真正化虚为实，还有待时间的考验，愿与广大读者共勉。

阅读和研究古代文化典籍，我们师生商订了共同遵守的三原则：首先弄清楚“是什么”？也就是要求知其然，力求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窥其真实面貌；其次是明白“为什么”？也就是要求知其所以然，进一步追究作者为什么如此著笔，弄清作者言外之意及用心所在，以深挖其丰富内涵；最后是面对历史，立脚现在，确定今人该“怎么想”？也就是要求明白今之所当然。这就意味着在弄清事实、明白用心的基础上，疏理其内在规律，重新给予理性评判，并对其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进

行深刻的现代思考。我们有关《周易》卦爻的教学及探索，也同样遵循了上述三原则。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却常被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所窘，如陆机《文赋序》所说："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因此，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上述三原则，同样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

另外，在数千年的易学发展史上，百花齐放，流派纷呈。尽管各家各派多有对立，相互批判，但是我们坚信，传世的各家各派，虽然各有其视角盲区，甚至是有其弊端，但只要还在流传，就说明了它们各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讲《周易》当然必须讲哲学、谈思想和明义理，但是，像三国魏时玄学家王弼，是公认的义理之祖玄学魂，贡献很大，不过他一扫汉代象数而阐释义理，造成了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势同水火，长期相互排斥，实际也不利于易学的健康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寿祺先生告诫我说："非象数无以明义理。"令我终生不忘。因此，本书对于历史上的各家各派，不问是汉象数派、或是魏晋以后的义理派，或是唐宋以后出现的历史学派、甚至是近代的新思维派，我们尽量撷取其精华，并在新的综合过程中，阐发我们的新思考。博采众长，自抒己见，以飨读者，并希望能够有所助益。

在撰写《演说》的十年中，得到了众多师友的热心关怀，在此一并致谢。现借此书的出版，奉献给三位亲人和挚友：

奉献给我那九五高龄的老母吴淑仪，她虽看不懂《演说》，但却经常烧香许愿，为儿祈求平安，一颗伟大的慈母之心，永远震撼着万里游子的赤诚灵魂；

奉献给结发之妻汤娟，在任何风雨困苦之中，相濡以沫，安危与共，作为记者的贤妻，不忘提供许多新鲜的信息，无论是学术切磋，抑或文艺论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我启发和力量，此所谓虽不言《易》而暗合于《易》；

奉献给挚友李龙羽先生贤伉俪。龙羽兄早年是日本早稻田大学高材生，现在是学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同样对《周易》有浓厚的兴趣。每当我们相聚，龙羽兄喜欢切磋学问，时常出人意外地从一个全新视角来谈《易》，其如珠妙语，画龙点睛，振聋发聩，令人解颐，对我启迪至多。并且，在我写作最困难的时期，是龙羽兄鼓励我坚持到胜利。

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但一介书生，别无产业，而只能借书奉献心香一瓣，以表诚孚。

最后，应该说明一下：《演说》曾多方借鉴古今人的成果，其中佳作，如黄寿祺、张善文二位先生的《周易译注》，借鉴尤多，引用时加以注明，以示不敢掠美。

外行谈《易》，贻笑方家，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赐正。

蒋 凡

2007年元月修订于海上半万斋

目 录

自 序 / 1

䷀乾卦第一 乾龙飞天处处踪 / 1
䷁坤卦第二 大地母亲胸怀广 / 9
䷂屯卦第三 万物初生步维艰 / 15
䷃蒙卦第四 启蒙发智树根本 / 22
䷄需卦第五 “需待”道畅茁壮长 / 28
䷅讼卦第六 止讼息争杜根源 / 34
䷆师卦第七 正义之战仁义师 / 40
䷇比卦第八 团结亲附仁者心 / 47
䷈小畜卦第九 养聚知止求小康 / 52
䷉履卦第十 如履虎尾致元吉 / 58
䷊泰卦第十一 心气交通天地泰 / 65
䷋否卦第十二 否泰兴亡关人事 / 71
䷌同人卦第十三 天下为公世大同 / 77
䷍大有卦第十四 精神物质双丰收 / 84
䷎谦卦第十五 谦虚受益骄必败 / 90
䷏豫卦第十六 后天下之乐而乐 / 97
䷐随卦第十七 相随而从止于善 / 103

䷑蛊卦第十八 匡救父弊治蛊乱 / 110
䷒临卦第十九 古代的领导艺术 / 117
䷓观卦第二十 万国观光见盛德 / 124
䷔噬嗑卦第二十一 秉公持正利用狱 / 131
䷕贲卦第二十二 文质彬彬致“贲”道 / 137
䷖剥卦第二十三 剥丧横流觅生机 / 144
䷗复卦第二十四 迷暗知复透微曦 / 150
䷘无妄卦第二十五 以正祛邪归“无妄” / 157
䷙大畜卦第二十六 蓄德养贤路通天 / 163
䷚颐卦第二十七 颐养以正颂声兴 / 169
䷛大过卦第二十八 “大过”乱世育英才 / 176
䷜坎卦第二十九 高歌正气越险道 / 183
䷝离卦第三十 养火以正成文明 / 189
䷞咸卦第三十一 无心之感阴阳和 / 196
䷟恒卦第三十二 锲而不舍恒久道 / 203
䷠遁卦第三十三 遁世无闷俟时行 / 209
䷡大壮卦第三十四 生气壮盛戒骄溢 / 216
䷢晋卦第三十五 柔顺进长著明德 / 222
䷣明夷卦第三十六 黑暗之中见光明 / 229
䷤家人卦第三十七 家道贞正天下兴 / 236
䷥睽卦第三十八 求同存异济乎睽 / 244
䷦蹇卦第三十九 和舟共济脱险难 / 251
䷧解卦第四十 解难行道防隐患 / 258
䷨损卦第四十一 老实吃亏终致益 / 265
䷩益卦第四十二 益下自损终自益 / 273
䷪夬卦第四十三 夬决除恶扬王庭 / 280
䷫姤卦第四十四 阴阳遇合自有道 / 287
䷬萃卦第四十五 修德服人说会聚 / 294
䷭升卦第四十六 积小成大顺性升 / 301
䷮困卦第四十七 努力脱困获新生 / 308
䷯井卦第四十八 功德无量井泉养 / 316
䷰革卦第四十九 革故布新顺天人 / 323

䷱鼎卦第五十 鼎食以烹在新人 / 330
䷲震卦第五十一 震惧修省拓亨途 / 338
䷳艮卦第五十二 时止则止光明行 / 345
䷴渐卦第五十三 循序渐进竟其功 / 352
䷵归妹卦第五十四 血泪淋漓论婚嫁 / 360
䷶丰卦第五十五 明动相资见“丰”大 / 368
䷷旅卦第五十六 行旅风霜说辛酸 / 376
䷸巽卦第五十七 顺入人心秉刚正 / 384
䷹兑卦第五十八 欢悦以道远邪媚 / 392
䷺涣卦第五十九 风行水上现至文 / 400
䷻节卦第六十 甘节苦节吉凶别 / 408
䷼中孚卦第六十一 诚信之道感天地 / 416
䷽小过卦第六十二 矫枉过正致大吉 / 424
䷾既济卦第六十三 思患预防济其功 / 432
䷿未济卦第六十四 曙光在前新征途 / 439

乾

卦第一

䷀

乾龙飞天处处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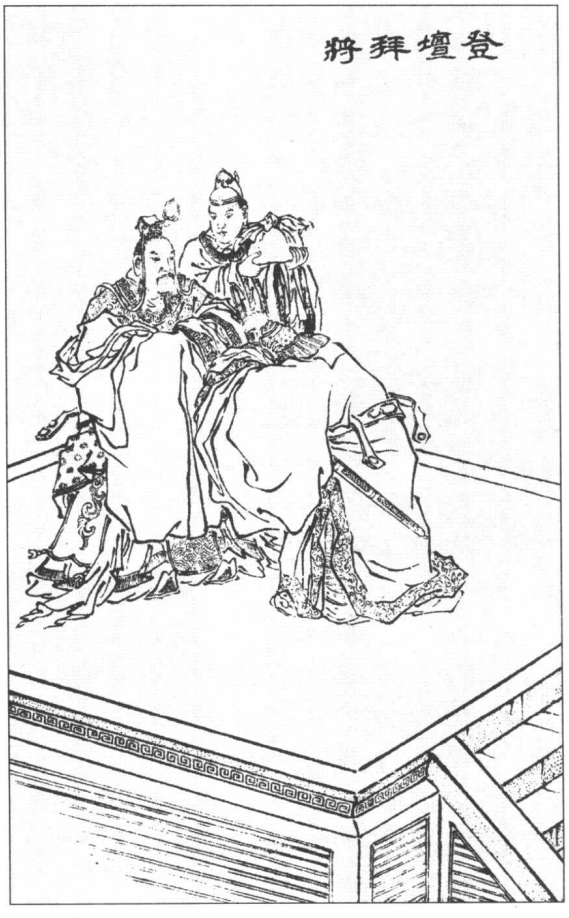
《周易》六十四卦，首立《乾》《坤》二卦，很有道理。从宇宙的自然本体言，“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天之气为阳，轻清而上升；地之气属阴，重浊而下降；阴阳震荡，万物以生。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从婴儿呱呱坠地，一睁眼就接触到天与地，这是活生生的事实。人类的一切知识宝库，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生产实践，都在天与地这一大的宇宙环境中生成并储藏。因此，人要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当然首先就必须了解天地及其发展变化。《周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开篇《乾》《坤》，说明了作者的根本认识。

《乾》的卦象是䷀，下乾上乾，由八卦中的乾卦（☰）重叠而成。“⚊”是阳的符号。用“⚊”的三迭为☰，象征天；再用两个“☰”的重叠，象征天道万物那复杂的关系及其微妙变化。《乾》卦象征着天道刚健，运动不息。《说文》段注：“乾者，日始出，光乾乾也。”“乾”字原是日出时光芒四射的样子，因其发音近“健”，所以《易经》十翼中的《说卦传》，直接解释为“乾，天也”、“乾，健也”。《乾》的卦辞则说明了全卦的总义，曰：“乾：元、亨、利、贞。”这是《周易》作者通过对于自然的观察而对天的四种功能的总结。元，开辟元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指的是开天辟地时的浑沌的宇宙本原。亨，亨通流畅。说的是物质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矛盾的运动就是事物的生命，人的身体气血不通就会生病，地球也一样，停止运动，也就会丧失生命活力。利，和祥有利。指事物发展的效果而言。贞，贞正坚固。要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自然规律办事，而不走邪路。事物的成败，首先要从事物的内部找原因。卦辞是经中之经，是对《乾》卦之义的最原始的说明。作者认为天

的本质是沛然以健的阳气，阳气运动变化，促进并主宰了世界的发展。从自然现象到人事变化，都是在乾天阳刚之气的催生下出现。所以《象》辞解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究天人之际"的角度看，这就是要求人们，一切事业的开端，首先必须效法天之所行，"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孔颖达《周易正义》）。我们现在讲学习时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也有这个"自强不息"的意思。从卦辞我们看到了古老中华民族的祖先所曾有的积极有为的奋发精神与勃勃生气。

下面再谈爻辞。《乾》卦六爻，每爻均有爻辞一则，以"假象寓意"的譬喻方法，来象征天道的刚健运动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六爻表示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六个不同阶段或等次，象征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上下、贵贱等等的不同地位、条件或身份。六爻之名，用数字表示，以"九"代表阳，"六"代表阴。古人以为易的阴阳之气从下而生，所以从最下一爻开始，由下往上，依次是初、二、三、四、五、上。但《乾》《坤》二卦，除六爻有辞外，又多了无形之爻"用九"(《乾》)与"用六"（《坤》）的二则爻辞。这在六十四卦中，是为特殊，并非通例。各个卦的六爻把规定事或物的发展划分为两大阶段，初、二、三爻是下卦，也称内卦，属初级发展阶段；四、五、上爻是上卦，也称外卦，象征事物发展、转化已经完成的高级阶段。《乾》的爻辞多用"龙"或"君子"来作生动的象征喻示。

■刘邦登坛拜韩信



初九，潜龙勿用。

"潜龙"云云，象征阳气潜藏，龙蛇蛰伏。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它非常刚健，充满阳刚之气，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变化无穷。龙的这些属性，就是由天派生出来的。但第一爻处位最下，是事物的开始，犹如人类中的大力士，当他在刚诞生的婴儿时期，仍然是软弱无力，有待哺育与培养。因此，即使是神奇的巨龙，也一样有它诞

生、发展以至衰亡的发展过程。幼龙初生，虽然秉阳刚之气，但因力量不足，所以只能潜伏在深水中，避免表现或施展，以免遭受意外，被敌对力量扼杀在襁褓之中。这象征着事物的萌芽时期，必须正视自己，养精蓄锐，以待时日。犹如幼龙初生，无法一步就升空腾飞一样，这是自然之理。从人事看，也是如此。初生阶段，力量薄弱，只能隐忍待养，储蓄潜能，待到羽毛丰满，再图腾飞。“潜龙”，一说是圣贤处下位未显之时。像汉初的韩信，想当年汉王刘邦登坛拜大将，统率汉军取赵灭齐，最后消灭了“力拔山兮”的楚霸王项羽，韩信作为汉军统帅，威名显赫，英雄盖世。但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他在青少年时，曾因贫困失志，遭受乡里流氓的嘲笑与侮辱，迫他要么无故杀人，要么受钻裤裆之辱。韩信忍辱负重，不争一时之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是“潜龙勿用”。如若不然，与几个微不足道的流氓争一日之短长，不要说当时韩信力弱势孤，就是打赢而杀了人，也并非英雄本色，而可能早在刑场上抵命去了，怎能成为我国古代名垂青史的著名军事家呢？“潜龙”或“龙潜”又可象征帝王未即位的特殊阶段。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有一则“晏元献题阙伯庙诗”的故事，云：“南京高辛庙制度甚雄，世传太祖龙潜时，尝以木杯珓占己名位，自小官以渐数之，至极品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契。”后来，晏元献为南京留守，就此事题诗庙中云：“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潜龙。尝因蓍蔡占，来决天地屯。”晏元献指晏殊，太祖指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当其潜伏民间之时，怎敢公开说是自己占得天子之位？当时他如果大肆宣扬，必然以篡逆大罪论处而人头落地，怎么还会有后来龙飞九五的宋太祖呢？“初九”的潜藏，正是避凶趋吉，为今后的腾飞作必要的准备。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田在地上。见，现也。“大人”，专指有道德的圣贤或君子。“二”是初级阶段的第二时期，处于下卦的中位。所谓中位，有两个意思：一指上、下卦的中位，下卦是二，上卦是五；一指全卦六爻的中位，一般是指五位。虽然“中庸”是后来的儒家哲学，但从《周易》经卦重视中位看，“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维特点已经萌芽。就以“中医”的原始意义而论，并非指中国的医学，而是受《易》卦重视中位的启发，强调人体上下交流、阴阳气通的折中之“中道”。爻辞是说，经过哺养蓄积，年轻的巨龙已初具力量，开始崭露头角，离潜出游，相机以图发展。虽然一飞冲天的力量尚嫌不足，但处位中而素质美，在起飞线上跃跃欲试，所以像人类社会的“大人”领袖一样，已为万众瞩目。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卦各爻，皆说龙为喻，唯独“九三”承“九二”之“大人”，而以君子为象。因此可以肯定，“龙”与“大人君子”有必然联系。乾乾，即健

而又健。惕，惊惧警惕；若，语助词。厉，危险。咎，病也。爻辞是说，处于“九三”之位，君子终日警惕慎行，自强不息，这样就能脱离危难而消灾弭祸。从《乾》九三的爻位变化而言，宋朱熹《周易本义》（以下简称《本义》）云：“九阳爻，三阳位，重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乾乾，惕厉之象……言能忧惧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宋程颐《伊川易传》（以下简称《程传》）云：“在下体之上，未离于下而尊显者也。舜之玄德升闻时也……天下将归之，其危惧可知。”按，九三犹在下体，乾卦主刚健之进，但下体则不利于速进，故有“夕惕若，厉无咎”之戒。“九三”处于由内卦向外卦发展转化的过渡阶段，“三”偏离“二”的中位，上升到下卦之巅，阳刚过强，可能遭刚折之危。所以大人君子要异常警惕，自强自救，以挽救功业于危险之中。

九四，或跃在渊。

这又以龙为象。“或”，疑问副词，表示不确定的语气。爻辞是说，龙处“九四”之位，或进或退，可能不成问题。宋俞琰《周易集说》（以下简称《集说》）引林希元曰：“九阳爻，四阴位，阳主进，阴主退，是进退未定也。以上体(按：即上卦)言，四居上之下，居上欲进，居上之下则又未必于进，亦进退未定也。以上下二体（按：指上、下二卦。下同此例）言，四初离下体入上体，是为改革之际，亦进退未定也。”又云：“未必于进，非不进也，审进退之时，必时可进然后进也，是谓随时进退。”按：九四升至上卦，上卦主进，故四同样处于进退之际，但不像九三的危惧，而另有其疑问的“或”辞，这是因为上下卦体有别。很明显，“九四”爻位，已由下卦脱出而升到上卦，处于上卦之下，虽有受压迫感，但紧邻“五”之中位，得以大力提携帮助，所以可进则进，可退则退，进退随机而发，而不必冒什么大风险。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爻位不仅处上卦之中，而且是整个卦（包括上、下卦）的中位，“五”为阳位，这样，“九五”既中且正，最为吉祥，是事物发展到最为完美的境界。巨龙早已蓄足精力，一飞冲天，遨游太空，占据了无限的活动空间，居高临下，得以尽情地施展才能与抱负。旧称此爻为“君位”。古人常以龙代表天子，又称皇帝是“九五之尊”，就是从《乾》卦的“九五”化出来的说法。巨龙飞天，大人出现，领袖万物及人类，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潜伏、跳跃、升退各个阶段运动的结果。这本来只是指杰出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但一旦把“九五”之爻与“九五之尊”相联系，封建统治者就企图垄断《乾》卦，把它变为帝王一人之独专。可惜《周易》用来占卜时，使用的是五十根筮草，经过左右手多次的抽数，经由三变，得到位置最下的第一爻。同样的动作程序重复十八变，于是得到全卦六爻。这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帝王之尊用《易经》来占筮，

不一定得《乾》卦九五；相反，布衣百姓，由于人数众多，占筮时得到《乾》卦“九五”的可能性更大。对此，宋太祖赵匡胤及其儒臣王昭素，曾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宋史·儒林传·王昭素传》及《朱子语类》载：宋太祖问，一般人不是“龙”，怎么也会占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呢?言外之意，这最吉祥最完美的《乾》卦九五，当属帝王一人垄断才对。王昭素回答说，没有关系，当我们占到这一卦爻时，“飞龙在天”指陛下，而我们臣下则是“利见大人”。在这里，“利见大人”的“见”，原是解释为“现”，也即利于大人展现而大有作为的意思。但王昭素则直接释“见”为看见，也即利于万民瞻仰大人、以资楷模的意思。这样就在字义上巧妙地转了一个弯，以迎合帝王唯我独尊的心理。昭素虽为儒臣，但并不迂腐，巧妙地利用了爻辞，避开了一次灾祸。朱熹对此大加称赏，云：“此说得最好，此《易》之用所以不穷也。”

上九，亢龙有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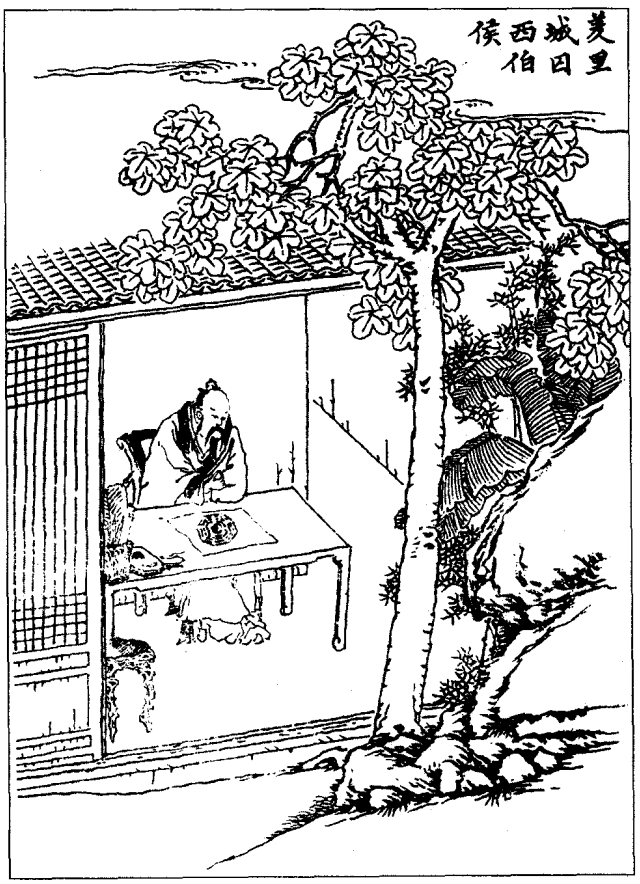
亢，过高过甚。“上九”不仅位处上卦之上，而且高踞于《乾》卦之巅，事物发展到极限，穷极必反，因而同时潜伏着盛极而衰的危机，构成了矛盾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契机。居高位如不思危时，采取措施，防微杜渐，到时将出现无可挽回的后果。这就像“飞龙在天”，如果因为阳刚之劲十足，洋洋自得，只知一味地穿高激飞而不回头，总有一天，会因力不从心而摔个粉身碎骨，这就叫“亢龙有悔”。这也就是《尚书》所称“满招损”的意思。如《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燕人蔡泽于秦昭王时，西入秦游说秦相应侯范雎。泽以商鞅、白起、吴起、大夫种之功成身死为例，以喻范雎贪图爵禄富贵，“功成不去”，必致祸殃，其言称引《易》之《乾卦》上九爻辞，云：“《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熟）计之！”其实，不仅是居高位的人是如此，普通人做事同样也会碰到“亢龙有悔”的问题。譬如打仗，只知进而不知退，最后必然覆军杀将，自取灭亡。再拿音乐歌唱来说，再优秀的高音歌唱家，也不可能在歌唱时几个八度一直高上去，如果这样，必然倒嗓，拗折金口而令听众轰笑。这同样也是“有悔”，犹如巨龙之“亢”而带来了令人后悔无穷的灾难。这是一般的理解。最近看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第十二章《亢龙有悔》，很有启发。小说这样写道，丐帮帮主洪七公独创了一套拳法——降龙十八法，并把十八法中的“亢龙有悔”一路，传授给新收的徒弟郭靖。郭靖开始练时，只知一味加强拳法力量的刚猛，出拳击树，狠攻猛打，只见枝叶晃动，而不见树木摧折。洪七公就此批评他不懂“亢龙有悔”的真谛。于是郭靖重新训练。“练到后来，意兴神会，发劲收势，渐渐能运用自如，丹田中吸一口气，猛力一掌，立即收劲，那松树竟是纹丝不动。郭靖大喜，第二掌照式发招，但力在掌缘，只听得格格数声，那棵小松树被他击得弯折了下来”。初入武林的新手郭靖，在武艺未臻上乘之时，常常用“亢龙有悔”一

路拳掌抗高手，御强敌，成功的关键在于“亢”而“有悔”，刚中有柔，刚柔相济，则无坚不摧。金庸先生所理解的“有悔”，就是刚而知退，知道回头，就不会带来令人后悔的灾难。以上二种理解都有一定道理，其实精神是相通的。处在盛极而衰的“上九”之位，一味亢进必致“有悔”；而从反面思考，“亢”而知“悔”，懂得回头，正确处理矛盾，必然“无悔”。当然，关于“亢龙有悔”，还有其他的解释与譬喻。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以为“盈不可久，若太上皇者也”。像唐玄宗李隆基于安史之乱后称太上皇，居上为贵，但不在“九五”之位，故无民无权，犹如傀儡，受制于人，所以后悔莫及了。具体解释不同，但精神相通无异。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周易》对于数字，有其特殊含义。筮得阳爻，或七或九，九是可变的老阳，七是不可变的少阳；《周易》主变，所以其筮法用九不用七。如果所筮六爻均阳，即以“用九”之辞为占。爻辞说，出现一群巨龙，都谦逊退让而不自居尊首，吉祥。说的是“谦受益”的意思。《乾》卦六爻均阳，亢进知退，明白转机，就能顺利，由阳刚转阴柔，完成由《乾》卦向《坤》卦的发展变化。所以王弼注解释“用九”，是“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与《老》《庄》“贵以贱为本”的道理相合。唐太宗李世民，就很懂“用九”的“群龙无首，吉”的奥妙。他训诲太子说：“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卷十一《教戒太子诸王》）皇帝与太子都是“龙”，是当然的国家元首。但他教训太子，“水能

■周文王被囚羑里



载舟，亦能覆舟”，应取“群龙无首”的态度，谦虚谨慎，兢兢业业，而不以领袖自居，这样才能坐稳天下。所谓“群龙无首”，并不是不要领袖，而是不以领袖自居，全心全意于国家民族，大办实事，干出成绩，自然大家心悦诚服，政权社稷得以巩固。这是“以退为进”的生活辩证法。

有人用周灭殷纣来具体解释《乾》卦六爻所处的不同环境与阶段。“初九”象征周文王被殷纣王拘囚在羑里的时候，文王虽素质为“龙”，原该升天腾飞，但形势不利，力量不足，只能忍辱负重，“潜龙勿用”，蓄积精力以待时日。这是新生“革命”事业（古人谓周朝灭商为“革命”）的需要。“九二”的“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象征文王被释放，“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得到贵族与群众的拥护。“九三”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象征文王战战兢兢，日夜警惕，奋发图强，以免新生“革命”遭危难。“九四，或跃在渊”，象征周武王继承父亲事业，羽毛开始丰满，观兵孟津，以伐殷纣，诸侯会者八百，但因时机尚未成熟，于是耀兵而退。这是跃跃欲试的阶段。“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象征周武王完成灭商建国大业，即天子位，如飞龙在天，普降霖雨以惠万民。“上九，亢龙有悔”，象征周公作《无逸》以诫成王，要求帝王“先知稼穑之艰难”，而不要贪求安逸享受，这是建国后由军事进攻转入和平建设的转化阶段。不知转化和辛勤建设，而一味“亢”进暴取，则很难坐稳江山，成王接受了周公的意见，因知悔而无悔，周邦维新，民族以兴。“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象征成王无为，信贤任能，任用周公与召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天下太平。成王不自为首，而万民敬仰（参《史记·周本纪》及《燕召公世家》）。

程颐和杨万里《诚斋易传》以虞舜为例，初九“舜之侧微是也”；九二，“舜之田渔时也”；九三，“舜之玄德升闻时也”。而反面之例，如“蚩尤后羿莽卓(按：莽指王莽，卓指董卓)，在上而骄其下，在下而忧其不为上，骄则有懈心，何德之勤?忧则有觖心，何位之惧？故终必亡而已矣”！九四“舜之历试时也”；又谓太子之位，“懦于跃则为汉之惠元……躁于跃则为商臣为元凶，其咎大矣”。九五，舜受禅而德被天下；上九，“益戒舜以罔淫于乐”。

总之，《乾》卦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影响很大。首先，世界并没有龙这种动物，“龙”是远古中华民族祖先的一种图腾崇拜，是一种在想像中创造出来的洋溢着刚健元气的神物。因此《周易》作者取来作为《乾》卦六爻的具体喻象。正如朱熹所说：“《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类》）但后人通过对于《乾》卦的学习和运用，把天与龙等联系起来，认为《乾》为君，皇帝是龙，是天子，因此以“飞龙在天”赞颂皇帝为“九五之尊”，这是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者把原始初民的图腾崇拜化为新的血缘宗法之龙的皇帝崇拜。但在现代，社会已进入了现代化的新时期，一改对于

皇帝的个人崇拜，而以“龙的传人”称颂中华文化精神，要求发挥优良的民族传统，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如《乾》卦《象传》所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次，《乾》是纯阳之卦，但通过卦象、爻位及卦爻辞，已形象地展现了由潜龙——地龙——飞龙——亢龙——群龙无首的发展过程，表现了事物的矛盾运动及其由阳转阴、由盛转衰的自然辩证法，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哲理内容。在对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自然本体的哲理探索，及对于辩证法的认识和运用方面，我们祖先对人类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坤

卦第二



大地母亲胸怀广

宇宙本体为何物？的确很难描述。但人们却常用“开天辟地”四字，来具体形容宇宙的元始浑沌状态。天与地是一对矛盾，尽管所处位势不同，但是二者相关联，谁也离不开谁。天之下是地，地之上是天，天之为气轻清上扬，地之为气厚重沉实，轻清者易动尚变而具飘浮无定之态，厚重者拙朴主静而有坚定不移之姿，阴阳刚柔，一动一静，互为对待，相须而成。六十四卦中，《乾》后即《坤》，就是这个道理。《彖传》解释《坤》卦，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意思是说，大地配合上天，开创化生万物，于是地球上就有了自然的生机和生灵。再进一步，土地又是人类社会赖以立脚的基础。《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晋公子重耳（即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落难

■晋文公像



时逃亡到卫国，卫文公对他很不礼貌。经过五鹿（今河北汴阳县东）时，饥肠辘辘，于是向当地人讨饭吃，但当地人很不客气，从地上捡起土块塞给他。当时重耳很生气，想要揍他，但被他的谋士子犯所劝阻，并解释说："这是上天赐给你的土地。"言外之意，有了土地就有了建国家立社稷的根基。重耳明白了，于是向土块行礼，"受而载之"。后来晋文公强大了，打了回来，占有了卫国的土地，果然是受土得福。在肚子饿得发慌时，居然对不能吃的土块稽首行礼，可见古人对土地的重视。其实，何止是古人，今人也一样。游子远走千万里，经常随身携带故乡的一撮土，今日华侨，多有此例。现代诗人更是满怀激情，引吭高歌："啊，地球，我的母亲！"古今说法虽然不一，但其中所包含的深邃哲理，却是精神一致，殊途同归。

《坤》卦象是䷁，由八卦中的坤（☷）两相重叠而成。"--"的符号代表阴。《坤》的上下二卦六爻皆阴，是一个纯阴卦。《说卦传》解释说："坤，地也。"象征大地。又"坤，顺也"，象征阴柔温顺的事物。从文字训诂看，"坤"古文为"巛"，"巛"即"顺"的通假字。又因《坤》卦与《乾》卦相对而立，乾为君、为父、为男、为刚健；则坤为后、为母、为女、为柔顺。于是后人又引申出许许多多意思。后来卜筮释卦或研究者，就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来作具体的发挥。如果说《乾》卦强调天道刚健的自强不息，那么《坤》卦则性属阴柔，强调驯顺天道，静合自然，兼容并包，"厚德载物"。所以《彖传》说是"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就是说，大地母亲张开了她那深厚广大的怀抱，用源源不绝的丰富乳汁，哺育着大地上所有的孩子（即地上的万物和生灵）。总之，没有矛盾，就不成事物。《乾》与《坤》，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一进一退，一刚一柔，相反相成，构成宇宙自然的根本，形成了中国传统观念"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文化源头。

卦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关于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断句不同，则解释各异。我们则不拘一家，择善而从。卦辞的意思是说，《坤》象征土地，与乾天一样，具有元始开拓、亨通流畅、和祥有利、贞正无邪的四大属性或职能。但是大地顺天而行，不为物先，的的随行。乾为天之龙，坤为地之马，"龙马"相配，正是中国古称。所以这里以母马（而非公马）为喻，取其性柔而能行，以象征大地母亲那艰苦奋斗、滋育子孙的胸襟与德能。母马只要守持贞正无邪的品格，就具有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君子据此而前进，如果抢在人前盲目领头，必然迷失方向；要是上顺天道自然，紧随君主圣贤之后，克尽臣职，就是吉利之兆。中国古代，方位与八卦相配合，坤属西南，阴气蕃盛；艮属东北，阳气滋生。坤为阴物，往西南行，虽然遇阴获友，但又同类相斥；往东北则阳气渐生，虽然丧失了阴类朋友，但与阳刚呼应，阴阳相生，反而是通往成功的道路。这样只要安顺地守持贞正品性，就会吉祥如意。《汉书·律历志》曾解释卦辞中的"东北丧

朋”一句，说这是阴阳“答应之道”，最后彼此庆贺。阳无阴不成物，阴随阳而彼此呼应，滋成万物，繁荣昌盛，则是“同心一统之道”，皆大欢喜，吉祥如意。不过这种以阴阳五行及方位之说来解释卦辞中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恐怕不一定符合原始文本的历史，这是后来的象数易学家的现代视角的认识。近人胡朴安《周易古史观·总说》云：“《坤》之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言文王之国在西南，往西南必得朋；殷纣之都在东北，往东北必丧朋。”这一新解，比较符合历史文本的原义。而汉儒阴阳方位之说，只能作为参考。以后《蹇》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卦辞“利西南……夙吉”，同样可依胡朴安说来解释。

人们又称《坤》卦是柔顺地辅助君主的“后卦”。在封建社会以前，皇后处于尊位，除皇帝外，无人能比得上，所以在我国故宫中，皇后所住的宫殿名“坤宁宫”。人们又常称皇后是“天下母仪”。但不管是“坤宁”之义，或是“天下母仪”，都是从《坤》卦引申出来，文化来源是很古的。据《新唐书·后妃传》载，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年轻时回娘家，有两匹大马立于皇后的屋外，家人惊慌，占筮后“遇《坤》之《泰》”。当时的秦王李世民还处于兄弟建成、元吉的威胁之中。但释卦者认为，“《坤》顺承天，载物无疆；马，地类也；之《泰》，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又以辅相天地之宜”，具有“后妃象”，是个大吉大利的卦。长孙皇后受此启发，一生兢兢业业，辅助唐太宗建成帝业。如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授甲宫中，“后亲慰勉，士皆感奋”。由此可见，《坤》称“后卦”，并不是一切顺随别人而没有主张，而是强调辅助英明君主创建大业。一味阿顺媚容的皇后，恐怕皇帝也不会真喜欢她。如《明实录》及《明史·后妃传》载，明神宗朱翊钧的王皇后，正位中宫四十二年，从来不敢对皇帝说个“不”字，一生唯唯诺诺。虽然如此随顺，但明神宗却很不喜欢，把她冷落一旁。因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王皇后及三宫六院的千万美女，阿顺随人，缺乏个性，作为一个人是不健全的，是精神残废，无法与明神宗产生感情交流。唯有郑贵妃一人，出身民间，身分低微，但作为一个颇富个性的聪明女子，却常对明神宗多所反驳，语有劝谏，甚至是嘲笑讥讽，也时有发生。但明宗偏偏喜欢郑贵妃，她因此而专宠后宫，致令百官疑惧，以为对太子（王皇后生）不利。实际上，明神宗喜欢敢与他抬杠的郑贵妃是有道理的，因为三宫六院的千万美女，无一不唯唯诺诺，这使皇帝生厌，而有身处精神沙漠的苦闷。而郑贵妃的抬杠，却显出了女人的个性与魅力，使皇帝在精神饥渴中获得了充足的感情琼浆，他们的内心因交流而得到了平衡与满足。当然，像郑贵妃这样的女流，要小聪明，也算不得什么“天下母仪”，与《坤》卦关系还不深。但像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却是《坤》卦的象征与典范。史称长孙皇后虽然柔顺，但为国家而绝外亲专政之祸；又劝唐太宗纳谏，对于魏徵的直言极谏，太宗有时恨得咬牙切齿，但经长孙皇后一劝，立刻醒悟。宫中马死，太宗欲杀养马人，皇后引春秋时晏子谏齐景公

故事，数落为马杀人之过，她说：“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太宗意解，对宰相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见《贞观政要·纳谏》）作为“天下母仪”，也需要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坤》卦的柔顺，是随顺进步，促进有为，而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俗阿顺逢迎拍马。

下面再谈爻位爻辞。

初六，履霜，坚冰至。

在上下二卦的六爻之中，按《易》例初、三、五奇数为阳位，二、四、上偶数为阴位，阴阳各半。如果阳爻据阳位，阴爻据阴位，称为当位得正；相反，阳爻据阴位，或阴爻据阳位，称为失位不正。又象数中“九”代表老阳，“六”代表老阴，所以全卦六爻中，阳爻称“九”，阴爻用“六”。《坤》卦初六，处于下卦（又称内卦）之初，象征事物的萌芽阶段，阴据阳位，失位不正，表示阴气渐积渐盛，阳气衰退。在节候上，阴象征寒。就像足履微霜，虽非严寒，但却预示着严寒坚冰必降的自然规律。人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是这个意思。用《易经》六十四卦来占卜的人，就应该具备这种未来的眼光，这样他的预测才会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相反，拘泥于卦象卦辞而就事论事，反而是胡说八道，违背了作《易》者的原意。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二的爻位，阴据阴位，处于下卦之中，居中得正，非常吉利，爻辞是说，在阴柔上升的第二阶段，立位正直，居体端方，胸襟宽广，包容万物，从位、体、用三方面保持自然品质，这样虽然“不习”也无不获利。所谓“不习”，并不是无须学习。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后来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的传统偏见；而在奴隶社会中，则仍多少保存了某些原始公社母系社会的遗踪或残余，对妇女的歧视反而没有这样厉害。因而“不习”之“习”，是人为故意雕琢的意思。这句的正确解释，就是王弼所说的“不假营修而功自成”，强调自然的品质，反对虚伪矫饰，也就是大地的柔顺之道发出的自然光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与《乾》卦之君相对，这是从《坤》卦的臣道立言。六三已上升到下卦之终，处于由下卦向上卦也即由内向外发展的过渡阶段。阴爻处阳位，虽然处正非正，但阳位之势，内含阳刚美质，君子可以据此守正无邪；或者克尽臣职，辅助君主，“有善则归之于君”，“不敢当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终”而已（见《程传》）。在古代，特别是专制时代，伴君如伴虎，压抑了人性，即使有功也不敢自居，而是归功君主，所以古人有“无成有终”的经验总结，其中隐含了多少人生的悲慨。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四已由下卦上升到上卦，处于上卦之初，由六三过渡而来，六三的“无成有终”的阴影宛然可见。“括囊”，就是把布袋的口子扎紧，意思是六四处上卦之下，下挤上压，虽然处位得正，但仍须谨慎小心，免开尊口，或杜门隐居，犹如扎紧口袋一样，才能保全自己，虽然“无咎”（没有祸害），却也因此失去了荣誉。荀子对此非常不满，批评这些“无咎无誉”的“括囊”之人为“腐儒”（见《荀子·非相》），说是造就了大批乡愿，无益于社会的发展，这说明了旧社会对于人才的严重压抑。为求生存，不得不“括囊”无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进步缓慢，多少与此“括囊”观念有关。悲哉！

六五，黄裳，元吉。

六十四卦中，“五”是全卦的主位。《坤》称后卦以此爻为据。《坤》卦六五，虽然阴据阳位，失位不正，但却处于中位。古人极重中道。阴柔虽处尊位，但行中道而谦恭下士，自然被下面的人臣百姓所拥戴。在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中，青、赤、黄、白、黑，黄为土色，方位居中。黄色正是“中道”的象征。而“裳”则是下面的裙服，象征谦下。行中道而谦下待人，当然无不大吉大利。所以六五之爻，穿上黄色裙裳，吉祥如意，是个至为完美的征兆。阴阳五行学说，虽是后来战国时代兴起的，但论其思想渊源，早滥觞于六十四卦。《周易》并非儒家专书，这也是一个佐证。《坤》之六五，虽然其爻吉祥至美，但并非所有人占得此爻都是吉兆。如春秋时鲁国的费邑宰南蒯，欲以费邑叛鲁降齐，筮得《坤》六五的“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但子服惠子坚决不同意而斥之，他说：“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认为《坤》六五的随顺，是服从于积极、进步、正义的自然要求，所以称“元吉”；而叛乱之事，则与正义事业相反，违背了作《易》者的原意，所以“筮虽吉”，但不可行（事载《左传》昭公十二年）。这是一种聪明的释卦与预测，表现了解释者的进步思想倾向，同时也是“《易》无达占”的一个生动例证。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上六是事物发展到顶点的转化阶段。但阴气盛极而衰，阳潜其中而生，阴阳摩荡，对立转化，所以用“龙战于野”作譬喻。所谓“战”，象征天地阴阳的矛盾与碰撞。也有人把“战”释为“接”，认为阴阳二气交接互合。解释有异，但精神实质并无二致，都强调了阴阳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其血玄黄，其实即指天地，古人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以血色喻，天玄地黄，天地为阴阳和合，所以能产生万物，厚载不偏。

用六，利用贞。

意思是说，用“六”数代表阴柔事物，利于永远守正无邪。所谓贞正，就是明白《坤》卦柔顺的理势，随顺自然，刚柔相济，所以吉祥有利。

总之，从《坤》卦初六的“履霜，坚冰至”开始，一直到上六的矛盾转化，用六的“利永贞”，体现了阴柔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揭示了刚柔相济的朴素生活辩证法。阴柔事物其性虽柔，但渐积渐盛，力量同样无穷，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化，也可以向坏的方向发展。所以应该随顺自然，因势利导，积极促成矛盾向好的方向转化。柔而不刚，只知随人脚跟而毫无主见，则只是奴才而已，并非健全的人。柔中有刚，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后来的道家颇受《坤》卦影响，并不因柔顺而丧失人的主体意识，而是积极发展阴柔事物的积极方面，强调“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刚者易折，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补充了《乾》卦精神而强调阳刚的不足。有了《坤》卦的启示，刚柔相济，阴阳相生，“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观念就愈加牢固地生根发芽，植入人心，成为影响千秋万代的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观念。

屯

卦第三



万物初生步维艰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一群“野孩子”分成两队“打架”，小朋友总是被大孩子欺负，翻不过身来。这时，我多么盼望着快快地长大！回家时，望着残垣颓壁上的墙头草，常好奇地想着，那柔弱的小草，怎么有本事顶住砖石重压，破土而出，迎风飘扬的呢？以后游黄山，面对千丈峭壁上那斜穿直上的青松，又不禁肃然起敬：松树初生，幼芽嫩苗，又是怎样经受巨岩的沉重压迫，挤出缝隙，巍然挺立的呢？读了《易经》的《屯》卦以后，眼前突然展现了一幅事物初生时艰难成长的形象图画。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已沉浸在深邃的哲理思考中，寻找战胜那摧残幼苗、吞噬生命的魔王的耐心和力量。六十四卦中，《乾》《坤》之后，紧接着就是《屯》卦，这里自有学问。如《序卦传》所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屯》卦的内容，就是对于新生事物艰难成长过程的一种特殊概括。

《屯》的卦象是䷂，下震（☳）上坎（☵），象征着事物初生的艰难。《说文》云：“屯，难也，象艸（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一，地也，尾曲。”也就是说，“一”画代表土地，其余代表刚萌芽的植物种子，草木萌芽又因土地的压抑，扭曲着身子，破土而出。这里既有受压的痛苦，又充满了对于新生未来的希望。从卦象看，上卦坎（☵）是云，下卦震（☳）为雷，云在雷上，象征雷雨将下而未下之时。乌云满天，雷声隆隆，云雷方兴，屯难之始，出门在外，人多丧胆。就以原始人类的初生为例，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艰难跋涉。人类文明的建立，绝非偶然，它曾经历了四次冰河时期。或是火山爆发，或是洪水滔天，或是冰天雪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气候、土壤与森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淮南子·览冥训》所描绘的：“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

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但处于婴孩时期的原始人类，在经历了大量的死亡之后，终于在废墟上创建了新的文明。古典学者迈尔斯（Myres J. L）在《谁是希腊人？》中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明：“在没有树木可以巢居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地上；在果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们就食肉度日；他们宁肯取火、制衣，也不肯追逐阳光的温暖；他们守卫洞穴，训练后代，设法在这个好像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世界里找出个道理来。”（见汤因比《历史研究》引）在毫无道理的残酷环境中“找出个道理来”，人类文明终于获得了新生。

古代文化典籍如《左传》、《国语》及王弼《周易注》，常用“互卦”的说法来作为解释卦义的重要参考。所谓“互卦”，就卦六爻之间，除初与上二爻外，中间四爻又相互包涵，由二、三、四组成下互之卦，三、四、五则组成上互之卦。“互”者，包涵了互卦与本卦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变化的内容。从《屯》卦（䷂）的卦形看，下互之卦由六二、六三、六四组成八卦中的坤卦（☷）。坤，顺也，说明弱小者必须顺应自然之势，以求生长之机。又坤于时令为立秋，象征万物致养，并意味严冬将降，致养则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即可增加克服困难的力量。上互之卦由六三、六四、九五组成艮卦（☶），艮为山，德性为止，象征知险难而止步，不盲动，不躁进，“十年不字”，知幾而动。又艮于时令为立春，正是万物复苏、重萌生机的时刻。关键在于克服困难的条件、决心与实际行动，以及如何把握时机。失机者则窒息生机、溺于上卦的坎险之中；反之，得机者则生机勃勃。因此，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很重要。

卦辞曰：“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意思是说，《屯》卦象征事物初生，兼有元始、亨通、有利、正直四德。但与《乾》《坤》二卦的四德不同，在初生之时，举步维艰，因而事物四种德性的形成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如果独立冒进，就会陷于险境，所以不宜轻举妄动，这时利于建诸侯而广资辅助，在众人的大力帮助下，创建新生事业。从卦象的变动来分析，震为雷为动，性为刚；坎为水为险，性属柔；震动于下，而险在其中，所以《彖传》说是“刚柔始交而难生”。于此可见，事物的初生并不太平，而是“动在险中”。但卦辞所说的“勿用有攸往”，并不是因险不动、知难而退的意思，犹如女人生孩子，不能因痛苦就不去生养。相反，应该创造条件，在较有利的环境中涉险而动。原始女人因难产而死亡的是很多的；而文明社会中，医院的科学手段则为迎接新生命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也就是卦辞所说的“利建侯”的意思。“勿用有攸往”与“利建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正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只有深刻思考，周密安排，才有条件去涉险而动，从而获得新生。这也就是《象传》所说的“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的意思。也就是说，君子观《屯》象，“当悟知当局势初创多艰之时，须奋发治理天下”（黄寿祺语）。比如南北朝时，宋武帝刘裕北伐，命大诗人谢灵运作《撰征赋》，说是“民志应而愿税，国屯难而思抚”（《宋书·谢灵运传》），正确理解《屯》卦精神，奋发有为，

排除艰难，北伐胜利，解民倒悬，因而刘宋皇朝应运而兴。相反，如秦二世胡亥不思创业屯难，一做皇帝，立即纵情声色而不知“经纶”，结果国亡身死，丧失万世基业。这一正一反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卦辞的精神，不是临难畏缩，而是强调积极有为以求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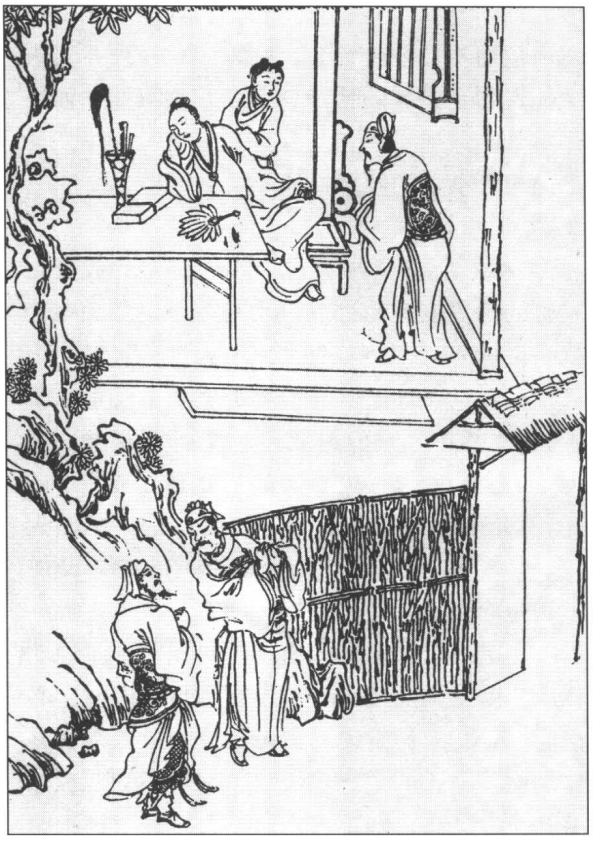
下面再从爻位爻辞的变动进退来谈初生事物的发展过程。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

按照《易》例释卦，有“卦主”之称。所谓“卦主”，即六爻中的成卦之主，卦主所据爻位极其重要，其余五爻的位置变动与进退，均视与卦主的关系而进退，形成各爻间的种种关系。也就是说，各爻围绕着卦主之位为轴心旋转，因此，只要把握“卦主”，就能纲举目张，有助于理解卦爻的精神实质。《屯》卦的初九位处下卦之下，阳爻居阳位，居位得正，是成卦之主。全卦四阴爻二阳爻。一般地说，凡卦爻中，阴阳以少者为主，所以《屯》卦的初九和九五，二阳为四阴之主。其中九五虽处尊位，但因处于上卦坎险之中，二阴夹击，陷而失势，所以反而是初九变成全卦之主。初九一阳震动于下而全卦随之，是否能够“涉险而动”，获得新生，关键在于知幾而变化。爻辞是说，初九，流连徘徊，观测形势，利于坚持贞正品格，利于广建诸侯以获辅助。所谓“盘桓”，正说明初九处位最下，象征事物刚一诞生就遭遇到巨大的压迫，所以在力量稚嫩时，必须坚守正直而不肯动，广寻帮助而积蓄力量。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初九爻象爻辞所示，正是这一意思。但“盘桓”之后的“利建侯”，又说明初九虽然面对险难，谨慎小心，但那破土而出的新生之势，则不可逆转，关键在于捕捉时机。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如，语气助词。屯如，邅如，艰难不进的样子。班，多貌。匪，通“非”。字，婚嫁。爻辞以古代氏族的抢婚制度为喻，意思是说，六二，揭示草创艰难，彷徨不前的发展阶段。犹如乘马者纷纷到来，这不是强盗，而是抢婚；但女子知屯难，于是坚守贞正而不嫁，等待了十年之久，终于如愿以偿，嫁个如意郎君。按《易》例，各卦六爻之间的升降进退变化种种关系，其中有所谓乘、承、比、应的名目。“应”，是指上卦三爻与下卦三爻各相对应的关系，照规定是初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如果上下卦对应二爻是阴阳呼应，称为有应；反之，二爻同阴或同阳，同性相斥，称为无应。一般以有应为美，而以无应称凶。阴阳相应，象征事物的矛盾对立与统一和谐，故一般呈吉兆。但《易》重变，又应视具体情况分析，而不能说死。如《屯》六二阴爻居阴位，居位得正，又处下卦之中，上应九五，阴阳呼应，按常例该是吉兆。但九五如尊贵者乘马前来抢婚，而六二如女子，却又乘凌初九阳刚，为初九所牵制。《易》例之“乘”，就



■刘备三顾茅庐

是阴爻居阳爻之上，犹如小人乘凌君子，故爻义多不吉。若阳爻居阴爻之上，因《易》强调阳刚为主，是为正常现象而不称“乘”，《屯》六二乘凌初九，已呈不吉之兆，加以呼应九五之时，又被六三、六四两阴爻所阻隔，犹如二小人向九五进谗，故上面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允婚，形成“屯如邅如”的困难局面。不过“十年乃字”四字，又预示了事情的转机，于黑暗中见光明。“十年”表示时间长久，同时又暗示了将有时来运转的机会。险中守正，绝不盲动，长期坚持，终于如愿。六二说明了守持贞正以等待时机的重要。史载伊尹之待商汤，吕尚之事文王，明君贤相，两相求匹，犹如处子的“十年乃字”。又如三国时诸葛亮躬耕陇亩，以待时机，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诸葛隆中纵谈天下，终于出山，艰苦卓绝，开创了蜀汉的数十年基业，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相。这不就是“十年乃字”的又一生动事例吗？所谓“十年乃字”，就是难极而通，恢复正常，牢牢地把握一缕生机，而开拓出一片新天地。至于乘、承、比、应中的承与比，“承”是指下爻紧承上爻，以阴亲阳而当位为吉；“比”是指相邻二爻的关系，如初与二比、二与三比，三与四比，四与五比，五与六比。在相比的过程中又体现了或乘或承的关系，其吉凶又视其相邻二爻的作用与反作用而定。以后说到具体卦爻，再举例说明之。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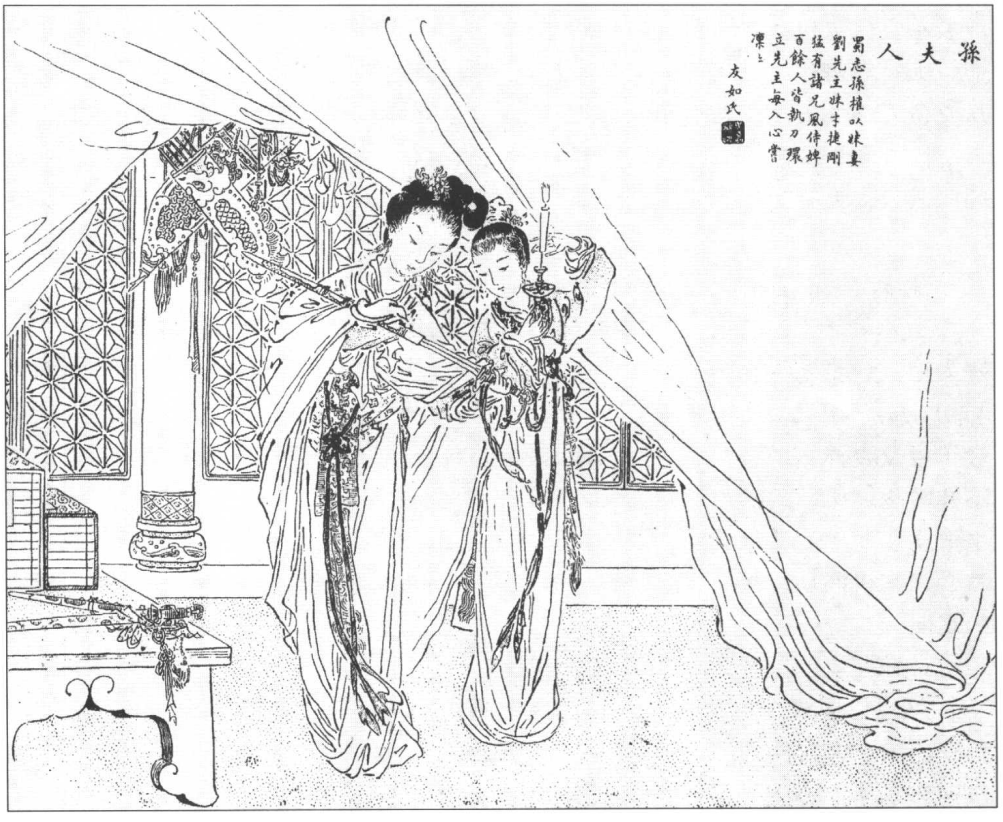
即，就，追求或捕捉。虞，虞人，古代管理山泽的官吏。幾，动之微，就是事物细微变化的迹象。爻辞是说，猎取山鹿而没有虞人作向导，就会在茫茫林海中迷失方向而一无所获，因此君子见机行事，舍弃追捕。如果固执冒进，必然会有凶险憾惜。六三处于下卦之上，急于升向上卦，但阴爻据阳位，居位失正，又与上卦的上六同性相斥，不相呼应，基本是个凶兆。所以爻辞的主要精神是强

调知幾识微，反对急躁冒进。比如汉代末年，外戚何进为大将军，他为了驱逐宦官集团，决定召集董卓等割据各地的军阀率兵进京，当时陈琳（建安七子之一）就称引《屯》卦六三的“即鹿无虞”之说加以劝阻，认为何进不明形势，急躁冒进，引狼入室，必致大祸。何进不听，专断独行，终于身死族灭，天下大乱。事载《三国志》卷二一《陈琳传》。由此可见，六三“往吝”的预测，并非唬人之语，而是有实际的内容。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爻辞是说，乘马者纷纷前来求婚，大胆前往无不吉利。六四已由下卦升到上卦，处于上卦之初，又紧邻上面“五”的尊位，得到尊者的有力援助，所以六四与初九上下阴阳相应，如求婚配，虽然中间有六二、六三两阴爻的阻隔，但只要方向明决心大，那么任何障碍都可以超越，一定会达到目标，所以说是“往吉，无不利”。比如史载三国时刘备占有荆州之后，吴主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及京剧《龙凤呈祥》，据此渲染，写刘备江东招亲，是为联吴抗曹的政治需要。吴国统帅周瑜等，犹如

■孙夫人像



小人，百般阻挠孙、刘联婚，派兵追杀刘备及孙夫人。但诸葛亮定下锦囊妙计，鼓励刘备毅然冒险去江东。终于娶孙夫人回荆州，周瑜诡计失败，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是《屯》六四爻辞所称“求婚媾也，往吉，无不利”。这是鼓励人们面对险难而不气馁，振奋精神，排除障碍，去争取新生的机会。这种开拓和拼搏的精神，值得提倡。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屯，作动词用，克服困难以屯聚能量。贞吉，守正以获吉祥。贞凶，守正以避凶险。爻辞是说，九五之爻，克服困难积聚能量，准备对下施其膏泽，柔小者守贞可获吉祥，而对于刚大者言，则仍须行动谨慎，守正以避凶险。为什么爻辞说“小贞吉”而“大贞凶”呢？这应该从爻位爻象来分析。照理说，九五处全卦的尊位，阳刚居中且正，应是一卦之主才是。但九五处上卦坎中，坎为险为陷，其象为☵，二阴包围一阳，九五陷于坎险之中，难以自拔，位势不利，无法自主，而让位于初九。因此，九五虽然是居中且正的有力者，小动则力量有余而吉祥如意；如办大事，则因陷于坎中，非积蓄力量不可妄动。不然，如陷泥泽，挣扎愈力，所陷愈深。例如1991年夏秋之际，我国发生特大水灾，国家开国库并动员世界募捐以救灾。这就是“屯其膏”。处大灾中，损失极大，力量相对薄弱，应鼓励灾区人民生产自救，可获吉祥；反之，不顾形势艰难，想要一下子建大事业、大打翻身仗，则可能因膏泽不足、力量不达而失败。这就是“大贞凶”。而从爻位看，九五虽是初生事物破土直上的成功阶段，但居上者如不兢兢业业，守贞防险，而是逞强冒失，就可能功亏一篑，饮恨而终。于此可见，爻辞“大贞凶”云云，大有深意。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上六处于上卦之终，是初生事物难极而通的矛盾转化阶段。爻辞仍以古代婚嫁为喻，说是乘马求婚，一无所应，女子唯有伤心泣血泪如雨。通观全卦，六四与初九阴阳相应，所以婚媾之求，“往吉无不利”。九五与六二阴阳相应，所以守正可获吉祥，或可避免凶险。而上六与六三，二阴同性相斥，全不呼应，如果不知转化之机，仍然与六四、九五一样，乘马前往求婚，以阴求阳不得，则徒自失败伤悲而已。爻位爻辞，说明了新生事物虽然已经萌芽，但要继续健康成长，就必须知机而动，而不可有骄矜满盈之色。不然，必导致“泣血涟如”人生悲剧的重演。

总之，通观《屯》之全卦，旨在阐明初生萌芽及创业的艰难。天地之初，草昧迷濛，大自然的一切，都混乱而毫无秩序。要从这里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又谈何容易!但新生事物，并不因艰难困苦而退缩不前，相反，君子知幾而动，正

是经纶天下大有作为的时期。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不过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当秦二世时，秦法严酷，天下大乱，萧何、曹参等推他为首，带头造反。这时，他如果知难而退，又怎能开创两汉三、四百年的基业呢？只要持正而行，待时而动，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新生的幼苗就会成长为参天大树。当然，其间诸如风雨交加、冰雪盖地等摧残幼苗之事，应该严加防范。真正爱护新生事物，就应该为它的茁壮成长创造条件，而不是说空话，发大愿，等到幼苗枯死，再来伤心泣血，到时悔之晚矣！

蒙
卦第四



启蒙发智树根本

中国是龙的故乡，古往今来，人人望子成“龙”。但要孩子成“龙”，又谈何容易？这就必须教子有方了。童蒙教育，的确是事关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古代有“孟母三迁”的传说，说是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历尽千辛万苦，几次搬家，最后迁到紧靠学校的地方，琅琅的读书声，造成了很好的文化气氛，经过环境的熏陶教育，终于造就了一代儒家亚圣——孟子。这一生动的故事，已经成为传统教育的千古美谈了。而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儿童更为幸福，政府推广小学初中义务教育制度，为一切儿童接受良好教育，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优越的条件。但遗憾的是，在重商浪潮与拜金主义的冲击下，有人强迫自己的孩子放弃童蒙教育，十来岁的孩子，就去做个体户的童工，于是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人们口袋里虽然一时增添了几枚铜钱，但是文明大国有可能蜕化为文盲大国。现实虽然距离这一程度尚远，但如步步后退，其后果严重，不堪设想。童蒙教育，古今异势，应该是迅速进步才是，而现在出现大批童工不受教育，岂非咄咄怪事！读了《易经》的《蒙》卦以后，令人汗颜，实在该是震悚反省的时候了。

《易经》六十四卦，《蒙》在《屯》后，事出自然。天地乾坤生万物，万物初生受屯难，而生命破土萌芽之后，始出浑沌朦昧，无知无识，不知天地为何物，人生有何事，人类的幼年，如不接受童蒙教育，怎么能够健康成长呢？缺乏教育，就会愚昧无知，这样即使身体健康，四肢发达，同样也是一个头脑简单、思想愚昧的“残疾人”。思想残疾比身体残废更可怕！因此，从卦序看，《乾》《坤》之后，紧接《屯》《蒙》，正说明了古人对于童蒙教育的重视。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学校》引《物理论》云：“学者植也。”



儿童不经童蒙教育，犹如草木萌芽之后不加培植，就会逐渐枯萎致死。故《吕氏春秋》卷四《尊师》云："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按：爽，病也）。"人如果不学习，那么虽然有天生的耳、目与口，但还不如聋子、瞎子和口吃的人。学习始于童蒙，尤为重要。所以宋代张载特别重视幼儿教育，要求人们以身为教，"示以好恶有常"之行，他并进一步说明其道理："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见《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相反，如果不注意教育孩子，人类积累万千年的文明进步，就会因为出现新一代的知识断层而葬送。所以古代政府规定，如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二《辟雍》云："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故《礼》曰：'十年曰幼学。'"南朝宋傅亮草拟《立学诏》亦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其实不仅是政府，民间也早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虽然是后来的事，反映的是等级制度的统治思想，但教师可与"君"、"亲"并列于"天地"之后，正可看出《周易·蒙》卦影响的深远。

《蒙》的卦象为䷃，下坎（☵）上艮（☶），象征启蒙。《序卦传》解释说："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蒙是事物发展处于初生幼稚的阶段。又《释名·释天》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蒙又是阴暗、暗昧的状态。后用于人事，引申指蒙昧无知。如《左传》僖九年："王曰小童。"孔颖达疏云："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谓之童蒙焉。"人类初生，蒙昧

幼稚，必须接受启蒙教育，才能健康成长。从卦德分析，上艮为山为止，下坎为陷为险。“山下有险，险而止”（《彖传》），遇险而彷徨止步，犹如蒙稚智慧未开之时，不知所措的状态。而从卦象看，上艮为山，下坎为水，山泉淙淙，冲石激湍，汇为江河，渐行渐远。这又象征儿童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几经曲折，智慧渐开，终于健康成长。从卦象与卦德方面看，已可明白《蒙》卦那“启蒙发智”的精神所在了。

从互卦看，下互九二、六三、六四组成震卦（☳），震为雷为动，学童年幼好动而多变，多问好学，故“动”并非坏事，由思想不定型，经过学习而逐渐有主见。上互由六三、六四、六五组成坤卦（☷），坤者顺也，顺从自然，强调学习应循序渐进；又坤为地，地厚德载物，说明学无止境，博大精深，犹如大地兼容并包，容纳各种学问。

卦辞曰：“蒙：亨。匪（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渎，乱也。意思是说：《蒙》卦象征启蒙，有教育就会亨通。不是我求学童来学习，而是学童向老师求教。初次求问决疑则教之，再三再四地胡乱发问就不予回答。利于守持贞正。这里阐明的是教学相长的启发式教育的精神。教是为了学，是为了启发蒙稚，增长知识，德智全面发展，这就是卦辞“亨通”的意思。其实，不仅对于童蒙，就是对于一般的成人，一样要重视启发式的教育。“学问”一词，既有学，又要问，学离不开问。但所谓“问”，不是未经思考的胡乱发问，一切依赖老师。而是要经过独立思考，冥思苦想，才能就知识的要害之处提出关键的问题，由此而举一反三，迅速提高和进步。于此可见，做个好学生，必须善于发问。不假思索，胡乱发问，说明学生尚未认真思考。如果老师有问必答，那么虽然学生也可能暂时增长一些知识，但缺乏学习和思考的自觉性，以后再遇到难题，又会重新陷入混乱的思绪之中而茫然无措。这不是真正对学生负责，而是培养学习的懒汉。所以后来荀况受《易·蒙》卦影响，在《荀子·劝学》篇中说：“问楛者，勿告也。”楛，指恶劣或不正当的事情。特别是儿童，童稚未开，不辨黑白，不问好丑，都感兴趣。对于他们胡乱问“楛”之事，“勿告”的说法，实际就是加以制止，而把孩子的思路另外引向康庄大道。在这方面，孔子堪为后世师表。他称自己做教师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表现了一位伟大教育家的崇高献身精神。但“诲人不倦”，自有方法，而非有问必答。他曾明白地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均见《论语·述而》）可见他对学生的教育，不是盲目灌输，而是因材施教，实行启发诱导的方法，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让求学者产生强烈的求知心理，而童蒙一旦自觉，则可塑性特强，可收事半功倍的良好教育效果。孔子精熟《易》理，正确发挥了《蒙》卦“初筮告……渎则不告”的精神原则，启发了童蒙的学习自觉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后来宋代苏轼受其影响，在《东坡易传》中提出“自得、自悟、自胜、自达”的“四自”，强调启发儿童学习的自觉性，这

样的教学效果更佳。但是在启蒙教育过程中，无疑的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尊敬师长，所以说是“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里强调的是启发式，而不是填鸭式的教育。蒙稚学童，开始是糊里糊涂，对什么知识都感兴趣，因此就会因好奇心的驱使而胡乱发问；对于别人的话，缺乏分辨能力，常是听什么就信什么。而从教育规律来看，知识的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就像肚子虽然很饿，但是饭还必须一口一口地吃，胡填乱塞，囫囵吞枣，贪多嚼不烂，反而有害健康。对于学生的胡问，教师若是有问必答，并不一定就是尽心尽责，因为学生脑子里一下子填满了教师的意见，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教师马首是瞻。试想，一个不会思考也无法思考的学生，不是思想的残疾又是什么？因此，童蒙渎问再三，教师不讲究方式方法而有问必答，虽然心热，却误人子弟，这就叫做好心办坏事，违反了教育的规律。卦辞的精神与此针锋相对，故称“初筮告，再三渎”。“学而不思则罔”（《论语·为政》），“学问”之“问”必出于“思”。填鸭式的教学，不去发挥学生思考的主动性，那学生思路就会糊涂一片，怎会明白事理以开发蒙稚呢？还有，卦辞的“利贞”二字，也颇寓深意。《彖传》解释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学习“入门须正”的意思。把学童的启蒙教育引入正途，根正苗壮，茁壮成长，就有可能培养和造就出一代贤圣英才，所以《吕氏春秋》以为“圣人生于疾（力）学”（见卷四《劝学》篇）。《彖传》以为启蒙教育可以致“圣功”，并没有夸大，而是符合实际的。另外，蒙稚学童，不明事理，顽皮难教，因而给启蒙教育带来了特殊的困难。《蒙》的卦象为“山下出泉”，溪水遇山石阻挡，千回百折，不屈不挠而果其行。这又象征启蒙教育，必须具备“君子以果行育德”的坚毅献身精神。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片废墟，但因重视中小学教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日本人在其他方面省吃俭用，勒紧裤带，但却拨出特别经费，扶持和发展小学教育。日本人民为教育而作出了自我牺牲，在六、七十年代后，终于开花结果，把日本引向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为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爻辞爻位的进退变化，又说明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规律。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刑人，旧注一般解释为犯罪受刑罚的人，以为是“痛加惩责，使知敬学”。这一说法虽亦可通，却太牵强，对待学童，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严厉而残酷的手段，视如寇仇呢？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学》，则引《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等例，训“刑”为“法”，是“刑”与“型”同。刑人，就是典型。言之有据，义义通顺。桎梏，刑械手足的刑具，如今之镣铐。说，通“脱”。爻辞是说，初六，有利于运用典型来进行启蒙教育，以便使人增长学识，知法守律，免于犯罪；如果学习不专心，急于求进，必致憾惜悔恨。初六处位最下，阴居阳位，居位失正；象征启蒙的最初阶段，正是浑沌朦昧、一片无知的状态。这时的启蒙工作，适于树立典型，运用具体形象进行教育：从教的角度，为人师表，最

重身教；从学的角度，是先具体后抽象。如果超越形象教育的“典型”阶段，要求学童一下子就学习许多高难度的抽象知识，学童内心畏惧，就会对学习产生抵触心理，这样反而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蒙》卦六爻，四阴二阳，同样是以阳爻为主，九二阳爻处阴位而失正，原非吉兆。但是读卦读爻应掌握“《易》无达占”的灵活原则，不能拘泥字面或一成不变，而要视其所处的具体情势而言。中国古代更重视中正之道，九二处于下卦中位，阳刚适中，上应六五，阴阳交接，蒙以养正，这是吉象，所以成为全卦之主。上九则过刚不中，有违中道，因此，不可为主。爻辞是说，九二，兼容并包，无所不教，吉祥。就像娶新媳妇；又像孩子成长，代父治家，一样吉祥如意。九二是成卦之主，上下卦的四阴爻皆因九二而生义，也可说九二是四阴爻的教师。“包蒙”云者，后来启发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就是说，不问上下尊卑贵贱，只要交少量学费，就可以入学接受教育，这也就是孔子所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就为非贵族出身的儿童和青年接受教育、参予政治提供了初步的条件，具有一定的古代朴素民主意识的因素。古代国家，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因此儒家倡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常是“国家”连称，所以常用家庭的“纳妇”、“子克家”之类来比喻。因此，这里的“纳妇吉”，象征教育的成功如意；“子克家”，更是譬喻经过启蒙教育，青年成长，后来居上，成为有用的人才。“纳妇吉”、“子克家”之类，不过是以家为喻，言外之意是包括了善于治理国家的内容，意义是深刻的。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这里的“用”，不是动词施用之义，而是作副词，宜也。取，通娶。金夫，男子的美称。攸，所也。爻辞是说，六三，不宜于娶妻，因为那女子一看到美貌郎君，就心猿意马，忘乎所以，不顾廉耻，娶这样的妻子是不吉利的。六三处于下卦之终，阴柔失正，但以蒙稚之子，却急于升到上卦，下面乘凌九二阳刚，上面急于与上九阳刚呼应，一心二用，急于求进而心无所主。从启蒙角度看，这也违反了循序渐进、专心致志的教育规律，所以说是“无攸利”，这本是个凶爻。另外，从伦理角度看，作者站在旧礼义的立场，认为启蒙学习如果虚浮躁急，根基不正，就必然带来不顾廉耻的后果。言外之意，作者注重德育，强调入门须高，蒙以养正的道理。

六四，困蒙，吝。

爻辞是说，六四，为蒙稚所困惑，必有憾惜。六四已由下卦脱出，升到上

卦之初，阴处阴位得正，本该是个吉兆。但因六四以阴爻而处于六三、六五二阴之中，独远于九二、上九，象征缺乏师教、蒙昧不治，因而有所憾惜。而阴的符号为“--”，为虚，阳的符号为“—”，为实。六四远离阳刚，所以《象传》说是“独远实也”。所谓“实”，也指治蒙师教而言，俗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选择教师与注重环境，尤为重要。不仅童蒙，成人亦然。荀子就明确地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按：指向有学问有道德者学习），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

六五，童蒙，吉。

爻辞是说，儿童启蒙，开发智慧，吉祥如意。六五处于上卦之中，阴处尊位，与九二阴阳呼应，谦顺下人，虚心向下面的九二求教，又上承上九，以阴而获阳之助，表现了热情好学、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所以是很吉利的征兆。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击，治。为寇，“喻暴烈过甚的方式”；御寇，“喻适当的严厉”（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爻辞是说，上九，以刚猛迅疾的方法来启发童蒙；不利于施用暴烈过甚的方式，而宜于采用适当的严格要求。上九处全卦之终，是矛盾转化的阶段。上九阳刚处阴位而失正，而且处位极高，刚猛过甚，对待学童严厉过甚，如对待强盗一样，则效果适得其反。据最近报刊披露，我国某地有人因孩子学习成绩欠佳，升学考试落榜而痛加棰楚至死。这视孩子“为寇”的教育方式，其害至此，怎可提倡？爻辞称“不利为寇”，实是至理名言。但是，如果适当严厉，学生知有所畏，不敢过分放纵自己，则仍可使上下顺应，师生和谐，教学相长。这说明教师的“严”，必须掌握分寸和火候。

总之，综观全卦，说明了儿童的启蒙教育何其重要！九二、上九从“教”的角度立论，其余四阴爻从“学”的方面立言，教学相长，辩证统一。后代如孔子等大教育家，读《易》至于“韦编三绝”，无不沾溉《蒙》卦，传统教育思想的健康发展，与此息息相关。

需卦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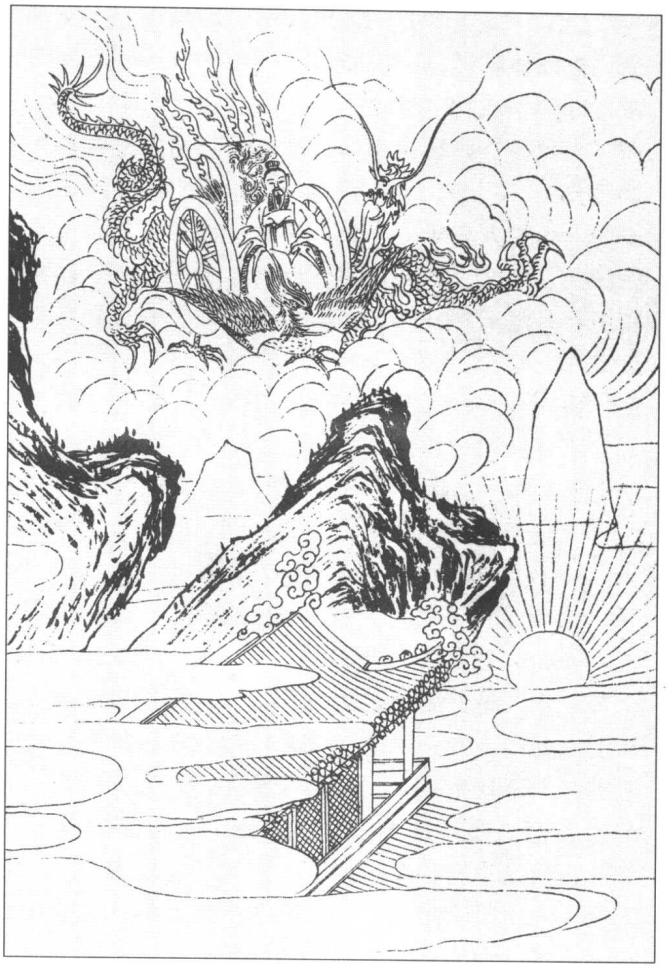


“需待”道畅茁壮长

六十四卦，《蒙》后是《需》。《序卦传》说：“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自然万物，历经屯难萌芽、幼稚启蒙阶段，开始转入生长期。但生长并非凭空而降，而是依靠了哺育生养。而养育之道，成长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又必须持之以恒，待以时日，所以《需》卦除生养外，同时又具有等待的意思。宇宙万物的形成与生长，必然经历“需待”的阶段。无生命的自然物如煤炭，由森林变为煤炭，历经百万年，需待的时日是漫长的。今天的人，常为了一时的超前消费，竭泽而渔，拼命开采，这样不出一、二百年，采个精光，这时再盼其尽快再生，超越需待之期，违背自然规律，必然是水中捞月一场空。我国南方有一种水果——荔枝，甘甜清香，令人馋涎欲滴。我国古代有许多关于荔枝的美妙故事。如唐杨贵妃喜食荔枝，唐玄宗为了讨好爱妃，特设驿骑，三十里一换马，日夜兼程，从南方急递长安，所以晚唐杜牧《过华清宫》诗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语。宋代苏东坡，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文坛佳话。但荔枝树从接枝栽种以后，历经十余年的生长，方能结果。需待之期，自有时日。但我的故乡闽南，五八年后，常因种植计划改变，就砍掉荔枝树而改种其他作物。大炼钢铁时，又为土高炉烧火需要，或者是为了宅基造房的需要，老树砍伐殆尽。以后再来重新栽种，浇水施肥，辛勤养植，但已浪费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为了一时的“热情”，只能重新经历漫长时日的需待的焦躁，其损失是很大的。再以万物之灵的人类为例，孩子如果不加哺养，又怎能长大成人呢？就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与事业，也有个需待的过程。屈原《离骚》唱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也要一步一步地走，想要超越“需待”，要求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或是一步登天，都是妄想。于此可见，掌

握自然生长的“需待”之道，其中大有学问，读了《需》卦以后，自会明白个中奥妙。

《需》的卦形是䷄，下乾（☰）上坎（☵），象征需待。从卦象看，上坎为云，下乾为天，云气上蒸于天，待其阴阳交汇，遇冷即化雨下降，雨水滋润了大地万物，所以有生养之义。而有养必有待，这是一个过程，阴阳交接，遇冷下降，就是条件限制，自然必须等待，所以象征需待。从卦德看，上坎是水，代表险陷；下乾是天，性属刚健，刚健涉险而不妄为，待时而后动，才能避免陷于困境，此所以为需待。需待并不是懦弱。遇事该断而不断，犹豫不决，自丧时机，是为懦弱，也就是《左传》所说的“需者德之贼”的意思。而事物的发展，不到该断时刻，就静养以蓄积力量，如武术家所谓生养浑厚的内力，耐心等待，一旦时机成熟，果断行动，一击成功，脱险而出，是为需待。我国俗话所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正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需待时机，创造条件，争取最后消灭强敌。如此需待，正是事物健康发展的必然过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卦辞曰：“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孚，诚信。光，正大光明。意思是说，《需》卦象征需待，内心诚信，亨通其道，光明磊落，坚持贞正，必获吉祥，而占人天相，所向无前，所以利于涉河越险。从卦构看，九五阳刚居尊位，是一卦之主，性刚健而内诚信，光明正大，领袖万物，下面又有乾卦三阳爻团结一致，前来呼应援救，自然信心倍增，力量大长，有能力涉越大河，克服一切险难，从而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道。所谓“涉川”，取坎为水之意。开篇《乾》《坤》之外，《屯》《蒙》《需》都有坎，由坎推衍而成卦。坎水之性，

为险为陷。《需》卦的涉越川河，即象征经历险难，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待机而动，方能成功涉越，脱险出陷。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载舟为利，覆舟即险。成功"涉川"，超越坎险，是事业胜败的一大关键，意义是重大的。而《大象传》则转换视角，从需养的角度来解释，云："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云，水汽聚集，必待阴阳之和而成雨，一切自然而无为。无为则无不为，人们安居乐业，怡然自得，饮食宴乐而不知其然。后来的统治者，以此喻恩泽在朝廷之上，人们但饮食以养身体，宴乐以和心志，俟其自至。所以宋朝皇宫中建有需云殿，其义即取自《周易》的《需》卦，企望臣民等待皇恩下施，饮食宴乐，以享太平。这又另当别话。但《需》卦之养，与饮食有关，则无可怀疑。从人事言，人要生存，就要吃饭，所以"民以食为天"，成为千古的至理名言。不过所谓"饮食"，到底是谁养谁呢？是上养下，还是下养上？古今中外，争个不亦乐乎，因为，出身不同，观点绝然相反，读者当自明鉴。

爻位爻辞则从变化运动的不同角度，来具体发挥卦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爻辞是说，初九阶段，利于在郊外需待，利于保持恒心等待，自然没有咎害。《需》卦上坎为险陷，下乾三阳只能越险而动。而在下乾三阳中，初九处于全卦之下，虽然阳爻居阳位而得正，但位卑力微，独自涉险困难很大，所以必须与上面九二、九三两阳爻联合行动，在条件不足之时，只能在郊外远远地等待以避害，人不轻举妄动，自然无咎无害。为什么说"需于郊"呢？这如今天看电影的大远景，郊外有水，一片朦胧，并非直接涉河，所以《小象传》解释"需于郊"，说是"不犯难行也"，正是远离坎水之陷，而耐心等待之意，因为初九的爻位，离上卦坎陷最远。这符合事物生长初级阶段的常理。初生幼稚，力不足以涉险犯难，只能远观静养，待援而后进。不妄动涉险，所以"无咎"，应该说是吉兆开头。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爻辞是说，九二阶段，需待于河边沙滩，虽然一时受到小人的言语中伤，但祸患不大，最后还是获得吉祥。九二之爻，犹如今天电影镜头的中景。沙滩近水，郊则远在水外，与初九相比，九二已接近坎水的险陷一步，所以说是"需于沙"。为什么又说"小有言"呢？因为《需》卦中的九二、九三与六四，组成互卦《兑》，而按照《说卦传》的解释，兑"为口舌"，"为毁折"，所以有言语中伤之象。但因九二阳刚居中，刚而能柔，谦虚谨慎，耐心需待，所以虽受小人的訾议毁谤，但却不为其所动，决不急躁妄进以涉险犯难，所以最终也获得吉兆。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爻辞是说，九三，在河中泥滩需待，招致了敌人的攻击。九三爻辞所描绘的，如电影镜头往水中推拍，成为近景，陷于坎险。九三处位于下卦之上，距离上卦坎陷最近，本已危险，再加上自己行动又招致强敌压境，更是险象环生。但所谓“致寇至”，如《象传》所解释，还是“灾在外也”，言外之意，并非内在器质性毛病，而是外来强加的危险，只要培养内力，恭敬审慎，认真对待，则仍可化险为夷，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一爻表面虽凶，但并非全然无法可想。如灭亡北宋的靖康之难，传说金兵追杀，康王赵构“泥马”渡江，如陷河中泥滩，岌岌危哉，但他终于跃出险陷，在江南建立南宋王朝，保住了半壁江山。后来的南宋王朝，如果不是因为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杀害忠良，镇压人民，那么虽有强敌压境，又何足道哉!所以，“需于泥”并非处于绝地，关键在于正确需待，审时而后动，伺机而后发，则仍可逢凶化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爻辞是说，六四阶段，需待于血泊之中，但最后终于从坎陷中脱险而出。因为六四已升至上卦之初，进入坎陷之境。而据《说卦传》，坎为血卦，所以险象纷呈，伤亡惨重，在血泊之中，挣扎和需待，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令人感到惊心动魄。但六四阴柔得正，需待有方，在危难中能冷静思考而不躁急，耐心等待时机转化，终于从血泊中挣扎出来，成功脱险。如武侠小说所写，误入八卦阵的死门，在刀光剑影中左冲右突，鲜血淋漓，但仍耐心寻找，终于找到生门，杀出重围，又获生机。此爻初凶而终吉。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爻辞是说，需待丰盛的美酒佳肴来惠施下民，坚持贞正无邪可获吉祥。如前卦所说，全卦六爻阴阳中，以少者为主。据此，《需》卦二阴四阳，该以阴爻为一卦之主。但我们同时还应掌握“《易》无达占”之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需》二阴爻全非卦义所在，下乾三阳爻则耐心需待而不轻进蹈险，只有九五阳刚居尊位而心存诚信，爻位既中且正，其所需待，已臻完美境界，所以有资格作为一卦之主的面貌出现。爻辞以“需于酒食”，大吉大利为喻，古人以为象征王道久化而泽及下民。如汉初，萧何死后，曹参代何任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他选择官吏，以“木讷于文辞”的“厚重长者”为准，那些“言文深刻”以争声名的巧吏则斥去不留。又“日夜饮以醇酒”，属下见曹参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参虽常与属下饮酒歌呼，但天下太平。因为在曹参之前，“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需待蓄积已臻上境，所以曹参声称，饮酒歌呼，“遵而勿失”，“故天下称其美”（见《史记·曹相国世家》）。又如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国家在战争废墟中重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积极发展生产，终于呈

现出一派繁华升平景象。故王弼注《需》九五云：“已得天位，畅其中正，无所复须，故酒食而已，获吉贞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爻辞是说，上六阶段，位高而无复需待，因妄动而落入陷阱；但因有不召自来的三位客人的救援相助，自己居高位而恭敬相待，终于脱险，获得吉祥。上六处位最高，阴居险极，柔弱乏力，已是矛盾转化的阶段，需极转躁而无所待，故致“入于穴”的危险，而难以自拔。但上六又阴爻阴位，居柔得正，下应九三，阴阳呼应，如以九三带动下乾其他二阳爻，同心协力，说明上六因阴性谦逊，恭敬诚笃，所以下乾三阳爻如不召自来的三位客人，和衷共济，拯溺济危，共赴危难。上六的基础牢固，得到下面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能够获救出险。爻象虽凶而无险，终获吉祥的结局。

现在让我们以楚汉战争中的汉朝开国为例，来说明《需》卦爻位的进退、变化与发展。秦末天下大乱，刘邦率沛县子弟加入反秦义军行列。时项羽率楚军北渡黄河，攻击秦军主力，陷于坎险之中。刘邦则率偏师西进，避开了秦军主力，终于顺利进军关中。这就是“初九，需于郊”，远避坎陷而积蓄力量，事业初起，力单势薄，不得不如此，这符合“需待”初级阶段的规律。而刘邦因叛徒曹无伤告密，项羽决定集中兵力消灭刘邦，双方力量悬殊，刘邦不得不用张良计，亲赴鸿门宴，终于争取了时间，化险为夷。这是“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虽有曹无伤一类小人的“小有言”，毁谤中伤，但最终是如近沙滩，有凶无险。刘邦为汉中王后，用韩信、萧何之谋，北定三秦，东进中原，招致项羽楚军主力的攻击，屡次大败，如陷泥淖。这如“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但因刘邦正确需待，以关中为根据

■项羽像



地，源源不断地往前线输送兵源粮食，养而有待，所以能长期坚持，自立不败。“六四，需于血，出自穴”，如楚汉二军主力，战于彭城灵壁东，据《史记·高祖本纪》载“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项羽）乃取汉王（刘邦）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当是时，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但汉王刘邦并不气馁，自甘失败，而是屡蹶屡起，从血泊中爬起来，耐心需待，终于“出自穴”，争取了最后的胜利。而项羽则骄兵悍将，横行一时，心浮气躁，急于决战，甚至隔着楚河汉界，寻找刘邦个人挑战，作为一军统帅，说话如此幼稚，实在十分可笑，就因他不懂正确需待的道理，最后只落得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悲剧下场，令人浩叹!胜败转换，生死易位，瞬息万变。“需待”之时义，伟乎大哉!“九五”之爻，如刘邦夺取全胜，开朝建国，龙飞九五，“需于酒食”，象征朝廷恩泽普施，完美吉祥。而“上六”之爻的“入于穴”，如高祖刘邦去世，诸吕乱政，但有周勃、陈平等老臣同心救上，共赴危难，一军尽皆左袒，终于平定危难，出于险中，为汉朝开国，迎来了“文景之治”，终于茁壮成长，顺利地转入了封建国家发展的成熟阶段。

讼
卦第六



止讼息争杜根源

《需》卦的后面是《讼》卦。《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生养饮食，实际是涉及人类生存的根本物质利益。而有了利益，就有分配不均的问题，由此而起争议，兴诉讼，打官司，辨是非。诉讼原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情，应该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在阶级社会中，何时、何处没有争讼？人们对于“讼”的发展规律是否理解与正确运用，关系到个人幸福与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对于一些改革家或理想主义者，他们热烈追求“讼者平，赋者均”（柳宗元《送薛存义序》）的乌托邦世界，虽然不能实现，但却反映了古代人民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人们对于努力追求“讼者平”的圣贤君子，总是报以深切而诚挚的怀念。今河南省宜阳县，北魏时称甘棠县，县西北五里有召伯庙，就是用来纪念周初燕召公奭听治讼平的事迹。《括地志》载：“召伯听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树，后人怀其德，因立庙。”据说召公为人公正无私，“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史记·燕召公世家》）。这大概就是古人心目中

■召公像



那“讼者平”的典范了。而古人那“讼者平”的理想，其思想渊源于《易经》的《讼》卦。

《讼》的卦形是䷅，下坎（☵）上乾（☰），刚好与《需》卦的下乾上坎相反，《讼》与《需》互为综卦，《需》是需待，《讼》则象征争讼，义则相续又相反。从卦象分析，《讼》卦上乾为天，下坎为水，《象传》说是“天与水违行，讼”。孔颖达《正义》解释说：“天道西转，水流东注，是天与水相违而行。”也就是说，由于地球的自转，太阳总是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自东向西运行；而中国大陆多数水系，由于西部多高原山脉，东部多平原沿海，所以总是水向东流，奔腾入海。这原是自然现象。但在古代科学不发达时，视天道西转与水流东注为“相违而行”，不足为奇。古人还有另一种说法，以为“天阳上行，水性就下”。也就是说，天的刚健阳气腾腾上升，水的阴柔之气化雨下降，一阴一阳，一上一下，行进相反，不相交接，自行其是，所以说“其行相违”。这就像是两个性格相反的人，彼此不合，脾气乖戾，很容易起争执致诉讼。讼，争也，《释文》进一步说是“言之于公也”。争执起讼，私下已无法解决，进一步必然诉之公庭，等候裁决。而从卦德分析，上乾为天，性属阳刚而健；下坎为水，性属阴柔险陷。上刚凌下，下险伺上，刚险相接，易起争讼。以人言之，一个阴险，设陷阱以待上；一个刚健，心躁急而凌下，各不相让，必兴争讼。

卦辞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意思是说，《讼》卦象征争讼，是内心的诚信，窒碍难通所致，但只要心中保持惧惕就可获吉祥；如果持强极讼，最后必致凶险。利于大人君子出现以作公平中正的裁决，而不利于冒险涉越大河。所谓“有孚窒”，指的是九二阳刚中实而深埋于上下二阴的虚陷之内，象征内心的诚信受窒塞，理直而难申，所以公诉于庭而致讼，以求中正的裁决。但下坎为水为陷，又表明讼是险事，不得已而为之，利于大人君子作法官以申张正义，而不利于小人冒险以求侥幸胜诉。如果健讼不止，穷极难成，最后必致凶险，所以说是“终凶”，又说“不利涉大川”去自蹈坎陷。卦辞的精神，启迪了后来儒家的中庸之道。认为刑狱诉讼非仁义之事，君子不得已而为之，应该适可而止，止于中正之义，切不可穷凶极恶，大兴狱讼而致人于险陷之中。上面的正人君子，健讼不已必下陷于坎险；下面的小人，设陷伺人也必自罹凶险。两败俱伤，何必穷极诉讼，争胜逞强？《讼》卦的实质，不是教人如何去进行争讼，而是因讼而止讼，劝戒人们免争止讼之义。所以《大象传》说：“讼，君子以作事谋始。”这是从杜绝争讼的根源入手，防范于无争未讼之始。中国后来的传统理讼观念，从总体倾向看，可分为儒（包括了佛家）与法二大家。但不管是儒或法，或者是王霸合流、儒法一体（外儒内法或外法内儒），都一样强调从事“讼”者，必须重视“作事谋始”。当然，怎样“谋始”，由于儒法理解不同，因而内容、方法与步骤各异，甚至可以说是对立：儒家强调仁义（佛家则曰慈悲）的道德教育，要求“君子无争”，如果人们

都因儒家的传统教育而无争（佛家则曰无欲），怎么还会起争讼呢？这不正是一种防范于未然的杜绝讼源的根本措施吗？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论语·颜渊》）法官裁决，洞察秋毫，公正廉明，孔子认为自己和一般人相同，并不比清官强；但从根本的道德教育入手，杜绝兴讼根源，则是大有可为的。人们如果真能讲仁义明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当然息争止讼。而法家的"作事谋始"，则从刑法入手以绝讼源，他们严格等级，申明职责，制订律法，明确章约，"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商鞅《商君书·垦令》）。"作事谋始"，意在杜绝讼源，意向当然是正确的。但在阶级社会中，却很难实行，因为不管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还是法家的严刑峻法，都不可能真正止讼息争。封建帝王，"朕即是法"，这是人治而非法治，随心所欲，不公不正，怎能止息争讼？汉代酷吏以法杀人，史载"至流血十余里"；汉武帝时，有人指责酷吏杜周听讼审狱，"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杜周公然宣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史记·酷吏列传》）这不仅否定了儒家的仁义道德，甚至连法家之"法"也一样视如弃屣，一钱不值。在这种专制黑暗的社会中，再优秀的人才，再杰出的方略，再热诚的政策，都将一无所施而宣告失败，悲哉！

下面谈爻位爻辞。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爻辞是说，初六阶段，不为讼事所纠缠，自己略加辩论，即脱身而出，终于获得吉祥。初六处位最下，阴爻阳位，居位不正，软弱无力；又上应九四阳刚之讼。但自己明白地位和能力，处讼之始，不为讼先，因而阴柔忍让，小加辩护，息事宁人，获得谅解，所以终为吉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意思，与佛家所谓"让一步即入福地"的精神相通，作卦者的心中，从讼事一开始，就抱着止讼息争的态度。按：爻辞中的"小有言"，与《需》卦九二爻辞相同，而含义不一。《需》九二是指小人的言语中伤；《讼》初六则是因九四阳刚兴讼，自己不得已而略加辩护，并无应讼之意。因此，同是"小有言"，一在人，一在己。"《易》无达占"，读者当自细察明辨。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逋（bū），逃亡。眚（shěng），原是一种眼病，这里引申为灾祸。爻辞是说，九二，争讼失败，赶快退归，其私家采邑之人逃亡了三百户，不算什么灾祸。为什么逃亡了三百户反而说是"无眚"呢？因为九二阳刚，处于坎中，为下卦险陷之主，但阳刚居阴位，柔而失正，下卦之中，不敌上卦九五，尊卑异势，能量不同。而古代的律法，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一句骗人的话，无法当真。所以九二、九五的争讼，二阳同性相斥，胜败早因势位关系而成定

局。幸亏九二聪明，应变力强，迅速退让，又因败讼，私邑逃亡了三百户，失众知惧，坏事变为好事，从此兢兢业业，转危为安。与全局的大安相比，丢掉了三百户又算什么？衡量得失，所以说是“无眚”。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从王事，就是从事诉讼。爻辞是说，六三，享受祖宗的德业，守正以防凶险，最后获得吉祥。或在天子前面从事诉讼，不会成功。这是因为六三处下坎之上，阴处阳位，势力柔弱，又应上九之讼，上九刚以凌下，强而欺弱，所以与上九打官司，不会胜诉。爻辞爻位，从正反两方面劝戒弱者安食祖宗德业，毋争毋讼，必然吉祥如意。如果好讼，则效果相反，一事“无成”而致凶厉。如《史》《汉》所载，汉武帝时，灌夫因前吴、楚七国反叛之时，披坚执锐，冲锋陷阵，马踏吴军壁垒，“身中大创十余”，战功赫赫，“名闻天下”。后因饮酒使性而丢官。但食祖之德，“家累数千万”，“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其家族横行乡里，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后又因饮酒骂座，得罪丞相武安侯田蚡，被逮捕下狱，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上与争讼于帝前。后果致弃市之祸。事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读《讼》六三，灌夫似之，不安于“食旧德”之吉，又不自度德力，与上九（喻丞相田蚡）争讼不息，终于败讼“无成”而取祸。此事可为健讼者戒！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复，回归。命，天命自然。渝，变化。爻辞是说，九四，争讼失败，于是安于天命，随顺自然而顺服正理，因此很快改变了争讼心思，安守贞正以获吉祥。九四已升到上卦之初，但是阳处阴位，虽为刚而气力不足，加以下应初六，以上凌下，以强欺弱，初六抗理小辩，九四自知理亏，迅速打消了争讼好胜之心，安顺天命，回归正道，所以最后还是吉兆。

九五，讼，元吉。

朱熹曾把《讼》卦九五比作刑狱之官，我看不太正确。因为九五是尊位。古时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问题，而是三权集于君主一身，帝王就是法的象征，本身就是最高法官。这里的九五之“讼”，不是与人争讼，而是作为中正听讼之君，而行无讼之化，以致国泰民安，所以说是大吉大利，至善至美。听讼是为息争止讼，这是最为本质的精神。初不永讼，二、四不克讼，三之无成，上之强讼而终褫，就是强调因中正裁决，以讼止讼。如果不是处在既中且正的九五尊位，谁来服从你的裁决？但因古代君主专制的弊病，帝王个人的主观随意性盲动性很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易》卦作者要求帝王的裁讼决平必须既中且正，这就是条件限制。而实行与否，又要看社会的发展、形势

的变化和君主个人的素质。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锡，赐。鞶（pán），大带，古时官服之饰。（按，这里以具体服饰喻高官厚禄。）褫（chǐ），夺。爻辞是说，上九健讼，上诉天子，常因位势而胜讼，获得显贵命服的赏赐；但最后的结局，是在一天之内三次被剥夺净尽。上九处全卦的最高位，处于讼道终极而矛盾转化的阶段，位高势逼，刚狠逞强，欺下凌弱，无所不为，强讼六三，六三不敌而“无成”；但上九不过是胜讼于一时，因为九五为中正之君，岂能永远被小人所蒙蔽？所以上九暂时胜讼所得的赏赐，最后仍被九五剥夺干净。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所载，丞相武安侯田蚡，是太后的同母弟，仗着太后之势，诬陷魏其侯窦婴等功臣，窦婴被杀，田蚡胜诉，一时权倾朝野，位高势逼而不知退让，结果是很快愧死国除。汉武帝明言：“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田蚡之例，如上九之健讼，最后是害人反害己。这是用健讼不已的反面例子，来劝人止讼，与全卦精神相一致。

与《讼》卦止讼息争的传统观念不同，目前的西方国家，是个无事不讼的世界。特别是美国，更是到处有律师事务所，无论大事小事，都上诉法院。你若不懂法律，不雇律师，只要为人所讼，简直是一步也动弹不得。你在自家的花园里用割草机锄草，邻居可能因噪音太响而告你。就是日本，谦谦君子的大和民族，也已变成健讼之国。如蜚声海内外的电影明星山口百惠，她息影后，在某地建造了一幢森林别墅，但因她知名度太高，每天宾客盈门，车如流水马如龙，打扰了邻居的休息与清梦，被人告到法院，山口百惠终于败讼。这在中国，根本不算回事。自由市场就在卧室的门前窗下，全天候的争吵叫卖之声，震耳欲聋，人们整天昏昏然，如浮动在噪音海浪之上，这不是慢性杀人又是什么？但市场管理所不管，工商行政管理处不问，而法院则以区区小事而不受理，虽有报纸呼吁，舆论又被当作耳边风，使受害者投诉无门。不同的传统观念，结果不同。向法治转变，应该说是一种文明与进步。但这不是说目前的西方法制就一定优于中国的观念。西方资本主义法制同样是为了特定阶级或政党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它比封建法制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等于它是公正无私的，因而西方法律所称的正义观念同样是欺人之谈。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曾讥讽律师和法官为“讼棍”，说他们的职业就是搬弄法律，“设法证明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你付多少钱，他就为你出多少力”。而蒲伯在《拘留所的掠夺》中更以形象的语言描绘说：“饥肠辘辘的大法官们很快就做出了判决，绞死了这些可怜的人，以使陪审员能去进餐。”而相比之下，中国易卦作者及孔子一类贤者那从道德教育入手，“作事谋始”，止讼息争的观念，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但却不愧是一种超前意识，在未来非阶级社会中，在真正

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世界里，总有实现的一天。只要去掉其封建尘垢，就闪现了照耀未来的一段精光。目前，西方的文化观念已有意提倡向东方世界的回归，《讼》卦所示的超前意识，值得向世界文化大力推荐。

师
卦第七



正义之战仁义师

古今中外，不分肤色与民族，无论国家与地区，世界上的儿童，都一样喜欢玩打仗的游戏。有时是两军对垒，有时则是三国混战，喊杀连天，自得其乐。有的哲学家以此为例，来附和古人的“人之初，性本恶”之说。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打仗就意味着毁灭与死亡，要么杀人，要么被杀。孩子喜欢“打仗”，玩具又多坦克大炮，这不是“性本恶”又是什么？但就我看来，儿童的打仗游戏，与“性本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成人生活的一种特殊反映，也可说是人类社会千万年来积淀已久的集体潜意识的一种特殊心理宣泄。从原始社会到二十世纪的今天，何时、何地没有战争？兵火绵延，硝烟弥漫，就是在高唱和平与人道而科学昌明的今天，也同样无法摆脱。目前的中东战场、海湾局势，剑拔弩张，又将一触即发，就是生动的例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是在战火洗礼中长大的。人类要生存，国家要发展，文明要进步，就无法避免战争，因而研究战争及其发展规律，就成为古往今来经久不衰的一门重要学问。《左传》明言：“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襄公二十七年）就是孔子复生，也无法“去兵”，他作为教育家，曾开设了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二门，即与战争有关，是为军事教育。所以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而这些传统的军事思想，又可在《易经》的《师》卦中见其端倪。

六十四卦中，《师》在《讼》后，序列第七。《序卦传》说：“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从卦序看，人们因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均、占有多寡而起争议而致诉讼，而律讼的裁决一旦不能解决问题，必然群起争斗，兴师动众，小至部落，大至国家与民族，以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师》随

《讼》后。

《师》的卦形是䷆，下坎（☵）上坤（☷），象征兵众。师，据《周礼》，原是一种军队建制，“二千五百人为师”；后来引申指兵众或军队。从卦象分析，下坎象征水，上坤象征地，有包容蓄聚之象，地中容蓄着滔滔不尽的水源。而空气和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息的必要条件。因此，地中蓄水，犹如土地遍养民而广积兵。如朱熹《周易本义》所说：“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坤地德厚能容民养民，能容能养则无流民；坎水长流而蓄积地中，则能蓄众，待势而发，以至柔之水，摧至刚之敌。这样不仅内无叛众，而且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古代兵书以水比兵，谓“胜兵似水”，就是因水至柔弱，但一旦蓄势待发，便溃穴决堤，千里奔泻，势不可挡。这是古代“寓兵于农”的象征，也就是“民为兵本”的意思。所以《象传》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蓄众。”军队一旦脱离了人民，则如无源之水，不久就自行枯竭。而兵农一体、军民一家，则战无不胜。封建社会以农立国，士兵多出于农民。后来战国时法家所谓“农战”策略，西汉赵充国的以兵屯田，都是寓兵于农的具体表现。和平时务农为本，战斗时民变为兵，足食足兵，则攻必克，战必胜。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广大民兵，也是寓兵于农的生动例证。而从卦德方面分析，下卦为坎为陷，又象征兵者凶器也。所以《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险陷之地，非出于不得已，不可蹈之。强调用兵之险，即寓劝人不要穷兵黩武的言外之旨。上坤为地为顺，大地载养万民，顺应自然而生活。在《师》卦中的坤“顺”，并非俯首帖耳；而是热爱和平，必要时行险打仗而不违顺，故《彖》辞称“行险而顺”。在生活中，战争不断，国不可无兵；无兵之国，则任人宰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凭藉坚船利炮，发动侵略战争，辱我中华。殷鉴不远，谁能“去兵”？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国防与军队占有重要位置。但用兵必须合乎正义，蹈险而行顺，虽行危道，而人心归顺。所以古兵书说：兵为凶器，必有所杀，但除暴安良、去恶从善，“杀所以生之也”。由卦德看，《师》卦作者所强调的是以杀止杀，劝善惩恶，反对穷兵黩武。

卦辞曰：“师：贞，丈人吉，无咎。”丈人，大人君子，贤明长者。意思是说：《师》卦象征兵众和战争，必须坚持正义，由贤明长者来统帅军队可获吉祥，必然无所咎害。“贞”虽仅一字，却涉及了战争性质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统率军队进行战争，首先必须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贞正无邪，力持正义，为保卫真理而战，才能“解民倒悬”，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如古代汤武革命，“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为什么不先打到我们这里来呢？）”这也就是《孟子·尽心下》所说的“征之为言，正也”的意思。另外，卦辞还强调了统帅的选择与作用。“丈人”二字，在古代是一种庄严的称呼。这里指的是本卦的九二。全卦六爻，以九二一阳统帅五阴，从



■诸葛亮像

卦义上说，已成为一卦之主。所以简任将帅，事关国家的胜败兴亡，必须慎之又慎。汉末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出山，以后三国鼎立，诸葛亮成为蜀国的丞相兼统帅，他就是一个“丈人”。后人常指责蜀汉后主刘禅，说他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实际上他信任“丈人”诸葛亮，不亚于乃父刘备。君主将帅，上下一心，因而蜀汉以四川一州之地，抗天下数十州之力，北伐曹魏，东联孙吴，艰苦卓绝，没有君主的诚心信任，没有“丈人”的正确指挥，恐怕早就灰飞烟灭，哪来的三国鼎立之势呢？而反观现代战争，则可以美国的巴顿将军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顿骁勇善战，在非洲击败了希特勒的名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西欧冲破天险严寒，挥师直指柏林，战功盖世，早著英名。但在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与继任者杜鲁门看来，他只能任一军之长，而不能成为全军统帅。战后甚至很快强迫这个视战争为生命的将军退休。后人常以此指责杜鲁门。实际上当时的美国总统自有道理。从战役战术角度看，巴顿极其成功；但从政略战略方面看，他轻视与盟军（主要指苏军，也包括英军）的合作，甚至想在德国土地上对苏军挑衅。这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大局不利。在更大的背景下考虑，巴顿不是一个人所景仰的“丈人”，当然不能出任统帅之职。如果当时杜鲁门任命了巴顿为盟军统帅，在消灭希特勒以前，苏美二军火并，英军观火，又将如何消灭法西斯呢？选择“丈人”，不可不慎之又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总统，作出了明智的抉择。

下面分析爻位爻辞。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否，不；臧（zāng），善也；否臧就是不善。爻辞是说，初六兴师动众，

首先必须严明军纪和号令约束，如若不守纪律和号令，就会出现凶险。从爻位看，初六阴居阳位，位于下坎之初，处位不中不正，阴柔软弱，因而出兵之前，必须严申军纪和号令，以便协调指挥，三军一致，壮大力量，蓄势待发。一支没有军纪、到处奸淫烧杀的军队，怎么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虽然可能一时取胜，如秦汉战争中以项羽为统帅的楚军，坑降卒、杀百姓、掘人祖坟、火烧咸阳，横冲直撞，得意一时，但终因军纪败坏，人民痛恨，最后覆军杀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爻辞所说的“师出以律”，还含有慎始有终之意。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从一开始挥师而动，就要考虑到最后的结局。春秋末年，燕、晋二国兴兵伐齐，齐师败北。于是晏婴向齐景公推荐司马穰苴统帅军队以抗强敌。齐景公派其宠臣庄贾监其军。司马穰苴因为人微言轻，威信不立，士卒未附，于是严申军纪，“立表下漏”，限定时刻，将士报到。但监军庄贾，恃宠生骄，与亲友饮酒而迟不报到，司马穰苴召军正申明纪律，将斩之以法。齐景公急派使者驰车兵营以救之，但穰苴义正辞严，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遂斩庄贾以循军。又召军正，指责使者入军驰马，违纪当斩，因为“君之使不可杀之”，于是斩其仆及马。作为齐军统帅，他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带头严守军纪号令，于是士气大振。“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很快尽复失地（《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又如汉文帝时，匈奴入侵，周亚夫军细柳营以防，时文帝亲自劳军，到细柳营外一看，只见甲胄耀眼，刀出鞘，弓满弦，就是皇帝亲至也不得入。于是按军纪派使者持节诏将军，这时周亚夫才传令“开壁门”，又令军士传令：“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可得而犯邪？”’（《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后

■周亚夫像



来吴楚七国叛乱，兵会中原，周亚夫据荥阳，一举荡平。这种战斗力，与其一开始就严申军纪号令有关。“师出以律”，事关重大!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中，中正不偏；锡，赐也。爻辞是说，九二，统帅三军，坚守中正之道以获吉祥，必然没有祸害；君主因此委以重任，再三给予奖赏。九二处下卦坎陷之中，上应六五，为一卦之主，以一阳统五阴，蹈险而为将帅，当然选择必须慎之又慎。古兵书说：“凡国有难，君召将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愿将军出师右之也。’……将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若此则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六韬》）所谓“在师，中吉”，并不是说只是统帅一人之功力，而是说慎择统帅，社稷以安。因为统帅行中守正，不偏不倚，公正廉明，朝廷信任，内无掣肘，士卒感奋，智者为谋，勇者尽力，合三军之智勇，所以能战无不胜，大吉大利。“中”者云云，指九二居下卦之中以应六五之中，九二阳刚，六五阴柔，阴柔之君宠任阳刚九二，刚柔相济，军队有坚强的领导中心，指挥如意，所以师无躁妄之动，众无逗挠之失。所谓“王三锡命”，说明将帅的成功有条件限制，必须获得朝廷君主的信任。所以军权无中制，才能破敌立功。九二之爻，从军人的角度，说出了君王信任的重要。汉王刘邦建坛拜无名之辈韩信为大将，虽然一军皆惊，但汉王任之不疑，所以韩信能统帅汉军，所向披靡，为创建汉朝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六三，师或舆尸，凶。

爻辞是说，六三，战车载着阵亡将士的尸体归来，形势险恶。从爻位看，六三上面为坤之三阴，有积尸之象。又坤可象征舆，坎象征轮，所以爻辞称有舆尸之象。又六三阴爻居阳位而失正，处于下坎的上位，才弱志锐，轻举妄动，想要一举越险，由下卦奔向上卦，但因阴柔力弱，贪功冒进，必败无疑。果然是载尸而逃，举国震动，形势十分严峻。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六三既不知敌，又不知己，不自量力，所以成为败逃之师。《孙子兵法》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如《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载，秦穆公不听蹇叔的谏诤，派孟明、西乞、白乙三人为将，率师越晋境而偷袭郑国。三将只知袭郑之利，而不计晋军之险，结果是郑国商人弦高借犒师之名而滞秦军，并飞报郑国戒备。秦军袭郑不成，经崤函撤退，为晋军所袭，全军覆没，三将尽擒。其实，当秦军过周之时，王孙满早就断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粗心大意）；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秦军败北，早在秦穆公定策袭郑之日已定，但骄兵悍将嗜利轻进，更是重要原因。六三之爻，从反

面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骄兵必败，悍将勿用。

六四，师左次，无咎。

古人尚右，所以左次即是撤退。爻辞是说，六四，大军撤退，无所咎害。六四爻位，居上卦之初，虽然居位不中，但阴爻居阴位而得正，象征力量不足时，全师而退，据下卦之险陷以坚守，虽然没有破敌立功，但也没有咎害。从正面看，与六三“舆尸”之凶相比较，还算是由凶趋吉之兆。一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战争当中，有进攻就有撤退，乃事之常情。但骄兵悍将不这么看，他们视撤退为怯弱，是失败，是耻辱。激于将帅一己之私忿，置国家根本利益于脑后，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或是敌军设险陷以待我之时，还是硬冲硬打，其悲剧可想而知。如春秋时晋楚城濮之战，楚军统帅子玉不听楚成王劝告，在晋文公亲自率领晋军救宋之时，不肯全师撤退，结果兵败自杀，严重影响了楚国的实力和地位。（参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又如，三国时曹操派夏侯渊镇守关中，与刘备对垒。渊曾“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为曹魏军中一员虎将。但因胜生骄，曹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结果在与刘备相拒阳平关时，当时形势不利，夏侯渊不是据险固守，而是轻率出战，为刘备袭杀于阵前。这又从反面对于不能全师“左次”的骄兵悍将敲响了警钟。总之，六四之爻说明将士应根据力量对比，战场变化，审时度势，当进则进，该退则退，以退为进，以等待后来的进攻。列宁曾有“退一步，进两步”之说，“师左次”正是“进两步”前的撤退。

■城濮之战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言，非言语之言，而是无实义的语助词。长子，指九二，也即卦辞中的“丈人”，从众人眼中看是可尊敬的贤明长者；从爻象看，九二与六三、六四互卦为震，而震有长子之象，因为九二与六五阴阳相应，所以从六五君王的角度看，则有派长子帅师之象。古时太子帅师，是极隆重极庄严之事，说明君王对所任统帅的宠信程度。弟子，指六三，没有德才的小人。爻辞是说，六五，禽兽损害了田里的庄稼，利于捕获，没有灾祸；刚正长者可以委以重任，率师出征；无才无德的小人如作统帅，则有失败“舆尸”的凶险；只有坚守正道，才能使国家与民族脱离险境。从爻位看，六五居尊，柔顺而中，是阴柔之君，谦恭待下，以求九二作统帅，以诚相待，宠任有加，上下一心，而不从中掣肘，军中权自将出，应变有方，所以无咎。但三军统帅，如果任用非人，于国于民不利，所以为凶。另外，“田有禽，利执言”是以田猎为喻，说明敌来侵犯，奋起迎敌，是保家卫国，非穷兵黩武而以好战杀人为利。这又说明了战争必须坚守贞正无邪的正义性，才能获得下面臣民的广泛支持与拥护。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指天子。爻辞是说，上六，天子颁布诏命，论功过以行赏罚。有功之臣，封侯建国，有土有民；小人则罚而不用，以免干扰国政。上六阴爻得正，又处位最高，象征战争结束向和平转化的新阶段。上卦坤为土地，所以有裂土分封的“开国承家”之言；又因全卦一阳五阴，阴爻重叠而有小人之象；而上六又处于矛盾转化阶段，若阴爻变阳，则变坤为艮，艮卦有止义，所以象征“小人勿用”，禁止小人形成势力，干扰政治。这已从战争的阴霾中走了出来，成为国家和平建设的新开端。

综观全卦，从政略及战略角度看，战争用兵之道，尽在于《师》。寓兵于农，全民皆兵，谁敢与战？仁义之师，贵在于正，战争的正义性必须坚持。师者凶器，所以反对穷兵黩武，而要求“以杀止杀”（《后汉书·耿弇传论》），正是持正以战的具体表现。持正以战，则战无不胜，这是因为人心向背的关系。而社稷安危，又与选择良将有关。在上者的职责，主要在宠任“丈人”而斥“小人”，这是人君的御将之道；师出贵刚中有德者为帅，严明军纪，审时度势，这是在下的为将带兵之道。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说：“六爻中，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伐罪赏功，靡所不载。其终始节次严矣。”因此，《师》卦是孔子以前的古代兵法总纲，其军事思想，对后代诸子百家（包括儒、道、法、兵家等）影响是巨大的。

比

卦第八



团结亲附仁者心

自猿变成人后，原始人既无坚牙利爪，又乏凌空双翼，怎能在大自然那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不仅逃脱了鸷禽猛兽的追捕，而且日益发展壮大，成了主宰世界的万物之灵呢？因为人能思维，以“群”生活。原始人的群体生活，就是后来文明社会的缩影。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就必然在人“群”中发生种种关系。从绝对意义上说，与世无关的孤独者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周朝开国之初，殷商遗老伯夷和叔齐，耻不食周粟，逃到了首阳山，采野菜而食，最后饿死于首阳山，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成了千古的美谈。但早就有人讥讽伯夷和叔齐兄弟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他们用什么来煮野菜？身上穿什么御寒？孤独的圣贤也早与周人发生了关系。近代英国小说《鲁滨孙飘流记》，写鲁滨孙因海难飘流到孤岛，在孤岛上单枪匹马，开拓殖民地。实际上，鲁滨孙从船上带了一批工具到岛上，这些工具是社会文明的产物，是人与人发生关系的象征。而且鲁滨孙还在岛上找到一个“野人”礼拜五，主仆二人相亲相附，这不是一个小社会了吗？而人际关系，彼此残杀与相亲相附，相反而相随，如影之随身，构成了生活的两个极端。因此，《师》卦之后就是《比》卦。《序卦传》说：“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人类繁衍，必相亲附，社会才能安定。兴师动众，一方面是为了以战争手段来消灭敌人，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我一方民众的相亲相附的温暖生活。没有内部民众的团结一心，相亲相附，战争是无法支持下去的。因此，《师》、《比》二卦，象征意义既相反又相续，相互成为上下卦形颠倒的综卦，其中自有名堂。

《比》的卦形是䷇，下坤（☷）上坎（☵），与前面《师》卦的下坎上坤正好相反，相互成为综卦。卦形已透露了《师》《比》二卦那相反相成的消息。



■伯夷、叔齐像

《比》卦象征相亲相附。从卦象看，下坤为地，上坎是水，所以《象传》说是“地上有水，比”。何晏也说：“水性润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润，比之义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也就是说，柔水浸润大地，大地滋养万物，象征人们的相亲相爱，相互比辅。而从卦德看，下坤为地，其性宽厚温顺；上坎为陷，其性为险。如陷阱在地下，视之不见而险在，则危乎其危。而《比》卦正好相反，是陷阱在地上，人皆见之而知避，所以能化险为夷，越险而过，顺利地投入大地母亲的温暖怀抱，相亲相附，一无所忌。

卦辞曰：“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原，推原。原筮，推原占卦的本意。元，善之始。永，久。贞，正也，即无邪。后夫，后来的人。卦辞是说，《比》是一个吉卦。人们推原占卦的本意，诚心相待，相亲相附，组成社会，并自觉地比附于善良长者，永久地保持贞正无邪品格，必然无灾无难。生活不安定，就会想方设法前来比附于尊长；心中不满而迟来比附的人，就有凶险。“比附”原是一种自然规律：正负电子围绕原子核转，构成了原子。恒星围绕着太阳，月亮围绕着地球，旋转不息，构成了太阳系。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比附”有二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小人的朋党比奸，结成一个黑暗的社会集团，《荀子·王霸》篇曰：“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如楚襄王宠任奸佞屑小，左州侯，右夏侯，结果与秦军战，众叛亲离，国破身危，为天下笑。一是“君子”之间的相亲相附，组成一个以仁义圣贤为中心的光明社会，安定团结，大吉大利。古人认为，如尧、舜以仁义治国，文、武以百里取天下，其道正而足以统一人心，所以天下之人，争相比附，相亲相爱，安定团结。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所言：“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比》卦所象征的“比附”之义，当然属于后者。比附的对象不同，结果可以绝然相反，所以要以诚挚之意，推原占卦的本原。《彖传》解释卦辞，说是“比，辅也，下顺从也。”这是以上下相应，下亲附上为“比”。其实，亲友之间的相亲相爱也是一种比附，只不过这不是上对下或下

对上，而多是一种平等的比附。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亲朋友好同志间的平等比附，日益显得重要。但在古代，当然还是以上下相应的亲附为主。全卦六爻，一阳五阴，九五阳刚居尊为卦主，其余五阴上下争相比附，又因比附的时间和诚意不同，有吉有凶，爻象各自不同。后来比附者之所以凶，是因为心不诚意不专，为形势所迫而前来投机，动摇不定，姗姗来迟，怎会有好结局呢？《彖传》所说“后夫凶，以道穷也”，是有道理的。

再看爻位与爻辞。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孚，诚信。缶（fǒu），口小而肚大的瓦器，古人常用以盛酒。来，使动词，使初六来归九五。爻辞是说，初六，心怀诚信以亲密比附贤明长者，免受灾祸；在上的贤明长者，同样也充满诚信，就像美酒洋溢缸外，使远方来归的“荒外”之民，一样获得了亲密比附的吉祥。初六处下坤之初，距九五之位最远，又阴爻阳位，居位失正，软弱乏力，上应六四，二阴同性相斥。只有远比九五，诚心以归，才能在九五贤明尊者的大力帮助下，消灾弭难，所以为吉爻。这是自下比附于上。但从在上者的角度看，也因自己内心的诚信，而使化外之民，不远万里地来归附自己。古人常以尧舜二帝为例。据《史记》本纪载，帝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圣德顺人，九族以睦，“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舜承尧业，发扬光大，诚心比下，“至于荒服”，南抚交阯，西和羌戎，北合息慎，东安岛夷，“四海之内，咸拥戴帝舜之功”。仁义治国，远荒来服，四境安定，意义重大。就这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了战争与亲比的无数次的反复，融汇了各地众多的部族及部族联盟，终于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发扬光大。这就是《比》卦初六爻辞的形象写照。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爻辞是说，内心诚挚地亲密比附于在上的君主，坚持正道可获吉祥。六二从初六阶段进了一步，处于内卦下坤之中，阴爻阴位，中正柔顺，上应九五之尊，阴阳欢洽相应，这说明六二内有涵养，学可格君，是为实现其匡时救世之道，而不是为了向君主要名要利。因此，这种发自内心的亲比，持正而不自失，所以为吉兆。武侠小说中的结拜兄弟，常有“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套语，这不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亲比。但《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倒可作为“比之自内”的典型。异姓兄弟，生死与共，亲密比辅，上下一心。为的不是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汉室江山，解民倒悬。关羽被曹操所败，曹氏待之极优，封侯赐爵，上马金、下马银、美女成群，日日酒宴，但关羽还是封金挂印，千里寻找刘备。在灯红酒绿的浊世中，不失其贞正节操之守，“比之自内”所以为吉兆也。



■关羽挂印封金

六三，比之匪人。

匪，非的通假字。爻辞是说，六三，比附于不是正大光明的人。从爻位看，六三居下坤之上，阴而失正，躁动盲进，向上为六四所阻，无法靠拢九五阳刚之主，而只能乘二承四应六，所比三爻皆为阴，三阴为群小之象，比于群小，而非九五尊者，所以说是“比之匪人”。这是一个凶兆，比附坏人而听其指挥，可悲可叹，所以《象传》说是“不亦伤乎”？如明末天启年间，史称目不识丁的宦官首领魏忠贤，建立“阉党”，遍布特务，内廷有熹宗的奶娘客氏之助，外廷有众多心腹党羽，上自内阁宰辅，下有文臣武将，“五虎”如文臣崔呈秀等，“五彪”即武臣田尔耕等，更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目，呼朋引类，狼狈为奸，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为魏忠贤建生祠，称魏忠贤为“九千岁”，甚至是“九千九百岁爷爷”，魏之寿诞，争相献媚，“绶带挤击，挨摩之声铿然，闻有挤伤衣带腿足者”。比附魏忠贤，欲窃国家神器，这不是“比之匪人”是什么？后来崇祯朝时，阉党一网打尽，但国家腐败，根本早已动摇！

六四，外比之，贞吉。

爻辞是说，六四，在外亲密比辅于九五阳刚之主，坚守贞正，必获吉祥。六四已从内卦（即下卦）跳到了外卦（即上卦），阴爻阴位，柔顺得正，紧邻九五，得到阳刚之主的影响最大，亲密比辅，竭诚尽力，所以为吉。按照爻位进退规律，四原与初应，但《比》之六四，不应初而比五，所以称“外比”。有公而忘私之象。（初二的“内比”，则是甘心以身许国之象。）又因初四阴柔近君而有“媚”君之嫌，所以戒其坚守正道以获吉祥。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明也。据《礼记·王制》篇，有“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之说，以为古代帝王诸侯的狩猎，禁止斩尽杀绝，以便动物生生不息，百姓捕之不尽，人民的衣食有了来源。这和现在所谓保持自然的生态平衡之说，暗中吻合。所谓“王用三驱”，就是古代君王狩猎之制，三面驱兽，一面张网，奔者不禁，迎者捕获，所以称“失前禽”。爻辞是说，九五阳刚居尊，正大光明地亲密比辅，如君王狩猎，三方驱围，一面张网，顺其自然，听任前面的禽兽逃失而不禁；属下邑人明白君王仁义之心而不戒备追捕，必然吉祥如意。九五阳刚尊位，既中且正，像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君主。这是一卦之主，一阳中正，仁心广大，五阴争相比附之。以田猎为喻，君王泽及禽兽，开其三面，而任其走失，以免禽兽无噍类。据《史记·殷本纪》载，汤外之野，见人田猎网张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于是去其三面，祝辞改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各地诸侯听到这一传说，以为“汤德至矣，及禽兽”，因此争相归顺比附。陈梦雷解释说：“此爻象极得帝王之用心。盖王者未尝不欲万国皆在绥怀之中，然惟顺我抚而亲之，其叛去者亦姑舍之。在内者安之，在外听之。其心光明正大，在下亦相忘其化，王道所以隆也。”（《周易浅述》）现在的世界，小至伊拉克突然出兵吞并科威特，大至美国到处充当世界宪兵，与《比》卦九五的“王用三驱，失前禽”的宅厚仁心，正好相反，谁会真心臣服，亲密比附？霸权行径，可以休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无首，不是说没头，而是时间上的不争先居首。爻辞是说，上六，意欲比附于人，却又姗姗来迟而不为人先，必遇凶险。上六阴爻居全卦的最上位，下无所应，阴而奸诈，位高而逼，不甘心臣服于九五，直到下面众阴皆已亲密比辅，大局已定，形势不利，于是再来比附，可惜已经迟了，反而遭遇凶险。而且，上六处于比道之极而转化阶段，企图化五为阴而己为阳刚，则变《比》为《剥》（䷖）。剥，落也。《周易集解》引郑玄注：“阴气侵阳，上至于五，万物零落，故谓之剥也。”上六野心，后果严重，不齿于正人君子，所以为极凶之兆。

总之，《比》卦精神，要求人类社会如宇宙一样，自然亲比，团结和睦，繁荣昌盛，生生不息。但无论上下之比，或左右之应，所谓亲比，有君子与小人之别。所以亲比以正则吉，以邪则凶，亲比之道，可谓大矣！

小畜

卦第九



养聚知止求小康

《小畜》第九，序列《比》卦之后。《序卦传》说：“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人们在度过了战争的艰难阶段以后，转入了相亲相附的和平建设时期，于是越过坎险，政治安定，与民休息，经济复苏，国家和人民开始了小有畜聚的小康生活。这是古代人民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孟子·梁惠王上》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学校）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须发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统一天下而为王）者，未之有也。”儒家亚圣孟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古代“王道乐土”，即小有畜积的小康生活图画。尽管要求并不算高，丝毫也没有现代社会超前消费的非分之想，但在古代，却常常是昙花一现，转眼即逝，那短命的绚丽图景，更激起了人们的思慕与狂想。“王道乐土”，何其远哉！《小畜》设卦，正体现出古代中华民族的一种理想与追求。企求“小康”化为现实，尚有待于今天我们的努力。

《小畜》的卦形是䷈，下乾（☰）上巽（☴），象征小有畜聚。“小畜”之“小”有二解：一是大小之小，就是以小畜大，以下畜上，以阴畜阳，以臣畜君；一是多少之少，所积力量与资财尚未足以创大业、办大事。“畜”也有数解：一是通“蓄”，蓄积、积聚之义，如《穀梁传》庄公二十八年：“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二是“养”，如《论语·乡党》：“君赐生，必畜之。”三是“畜止”，由畜聚、畜养，与“小”相结合，引申出畜知所止之义。四是“畜德”，即培养优秀品德，如《象传》所说：“小畜，君子以懿美德。”也就是说，“小畜”不仅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积聚，同时也包括了精神文明的建设，政治

品质、道德情操皆在可“畜”之列。

从卦象分析，下卦乾（☰）象征天，上卦巽（☴）象征风，风行天上，驱聚乌云，但风有气无质，能畜而不能久，还没有达到阴阳交和、普降时雨的火候，只是处于酝酿积聚阶段，所以称之为“小畜”。从卦德分析，内乾外巽，有可为之才。下乾阳刚而健，上巽阴柔而顺，阴阳相吸而聚，这是自然规律，畜养刚健，止其盲动，聚以待进，莫如巽阴之顺。古人所说柔以济刚，此为一例。而从卦体看，全卦六爻，一阴处四为成卦之主，以畜养其余五阳，以小畜大，以臣畜君，形成了一个以阴柔之主为中心的小家庭或小社会，所以称为小畜。

卦辞曰：“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意思是说，《小畜》象征着小有畜聚，开拓了亨通之路；阴云密布而暂不下雨，云气来自我们城邑的西郊。古人以云为阴物。而从方位来说，东和北为阳方，西和南为阴方。“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正说明阴气虽已升起，但阳气之聚力量不足，达不到阴阳交而时雨降的程度，因而还须养聚阳刚之气以待时机。卦中以六四阴爻为主，所以称我。朱熹《周易本义》以周文王与殷纣王的历史故事为喻。文王被拘羑里而演《周易》，相当于小畜之时，周在羑里的西面，所以称“自我西郊”。但“密云不雨”的小聚之时，虽因所聚力量不足而暂时停止前进，但它却为阴阳交接创造了有利条件，“密云”总有化雨的时候。象征事物的发展虽小有畜止，但停顿是暂时，理想无论多么遥远，但只要持之以恒，如愚公移山一般，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的。“小畜”迈开了通往成功之路的第一步，此所以为“亨”吉。

■勾践事吴



再谈爻位爻辞。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爻辞是说，初九，复返阳刚的本性，会有什么灾祸呢？必然吉祥。初九处下乾之初，居位最下，是小畜的初始阶段，力量卑微。但阳爻阳位得

正，上应六四卦主，争取阴阳相应，这是为阳刚之气的本性所决定的。因而虽然远离六四，但坚定地耐心上升，有朝一日，总会被卦主所畜。这是符合阴阳之道的自然规律的，当然没有灾害，而获吉祥之兆。古之解《易》者，常颂阳刚之大，而忽视阴柔之力，这是片面的。实际上从矛盾联系的观念来看，阴阳相生，谁也离不开谁，阴之畜阳，同样合乎自然之道。《老子》所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正道出了阴阳相反相生的矛盾规律。《小畜》卦初九之阳，向上以求六四阴主之畜，是符合阳刚之道的，所以为吉祥。如春秋时，越王勾践为吴所败，国破身囚。平素勾践为人，性本阳刚躁烈，但为报仇，君听臣言，接受范蠡、文种之策，忍辱负重，阴以畜阳，甘愿没身为奴而为吴王执戈前驱，卧薪尝胆，终于灭吴雪恨。如果勾践在大败之初，不以阴柔养其阳刚之性，小畜以待，能忍受此奇耻大辱吗？没有“密云”之畜，何来骤雨终朝？勾践灭吴，是一生动例证。由此可见，阴以畜阳，正是为了复返其阳刚本性而发扬光大。

九二，牽复，吉。

爻辞是说，九二被初九牵连而现其阳刚之性，吉祥如意。九二阳处阴位失正，又与九五同性不应，照理不是吉兆。但居中行中庸之道，而不盲目躁进，又被初九牵连一道，上行共应六四阴爻之主，这样又是阴以畜阳，合于自然，所以为吉。九二所倡，正是团结并进，以行中庸之道的精神。由初、二两爻看，一以位正而吉，一以居中而吉。由此可见小畜之时，争取正与中，何等重要。这样的“小畜”，自会渐积渐大，走向成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说，通“脱”。爻辞是说，九三，犹如车轮辐条解散，或是夫妻争吵离异。九三虽阳刚居位得正，但六十四卦中的三位，地位特殊，一般都较凶险。《小畜》九三，位处下乾之上，刚亢躁动，急于由内卦跳到外卦。但与上九同性相斥而无应，又自高其才紧逼六四近邻，无视卦主而不为阴畜，譬如车辐涣散，不能围绕车轴为中心旋转，那么车轮怎能继续前进呢？自然世界，并非何时何地都是以阳刚为主的。如中医所谓“肾阴亏”之病，主要进滋阴之药以救，如服壮阳药，继续胡乱行事，则将病入膏肓。又如阴阳失调，夫妻反目，不看形势，不问场合，忽视阴柔的重要畜养凝聚力，一切以阳刚为主的大男子主义，当然不可能夫妻同心。不同心就会阴阳解体，怎能建立起健康幸福的家庭结构？家庭破坏，又怎能企望过小有畜聚的小康生活？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界，小小的家庭，就是社会的缩影。所以古代“忠孝”连称，“齐家”与“治国”并重。因而阴阳失和，不仅破坏了家庭，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血，通“恤”，忧愁。惕，惕惧。爻辞是说，六四，内心诚信，畜聚五阳；远离忧愁，脱出惕惧，无灾无难。六四已脱出下乾而升至上巽之初，阴柔阴位得正，下有初九之应，上邻九五之中，从上下各方以应阳刚，渐聚渐大，力能畜人，又是全卦唯一的阴爻，为众阳的向往中心，是全卦的凝聚力之所在，因而是《小畜》的成卦之主。一个家庭，一旦失去母亲的温暖，其惨况不可言喻。因此，作为阴柔的卦主，六四的凝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譬如慈祥温柔的母亲，上有阳刚之夫的密切配合，下得众儿的倾心拥护和有力支持，家庭和睦，生活小康，当然没有忧虑，吉祥如意。推诸国家也是如此，九五居尊位为君，与六四阴柔之臣上下“合志”，言听计从，如《周易折中》所说：“以阴畜阳……臣之畜君，必信而后济，非与上合志，不可为也。”上下一心，君臣合志，排除困难，渐养渐聚，为国家的富强创造条件，如诸葛亮之于刘备，魏徵之于唐太宗，一以政略，一以谏诤，忠贞无二，拨正了国家航船的方向，所以道路亨通，至为吉祥。妻之畜夫，臣之畜君，虽为小畜，生活中却少不了。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挛，用手牵连；如，语气助词，无实义。爻辞是说，九五，内心诚信，率领众阳共同向往六四阴主，说明九五与大家共享富贵。《彖传》说：“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具体就是讲九五。九五处位，既中且正，为阳刚之君。但在小畜之时，知力不足以大有所为，因而谦恭待下，虚心接受六四阴柔之养；更可贵的是，九五并不因其尊贵而独享别人畜养，而是以其诚心，带动大家一心一意共创小康生活的环境。自助助人，共同富裕，正是一个领导者应有的气魄。九五君子，居中用事，正气舒展，志意昂扬，大家诚信，上下相应，团结一心，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呢？“小畜”之时，日臻成熟，化“小”为“大”，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只要九五转阳为阴，则下乾上艮而化为《大畜》卦，正是趋向大有作为的大畜之时。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尚，上。尚德载，即畜德满载的意思。几，近。望，夏历每月十五月圆为望日。爻辞是说，上九，密云化雨，畜阳已止，阴畜阳德，满载而归；这时妇女们坚守贞正品格以防凶险，犹如月明而不满盈；君子若不知畜止，前进必遭凶险。上九阳刚而处于全卦的最高位，阴阳既交，密云化雨，“小畜”道尽，正是矛盾转化的关键所在，下与九三不应，又忌妒九五之尊，高其位而不受六四阴畜，继续盲动躁进而不知畜止，所以前进必有凶险。言外之旨，处上九之时，无论阴阳双方，都应守正以防凶险，知小畜之机，非大有可为之时，渐养渐聚，畜有所止，以待时日。上九如狂妄躁动，转化为阴，则上卦为坎（☵），坎为险为陷，其岌岌可危的形势指日可待。从《屯》至《比》六卦，都以坎组卦；至于《小

畜》，才跳越坎险而求小康。但上九一旦盲动，又重新落入坎陷的苦难之中。以历史为例，中华文化，汉唐为盛。唐代贞观之后至于开元，小畜之聚，休养生息，终致小康生活，如杜甫《忆昔》诗所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古代农民的理想终于化为现实，所以无不欢欣鼓舞。但唐玄宗高高在上，不知畜止，只要国库里有多余的几粒粮、几匹布，就狂妄起来，超越时段，想要大干一场，于是穷兵黩武，四处拓边，不听边帅王忠嗣谏诤，肆意践踏和平边界，派哥舒翰统帅大军"西屠石堡取紫袍"，结果是西征吐蕃，南侵南诏，血流成河，民怨沸腾。朝政上则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群小，还自以为大兴文治武功。唐玄宗穷奢极欲，耗尽国库，民不聊生，小康生活终于又是昙花一现，转眼即逝。这不是超越"小畜"阶段而自罹坎陷又是什么？结果很快就"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气象荡然无存，李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怎能大有作为？前车之鉴，可以为戒。而正确理解《小畜》卦的"畜止"之义，则历史另是一翻欣荣景象。如王得臣《麈史》载，北宋理学家胡瑗给学生讲解易卦《小畜》，便引当朝世事以明"畜止"大义。他举宋初宰相赵普向宋太祖推荐官吏的事例，来生动说明"畜，止也，臣，止君也"的大旨。据《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载："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如果赵普为保富贵，尽可媚顺君王，无视"畜止"其君之义；但他义无反顾，"畜止"君王，举贤授能，用人得当，天下以宁。宋初太平盛世的降临，与其君臣知"畜止"大义有关。

■赵普像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

对于上九“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爻辞，汉京房《易传》有不同的解释与发挥：“言君弱而妇彊（强），为阴所乘，则月并出。”（见《汉书·五行志》引）把国家的衰亡，归罪于“女人祸水”，已早就成为一种传统偏见。根据“易无达占”之说，当然也无不可，但夹杂后代浓厚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之“占”，又另当别论。因为这并不符合《周易》作者的原意。作《易》之时，当殷、周之际，当时虽属奴隶社会，但尚保留了一些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会制度的残余痕迹。《小畜》卦以六四一阴为成卦之主，颂阴畜阳之利，以家庭为喻，为母亲与妻子的中心凝聚力大唱颂歌，这是原始公社母系社会残痕的某种折光。其实，从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角度看，男女之间，谁的能量大影响大，谁就是无形之主，所谓“妇强君弱”“女人祸水”之说，早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这是《小畜》卦给后人的启示。此外，在君臣上下关系中，提倡推诚相见，“富以其邻”，共同创造富裕的生活，这种古代朴素的“民主”经济思想，在古人仅是“理想”，在今天则将化为现实。时光流逝，匆匆数千年，作《易》者如果地下有知，怎能不感慨万千呢？还有，《小畜》之畜，不仅聚物，而且畜德，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一启示，也很重要。秦皇汉武，不畜其德以趋小康，而是不恤士卒万民生命，大兴徭役，连年征战，结果是国库空虚，白骨蔽野，连“小畜”之境也已丧失殆尽，怎么还谈得到由“小畜”而趋“大畜”之境呢？历史教训，值得注意。

履
卦第十



如履虎尾致元吉

《履》卦序列第十，在《小畜》卦之后。《小畜》卦形上下一反，就化为《履》，彼此互为综卦。其象征意义，一为畜止，一为行走，一静一动，构成一对矛盾。《序卦传》说："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原意是实行，如杜佑《通典》所说："践而行之曰履。"而在古代，"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所以《序卦传》把"履"解释为循礼而行。也就是说，人们经过了"小畜"阶段，资财小有蓄聚，有多寡之分，高下之等，美恶之差，人们又如何分配和消费这些蓄聚呢？物质小康就刺激了人的"物欲"，有欲就会起争端，这样社会必然混乱。于是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统治阶级就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制定了礼，要求人们循礼而行，不要有超越礼制规定的非分之争。春秋时，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平子（即季孙意如），在家里享受八佾之舞，孔子当面指责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一个家庭舞会，本是小事一桩，为什么孔子会这样愤怒呢？因为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天子之舞用八佾（八人一行叫一佾，八佾六十四人），诸侯之舞用六佾（六佾四十八人），大夫之舞用四佾（四佾三十二人）。季氏只是小国的大夫，循礼只能舞四佾，又怎么可以超越礼制规定而舞天子之八佾呢？古人认为，循礼而行，社会以安；履行非礼，人亡国危。因而《诗经》有《相鼠》之刺："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不循礼而行，还不如死掉的好！在古代这不是危言耸听。《易经》的《履》卦正是这一思想的概括，针对当时世俗对于礼制的破坏，于是发出危辞加以警诫。所以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说："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机，不为所伤，乃见所履。《大传》曰：'《易》之兴也，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辞矣。故九卦处忧患，以

《履》为首。”

《履》的卦形是䷉，下兑（☱）上乾（☰），象征谨慎小心循礼而行。从卦象分析，下卦兑象征泽，上卦乾象征天，《象传》说是“天下有泽，履。”古人分析说：“天在上而泽居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常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陈梦雷《周易浅述》）人们观察到天在上而泽在下的现象，体悟到礼制那严格的等级规定，成为人们行为实践的准则，所以取其象而为《履》。从卦德分析，上乾为天阳刚性健，下兑为泽阴柔性悦，天健动于上，泽顺悦于下，各安本分，和睦相处，象征循礼而行。

卦辞曰：“履：履虎尾，不咥人，亨。”第一个“履”字原缺，刘沅《周易恒解》据《象传》增补。咥（dié），咬。卦辞是说，《履》卦象征循礼而行，犹如小心地尾随老虎之后，不为老虎所伤，道路亨通。上卦乾，在《乾》卦有龙象，但在《履》卦则有虎象。六十四卦的象征物常有变化，如水之赋形，遇方则方，触圆则圆，变幻万端，随遇而安，千万不可拘泥。人所履行，古人以和悦卑逊为贵，因为兑泽柔悦，尾蹑乾刚猛虎之后，诚惶诚恐，小心翼翼，象征人处世上，危机四伏，但只要谨慎小心，循礼而行，则化险为夷，猛虎并不觉察而咬人，人生道路仍然畅通。全卦六爻，五阳包一阴，六三阴爻为成卦之主，以柔蹑刚，和悦柔顺，小心循礼而行，所以没有灾祸，仍可继续前进。故《晋书·袁宏传》称引其《三国名臣颂》中之赞云：“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虽遇虎尾，神气恬然。”卦辞不言吉凶但以“履虎尾”的危辞，告诫人们谨慎行事，循礼以履，则吉；阳刚躁动，狂妄自大，越礼而行，则凶。言外之意，人们自当细辨。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指素愿。爻辞是说，初九，依照平素的志愿，循礼而行，前进必无灾祸。初九处位下兑之始，居履之初，虽然上无应于九四，但阳刚位正，性和顺而志刚强，在下能安其素，而无改其初衷，不因利诱，不为物迁，虽世俗非笑之，但只要自己认为合于礼义，就坚持特立独行，举世非之而不惑。所以《象传》说：“素履之往，独行愿也。”事业之始，“素履”二字，非常重要，特立独行，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操守。唐韩愈写《伯夷颂》大加称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皆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与此相反，现代文明社会（无论西方或东方），反而出现一切向“钱”看的现象，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根本谈不到什么“素履”节操，更不要说什么法制和理想了，道德沦丧，于斯为甚。虽得逞于一时，但自欺欺人，可能很快落入法网，身陷囹圄；更严重的是，贻误国家与民族。如美国《易经》学会会长钟启禄所说：“一个社会之乱，不是乱在人多，而是社会早已没有道德的观念的下场。一个国家的靡靡不振，一再想改革，硬是改革不了，改革不下去。”（《易经十六讲》，中



■谢安像

国华侨出版社）这又从反面说明初九“素履”，“独行”的意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幽人，指幽静恬淡的高尚隐者。爻辞是说，九二，虽然大道平坦，但仍小心行走，幽静恬然的隐者，坚守贞正可获吉祥。九二由初九的“独行”向上前进了一步，处于下兑的中位，志阳刚而行中庸，以阳爻居阴位，有谦恭谨慎地在平坦大道上行走之象。而刚中在下，上与九五不应，所以又有“幽人”独守之象。“幽人”自有其素愿操守，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所以《象传》说是“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也就是说，尽管世乱纷扰，但“幽人”君子心有主见，守正以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虽然履道坦坦，但仍然小心循礼而行。九二以刚中居柔位，古人以为所履谦下而合于礼之本义，所以说是“贞吉”，也就是说，坚持合乎礼义的贞正操行，必致吉祥。如《晋书·谢安传》史臣曰：“文靖（谢安卒谥文靖）始居尘外，高谢人间，啸咏山林，浮泛江海，当此之时，萧然有陵霞之致。”是个典型的“幽人”君子，但他“中不乱也”，早在筹谋恢复国家江山的大业，所以，后来有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因以中兴。有所不为之“幽”而守正以待，终于迎来了“履道坦坦”。如《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所称：“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遁，俟时而动。”六爻之中，九二从正面把“履”道表达得最为详尽。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瞎一眼而视不正。跛，瘸一脚而行不正。能，作连词用。《周易集解》引虞翻注释“能”为“而”，古时“能”，“而”声近义通。爻辞是说，六三，

眇而注目，跛而竞行，争强逞胜，紧随虎后，被猛虎所咬，有凶险，就像武夫刚愎自用，妄图代替君王一样。六三一阴欲统帅五阳，是履道的成卦之主，它从反面揭示了《履》卦的精义。从爻位分析，六三阴居阳位，处下兑之上，急于由下向上升进，欲与上九阴阳呼应，但又为九四、九五二阳所阻，加以处位不中不正，柔弱而志刚，以履乾后，犹如不顾猛虎在前而躁急前行，结果为虎所咬，当然凶险。从卦构看，六三与九二、九四互卦为《离》，《离》为火为明，兼有目象，所以说“眇能视”。六三又可与九四、九五互卦为《巽》，《巽》有股象；而原来的《兑》卦，有毁折之象，所以合而称之为“跛能行”。既眇且跛，力量软弱，而乏自知之明，仍然一意孤行，强履上乾虎尾，能不危乎？又六三急于转化上进，一旦变阴为阳，则下兑化乾，有武人为君之象。犹如武人自恃刚狠之勇，野心勃勃，无礼犯上，欲肆其阴毒之志，取帝王而代之，结果身败名裂，千古唾骂。唐代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因宠生骄，肆虐中国，集天下之精兵，下洛阳，战潼关，破长安，篡唐自立，称孤道寡，旋即兵败，身首异处，而子孙无有噍类。古人以此为“武人为于大君”的形象写照。又宋司马光于汉末党锢之祸叹曰：“党人生昏乱之世，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蹈虎狼之尾，以至身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见《资治通鉴》卷六五）司马光从另一角度看问题，即使不是坏人而是正人君子，但如方法不对头，眇视跛行，逞强恣肆，而不问自己的能量与敌人的强大，一样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强踩虎尾而前进，结果被虎所咥。个人一命呜呼还是小事，但这一无谓牺牲，又加速了国家的败亡。这说明志士仁人，虽有匡世救乱之心，亦应审时度势，度德量力。于此可见，六三凶爻，危辞设诫，古今人所共鉴。

■安禄山范阳作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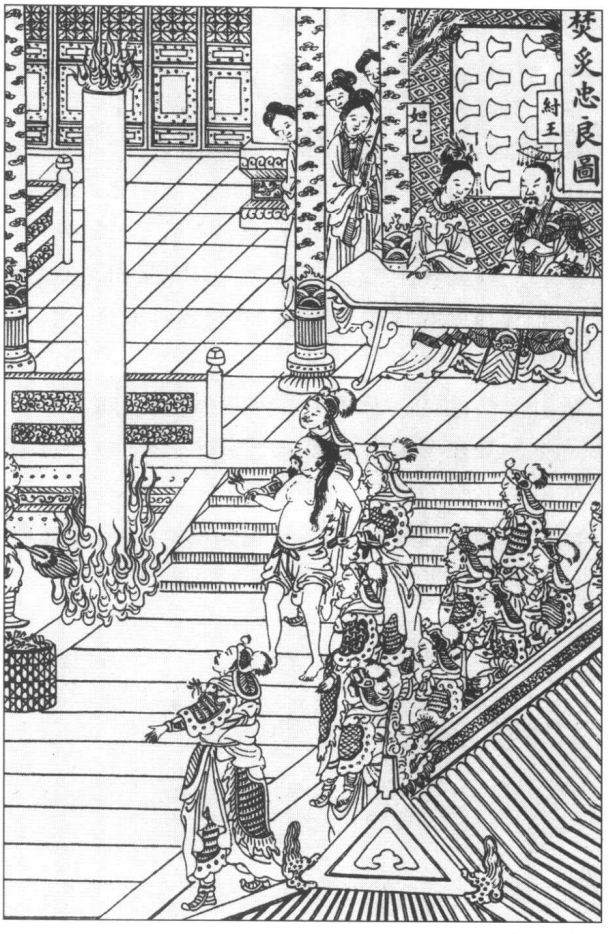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sù），畏惧貌。爻辞是说，小心地尾随猛虎行进，保持了高度警惕，最后必然吉祥如意。全卦以上乾阳刚象征猛虎，而在具体的爻位进退变动中，又以九五之刚象征猛虎。九四处位，已从下卦升到上卦之初，阳爻阴位，不中不正，直逼九五乾刚，因此出现“履虎尾”的危机征兆。但九四阳爻阴位，以刚居柔，又表示了态度谦逊，行事谨慎，有“愬愬”之貌，履危知戒，小心而行，所以最终又获“终吉”的美好结局。《吕氏春秋·慎大》有这样一则故事来说明《履》九四爻辞：“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贵虏也，贵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终吉。’”高诱注云：“喻二虏见于（周）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终吉也。”临危不乱，慎言对应，小心而行，终于逢凶化吉。而在《履》卦的卦爻辞中，“履虎尾”一句，三次重复出现，又将如何解释呢？实际上，卦辞中的“履虎尾”，体现的是一卦的总体精神，全卦以和悦履乾刚之后，小心循礼而行，所以“不咥人”而亨通；而六三以柔居刚，虽眇且跛，阴弱乏力，但却争强逞胜，所以如“履虎尾”而自招“咥人”之凶；九四与六三虽然同样不中不正，但态度相反，行事不同，九四以刚居柔，谨慎小心而有“愬愬”之惧，所以逢凶而化吉。同一辞句，象征意义可有不同，必须视其具体情况而定。拘泥一解，死于句下，不合“《易》无达占”之通理。

九五，夬履，贞厉。

夬（guài），通“决”，果断而决。爻辞是说，九五，言行果决，奋然前行，但必须坚持贞正以防凶害。九五阳刚，既中且正，象征以帝王之尊，乾刚决于上，兑顺悦于下，上下一致，毫无二辞，所以令行禁止，宸衷独断，而无所疑惧。这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夬履”之刚，可办大事创大业。但《易》卦的主旨精神之一是“变”，阴阳转化，事出必然。卦构变化，则矛盾性质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履》之九五，一旦化阳为阴，则一变而为《睽》卦（䷥），象征睽背乖离。《睽》卦下兑（☱）上离（☲）。离为火，有明之象，刚烈过甚，又自恃其明；而下兑又不知谏诤，一味顺从以悦上。这样一来，则“夬履”化为专断独裁。上独裁专制，下奉迎谄媚，国家能不危乎？夏桀、殷纣，就是历史的显例。他们以独裁专横为明，酷刑暴政无以复加，所以当时百姓指天发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见《尚书·汤誓》）众叛亲离而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九五有“贞厉”之戒，貌似危言耸听，实是至理名言，教人坚持正义之道，小心循礼而行，则可逢凶化吉。《尚书·周书·君牙》有“心之忧矣，若蹈虎尾”之言，直接受到《易·履》卦“履虎尾”的影响，居安思危，循礼而行，周朝以兴。这

就是“贞厉”思想的具体化。



■紂王酷刑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祥，黄寿祺谓“徵祥，即吉凶祸福的体现”（《周易译注》）。旋，周旋，引申为围绕着礼的中心旋转。元，善之始。爻辞是说，上九，回顾过去的历程，全面考察其吉凶祸福，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因而循礼而行，周旋中规，折旋合矩，至善大吉。上九位处全卦之巅，标志履道大成之时，阳处阴位，刚以居柔，谦逊待下，下应六三，阴阳相和，谨守履道，有“旋”之象；又能回顾所走的道路，冷静思考，总结经验，有“元吉”之象。唐韩愈《杂说》四首（之二）说：“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四支（肢）虽无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虽无事，不足矜也，纪纲而已矣。忧其所可恃，惧其所可矜。善医善计者，谓之天扶与之。《易》曰：‘视履考祥’，善医善计者为之。”统治者治理国家，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平安”，就像医生治病，不能只看人的肥瘦一样，而应该回顾所走的道路，审视安危脉理，顺应客观发展规律办事，这样就会如《履》卦上九所说，获得天的赐福。所以《象传》解释说：“元吉在上，大有庆也。”象征君王履礼于上，则万民欢庆于下。古人认为，为人君长，一言一行，系天下之祸福，能不慎哉！即使从今天的文明社会看，考虑到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为一个领导人，同样也应该居安思危，懔懔如“履虎尾”，引导人民克服艰难险阻，走向亨通元吉之路。古人之所谓“道”，各家各派理解不同，各道其所谓“道”。但有一点基本一致，即是人生必由之路。《履》卦所示，人生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所以充满

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了“履虎尾”的危辞以戒。所以明代洪应明（自诚）《菜根谈》说：欲做精金义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诗·小雅·小宛》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与《易·履》“履虎尾”同义，遇危难而谨慎处之，是走向成功的开始。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不固执古人封建之礼，而把“礼”解释为真理和正义，那么小心循“礼”而行，人生之路同样可以去咎除吝，逢凶化吉，还是充满了愉悦和欢乐的。《履》卦下兑上乾，下悦乎上，以柔履刚，上下感应，阴阳调和，当然充满欢乐，走向光明的未来。由爻位进退看，下卦初九无咎，九二贞吉，至六三而凶，所走之路，由正趋反；而上卦则相反，九四“愬愬”，九五“贞厉”，上九“元吉”，则是否定之否定，重新由生活的凶险反面，而向光明的正面发展。如美籍华人钟启禄先生所指出，《履》卦充满了生活的辩证法：“不但说明在辩证中的各观念的相互蕴含性，而且指出本质的提升，是辩证观念之为辩证。……九五的‘夬履贞厉’之中，就隐藏了‘视’其所‘履’，‘其旋元吉’。其旋元吉是视其所履的结果。”（《易经十六讲》）

泰

卦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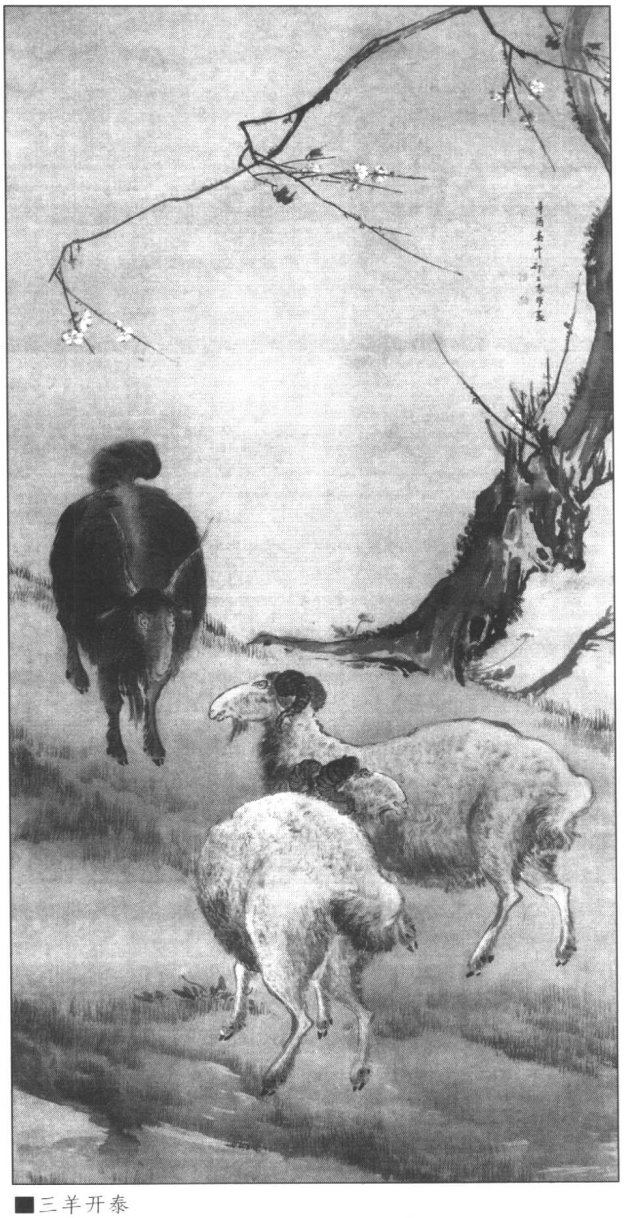
心气交通天地泰

中国的农历辛未（公元1991）是“羊”年，新春伊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一套纪念币，其中一枚的图案是“三羊（阳）开泰”，你知道其中的奥妙吗？无独有偶，古典小说《西游记》第九十一回，讲到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离了玉华城，一路来到金平府慈云寺打斋。那天正值元宵佳节，就到金桥上观灯游玩，不想乐极生悲，唐僧被一阵妖风席卷而去，无影无踪。孙悟空急忙驾起筋斗云四处追寻，忽见天神中的年、月、日、时四值功曹使者，变为牧羊人，赶着三只羊从西山坡下过来，被悟空识破，下面一段对话，颇合《易经》中《泰》《否》二卦相反相生的至理：

行者（悟空）道：“你们不在暗中保佑吾师，都往哪里去？”功曹道：“你师父宽了禅性，在于金平府慈云寺贪欢，所以泰极生否，乐极成悲，今被妖邪捕获。他身边有护法伽蓝保着呢。吾等知大圣连夜追寻，恐大圣不识山林，特来传报。”行者道：“你既传报，怎么隐姓埋名，赶着三个羊儿，吆吆喝喝作甚？”功曹道：“设此三羊，以应开泰之言，唤作‘三羊开泰’，破解你师父之否塞也。”

原来，“羊”的谐音为“阳”，“三羊”就是“三阳”。《泰》（䷊）与《否》（䷋）卦形相反，《否》的上卦乾（☰）为三个阳爻，三阳从外卦转变为内卦；而下卦坤从内卦翻为外卦，则《否》极《泰》来。一九九一年的纪念币的“三羊开泰”图，就是从《易》经得到的启发，意为化险为夷，吉祥如意。

《泰》卦的顺序，排在《履》卦之后，《周易》卦序的排列，有一定的道理。清陈梦雷《周易浅述》说：“自有天地（按：指《乾》《坤》两卦）以来，《蒙》以教之，《需》以养之，《讼》以平之，《师》以卫之，《比》以附之，



■三羊开泰

《畜》以聚之，《履》以辨之，而后得《泰》。乃过中而《否》之机伏矣。甚矣，致泰之难，保泰之不易!虽曰天数，不可无人事也。”“泰”就是和平通泰，相互之间交流通气而得到平安幸福。谁不想过幸福安定的生活？但从《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看，“泰”的美好境界，来之不易，“保泰”更不容易。《泰》虽是吉卦，却同时潜伏着转化为“否”的危机。所以《泰》卦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否》卦。在这里，古人强调了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保泰”的努力。人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按照天道自然的发展规律办事，就可以把“泰”转化为“否”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达到“保泰”的目的。在这里，《泰》的卦义也明白地显露出来了。

《泰》的卦象是䷊，下乾上坤，象征通泰。从表面看，乾天坤地，天在下而地在上，天地颠倒，应该是大难临头，为什么反而是通泰吉祥的征兆呢？原来，《周易》的象征物，不能完全作实际事物解释，而是撷取某一方面的象征以喻义，所以应作“虚”的灵活解释。比如《乾》卦六爻中的五爻，以龙为喻，但科学证明并无真正飞龙的存在，这只是古人想像中的动物。又如《乾》《坤》二卦，强调天尊地卑，则天在上而地在下，二者无法逾越。这是受阶级社会等级观念影响后的一种认识。但在《泰》卦中，强调的不是等级差异，而是相互交通，所以对天地乾坤，又是另一种说法。天地阴阳，先交流而后亨通，由亨通而趋安泰。天地阴阳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交流，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由阴阳派生的万物也就彼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

此隔离，互不相关，这样世界不乱了套了吗？试想，生物的发展变化是经历了一定的进化链的，如果这些进化链突然相互脱节，各管各的，还有什么物种起源和进化？譬如老天不接纳大地上升的水汽，森林拒绝天上雨水的浇淋，不是都要枯死了么!从自然规律看，这是不可能的。古人明白这一道理，于是就借喻说明泰之为道，“本以通生万物”，现在突然让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南辕北辙，阴阳不通，各自闭塞，不能交流，这样就会产生“万物无由生”的严重后果，导致世界的毁灭（参李鼎祚《周易集解》）。从这一不可想像的反面，古人悟出了正面的道理，也就是无生命的自然界因“气”相通，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类以“心”交流。天在下而地在上，象征的正是天气轻清以上升、地气重浊而下沉的阴阳交流会通。今天的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被大气层团团包裹着，所谓天地上下，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科学地说，天地上下，实在只是一种模糊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东西半球的人，所处天地的方位，可以相反。美国人的上天，却在中国人的脚下；同样，美国人的地下，正指向了中国人的天上。从这一角度看，《周易·泰》的卦象乾下坤上，天地颠倒，原来不成问题。不过是否由此可以证明中国远古先民科学水平很高，已认识到地球是圆的呢？据上海《文汇报》1990年2月18日报导，北京大学的陈传康教授，曾把《易经》与天外来客联系了起来，而一旦有了天外来客所见地球的知识，上古人民就自会产生地球是圆的科学认识，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尚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这里不再饶舌。不过据现存的文字记载，说明古人并不知地球是圆的；因此他们就改变思维方向，从“心”与“气”的无形交流会通方面来解释乾下坤上的《泰》卦之象，这是很聪明的。譬如地上的水分，遇热上升，在天上遇冷，凝结为雨雪，返降大地，这不正是天地以“气”相交的结果吗？而从社会人事的角度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存在阶级、阶层的差异，但总是相互联系、交流会通，构成社会共同体。如果资本家不招工人，工厂又怎么开张呢？中国封建社会，认为“礼别异，乐合同”，等级区别不可抹煞；但通过音乐的陶冶，引起人们感情激动，因“心”交而和谐，社会就安泰和平了。心气相交，天地通泰，这就是《泰》卦的内在卦义。

卦辞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古人以阴“--”为小，以阳“—”为大。《泰》的下卦是乾，三阳爻“—”居于内卦，是由《否》卦（䷋）的上乾三阳由外转内而成，所以说是“大来”。上卦是坤，三阴爻“--”处于外卦，是由《否》的下坤三阴由内转外而成，所以称“小往”。《周易》著者认为，阳盛来而阴衰往，显现了天地阴阳会通，生气蓬勃，既吉祥又亨通的兆象。在十二月循环的消息卦中，《泰》卦象征正月，三阳在下往上长，三阴在外正衰退，虽是阴阳各三，但发展趋势不同，透露阴阳变化生机蓬勃的消息，正处在天地交会、万物亨通的时期。所以《象传》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这又以

天道比附人事，以为泰卦的阳盛于内，利于君子的成长，而阴衰于外，则对“小人”不利。当然，所谓“君子”与“小人”，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又另当别论。

《泰》卦六爻，则象征通泰事物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茅，茅草；茹，根相牵连貌。汇，类也。征，前往。“初九”处于下卦之下，但阳位得正，又上与“六四”阴爻呼应，所以一开始就展现了吉祥的兆象。爻辞意为，拔茅草时，因根与根连，拔一根而众根动；三阳爻在下，一阳动而三阳进，象征通泰事物的最初发展阶段，一开始就能以类相聚，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向上发展，成为一个好开端。意在鼓励人们努力前进以获吉祥。这使我想起唐初李世民开创李唐江山之初，当时的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相互勾结以排斥秦王李世民。他们向父皇进谗，贬斥和离间秦府的主要文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人。但秦王府精诚团结，上下一心，共同对外，力图帝业。结果，如拔茅茹，其根类聚，拔一根而众根动，反而促使秦王府下决心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兵变，在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斗中大获全胜，不仅杀了建成、元吉，而且迫使父皇李渊退位禅让，从而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辉煌的一幕。秦王府以类相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开始就转危为安，展现了通泰的美好前景。政治斗争如此，经济工作或其他领域也是一样道理，这里不多列举了。

■萧何像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荒，污秽。冯河，徒步涉水。不遐遗，即“不遗遐”的倒装句。遐，远。尚，《尔雅》释为“右”，即佐佑。爻辞是说，九二阳刚处于中位，上应阴柔“六五”，作为君主的辅助。九二胸襟宽广，刚柔并济，既能包容污秽，又具非常魄力，果断行事，即使大难当前，涉水过河也在所不惜。举荐贤能，即使关系疏远也罗致无遗；反对朋党，虽是亲朋也毫不顾惜。光明磊落，辅佐君主以行中道。在历史上，汉初的丞相萧何就是这样懂得通泰道理的人物。他胸襟阔大，包容一切，虽然汉王刘邦对他颇有猜忌，但他在汉王失败时并不逃避，而是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往前线源源

不断地输送兵粮，终于使汉军夺取了最后胜利。他与韩信原不认识，关系疏远，但因其军事才能而力荐为大将；他与曹参，平日关系紧张，彼此不和，但临死前却推荐曹参接任丞相之职。其心胸坦荡，公而忘私，为国家的通泰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推行不偏不倚的中行之道，是通往“通泰”境界的重要因素。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爻位，阳刚得正，又与上六阴爻相应，以能获食禄有福为通泰吉兆。但九三位居下卦之上，处于内、外卦的交接线上，过中而轻进，已潜伏着泰极而否来的危机。爻辞是说，广袤的平原中有陂险，事物有去就有回，人们只有懂得艰难，保持贞正品格，才能避免咎害。这样就不必耽心别人是否信任，从而获得禄食与福气。这里应注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二句，显现了转化的苗头，充分揭示了生活的辩证法。从空间扩展来看是“无平不陂”，没有绝对平坦的道路。攀登成功之巅，必然经历艰险的崎岖之地，许多科学家的经历都证实了通往科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而从时间的延伸来说，是有去就有回，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在经历春生夏长秋收的喜悦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隆冬严寒，谁也无计回避。只有对于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正确处理，才能经历“艰贞”而获得“无咎”的结果。这第三阶段已初步揭示了“保泰”的艰难。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飞翔貌；这里指疾飞下降，不富，阳“—”为实，阴“--”为虚，虚为不殷实之象，故称“不富”。邻，指上卦的六五、上六两阴爻。六四之爻，阴居上卦之初，当上下卦交泰之时，又下与初九阴阳相应，所以基本是个吉爻。爻辞是说，六四之爻，虽然阴虚不富，但与其邻六五、上六二爻，联翩下降，以与下卦三阳爻相呼应，大家不必相互告诫，一样心存诚信，这原是内心的共同愿望。爻象爻义，呈现了阴阳上下交会的“通泰”景象。但“不富”云云，已有居高思危的暗示，潜伏着转化的兆头。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乙，殷帝王中以干支“乙”称名者有商汤与纣王之父，据现代学者考证，当指后者，即纣王之父。《程传》以为帝乙始制王姬下嫁之礼。归，嫁。妹，《说文》段注引《毛传》认为“女子后生曰妹”，则解妹为少女。祉，福。《易》卦第五爻属阳位，原是君主之位，九五之尊，力大势雄，臣民仰敬，该是大吉大利。但是《泰》卦“六五”阴居尊位，所以不能不谦虚下应“九二”，嫁公主以配贤者，居中不偏，上下交泰，以加强统治。从统治者角度看，“九二”尽人臣之职以辅助君王，“六五”降帝尊以任大臣，二者相互交通，配合默契，国泰民

安，所以是获得福泽的吉祥之爻。但是，“六五”的爻位爻辞还寓有言外之意，如果帝王不是谦虚屈尊以下任贤人呢？如果他因居尊位而暴虐独裁呢？“六五”之高位，通泰事物发展到了完美成熟的境界，正潜伏着泰极否来的危机。只是因为“六五”对于矛盾的处理得当，所以才获得了福泽与吉祥。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復，通覆。隍，城下无水的深沟。邑，通挹，减损。告命，诰命，君主诏命的一种。贞吝，守持贞正以避免遗憾。爻辞是说，当通泰事物发展到最后阶段，泰极否来的客观发展趋势不可避免，犹如城墙崩塌到干涸的护城沟里；这时人君不可逞强一时，兴师动众，而应该克制自己，承认错误，下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坚守贞正以防憾惜。《诗·小雅·十月之交》说：“烨烨震电，不宁不令（令，善也），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歌形象地说明了“泰极否来”的矛盾运动规律，极其辩证。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无所不在，谁也阻挡不了。所以古人有“沧海桑田”之叹。不过人们对此，应持“贞吝”的积极态度，而不是消极地坐等变化或加速灭亡。居高思危，正确对待，坚守贞正，自能适应转化的过程。例如中唐时唐德宗李适，刚愎自用，任用群小，结果几次被叛军围困于小小的奉天城，差点成了阶下囚。这时，大臣陆贽劝他纳谏思过，并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代皇帝起草了罪己诏公布天下，言辞极为恳切，开篇曰：“致现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民），不吝改过……小子（德宗自称）……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未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史载，这一罪己诏感动了将士兵卒和广大人民，上下思想交流，感情共鸣，终于力挽狂澜，所以将军李抱真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自邑告命”的罪己诏，成为特殊发展阶段的通泰宣言。但形势一旦好转，唐德宗早把罪己诏忘得一干二净，依然故我，终于国事日非，一发不可收拾。他自己也被奸佞群小所包围，临终时，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甚至哀求宦官让他最后见太子一面都不行，含恨九泉，咎由自取。这不就是《泰》卦上六“城復于隍”的生动说明吗？正如黄寿祺、张善文二位先生所说：“《论语·子路》谓‘君子泰而不骄’，似均可印证《泰》卦寓涵的‘处泰虑否’的鉴戒意义。”

否卦第十二



否泰兴亡关人事

《否》卦第十二，紧跟在《泰》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人生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既有畅通的路段，也有闭塞的时候。有通必有塞，有泰必有否。"泰"与"否"是一对矛盾，意义相反而相成。在分析《泰》卦时，我们曾有"否极泰来"之言；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泰极否来"。因为《泰》、《否》二卦，卦形完全相反，是《易》卦阴阳爻相互对峙的三十二对卦中的一对。《杂卦传》说："《否》、《泰》反其类也。"《泰》卦是下乾上坤（䷊），《否》卦则是下坤上乾（䷋），不仅整个卦形卦义相反，而且六爻的阴阳变动一一相对，彼此成为对方的正面或反面，展现了事物之间"周流六虚"时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就这样，天道自然的发展规律通过数理观念来显示，而数理观念又通过卦形卦象来体现。汉儒解《易》，重在象数，只要不是故弄玄虚，那么也可以从正确的方位去解开六十四卦的奥秘，从而体悟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具体就《否》卦说，它所表现的是与《泰》卦相反的事类，俗话所说的乐极生悲、泰极否来，就是简明的概括。《否》卦中含有浓厚的悲剧性内容，如《彖传》所说的"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在处于否闭的危机阶段中，自然万物无法生养，社会人事国家衰亡；对于个人来说，即使贵为帝王，一旦体内阴阳不交，也就意味着生命的危病或死亡。如清末光绪帝载湉，由于生活的孤独凄凉，政治上的失败忧患，以及自幼体弱多病，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去世，年仅三十八岁，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医案及光绪帝亲书《病原》，是年十月十九日的脉息，"清气不升，浊气不降"，至二十一日而有"阳散阴涸之象"，致使神医束手，一命呜呼。就医学看来，阴阳不通的闭塞之象，实在是对生命



■光绪帝像

的莫大威胁。不过，《易经》六十四卦，并不教人欢乐时忘乎所以，悲剧降临时又无可奈何，纯然是天命自然的奴隶；而是教人主动地去认识天道自然，探索人生奥秘，以便尽可能地去摆脱自然因果规律的连锁性，或是尽量利用自然的伟大潜力，从而主动去改变悔吝凶咎的命运，迎接吉祥如意的光明未来。《泰》、《否》二卦，的确启人至深。

《否》的卦形是䷋，下坤（☷）上乾（☰），象征闭塞不通。从卦象分析，下坤为地，上乾为天，天在上而地在下，从世俗眼光看，完全合乎实际，事属正常，应是吉卦。但《易》卦作者却是以“变”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所以得到的结论正好相反，正常仅是外在的现象，内在的本质是向不正常的方向发展。《象传》说：“天地不交，否。”《礼记·月令》也说：“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说的就是否闭之时，乾天在上，气清而上升；坤地在下，气浊而下降。这样阴与阳不就永不交通了么!阴阳不交，违反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当然就会造成自然万物不通、君臣上下隔绝的结果，所以说是闭塞不通。而在《易》的十二消息卦中，具体的象征时令有异，但理论本质相似：《泰》是阳气渐长的正月，《否》则是七月，是阴阳不交、万物难长的酷暑之时。与《泰》相反，《否》的三阴爻在下，逐步向上卦发展以侵蚀乾健三阳。但七月之时，立秋一过，又在阴气否闭之际，寓暑气渐消之机，所以自九四以后，上乾三阳，一爻比一爻劲健，直至否道完全倾覆消亡为止，这就意味否闭之世不会永久发展，冲破黑夜的曙光将会出现。

卦辞曰：“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辞中第一个“否”

字原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据全书通例校补。卦辞是说，《否》卦象征否塞不通。否闭之世，人道不通，不利于君子所行的正道，犹如刚大者被逐于外，阴小者入主于内。这反映了全卦的主旨。从《泰》到《否》，坤三阴爻从外卦入主于内卦，于是泰极否来，下卦三阴爻构成为否道主体；而乾三阳爻则从内往外，从所处下卦泰道之主的地位，被挤压到上卦，于是呈现了阴长阳消的征兆。而在作《易》者看来，阴虚（--）象征小人，阳实（—）象征君子，所以坤内乾外，象征小人的阴谋诡计得逞于一时，而正大光明的君子则暂时遭受挫折。所以《彖传》解释说：否闭之世，“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否闭之世，小人猖獗于一时，君臣上下，阻隔不通，天下动荡，国家处于危急之秋，国将不国，所以称之为“无邦”。但形势并非绝望而不可逆转。既然有“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时候，那么只要正人君子保存实力，就是对于“小人道长”的一种否定。因此，君子在否闭之时，不务荣华富贵，不求功名利禄，收敛锋芒，不形于外，以免在形势不利时目标太大，被小人围攻而衰亡。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明代的张居正，他对明中叶后的社会很不满，因此年轻时即胸怀理想，立志改革，欲挽狂澜于既倒。嘉靖末年，奸相严嵩当政，一时小人得势，志士吞声。在这否闭之时，张居正一方面对严嵩之类炙手可热的人物巧于周旋，并不过早暴露自己的目标，且家居三年，读书学习，外出调查，避开了朝廷小人的迫害；一方面伺机而动，在《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诗中明白地说：“欲骋万里途，中途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终于保存了改革的主力，在严嵩集团失败后不久，入阁主政，成了万历初年的著名改革家。如果在严嵩当政的否闭之时，他锋芒毕露，而不是“俭德辟（避）难”，恐怕早就被小人所害而被历史淘汰了，哪会有后来震动历史的改革成就呢？由此可见，即使在否闭之世，只要君子存在，同时也就寓藏着“小人道消”的转机，只是必须主动创造，耐心等待，而不是逆来顺受，听从命运的安排。

再看爻辞爻位爻象。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贞吉，亨。

关于“拔茅茹，以其彙”的解释，可参见《泰》初九。爻辞是说，初六，如拔茅草，因其根根牵连，拔一草而众草齐动。初六阴居下坤之初，处位最低，阴柔失位而不中，阴窃阳位，有阴毒之志，透露了某种野心。下坤三阴在下，当否闭之世，连类而动，犹如小人形成黑暗集团，很难一下拔除。不过初六虽为小人，但居否之初，上应九四，阴阳相交，其恶未形，所以暂时为害还不大。犹如人们生病，开始只是伤风咳嗽而已，并非突然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当然伤风咳嗽对身体也不利，但为害尚轻，只要及早治疗，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小人朋党比奸，形成集团势力，是有其过程的，否道一动，其恶甫萌，君子见幾，精诚团结，防患于未萌，就可以避害，因而前进的道路仍然通畅；而对小人来说，因其

涉恶未深，利于改造，仍可以改邪归正，变为君子。所以爻辞称为“吉亨”。爻象之吉，来自于斗争，关键在于“贞”字。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包容承顺。爻辞是说，六二，意欲包容承顺上乾诸阳，对小人是吉兆；大人君子则当安于否道，不与之通，这样仍然道路畅通。六二，处下卦之中，阴爻阴位，居位既中且正，又上应九五之阳，在一般卦该是吉爻；但在《否》卦的特殊环境中，则意义相反，如小人之得位势，窃据朝政，妄图顺理成章地包承一切，意欲控制在上乾阳三爻以为己用。这时否道已成，对小人是个“吉”兆。但对君子来说，则不可与之同流合污，小人之吉，君子为凶。不过处否之世，君子如能面对现实，承认不利，恬然而退，谨守否道，不为小人所用，则小人虽能猖獗于一时，但终归会走向反面的。所以大人君子的道路，仍为亨通，并非绝望。如春秋末年鲁国季氏家臣阳虎专国政，小人得位得势，欲召孔子为己用，“孔子不见”。于是他以计赠孔子一只烤乳猪，意欲孔子循礼登门拜谢；孔子则“时（伺）其亡也，而往拜之”（《论语·阳货》），坚拒而不与之通。阳虎小人意欲包承君子，以壮声势获得吉祥；但孔子则如白莲出污泥而不染。虽然仕途否闭，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但他谨守“君子固穷”之道，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被后世尊为“圣人”。又如宋代黄徹《碧溪诗话》卷五：“《否》卦：‘包承，小人吉。’说者谓小人在下包之，小人在上者承之，盖处否当然。杜（甫）云：‘曲直吾不知，负暄候樵牧’，‘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洗眼看轻薄，虚怀任屈伸’，‘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其寄傲疏放，摆脱世网，所谓两忘而化其道者也。”处否之际，小人得志，猖狂而难以理喻，所以诗人杜甫不与之交游，“洗眼看轻薄”，“高枕笑浮生”，这种疏傲独立的高尚气节，正是对于小人得志的打击。小人气沮，则否闭之中，已潜伏安泰之气的一线生机。于此可见，否闭之穷，正义不灭，君子的道路仍然畅通，就看具体行为，是否如孔子所称之“狂狷”者，“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也就是《象传》所说“大人否亨，不乱群也”的意思，所谓“不乱群”即不与小人为伍。

六三，包羞。

爻辞是说，六三，包藏羞辱。六三处下坤之上，自高其位，意欲往上包承乾刚之阳，但居位不中不正，阴据阳位，野心勃勃而力有不足，又处下卦上位，妄动躁进，不自量力，徒取羞辱而已。《否》卦下坤三阴皆为否道，但初六居否之初，其恶未形，犹致“吉亨”；六二小人据位得志，否道已成，但知阴柔承顺而不以力取，所以仍致“否亨”；至于六三，则窃据高位，不知羞耻，否道之极，而小人不明矛盾转化之机，因而徒取“包羞”之辱。据史载，明代天启一朝，阉党魏忠贤当政，一时小人气焰甚嚣尘上。当时的内阁首辅（首席宰相）顾秉谦，不顾身分欲拜魏忠贤为义父以揽权固宠，但怕魏嫌其年纪太大，于是遂让四个儿

子拜魏忠贤为“上公祖爷”。儿子为魏阉“义孙”，则自己不就是名正言顺的干儿子了么!又如阉党“十狗”之首的曹钦程，身为太仆寺卿，是魏“义子”，后因内部倾轧，削职为民，离京之时，再拜魏忠贤曰：“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悲泣而去。溜须拍马，无以复加。真是丢尽读书人的脸，不知人间仍有“羞耻”二字!没过几年，崇祯帝即位，这批无耻之徒落得了应有的可悲下场。这不就是六三“包羞”的形象说明么？！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命，天命。畴，通“俦”，众类也。离，附丽，依附。祉，福也。爻辞是说：九四，开始扭转逆道，合于天命自然，没有灾祸；上乾阳刚众类皆获吉祥。爻辞“有命无咎”四字，是将转否为泰的征兆。九四已从下卦升到上卦乾始，下应初六，阴阳相应，象征力争改造小人。又九四阳处阴位，志刚强而态度谦逊，行动谨慎，所以虽居位不正，但近九五之尊，获得同类的大力协助，已有力量逐渐扭转否闭之道，其同志也因团结一心，而皆致福祥之兆。为什么泰变为否，在内卦言之；而扭否为泰，却必须等到否道过中以后的外卦方才逐步展开呢？这是因为泰变为否容易，而否转为泰困难。从生活规律看，事实的确如此。人们在荣华富贵的安泰生活中，忘掉了潜伏着泰转为否的严重危机，时间一到，很快堕入否道；而转否为泰，则必须从废墟中重建，每一个脚印都渗透了血和汗，不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行吗？《否》卦九四，转否为泰，虽然仅是开始，却是关键的一步。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休止。苞，丛生貌。其，通“几”，几乎，接近。其亡其亡，《周易集解》曰：“案其亡其亡，近死之嗟也。其与几同，几者近也。”苞桑，桑树根干相牵连，以喻根深蒂固。爻辞是说，九五，果断地休止否闭局势的发展，大人君子获得吉祥；但休否之时，也须心存惧惕：危险常在，而有几乎灭亡之感，这样居安思危，就能转危为安，化否为泰，而有系于苞桑之固。九五阳刚，居中且正，比九四更为劲健，又居九五尊位，得位得势，有德有才，所以有能力在时机成熟之时，果断地休止否闭乱局。从全卦言，《否》卦象征了阴长阳消的否闭；但从上乾而言，则在泰与否的斗争中，九四已开始消阴为阳，九五则进一步发展，根本扭转了时局，阴消阳长，转否为泰，已成定局。但九五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残余复辟，所以有“其亡其亡”的苞桑之叹。因为六三、九四与九五，互为巽（☴），巽有木象、绳象；而下坤为地，有田象。古时农田，桑树为衣食根本之一。所以九五以“系于苞桑”为喻，义随象发，常存危亡之心，必致苞桑之固，而丧乱不能为害。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唐高祖》曰：“故能折棰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李渊起兵太原，扫除群雄，削平割据，化否为泰，正是来自于残酷的斗争，心存“其亡其亡”之念的缘故。如唐军历下邽、过栎阳，路经隋炀帝的行宫、园苑，李渊见后，不胜感慨，下教曰：“大业以来……经兹

胜地，每起离宫，峻宇雕墙，亟成壮丽。良家子女，充仞其间。怨旷感于幽明，糜费极于民产。替否迭推，将何纠逖。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他于战无不胜之时，悟到了“替否迭推”之理，因而为唐开国，系下了苞桑之固。李渊的历史功绩不可抹煞。《否》九五“其亡其亡”的精神，影响很大。汉王符《潜夫论·思贤篇》就曾加以阐发：“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故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常安而国脉永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倾，覆也。爻辞是说：上九，倾覆否闭乱局，把先前所存的否疾一扫而空，于是迎来了皆大欢喜的通泰日子。从爻位爻象分析，上九居位最高，刚健勇猛，又处于转否为泰的临界线上，所以能一鼓作气，倾覆否乱，否极泰来。一旦矛盾转化，上九变阳为阴，则上乾化兑（☱），兑有喜悦之象，所以先否后喜，说明否闭之世，终不可长。爻辞所占，贵在顺应自然又不空待命运，要求人们尽力人事而努力奋斗，以实现倾否而后喜的全新境界。

总之，《泰》、《否》二卦，矛盾相反，但又如影之随形，难以分离。古诗有“否泰如天隔”之句，以为人的命运，国家治乱，否闭与通泰有天渊之别，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却是片面的。否泰相反而相续的关系，常为人们所忽略。据传周公曾说：“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草木也不茂。”（见《韩非子·解老》称引）这话很有道理。否闭也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正确对待。严冬的大雪，正为来年春夏的丰年埋下了新的希望。否闭之际自有生机潜行，需要人们去发现和利用。反之，则将产生人间悲剧。处泰之时，如果像隋炀帝一样骄奢淫逸，则伏泰极否来之兆，很快身死国灭。殷鉴不远，能无戒乎？所以孔子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解《易》卦，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经·系辞传下》）这里所强调的不是顺任天命自然，而是重在人事的努力，以便驾驭否泰转化的大局。《易经》六十四卦虽有占卜之用，但并非尽是迷信，就在于它一方面以为“成事在天”；但另一方面更加强调“谋事在人”。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主体意识，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演。后来晋潘安在《西征赋》中，继续发扬这一精神：“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嗟夫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无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专，陷乱逆以受戮，匪祸降之自夭……岂地势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否泰形势的转化，除了客观自然的因素外，人事努力也是极其重要的。

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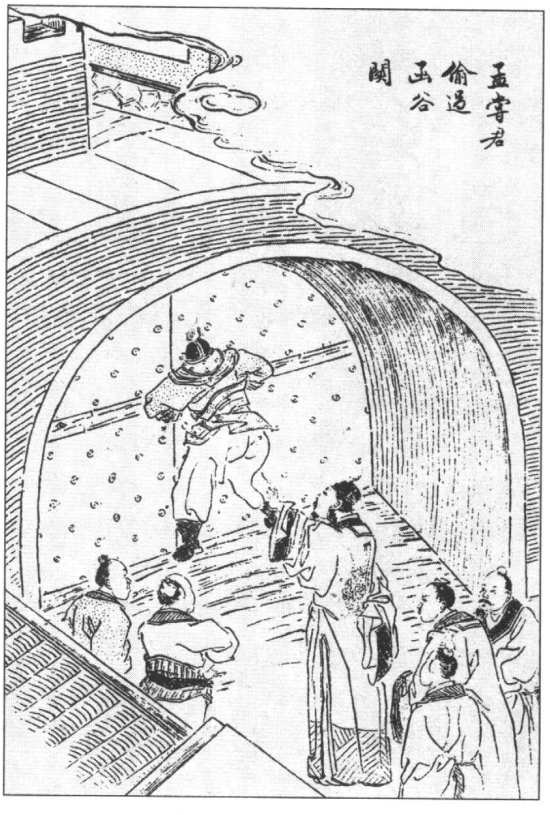
卦第十三



天下为公世大同

《同人》卦第十三，次于《否》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晋韩伯康注：“否则思通，人人同志；故可以出门同人，不谋而合。”生活在否闭之世，人人自危。为了打通否闭局势，以便死地求生，就必须大家合力，万众一心。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至关紧要的。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被骗入秦，秦昭王囚之，并计划杀他。孟尝君只好变易姓名，落荒而逃，秦国追兵愈来愈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但是，如等到天亮开关的时候，追兵早已赶到，孟尝君及其宾客一行，只有束手就擒而别无他法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君臣一心，上下同志，群策群力，思筹出关良策。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

■鸡鸣狗盗



壮哲明美家人哈塞部圖益其記華井圖書單最是民瀚如故事苏贺克演书中学小过既济来涉

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在孟尝君的食客中，鸡鸣犬吠之辈，居于“下坐”，一般人羞与同列。但孟尝君不管这些，一视同仁，仍然带了他们使秦，无论上下“出门同人”。就在无法出关而危如累卵之时，半夜一声鸡叫，引起关内外群鸡齐鸣，终于顺利开关出逃。如果居“下坐”者不与在上者同志，在上者又羞与在下者为伍，人怀异志，军心涣散，而士无斗志，又将如何破关而出呢？人人死无葬身之地，孟尝君又怎能在战国的历史舞台上，继续表演许多有声有色的动人故事呢？其实，不仅是事关国家兴亡的政治大事，小至家庭或个人，也是如此。在现阶段的中国，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供养两个孩子上学，经济上常入不敷出，如负重爬坡上山，担子愈感沉重。在此否闭之时，只有全家振作，“人人同志”，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则将冲破否闭，克服暂时性的困难，而迎来健康成长的胜利。如果家庭缺乏“同人”的温暖，在否闭来临时相互埋怨，则人们不胜负担，即使不在物质上被压迫，也必然在精神上被摧毁。于此可见，“同人”是否极泰来的必要条件。

《同人》的卦形是䷌，下离（☲）上乾（☰），象征和同于人。从卦象看，下离为火为明，上乾为天为日，火性炎上，与天亲和，所以《象传》说是“天与火，同人。”《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谓乾舍于离，同而为日，以照于下，君子则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也就是说，上乾之日，明照白昼；而下离之火，烛照于天，则补天日之不足，使黑夜有白昼之明。不管黑夜或白天，日火辉映，普照天下，路明心亮，至公无私，故君子同人。而从卦德分析，上乾性健；下离火，其德为丽为文明，内文明而外刚健，则立脚中正，大公无私。所以《彖传》说是“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观察卦构，六二与九五，处于中正之位，又阴阳相应，刚柔并济，正是上下同志，君臣同心之兆。又九五乾天之位，六二处人之位，因而六二、九五之应，又有以天同人之象。也就是说，“同人”不仅事关人事，同时是符合天道自然的。以原子的构成为例，如果原子核与电子不是阴阳相吸，彼此同心，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宇宙中就不复有原子的存在了。没有构成物质的基本原子，当然也就谈不到宇宙万物的存在，哪里还有什么人事呢？

卦辞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前一“同人”，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校增。卦辞是说，《同人》象征和同于人；在辽阔的原野上和同于人，道路畅通，利于涉越大河急流，利于君子坚持正道。为什么说“同人于野”呢？因为原野辽阔无垠，以此象征“同人”的宽阔胸怀。从卦象卦德分析，乾天离火，其性同为正大光明，普照天下，大公无私。在广阔大地上生活的人类千千万万，在原野上行进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是不管什么人，只要心向光明，行于正道，就应该引为同志，是谓“同人”。人们存异求同，大公无私，当然就具有了战胜困难的力量，前进的道路是光明而畅通的，此所以为“亨”。而乾性健行，人们同心同德，则可以济难越险，所以又有“利

涉大川”之象。又内文明（下离）而外刚健（上乾），六二与九五之爻，既中且正，阴阳相应，合于正道，利于正人君子，所以称“利君子贞”。可见“同人”之同，是以“贞”为条件的，是君子之和同，而不是与混浊邪恶同流合污的“同”。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申叔谓楚军主帅子反曰：“民生厚而德正……和同以听。”正是以“和同”并称，指君子之正道。而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所称“小人同”，指的是同流合污之“同”，而非《同人》的君子之“同”，二“同”矛盾对立，共名而实异，读者自应明辨。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爻辞是说，一出家门就与人和同，没有灾祸。初九处下卦之下，上与九四无应；但阳爻位正，又比邻六二，阴阳相动，刚健以行，仍然具有一定的内在潜力。又初九若变阳为阴，则下卦化艮（☶），艮有门象，所以爻辞称“同人于门”。人们刚想出去闯天下干事业，一出门就能与人和同，是好兆头，必然“无咎”。另外，“门”指门外而非门内，这很重要。门外之同，出于公心，其所指虽不如原野之同的旷远，但已非门内宗族阿私之同。这就引出了六二爻辞。

六二，同人于宗，吝。

从全卦看，六二与九五，不仅处位中正，而且阴阳和谐，应该是吉兆，所以卦辞称“亨”称“利”。但从六二所处的具体卦位及所体现的发展阶段看，又有不利的一面，所以爻辞称“吝”。爻辞是说，在家门内部的宗族中和同于人，有所遗憾。如果联系卦辞的“同人于野”、初九的“同人于门”，则“同人于宗”正是从另一侧面肯定了求同存异、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从爻位看，全卦五阳都企图与一阴（六二）相和同，但因所处时、位不同，效果各异。六二处于下离的中位，又是阴处阴位得正，是全卦唯一的阴爻，作为成卦之主，是上下五阳共同向往的中心。但六二却不顾这一切，抛弃了与初九、九三、九四及上九和同的机会，而一味与关系密切的对应爻位九五尊者相和同，其所和同比较褊狭，不是大公无私，一视同仁，所以用“同人于宗”作喻。与家人宗族和同，当然也不错。但家门宗族到底只是社会的一个小部分，而且和同家人，又难免具有私心，如果宗族家人中的邪恶佞人，六二作为成卦之主，也不以贞正为标准来区分是非，胡乱和同，其遗憾结局可想而知。现代西方影视，如最近播映的美国电视连续剧《钻石王朝》，亿万富翁的继承人是一对孪生姐妹，姐姐名伊芙，妹妹叫阿力克斯。姐姐心狠手辣，一心想害死妹妹以独吞财产，而妹妹却心地善良，因血缘关系而一味对姐姐忍让迁就，和同于家门之内，结果造成一幕幕的人生悲剧。这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同人”应坚持贞正的原则，“同人于宗”，心胸狭小，必有憾惜。同时，六二爻辞还启示我们，应跨出家族之门，放眼辽阔的原野，心存大公无私之念，和同于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民族的

飞跃。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莽，草丛。爻辞是说，九三，伏兵于草莽之间，登上高地窥测敌人，但三年已过，仍然不敢兴兵交战。从爻象看，下离为兵戈，有戎象；又六二，九三，九四互卦为巽，巽为木为入，草木同类，莽莽苍苍，利于遮掩埋伏，有莽象。所以爻辞称“伏戎于莽”。而从爻位看，九三处下卦之极，不知沟通上下，而欲上与九五尊者争斗，以便下同六二，包揽一切，但因时位不利，势有不敌，所以虽然伏兵三年，但终徒劳无益，一无所获。故虽不言凶，而凶象已露。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城墙。克，能也。爻辞是说，九四，已登上对方的城墙，但又主动撤退而不进攻，吉祥。九四已升处上卦之初，虽然位不中正，又下与初九无应，但位势已较九三有利，阳居阴位，刚而能柔又不急躁，态度谦逊平和，在形势紧张的关键时刻，能冷静而理智地进行思考。九三欲上抗九五之尊而下独取二，同列当然有意见。于是九四发难，以优势之位，乘凌九三。欲下同于六二，所以有“乘其墉”之喻。但九四刚居柔位，冷静回顾，知道自己与六二也非正应，于理不直，所以虽然已登对方城墙，并非力不能攻，但为合于“同人”正道，主动撤退。中越边界战争，即为一例。当时中国军队，因越方挑衅而自卫反击，予以教训，举同登，入凉山，势如破竹，越南震动；但完成教训的战略或策略目标以后，如果长期占据别国领土，于义不安，旋即主动班师而“弗克攻”，因而获得世界舆论的支持与称赞，中国的朋友仍然遍天下。这不就是一种得道多助的“同人”之道的生动说明吗？九三、九四一样欲下同六二，都有兵戎战争之象，但为什么九三“三年不兴”有凶兆，而九四“弗克攻”而吉呢？这就因为“同人”的时势不同所致。九三不自度德量力，缺乏自知之明，上凌九五之尊，而意欲独吞“同人”之果，心欲“同”而招怨，树敌太多，故呈凶兆；九四则下攻九三之无理非正，教训适可而止，位势俱佳，合于正义，所以为吉。由此可见，“同人”之道，并非时时畅通，如果时位不佳，也会陷于困境。关键还在于坚持“贞”正原则，因正而进，因正而退，则朋友遍天下，最后必致“同人”福地。反之，非正而强迫人同，以邪佞为同一的标准，野心勃勃，则虽兴师动众也必劳而无功，最后可能导致众叛亲离的局面，从而走向了“同人”境界的反面。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咷（háotáo）即嚎啕，大哭的声音。在和同于人的时候，先是嚎啕失声痛哭，尔后欢天喜地，犹如大战一场，告捷凯旋，胜利会师一般。九五阳处阳

位得正，居于上卦中位，尊严中正，又下与六二阴阳相应，应该是个大吉之兆。卦辞从整卦的总体精神出发，肯定了六二与九五阴阳二爻中正的“同人”之应，所以《同人》是个吉卦。但从具体爻位观察，则情况又有变化。九五欲下同于六二，但隔着九三、九四阳刚二爻，劲健而具阻力，非一战即能分胜负，要冲越障碍，就难免磕碰和损伤，所以有“先号咷”一番的痛苦。但九五仍不顾危险而为“同人”前行，如《象传》所说，是“以中直也”，因为正义所在，人心向背，虽经苦战，但战无不胜，所以有“后笑”之象。从爻象分析，《易》理主“变”。九五若变阳为阴，则上乾化离（☲），离有兵戈之象。所以全爻以军事行动为喻。而九五趋阴，又与九三、九四互卦为兑（☱），兑为泽为悦。离火无情，兑泽喜悦，水火无定，所以有先哭后笑之象。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非英军，被德军“沙漠之狐”隆美尔所败，为救“同人”，美军远征非洲，与德军坦克兵团周旋，开始尸横遍野，损兵折将，“同人”之先，“号咷”一番；后经巴顿将军整顿，以堂堂正正之师，驱逐德军出非洲，而与被困英军会合。随后挥师北指，合围欧洲本土，此所以有“而后笑”之吉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赴缅作战的远征军亦然。苦战日军，掩护英军撤退，先是损失惨重，但终于痛击驻缅日军，打通国际援华的生命线，而与美军会合，也与先哭后笑的九五爻象相合。

■长沮、桀溺像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爻辞是说，上九，企图在荒僻郊外与人和同，未遇同志，也不生后悔。上九处全卦之极，“同人”道穷，即将转化，所以下与九三无应，又欲强同于六二，却为三阳（九三、九四、九五）所阻隔，势难跨越，同志难觅。“同人于郊”与“同人于野”，“郊”与“野”一字之差，性质有别。如陈梦雷所解释：“野远而郊近。但野乃大众往来之道，无人不同；郊在郭外荒僻之处，无人可同也。”不过又因无所与同，所以自然与人无争，无争则悔吝不生，而吉祥也不现。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所以王弼发挥《象传》“志未得也”之意，

明确地说："故虽无悔吝，亦未得其志。"如长沮、桀溺等逃耕于郊的隐士高人，他们一再嘲笑周游列国的孔子，说他如丧家之犬，并不引为同志。隐者表面虽然清高，但其内在心理，因为"未得其志"而早已失掉平衡。内心不平衡，又怎能长期坚持下去呢？即使个人坚持，实际也极为痛苦。倒是孔子比较老实，他是这样回答隐者的嘲笑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意思是说，我们既然不可以与禽兽合群同处，若不与人们和同，又将与什么打交道呢？我这样劳碌奔波，只是为了改革弊政，坚持"同人"正道，以期社会转化，这又有什么好嘲笑的呢？和长沮耦耕而隐的桀溺，犹如上九所示，未得其志，虽因避世无争而暂无悔吝，但只是保全"小我"的血肉之躯，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群体"大我"贡献大小如何呢？与孔子相比，隐者志小，"同人"道穷，于此可见。

读了《同人》卦后，颇有感触。首先，"同人"之"同"，是存异求同。那种依靠权势，强人所"同"；或者以为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朋和心腹，以及本集团甚至同阶层的人，才可以"同"的看法，是褊狭而非大公无私的，虽然一笔写不出二个"同"字，但意义自异，不合《同人》卦义。春秋时史伯对郑桓公说："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这段话中有两种意义对立的"同"；一是"以同裨同"之"同"，一是存异取谏的"和同"。后一"和同"，合于《同人》卦义，正体现了传统的中和精神。就婚姻论，近亲结婚，"以同裨同"，会产生许多遗传疾病，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聘于异姓"，毫无血缘关系，反而有利于人类的优生。而就音乐艺术言，"声一无听"更是众所皆知的道理。当时齐相晏婴就说："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这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收音机、电视台天天播映样板戏，样板戏再好，也会听厌。样板戏是颇为精心制作的艺术，命运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单调"一听"的音响呢!现代交响乐如果缺乏和声、对位和丰富的声部，以及众多器乐的协调，能具如此恢宏而动人心魄的气势吗？而不同乐器，音色特点各不相同，如不存异，能有和谐的"大同"吗？社会政事也是如此。唐太宗之于魏徵，就是"同人"的好例。魏徵强项直谏，常常刺痛太宗的私心杂念，他虽然贵为皇帝，至高无上，但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世俗之人，他一样会激动，不安，生气和愤怒。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魏徵之命，岌岌可危。但事实不然。因为唐太宗终于强行压制了"小我"的私心，而出之以国家民族"大我"之公心，表彰直谏，存异求同，号召以魏徵为镜鉴，为史上"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又一有利条件。唐太宗与魏徵，君臣上下，存异求同，正合于《同人》之旨。这一种"同"，就是孔子所称的"周而不比"的君子之"同"，而不是"比而不周"的小人之"同"（《论语·为政》）。其

次，《同人》至公大同的卦旨，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礼记·礼运》篇据卦旨发挥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是古人根据原始公社的传说而构设的理想国。清末的康有为，为了推动戊戌变法，又以今文经学公羊家的眼光，糅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及欧洲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根据《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境界，写成了《大同书》，幻想建立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古人虚构的大同社会，当然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其精神鼓舞现代人。后来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言，正是以革命手段，来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理想。但这一理想的最终实现，还有待我们及后人的努力。奋斗吧，中华的优秀儿女们！

大有

卦第十四



精神物质双丰收

《大有》卦第十四，在《同人》卦之后。《序卦传》说：“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也就是说，同人相亲，齐心协力，事业有成，众望所归，万物依附，必然大有所获，至盛丰收，所以用《大有》来加以象征。《大有》的卦形是䷍，下乾（☰）上离（☲），与《同人》卦的下离上乾的卦形（䷌）上下颠倒，形成彼此相互促进的“综卦”，象征至盛丰收。从卦象分析，《大有》卦下乾（☰）为天，上离（☲）为火，《象传》说是“火在天上，大有。”程颐解释说：“火高在天上，照见万物之众多，故为‘大有’。”（《周易程氏传》）其实，上离不仅象征火，而且象征日，所以《说卦传》说：“日以烜（xuǎn，晒干）之。”下乾上离，昼日夜火，丽日中天，或夜火遍野，普照天下，无所不明。方向明则物知所归，从而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是治世极盛之象。而从卦德分析，内乾德性刚健，外离德性文明，刚健应天而动，文明合时以趋，顺应天时，合乎自然，则万物欢欣成长，无不昌盛，正是至盛而丰收之象。所以《彖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王弼就此作义理发挥：“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应天则大，时无违行，是以元亨。”顺应天时，合乎自然，在古代与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关系最为密切，我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正是“应乎天而时行”的具体化。“大有”，指的是农业收成的大有之年。中国古代早有“有年”与“大有年”的说法。《春秋》桓公六年的“有年”记载，注谓“五谷皆熟书有年”。《春秋》宣公十年有“冬大有年”的记载，因为从节气看，秋收冬藏，冬天享受大有之年的收成。《穀梁传》解释说：“五谷大熟，谓大有年。”《公羊传》桓公三年发挥说：“‘大有年’何以书？亦以书喜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丰年也。”《易经》的“大

有”，指的是获大丰收的大有之年。现代西方社会食品结构发生变化，禽蛋肉等高蛋白类的食物大大增多，而粮食相对减少。但中国古代则不然，人民一贯以淀粉类的五谷粮食为主，所以称少数的统治者为“肉食者”。五谷丰登，则人民衣食有靠。所以《诗·小雅·甫田》有“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之言。朱熹注曰：“有年，丰年也……古者士出于农，而工商不与焉。”丰年民乐，农勤于田亩，士慎于仕进，则国泰而民安。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农立国，农业收成直接反映了国民经济生活，甚至可说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人们常用“五谷丰登”的对联贴在大门口，来表示内心的愿望。五谷丰登的至盛之时，实际也就是封建国家处于“大有”发展阶段的具体象征。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诗描绘非常生动，富于生活气息：“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晓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而杨万里《至后入城道中杂兴》诗云：“大熟仍教得大晴，今年又是一升平；升平不在《箫韶》里，只在诸村打稻声。”太平盛世歌升平，并不在于封建统治者的自吹自擂，演奏尧舜时代的乐舞《箫韶》；而主要应该观察农村，细辨民间的“打稻声”。《红楼梦》第十八回载，贾元妃回大观园省亲，贾宝玉作诗以献，其中《杏帘在望》诗有这么四句：“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也是把“盛世”与“稻花香”相联系。其实，南宋大词家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早已说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那扑面而来的漫天遍野的稻花香气，使人联想到即将迎来至盛丰收的大有之年，因而欢欣鼓舞，似乎连田间群蛙的齐声喧嚷，也是在争说丰年。构思奇特，把词人与人民的呼吸脉搏，一气贯通了起来。《论语·颜渊》所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正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由此可见，大有之时，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的丰收方面；而且必须因此而与人民息息相通，表现了精神文明的丰收。

卦辞曰：“大有：元亨。”意思是说，《大有》之卦象征至盛丰收，通往至善至美的道路是畅通的。从卦构看，六五一阴居尊，成为卦主，上下五阳共尊奉之。《易》以阳为大，而以阴为小。《大有》一阴而得到五阳的拥护，不是大有所获的丰收又是什么？《小畜》也同样是一阴五阳，但情况不同，其一阴为六四，并非中位，逆于时势而勉强统帅诸阳，所以称“小”。而《大有》则是六五居中，柔居君位，礼贤下士，态度谦逊，以统诸阳，则时势俱顺，反响热烈，所以为“元亨”。陈梦雷说：“内刚健（按：指下乾）则克胜其私，外文明（按：指上离）则灼见其理，上下应之者，众阳应乎六五也。应天时行者，五以柔应乾之二刚也。天之道不外乎时而已，宪天出治，顺时而行，是以大亨也。”（《周易浅述》）但通往“元亨”的大有之路，首先必须依靠人们的努力去开拓，而不能只是依赖天命自然的恩赐。仍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例，《左传》昭公元年载赵文子语：“譬如农夫，是穮（biāo，耘田锄草）是蓘（gǔn，培土育苗），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只有经过辛勤耕作，才能迎来大有的丰收之

年。其次，要争取丰收，就必须扶善除恶。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曾借以喻政治，其《钱镈》诗云："欲收禾黍善，先去蒿莱恶。"自然如此，社会亦然。只有除暴，才能安良，而良民安则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精神文明获得发展。《象传》发挥卦辞说："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也就是说，"大有"之时，"元亨"之路，来之不易，应予珍惜。后来司马光据此阐述了《大有》的卦旨，说："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则善恶无所遁矣。善则举之，恶则抑之，上之职也；明而能健，庆赏刑威得其当，然后能保四方，所以顺天美命也。"（《温公易说》）

下谈爻位爻象和爻辞。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交，交接。害，祸怨。匪，通"非"。爻辞是说，初九，不主动招祸积怨，自然没有祸灾，但有前提条件，即必须牢记艰难。初九是"大有"的初始阶段，处下乾之初，当"大有"之始，上与九四无应，又远离六五，应援乏力。又因下乾有金象，上离为兵戈，有火象，按照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火能克金，加以遭罹兵戈之难，所以有遭小人伤害之象。古人常说："富者怨之府。"大有之时，家肥屋润，衣锦食甘，易招人怨。现代美国富翁的子女常遭绑票，就是一例。又目前中东海湾局势，科威特盛产石油，人均年收入一万三千美元，而其他阿拉伯国家如也门等，人均年收入才几百美元，贫富悬殊，易招人怨。所以伊拉克出兵，以闪电战的攻势，一举占领科威特，原是违反国际公法，无理之极；但阿拉伯世界中，却难免有幸灾乐祸者。大有的富国科威特，交害惹怨，也是一例。不过初九阳爻阳位得正，象征颇具才华，又去上离尚远，尚未涉害，自然无咎。但必须牢记创业的艰难，戒骄戒躁，而不能因"大有"始到，就得意忘形。只有慎始善终，才能长保"大有"。程颐说："若能享富有而知难处，则自无咎也；处富有而不能思艰兢畏，则骄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周易程氏传》）现在某些暴发的个体户，口袋里几个钱叮当响，立刻到灯红酒绿的舞厅赌局等处拼命消费，而不把挣来的利润投入再生产，不知创业维艰，结果很快破产。这从反面看到初九爻辞"艰则无咎"的深刻含义，应引以为鉴。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爻辞是说，大车满载财富，继续前进，没有祸灾。九二虽然爻位非正，但处于下乾中位，上与六五阴阳正应，有被君主宠信而任重道远之象，所以用大车载货以喻人事。又阳处阴位，虽才华横溢，创业有方，而态度谦逊，作风谨慎，所以可继续前进和发展，而没有危险。按九二阳处阴位，阳爻而刚健易行，阴位则虚中以受货，所以有"大车以载"之象。爻位爻象均充分说明了中位的重要，强调了中庸的精神。只有谨持中道，不私不偏，才足以任重而致远。所以《象传》

此，大有之时，应公正无私，慎行中道，才能保持不败。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通享。享有二解，一作享献，一作享宴。观九三爻象，九三、九四与六五互为兑（☱），有口象；又九三化阳为阴，则三、四、五互为坎（☵），有饮食象。据爻象以解爻辞“亨”，当为宴享之义。爻辞是说，九三，天子宴赐公侯，小人则没有资格享此荣宠。九三处下乾之极，阳爻阳位得正，刚健有力，如公侯之堪负重任。九三积极，由内卦向外卦靠拢，六五之君，阴柔礼下，因国阜民丰而宴享公侯等重臣，并寄予重任；而九三则因其刚正之德，忠心国事，以报朝廷的知遇之恩；君臣上下，共享“大有”之果。所以爻辞以宴享设喻。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九三处下乾之上，距上离仅一步之遥，乾为金而离为火，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火能铄金，下乾受克，伤害最大的当然是距离最近的九三了。因此爻辞在指出天子欢宴公侯重臣的同时，又指出了“小人弗克”的另一面。《象传》解释说：“小人害也。”小人妄叼君宠，不仅为君子之害，而且直接威胁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小人之害，一在才能之小，力小任重，如细桷为梁，无法负载负重，必然木折屋毁；一在器识之小，心术不正，视野狭小，只看到一己之私有，而置公众利益和国家前途于脑后。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小人德劣，不能胜其位，必致祸害。”故爻辞对尸位素餐的小人，力加抨击，主张不予重用。由此可见，爻辞“亨”之一字，就不仅是现代社会公共场合中一饱口福的普通宴会而已，其内在的象征意义，读者当自明鉴。

九四，匪其彭，无咎。

匪，通“非”。彭，盛多貌。如《诗·齐风·载驰》：“汶水汤汤，行人彭彭。”朱熹注：“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爻辞是说，富有而不过盛，没有祸灾。九四已从下乾升到上离之始，早已超越了“大有”发展的中期，正向全盛时期逼近；九四又紧邻六五卦主，因其近而受宠，成为君主的近臣而致“大有”。但九四近臣与九三重臣一样受君主宠信，而内在性质有差异：重臣之宠，在于职责与努力，任重而道远，君主赐宴，出于公心，其“大有”为国家酬报；近臣则因其地位亲近，君主多因私人感情而予宠信，以此而致“大有”，私字当头。私心太多，狎昵过甚，助其气势，又无所顾忌，常在有意或无意中，触及君主隐私或要害，所以前途必有凶险。从爻象观察，也是如此。九四处上离之初，已具盛大的气焰与声势，但因位处不中，缺乏离火的烛照之明，僭逼震主，六五柔中之君则为之寝食不安。君主不安，其前途可想而知。如秦始皇对丞相李斯外出时随从车骑之盛颇致不满，就是一例，功高盖世的公侯重臣声势过大，尚且易惹人主之忌，更何况是近臣呢？如中唐初期的宦官头子李辅国，因为曾是唐肃宗的心腹亲信，结党宫闱，飞扬跋扈，专政擅权，其气焰甚为嚣张。肃宗驾崩后，

儿子代宗继位，他公然对皇帝说："大家（按：指唐代宗）弟（但）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见《新唐书·宦者列传（下）》）意思很明确，要求皇帝安于傀儡的地位，以便于他的玩弄。过分亲近，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势凌人君，终于落得流岭南赐死的下场。这虽是后话，但近君则声势不宜太盛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古时如此，现代阶级社会亦然。所以爻辞作者一再告诫"匪其彭"，以防"大有"而过盛，是有道理的。不过从整个爻象来分析，九四又因阳处阴位，以刚居柔，虽盛大而甘处阴小之位，所以获得"无咎"的兆象。九四是否能保存其"大有"，其地位与命运，关键还在于明辨是非，以公杜私，以防过分亲盛而僭逼震主。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其。孚，信。交，交往。如，语气助词，无实义。爻辞是说，六五，心怀诚信与上下交往，不怒而威望自著，吉祥如意。六五处上离中位，离体中虚，如人虚怀若谷，故有"厥孚"之象；又下与九二阴阳相应，所以又有上下"交如"之象。其实六五不仅与九二正应，而且与其余诸阳友好"交如"，六五居于全卦之主的尊位，作为阴柔之君，谦逊待众，礼贤下士，以诚信相交接，所以自然成为上下五阳共同向往的中心，一切活动围绕着卦主旋转和展开。大获人心，激扬士气，上下交泰，当然也就大获所有，所以六五正处于"大有"事物全盛的发展阶段。当然，柔中居尊，太柔则纪律涣散，难服人心，因而六五化阳，上卦变乾刚，济之以威，刚柔相济，所以爻辞称"吉"。王弼注云："夫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既公且信，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爻辞是说，上九，天所保佑，吉祥而无不有利。上九爻位处全卦之极，下与九三无应，原该是"大有"道穷而终极之爻。但爻辞却说是"吉无不利"，是个吉爻，为什么？因为上九阳刚而处阴位，居六五之上而自谦抑。全卦余爻皆乘凌阳刚，而唯独上九以刚乘柔（指六五）以顺，所以《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上九说（悦）五，以柔处尊，而自谦损，尚贤奉己，上下应之，为乾（天）所右，故吉且利也。"根据上九的居位特点，而以人事来说明，则上九如功成身退的国家耆旧，以阳从阴，以刚顺柔，虽自居高位，但明白满招损的道理，履信事君，忠心国家，能顺应天命，享自然清福而不去瞎指挥，居"大有"丰盛之世，能急流勇退，而不以财物累其心，能高尚其志，荐贤以自代。如黄寿祺先生所说，"守顺谦下，诚信接物，见贤思齐"，"超然安处于'无位'之地，犹如获'天佑'长保富有，故'吉无不利'"（《周易译注》）。

总之，《大有》一卦，显示了上古人民的美好愿望，“大有”之世，就是古人想像中的理想国，也即政治昌明的至盛极乐世界。为了创“大有”、迎“大有”，人们迎神祭社，创设了许多节日。如古书中“有年瘞土”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任地》篇，注谓“年，谷也”，就是丰年祭土地之神以报其功的庆祝活动。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是古人日夜盼望的境界。唐储光羲《观竞渡》诗云：“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只要能获大有之年，人们自会欢欣鼓舞地加以庆贺，杀猪宰牛，祭土安神，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汉族如此，我国其余的少数民族也有一样的心思。如独龙族在每年十一至十二月间过年节，称“长秋哇”或“农瓦德路”，庆祝丰收吉安，欢聚宴饮；歌舞狂欢，要连续好几天呢。不过所谓“大有”，不仅指物质财富的丰收，更应指精神文明的丰收。如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上表刘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卒后果然“如其所言”（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从物质财富看，薄田十余顷，作为公侯丞相，并非“大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诸葛亮鞠躬尽瘁，忠心国家，名垂青史，妇孺皆知，这不是精神的“大有”又是什么？最近播映英国电视连续剧《小公主》，女主角是一位名叫萨拉·克鲁的小姑娘，她父亲去世后，曾尝尽人间的酸辛，备受世态炎凉的嘲弄，但她心地善良，在自己饥肠辘辘时，把面包送给了肚子更饿的孤女吃。所以人们称颂说：“即使在她身上穷得一个便士（按，英国货币的最小单位，相当于中国古时的一文钱）的时候，她也是富有的。”所谓“富有”，指的也是精神世界的丰收。但在现代社会，人们为了发财致富，为富不仁，什么假药或冒牌货，纷纷出笼，其金钱一时“大有”，但内在精神生活能不问心有愧而过得会实在吗？与小姑娘萨拉·克鲁相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才是。谁是真正的“大有”世界的主人翁？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谦

卦第十五



谦虚受益骄必败

《谦》卦第十五，在《大有》卦之后。如《序卦传》所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释文》解释说："卑退为义，屈己下物也。"俗话说："弓满则折，月满则亏。"人们一旦富有起来，不管是物质上的实利，或是精神上的虚名，都易招忌惹祸，成为攻击的目标。因此，人们在获得"大有"的丰收之后，应该谦虚谨慎，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唐初贞观二年，唐太宗君臣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能争；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按：实为《易·谦》卦《彖辞》）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敢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

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按：见《诗经·大雅·荡》）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见吴兢《贞观政要》卷六《谦让》）

贵为天子，为保江山永固，仍须行常谦常惧之道，更何况是一般的臣民呢？唐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史称盛世，正与其谦虚谨慎而不自满有关。看来，唐太宗对《易经》六十四卦是颇有研究的。

《谦》的卦形是䷎，下艮（☶）上坤（☷），象征谦虚。以卦象看，下艮为山，上坤为地，《象传》说："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pǒu，取也）多



魏徵像

益寡，称物施平。”所谓“地中有山”，当然并非生活中的真实，而只是一种寓含哲理的隐喻。但是，为什么不说“山在地下”而说“地中有山”呢？因为谦之卑退，并非力所不及，而是主动谦让，以便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谦”之卑下，其中却蕴藏着崇高，用“地中有山”来作譬喻，非常形象。程颐就此发挥说：“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见抑高举下，损过益不及之义；以施于事，则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称物之多寡以均其施与，使得其平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这种古代素朴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于黑暗统治者的无耻占有，不是一种无形的挑战吗？因此它多少含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而从卦德分析，艮在内而性为止，坤在外而性为顺，止乎内而顺乎外，象征居“大有”而与人共之，这不是典型的谦让么？从卦构看，九三一阳是成卦之主，其余五阴共同与之呼应，众阴向一阳，正是谦逊的表现。又全卦阴爻为多，阴爻形断而中虚，又象征以虚空之地容纳“大有”，永远不会有满溢之患。苏东坡《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虽然具体是说诗，但同样合于《易》理。“空故纳万境”，正是对于谦虚之“虚”的生动描绘。不管是人或事物，既谦让又虚心，则无怨无忌，无往而不达。由此可见，仅从卦形的六画略作分析，已可窥见“谦虚”二字的内容有其极丰富的内涵。

卦辞曰：“谦：亨，君子有终。”意思是说，《谦》卦象征谦虚，道路畅通，君子观卦象而因此体悟到必须善始善终地保持谦虚的美德。卦辞文字虽短，但并不简单。“亨”之一字，揭示了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卦，占筮者因此而获得了光明的未来，无穷的前途，但条件是“君子有终”。不是君子，难行谦道。小人有时为了沽名钓誉，也会在大众面前，故意装扮成一个谦谦君子的样子。但小人之“谦”，只是一时的需要，终将暴露真相。如南北朝时孔稚珪，曾作《北山移文》，讽刺某些自命清高的隐士，内心贪图官禄名利，而外表却是一派恬淡山林的虚伪情态：“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代，蔑五侯，风情

张日，霸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叹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覈玄玄于道流。”似乎极其高洁，俨然是不计名利的谦退君子。但这只不过是欲抑先扬的艺术铺垫而已，紧接着作者笔锋陡转：“及其鸣驺（按：使者的马车）入谷，鹤书（按：征召诏书，书体如鹤头，故称）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于是“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惟妙惟肖地把那些热衷于走“终南捷径”的伪君子真面目暴露无遗。后来明代洪自诚《菜根谭》据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谈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厌名利之谈者，未必尽忘名利之情。”外表谦逊，内心阴贪，这是封建士大夫的一种被扭曲的变态心理。所以孔颖达说：“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唯君子有终也。”卦辞所说“君子有终”四字，谈何容易!其“终”字有二义：一是君子行谦虚之道，不问任何条件，不管身处何境，都是一样忠实履行，善始善终；一是由善始善终之因，而引出来福祥之果，即君子行此谦道，或者亏于一时，但终将获得亨通与吉祥的美好前景，也就是程颐所说的先屈后伸，享之有终的意思。从小背景看，谨守谦道的君子可能吃亏；但从历史大背景看，则“君子有终”的谦虚君子，必终成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杠杆。

下面分析爻位爻象和爻辞。

■冯异像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爻辞是说，初六，谦而又谦的君子，履行谦道就可以涉河越险，一切吉祥如意。从爻位爻象看，初六以柔下处谦道之初，有谦而又谦之象。又初六阴处阳位，于艮之下，艮有止义，始行而知止，有知足不辱之象。其实，不仅儒家提倡谦道，道家的老庄更是如此。《老子》所说的“知止可以不殆”，正合初六爻象谦谦知止之义。但谦谦知止，并不是一味退让，而是为跋涉艰险，利于前进，所以爻辞说是“用涉大川”，这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退一步，进两步”的意思。在《易经》中，“涉川”常意味着越险济难。《谦》卦的二、三、四爻互卦为坎（☵）为水，象征川险；而三、四、五爻互卦为震

（☶）为木，木可为舟，舟行川上，所以《谦》中爻象本身就含有涉川越险之象。而《谦》初六的君子“谦谦”，慎之又慎，正是涉川越险前的必要准备。涉险无备，与谦道相反，其溺水而亡可以预料。但为什么别卦是“利涉大川”，而《谦》卦初六却是“用涉大川”呢？陈梦雷解释说：“‘用涉’与‘利涉’稍殊。利涉者，无往不利；用涉者，涉川不可争先，用谦谦之道以涉则吉。人当险难之时，非深自屈折不足以济，故必用谦谦以涉也……初在下卦之下，谦而又谦，在下之君子，卑而不可逾者也，用以涉川，则虽济患难可矣，况平居乎？”如东汉的开国元勋冯异，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功高盖世，百姓归心，专阃关中，号“咸阳王”。但他“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止所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正因为冯异谦让知止，行谦谦之道于初始之时，所以光武一向宠信有加，成为中兴名将，死后泽及子孙。《后汉书·冯岑贾列传》之史论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若冯（异）、贾（復）之不伐……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在现代，如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武装闹革命，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大革命失败后的不利形势，一心想占领大城市，与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的国民党正规军作阵地决战。为此，革命力量牺牲惨重。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则组织红军，手持梭镖，退上井冈山。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星星之火终于燃遍了全中国。如果毛泽东当时不行“谦谦”退却之道，而以梭镖直冲坦克，怎能有以后的涉险济难，战胜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伟大胜利呢？于此可见，行君子“谦谦”之道，先屈后伸，是积极有为之用，而非一味消极退让。退正是为了以后更快地前进。

六二，鸣谦，贞吉。

爻辞是说，六二，谦虚之道，引起了君子内心的共鸣，坚守正义，可获吉祥。六二处于下艮中位，阴柔中正，谦虚出于内心的本性，所以《象传》说是“中心得也”，由于内心守谦之道，动机纯正无瑕，所以名声流传而获吉祥。其所谓“鸣谦”，正是上比九三卦主，共鸣互应。从卦构看，三、四、五互卦为震（☳），震为雷，雷动而天下应。九三劳而能谦，诸阴犹如众庶，风闻其雷响，而率皆相从于谦，阴阳互应，和谐而鸣。六二自处卑下以退让，所以称为“鸣谦”。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爻辞是说，勤于谦虚之道，君子善始善终地努力坚持，必然吉祥如意。这里的“君子有终”，与卦辞的“君子有终”同义，因卦辞辞旨主要依九三卦主以立义。九三是全卦唯一的阳爻，处下卦之终，位于上下卦之交，从爻位看，一般

象征处于艰难转化的痛苦阶段，并非吉爻。《谦》卦不然，九三阳爻居阳位而得正，刚健有力，又不以此傲人，而是谦虚待人，勤劳不息，谦处下卦而不自高自大，为众阴所响应和支持，犹如万民敬服，团结互助，就有力量越坎险而济难。所以元吴澄《易纂言》说："万民服，谓有终而吉也。"唐初贞观三年，太宗问儒学大师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无，己若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诚如卿言。"诏赐物二百段。（见《贞观政要》卷六《谦让》）孔颖达从正反两方面，把《谦》卦九三的爻义，描绘得生动形象，其深刻哲理，脱颖而出。《老子》所云："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又云："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与九三"劳谦"同义。正是无论儒家或道家，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也。

■周瑜像



六四，无不利，撝谦。

撝（huī），裂也；引申为发挥之义。《说文段注》云："撝谦者，溥散其谦，无所往而不用谦，裂义之引申也。"爻辞是说，六四，无所不利，因为君子发挥了谦虚的美德。六四处上卦之始，已升到下卦九三劳臣之上，又邻近六五之君，处位阴柔得正，谦逊事上，谦恭礼下，因此上爱下敬，无所不利。在一般卦中，四处"多惧"之位，并非吉爻。但《谦》之六四则"无不利"而吉，原因何在？因为六四敬慎自修，履行谦道，以示不取自安之意。敬上礼下，其所行皆得其宜；得其宜，则所处时位与势态皆佳，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能无往而不利。如三国时东吴大将周瑜，从历史记载看，就是"撝谦"的典型事例。后世小说

《三国演义》及其他三国戏，如京剧《群英会》将周瑜塑造成一个气量狭小的骄傲狂妄之人，纯属艺术虚构，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这一典型形象。历史真实是，在孙权“位为将军”之时，“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因之孙权对他宠信有加，终于力排众议，联合刘备，北抗曹操，赤壁一战，大获全胜，事业有成。而他对下亦谦恭有礼，不计较个人名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程）普颇以年长，颇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酒，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作为小说或舞台艺术形象的周瑜，是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小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谦虚大量的君子。不然，何以能成赤壁之战的主角，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那辉煌悲壮的一幕？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爻辞是说，六五，虚怀若谷而不富裕，但因为得到邻居的帮助与拥护，所以出兵讨伐骄横不服者，无不有利。六五处上坤的中位，也是全卦的君位，作为阴柔之君而具阳位之势，与六二虽然无应，但下比九三阳刚“劳臣”，能够谦恭下士，敬礼有加，同时与上六协调一致，共伐不服，所以出兵而无不利。为什么称“侵伐”？因为从爻象看，六五若化阴变阳，则与九三、六四互卦为离（☲），离有兵戈之象，故以征战设喻。为什么称“不富”？因为六五虽居君位，但按照《易》理，阳实阴虚，六五作为阴爻，虚怀若谷，谦虚礼让，有财有利则与人共，所以“不富”。作为君主，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国家昌盛，人民富裕，君主才能心安理得享受“大有”之利，因此君主不损民以自利，行谦道而“不富”，不正是历史的好现象吗？像中唐时唐德宗，在宫室之内，厚自聚敛，甚至派宦官以“宫市”名义，四处劫掠，巧取豪夺，还要勒索所谓“门户钱”或“脚价钱”，人民货财两空，谁不怨恨冲天？《新唐书·食货志》说：“有赍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宫（宦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韩愈《顺宗实录》记录更为详尽。当时白居易作《卖炭翁》一诗，对此加以无情的讽刺与鞭挞：“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如此皇帝，不是无赖又是什么？怪不得泾原兵变，攻入京师皇宫，禁兵四散不战，唐德宗只能仓皇出逃！所以欧阳修《易或问》曰：“贪满者多损，谦卑者多福。”谦卑之君而“不富”其身，实是历史的进步。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爻辞是说，上六与行谦道者共鸣，利于出兵作战，征伐自己封国中的叛乱。上六处上坤之极，居“无位”之位，在矛盾转化的关口，一般的卦都有不利的



■夫差像

一面。但《谦》之上六“利用行师”，大有作为，为什么？因为上六下应九三，阴阳共鸣，又下比六五，共行谦道，名正言顺。但因居位不中，不像六二柔顺中正，所以爻辞同是“鸣谦”，但六二“贞吉”，而上六爻是利于“征邑国”。说明上六之谦尚有不足所致，所以《象传》说是“志未得也”。实不足则邑人叛，叛则征之，以谦顺征叛逆，师出有名，堂堂正正，此其所以为利。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谦虚美德，人皆称颂。《易经》的《谦》卦主其首，《尚书·大禹谟》发为“谦受益，满招损”之论，以后儒、道、释，均执谦道，成为至理名言。据《韩诗外传》载，周公曾以此告诫儿子伯禽，说：“《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谦虚之道，对于社会人生，意义深远。谦虚使人进步，骄傲必至灭亡。春秋时吴王夫差，几乎每战必胜，骄傲自专，最后被越王勾践袭取，一战而身死国亡，持盈履满，岌岌危哉!历史的教训，值得重视。又有人把中国传统美德的谦虚，与西方强调竞争相比较，并证之以近代史，认为西方之文明观念高于中国。其实这理解不正确。谦虚美德，世界公认，非中国独有。且《谦》卦所象征的谦虚，意思并非一味退让，更不是毫无原则地把国土和民众利益拱手割让给侵略者。因为“谦道”，不仅有合理的竞争，而且主张“利用行师”以征伐骄横叛逆。可见谦虚之道，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辩证观念，并不排斥合理的竞争。其实谦虚之道，不仅事关人类道德，而且更进一层与宇宙自然浑为一体。不久前，看到当代作家秦兆阳写的《宇宙的格言》，很受启发：“幸福属于落日，它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希望属于星辰，它迎接新的黎明。落日并无遗憾，天空由星辰布满。星辰自由消失，朝阳喷薄而出。啊，宇宙是一本天书，上有格言一句：勤奋、闪光、谦虚。”（见《文汇报》1990年9月14日第3版《笔会》）《谦》卦六爻，内三爻皆吉，外三爻尽利，整卦吉利。在六十四卦中，可说是绝无仅有，未有《谦》之尽善尽美者。参合古今之间，验证天人之际，可知谦之为道，大矣哉!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

豫

卦第十六



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世界上，只要是活人，谁不想过幸福欢乐的生活？关于这一点，东西方都一样。人们常用神话和传说来为欢乐的生活编织出一只只绚丽的花环。弥尔顿在《快乐的人》中，对着天上的喜神唱起了颂歌："优美的女神呵，我们欢迎你，你在天上叫夫洛斯妮（按：爱神维纳斯的女儿），在人间却叫开心的欢喜……欢喜神，请答应我的请求，让我们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共享着不越礼数的欢乐：让我们静听飞鸣的云雀，它的歌声在惊破残霄，直待五彩的朝霞升起，在高空里飞鸣不已，让我移身走向窗前，隔着野蔷薇或葡萄引蔓，或是蟠屈纠缠的藤萝，向晨光问好，尽情地快活。"中国人在迎接丰收的喜庆日子里，也常奏起了悠扬动听的民族乐曲《欢乐歌》。但是，朋友你可知道：欢乐的生活是怎样来的呢？是凭天而降，还是人们的争取与创造？为什么欢乐与悲痛常是形影不离，怎样解释这一活生生的矛盾现象？人们又该怎样来保持那健康持久的精神欢乐，而尽最大的努力去抵制一时感官纵乐的诱惑呢？在读了《豫》卦以后，或许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考，努力寻找解开这一连串问题的钥匙。

《豫》卦第十六，在《谦》卦之后。《序卦传》说："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尔雅·释诂》曰："乐也。"生活在喜获丰收的"大有"之世，又能谦虚地待人接物，这样就必然从物质到精神，都获得了欢乐。《豫》的卦形是䷏，下坤（☷）上震（☳），象征欢乐。从卦象看，有下坤为地，上震为雷之象，所以《象传》说是"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也就是说，震雷为阳物，坤地为阴物，雷闭地中，滚动而出，声震天下，正象征阴阳交合，万物振奋而欢乐。我国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惊蛰，春雷始鸣，蛰伏过冬的动物震动惊醒，纷纷活动，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不

管是自然界的动物或人类，到处洋溢着生命的欢乐。而大地母亲则敞开了自己宽厚的胸怀，用乳汁滋养万物，倾听儿女们的欢声笑语，心里一样地快乐。古人迷信，有自然神的崇拜和祖先崇拜。因此，为了表达自己因欢乐而感激的心情，人们唱歌跳舞，并把这一切都献给了祖宗和上帝，以祈求神灵保佑，永远欢乐。从卦德看，下坤德性阴柔以顺，上震德性阳刚而动，《彖传》说是“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所谓“刚应而志行”，就是阴阳相应，理想实现，所以其乐陶陶。按九四一阳为全卦之主，上下群阴和应，犹如春雷响而万物生。内坤顺着外震而共鸣，出于本性，无不和悦，自然充满了欢乐。所以汉代郑玄解释说：“坤，顺也；震，动也。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故谓之豫。豫，喜佚说（悦）乐之貌也。”（见《周易集解》称引）

卦辞曰：“豫，利建侯行师。”卦辞说，《豫》卦象征欢乐，人们把握这有利时机，以建立诸侯和率师出征。从卦象看，上震为雷，雷为长子，长子主器，百姓归心，有利于建立诸侯之象；而下坤为地，地多民众，九四一阳而统众阴，号令一声而众动，所以有师役之象。三军一动，志士用命，人心和乐，所以为“豫”。豫即欢乐，是合乎天时地利的自然规律，意义深远，谁也无法违背。《彖传》据此发挥说：“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tè，差错）；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为什么在欢乐时刻却要提到“刑罚清而民服”呢？因为《豫》卦的上震为雷，震曜天罚。晋夏侯湛《雷赋》云：“故先王之制刑，拟雷霆于征伐，恢文德以经化兮，耀武义以崇烈。苟不合于大象兮，焉济道以成哲！”唐张仲甫《雷赋》云：“冀贞廉于众口，法令未若于雷霆。”除害正为了兴利，所以政治清明民心服悦，皆大欢喜。于此可见，“豫”之欢乐，并非忘乎所以的纵情声色狗马之乐，而是通过劳动和斗争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有谁想破坏这一幸福生活，若不兴雷霆之师以惩罚之，能保得住吗？《豫》卦的旨义，的确富有辩证的思想因素。“豫”虽然只是一字，但内容丰富，古人分几个层次加以阐述：一是“备豫”，一是“逸豫”。所谓“备豫”，就是必须有备无患，时时警惕，力加保卫，以防欢乐幸福生活的丧失。孔子曾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也就是说，人们观察《豫》卦，受到启发，因此屋里固设门户，夜晚敲梆子巡逻，严防小偷强盗来抢夺欢乐之果。人类是很复杂的，分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各人心思不一，对于“豫”即欢乐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获取欢乐的手段也各异。正常的人用艰辛的血汗换来了幸福的欢乐；但小人则想不劳而获。因此，对于这类小人败类，难以理喻之时，就必须动用武力来惩罚，以便保卫那得来不易的欢乐。孔子透过卦象，深刻理解了卦辞的精神实质，“利建侯行师”，建藩御侮，动用暴力，正是为了保卫欢乐。而所谓“和豫”，是人心和悦，共鸣互应的欢乐，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与民同乐”，而不是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独乐”。《孟子·梁惠王（下）》有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齐宣王）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类，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田猎于此……（百姓）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所谓“和豫”，必须是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欢乐，是万民“皆欣欣然有喜色”的与民同乐，有了这样的“和豫”，即使作为帝王统治者，也可心安理得地尽情痛饮欢乐的美酒。因为一旦有谁侵犯了这样的幸福生活，人民自会如雷奋起，迎头痛击，以实际行动来保卫“和豫”的理想国。由此可见，“和豫”与“备豫”关系极为密切。至于“逸豫”，则是不顾人民死活的纵乐，其所谓“乐”，是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独乐”，百姓无不痛心疾首而诅咒之，甚至说是“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甘愿与“独乐”的统治者同归于尽（见《尚书·汤誓》）。如殷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

■纣王沉湎酒色



野兽蜚（飞）鸟置其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见《史记·殷本纪》）如此骄奢淫乐，不知夺去了多少百姓的生命财产!百姓之痛，独夫民贼则视为乐，如此放纵，怎不灭亡？此之谓“逸乐”。沉溺于“逸乐”之中，必然丧失其所谓“乐”，而带来无限的悲痛。君子观《豫》，自当明辨“备豫”、“和豫”和“逸豫”的区别与联系，并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态度与行动。下面分析爻位爻象和爻辞。

初六，鸣豫，凶。

爻辞是说，初六，自鸣得意，乐极生悲，有凶险。初六处下坤之初，阴居阳位，不仅处位最下，而且不中不正；但上与九四强大卦主阴阳呼应，九四位处上震，震有善鸣之象，为之强援，初六有恃无恐，不顾处欢乐之初，能力低下，而急于超越二、三两爻之位，升到上卦与四倡鸣，因此有“鸣豫”之象。“鸣豫”云者，象征小人在下，得到扳援；急于用事，狂欢极乐，所以有凶象。《豫》初六的“鸣豫”，是从前卦《谦》上六的“鸣谦”转化而来。但同样的“鸣”，一凶一吉，相互反对，为什么？这就因为时位爻象不同的缘故。《谦》上六所鸣为谦道，所以虽履“无位”，但以谦卑自处，因而得人心而致“利”；《豫》初六则虽处欢乐之世，但不明白欢乐中蕴含着苦痛与悲愁，更不知欢豫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借人之势，暂时而乐，不知顾惜，反而妄自张狂，得意忘形，到处吹嘘。而一旦外援撤去，则迅速跌入无边的痛苦深渊。其所谓“凶”，主要不在于外部环境，而是内在的本质。所以《象传》说是“初六鸣豫，志穷凶也。”王弼注曰：“处豫之初，而特得志于上，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只要读史书中的《佞幸列传》之类，自能明白。如汉武帝的佞臣韩王孙嫣，以身媚上，他外出时“从数十百骑”，其车马扈从之盛，连江都王见了，还以为是皇帝出巡！依仗人主之势而纵其逸乐，但最后得罪皇太后，皇帝不能救，“赐嫣死”（见《史记》）。自鸣得意，最后死于非命，其“凶”可知。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不终日，形容知幾见微之速。爻辞是说，六二，耿介之性如磐石，迅速觉悟到欢乐必须合乎中庸的原则，坚持贞正品格，一切吉祥如意。六二处下坤之中，又阴居阴位得正、居位中正，非常完美；又全卦其余诸阴，爻位不是不中，就是不正，均沉溺于欢乐之中而不自知。两相比较，六二之“贞吉”，事出自然。按爻象所示，六二、六三与九四互卦为“艮”，艮为止，有石象，以石之静止喻其坚定；而若变二为阳，与三、四互卦为离（☲），离为日，故又有“不终日”之象，以变动喻其思虑机敏。故《宋书·谢灵运传》有“时来之机，悟先于介石”之语。众阴沉溺欢乐之中，唯独六二坚守中正之道，静如山，坚如石，思虑明审，透澈而坚定，不俟终日而悟事理之机微，所以能迅速跳出逸乐的苦海。由此可见，六二所坚持的中正之“豫”，是“和豫”，是精神上的长期欢乐，而不是

感官肉体的一时纵乐。西人也有近似的通感之论："圣人生活中需要的快乐不是在享受放荡生活之中，不在肉体的满足之中……这类快乐只能窒息幸福……什么能使圣人动心呢？这只能是那种必定有善存在的快乐，以及不是来自冲动和因为占有某种东西得到的快乐。所有善之物会直接展现给圣人，圣人展现给自己：他的快乐，他的满意，他信守中道，不逾矩。"（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章》）所谓"善的快乐"，即孟子的"与民同乐"，基本上是一种受理性制约的灵魂欢乐，符合中正或中庸的原则，所以能坚如磐石，永恒持久。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盱（xū），睢盱，向秀解释为"小人喜悦佞媚之貌"（《周易集解》称引）。爻辞是说，六三，向在上者（按指九四）飞媚眼以寻求欢乐，必有后悔；如果迟不悔悟，又必将悔上加悔。六三处下坤之上，正当上下卦之际变化多端的艰难之位，阴处阳位，阴柔失正又不中正，急于向上媚悦九四卦主以寻求非分的逸乐，心术不正，非出至诚，所以会致悔咎。但六三质柔位刚，又有悔悟之象，所以爻辞戒其幡然悔悟，愈快愈好，如果犹豫迟疑，可能又会有悔之迟矣的新悔产生。爻辞虽短，"悔"字两见，可见作者虽然认为六三基本是凶爻，但如能勇于悔过，自新有望，则又有逢凶化吉的可能。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由之而获豫。朋，朋友，象征地指卦中五阴。盍，通"合"。簪（zān），古人用以束发的头饰。爻辞是说，九四，众阴因紧跟他而获得欢乐，大有收获；这时必须坚信不疑，像约束头发一样地把众多朋友紧密团结在一起。九四是全卦唯一的阳爻，是成卦之主，为上下众阴围绕的中心，有"大有得"之象。又一阳以贯众阴，所以有以簪贯发之象。又九四处上震之始，已从下卦升到上卦，所处正是"多惧"的大臣之位，因阳处阴位，德刚正而质柔顺，态度谦逊而有犹豫之象。但九四作为卦主，阴爻众星捧月，大家的欢乐由卦主而来，事体重大，所以作者戒之以"勿疑"，如清末马其昶《重订费氏学》所指出："一阳，化则无阳；九四疑位，曰'勿疑'，惧其以失位为疑而化也。"所谓"勿疑"，实际是劝九四直道而行，鼓勇而进，精诚团结，以争取民众的幸福欢乐。

六五，贞疾，恒不死。

爻辞是说，坚持正道，就能常保健康而避免死亡。九四为大臣之位，六五则处全卦的君位，但阴处阳位，质柔而位刚，是阴柔之君，所以虽能谦恭待下，阴阳呼应，以致欢乐；但六五位不正，又与六三、九四互卦为坎，坎有心病之象，而下面又乘凌颇为刚强的九四之臣，故有强臣逼柔君之象，现象并非正常，所以爻辞称"疾"。不过六五终因处于中位，坚持正道，所以能预防疾病，常保

健康。从医学角度看，治病以预防为主，人们能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缺陷，加强锻炼，持正驱邪，自然无病而健康不死。爻辞“恒不死”，貌似消极，却含有预防疾病（包括生理与心理，个人与社会）的积极因素。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昏暗愚昧。渝，改变。爻辞是说，上六，昏冥愚昧地纵乐业已成为事实，如果及时悔悟，迅速改正，则仍可消灾弭祸。上六处《豫》卦的终极，与六三无应而下比九四以求欢乐，阴柔居豫卦之极而有“冥豫成”之象，所以尽欢极乐，毫无节制，造成严重后果。但上六爻位，又阴柔得正，加以上六变阳，则化为晋卦（䷢），晋出地上，有不终冥之象。爻象所示，如能及时改正，则仍然可以挽救，悔过就善，则如禅家所说，可以“立地成佛”，所以爻辞称“有渝无咎”，寄托了作者的诚恳告诫与热切希望。

总之，《豫》卦所述，虽为豫乐之世，但综观全卦六爻之象，九四一阳为主而施乐，其余众阴共趋而附之：其中除六二因居位“中正”而获吉外；其余四爻，初以“鸣豫”致凶，三以“盱豫”而悔，五以贞正防疾，仅得“不死”，六则因居穷终而有“冥豫”之象，均非吉兆。可见卦旨所示，主要是乐不忘忧的精神，后来孟子发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见《孟子·告子下》，对传统思想影响很大。甚至在西方也有共鸣。如乔叟在《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中说：“黑夜过完了显露出晨曦，愁苦的尽头方有欢乐”，“人们要得快乐，往往必须先经受种种折磨……我们目睹着这创痛现已痊愈，此时的甜蜜更觉甜蜜，因为在先已尝过了苦味。他俩由悲苦的幽谷流入了幸福的江河……”知道安乐来之于忧患，自然会兢兢业业地珍惜“和豫”之乐而与民众共享，这样欢乐才能持久。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对于《豫》卦精神的完美发挥，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精神典范。

随

卦第十七



相随而从止于善

《随》卦第十七，在《豫》卦之后。《序卦传》说：“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也就是说，要获得幸福欢乐的生活，必须“与民同乐”，才能持久和发展；而“与民同乐”，作者认为就是君子行道而众人随之以动，就是俗话所说的“皆大欢喜”，所以《豫》卦后面紧接着就是《随》卦。随，《说文》说是“从也”，有“随从”之义；又随从而与人同乐，有和谐的意思，所以又可以引申为“随和”，佛教徒则引申为“随喜”。在现代社会中，受西方文明思潮的冲击，人们喜欢提倡人的主体意识。的确，一个人如果缺乏主体意识，整天唯唯诺诺，如鲁迅先生所说，自甘做奴才的奴才，怎么会有独立思考呢？而缺乏独立思考，整天人云亦云，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创造性。缺乏创造意识，世界就不会发展，文明也很难进步。因此，现在有的人，一听到“随”、“随从”、“随和”之类的词汇，就感到讨厌。其实，他们对“随”的理解并不全面，现在舞台与银幕上充斥着清宫戏，主人一呼，不管青红皂白，奴才一迭连声地“嗻”，特别是那些因生理残疾而引起心理变态的太监，哆声哆气地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更是令人作呕。人们所批判的该是这类奴性的盲从，而不是《随》卦之“随”。人是社会的人，人不仅有个性，而且有其共性和社会性。如果人人只想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却想不到“随人”或“被人所随”，那么怎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呢？人人自以为是，不要说社会，就是一个家庭也难以维持。譬如家里只有一架电视机，年轻人想看足球赛，老年人想听古装戏，而中年人则爱看伦理剧，如果三方各不相让，只好谁都不看。反之，如果好好商量，相互尊重体谅，则不难解决。因此，“随”作为一种特定事物和现象，它不仅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就是宇宙自然也有“随”这一运动法则的存在。如在太阳系中，行星围绕

太阳旋转，月亮围绕地球旋转，这也是符合“随人（物）”或“被随”的和谐原则的。假如太阳与诸行星之间互不相随，各行其道，那整个太阳系将不复存在；而地球一旦拒绝太阳的吸引，则将失去动力和光明，人类也将永远堕入茫茫无际的黑暗深渊。因此，作为人，既要提倡有棱角有个性；同时也要趋随和求向心，不管“随己”或“随人”，都要与社会和谐。“随和”不是盲从，而是在服从自然和谐的大原则下自愿在人类大家庭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随”的德性，不应该否定个人的创造力，而是将他投入整个时代的熔炉之中。读完《随》卦之后，自会明白这个道理。

《随》卦的卦形是䷐，下震（☳）上兑（☱），象征随从或随和。从卦象看，下震为雷，上兑为泽，如程颐所说：“雷震于泽中，泽随震而动，为随之象。”也就是说，“随”是一种自然（包括社会）现象，生命活跃于其中。惊蛰雷鸣而万物苏醒，所以古人认为，雷是生命活动的中心震源；而大泽皆水，人类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在任何时刻都离不开水。天文学家判断其他星球是否有生命存在，就首先探测是否有空气和水的存在迹象。人绝食若干天尚可坚持；但若滴水不进，则会因为生理脱水而很快丧失生命。由此可见，雷和水对生命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随》卦取“泽中有雷”（《象传》）之象，正是古人对于世界生命活力的一种认识。雷鸣而风雨疾作，大泽波翻浪涌，水中生物随之浮沉，欣然而动。这是一种宇宙的自然法则，谁也不能违背。所以《象传》发挥卦象的象外之旨，说是观《随》卦而“君子以向晦入宴息”。陈梦雷解释说：“雷二月出地，八月入地，泽亦地也。又兑正秋，八月正兑之时。震下兑上，有雷入地中之象。君子取之，及向昏晦，则居内休息。造化有昼有夜，人生有作有息，人心有感有寂，有动有静，此造化之自然，亦人事之自然也。”其所发挥，言简意赅。就是说，人们体会到“随”的规律，就应该按时作息，随时而动。

■壤父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

沈德潜《古诗源》开篇就是古逸诗《击壤歌》，传说远古帝尧之世，天下太平无事，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人类必须随着自然和社会规律进行活动才能有所作为，君子应当自强不息。但君子也是人，怎能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坚持工作学习呢？晚上的休息，正是为了白昼的活动，科学地说，休息是活动的延续。不懂得休息，身体一垮，还有什么学业事业可言呢？从《随》卦"泽中有雷"之象，人们领悟到必须把握时机与位势，随自然和社会规律而动，无论是英雄豪杰或帝王将相，如果逆时代潮流而动，必然被历史的车轮碾成齑粉。而从卦德分析，下卦震性为动，上卦兑性为悦，内动而外悦，象征人们内心喜悦，自愿随从而统一行动。所以《彖传》说是"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悦）"。《随》卦的下震上兑（䷐），与《蛊》卦的下巽上艮（䷑），各爻阴阳均反，互成综卦。按《易》例，八卦中阴阳爻以少者为主，所以《蛊》卦的上卦为阳卦，下巽为阴卦，《彖传》说是"蛊，刚上而柔下"。而《随》卦则反艮为兑而居上，兑是阴卦；反巽为震而居下，震是阳卦，阳卦由上而来居于阴卦之下，所以说是"刚来而柔下"。"而"训"于"。又在八卦中，震可象征长男，兑可象征少女。古代男尊女卑，长男动于内而少女悦以随。如孔颖达《周易正义》说："震动而兑悦，既能下人，动则喜悦，所以物皆随从也。"按《易》例阳刚为贵，高贵者如能折节下人，与卑贱者打成一片，则在下之人铭感肺腑，视为"平等"，自愿相随，统一行动，使精神力量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了改造世界的进程。因而《彖传》赞叹道："随之义大矣哉！"要改造世界，人们就必须精诚团结，思想一致，行动统一，自觉相随，没有精神上的"甘愿相随"，就不可能有自觉的行动。

卦辞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卦辞是说，《随》卦象征随从或随和，其德性为元始、亨通、有利、贞正，必然没有灾祸。按《乾》卦等也有"元亨利贞"四德，但《乾》卦辞不言无咎，因为乾为天，涵盖万物，无往不利，所以不必再言吉凶悔咎。而《随》卦则有其特定环境和条件，因喜悦而随人以动，容易走火入魔，媚人或被迷，因此必须坚持贞正之道，方能"无咎"。占卜得随卦，并非尽皆吉兆，而要根据具体条件来分析。如春秋时期，鲁国的穆姜（鲁成公之母）因与叔孙侨如私通，欲废成公，斥逐执政季孟，事败，软禁在东宫。她于是求神问卜，看何时可脱囚而出。曾占筮得《随》卦。据《左传》襄公九年载：

> 史曰："《随》，其出也，君必速出。"
>
> 姜曰："亡（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按：元者善之始）；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悉，能无咎乎？必死于

此，弗得出矣！”

史官拘泥于《随》卦四德无咎之辞，作出“君必速出”的吉兆解释，虽符合一般通例，却不准确；而穆姜虽是妇人，却有自知之明，她是根据“《易》无达占”之理，按照《随》卦的特殊条件限制来解释卦辞，从自己不具备“无咎”的前提条件而悟到了“凶险”，得出“必死于此”的判断。事实证明，穆姜很快就“薨于东宫”。她虽占得《随》卦之“无咎”，但因行为不合“贞正”之道，以“恶”而随，害人误己，怎得无咎？于此可见“贞正”之道，对于《随》义的重要性。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孔颖达《正义》曰：“谓执掌之职，人心执掌与官同称，故人心所主谓之官。”黄寿祺、张善文据此引申指“思想观念”（见《周易译注》）。渝，变也。爻辞是说，初九，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思想观念，坚持贞正之道，必致吉祥。这样一旦出门交往，必然有所成功。从爻位看，初九处下震之初，上与九四无应，居下无人随我，说明处于“随”的初始阶段，在事物全貌尚未完全清晰以前，不能有所偏系，固执于一，而应多加观察体验，可随则随，因事物具体时位而改变思想观念，才能跟得上急遽变动的形势。又初九阳处阳位得正，阳刚象征变动，有执正以随之象，所以说是贞吉。而执正以随，思想观念指导了行动，因而一出门交往办事，就能有所成功。爻辞“官有渝”一句很重要。人们的行为行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善于变化以“随”。社会要进步就要改革，而改革首先就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清代全盛的乾嘉时期，阮元任江西巡抚，曾制造“红船”，各地多有仿造。据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一载，红船“快如奔马”。一次，阮元遣家丁回仪征老家，“恰值风水顺利，朝发南昌，暮抵瓜州”。阮元因此写了一副对联悬挂船中：“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得意非凡。其实阮元所制红船，还是木结构的，依靠自然的风力水速为动力，一旦逆水行舟，则只能依靠人力来作动力，怎能快如奔马呢？从能源观念看，“红船”虽快，但并没有脱离古代农业社会依靠老天自然恩赐的旧观念。而在同一时期的西方，由于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旧有的能源观念，欧美已开始制造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小火轮之类，符合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需要。不久，西方即以其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从中国红船与西方轮船的比较中，也可看出改变思想观念的重要性，更不要说直接的社会改革了。但是思想观念的改变，必须服从“贞正”的原则，而非胡乱于“随”。如果不根据具体情况，胡乱“随”人，盲从行事，则可能误入歧途。因此爻辞的“贞吉”云云，又明显有要求慎始而交、守正以随的意思。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爻辞是说，六二心系初九，犹如随从小子，因而失去了丈夫的欢心。按爻

象，初阳在下而近于“小子”，九五在上居君位而为“丈夫”。又六二互六三、九四为艮卦，艮为止，有不善行动变化而就近取应之象。六二阴处下震中位，既中且正，又上与九五阴阳相应，照常例该是吉爻。但因《随》卦特殊环境所限，六二阴柔软弱，难以独立支撑局面，一定要随从阳刚，而六二又被六三阴爻所阻，远离九五之阳，因而上应不专，而就近下系初九。所谓“随”，一般指人随我，而“系”，指我随人。随我，主动权在己不在人；随人，则主动权在人不在己。而初九尚未成年，还不成熟，一般不应为人所随的对象，但六二偏偏系于“小子”，正是盲目以随不以贞正之象，所以会失去九五这阳刚丈夫的欢心。盲目而随，因“小”失“大”，生活中这种经验教训还少吗？爻辞中“失丈夫”之“失”，包含了作者的深深慨叹与惋惜，所以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说是“戒人从正当专一”。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爻辞是说，倾心相随在上的丈夫，因而失去小子，随从求人而有所得，利于坚守正道以防凶险。从爻位爻象看，六三处下卦之终，阴处阳位失正，又与上六无应，该是有艰难及凶险之象。六三与六二同有所系，随人而动，但情况不同。六二下随初爻为盲动。六三上随九四，阴阳以交，有求而得，有向上舍下之志。舍上随下与向上舍下相反，所以六二有失而六三有得，吉凶自然不同。但六三随上求人，如不以正道得之，则近于媚上求宠，所以又戒之“利居贞”，就是说，向上以随方向并不错，但须“居贞”则利。言外之旨，如不“居贞”而坚守正义，则凶象在其中矣。于此可见《易卦》辩证思想，经常考虑到问题的正、反二面，只是遣词用字简练含蓄，读者当深思而得之。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爻辞是说，九四，被人追随而有所收获，坚持贞正之道以防凶险，只要对于正道怀诚信之心又光明磊落，哪会有什么祸患呢？从爻位爻象看，九四居上卦之初，紧邻九五之君，处于大臣之位，虽其位失正，但以阳刚之体而履阴柔之位，有刚而能柔、谦以应下之象。所以一旦为六三所随，必然有所收获。但《易》卦重在变化。九四若变为阴，则上兑变成坎，坎有险象。所以卦辞言“有获”而戒以“贞凶”。意谓不以正道得之则所获皆凶。又九四为大臣而逼近君主，被下所随而有所获，众望所归，易于引起九五之君的猜忌。但爻辞不言其凶，而要求九四心怀诚信，正大光明，则何咎之有？这是一种主动发扬贞正德性，以求消灾弭祸、化凶为吉的积极精神。

九五，孚于嘉，吉。

爻辞是说，内怀诚信以相应，终于达到至善，吉祥。九五处全卦的君位，

阳爻阳位而中正，时位十分完美，是《随》卦之主，其余各爻纷纷相随。但九五之位，主要应在六二。六二阴爻阴位而处下卦之中，所以九五与六二上下阴阳中正互应。而九五、九四二阳爻，处六三、上六两阴爻之中，约之而成坎卦，阴虚于外，阳实于中，象征内怀诚信而达于至善，所以说“孚于嘉”。至诚至善而相应，天下翕然而从，君取信于万民，万民拥护有道明君，也就是封建时代农民所盼望的好皇帝，上下沟通，相互信任，在古代这就是开明盛世，当然国家巩固、社会安定、大吉大利了。所以《彖传》说是“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只有九五卦主才能当之。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爻辞是说，上六，强行拘禁，用绳索捆牢，迫之随从。于是君王在西山举行了兴师讨逆的祭典。上六处《随》卦终极，“随”道已穷，又阴柔软弱，上下无应，处在“随”道转变的矛盾焦点上。在生活中，“随”与“逆”相对而成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上六位高而难以随人，又阴柔而人不肯随，互不相随，则矛盾向逆反方向转化。人心逆反，大者为叛。既有叛变，故必须兴师以讨逆，拘系以维，所以上六被九五之君强行维系以随。在“随”道之中，动用武力以使人随从，正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穷极生变之时。如能持正讨逆，行以至善，则仍可致吉兆；若以邪暴相强，则被迫相随者内心不服，顷刻星散，众叛亲离，其凶可知。如商周之战，殷纣王无道，强迫奴隶随之作战，“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周本纪》）。最后殷纣王自焚鹿台，国家灭亡。邪暴相加，强人以随，结果如此，可为世鉴！

■纣师倒戈



总之，“随”或“随从”、“随和”，是生活中一种普遍现象。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孔子是古代圣贤，尚且择善而从，何况众庶乎？“随”道主义，既可以是人随我，也可以是我随人；既可以是下随上，也可以是上从下；既可以是物随人，也可以是人随物。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临事择善而随。如程颐所说：“凡人君之从善，臣下之奉命，学者之徙义，临事而从长，皆随也。”（《周易程氏传》）在生活中，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甚至是集体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就有“我随人”或“人随我”的矛盾存在。这里不仅要有人的主体意识，而且要善于发挥《随》的卦义，择善而从，止于至善，则无随而不利；若是谄媚事上，邪恶相随，则无论是人随我或我随人，都是朋党比奸，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大大的不利。这就是从“随”转化为“逆”，由吉趋凶之兆。所以黄寿祺、张善文说：“（各爻）不同的处‘随’情状……皆不离‘正’字……不论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上随下、下随上，己随人、人随己，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朝作晚息、遇事随时，均当不违正道，诚心从善。”（《周易译注》）

蛊

卦第十八



匡救父弊治蛊乱

《蛊》卦第十八，跟在《随》卦之后。《序卦传》说：“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蛊（gǔ），按照《说文》，原是“腹中虫”，也就是人体中的寄生虫。又《周易集解》引伏曼容曰：“蛊，惑乱也。万事从惑起，故以蛊为事也。……时既渐浇，物情惑乱，故事业因之而起。”从文字上看，“蛊”字从虫从皿，皿者置食物之具，虫在皿中出现，则是食物日久腐败而生蛆之象。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平公因淫于诸同姓之女而致疾，请秦国医和（当时名医）治疗，医和诊断一语中的，说的是“近女室，疾如蛊”，“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当时晋国的执政大夫是赵孟，他问医和：“何谓蛊？”医和回答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杜预注：谷久积则变为飞虫，名曰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医和通过治病，就“蛊”的意思发挥了一通，并批评了晋国的惑乱之行。赵孟因他说真话，“厚其礼而归之”。所以蛊的本义是惑乱坏烂。但古人常一词多用，如“乱”可反训为治乱，“乱臣”并非叛乱之人，而是指治乱救衰之臣。同一道理，“蛊”为惑乱，又可解为“治蛊”，也就是拯弊救乱的意思。《蛊》卦爻辞中之所谓“蛊”，就兼有蛊与治蛊二义，读者当自明辨。从卦序看，人生在世，相喜相随，太平日久，过中失正，沉溺于玩乐之际，而不知惑乱已萌生其中。不过在世道蛊乱的多事之秋，也正是君子治蛊救乱的大有可为之时，所以《序卦传》发挥说：“蛊者，事也。”古人治蛊之事，不仅事关个人，而且可以事关国家与社会。“蛊”之一字是否正确理解与处理，关系重大。如《左传》僖公十五年的秦晋之战，晋惠公背信弃义，“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于是秦穆公意欲伐晋，令巫卜名徒父的人筮占之，“其卦遇

《蛊》（䷑）”，巫卜据卦象断为“大吉”之兆，他解释说：“《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杜预注云：“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巽为风，秦象；艮为山，晋象。”晋山的果实为秦风扫落，其木材为人所伐取，正是秦胜晋败之象。后来秦晋大战，晋惠公果然被秦军所俘。按，当时晋国自献公、惠公当政后而失德，全国陷于蛊乱之中，秦与之战，则为治蛊之义举，是成功的例子，秦因治蛊而日渐强大，为秦穆公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创造了条件。同样，后来晋惠公的二哥即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由秦穆公保护回国，是为晋文公，他对晋国的蛊乱，拯弊救衰，治蛊成功，晋国终成霸主之业。这是正面之例。不过如果观念错误，以正为蛊，则所谓“治蛊”，将把国家与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如汉武帝的晚年，年老多病，本是自然现象。但他却疑心病很重，以为这是人们为了抢班夺权，兴蛊道而诅咒人主的结果。“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于是他在暴怒之时，专断治理“蛊道”，甚至听信谗言连自己的太子刘据，也因怀疑而诛杀。在表面上，这是宠臣江充在捣鬼；实际上，江充为非作歹，其幕后的主使者是皇帝本人。所以江充敢到太子和皇后宫中去“掘蛊”：“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征和二年）甚至是逮捕人犯，“烧铁钳灼”，严刑逼供，致太子兵败自杀。这一切，如果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一时刀兵横行，百姓纷扰，“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汉书》卷六十六《公孙贺传》）。事后证明，“巫蛊事多不信”（《汉书·武五子传》）。但以正为蛊而加以残灭，国家元气大伤。于此可见，有蛊必治，但对“蛊”必须有正确的判断与认识。“治蛊”之事，不仅关涉个人，而且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能不慎乎？有鉴于此，读读



■秦穆公像

《周易》的《蛊》卦，很有益处。

《蛊》卦的卦形是䷑，下巽（☴）上艮（☶）。从卦象看，艮为山而巽为风，象征拯弊救乱。《象传》说："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风吹遇到山的阻挡，回环激荡，山上之物纷披散乱，树木果实纷纷被风扫落，树木有被风所摧折甚至连根拔起者，这正是有事之兆，象征君子振兴道德，改造风俗以拯弊救乱。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必云山下有风者，风能遥（摇）动，散布润泽。今山下有风，取君子能以恩泽下振于民，育养以德。"而从卦德分析，上艮象征刚止，下巽象征柔顺。《彖传》说是"刚上而柔下，巽止而蛊。"上艮为阳卦，苟且以止，阳刚之气往上升；下巽为阴卦，卑巽柔弱以随人，阴气重浊而下降。这样一来，阴阳背道而驰，互不相交，是为蛊乱。蛊乱之世，多事之秋，正君子治蛊的有为之时。因此，《蛊》卦象征拯弊治乱。

卦辞曰："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按：中国古代记时数有所谓天干和地支。"甲"为天干（按：其序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首，是一切事物的时与数的开端。先甲三日为辛，"辛"与"新"同音，义取更新，意谓"前事已坏，取先甲三日之辛以更新之"；后甲三日为丁，"丁"与"叮"同音，义取叮咛，意谓"后事方新，取后甲三日之丁以丁宁之，不使至于速坏"（陈梦雷《周易浅述》）。卦辞是说，《蛊》卦象征拯弊治蛊，亨通而止于至善，利于涉越大河之险；治蛊之时，应深入思考事物矛盾转化及其成败的机缘，事先思虑"先甲三日"之事，并慎重考虑"后甲三日"的后果。按照卦辞大意，以为治蛊之道，有取于更新丁宁，慎重对待之旨。清治腐败而更新，必然遭受顽固保守势力的联合压制，此事风险虽大，但不如此则将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因而以"利涉大川"为喻，认为通过治蛊就可达"元亨"的至善境界。

下面谈爻辞爻象。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干，匡正。考，古人一般用以称亡父，有时也指在世之父。但黄寿祺等引《广韵》训"考"为"成"，犹言"成就"；"有子考"，就是"有子成就先业"，于义也通。爻辞是说，初六，蛊乱初萌，由儿辈来匡正父辈之乱，不会有灾祸，开始虽冒风险，但最后必获吉祥。因为蛊乱之事，积弊日久而致，所以爻辞用子承父蛊而匡正之为喻。初六处下巽之初，上与六四无应，所以治蛊有"厉"，必遭凶险。试问，拯弊治乱的革新，怎能不遭受顽固力量的抵抗？但初六因在蛊道之初，阴处阳位，质柔位刚，有志拯弊更新，而行动并不急躁冒进，所以匡救之事还比较容易。犹如人之中毒未深，一开始就发现并加治疗，虽有凶险，而终必恢复健康。以史事为喻，如晋献公蛊乱之政，由儿子晋文公来加以匡救，爻辞所谓："干父之蛊，有子考。"但为了治蛊，晋文公在开始阶段也吃尽

苦头，差点被父亲派来的刺客所杀，亡命他乡，颠沛流离十九年，但最后还是回国治蛊，匡正父弊，晋国以兴，晋文公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名垂青史。这不是“厉终吉”又是什么？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爻辞是说，九二，匡正母辈之乱，不可过分坚贞以行。《易经》通例，一般提倡贞正；为什么《蛊》之九二强调“不可贞”呢？这就要看治蛊的具体对象了。九二位处下巽中位，阳处阴位，以刚承柔而行事，又上与六五阴阳相应，有子匡母乱而行中道之象。世上蛊乱之事，种类繁多，对象不同，时机有异，则应采取不同的“治”法。《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论，而“齐家”之事，一般由母亲主持。在以血缘宗族为其统治基础的先秦时代，如果家乱于内，则国乱于外。所以“干母之蛊”，同样事关重大。但母亲作为女性，其性格与心理不同于男性，一旦迷乱，则疑虑重重，固执难改。一旦强行以贞正治母蛊，常会激起逆反心理与抵触情绪，则难以达到拯弊治乱的目的。“不可贞”云云，正是针对具体对象，采用因势利导，治蛊的决心不变，但方式方法则以巽顺易入为主，以便减少治蛊的阻力。“不可贞”不是说治蛊拯弊不必坚持正道，而是根据具体对象，注重方式方法，是从效果着眼的灵活反应，本质与初六之“干父之蛊”并无不同。

■韩愈像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爻辞是说，九三，匡救父辈的弊乱，小有悔恨，但不会产生大的灾害。九三位居下巽之终，处于由内卦向外卦发展的“多难”地位，也是蛊道矛盾上升激化的阶段；又因其爻刚而失中，与上九无应，所以“干父之蛊”，会遭到一定的困难。不过九三阳爻阳位得正，以正祛邪，虽是小有悔失，但终无大咎。以君臣论九三，也是如此。如唐代韩愈，二贬广东。第一次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他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关中旱饥，百姓饿死，上书《论天旱人饥状》，以图匡正救乱，但被权幸进谗而贬为阳山令。第二次是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在刑部侍郎任上，因宪宗佞佛，举国若狂，上《论佛骨表》，差点脑袋搬家，幸亏宰相裴度等

相救，幸免一死，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并被催逼立刻离京上道。他到蓝关之时，侄孙韩湘（即后来传说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赶到相随，韩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两次远贬岭外广东，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广东尚未很好开发，瘴疠重生，中原士人不服水土，视为九死一生之地。二贬广东是急于治蛊拯弊的后果，即爻辞的"小有悔"。但经过时间的考验，韩愈的观点得到历史的承认，他个人也不久即调回京师任职，此即爻辞的"无大咎"。总之，要想"除弊政"，就不怕"有悔"。一个改革者，如果患得患失，虽然对于个人来说，避免了一时的"悔失"；但对国家与民族来说，却可能因此而劫难降临，推向深渊，这一咎害和损失更大。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宽裕，虞翻引申为"不能争"之义（见《周易集解》引）。爻辞是说，六四，宽容地对待父辈的惑乱，长此以往，必生憾惜。六四犹如辅君重臣。其位居上艮之初，阴处阴位，虽然得正，但下与初六无应，又在大力治蛊之时，过分柔弱，迁就拖延，不以治乱为急，缺乏疾恶如仇的精神，日积月累，积弊愈深，所以会有憾恨，事出自然。孔子从另一角度启发我们："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周易集解》称引）正与子裕父蛊相反。谁是谁非，一目了然。要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就要敢"争"，子之"争"，则把父辈蛊乱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父辈不会蒙受"陷于不义"的历史耻辱。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爻辞是说，六五，匡救父辈弊乱，备受赞誉。六五是治蛊的卦主，虽然阴居阳位而失正，但柔而得中，又下与九二阴阳相应，有因阳刚之臣全力拥护支持而致誉之象。如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失德蛊乱，被国人所流放。他的儿子周宣王即位，虽然本人并非刚强之君，但用仲山甫等名臣，以阳刚之臣的大力支持作后盾，治父之蛊，伐猃狁，征荆蛮，周朝号称"中兴"，饮誉青史。所以《象传》说是"干父之蛊，承以德也"，这是以发挥美德来继承先人事业。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爻辞是说，上九，不作王侯之事，志尚高洁。上九处全卦之终，蛊道已极，治蛊之事，已在六五之时完成。上九处于无位无事之地，所以高尚其志，不事王侯，以免节外生枝，重陷迷乱。《后汉书·逸民传序》称引《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加以发挥："尧则称天，不屈颍阳之高（按：指巢、由之辈）；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按：指伯夷，叔齐）；自兹以降，风流弥繁……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

垢俗以动其概，或玩物以激其清……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作者范晔发挥《易》卦之义，很有启发。《蛊》卦上九的爻辞很含蓄，实际指出，蛊道已穷，矛盾即将转化，人主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富贵。治蛊之臣，不愿同流合污，就必须功成身退，与世无争，这样才不会触动人主之忌而招杀身灭门之灾。如春秋时越国的范蠡，一旦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以后，遁归江湖，“不事王侯”，经商致富，另辟洞天，其志高洁，万世共誉。而文种则因恋栈而被勾践杀害。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上九志尚之“高”，确有难言之隐，实在是出于不得已！这是上古士人深致慨叹的一种处世哲学。

《蛊》卦六爻之辞，除上九因蛊道已穷，不提治蛊之事外，余五爻均有“干”蛊之举。其中六五为治蛊之主，以柔居尊，有贤臣孝子之助，故获“用誉”之义；其下四爻，九二因治蛊的对象不同，采取灵活反映，故称“干母之蛊”；余爻均有“干父之蛊”一句。这反映了古代宗法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事实。子承父绪，父养疾于前，至于子辈之时而蛊疾大作，不治蛊行吗？但儒家一贯有“父没……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的言论，并以为这就是“孝”。以孝持家治国，是儒家的伦理纲领之一。而《蛊》卦则不同，作者认为“干父之蛊”——即匡正父辈的弊乱是对先人事业的最好的继承和发扬。这也就是《象传》所说的“意承考也”的意思。匡救父蛊，从行事看，似乎有违父道；但从意愿与本质言，则“干父之蛊”是真正地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不如此，则社会不发展，民族不进步。如前所述，春秋时晋文公之治蛊，表面有违父亲献公，但晋献公一心图霸，因其蛊乱而一事无成；其长子申生因为不愿“干父之蛊”，而死于愚孝，无益于事；其三儿惠公不能“干父之蛊”，同样兵败被俘，狼狈之极；只有到了二儿晋文公时，在诸多贤臣的协助下，勇于“干父之蛊”，终于实现了晋国的千秋霸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这才是真正的“承考”壮举。现在的人们，如果只是一味地讲“百年老店”、“祖传秘方”，不因形势迅速变化而勇于“干父之蛊”，那么如果不是变成晋惠公，就是太子申生，根本缺乏晋文公的雄心壮志，中华民族还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吗？宋理宗之时，针对国家的衰乱之弊，杨泰之入对曰：“法天行健，奋发英断……以救蛊弊，以新治功。本朝德泽，迩来斫丧无余，民无恒心，何以为国？”（《宋史》卷四三四《杨泰之传》）但是宋理宗不敢采取果断措施以“救蛊弊”，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一味残延苟喘，因而延祸子孙，后来虽然出了文天祥、李庭芝等民族英雄，但是朝廷社稷已病入膏肓，宋朝还有救吗？这反面的教训很深刻。宋哲宗时，宰相苏辙曾上疏说：“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民不堪命，几几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



■慈禧太后像

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见《续资治通鉴》卷八三）“干父之蛊”，功彪史册。但是，后来的明清之世，动辄以“祖宗之制”训斥臣下，不取“干父之蛊”，慈禧太后当政，更不敢“干母之蛊”，导致中国积贫积弱，深受列强凌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父母作之于前是始作俑者，但子辈不能救之于后，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吗？读《蛊》卦当深味其旨。

临

卦第十九



古代的领导艺术

《临》卦第十九，在《蛊》卦之后。《序卦传》说：“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意思是说，经过治蛊有为的多事之秋，人类事业因此而获得较大发展，因此《临》卦紧跟在《蛊》卦之后；“临”是“大”的意思。其实，“临者大也”只是引申义。宋项安世《周易玩辞》说：“临不训大。临者以上临下，以大临小。凡称临者，皆大者之事也，故以‘大’释之。”临，繁体作“臨”，《说文》曰：“监也，从卧品声。”《国语·晋语五》有“临长晋国者”之语，注谓“临，监也”，义同《说文》。由“监临”之义引申出“君临”、“高临”、“临视”、“临履”诸义。《临》卦之“临”，即取居高临下，以大临小的监临、临履之义。监临以视，临履而行，正是古代统治者必须重视和运用的一种领导艺术。《尚书·大禹漠》记载皋陶的话：“帝德罔衍（没有过失），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临下”之术，大有讲究。相传尧舜时“临下以简”，基本上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所以政清人和，国泰民安，社会发展，事业以大。当时“鸿（洪）水滔天……下民其忧”，舜从民愿，派禹治水，功垂千古，成了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一大功绩，即为帝舜“临下以简”的成功事例（参见《史记·夏本纪》）。相反，“临下”以暴，如夏桀殷纣，则国灭身死，为后人所不齿。就是秦始皇，他虎视六合，横扫诸侯，统一中国，功高盖世，但因“临下”无方，暴虐过甚，民不堪命，结果在他死后三、四年内，秦朝江山即被推翻。即使像春秋时鲁庄公“筑台于郎”、“筑台于秦”，因为无功筑台，滥用民力，而不与民同乐，尽管与夏桀殷纣之残民相比，过错甚小，但也被《公羊传》以为“临民”、“临国”无方而书以讥之（《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临国”“临民”，关系重大，所以《诗·小雅·小宛》有“惴惴小心，如临深



■大禹治水功垂千古

谷”之句，《论语·述而》有“临事而惧”之语。居高临下者，如不兢兢业业，则有陨谷坠亡之危。于此可见，“临”之时义，古人非常重视，所以特设《临》卦。

《临》的卦形是䷒，下兑上坤，象征监临履行。从卦象看，下卦兑是泽，上卦坤是地，《象传》说是“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泽为水，水往低处流，因为泽水汇集低处；而地则高出于大泽。泽卑地高，岸临于水，取其高下相临之势，所以说是“泽上有地”谓之“临”。人们因为观察《临》卦的“泽上有地”之象而得到了启发，高下相临，相互包容，如深泽与大地，相互涵盖，大地裹载深泽，泽水滋润大地，上下相须，开辟了自然的新境界。用之于社会人事，也是如此。在上的统治者，对于在下的臣民，所谓“临”，虽是居高临下，却不是随心所欲的胡作妄为，而是必须教民以德，通过思想教化，上下相互理解，彼此包容，而形成一个安定的社会局面。所以元代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说：“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兑泽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而“教”下必先受教育，所以统治者要“容保民无疆”，就必须自己有德以服人。据《左传》桓公二年载，鲁桓公受宋国贿赂而纳其郜鼎，包庇宋国臣下弑君之罪，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要求君主昭德以临，失德则无以“临下”。从卦德分析，下卦兑为悦，上坤为顺，《彖传》说是“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意为，内卦兑（☱）为悦，初、二阳气逐渐上升，但并不激于意气而恃势逼人；外卦坤（☷）为顺，阴之从阳，并不因外而逆；上下相悦相顺，就是《临》卦之德。这也就是《左传》所说的“昭德”以“临下”的意思。在十二月消息卦中，《临》卦象征十二月。《复》卦（䷗）中的一阳是阳气开始萌生的

十一月，而《临》卦下兑的二阳，则是阳气往上增长的十二月。所以《彖传》说是“刚浸而长”。而其中九二，作为整个重卦的成卦之主，上与六五阴阳对应：九二刚中，有坚强的才能而喜人；六五柔中，在上有谦顺知人之德而顺人，上下默契，既悦且顺，所以《彖传》称“刚中而应”。能够按照《临》卦刚长悦顺的卦德行事，就会“大亨以正”，这是“天之道也”（《彖传》），是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的。

卦辞曰：“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意思是说，《临》卦象征监临视察，具有元、亨、利、贞四大德性；但发展到八月，将有凶险。照理说，《临》卦象征上以临下的领导艺术，与《乾》卦一样具有“元亨利贞”四大德性，应是大吉之卦才对。但《乾》卦为天地始创，“元亨利贞”四德没有条件限制，所以不言吉凶；而《临》卦则因监临视察之道，有盛极而衰的时候，所以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而称“至于八月有凶”。为什么说“至于八月有凶”呢？因为以每年十二月的阴阳消长而言，从《临》卦的十二月至《观》卦的八月，相距正好八个月；而《观》卦的卦形是䷓，下坤（☷）上巽（☴），与《临》卦上下卦形相反，彼此成为综卦。而《观》卦二阳已被四阴挤到外卦之上，是阴气渐盛而阳气已消的时候。《观》卦的八月，人称仲秋，据《礼记·月令》篇：“是月也，杀气浸盛，阳气日衰。”与《观》之卦象相符。这样，从《临》十二月的二阳在下而渐长，发展到《观》卦的八月的二阳被四阴挤兑往外，阴盛阳消，不是“至于八月有凶”又是什么？所以黄寿祺等解释说：“此句以时令为喻，说明‘监临’盛极必有衰落的危险。”防微杜渐，见机知微，可见《易》卦作者，已具有未来学的深邃目光。

下面分析爻位爻辞。

初九，咸临，贞吉。

古时“咸”与“感”通，是一种自然而至的无心感应。爻辞是说，初九，上下相临，自然感应，坚守正义可获吉祥。初九阳刚处于下兑之下，是监临之道的初始阶段，该爻阳居阳位而得正，又上与六四阴阳相应，六四是近君之位，彼此位正而相互感应，表明初九得到在上者的信任而崭露头角，以施展其阳刚上进以临下的才华。但又因居位之低，其才能还在试用的实验阶段，所以还未到大展身手的时刻，因而作者诫以坚守贞正之道，以获吉祥，故爻辞称“贞吉”，守“贞”是获“吉”的关键。爻辞中的“咸临”，是本爻的精义所在。因为初九始见，人鲜知者，而能与六四上下以“贞正”相互感应，纯然是出于无心之感，合于天地自然的规律，所以虽是“临人”之初，但已透露了“临”道的深远意义。譬如现在“临下”的人事工作，如果领导干部忙于挑剔属下的缺点，那么上下级就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中，哪有“咸临”的味道？不是“咸临”，不合“临”道之正，则无法调动手下广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怎能做好工作？反之，如果领导处处为群众着想，把国家对于人民的关怀和温暖，送进人们的心坎里，

这样上下相临以无心之“咸”，自然感应而发生共鸣，领导者振臂于上，群众响应于下，上下一心，则精神上的“咸临”，就会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因为领导者的言行，自然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在下者积极响应；而在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之后，这对上级的领导艺术，不就是最好的肯定与称誉了吗？得到下面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国家政权自然稳固，所以初九为吉爻，表明了“临”道的良好开端。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九二处位下卦之中，阳居阴位，刚而能柔，又得中位，加以上与六五阴阳自然相应，九二是《临》卦的成卦之主，而六五又以中道居君位，上下以“中”共鸣互应，所以称“咸临”。如果说初九的“咸临”因居初而微，那么九二则居中而率初九共应六四、六五，“临”道之阳浸盛，所以初九诫以“贞吉”，而九二则“吉无不利”。这表明阳道正逐渐由内向外、由下向上升，呈现了勃勃的生机。但《象传》发挥爻辞说：“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未顺命”一句，古人争论纷纭，我们不去繁琐考述。清陈梦雷解释说：“九二以刚居柔，非苟且以取悦于上者，有‘未顺命’之象。五顺体而二说（悦）之，疑以苟从取悦矣。然刚而得中，以此为五所信任，非苟将顺君命以取容者也……得圣人教人以道事君之意。”（《周易浅述》）所论简单明了。如果上妄而下媚，上下吹吹拍拍，这就不是什么“咸临”了。“咸临”之道，未可尽顺上方之命。在上者言行合于正道则自然感应，反之则否。如孔颖达所说：“须斟酌事宜，有从有否，故无不利也。”（《周易本义》）可见上下“咸临”应以坚持“贞正”之道为原则。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甜也，这里指富有欺骗性的曲说邪行如巧言令色之类。爻辞是说，六三，以甜言蜜语的欺骗来监临臣民，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知过而忧心忡忡，那就不会有灾祸。六三阴据阳位而处下兑之上，过中失正，下凌二阳，又上与上六无应，矛盾重重，处于艰难的位置。这样来监临于众，非常困难。于是，六三为了摆脱其困境，施展其阴柔佞媚之性，花言巧语，哗众取宠，以骗取上下的信任和支持。从爻位爻象论，六三在兑之上，据《说卦传》，兑为口，明何楷《古周易订诂》说：“能悦物者口也。”口主言语。所以爻辞称“甘”，也即用花言巧语来媚悦于人。以“甘”临人，虽能得逞一时，却不能期许长久，总有一天会失去上面的信任和下面的支持，当然处境不利。如唐玄宗时奸相李林甫，口蜜腹剑，佞上欺下，专权近二十年，倾危国家，身死而入《奸臣传》，万世唾骂。此之谓“无攸利”。不过《易》卦作者有好生之德，所以又为六三指出了改过自新的道路。从爻位爻象看，六三与九二、六四互卦为震（☳），震有忧惧之象，知错能改，所以爻辞称“既忧之”；又六三若转化为阳爻，则下乾上坤（☷），变

为《泰》卦，泰者平安，所以爻辞称“无咎”。

六四，至临，无咎。

爻辞是说，六四，以至诚监临于众，必无咎害。六四邻五，为大臣位，处上坤之初，阴爻阴位得正，又下与初九阴阳互应，这与六三的位失正而乘凌阳刚不同，所以称“无咎”。爻位爻象的当位得正，是“临人”出于至诚的表现。秉公至诚，阴柔谦逊，当然上获明君信任，下得臣民拥护，必然事业有成，怎么会有灾祸呢？六四之“至临”，证之以史，周公近之。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蚤（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率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于天下亦不贱矣。

■群弟流言



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于是）诸侯咸服宗周。”《易》卦爻辞称“无咎”者甚多。但“无咎”之称，并非纯然无灾无难的一帆风顺。世界事物的发展必有矛盾存在，如果矛盾处理不当，则凶险潜伏其中。因此，“无咎”是有条件的，易卦作者鼓励人们要用预测未来的眼光观察事物，正确处理矛盾，则逢凶化吉，无咎无害。故“无咎”之辞，含有居高思危、自警自省的积极进取精神，用以指导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以消弭凶险灾祸于未萌之际。凶险消失称“无咎”，“无咎”的结果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有待于人的努力和创造。

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知，“智”的通假字。爻辞是说，以睿智君临于众，适合伟大君主的身分，必获吉祥。六五以阴柔居上卦中位，下应九二，又阳刚得中，可见能以智慧用人，事业大成，而毋须自己出力，这是大智大慧的结晶，所以爻辞称“知临”。如帝尧之用舜，舜之用大禹，服四夷，制洪水，无论自然或人事，皆能顺遂有成，终于在人与自然或人与社会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世传尧舜无为而治，实际是运用了知人善任的大智，统治者当然可以拱手无为于上而事业有成了。这是“知临”的佳例。易卦作者非常强调“中”位的作用，六五与九二阴阳得中而互应，所以《象传》这样说：“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所谓“中”位，就是出于天道自然的至理，而不是出于矫饰的结果。如果尧舜无论巨细，事必躬亲，而不是把握国家事业的根本，不能选贤授能而知人善任，必然庸庸碌碌，抓住芝麻丢失西瓜，这就违反了天地自然的“中”道，有悖于《临》卦六五“知临”的至理名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知临”作为一种领导艺术，值得后人深思。

上六，敦临，吉，无咎。

敦，敦厚，诚朴宽厚。而后又引申为敦固，朴实坚固。爻辞是说，上六，敦厚朴实地监临于众，吉祥而无咎害。上六处全卦之上，是“临”道之极，原与六三无应，但因阴爻阴位得正，其性柔和，居上而谦，德厚位固，因而附益六五之君，而应九二之阳，所以在矛盾转化过程中，避凶趋吉，因称“敦临”。《象传》说：“敦临大吉，志在内也。”所谓“内”，从爻位看，指下兑之二阳；从爻义看，象传称“志在邦国”，如《周易折中》所谓“若将天下国家置之度外，虽有些小德泽，终是浅薄”，“浅薄”其德，则与“敦临”相反。也就是说，虽然上六处于“无位”之位，高高在上，但“临”道盛极必危，所以敦厚而下得二阳之助，逢凶化吉，事业稳固。故朱熹云：“居卦之上，处临之终，敦厚于临，吉而无咎之道也。”（《周易本义》）《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在萧何死后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对于下级，“重厚长者”，而对“言文刻深”之吏，则先后斥去，坐饮醇酒，无为而治。“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曹参并不因居上位掌大权而擅威作福，而是“敦临”臣民，宽厚待下，终于得到皇帝的信任、臣民的拥护，百姓编成民谣加以歌颂，说曹参治国，“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临》卦反映的是古代的一种统治术，“临国”、“临民”事关重大，因而领导艺术大有讲究，历史已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但是“临”道的意义远不止于政治生活，它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对于所有的个人，也都有上下相临的问题。例如，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无官无职，似乎无所谓上以临下的监临之事。其实不然，师生之间也有上下相临的关系。因此，即使是普通教师，也要讲究领导艺术，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培养人才。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子女之间，也有上下相临的问题，这又涉及到了社会教育领域。在封建时代，家长说了算；但现代家庭则不同，人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怎能不讲究彼此相“临”的艺术呢？“临”道的触角，已深入生活的各个领域。

观

卦第二〇



万国观光见盛德

三国时大诗人曹植《七启》云：“是以俊乂来仕，观国之光。”唐孟浩然《送袁太祝尉豫章》诗亦云：“何幸遇休明，观光来上京。”所谓“观光”，指的是参观访问以考察国家或地方的盛德光辉及社会风土人情。这一概念，现在已成流行的话。比如报纸常见的港澳台胞及国外华侨组成回国“观光团”等报导。“观光”的出典，就是《易经·观卦》六四的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可见《观》卦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并产生了应有的影响。

《观》卦第二十，次《临》卦之后。《序卦传》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意思是说，事物经历了“临”的阶段而发展壮大之后，尊高盛大而备受观仰，所以《临》卦之后自然是象征观仰的《观》卦。其实，所谓“观光，”、“观仰”，只能说是《观》卦之“观”的主要意义，由此又引申出许多相关的说法。“观”，繁体作“觀”，《说文》曰：“谛视也，从见，雚声。”又《释文》：“观，示也。”原是指以眼睛可见的事物示人，也即“观察”的意思，引申为“景观”、“壮观”等。后来又由可见可示的物质形态，深入到无形无迹的精神形态，如道德风貌的“观德”、“观化”、“观止”等等。后代中华佛学如唐代的法相宗和天台宗，他们同样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力图使外来的佛学具有民族化的特色，以便于国人接受。如强调观察人们内在心性的“观心”，思想体系虽与《易》卦有异，但无异受到《观》卦的“观光”、“观德”的启迪，深入到人的内心去探索其精神奥秘。

《观》的卦形是䷓，下坤（☷）上巽（☴），象征观察瞻仰。据其卦象，上巽为风，下坤为地，《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风无形无迹而不可见，但自空中吹遍大地，万物振动之态，无不毕现。因此，

《观》卦上巽（☴）下坤（☷），以“风行地上”为喻，说明了自上观下，无所不明之义。所“观”的对象，可以是有形有迹的具体事物，也可以是无痕无影的精神心迹，因为大地厚实而无所不载，巽风无形而入于万物。君子从《观》的卦象悟到了“省方观民以设教”的大道理，上崇德树典型而可“观”，则万民瞻仰而顺其教化。所谓“省方”，就是巡察四方而观民风俗。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以省视万方，观看民之风俗，以设于教。”作者认为，统治者要“教”民，就必须了解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与要求。以今天的学校教师为例，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学习程度和具体要求，常会产生教与学脱节的现象，无法继续其教学。因此，在上者要“设教”治民，就首先要“省方观民”，了解民情风俗和人民心声，然后所“教”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据此，统治者要“设教”让臣民观仰，就要先观民风。在这里，以上观下和从下观上，自然统一。据传周代有采诗官的制度，以保证天子“省方观民”愿望的实现。《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按：即乐官），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也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一采诗以“省方观民”的制度，后来因战乱而无暇顾及。但到汉武帝时，又重新“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古代采诗以观民风的盛事，虽是昙花一现，但功不可没，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推其原始，正是来自六十四卦的“风行地上”之“观”。黄寿祺等称引刘牧之言：“风行地上，无所不至。散采万国之声诗，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见《周易译注》）其精神实质清楚可见。不过“易无达占”。古时又有“地上之木为‘观’”的另一说法，因为巽又可以象征木。据《汉书·五行志》称引古说：“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是为木不曲直。”这是后来的阴阳家根据五行学说，对于《观》卦坤下巽上“地上之木”象征所作的解释。过去南方的农村，村头常有数株百年的高大榕树，人们尚未进村，远远望见如盖的大树，就知是到了某乡某村。地上的高大树木，正是一种令人观仰的典范与标志。朱熹《周易本义》说：“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者也。”他的解释同样符合“地上之木曰观”的旨意。而高大树木，其根深植于厚土之中，其干凌霄挺拔不动摇，正直而不挠曲是木的本性。人们据此，又悟到在上者作为观仰的典范，治国理民，本当正直，一言一行，都应注意，甚至仪表风范也不可忽视，更不必说是“使民以时”的“劝农桑”和“安百姓”了。正直以行，“则木得其性矣”。相反，如果荒淫无

耻，声色狗马，毫无节制，高高在上，其恶言人人得闻，其丑行处处可见，如此之“观”，“夺农时”而“伤民财”，则是“木失其性”，有悖于《观》卦“地上之木”的精神要义。《汉书·五行志》所说《观》卦之象，虽然时代较晚，“使民”云云，仍是统治者居高临下的口吻，但正直以行，谋安百姓的提法，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孟子思想如出一辙，直接受到《观》卦卦象的启发。

而从卦体卦德言，下坤（☷）之性温顺，上巽（☴）之德和逊。《彖传》解释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据《易》例，阳为大，阴为小。《观》卦九五、上九二阳高高在上，所以说是“大观在上”。而九五处位既中且正，盛德辉光，是《观》卦之君主，为万民所观仰，所以又说是“以中正观天下”，其所谓“观”，取上以示下的典型之义。而《观》上下卦的德性，上巽和逊而不拂事理，下坤温顺则自然心安理得而无所乖戾，“具顺巽之德，以我之中正，观天下之不中正者”（陈梦雷《周易浅述》）。中正顺巽之德，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伦理典范。这似乎与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之道大相径庭。其实不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但进化论同样强调自然的和谐。如草原上的狼，弱肉强食，残害羊群，对人畜危害很大；但狼群的粪便肥沃了草原，狼吃老鼠和其他动物的腐败尸体，从另一方面看，减少了草原上鼠疫等可怕传染病的流行，显然又成了大自然的清道夫，为世界生态平衡的新和谐作出了贡献。认识事物，过犹不及，不可偏激，这就是中庸之道。况且，《观》卦的“中正顺巽之德”，并非只是懦弱退让；如果正确理解，“以中正观天下”而设教，所“教”之道，还有改造和淘汰“天下之不中正者”的另一面。可见中庸之道，并非绝对地排斥矛盾斗争。况且，《观》卦的“中正之德”，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与界限，它是在“过犹不及”的一个大范围内活动，而社会人生的“过犹不及”，又不能用具体斤尺来称量。如南宋遗民评点家刘辰翁，他发挥《易》之“中”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即中也。天地何所依？依于中，彼非中不立……今人知喜与乐之为和，而不知当怒而怒，怒亦和也。非怒之为和，而和者未尝不在也。犹当哀而哀，必尽哀而后无余憾也。故夫大寒大暑，烈风雷雨，人知其过，不知其和，彼其宣导湮郁，开辟变化，不若是不足以有为。故在当日为过，在一岁言之为和……凡吾所言，非传与疏也……彼忖无过无不及以为中，又以其勉强不妄发者为和，不惟不知性，亦不知道。”（《中和堂记》，见《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卷二）所以对不同时代的不同事物来说，“中正之道”可以因输进了新血液新内容而获得新生。即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中正之德”的传统观念一经改造，同样也有它合法存在并发展的理由。

卦辞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盥（guàn），通“灌”，祭礼名，指祭祀开始时以酒浇地的仪式，《周易集解》引马融曰：“盥者，进爵灌

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时。”荐，献也。颙（yóng），敬也。若，语助词，无实义。卦辞是说，《观》卦象征观示瞻仰：犹如举行祭祀大典，只要观仰祭祀开始时以酒浇地的隆重仪式就可以了，后面献飨细节，可以忽略不看，因为人们在充满庄敬肃穆的祭典气氛中，虔诚之心油然而生。以祭祀大典作譬喻来说明《观》卦大旨，与上古巫术占筮文化的时代思潮有关。为什么说“盥而不荐”呢？因为祭祀仅是一种外在的仪式，任何事情，都不能只看它的外表，重要的是注重其内在实质。犹如祭祀，一颗虔诚的“颙若”之心，比起那荐献许多牺牲祭品要宝贵得多，这就提醒，在让人瞻仰的“观”示之始，必先诚敬其心，端正立场与态度。俗话说，上行下效。古人认为，君子在上，如日月在天之明，普照大地，无处不见；但日月的亏食，在下臣民，也人所共见。因此，君子作为典范以观示于人，怎能不“颙若”其心，虔诚其意呢？所以《彖传》说：“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谓“神道”，是运用上古巫术的流行语来作譬喻，实际不是指宗教迷信之神，而是指神妙的自然之道。“观”的规律，普遍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生。圣人就是根据自然规律来阐述“观”道，以便教化万民的。欲设教“服”人，必先服己之心。

下面谈爻位、爻象和爻辞。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爻辞是说，初六，像儿童那样观仰事物，对于小人没有什么害处，而对于君子则有遗憾。初六处下坤之初，阴处阳位失正，又上与六四无应，就像一个出世不久的儿童，毫无经验，甫一出门，目不暇接，不知怎么看法，其所观瞻，茫然无知，这就叫做“童观”，是处“观”的始初阶段常有的现象。对于在下的“小人”，因为没有什么责任，所以也就利害不大；但君子在上，负有不可推脱的社会职责，如果一样茫然“童观”，就可能发生方向性的错误，一家之长影响一家，一乡之长影响一乡，一国之君影响一国，天子则影响普天之下，其咎害影响面很广，因而爻辞以“君子吝”为诫。

六二，窥观，利女贞。

窥，窥视。爻辞是说，六二，暗中窥视观仰，有利于女子坚守正道。六二处下坤之中，阴爻阴位，处位又正，加以上与九五阴阳互应，按照爻位爻象，该是个大吉之爻。但因《观》卦的主位在九五，六二与九五相隔遥远，上被二阴六三、六四阻隔，六二、六四又上与九五互卦为艮（☶），据《说卦传》：“艮为门阙。”为门所隔，六二只能从门内窥视九五；加以下坤为顺，本身又阴柔守中而取柔弱之势，因而难以冲破阻碍，而纵目仰观，因此一时无法尽观卦主九五的盛德光辉，所以爻辞称“窥观”。“利女贞”云者，作者以女子居深闺而从门内窥视九五阳刚之男为喻。言外之意，女子可以，而男子则否。因为古时重男

轻女，社会以男子为中心，女守内，坚持“贞正”即可。其所“观”是否完美，则无关国家大局。而男子主于外，国事人生，无所不问，如果与女人一样“窥观”，则因所见狭隘而具片面之识，这就有损于九五阳刚盛大的光辉形象，所以六二虽然没称凶咎，但也并非吉爻。故《象传》解释云：“窥观女贞，亦可丑也。”“亦可丑也”，即指男子汉大丈夫而言。六二之爻，于女为“贞”，而在男则“丑”，因具体对象而异其吉凶。

六三，观我生，进退。

我生，陈梦雷解释说：“我之所行。”（《周易浅述》）爻辞是说，六三，反观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进则进，应退则退。全卦以观于九五之主为喻。六三处下坤之上，取上跃外卦之势，又与上九阴阳互应，原该也是吉爻。但六三处上下卦之间的“多惧”之位；加以阴爻处阳位失正，欲上观九五，被六四所阻而难以如愿；又六三、六四、九五互卦为艮，艮有门阙之象，六三处门内，难以窥见九五之美，所以只能求其次而反观自身的作为，审视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审时以动，相机而行，以便慎择进退。孔颖达《正义》说：“三居下体之极，是有可进之时，又居上体之下，复是可退之地。远则不为‘童观’，近者未为‘观国’，居在进退之处，可以自观我之动出也。故时可则进，时不可则退。观风相机，未失其道。”因此，六三的“观我生”虽是反身自观，自观的主体及对象均为“自己”，但“自己”的言行作为，又无不与社会他人相联系，自言呓语，只是个别现象。因此，反身自观，实是以“观风”察世为基础。所以六三虽一时难以“观国”，但已比初六、六二进步，在“观我生”的基础上，正为六四的“观国”创造条件。孔子曾对他的得意门生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积极有为，以退为进，闪现了郁勃向上的光彩，正是《观》卦六三“观我生，进退”的形象说明。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顾与认识，常因所处社会大环境的动荡而变化，因而意义不同。比如南北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陈与义，他在金亡北宋的靖康之难以前，诗歌悠闲自适，其《同叔易于观我斋分韵得自字》诗云：“小草浪出山，大隐乃居市，功名一画饰，甚矣痴儿计……门前剥喙客，欲问观我意。但持邯郸梦，赠我一觉睡。”诗人在北宋和平繁华的社会中，其“观我生”的自我认识，多是远离功名是非的高士隐者之言，表现了士大夫的闲情雅趣，因而社会意义有限。但经历国破家亡的颠沛离乱之后，其《北征》诗同样称“观我生”，但是语调陡变，诗云：“华实相先后，盛过当同衰。亦复观我生，白发忽及期。夕云已不征，客子今何之？”北宋盛世，统治者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故金兵铁蹄踏破中原，导致人民的苦难，因而由盛转衰。参阅其避乱湖南的《夜赋》诗：“强弱与兴衰，今古莽难平。腐儒忧平世，况复值甲兵。终然无寸策，白发满头生。”诗人“观我生”的慨叹，已具有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深刻历史内容，已从个人恩怨上升为民族精神。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爻辞是说，六四，参观瞻仰国家的盛德辉光，作为君王的贵宾必然有利。六四处上巽之初，虽然下与初六无应，但已由下卦升进到上体，阴处阴位得正，所以为大吉之爻。从爻位爻象看，六四与六二、六三互卦为坤（☷），坤为土，有国象；六四上比卦主九五，最近阳爻，而且一旦变阴为阳，则上卦巽化为乾（☰），乾之“见龙在田”，有“天下文明”之象（见《乾·文言》），所以六四又有向往光明之象。故爻辞称“观国之光”。又九五为君位，六四上承，柔顺以正，所以有“利用宾于王”之象。《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坤为国，临阳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观，进显天位，故‘观国之光’。‘王’谓五阳，阳尊宾坤，坤为用为臣，四在王庭，宾事于五，故‘利用宾于王’矣。《诗》曰：‘莫敢不来宾，莫敢不来王’，是其义也。”（按：今《诗·商颂·殷武》“宾”作“享”。）据《左传》庄公十二年载，陈厉公生子敬仲，“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周朝史官据爻位爻象的变动作出具体的解释。原来，陈是上古帝尧之后，周时封侯建国，有作宾于周王之象。周史为敬仲占筮得《观》（䷓）之《否》（䷋），其变化在四。《观》卦下坤（☷）为土；上巽（☴）为风；六四变阴为阳则化为乾（☰）；而六三、六四与九五又互卦为艮（☶），艮为山，所以称：“风为天于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按史载，后来的陈桓子为敬仲的五世孙，后来始大于齐，再过三代，陈常（即田常）专齐之政，其子孙卒为诸侯，有齐国，是为齐威王，强于天下。这与《易》筮“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虽是巧合，但前人有德于民，泽及后代而子孙得国，却是事出有因。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爻辞是说，九五，反观自我，君子必无咎害。九五处上巽之中，卦主居君位，阳刚中正，下与六二阴阳正应，又与初六、六三、六四比应，所以光辉灿然，万国瞻仰，是人们所“观”的典范。但如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为了长保国家盛世之治，君子之“观”，不仅“观民”，而且应该深刻反省以自观，方保“无咎”。《象传》解释说：“观我生，观民也。”王弼注曰：“居于尊位，为观之主，宣弘大化，光于四表，观之极者也。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故观民之俗，以察己之道，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上为化主，将欲

自观，乃观民也。”据此，则“观我生”虽然表面是“自观”，其鹄的仍在“观民”，“自观”与“观民”，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术，是相统一的。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爻辞是说，上九，言行备受人们观仰，君子不会有灾祸。上九居全卦之终，“观”道已穷而矛盾转化之时，虚高其位而万民所瞻，只有兢兢业业以修美其德为务，才能保“君子无咎”。陈梦雷说：“上九以阳刚居尊之上，示为下所观瞻，若宾师之位也。故亦当反观己之所行，求免于咎也。曰‘其生’者，上无位，不当事任，避九五，不得称‘我’也。”（《周易浅述》）又从爻变来看，上九处高危多变之位，一旦矛盾转化，阳变为阴，则上巽（☴）化坎（☵），坎为水为险，有凶象；全卦则化为《比》（䷇），其上六爻辞曰：“比之无首，凶。”因此根据《观》卦上九的特殊情况，同是“君子无咎”，意义不同于九五，警诫之意可见。其爻之旨，暗示如不修美其德，改造自我，则必然会有凶险之象。

总之，《观》之为道，内容复杂，意义深刻。“观”虽一名，但具多层意义。不管是上观下或下观上，也无论“观我生”或“观其生”，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全面地观察事物，深刻地探索人心奥秘，以便作出准确而有效的反应。如《论语·泰伯》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宋代杨万里又发挥说：“学者无周公之所有，而有周公之所无，吾何以观之哉！”（《庸言》）一个人的才能和地位虽然可和周公相比，但是既骄傲又不倾听民众意见，固执不改，这样缺乏德行，当然就走向了“观”的反面，成了“不足观”的典型了。这就说明，《观》卦虽主观仰之义，但“观民”者必先“自观”，为人师表，必先改造自己，故“观”人以“正道”这一启迪，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噬嗑

卦第二一



秉公持正利用狱

《噬嗑》第二十一，序列《观》卦之后。噬（shì），咬啮；嗑（hé），合也。噬嗑，咬啮食物，除掉梗阻而口合。俗话说是眼中不容一粒沙子。口食也一样。食物中如含砂石骨头，当然也必须咬啮去之，而后合口下咽，消化吸收，以组合新机体。推而广之，社会亦然。刑狱治安之设，犹如牙齿咬弃砂石骨头而食可咽、身始安。《序卦传》说："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伟大事物，人共观仰，于是自然产生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民众团结在杰出领袖的周围，同心同德，所以说是"嗑者合也"。所取虽是"噬嗑"的偏义，但社会的安定团结，必须除暴才能安良，强梁不去，梗塞不通，当然上下不安。因此，人类一旦进入阶级社会，法律刑狱之设，早就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讼》卦偏于讼争，调停讼争，更多的属于思想工作的范围，程度较轻；而《噬嗑》则是针对触犯刑律的服刑服法之事而重在刑狱，处在严重的矛盾对抗之中，如朱熹《朱子语类》所指出，治狱判刑，暴力克服，"彼必为敌"，要做到服刑之人，心服口服，改过自新，"不是易事"。处理不当，很容易冤屈善良，或激化矛盾。因此一提到刑狱之事，仁人君子，常是蹙眉。但即使是孔夫子也不得不承认，"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礼乐刑政，缺一不可。认为"刑罚"之设，是为了让万民的行为有所遵循。话虽文雅，却也离不开"刑罚"之类的暴力。所以古代儒家，虽然口宣仁义，但与法家一样重视刑狱。所不同的是，法家把刑狱之法，公然说得鲜血淋漓，似乎有点嗜血成性、以杀人断肢为乐的味道；而儒家则多少注意到暴力对抗的严重后果，因此要求治狱之事，"须以艰难正固处之"（朱熹《朱子语类》），以便与礼乐仁义相配合，共同完成维护国家统治的任务。而国家巩固，

社会安定，万民团结，这也就是观仰之后“嗑者合也”的有效成果，所以六十四卦有《噬嗑》之设。

《噬嗑》的卦形是䷔，下震（☳）上离（☲），象征口齿咬合食物。从卦象看，《象传》说：“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噬嗑》卦象，下震为雷鸣，上离为电火，雷鸣电闪，相须而动，电闪明于上则无所不照；雷震威于下则无不慴伏。象征上天为人类的罪过震惊而行惩罚。于是地上的统治者，观“噬嗑”之象，效法天意，代天行罚，而刑狱兴。《周易集解》引宋衷曰：“雷动而威，电动而明，二者合而其道章（彰）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滥；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须雷电并合而‘噬嗑’备。”而卦德则与卦象的雷电相配合。《彖传》说：“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雷震阳刚处于下卦，离电为明而阴居上方，刚柔分处上下，阴阳结合，则化为巨大的力量。因为离卦象征闪电，照耀天空，其性阴柔而宽容，则美丑毕现，而正邪难以混淆；这就有利于下面的震雷利用刑狱，除暴安良，目标清楚，效果显著。

卦辞曰：“噬嗑：亨，利用狱。”卦辞是说，《噬嗑》象征口齿咬合，道路通畅，施设刑狱则有利。《彖传》解释说：“颐中有物，曰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从卦构看，上下二阳似口腔的上下唇，而卦中的诸阴爻如众齿罗列，外实中虚，便于咀嚼食物，只有九四梗阻其间，必须咬啮去之，故卦称“噬嗑”。而其中六五为治狱之主，居于尊位，主刑狱之事，刚柔相济，既不伤于严暴，又不失之宽纵，刑罚得中，万民知措手足。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发挥说：“上下之不能相合者，中必有物间之，啮而去其间，则合而通矣。国家之刑狱亦复如是。民有梗化者，以刑克之，则顽梗去而上下通矣，故利用狱。”所以《彖传》以为六五虽然阴处阳位而“不当位”，但柔得中义，仍然是“利用狱也”。卦辞的精神，强调刑狱必须刚柔相济以守中道的要义。

初九，屨校灭趾，无咎。

屨（jù），原意是“鞋”，这里名词动化，用如“穿鞋”。桎梏一类的木制刑具，用以锁足。爻辞是说，初九，初犯刑法，足著刑具，伤残脚趾，不算灾难。从爻象看，初九处震之初，震有足象，阳刚强行而动，易于犯法；而初与四应，六三、九四与六五互卦为坎，坎为桎梏，有险象。故爻辞以桎脚灭趾为喻。但这在古代，不能算是重刑，而只是“小惩”。六十四卦，写于上古奴隶社会时期，当时对于奴隶，刑极惨酷。因此，桎脚灭趾之刑，只能说是对于初触刑法者的小小惩罚而已。小惩而知错，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当然必无咎害。对于初九的灭趾“无咎”，孔子在《系辞传下》是这样解释的：“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则视为初犯者的福音，因为使犯法者重新获得了做人的机会。从犯人方面看，则强调迅速悔过以求自新。其实，初九爻象爻辞，不仅是对于初触法律者而言，而且还包含了对于刑法本质的理解。

英国古典戏剧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中的法官安哲鲁，对那些触刑犯法而要求宽恕的人说："要是第一个犯法的人受到了处分，那么许多人也就不敢为非作恶了……（法律）镜子望见了许多未来的罪恶，在因循怠息之中滋长起来，所以它必须乘它们尚未萌芽的时候，及时设法制止……我在秉公执法的时候，就在大发慈悲……惩罚一个人的过失，可以叫他不敢以身试法……他在一次抵罪以后，也可以不致再在世上重蹈覆辙。"所以初九的"屨校灭趾"，看似残忍，实是慈悲，它是一种以刑止恶，进一步改过自新的积极措施，关键在于提倡自新的自觉性。一旦自新自觉，则重新为社会集体所接受，成为和谐的一员。这与《序卦传》"嗑者合也"的精神是一致的。几年前放映电影《少年犯》，对于这些初次触犯律法的青少年，把他们关进少教所，犹如初九的"屨校灭趾"，限制自由，强迫改造，正是为了启发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自觉性。进少教所的"小怨"，其中包含了政府与人民对于犯罪青少年的关怀。许多少年犯在离开少教所后，成了一代新人，事迹令人感动。但是，如果对于少年犯一味宽容慈悲，不予"小惩"则后果不堪设想。传说古代一个母亲，她的儿子少年时偷了人家的一只鸡，占了小便宜，母亲不仅不予"小惩"，而且喜形于色，夸奖鼓励。后来儿子愈偷愈大，最后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被官兵逮捕，法官判以极刑。在临刑前，他要求见母亲一面，并在母亲吻他时咬下了母亲的鼻子，他痛恨母亲，眼泪纵横地宣称，是母亲的第一次"宽纵"和"仁慈"，把自己的儿子一步步地推向了断头台。"屨校灭趾"与上断头台，何者慈悲，不言而喻。所以《象传》说是"初校灭趾，不行也"，"不行"，不再重蹈覆辙而成为新人。这话很有道理。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肤，唐陆德明释文："柔脆肥美曰肤。"清陈梦雷以为是"豕腹下柔软无骨之肉，噬而易嗑者"。因此，以"噬肤"喻服罪受刑之人。爻辞是说，六二，对服罪者用刑顺利，虽然伤残其鼻，但没有咎害。《噬嗑》一卦，初、上二爻以受刑为喻，而中间四爻则以用刑为喻，立场角度不同。六二阴爻而处于下震之中，处位中正，以乘凌初九阳刚，阳刚在下，且无尊长而躁动犯法，六二公正以断。又六二、六三与九四互卦为艮（☶），艮有鼻象，六二施以重刑，所以用"灭鼻"为喻。施刑至此，人疑其过；其实，六二以柔克刚，不得不然。《周易集解》引侯果曰："居中履正，用刑者也。二互体艮，艮为鼻，又为黔喙，噬肤灭鼻之象也。乘刚噬必深，噬过其分，故灭鼻也。刑刻虽峻，得所疾也。虽则灭鼻，而无咎矣。"这就是说，对于严重触犯律法的人，只要是公正而断，虽然施以重刑，仍是对症下药；一味柔弱宽恕，则强暴不服，更易诱使继续犯法。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腊月或冬天腌制的干肉；孔颖达疏："腊是坚刚之肉。"腊肉日久

则变质生毒，以喻久年疑狱而犯人心生怨毒。爻辞是说，施刑时如咬啮干硬腊肉，受到怨毒，虽小有憾惜，但终无咎害。六三处下震之上，震为动，有施刑之位势。但六三阴爻阳位而有失中正，又与九四、六五互卦为坎（☵），坎为险，有遇毒象，如治久年疑狱施刑而受怨，所以爻辞称“遇毒”。但六三又与六二、九四互卦为艮（☶），艮为止，象征施刑公正，怨毒自止，所以爻辞称“小吝无咎”。

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胏（zǐ），《周易集解》引陆绩曰：“肉有骨谓之胏。”爻辞是说，九四，噬咬干肉而碰到骨头，说明施刑并不顺利，但九四秉性如金之刚，箭之直，利于在艰难中坚持正义，则为吉祥。九四已升到上离之初，处于紧邻六五君主的大臣之位，专治重案大狱。治大狱则困难大而怨毒多。九四阳处阴位，履非中而位不正，故施刑不利，如“噬干胏”而咬到骨头。又九四与六三，六五互卦为坎（☵），坎为险陷之象，故怨毒纷起。不过九四以刚治案，禀性终是刚直不阿，如陈梦雷分析：“九四……所断之狱，非若肤腊之易者，必如金之刚则不挠，如矢之直则无私，然刚直非易行，恐瞻顾而不果矣，故必艰难正固则吉。”（《周易浅析》）九四之爻，说明治狱之道未能发扬光大之时，处在艰难之中，应该坚守“艰贞”正道，刚直如金矢，则将化凶为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爻辞是说，六五，治狱之道不顺畅，如咬食干肉一般，但六五秉性如黄色之金，中和刚强，只要守持贞正之道就可以避免危险，而必无咎害。六五阴居君位而行中道，治狱而上诉于君，必非小案。加以阴柔而乘凌九四阳刚，处位不当，所以如“噬干肉”，难于六二之“噬肤”。但与六二位势不同，能力有异，权威临之，狱不难决。所以又比六三“噬腊肉”、六四的“噬干胏”容易。

六五居上离之中，离者光明普照之象，便于审察刑狱，无所冤屈。又六五变阳则上卦化乾（☰），乾有黄金之象。黄为中色而金性刚。六五柔居君位，治狱刚柔相济，以行中道。不过古人常说，刑也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六五虽然贵为君主，但仍然兢兢然以治狱，守正以防凶险。所以爻辞称“贞厉，无咎”。

上九，何校灭耳，凶。

何，通“荷”，负载也。爻辞是说，上九，荷负桎梏，遭受割耳之刑，有凶险。上九居全卦之极，以喻受刑之终。上九与下无应，阳刚居极而躁动不安，乘凌六五之君必然触犯律法，以此喻怙恶不悛的罪犯，必然受到严厉惩处而致凶险。上九处离（☲）之极，离原为明；但上九是矛盾多变之位，化阳为阴，则上

卦为震（☳），雷震一动，严惩之象。所以孔子《系辞传下》解释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一般认为，古代儒家治狱，强调人君不忍之仁，多讲宽恕之道。实际不然。儒家所重，在刚柔相济，恩威并施，辟以止辟，刑期无刑。刑辟之用，偏于严厉，观《噬嗑》六二、六三、九四、六五诸爻可知。以水火喻。治狱之道，宽恕似水，刑罚如火。水性懦软，民多狎玩而溺死；火德威烈，民望畏避而生存。法官治狱，只要坚持中公之道，则明察如电火，威震似雷吼，电闪雷鸣，不以为过。这就是唐初张蕴古《大宝箴》所说的“众弃而后加刑”的意思（《贞观政要》卷八引）。《尚书·舜典》有“明德慎刑”之说，《礼记·缁衣》有“惟刑恤哉”之论，但在古代，真正做到的极少。贤如唐太宗，也屡次受到魏徵的批评，说是唐太宗于“刑赏”“治狱”之事，“有所未尽”，于是在贞观十一年上疏：“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出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贞观政要》卷八《刑法》）针对封建刑法治狱的不公不正之道，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唐太宗读后，为之动容。唐太宗贞观之治，史载政清刑省，他恐“主狱之人，利在杀人”，如开棺材店的老板多喜人死一样，也是职业习惯，所以下诏“深宜禁止，务在宽平”（同上）。据《新唐书·刑法志》载，太宗即位，人或劝他“以威刑肃天下”，但他没接受，“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据说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仅二十九人。贞观六年，全国死罪者三百九十人，过年之时，唐太宗从人道主义出发，“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纵死囚回家与家人团聚而后赴刑，是否派人暗中监视盯梢？不得而知。但这事在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历代传为美谈。但就是这个具有不忍之仁的皇帝，却坚持按律治狱，而反对滥用大赦。贞观七年，他对群臣说：“吾闻语曰：‘一岁再赦，好人喑哑。’吾有天下未尝数赦者，不欲诱民于幸免也。”（《新唐书·刑法志》）又曾称引《尚书·康诰》周武王之语：“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证以古代史实，加以

■唐太宗像



世营明爽家人睽蹇解睽益其后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总结说："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已来，绝不放赦。"（《贞观政要》卷八《刑法》）这话有道理。因为"赦宥之恩"，多及不轨之辈。刑释人员，继续抢劫杀人，古今比比皆是。翻开现在的报纸，时有报导。依法而断，秉公持正，如《噬嗑》卦辞所称"利用狱"的精神，值得深思。

又《噬嗑》一卦，孕育着古代通商利民的经济思想。《系辞传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意思是说，君子观《噬嗑》卦象，明白了"嗑者合也"的意义。这是转移视角后的新理解。因为《噬嗑》下震（☳）上离（☲），象征咬合，与古代各地商品集中到了集市进行交易相通。又上离为日为明，下震为动，日明而民动。古时集市贸易，有"日中为市"的制度，与上离下震卦象有关。这样，《噬嗑》之义，虽然主要是以国家刑狱为喻，但其意义远远超越刑法范围。因为"《易》无达占"之理无处不在。古人观物取象，作六十四卦以类万物之情。而形象大于思维，人们通过"物象"，兴发想像，联类无穷，所以《噬嗑》的精神又可以与经济商业相通。班固《汉书·食货志》称引《易系传下》"日中为市"之说而加以发挥："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噬嗑》卦义的引申发挥，又可影响国计民生，通于工商之利，于此可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蕴。

贲

卦第二二



文质彬彬致“贲”道

《贲》卦第二十二，序列《噬嗑》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意思是说，“噬嗑”之道在于交合，但社会中的人们不可以苟且交合，而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交往，在社会集体中，人们自有其不同的地位、次序与行列，而与其身分相适应的，又有一定的上下尊卑威仪之类的文饰。一个国家若撇开阶级不论，那么政府部门的总统、总理、部长、省长、市长、局长、处长、科长以至科员，上自中央，下到地方，总有其次序行列，各人因所处地位不同，礼仪待遇各异。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免俗。我国外交部的礼宾司，接待不同外宾，而安排不同礼仪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又如同为小汽车级别的干部，还可能因汽车牌子的不同而心存不满。文饰之生，自古已然，文饰之用，愈趋流行，怎能不加研究？这只要读一下《二十四史》的“礼乐志”“舆服志”等就很清楚。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即使贵如“帝王”（即部落联盟首领），也是巢居穴处，兽皮遮身。东汉桓谭把古今文明加以比较后说：“夫不翦之屋，不如阿房之宫；不琢之椽，不如磨砻之桷；玄酒不如苍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郑之乐。”（《新论·启寤》佚文）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发展，人类的消费需要及享受欲望与生产力同步发展，加入了文明的行列，益愈繁盛。为了序列等级、威仪上下，统治阶级更是挖空心思，大兴文饰。《后汉书·舆服志》说：“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贤仁佐圣，封国受民，黼黻文绣，降龙路车，所以显其仁，光其能也。”但文饰之道，并不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发展，而自有其规律。降及战国以后，人称上



■王充像

下无法，不循旧章，“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虽死不悔。”可见文饰之事，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并非帝王贵族一家所独专，因而应该探求其内在本质，因其自然，成其文章。违背趋势，明令禁止，效果适得其反。如西汉末年，社会昏暗，王朝倾危，统治者以为是民心不古所致，因而汉哀帝以“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为理由，明诏禁止“世俗奢泰文巧”（见《汉书·礼乐志》）。但实际是文饰禁而不止，愈加流行。所以西汉王朝，并没能延续寿命，而是很快被王莽所篡夺。后来桓谭、王充等有识之士，就提出了不同的文饰理论来加以纠偏补弊。《贲》卦主张发展文饰，但又不是过泰过甚，而应与其内质相适应，这实是古代最早的一种文饰折衷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贲》的卦形是䷕，下离（☲）上艮（☶），象征文饰。从卦象看，下离为火为明，上艮为山，《象传》说：“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山上是草木禽兽聚集的地方，山下火光上照而通明，百物毕现，光彩闪烁，犹如文饰，所以卦象为贲。君子观《贲》卦之象而受到了启发，如程颐所说：“君子观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周易程氏传》）文明之治，就是人类社会的文饰。无论是礼仪服饰，哲学经济，文学艺术，建筑园林，体育杂技，都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表现。没有礼仪，不听音乐，不搞体育，人类缺乏文饰，当然也能苟延残喘，但过的是原始蛮荒的生活。而文明作为社会的文饰，使人类生活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原始人饮毛茹血是吃；现代人的菜肴讲究色香味，直至雕龙盘凤，也是吃。但两种“吃法”，显示了文明的进步，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大不相同：现代人的饮食文化，充分显示了人类战胜自然，成为世界万物之主的身分；而原始人的饮毛茹血，则恐恐然为生存而挣扎。但是为什么《象传》又说君子观《贲》象而“无敢折狱”呢？因为刑

狱之事，重在审得实情，如果自恃明察，或巧加文饰，则无视真情，掩盖事实，就很可能冤屈无辜。由此可见，文饰的应用也应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而不可滥用。再从卦构卦德分析，如《彖传》所说："刚柔交错（按：四字原脱，今据王弼注及郭京《周易举正》校增），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六爻，初、三、上为阳，二、四、五为阴，三阴三阳，交错成卦，这是体现了天的自然文采。又下离德性为明，上艮德性为止，人类由此而悟出了社会发展"文明以止"的道理。这里的"止"，不仅是一种范围限制，更是集萃的意思。文章灿烂，礼义修明，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通过观察天的文彩变化，人们很快地理解并掌握了天道四季运行交替的自然发展规律；而"观乎人文"，由表及里，从文饰到内质，终于逐渐发现并掌握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巧加运用，推行教化，以巩固其统治。

卦辞曰："贲：亨，小利有攸往。"贲（bì），《说文》曰："饰也，从贝，卉声。"卦辞是说：《贲》卦象征文饰，道路亨通，前往探寻可获小利。为什么卦辞一面称文饰之道为"亨"，前途通畅，一面又只许以"小利"呢？汉郑玄从卦象卦变方面加以解释："贲，文饰也。离为日，天文也；艮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刚柔杂仁义合，然后嘉会礼通，故亨也。卦互体坎震，艮止于上，坎险于下，夹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则可矣。"（见《周易集解》引）郑玄从天文地文相饰成"贲"，讲到社会的仁义交合、嘉会礼通，所以"贲"道亨通，这好理解。但他又从卦变分析，九三、六四与六五互卦为震（☳），震为足为动，主于行。但上卦为艮（☶），艮为止，限制震行，止于礼义，所以为"亨"。而六二、九三与六四互卦为坎（☵），坎为水为险，行路遇水，有陷溺之危，上艮下坎把震卦夹在当中，震足一动，上面受到艮止礼义范围的规范，下面有掉溺坎水的危险，必须谨慎小心，道路才能亨通，如此行动，当然只能致小利。从互体看《贲》卦，文饰虽于人类大有用途，但其中也潜伏着危机。如果过分追求外在的文饰而遗忘了内在的实质，形式脱离了内容，妖艳灭质或华而不实，则文饰之利何在？元代王申子《大易缉说》云："文盛则实必衰，苟专尚文，以往则流，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谓不可太过以灭其质也。"王申子的解释，与郑玄之论精神相合。

下面再谈爻辞与爻位爻象。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爻辞是说，初九，文饰脚趾，舍车安步。初九处下离之初，初在下有脚趾之象，借喻"贲道"的开始，阳刚位正，又上与六四阴阳正应，但因位势低下，不敢奢僭为荣而以华饰骄人。又初九刚体而动，上行应四，六四与六二、九三互卦为坎（☵），按《说卦传》，坎"于舆也为多眚"，也即车遇险陷难以行进之象，故爻辞以车喻。不过，坎虚其表，又有不胜其载之象。所以初九之行，虽见

车辆，乘之有灾，因为身分不符。故自觉遵守礼制，甘心徒步而行，而舍弃华贵的车辇。这就是《象传》所说：“舍车而徒，义弗乘也。”初九自饰其脚，徒步而行，行而宜之，守礼合义，与孔子所说“非礼勿动”精神相吻合。爻辞爻象一展开，就立刻把文饰与礼义联系在一起。

六二，贲其须。

爻辞是说，文饰须髯以附从尊长。“贲须”云云，与常人所说的“溜须拍马”的性质大相径庭。因为“溜须”是奴才拍主子的马屁；而“贲须”则是以自己的须髯文饰自己的脸孔。须长颐口之上，天生自然。从爻位爻象看，六二处下离之中，阴柔而居位中正，但上与六五无应，只能上比九三，刚柔交错而互为文饰。九三在下离的上位。如人之口颐；而六二在颐下则有须象，所以用“贲其须”为喻。古人文饰，对于须髯之美极其重视。须髯体现风度和精神。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水浒》中的朱同，人称美髯公。但须髯之美，生于自然，如宫中太监，口本无毛，无从“贲须”。美须随口颐而展，犹如文饰待质而外现。陈梦雷说：“二附三而动，有贲须之象。盖须生而美，非外饰者。六二柔丽乎中正，固有其美须之贲，非待外也。然阴柔不能自动，必附丽于阳，如须虽美必附于颐。”（《周易浅述》）须待口张，文附质行，正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尚质尚文的美学思想。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开篇指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接着提出了“文附质”、“质待文”的理论主张，认为“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乎情性……此立文之本源也”。这是继承了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之说而加以发挥。但孔子的文质论，又显然受到《易》卦的影响。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绝非虚言。

■关羽像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濡，润泽。（按："贲"与"濡"均作动词用，"如"则为语气助词）爻辞是说，彼此文饰，互施润泽，坚守正道，可致吉祥。九三阳爻阳位得正，与上九虽然无应，但下比六二，阴阳相贲，互为文饰。从下卦说，"贲"道已经上升到较高的阶段，不仅文饰其外表，而且滋润其内质，外贲为内质的自然外现，所以爻辞称"贲如濡如"，是为吉爻。从爻位爻象看，九三处于由下卦升向上卦的临界线，居于矛盾转化的位置之上，又九三与六二、六四互卦为坎（☵），坎为水，所以有"濡如"润泽之象；但坎又为险陷，水可致溺。爻象暗示，如果一味文饰其外，奢华过甚而灭其内质，润泽之水，也会化作溺人的灭顶之灾，因此爻辞谆谆告诫，居安思危，吉不忘祸，永持正道，则可化凶为吉。所以《象传》解释说："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牢守正道，义薄云天，谁敢加以欺凌呢？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pó），《周易集解》曰："案皤亦白，素之貌也。"翰如，形容白马。爻辞是说，六四，素白而贲，淡然以饰，乘着白马前进，开始以为遇到了武装的强盗，仔细观察，原来是抢婚的队伍。爻辞大概写于殷商时代。据《礼记·檀弓上》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注云："翰，白色马也。"可见"白马翰如"与"戎事"有关。看到乘白马的人群，以为是强盗抢劫，但实际却是抢婚队伍。爻辞以二言一顿的诗歌韵律，生动地描绘了殷商时代的抢婚民俗。新娘出嫁，一定要表示不愿离开氏族而甘愿在家奉侍父母的态度；而外族的男青年，又为了显示英雄孔武的本色，所以要组织队伍武力劫夺新娘；新娘家族，则派人追赶抢婚队伍，却假装落伍而归，于是新郎新娘遂其心愿，成为夫妻。这种抢婚风俗，现今我国西南地区某些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一些残存的遗迹。如云南宁蒗普米族有婚前"逮"姑娘的独特婚俗：新娘出嫁的当天，仍然外出到山上或田里劳动。男方迎亲队伍，派强壮男子"逮"住她后，大叫一声："某家请你去吃茶！"然后举行婚礼。又如贵州和广西的仡佬族，通行"打"亲习俗：骑马戴花的新郎，率领迎亲队伍前进，新娘一方则派出"打"亲队伍埋伏中途，双方遭遇后又打又吃，新郎"挨打"，但一赶到新娘家中，男方又乘新娘"不备"，将她俘虏，抢架到新郎马背上驮回家中，连劝带灌地让新娘喝罢酒推入洞房。（见余世谦《中国文明大观》，江苏文艺出版社）可见古代文化基因潜伏深远，时有发现。对于古代文化习俗，只能研究其利弊，因势利导，而不能视而不见，以为时过境迁，可以不问。《易经》六十四卦，在古代虽然主要是用来巫术占筮，但论其客观价值和意义，则非巫术占筮所能牢笼，其"观物取象"的象征手法，明显具有"《易》无达占"之效。从爻位爻象看，六四处于上下卦之交，紧邻君主的多惧之位，所以产生了种种误会，它与九三、六二互卦为坎（☵），据《说卦传》："坎……其于马也为美脊。"有文饰其马之象。而六四一旦变阴为阳，则

与九三、六二互为巽（☴），《说卦传》谓“巽……为白”，因此爻辞称“贲如，皤如，白马，翰如”。但坎又有险象，四与初阴阳相应而互贲，中间为九三所隔，而六四专一以应初，追求心切，不畏艰难，白马飞坎逾险；人或疑之，因而又以“匪寇，婚媾”为喻。初、二、三为下卦之爻，主要讲“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之意，贲饰文明，愈来愈盛，由初的“贲趾”，到二的“贲须”，发展到三的“贲如濡如”，则为“贲”道极致。而六四以后，升到上卦，则返朴归真，敛文附质，文明其内而不在外，所以六四爻辞以素白自然的妆饰为喻，而与事物的淳朴质素相适应。后代儒家以为，这与维持世道人心密切相关，“贲”道之时义大矣！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戋戋，朱熹谓“浅小之意”（《周易本义》），孔颖达以为“众多也”（《周易正义》），今取朱说。束帛，一束丝帛，以喻礼轻义重。爻辞是说，六五，以田园风光、山林之美为文饰，手持一束丝帛前去礼聘贤人君子，下虽无附而有憾惜，但上有应而终吉。六五阴爻居阳位而失正，下与二同性相斥而无应，所以有“吝”。但阴柔而中，居于君位，为全卦“贲”道之主，与上九相比而贲，阴阳协调，故终吉。六五为“贲”道发展成熟阶段，但其所文饰，在于“丘园”。因为六五与六四、九三互卦为震（☳），震为木，有丘园象。“丘园”与“市朝”相对而立。市朝为人所趋骛的华美之所，而丘园则是自然而生的质素之地。“贲于丘园”，则舍去人为侈华而重朴素自然。孔颖达《正义》曰：“五为饰主。若施设华饰，在于舆服宫馆之物，则大道损害；施饰丘园……唯草木所生……每事质素，与丘园相似，盛莫大焉。”又下离为文明，上艮为止，六五居中，离之文明，发展到艮而知其所止，所以有敦本尚实之象。后人受六五爻辞爻象的启迪，明白了治国持家之道，不尚华侈，而贵俭约。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司马光还写了一篇《训俭示康》的文章，讲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至今传诵人口。秦皇汉武，奢华过甚，祸及子孙，史有明证。又“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按：寇准）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历史教训，历历在目。

上九，白贲，无咎。

爻辞是说，文饰白素无华，没有咎害。上九居《贲》卦之极，矛盾转化，有返文为质之象。上九与九三同性相斥而无应，但下比六五，阴阳互贲，六五“贲于丘园”，崇尚朴素自然之美；上九“白贲”，更是由文趋质，返朴归真。王弼注：“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忧患，得志者也。”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借杜丽娘之口，唱道：“你道翠生生出落

得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牡丹亭·惊梦》）这正是六五“贲于丘园”与上九“白贲”的形象说明。

《贲》卦的文质折衷论对传统美学及伦理学影响极大。先秦道家绝弃文饰，强调朴素自然之美，认为“华言不信，信言不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有一定的片面性。儒家则不然，他们继承《贲》卦，发挥《易》理，既强调文饰的重要，但又指出文附质的本质，这就是孔子所称的“文质彬彬”之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志在内为质，文溢外为饰，文是志的外现，二者互贲，相得益彰。但比较而言，孔子尚质尚文的美学主张，其矛盾的主导方面应在内质，所以《论语·八佾》有“绘事后素”的说法。素白之色，是绘画五色的基本底色。不过后人据此片面发挥，如刘向《说苑·反质》记载了孔子的故事：“孔子卦得《贲》，喟然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这一故事，是汉代儒家经生的依托之言，比起孔子“文质彬彬”的折衷之论，实是一个倒退。从哲学伦理角度看，不仅是中国古代先贤，西方哲学家们的言论也有暗合于中国《贲》卦之处。如英国哲学家、文学家培根说：“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加华丽。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艳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因此号召人们：“把美的行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吧。只有这样，美才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辉。”

剥

卦第二三



剥丧横流觅生机

《剥》卦在《贲》卦之后，序列第二十三。《序卦传》说："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意思是说，专心致力于文饰之事，过分豪华，以文灭质，如若这样，亨通的道路就已走到了尽头，所以《贲》卦之后自然出现了《剥》卦。易卦之"剥"有二义：一是剥落。这是天道自然之事，谁也无法抗拒。宇宙万物，有生长就有消剥。就拿人来说，二八少女，豆蔻年华，人皆歆羡；但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人老珠黄，谁能幸免？无论西子王嫱，从其自然形态方面来说，都必然经历由"贲"至"剥"的过程，关键在于要有处变不惊、顺应自然的健康心理机制。二是剥夺。这主要指社会人事。剥夺是中性词汇，可以是上剥下，也可以是下剥上；君子剥夺小人的权利，小人剥夺君子的地位；或是在上者剥削人民，在下者动摇统治者的权势……所以，"剥夺"有正反二义。如法律机关打击刑事犯罪，杀人犯被判处极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以正剥邪。相反，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和无情剥削，如白居易诗《杜陵叟》所说："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当然是以邪剥正了。《易经》的《剥》卦，正反映了殷周古人从自然社会等不同角度对于"剥"道的深刻认识。

《剥》卦的卦形是"䷖"，下坤上艮，象征剥落或剥夺。从卦象分析，下坤为地，上艮为山，山原本高高在上，现在则必须附着于大地，以高就低，所以为剥。因此《象传》解释说："山附于地，剥。"人们观此卦象，悟出了"上以厚下安宅"的大道理。这就从自然运行而受到启发，悟到了社会人事的基本规律。大地愈是宽广厚实，则所负载的高山愈是巍然屹立，直插云霄，给人以坚实伟大的感觉。尖塔的建造也是同一道理，下受损则上不安。基础如果不厚实

牢固，尖塔一高，则有塔倒人亡之虞。厚下所以安上，基础一旦动摇，则怎能安然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呢？聪明的统治者明白这一道理。古代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即与《剥》卦的“厚下安宅”的说法有关。《尚书》所载《五子之歌》就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三国时征战不息，曹魏派大将军曹真伐蜀，宰相华歆以为伤民而进谏曰：“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三国志·魏书·华歆传》）孙吴的将军骆统有感于当时“征役繁数……民户损耗”的伤害国本的情况，思革其弊，上书孙权，说：“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隆，义以民行……《书》曰：‘众非后（君王）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故（圣王）与民消息。”（《三国志·吴书·骆统传》）观时制政，以民为本，形成了我国优良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石之一，促进了古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从卦德分析，下坤德性为顺，上艮德性为止（见《说卦传》）。因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古代社会中，八卦中的坤为母，母性阴柔而顺；艮则为山，山岩刚硬，其体静止，故德性为刚为止。大自然中，阴柔消剥刚强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剥而知止，阴柔最后仍然团结在阳刚的中心。所以《彖传》解释说：“剥，剥也，柔变刚也……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所论极其精辟。“剥”之为道，是“天行”，即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如四季节候，不能如春夏之常绿，秋之飘零，冬之肃杀，无可避免。但消剥之时，并非断绝大自然的生机，而是“顺而正之”，只要掌握了“顺正”的关键，则将迎来更加蓬勃发展的新春。如数九寒冬的漫天飞雪覆盖大地，虽然可能伤害贫寒之家，但冻死大地中隐



■五子作歌

藏的害虫幼苗，将为明年的农业丰收创造条件，所以农谚有“瑞雪兆丰年”之语。即在人类社会，消剥、“诛杀”之事，也不能一概斥为坏事。在十二月消息卦中，《剥》卦是九月，五阴消剥一阳，阴气大盛，该行“诛杀”之道。汉代刘向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为例，气候该冷不冷，杂草不枯，则来年与农作物争茂，不利于国计民生。刘向据阴阳五行说加以解释，以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为天位君位（按：二五，十，十即二五，故五行以五称十）。九月阴气至，五通于天位，其卦为《剥》，剥落万物，始大杀矣。明阴从阳命，臣受君命而后杀也。今十月陨霜而不能杀草，此君诛不行，舒缓之应也。是时公子遂专政，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以后，将皆为乱矣”（见《汉书·五行志》称引）。如果拨开“天人感应”的迷雾，则可见思想闪烁之精光。后代宋朝苏轼所论更干脆，其《策别十七》曰：“诛一乡之奸，则一乡之人悦；诛一国之奸，则一国之人悦，要以诛害而悦众。”现在我们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犹如行剥诛之道，为社会的安定团结作出了贡献。消剥之际，并非尽是坏事，其中寓藏着新的生机。

卦辞曰：“剥，不利有攸往。”攸往，所往也。意思是说，《剥》卦象征剥落或剥夺，应该暂时停止前进。所谓“不利有攸往”，这是占筮者对于君子的劝戒。因为《剥》卦是对处于消剥过程中的事物总的概括，基本精神是避害以趋利。消剥之时，“小人长也”（《彖传》），小人消剥君子，正义力量相对薄弱，处于被邪恶势力所侵蚀消剥的危急之秋，君子如果不自量力而盲动，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从卦形所示也可看出。《剥》卦（䷖）下面五阴消剥上面一阳。上九为成卦之主，坚守正道以避害，则生机仍存；但是如果上九盲目行动，则将为诸阴所剥而改变其阳刚之质，阳之不存，正义消失，则阴邪喧腾，群魔乱舞。如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反革命军阀大肆屠杀革命人士，共产党独秉阳刚之气而峙立在上，形势对共产党不利，革命处“剥”之时，陷于低潮，当然应暂时收敛，积蓄力量，“不利有攸往”以另图发展。但当时党内的掌权者，却违背《剥》卦“顺而止之”之旨，主观求“止”而不知顺时而动，盲目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到处发动武装起义，而且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革命力量严重受挫，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被迫长征，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由此历史教训可以看到，《剥》卦之辞“不利有攸往”的深刻内涵。

下面分析爻象爻辞。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以，介词，及也。蔑，无也，爻辞是说，初六，卧床的剥蚀先从床足开始，不守正道就会有凶险。初六在下坤之下，在卦中爻位最低，阴柔失位而无应，又与诸阴相邻，已有不利之象。但因处《剥》之初，剥蚀刚刚开始，程度尚不严重，所以借“剥床以足”为喻。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卢氏之说：“坤所以载

物，床所以安人，在下故称足；先从下剥，渐及于上，则君政崩灭。”所谓“君政崩灭”，是就初六“蔑贞”（不守正道）的远期效果而言，是一种预示性的劝戒，而不是说初六“剥”道始初就遭此大凶。爻辞“蔑贞凶”之说，语言精警，防微杜渐，使人有履霜而知坚冰至的警惕。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孔颖达疏：“谓床身之下，床足之上，足与床身分辨也。”爻辞是说，六二，剥蚀卧床及于床辨，不守正道就有凶险。如爻象所示，六二之剥，由下而上，已上升到床身与床足的结合处，逐渐向要害部分靠拢。六二虽然阴而得位，但上与六五无应，又被上下诸阴所挟制，沆瀣一气，以消剥上九一阳。爻辞所以言“蔑贞凶”而不直接称“凶”，是因为初、二两爻，与上九距离较远，消剥阳刚之力尚弱，还可以“顺而止之”，没有构成直接的严重威胁，所以只是以告诫的口吻，指出如若不守正道就有凶害，具有预示未来的眼光。

六三，剥，无咎。

爻辞是说，六三，虽历消剥过程，但无咎害。六三位于下坤之上，虽阴柔而居阳位，阳刚之质暗藏于中，又上与上九阴阳互应，内含阴气愈加壮盛。因而《象传》解释说是“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六三的四周皆为消剥阳刚的阴爻，六三不与剥阳诸阴为党，所以为诸阴所排而称“失上下”。“失上下”是弃邪向正的表现，这如唐玄宗身边宦官头目高力士，不仅是历史人物，而且也是文学人物，戏剧人物。在京剧大师梅兰芳所表演的《贵妃醉酒》中，高力士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历史上的高力士的确有不少劣迹，曾是阴类小人；但在考验生死的关键时刻，却能保持民族气节。如奸相李林甫当权，军阀安禄山得宠，恩科试中，李林甫黜落所有举子，媚颂玄宗，曰“野无遗贤”，似乎一片歌舞升平。玄宗受奸相愚弄，洋洋自得，宠信有加，专心于声色狗马，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侯，宁不暇耶？”高力士则进谏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不可禁。”又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臣之钳口，其时也。”忠心国家与民族，矛头直指安禄山与李林甫。以后的安史之乱，早在高力士的预料之中。他与袁思艺同为内侍省监，同样得到唐玄宗的宠任。但安史之乱爆发，袁思艺投降了安禄山，高力士则忠心护主，随玄宗入蜀。唐肃宗即位，改元至德，玄宗在蜀，喜曰：“吾儿应天顺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忧？”力士曰：“两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汉北为战区，天下痛心，而陛下以为何忧，臣不敢闻。”（见《新唐书·宦者·高力士传》）为国为民，泫然而泣。后来他因不肯与宦官头目李辅国集团同流合污，“长流巫州”，弃上下之阴邪而重归于正，表现了中华儿女的高风

亮节，正可作为《剥》卦“无咎”二字的具体说明。

六四，剥床以肤，凶。

肤，以皮肤指代人身。爻辞是说，六四，卧床的剥蚀已直接威胁人身，有凶险。从爻位爻象看，六四处上下卦之间，已升至上艮之下，紧迫于君，处“多惧”之位，下与初无应，上逼五而侵蚀上九，以阴剥阳，穷凶极剥。又六四剥极而化为阳，则三、四、五爻互卦为坎（☵），坎为险陷，故爻辞直接称“凶”。《周易集解》引王肃曰：“在下而安人者，床也；在上而处床者，人也。艮以象床，坤以象人。床剥尽而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剥床以肤，凶也’。”如东汉末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争斗与专横，犹如“剥床及肤”，国家生气消剥殆尽，君不君而国以亡，最后宦官与外戚诸阴邪之党，随着王朝的灭亡而尽歼。爻辞称“凶”，实具远识，足可证以史实。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鱼，成串的鱼，这里比喻前后次序相及。爻辞是说，六五，（后妃）率领众宫女依序承欢望宠于君王。据《周礼·天官冢宰》有“九嫔”之目，郑玄引《昏义》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也。”据此，知殷周制度，宫中妇女按照贵贱，宠御有序，承欢君王。这里借此以喻六五比于上九之阳。六五柔中居尊位，以周之六宫为喻，不仅表现了古代男尊女卑、阴以顺阳的观念；而且可以看出，《剥》卦众阴剥阳，至五而剥极，阴不可以再长，阳不可以终消，不然，则灭绝了事物的一切生机。所以六五之爻，实是剥极而复的先兆。六五之阴，因上比阳而潜寓阳刚之质，顺之而剥止阳生，为上九阳刚的萌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六三以应上之阳而“无咎”，六五因比于上九而“无不利”，均为吉爻，与其阴寓阳质有关。而其余众阴剥阳，则为凶矣。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爻辞是说，上九，丰硕之果未被剥食，君子获得之后，用大车载以周济世人；如被小人所夺，则将房舍剥落，民失居食。从爻位爻象看，《周易集解》引侯果云：“艮为果为庐为舆，处剥之上，有刚直之德，群小人不能伤害也。故果至硕大，不被剥食矣。君子居此，万姓赖安，若得乘其车舆也。小人处之，则庶方无控，被剥其庐舍，故曰‘剥庐，终不可用矣’。”又据陈梦雷《周易浅述》曰：“艮为果蓏。一阳独存于上，如硕大之果不为人所食，独留木末之象。果不食必烂，核堕地又复生仁，穷上反下，阳将复生也……一阳未尽犹可复生。君子居此，则为小人所载；小人居之，则剥极于上，自失所覆，如剥其庐。”按：汉京房《易传》曾以春秋时晋败周天子之师为例，说明“小人剥庐”是“阴乘阳，

弱生强”之象。但六五剥极，作者指出其潜寓阳质而“无不利”，看出了黑暗中的一线生机；相反，上九原为阴转阳生的吉爻；但作者又以其辩证观念，指出了“小人剥庐”的潜在危机。不仅君子有危，即是小人，同样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故汉崔篆《易林》有诗曰：“悬貆素餐，食非其安。失舆剥庐，休坐徒居。”那些尸位素餐的阴类，同样遭受灭顶之灾。



■隆中对

总之，剥丧之事，虽为天运，抑亦人谋。六朝刘宋诗人谢灵运《撰征赋》云：“盖闻昏明殊位，贞晦异道，……升平难于恒运，剥丧易以横行。”但明《易》者知“剥”道而处乱不惊，积极争取黑暗消剥中的一线光明生机。诸葛亮的《隆中对》对刘备纵论天下之势，使剥丧殆尽的败军之将刘备坚定信心，为蜀汉立国开创了生机。反之，则自失良机，而为剥丧横流所吞没。南宋末年，宗学博士程元凤入宫轮对，曾在理宗皇帝面前，“极论剥复之机及人主所当法天者”，“指陈时弊尤激切”，但昏君不听，“当国者以为厉己”而贬官流放（《宋史·程元凤传》）。这不是自毁长城是什么？南宋王朝并非亡于蒙古之强大，而是亡于自身之极度腐败。“小人剥庐”，身死国灭，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硕果之仁，为生机之根。剥果以食，核仁萌芽，生生不息，剥而后复。这又是“天行”，是阴邪小人所无法阻止的客观规律。读完《剥》卦，奥理自明，当然会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复

卦第二四



迷暗知复透微曦

《复》卦第二十四，在《剥》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剥复相继，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自古已然。就宇宙世间阴阳之道而言，阴剥极至于上而阳气必潜生于下。如果天地只阴不阳，或只阳不阴，则何能交合而化生万物？动物或人类生命，也无不然，阴阳雌雄，矛盾相克而相成。从时序季节言，春夏秋冬的四季运行，冬去春来，夜尽昼复，阴剥尽而阳萌生，这是大自然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就社会人事言，人世间多少盛衰兴亡之事，史册彪炳，无不记载，乱而后治，如《三国演义》开篇所唱之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即是剥极而复的意思。又如人类的劳动创造，有劳役则有休息，劳而不息，就是铁打的汉子，也吃不消，因为这样违反了大自然的“剥复”至理。秦始皇统一天下不久，立即大兴徭役，盖宫殿，修陵墓，筑长城，劳而不息，天下骚然，终于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秦皇朝即土崩瓦解。秦始皇野心勃勃，他之所以称“始皇帝”，是想要让他的子孙相继，一世、二世、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杜牧《阿房宫赋》）。但却料想不到国未二世即呜乎哀哉，子孙已无余类。想来这一代雄主，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人们曾责骂其子孙的不肖与无能。但是，亡国的种子却是秦始皇亲手种下的。劳而无息，征战无休，剥而不复，违背了自然法则，必受历史的无情惩罚！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有助于说明《复》卦内涵的深邃哲理。

《复》卦的卦形是䷗，下震（☳）上坤（☷），象征生机回复。“剥”与“复”是一对矛盾的事物。因此，《剥》《复》互为对卦，卦形卦象相反，从《剥》至《复》，上艮（☶）返下化震（☳），下坤（☷）则反为上坤（☷）。从卦形卦象已可悟到“剥复”相反而相生之理。从卦象看，《复》卦下震为雷，



■秦始皇像

上坤为地，《象传》解释说："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古人认为，"雷"为阳物，春雷一动而万物复苏，因而"雷"是万物生机的象征。在十二月消息卦中，《复》卦是阳气由下渐生的十一月。季候虽属仲冬，但下震一阳，潜藏地中，雷动则为生机之胎息。待来年开春，潜雷破土，一鸣惊人，万物苏醒而生机竞发，此所以为"复"。至于《象传》所发挥的"先王以至日闭关"云云，是说古人从仲冬之时地中潜雷萌动的卦象，悟到阳刚之气虽然胎息于中，但其力极弱，必须很好地加以保护，以图来日的新发展。《管子·四时》篇曰："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冬天的"闭藏"，犹如阳气弱而潜藏地中，是为了等待来年雷动而后养育生长聚收。而据《礼记·月令》篇，"闭藏"之时，具体指"仲冬之月"，即《复》卦所象征的一阳潜藏地中的十一月。古时政府发布公告，有"土事毋作"的禁令，固闭"地气"，以助天地之闭藏。这实是古代为了保持生态平衡而规定的一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反映了中华古人生生不息的文化观念。孟子所说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要求禁止滥伐山林，待树木成材而后用，砍伐之后，又有"闭藏"之时以养生，所以能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而易卦中的《象传》，更明确地指出是"至日闭关"。汉班固在《白虎通义》的《诛伐篇》解释说："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阳气，成万物也。"但遗憾的是，在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由"剥"转"复"的保护自然环境的进步文化观念，却被后人逐渐遗忘。劳役征战，滥砍滥伐，无论春夏秋冬，谁也不问"至日闭关"的道理。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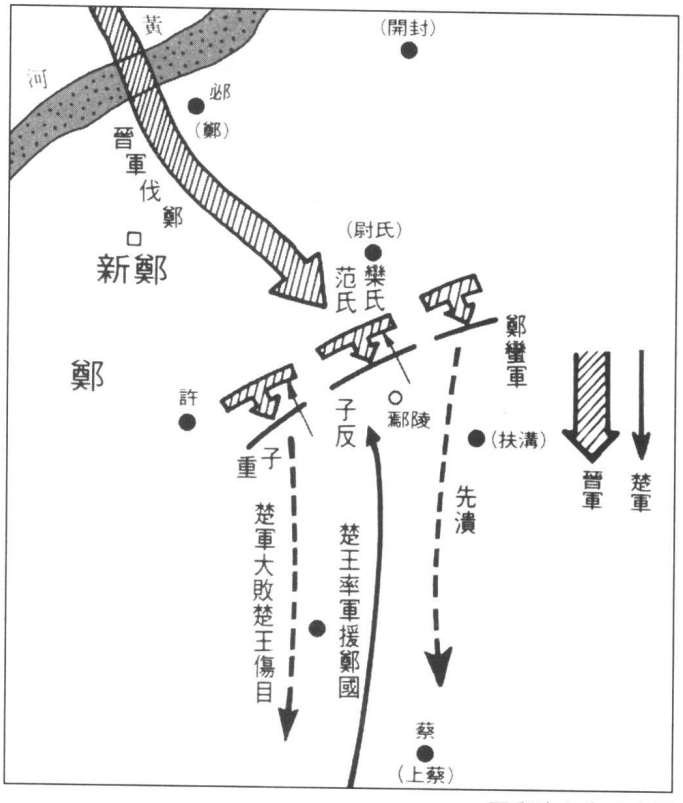
壮晋明爱家人哈建都据盈其别等先团开革昌宜良渐如有丰旅巽兑演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受到了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如《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按：即今《诗经》中的《秦风·小戎》）曰'在其板屋'。"可见直至汉时的甘肃陇西一带，仍然是"山多林木"，森林覆盖，老百姓才有原料建造木板房屋，自然环境保护较好，尚未感受到水土流失的严重威胁。但时至今日，"至日闭关"之约，早已荡然无存，或是为了满足少数统治者的豪奢生活的需要，或是为了眼前的生活利益，人们竞相持斧斤以入山林，不论时刻，滥砍滥伐，大片森林终于消剥殆尽，造成了现在的风沙弥漫，水土流失的严重危机。笔者不久前曾赴甘肃敦煌开会，道经陇西，虽然是千山竞立，但却几乎是寸草不长，成了光秃秃的黄土山，令人扼腕叹息不已！

从卦德分析，下卦震为动，上卦是坤顺，雷动于内而坤顺行于外。所以《彖传》说："复，亨，刚反（返）动而以顺行。"下震是阳卦，上坤是阴卦。阳刚从《剥》卦的上九，回复到《复》卦的初九，由外卦转为内卦，象征阳刚之气虽弱，但已化为内在的本质，是万物复萌生机的根本。所以《复·彖传》所谓"动而以顺行"，实际上意味着初九一阳逐渐向上生长的过程。下面震雷萌动于中，上面大地温顺而无所不载，所以寓藏着无限的生机。

卦辞曰："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意思是说，《复》卦象征生机四复，前途亨通。阳气入内出外通畅无碍，刚健朋友前来没有咎害。阳刚之气回复生机的规律，大约过七日即很快回转。利于人们前进。所谓"七日来复"，《周易译注》称引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解释说："我国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保留有一种现存文献失载的周初纪日法，即按月亮盈亏规律，分每月为四期，每期七日（或因大小月有八日者），从月初至月末依序取名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据此，'七日'正为日序周期转化之数；'七日来复'，当取此象征'转机迅速'之义，犹今语'一星期之间'。联系下经《震》、《既济》两卦均言'七日得'，似与本卦'七日'取义略同。"这就说明，《复》卦初九一阳，是透过黑暗帘幕的黎明前的一线微曦，它生机勃勃，无往而不利。以临产妇女为喻，临盆前的阵痛中，婴儿虽尚未出世，但却孕育着胎儿骚动的喜悦，坚持分娩，胜利就在眼前。所以卦辞说是"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象征着人们艰苦奋斗，在痛苦的炼狱中脱胎换骨，从而获得事业的新生，品尝着苦涩以后的甘甜。所谓"利有攸往"，是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二强的鄢陵之战。二国君主，皆亲征对阵。当时楚军强大，"压晋军而陈（阵）"，锐"不可当"。晋军惊慌，晋侯忧虑重重。为了鼓舞士气，于是巧妙地求助于占筮："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蹙，音促，窘迫。晋国史官筮得《周易·复》卦，《复》卦初九一阳始生于下，阳气渐长，在艰难困苦

中逐渐克服上面五个阴爻的侵剥，痛苦虽大，但却有“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之象。古代的阴阳学家，以为南方属阴，所以《复》卦一阳为主，不利于属阴的南国，而晋楚相比，楚居南方，所以释卦者据卦象而预言战事的发展不利于楚国。又一阳之气激飞如箭，又有“射其元王”之象。晋军因此预言而信心倍增，士气大振。后来晋楚大战，果然楚军败阵，楚共王被射伤了眼睛。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后人根据历史对筮卦的补充描写？两种可能都有。但由此可说明《复》卦从奋斗中求新生的基本精神。所以《彖传》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无论自然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多么艰难困苦，但生机尚存，无往不利，决不能丧失信心。生机回复，充分体现了天地养育万物的良苦用心，这是“天行”，也就是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



■鄢陵之战示意图

下面释爻象爻辞。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祇，至也。爻辞是说，初九，迷失方向不远，立即回归正道，不至于后悔，大善大吉。初九处于下震之初，象征起步伊始，即纳入正道，所以称“不远复”。又阳刚得位而居正，上应六四，阴阳相合，全卦五阴一阳，初九为成卦之主，下震之动，全在初九之萌，所以从爻位爻象看，当然不会有后悔之事产生而至善至吉了。孔子曾经称赞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说：“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复也。（王弼注：在理则昧，造形而悟，颜子之分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系辞传下》）当事理未明之时，人们可能因此而犯错误，“圣人”和他的学生一样难以避免。但可贵的是，一旦“理”化为“形”，聪明的人，“造形而悟”，因此而分辨善恶，知有不善，立即改过。知过必改，这就是《复》卦初九爻辞“不远复”的意思。知有不善，

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未尝复行”，这就是尽快地回复到至善的康庄大道。孔子、颜回之所以为“圣人”，“不远复”的知错必改的实践精神，是通往至善大吉的成功之路的关键之一。后儒据此，从伦理修身之道，推广到治学诸方面，如程颐《周易程氏传》说：“不远而复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学问之道无它也，唯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其实，不仅是修身治学，就是现代的工艺制器，道理也是一样。知“不远复”之理，在失败中发现其“不善”，知不善而立即改过回复正道，是创造发明的前奏曲。

六二，休复，吉。

休，美也。爻辞是说，六二，生机回复，美妙无比，吉祥如意。从爻位爻象看，六二阴爻阴位得正，又处下震之中，居位中正，虽上与六五无应，但下比初九，阴阳相和，故爻辞称“吉”。一般说来，初九既为《复》的成卦之主，其阳刚象征伦理上的仁与善。因此，六二虽失上应，但能诚心诚意地下比初九而亲仁行善，别开“吉门”，所以《象传》说是“休复之吉，以下仁也”。陈梦雷《周易浅述》也说：“柔顺中正，近于初九之仁人，能比而下之，取有以辅仁者，复之休美，吉之道也。”这里反映了古代儒家从伦理角度对于《复》卦六二的发挥。但黎子耀《周易秘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则释“休”为休息，他以《复》为遇卦，其第二爻变而为之卦《临》。而《临》卦九二《象传》云：“贞吉，未顺命也。”《秘义》解释说：“臣未顺君命，以箭相临而未发。上能休息士卒，施仁惠于下，则可获吉。”也可作为一说。但黎氏继续称引《易林》（复之临）曰：“国乱无常，咎征灭亡。”以“日食象征奴隶起义”，则为夸大其辞，明显不合《复》卦六二“休复，吉”的本意。

六三，频复，厉，无咎。

频，通颦，皱眉愁苦之貌。爻辞是说，六三，皱着眉头而艰难回复，虽是危险迭起，但最后必无咎害。从爻位爻象分析，六三处下震之上，阴居阳位，有失中正，又与上六无应，处震动之极，却复而不固。而六三变化为阳爻，则与六二、六四互卦为《坎》，《坎》有险陷之象，所以《复》卦六二在变动中也有“频复”之“厉”。又六三变而之卦为《明夷》，《明夷》有光明殒伤之义，从变动之道观察，其“厉”可知。但幸亏六三柔而位刚以知复，虽历尽艰辛，但却“厉”而无咎。因为回复向善，终是保存了美好事物的一线生机。如清康熙初年的三藩叛乱，叛军声势浩大，朝野震动，平叛战事极其艰苦，有“频复”之“厉”，几度陷入危机之中，但年轻的康熙皇帝坚持正义之道，终于化凶为“无咎”，使国家的统一回复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获得新生。尚秉和《周易尚氏学》曰：“知其危厉而振奋焉，则无咎矣。”释爻义甚明。

六四，中行独复。

爻辞是说，中正以行，独自回复而不顾世俗的猜忌诽谤。从爻位爻象看，六四虽处上卦之初，但《复》卦五阴爻，六四下有六二、六三，上有六五、上六，四居其中；又众阴无应，独六四位正而下应初九，阴阳相合，于心独专，所以称其“中行独复”。《象传》说是“以从道也”，《周易浅述》解释说：“此时阳气甚微，未足有为，故不言吉。然理所当然，吉凶非所论，所谓明其道不计其功者也。”如战国的大诗人屈原，忠心报国，自沉于江，其事非吉，其义可嘉。其《九章·涉江》曰：“世混浊而莫余知兮，余将高驰而不顾。”《渔父》又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正可作为“中行独复”的最佳注解。

六五，敦复，无悔。

爻辞是说，六五敦厚诚挚地追求生机回复之道，必无后悔。从爻位爻象看，上卦为坤，坤为地，有敦厚朴实之象。六五柔居中位，位失正而下无应。《周易集解》引侯果曰：“坤为厚载，故曰‘敦复’；体柔居刚，无应失位，所以有悔；能自考省，动不失中，故曰‘无悔’矣。”易卦最重中道，六五居全卦尊位而能驾御不偏之道，有敦厚朴实，一心回复向善之心，所以爻辞虽不称“吉”，但却获“无咎”。爻义仍然是鼓励向善以便积极恢复生机之义。后人加以发挥，意义更深一层，如清陈梦雷说：“初曰‘元吉’，五仅‘无悔’，不得以五胜初。窃意此乃困知勉行、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百倍其功者。能如是悔亦可无矣。”所谓“百倍其功”，谆谆向善之心，可谓深矣，则生机回复，将不难而至。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爻辞是说，上六，迷不知复，必遭凶险，有灾祸。用以行师作战，终必惨败；用以治理国家，国危君凶：（其后果十分严重）至于十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元气而征讨不服。《复》的上卦为坤（☷），李鼎祚《周易集解》分析象曰：“坤为先迷（凡按：地大多歧路故迷。）故曰‘迷复’。坤又为师象，故曰‘行师’。坤数十，十年之象也。”上六居《复》之终，“复”心不坚而妄变，下又无应，缺乏支持与拥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失掉了群众基础。没有群众，又一意孤行，当然必败无疑，所以爻辞称“灾眚”而致“凶道”。这是彻底违背了“复”道的必然结果。古时行君主专政之制，以“君”象征国家，所以“君凶”则国乱且败，影响了国家命运。因此，《复》卦上六的“迷复……君凶”之称，是极严重的警告。春秋末年，南方的楚国日趋强盛，侵剥中原的文明古国，鲁、郑诸邦，战战兢兢。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郑国派了子大叔（游吉）出使

楚国，但楚康王傲慢无礼，不接待郑使，于是子大叔回国就告诉大夫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无所归，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当时楚国专心致力于恢复以往春秋霸主的地位，但却狂妄自大，不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其志在"复"，其事实"迷"，不修其德，迷而不复，"能无凶乎"？后来人们分析楚国失败的原因，是迷溺于武力，"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这就是不修德政，舍弃其"本"因而大失天下之心的缘故。

总之，《复》卦之象所示，下震一阳如潜雷骚动于地中，虽然人们的肉眼一时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在是大地回春的前奏曲。但在严酷的自然（包括社会）竞争中，生机胎息尚弱，需要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发展。不想经过艰苦奋斗，企望"一次革命"而完美回复生机，实是胡为妄想。犹如一口无法吃成个大胖子，其理至明。急于回复，忘记了长期跋涉的艰难，可能欲速而不达，致令潜藏于中的一息生机过早地受挫夭折。当然，在生机回复的漫长过程中，也不可能步步准确到位；但知"复"之理，可以改过自新，回归正道，继续正常成长。孔子在《系辞传下》说："《复》，德之本也。""《复》以自知"，又说："《复》，小而辨于物。"意思是说，复于至善，回归正道，是事物的根本。明于《复》卦之理，贵有自知之明，善于辨析事物的细微征兆，及早地审知不善以回复于正道。迷而知复，知错必改，又为生机种子的萌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反之，迷不知复，则将咎由自取，不可救药。

无妄

卦第二五



以正祛邪归“无妄”

《无妄》卦第二十五，跟在《复》卦之后。《序卦传》说：“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意思是说，能够回归正道，恢复生机，就不会产生非法越轨之事，或是胡作妄为。所谓“妄”，狂乱，荒诞。周敦颐《通书》云：“不善之动，妄也。”因此，《释文》解释说：“无妄，无虚妄也。”中国古代常是“邪妄”连称。“正义”与“邪妄”是一对矛盾。我国传统中医治病，运用“以正祛邪”的原则，力求扶助阳刚正气，驱除邪妄浊气，保持肌体气血的正常循环运行，以确保健康。其医学原理，来自《易经》的《无妄》诸卦。又如古代儒家提倡“正名”原则，特别重视“以正祛邪”的言行。《序卦传》韩注云：“以正决邪，必有喜遇也。”后儒发挥易理，说：“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正邪，两言而足：正则用之，邪则去之，是则行之，非则改之。此理甚明。”（苏轼《论时政状》）苏轼所论，正是发挥《易经·无妄》卦以正去妄的精神，并进一步用以治理国家。但是世上万物，天下之事，有“正”则有“妄”，所谓“去妄”，并非易事，这是长期的事情，一刻也不可忘记。战国时荀子曾以妄人那欺众惑世的胡言妄为为例，说：“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荀子·非相》）他以为众人“愚而无说”，缺乏理论的自觉意识，不能坚持“圣人”所提倡以正驱妄的“正名”原则，所以妄人横行，千古而然。因此，人们要达到“无妄”的境界，就必须战胜环境及内心的邪妄，经历艰难的历程，去探索祛妄扶正的客观规律。于此可见学习《无妄》卦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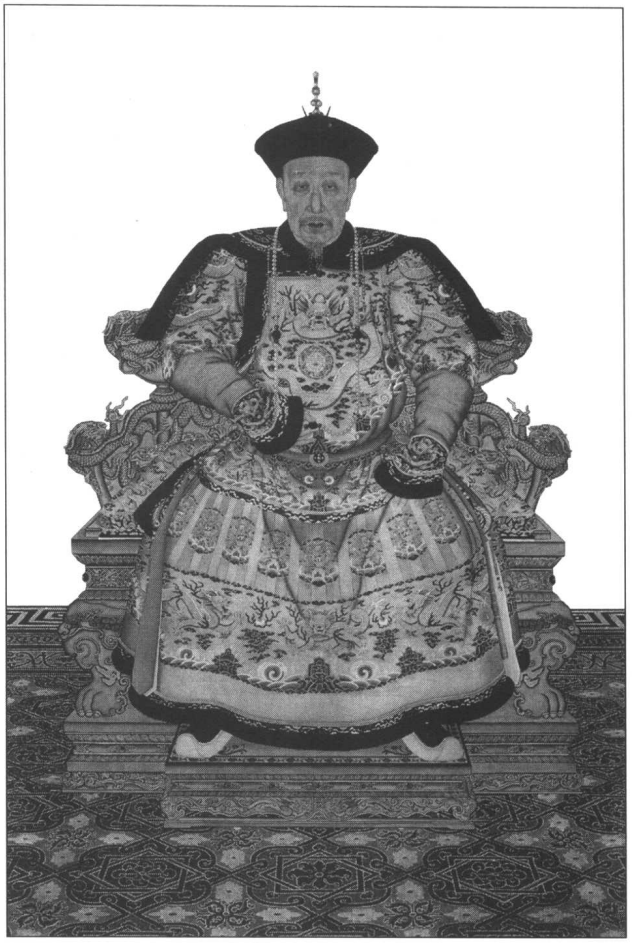
《无妄》卦的卦形是（䷘），下卦震为雷，上卦乾为天。《周易集解》引何妥曰：“乾上震下，天威下行，物皆絜齐，不敢虚妄也。”“象征无虚诈，去

邪妄，诚心志。”《象传》也说：“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古人以为，震雷代天行罚。普天之下，雷声震赫，其威势足以祛邪去妄。因此，古代的君主从《无妄》的卦象，体悟到天的权威，雷震天下，奋然而动，万物不敢妄为，君主作为“天之骄子”，代天行事，也就加强威权来配合天时，以养育万物。在邪妄横流之秋，不以雷震之威来收拾，则天下不会太平。《无妄》（䷘）与《升》（䷭）诸爻阴阳相反为正对卦。《升》属阳卦，象征事物的上升。而上升必经去妄扶正的过程，所以有《无妄》。《无妄》属阴卦，重点在去妄以扶阳。

从卦德分析，震卦居内为动，乾卦居外刚健，内震一动，外乾秉刚健之性以行之，英明果决，邪妄不兴。如《彖传》所说：“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意思是说，《无妄》卦下震的初九一阳为成卦之主，是从其综卦《大畜》（䷙）上艮的上九一阳转化而来。《易》理以乾卦为内，上卦为外，所以说是“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下震动而上乾健，阳刚震动而健行，邪妄道消，符合“天命”自然，所以又称“动而健”。“刚中而应”，指的是九五居尊位，以中正之体下应六二，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刚中则能断制虚实，有应则物所顺从，不敢虚妄也。”如果说《复》、《升》、《大畜》诸卦，主要是扶阳归正，则《无妄》卦主要是扫除灾祸，祛邪去妄，虽然着重点不同，但扶正养生的旨趣是一样的。

卦辞曰：“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意思是说：《无妄》卦象征无虚诈，去邪妄，求诚意。该卦具有元、亨、利、贞四大德性（参阅《乾》卦）。处于不可妄为之时，如果背离正道，就会灾祸临头，不利于有所行动。于此可见易卦所坚持的“正名”原则。事物变化的吉凶利否，决定于是否持“正”以行。所以《彖传》说：“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非“正”妄行，违反“天命”的自然规律，当然会遇到灾难。所谓“不利有攸往”，正是对于背离天命“正”道者的严重警告，劝诫他们及早改邪归正，遵循“无妄”之道而行。天体四布，星球运行，相吸相斥，力量平衡，各有其运行轨道，维系了宇宙各星系的正常秩序。《无妄》之旨，符合宇宙运动之规律，所以《彖传》称“天命”。但宇宙的运行，“正道”是与“邪妄”相对而成立。物质永远处于运动之中，有运动就会有意外而生邪妄，恒星相撞，流星穿空，改变了许多星球的命运，这种星球破碎之灾，就是客观自然存在的“邪妄”。但此后宇宙又重新布局，诸星球各安其分，纳入轨道，按规律运行。这就是去“妄”归“正”，复归“无妄”。再以养生为例。《管子·形势解》说：“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按照自然的节奏来调节人的生活，从而获得健康长寿，这与“无妄”之旨相合。但只要是人，在漫长的风雨人生中，谁能绝对保证一点病也不生？有病就是“邪妄”附身。如庄子所说：“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庄子·达生》）好色纵欲过甚，酒食毫无节制，以致病魔缠身，生病减

寿。“过”者违背自然之谓也，这就是医学上诱致“邪妄”侵袭的路径。医生的职责就是祛邪扶正，以打通人体阴阳平衡的“无妄”之道。中国历代帝王，如清朝康熙、乾隆那样活到耄耋之年的并不多见，更多的人寿命不长。如果撇开政治原因不论，他们的生活医疗条件何等优越，为什么寿命反而不及普通人长呢？道理很简单，毛病还是出在庄子所说的“过”字上。三千宫女绕一人，美酒佳肴摆满桌，酒色无度，“过”字当头，致“妄”而不归于“正”，怎得长寿？枚乘《七发》所描绘的，正是人主之“妄”：“出舆入辇，命曰厥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当头棒喝，栩栩如生，令人猛醒。生活之“过”之“妄”，就是致病根源。清除病根，扶正去妄，则自然恢复生机而健康长寿。



■老年乾隆像

下面谈爻象爻辞。

初九，无妄，往吉。

爻辞是说，初九，无虚诈，不妄为，前进必获吉祥。初九处全卦之下，虽然阳刚体贵，得位以正，震然而动，为《无妄》卦成卦之主。但于无妄初萌之时，谨慎小心，谦恭下人，上比阴柔六二，阴阳和谐，以贵下贱，行不犯妄，所以《象传》称：“无妄之往，得志也。”又初九上与九四两阳相斥无应，为什么爻辞称“往吉”呢？原来，《易》理讲动主变，初九往应于四，“四失位故命变之正（按：即变阳为阴），四度得位，承五应初，故往吉。在外称往也。”（《周易集解》引虞翻之说）以战争为例，敌人犯国，我以正义之师御之。于敌为“妄”，于我为“无妄”。双方布阵排兵，火力配置，变化无方。我处战争将动而未动的无妄之初，虽然体刚义正，但仍必须谨慎小心，多方侦察，以决定战

策。最好如《孙子兵法》所说，“攻心为上”，争取敌方士兵人民认识正义，掉转枪口，我军前进以相呼应，配合默契，应变自然，则必然克敌制胜，大获吉祥。这就是虞翻所说的“四失位故命之变”的生动说明。

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菑（zī），畬（yú），《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田初一岁曰菑，二三岁曰畬。”也就是说，菑是新开垦的生地，畬是多年耕种的熟田。陈梦雷《周易浅述》说：“始耕终获，先种后畬，此自然之常。今皆曰‘不’，统付之无心也。”所谓“无心”，并不是不去思考问题，而是循自然之理的意思。陶渊明《归去来辞》云：“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即是例证。爻辞是说：六二，耕种以时，无心而作，不必计较而自然收获；因地垦荒，任其自然，无心而自得良田。这样则利于有所前往。按六二处下震中正之位，上应九五，阴阳互应，出于自然。所以爻辞称“利有攸往”。释典《宗镜录》卷八十三：“若不起妄心，则能顺觉，所以云无心是道。”又引用文殊菩萨的话：“如人学射，久习则巧，后虽无心，以久习故箭发皆中。”（同上，卷四十五）所举之例，虽是射箭，其实与种庄稼及一般道理相通，只要纯任自然而无成心，按规律而行，则无往而不利。六二以耕获为喻。据《说卦传》，震卦（☳）“其于稼也为反生”，也就是说，震卦有庄稼种子顶破甲壳而萌生之象。又六二与六三、九四互卦为艮卦（☶），艮卦“为果蓏”，也与耕种有关。因此爻辞据此而立象，以耕获菑畬为喻。处无妄之时，就有“妄”作对立面存在。因此，克服“妄”以达“无妄”，有个自然发展过程。《无妄》六二，就是处于自然过程之中，尚未达到“无妄”的高级阶段，因此《象传》又解释说：“不耕获，未富也。”因为耕获之富，来之于无妄过程的完成，而在过程中，当然只能称“未富”了。又按黄寿祺等《周易译注》释“未富”为“未曾谋求富贵”，因为“卦辞指出，无妄之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六二能安顺守正，不妄不贪，故获上应而‘利有攸往’”。此说本于六二之“中正”立论，于义亦通，颇有启发。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中，行人得之，邑人之灾。

爻辞是说，六三，虽不妄为而飞来横祸：犹如拴着一条牛，有人顺手牵牛而去，以致连累乡里大家蒙受猜疑审诘之灾。从爻位爻象看，六三处下震之极，阴柔而失中正之位，急于上应上九之阳，意诚挚而归无妄，但有躁动之行，不期而灾祸自生。《周易浅述》分析爻象说：“三变离（☲），牛象。互巽（按：指六二与九四、九五互体成☴）为绳，艮（按：指六三互六二、九四成☶）为鼻，系中之象。震为大涂，中爻人位（按：三、四爻居全卦中爻），行人之象。卦之无妄皆以正而亨，而六三则不中不正矣，故有无妄致灾之象。行人牵牛以去，居者反遭法捕之扰，所谓无妄之灾也。”所以《杂卦传》说：“《无妄》，灾

也。”比如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人们常说，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强调“人定胜天”，意诚挚而归无妄。这种改造自然的决心与勇气，并非妄为之举。但改造自然，也必须审时度势。六三处震动之极，不能自已，鼓噪而进，则将招致自然的报复，而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失却平衡之弊。如果空气和水源受污染，人们无意之中，必受无妄之灾。这是“运数适然”，而不是某位具体的个人所致。

九四，可贞，无咎。

倒装句为“贞可”，解释为守正则可，不正则非。爻辞是说，九四，可以坚定正道，没有咎害。九四已升至上卦之初，迫近九五之君而失正，下与初九无应而处“多惧”之位，该是十足的凶爻。但因九四奉守贞正而祛除邪妄，如王弼所说：“处无妄之时，以阳居阴，履于谦顺，比近至尊：故可以任正，固有所守，而无咎也。”这就鼓励人们，刚而能柔，保持贞正的高尚品格，以便祛妄去害，逢凶化吉，故爻辞称“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按：与六三“无妄之灾”相比，“疾”比“灾”轻，无足轻重。爻辞是说：九五，虽不妄为却偶染风寒小疾，不必服药而有恢复健康的喜悦。经后人的发挥运用，“勿药有喜”四字，已成为生活中常见的庆贺之语。如唐文宗疾愈之后，当时任苏州刺史的刘禹锡写了《苏州贺皇帝疾愈表》，其中有“勿药有喜，如山永安”的话。为什么“勿药有喜”，就可以寿比南山呢？宋代苏辙《字文融》一文中也说：“愚医类能杀人，而不服药者未必死。”从预防医学的角度看，“勿药有喜”很有道理。比如现在有些人，钻公费医疗和劳保的空子，利用关系或特权，小病大养，滥服滋补名贵药品，常是效果适得其反。我听说一个病例，某人小疾而滥服人参，并在公费医疗中报销，自以为占了便宜，殊不知因过量服用，亢进过分，内分泌及神经系统几乎失控，虽经抢救勉强活命，但几乎成了废人。小病大养，没有病也会招致大病。这从反面说明了“勿药有喜”的科学性。而从正面说，“勿药有喜”，不是有病不吃药不治疗的意思，而是说只须加强身体锻炼，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那些小毛病就可不药而治。这个意思，对后代以预防为主的医学很有启发。所以晋代葛洪《抱朴子·用刑》篇明确指出：“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病。”符合《易经》“勿药有喜”的精神。英国学者培根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无病时不要滥用药物，否则疾病降临，药就可能不生效了。但也不要忽视身体中的小毛病，应当注意防微杜渐。当有病时，就要努力恢复健康；当健康时，则应当经常从事锻炼……锻炼对增加体质是多么重要。”培根是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时处十六、七世纪，比《易经》时代晚两千余年。其实何止医生治病，推而广之，“勿药有喜”也可运用于治理国家及其他事业。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慨叹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

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如果六国君主，牢记《无妄》九五“勿药有喜”的至理名言，“各爱其人”，以提高国家的“免疫力”，则不仅能抵抗强秦，而且有统一天下的机会和可能。对于秦朝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秦之亡，亡在自身之“妄”而非天下的刀枪。杜牧之见，确是思想深邃发展了《易》理。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爻辞是说，上九，意不妄而行有祸，没有什么利益。从爻位爻象看，上九居全卦之上，处无妄之极，正是从“无妄”向“妄”矛盾转化的关键时刻。此际时穷难行，应守静应变，才能消灾弭祸，回复正轨。但上九阳刚失正而躁动不已，不识时务，当然行必有“眚”。爻辞称“无攸利”，实是一个凶象。《周易集解》引崔憬分析上九之说：“居无妄之中，有妄者也，妄而应三，上下非正，穷而反（返）妄，故为灾也。”所以《象传》说：“无妄之行，穷之灾也。”如山区行车，风雪弥漫，加以山路失修，时有滑坡塌方之发生，此时处“无妄”穷尽之时，本应停车静观，检修和加固机器，提高车辆自身的“免疫力”，以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意外。待风住雪晴，公路畅通之后，再行出发。若此时不顾“无妄”之穷，奋一己躁动之气，冒险行车，则可能应了爻辞所称“行有眚，无攸利”的预言。实际上，预言的准确性并非借助于鬼神之力，而是源于循理而动，按自然规律办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后来中国传统的未来学预测，颇受易卦影响和启发。只要不是大搞迷信的胡言乱行，那么这种对于易理的科学探测，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又上九变爻为阴，则《无妄》化为《随》卦，《无妄》是遇卦，《随》是之卦。《随》卦上六爻辞有“拘系之”之辞，《象传》说：“拘系之，上穷也。”从爻变来看，《无妄》上九如不守正应变，则其穷凶之象毕露。崔篆《易林》（《无妄》之《随》）有诗曰：“破亡之国，天所不福，难以止息。”可见“古人”已经悟到，处“无妄”穷极之时，刚健躁进而无止息，则为“天”（即自然）所“不福”，谁有能力保佑必将“破亡之国”呢？上九一爻，寓理非常深刻。

综观全卦六爻，下卦三爻震体主动，上卦三爻乾体主静，但无论动静变化，均须坚守“贞正”之道则吉，违正而行则凶。儒家据此，强调“正名”原则，要求行为规范，“非礼勿动”。道家则依卦名无妄而起义，以为“无妄”之“正”，贵于无心，动与天合理循自然。儒、道二家之所谓“正”，内容有异：一重伦理，一重物理。但坚持“正”为亨通之道，于此而判断“无妄”发展过程中的吉凶，则是共识。天下雷行，万物无妄，圣人因其物性而加以治理养育，“圣人—自然之天”。这样，儒家的人道，与道家的天道，又在阐释《无妄》卦义中不知不觉统一了起来。

大畜

卦第二六



蓄德养贤路通天

《大畜》卦第二十六，在《无妄》卦之后，彼此互为上下卦相反的综卦，因此关系密切。《序卦传》说："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意思是说，心意诚挚不妄为，纳于正道，一心向善，则可以大蓄至德而聚养万物。"畜"通"蓄"，聚也。但在不同情况下，视其所聚而义有区别。"畜"之小者为畜聚财物，从物质的因素考虑问题，如《小畜》卦之"畜"是也；"畜"之大者，则由物质因素向精神方面净化和升华，如《大畜》卦之言"蓄"是也。《大畜》之"畜"有三义：一为畜聚；二为畜养；三为畜止。关键在于蓄聚至德。人的道德面貌改变，品格高尚，克己为民，则为贤人；国有贤人，养之用之，则政治清明，国家大治；国家大治，则繁荣昌盛，物阜财丰，国库大有蓄积而民知其所止。国家有"大畜"的面貌，则距离太平盛世、安居乐业的时代不远了。即单就"畜聚"之义来看，也兼有物质与精神二方面的意义。如《穀梁传》庄公二十八年："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据《礼记·王制》所称引，"畜"作"蓄"。此"畜"明显是蓄积、蓄聚之义。国家仓库如果缺乏积蓄，没有粮食和物资，那么一旦遇到灾年或战争，则国穷民困，无可奈何。所以，《明史·朱升传》载："太祖（按：即朱元璋）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朱升所称"广积粮"，不仅是指粮食的蓄积，而且包括了以粮食为中心的一切作战物资。战国纷争，干戈扰攘，最后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的胜利，原因很多，非仅"地利形便"，更有"畜积殷富"的经济因素。因为从本质看问题，战争的胜负与经济力量的对比有关。而从精神角度看，如

《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颜师古注："畜读曰蓄。蓄，聚也。"所谓"畜德"，就是培养、积畜优良品德。其实，《大畜》卦所蓄之德，不仅指道德，而是泛指属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一切气质风尚诸因素。如《汉书·李陵传》称引司马迁之言："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

《大畜》的卦形是䷙，下乾（☰）为天，上艮（☶）是山，象征大有畜聚，广为畜养，畜健知止。《象传》分析卦象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按照《大畜》的卦形分析，艮上乾下，山居上而天在下，所以称"天在山中"。但一来"天在山中"，在现实生活中实在并无其事；二来《大畜》的大为畜聚，与"天在山中"有何关系？实在令人费解。因此，古往今来，多少《易》家争讼纷纭，这里只能择善而从。《周易集解》引向秀曰："止莫如山，大莫如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为大器，山则极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山能包容广大无边的天，当然所畜至大，无与伦比。但在现实生活中，山有体而天无方，山中怎能包天？朱熹《周易本义》的解释模糊空灵："不必实有其事，但以其象言之耳。"也就是说，这是《易》卦作者的虚设之象，用作譬喻，并非真有其事。如《乾》卦以龙为喻，但有谁真见过"飞龙在天"呢？这种解释较为合理。但清陈梦雷不同意朱熹的意见，说："天在山中，《本义》谓不必实有其事。然天包地外，地下有天，是即山中之天也。山中有天，所畜至大。君子以此多识前古之言，已往之行，以畜其德之大者。"（《周易浅述》）陈梦雷生活在康熙、乾隆的时代，所论是否与十七、十八世纪的西学东渐有关？从现代科学来看，地球是圆的，上下四周，为天所包裹，如果东半球的人说是天在山上，那么同一事实，在西半球人的立场看来，不就可以说是"地下有天"，"山下有天"了吗？天在山下，为山所畜，其畜伟哉，故称"大畜"。陈说新鲜，颇有启发，也可备为一说。

但是《象传》所说的"畜其德"，与"天在山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应该说，这是古代儒家对于《易》卦的一种理解。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韩诗外传》发挥说："仁者何以乐山？山者，万人之所瞻仰，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伏焉，生万物而不私，育群物而不倦，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有似夫仁人志士。此仁者所以乐山也。"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山已高度拟人化，并赋予了高尚的道德，无私的品格，宽广的心胸。天再大，也能包容在其坦荡无私的胸怀之中。这又进一步牵涉到后人对于卦德的深层分析。《彖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原来，《大畜》的下卦乾体阳刚劲健，生气勃发；而上卦艮属山而性为止，大山静止厚重，所以《彖传》称"笃实"。下乾劲健而上行，上艮笃实而止健。所谓"止"，不能望文生义，以为只是限止之

义，而有其更深一层的含义，借用苏东坡对于文学创作的描绘："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下乾生机勃发的劲健之气，如果一旦盲目弥漫，则可能在广大无边的天际中消失能量，怎么还能畜聚？为此，上艮大山之止健，就是非常必要的。须知健不止则聚不富，怎能达到"大畜"的境界呢？山的止健，正是下乾劲健之气"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保证。加以大山的宽广胸怀，下乾之健，虽"止"山中，仍然运行翻腾，动荡不息，变化万千。所以《彖传》称其"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陈梦雷解释说："笃实自有光辉者，盖畜于中而见于外也。以乾体之刚健，无人欲之私，艮之笃实，无虚伪之饰。则暗然日章，自有辉光，畜之不已，其德必日新矣。"（《周易浅述》）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中国的传统观念更重视精神世界的"畜德"。《礼记·大学》就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也引古语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誉"立德"为"不朽"的盛事。于此可见古人对于《大畜》卦义"畜德"的重视和运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还记载了范宣子在晋国当政，以诸侯盟主的权势，要求诸侯重金贡献，郑国不胜负担。于是郑国子产写信给范宣子，劝其改过立德："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按：子产名）也惑之……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后来范宣子真的接受子产的批评，改善外交，晋国威信大大提高。后世聪明的君主以此为鉴，很明白《大畜》卦"畜德"精神的深远意义。唐初魏徵曾给唐太宗指出："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其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建议，使《大畜》卦的"畜德"精义，光辉日新，终于迎来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彖传》称"畜德"为"大正"之道，实在对于后人很有启发。

卦辞曰："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不家食，指贤者离开家庭而走上仕途，食禄于朝。卦辞是说，《大畜》卦象征大有积聚，利于坚守正道，促使贤者乐意出来为国家服务，这样必然吉祥如意，利于涉越大河，克服险难。如果说卦形卦象所示，主要是"畜聚"之义，那么卦辞则重在"畜贤"之义的阐述，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已有大畜之资，当须养顺贤人，不使贤人在家自食，如此乃吉也。"不谈往古，就说现在，一旦遇上凶年饥岁或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或大公司大企业，不也常常大量裁员，造成大量的失业队伍吗？而在声势浩大的失业大军中，就包括了许多方面的有用专业人才——也即《大畜》卦所称"不家食"的贤者。贤者"家食"——回家吃老米饭，就现代社会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道理很明显。因此，"畜贤"的前提是"畜聚"，没有大有积聚的丰富物质基础，心想"畜贤"，但却可能贤人外流，到国外为他人服务去了。现代社会中很多此类现象。但先有物质方面的大有"畜聚"还不行，还必须

进一步实现精神上的“畜德”，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就无法坚守正道。道不正而良马却步，贤人也只好“家食”去了。如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一度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杜甫《忆昔》），从物质财富方面看，可说是大有“畜聚”了吧。但当时的统治者骄奢淫逸，采取的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李白《古风》十五）的政策，奸相李林甫竟恬不知耻地称为“野无遗贤”，用谎言来掩盖贤人“家食”的可悲情况和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爆发的安史之乱，即与统治者骄横失德，贤人失志“家食”有关。后世的历史教训，证明了《大畜》卦辞“畜贤”精神的重要。所谓“不家食”，就是贤人不畜于家而畜于国，贤人当政，国泰民安，心心相印，精神快乐，因而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人人提高了为国家和民族作奉献的自觉性。有了这种自觉意识，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至为吉祥。人人团结，相互帮助，力量壮大。当然就有利于克服矛盾越险涉难了。所以《彖传》解释卦辞大旨时说：“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所谓“应乎天”，也就是说，养贤为国，合乎天道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

下面分析爻象爻辞。

初九，有厉，利已。

已，止也。爻辞是说，初九，有危险，暂停前进则利。从爻位爻象看，初九处下乾之初，乾体刚健，初九位正，上与四应，按照他卦之理，位正而阴阳相应，该是吉爻。但爻辞却称“有厉”，为什么？原来，与一般《易》卦取阴阳相应为吉不同，《大畜》卦处大畜之时，卦形卦象显“畜德”之义，卦辞示“畜养”之义，而爻象爻辞则重在“畜止”意义的阐述。下乾三阳刚健锐进，为上艮所止，不止则不畜不聚。故下乾三爻以“自止”为利，上艮三爻以“畜止”为吉。初为四所畜止，二为五所畜止，只有三与上二爻，畜极而通，不必言止而道路畅通自有吉利。

初九为六四所畜止，若恃刚健而锐进不已，超越范围，不止于所当止，必有危难。故爻辞称“有厉”，明确指出了利于暂时停止前进。就以现代家庭煮饭的高压锅来说，加热使蒸汽能量的畜聚保持在适当的压力下，合于“自止”和“畜止”之义，如果不顾一切条件，拼命加热加压，则可能因气压太强而产生爆炸，不仅能量消散而不聚，而且有锅毁人伤之虞。这不是“有厉”是什么？在此情况下，只有暂停加热加压，才有利于把饭煮好。所以《象传》称“有厉则已，不犯灾也”，也就是说，初九有“自止”之明，就能顺利地完成“畜止”而不遇灾难。

九二，舆说輹。

说，通“脱”。輹（fú），车厢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头，亦称钩心木或伏兔，车行时缚于轴，止则脱，暂止旋起，在人操纵。爻辞是说，卸脱车輹，暂时

停止前进。《小畜》卦九三有“舆脱辐，夫妻反目”的爻辞，明显是凶爻。辐为车轮条辐，一旦脱散，则轮不成轮，无法继续行车。但《大畜》九二的“舆脱輹”，则不过是因等待时机而暂时解缚停车而已，二者性质不同，当然吉凶有异。从爻象看，九二处下乾之中，居阴柔之位，刚能下人，如程颐所释：“二虽刚健之体，然其处得中道，故进止无失；虽忠在于进，度其势之不可，则止而不行，如车舆脱去轮輹，谓不行也。”暂时不行，正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前进。所以《象传》说是“舆脱輹，中无尤也”，也就是说，九二对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时势，心中明白，审时度势，决不冒进，所以不会犯错误。“脱輹”之举，符合“畜止”的需要，因而是一个吉爻。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爻辞是说，九三，良马奔驰，相互追逐，利于牢记艰难而坚守正道。应当努力熟练驾驶车马和用以防卫的技术，才有利于前进。所谓“良马逐”，按照京房《易传》解释，是指“进贤人”，他说：“经曰‘良马逐’，逐，进也。言大臣得贤者谋，当显进其人，否则下相攘（郄）善，兹谓盗明，厥咎亦不嗣，至于身僇家绝。”（见《汉书·五行志》）如果国家不是举贤授能，为“良马”的自由驰骋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无道者必相攘争，天下大乱，以致招来身死家灭的严重后果。从爻象看，三位“多惧”，所以爻辞有“利艰贞”的告诫。又九三与上九，二阳爻相斥无应，在一般卦中为凶咎或有悔；但在《大畜》卦中则不同。九三处下乾之上，上九居全卦之极，都一样是处在矛盾转化、畜极而通的时候，所以九三爻辞不言“畜止”，而言“利有攸往”，因为三与上两个阳爻，上下“合志”，如程颐所说，是“不相畜而志同”。上九的“何天之衢”，大路畅通，不正为九三的“良马”竞逐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了吗？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牿（gù），缚在牛角上使牛不能触人的横木。爻辞是说，六四，小牛未长角而预先加牿，至善至祥。从爻象看，六四已从下乾升到上艮之初，从自止其健转为畜止乾健，态度和立场已有变化。六四位正而畜初九，有防患于始，禁恶未萌的意思。六四互九三，六五为震卦（☳），震有木象，故爻辞称“牿”。又六四变而为阳刚，则上卦化离（☲），离有牛象，六四应初，则其牛为“童牛”。爻象与爻辞“童牛之牿”相符。按：防患于未然之时，不仅出力少而收效易，而且见其深谋远虑，足与共谋大事，所以爻辞有“元吉”的叹美之辞。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fén），阉割过的猪。爻辞是说，猪有利牙，经过阉割去势，则性温和而容易制约，吉祥。六五居全卦中位，其所畜止的对象是九二。九二与初九不

同，初如童牛无角，防患于初为力易；九二则其劲健已进，止之于动态之中较难。但六五以柔中居尊，柔能克刚，所以善于寻找机会来加以制约，猪性刚躁而动，附以利牙，则势难制。但六五巧妙地实施阉割去势的手术，势一去则猪躁自止。这比喻是说考虑问题，应从根本出发，这样就会畜有所止，功德圆满。所以《象传》说："六五之吉，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这里作惊喜的感叹词。爻辞是说，上九，大路通天，何其畅达！亨通。上卦艮有径路象，下卦乾为天之象，所以爻辞以"天之衢"为喻。上九处《大畜》卦之极，处于畜极而通的态势。对于下乾三阳，始加畜止，现在则止势已消而天路畅通，自由驰骋，势出自然，怎能不令人惊叹呢？所以《象传》说是"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全卦"畜德"、"畜贤"、"畜止"之义，到此功德圆满。畜极而通，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事虽出于理数之自然，但同时也包含了人的主观努力的因素。

综观《大畜》卦，有几点引人深思：第一，《象传》和《彖传》据卦形、卦象和卦辞作出了"畜其德"、"辉光日新其德"的阐释，对后世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很大。要国富民强，必须"畜聚"，除物质之"畜"外，更必须"畜德"。它启发后人，改造世界，首先必须注意人自身及其心灵的培养锻炼。因此，提高民族的精神素质，加强思想教育，对于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国前期封建社会的迅速发展，曾站在世界文化的峰巅，与文化观念的进步有关。但发展到后期封建社会，后儒片面认识《大畜》卦的精神，扭曲了"畜德"的实际意义而把它绝对化，似乎有了主观之"德"，就可以无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建设。这必然受到历史的报复，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正是对于片面培育封建道德观念的一种反动。第二，"畜贤"的精神，又提醒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要举贤授能。在国家有了既定的方向路线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贤人"政治，关系到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因此，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培养和大胆起用"贤才"是时代赋予的任务。第三，人要健康，事业要发展，就必须培养阳刚劲健的正气。但是充满正气，还要进一步善于引导。不然，气太足了，皮球也会胀破的。"畜止"的精神值得深思，人都有一股气，要求实现人的主体意识，但这股气只有经过"畜止"之后，才能达到"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自由新境界。唐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畜》的"畜止"精神，与王之涣诗所寓的深邃哲理息息相通。

颐

卦第二七



颐养以正颂声兴

《颐》卦第二十七，在《大畜》卦之后。《序卦传》说：“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意思是说，事物经过了大有畜聚的发展阶段，从精神到物质都很丰富，可以施用于颐养之道，所以《大畜》卦后有《颐》卦。“颐”就是“养”的意思。“颐养”连称，在古代早已成为广泛运用的词汇。《孟子·告子》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养”“不养”，性命攸关。“颐养”有道，不仅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而且也客观地存在于天道自然中。世界文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能源的变化。但不管何种能量，世界的能量无不来源于太阳的光和能，太阳光对地球的照射，就是对于地球的颐养。反过来说，人类对于自然能量的保护和使用，也就涉及到地球的“养生”问题。又如山区水库的发电，没有江河及雨水汇入山间水库，水库缺水，水位不高，则水的势能怎能变为电能？水不断汇聚水库，对于水库电站来说，是它赖以存在的生命源泉。还有，保持环境的生态平衡，无疑是符合自然事物发展的“养生”之道的。因此，研究天道自然的颐养之道，对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斗争与和谐，必将大有益处。而就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所谓“颐养”，实际上就是扩大了的人类“养生学”，又可分为物质生活的颐养和精神风尚的颐养两大方面。如汉时鲁匡说：“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见《汉书·食货志下》）这是指生活物质方面的颐养。又如汉末马融《广成颂》云：“夫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腑脏），颐养精神，致之无疆。”（《后汉书·马融传》）这是指精神方面的颐养。心平气和，不过泰过甚，心理健康，有利于生理方面的“平和府藏”，精神愉悦，有利于身心健康和长寿。可见精神的颐养与物质的颐养，又

可以互相转化。而一旦进入阶级社会中，人的“颐养”，又可有上养下和下养上的区别。古代的统治者一贯以“民之父母”自称，治民称“牧民”，以牧民牧养牲畜，以喻人君养育治理百姓。州县长官称“牧宰”，也是上养下的意思。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已成了一般士人的共识。但也有少数有识之士，另有精光灼见，如宋王安石《再上龚舍人书》曰：“百姓所以养国家，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唐柳宗元说得更清楚，他在《送薛存义序》中说：“凡吏于土者，若（你）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他一反士大夫那上养下的传统观念，认为老百姓交租纳税，就是拿他们生产的物资和钱财来供养官吏，雇佣官吏来为老百姓办事。但遗憾的是，官吏擅作威福，忘记了自己是民之“仆役”的职责。这是下养上的观念，在古代确是振聋发聩的伟论。当然，《易》卦作者的思想观念，限于时代局限，还不可能达到柳宗元等的先进水平。

《颐》的卦形是䷚，下震（☳）上艮（☶），象征颐养之道。颐，古文作“𪏭”，但依《说文》段玉裁注，其字形应当横过来看而作“𦐇”，则是口上、口中、口下之形，清楚呈现，指口辅车，也即口腮，以口腮咀嚼食物，来比喻食物养人。从卦象看，上艮为山，下震是雷，《象传》解释说：“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下震一动，春雷鸣而万物复苏以求养；上艮之山，广大无所不包而具养生之畜。我们在分析《大畜》卦时，就曾称引《韩诗外传》，说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山，是“生万物而不私，育群物而不倦”的神圣象征物。因此，“山下有雷”，正象征万物求养而得其所养。但是，君子观《颐》卦之象，为什么悟到了“慎言语，节饮食”的道理呢？原来，“颐养”有其客观规律，“节饮食”从自然角度来谈人类的养生，饮食无节，则营养再丰富的食品，也会化为损害健康的“毒药”，消化不良，逐步加深，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慎言语”，是从社会角度来谈人的生存和发展，明冯梦龙《古今小说·沈小官一鸟害七命》这篇小说，曾经感慨地说：“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因为言语不慎，导致灾祸临头，生命不保，还谈什么养生之道？所以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一再告诫子孙说：“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言多必失”这种思想早已有之。据《孔子家语·观周》篇记载，孔子曾入周太祖后稷的宗庙，看到庙堂右阶之前有一个铜人，“三缄其口，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所谓“三缄其口”，就是在铜人嘴上贴了三张封条。孔子看后，大发感慨，对学生说，“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古之“慎言”，与“山下雷”的卦象有某些共同之处。山下之雷与天上之雷不同：天上雷肆无忌惮，威赫猛烈；山下雷则动知所止，不过甚而万物以养。言语饮食出于颐（口腮），如山下雷动，“慎之节之，法艮之止也。慎言语所以养德，节饮食所以养身”（陈梦雷《周易浅述》）。所谓“节”与“慎”，不过是个比喻，说明“颐养”之道，虽是出于天然，但必须合乎规律之“正”，才能确保其生养和发展；反之，言不

“慎”而行不“节”，则违背颐养的“正道”，必遭自然的报复和历史的嘲弄。不过，像朱柏庐那样来谈“慎言语”，缩小了人的主体意识，把人变为谨小慎微的“君子”，这理解并不一定符合《易》卦精神。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还是唐太宗说得精彩，他认为“非虑无以临天下，非言无以述虑”，言语作为表达人们心态的工具，非常重要。但有的人因帝王将相之尊，高谈阔论，“轻物骄人”，这样的言语只是自欺欺人，有害无益。他在贞观二年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八年又说：“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见《贞观政要·慎言语》）所举的事例很生动，随便一句话，立即劳民伤财，送来了五百车的萤火虫！像唐太宗这样从积极方面来理解易卦精神，确是出类拔萃的“养德”之举，载入史册以为规训，很有必要。

从卦德分析，震性为动，艮性为止，下震求养于上而动，上艮致养于下而止其所动。能令在下求养者知止而不动，非饱暖其口腹不可。这就涉及到下求养和上养下的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在土地改革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又曾在调整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中，提出了到底是“谁养活了谁”的问题，从传统的上养下的方面，一反为下养上的方面。这是后话，说明了易卦有关“颐养”的阐说，仅是涉及这一问题的某一方面。但仅就这并不完整的方面来看，还是有很多问题启人深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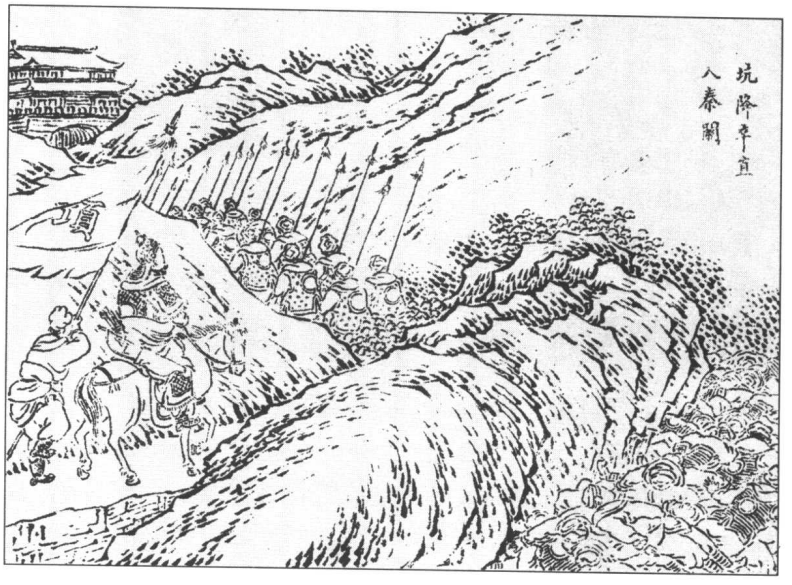
卦辞曰：“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口实，人们口腹每日所需的食物。卦辞是说，《颐》卦象征颐养之道，坚持正道得之则获吉祥如意，从观察颐养的现象中，人们自然明白，求温饱而养身体，自有其客观规律。言外之意，包含了不以其道得之，君子不食的意思。这就从一般的身体养生，进一步发展到精神的养生——即养德育人。元曲武汉臣《玉壶春》（第一折）一开场就说得通俗明白：“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要颐养，就必须吃饭，那么就免不了为获取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而奔波。就是出外做官，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生活。所以晋陶渊明在《归去来辞序》中叹息道：“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为了“口腹”之需，不得不供人驱役。可见人睡醒后眼睛一睁，首先就要考虑颐养的问题，不管是思想家也好，政治家也好，都要首先考虑并力图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宋明理学家对寡妇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实在不通之极。守寡违背人性欲求，能算什么“气节”呢？人都饿死了，还谈什么“守节”不嫁！这种迂腐的高谈阔论，如果让这些理学家几天不吃饭，看他“高调歌”怎么唱法！楚汉相争，郦食其说刘邦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刘邦接受了郦食其



■陶渊明像

的意见，派丞相萧何留守关中根据地，大力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终于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打败了强大而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统一了中国。由此可见，政权要巩固，社会要太平，首先就必须考虑“民以食为天”的问题，让百姓吃饱饭，才能进一步安定和发展，这是每个聪明君主都会想到的。晋末的陶渊明，人称“隐逸诗人”，可他却想得很实际，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稻》诗中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吃饱穿暖，并非小事，而是人类“养生”的大问题。今天，我们的政府，不是还在为十多亿人民的温饱而操劳吗？不考虑人民的“颐养”，不问人民的温饱，而空唱“高调歌”，不是愚蠢是什么？项羽不唱“高调歌”，他根本只想夺取自己的权力，而不去考虑“民以食为天”的问题，所以史书记载，楚军过处，地方残破，甚至野蛮地屠杀全城百姓和坑杀降兵。这样，他败在刘邦之手，就是势在必然了。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某些封建士人猛醒，明代于谦，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虽然最后为复辟的明英宗所害，但他曾有《咏煤炭》诗以明志：“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于谦保持了他高尚的气节，为人民所支持和爱戴，他那为人民的“饱暖”而奋斗的事迹，永垂史册，牢固地留在中华儿女的心中。而杀害于谦的刽子手呢？永远被历史所唾骂。“颐养”正道，内容丰富，大有文章。这些虽是后事，但符合《易》卦的精神。《彖传》早就说过：“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养之时大矣哉！”《彖传》的解释，强调“养正则吉”，对后世很有启发。所谓“养正”，不仅自养有“正”的气节问题，就是上养下也有“正”与“不正”的问题。《礼记·檀弓下》载：“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屨，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黔敖）从而

谢焉，终不食而死。”富贵者骄人而食饿者以“嗟来之食”，养之而不以“正”，带有蔑视和恩赐的眼光，而非平等尊重的无私奉献，怎能不叫人愤恨呢？解放前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是否与易卦“养正”的精神相通呢？“养”而得其“正”，天地万物，贤人百姓各得其当养，当然人们会惊叹颐养的时义是多么无私而伟大啊！



■坑秦卒项羽入关

下面分析爻辞爻象。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朵颐，吃东西的样子。爻辞是说，初九，舍弃自己的灵龟，而贪婪地看我吃食，有凶险。《颐》（䷚）的约卦是《离》（☲），保持上下二阳，中间四阴合而为一，则化《颐》为《离》。《离》卦有龟象，所以《颐》卦初九以灵丘为喻。灵龟，因其新陈代谢缓慢等特殊的生理功能，寿命很长，可活几百年甚至近千年，所以古人视为灵圣之物。据载灵龟可以长久不食地生活着，这就有利于自养，吃得少而活得长，启发了人们的“养生”思路。但是人们为什么要丢掉自己那灵龟的美质，去贪婪地求人之养呢？从爻位爻象看，初九处下震之初，六四代表爻辞中的“我”，初九急于上应六四以求食。阴阳互应，在一般易卦为吉象；但在讲究“养正”之道的《颐》卦之中，则化为凶。因为根据古代的历史事实，不能自养而求人以养，而求之又不以正道，无法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当然就呈凶象。《孟子·离娄下》有《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通过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把丈夫去坟场乞酒食，回家后“骄其妻妾”，最后被妻妾揭穿，勾勒出一个无耻小人形象，辛辣地讽刺了古代社会中那求养不以其道，为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的言行。这种人舍弃和背叛了自己的阳刚美质，企求不劳而获。“观我朵颐”，乞分一杯残羹，这不是凶相毕露又是什么？所以《象传》说：“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壮哉明灵家人唉延龄福之基始举开图并革昌虚民渐如好丰恭觉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颠倒。拂，违背。经，常理。丘，指上九居全卦之高位如山丘。爻辞是说，六二，颠倒了颐养之道，向下索养，违背了常理，又急于向上九索取颐养之资，前进必有凶险。从爻位看，六二处位中正，该是吉爻，为什么反呈凶象呢？因为《颐》约卦为《离》（☲），六二是口中食物，本有自养之资，但它违背常理正道，而盲目地向上下索取颐养，自己抛弃了中正可养之势，反而卑躬屈膝于不中（初九）无位（上九）之爻，“嗟来之食”，岂是好吃的？此所以为“征凶”。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爻辞是说，六三，违背了颐养的正道，应该坚持正义以防避凶险，十年里不要出外施展才能，这时妄动必然没有什么好结果。处下震之极，目光直盯视上艮之卦，处矛盾转化的“多惧”之位，阴处阳位而失正，又有过中之误，急于求应上九之养，颐养失正，所以爻辞劝其改邪归正，守正以防凶险，如果盲动躁进，不为上艮所止，则“无攸利”，呈凶象。所谓“十年勿用”，不是如战争的最后通牒一样，机械规定时间，而是比喻其所养失正，中毒颇深，该很好闭门思过，深刻反省。所以《象传》说：“十年勿用，道大悖也。”痛改前非，所需时日当然就长了，所以用“十年”来加以形容。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逐逐，必欲得到的样子。爻辞是说，颠倒地以阴养阳，吉。在下者求养时虎视眈眈，在上者顺其所欲，逐逐然致之而来，必无咎害。从爻位爻象看，六四处下艮之初，阴居阴位得正。按卦理，以阳养阴，以上养下为顺。现在六四下应初九，以阴养阳，所以称“颠颐”，但是六二爻辞“颠颐”为凶，六四同一“颠颐”，反而获“吉”，什么道理？原来，《颐》的下卦三爻象征下求养于上，不能自养而求养于人，已有凶象，更何况六二是“颠颐”之养呢？上三爻则以养人利物为吉，以四养初，原是既顺且正之事，虽然以阴养阳，人视为颠倒，但实际则吉。六二与六四所处爻位不同，态势各异，所以同样爻辞称“颠颐”，但实际内容不同，六二求养于人，其志在物；六四以养人利物为己任，其志在道，《象传》说是“上施光也”，称颂居上者下施光明恩泽，所以一则以凶，一则以吉。这就是古人所谓“《易》无达占”的又一生动例证。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爻辞是说，六五居君位而赖上之养，有悖常理，安居守正可获吉祥，不可以涉河越险。从爻象看，六五虽然处君位，但阴柔失正，又无下应，只能依赖上九之养而养天下，以阳补阴，致贤利民，志在天下万民，为“养之正”，所以爻辞

称“吉”。但阴柔力弱，无阳刚之势，所以又告诫它“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颐，由他而得其所养。爻辞是说，上九，天下依赖他的努力而各得其养，知危慎行，可获吉祥，利于涉河越险。上九处《颐》卦之极，虽然其位失正，但秉其阳刚之质，志在天下，知难而进，所以爻辞称“吉”。又上九位置太高，经常引起君主的怀疑或猜忌，因而爻辞又称“厉”。“厉吉”二字，正说明了上九的性质。如前所述，刘邦在楚汉战争和面临诸侯反叛的危急之秋，经常把关中根据地（包括都城长安）托付给丞相萧何，萧何大力整顿社会，发展生产，人民以养，国家始安。但丞相之“由颐”，引起了帝王的猜忌和怀疑，刘邦以“关心”为名，派卫队监护萧何，并在凯旋回京后不久，把他投入大狱。后虽释放，但萧何诚惶诚恐，不得不“徒跣谢”（《史记·萧相国世家》），个人之厉，国家之吉。如果没有萧何经营关中，百姓缺衣饭，军队不果腹，刘邦怎能统一天下呢？所以连刘邦也公开承认，汉朝开国，群臣之中，萧何功劳第一。这是“厉吉”的生动事例。如唐代安史之乱后，李泌出任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宰相，明知君主昏暗，但为挽救国家，只能知难而进，蹈“厉”而行，天下“由颐”，最后功德圆满，所以称“厉吉”，“吉”前加“厉”，说明任重道远，历尽艰险，其所贡献，超越一般。

总之，《颐》卦所提倡的“颐养”，包括了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虽然远非十全十美。但《彖传》据卦形卦象和卦爻辞，总结出“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的精神，从颐养或养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方法，加以精约的概括和说明。所谓“观其所养”，就是承认养生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可寻；所谓“自求口实”，则是从追求和探索养生功效方面来肯定主观努力的重要。养生之道，就包括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后来孟子说：“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古代社会中的开明人士，无不注重“颐养”的研究与实行。另外，《彖传》据卦理而提出了“养正则吉”的精神，对于后世中华文明所高扬的凛然气节，影响很大。不管是自养或养人，都有“正”或“不正”的问题。不以“正”得之，饿死而不为，“嗟来之食”，君子耻之。西方宗教也有差不多的说法。如《旧约全书·传道书》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富，欲不容他睡觉。”劳动者得食以正，虽是粗茶淡饭，分外甘甜。我国孔子也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学而》）而剥削者所食丰厚，但养不以正，敲骨吸髓，怕人报复或算计，所以睡不安稳。可见在“养正则吉”的问题上，中外精神相通。古人以为，理解和实行颐养之道，则为王道乐土奠定基础。崔篆《易林》为《颐》卦作诗云：“家给人足，颂声并作。四夷宾服，干戈卷阁。”“颐养”的意义是多么伟大啊！

大过

卦第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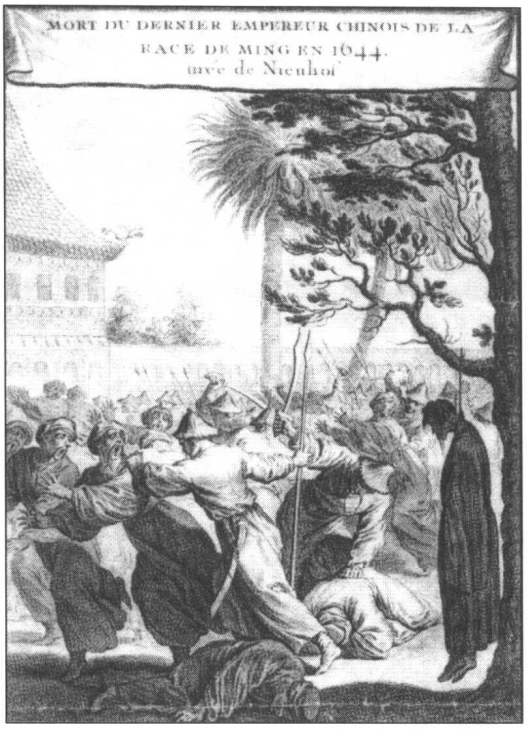


“大过”乱世育英才

《大过》卦第二十八，在《颐》卦之后。《序卦传》说：“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意思是说，没有丰富的颐养，就不可能有所兴动和作为。所以《颐》卦之后就有了《大过》卦。按照《序卦传》的理解，“大过”就是大有过人之处的意思，如《周易折衷》称引姜宝的解释：“无所养则其体不立，不可举动以应大事；惟养充而动，动必有大过人者矣。”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人民食不果腹，国家想要兴办什么大事，那么基础必不牢靠。就是打仗，也必须吃饱饭才有作战能力。三国时曹操作战，就善于断绝敌方粮道，敌军没饭吃，还能有什么兴动和作为呢？粮草一断，无疑地不战自乱。所以古时的战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而后动，大收非凡过人之功。目前的海湾战争，炮火纷飞。但在开战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给士兵加工资，每人每月增加约一百六十美元，而多国部队的主力美军，也大大增加前线士兵的生活补助费，这是为什么？莫非也是养而后动，希望自己的部队在战争中有过人的表现，建立不朽的功勋。但是，就我读《大过》卦的体会，“大有过人者”，并非本义，而是《易》卦精神的延伸和发挥，《大过》卦之“过”，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之“过”（见《论语·先进》）。意思是说，做人做事要适中，合乎中庸之道。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颛孙师（子张），一个叫卜商（子夏），前者有些过分强猛，后者则有些拘谨不及，学生们问老师，谁强一些？孔子就以“过犹不及”回答，认为都有缺陷，不合乎中庸之道。以驾驶汽车为例，从空间占位论，方向盘不断左转右旋，目的就在于保持“中道”行驶，以保证汽车在规定的行车道上奔驰。而从时间角度看，在现代高速公路上行车，车速过快，容易出事；车速过慢，则不符合高速公路的行车要求，影响了随后一长串车辆的正常

行驶。于此可见“过犹不及”的正确。但是，《大过》卦不仅有“过”，而且“过”前有“大”的附加形容词，构成了“大为过甚”之义，这不就表明了自然或社会正处于一个“大为过甚”的大动荡年代了吗？从传统观念看，处于大动荡的混乱年代中的人们，如能持中守正，那么“大过”之时，也正是人们大有作为的最佳时机。古人说“乱世出英雄”，合于《大过》卦理。三国时争战不息，曹操、刘备、孙权等一代枭雄并出，都成为老少皆知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其实，不仅是政治人物，如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人文荟萃，不管是儒、道、阴阳、名、法，还是墨、兵、纵横，无不成为名彪青史的大思想家。他们都是在“大过之时”建立了非凡成就的人物。所以《彖传》在称颂《大过》卦理时叹美道：“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过》的卦形是䷛，下巽（☴）上兑（☱），象征大为过甚。从卦象分析，在八卦所象征的自然物中，巽的象征物为风为木，兑的象征物为泽。《大过》卦中的下巽象征树木，上兑象征大泽。本来泽为水，滋润树木，树木以长。但《大过》的卦象，是树木在大泽之下，被大泽之水所淹没，这早已超越了滋润树木以保证其生长的正常范围，构成了灭顶之灾的“大过”之时。湖泽之水滔天，树木浸没其中，过多过久过甚，树木怎能正常生长？所以《杂卦传》说：“《大过》颠也。”颠，颠倒。生活的颠倒，的确是非常时期。《象传》进一步说：“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卦象启迪了人们的哲学思考。《大戴礼记·礼察》引《易纬》说：“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之千里。”这与今人所说“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谬误”，自然合拍。“差若毫厘”的过失，就会导致“谬之千里”的严重后果，更何况是“大过”呢？“大过”比“过”离真理更远。因此，处于“大过之时”的“圣贤”或“君子”，要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为正，怎能不花力气，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呢？《象传》所说的“独立不惧，遁世不闷”，并不是鼓励人们逃避现实斗争，隐匿于象牙塔内自在逍遥，而是强调在大动荡的乱世之中，处“大过”之时，要有面对现实独立思考和积极斗争的勇气。如程颐所说：“君子观《大过》之象，以立其‘大过人’之行。君子所以‘大过人’者，以其能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天下非之而不顾，独立不惧也；举世不见知而不悔，遁世无闷也。”试想，处在大动荡的年代中，特别是在战争紧张阶段，如果一切按太平时期的常规办事，步步都要请示汇报再有所动作，行吗？敌军已越过前线，一场惨酷的白刃战即将大规模展开，这时再向千万里之遥的皇帝请示，来得及吗？明朝末年，中央朝廷与后金（即后来的清）对抗，从军队数量、武器装备、粮秣辎重及经济力量等等，无不优于后金；从指挥战争的统帅来看，如熊廷弼、袁崇焕，皆为优秀的军事家，不仅擅长战略思考，且善于战役战术安排。但从整个战争的发展进程看，明军却节节败退，后金骑兵取积极进攻态势。因为明廷腐败无能，崇祯帝猜忌统帅，自毁长城，每次作战计划，都要取圣旨而后行，而皇帝又不明了前线的具体情况，



■崇祯帝吊死煤山

怎能不自取灭顶之灾呢？处“大过”之时，而不许出“大过人”的贤才，不准“独立不惧”地真正思考，终于把崇祯皇帝送到景山上吊的绳子里。但是此前不久的宰相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实行了十年的改革。当时土地兼并，赋敛无度，国防废弛，生民涂炭，形成了国家与民族的严重危机。处此“大过”之时，没有非常之人（即“大过人”）出来收拾残局，力挽狂澜行吗？在他当政的十年间，改革措施的确行之有效，明王朝的内忧外患渐次平息，国家相对安定，经济也有发展，当时国家仓库的粮食可支十年之用，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明代中叶以后，只有张居正执政的十年是较清明富强的时代，在此前后，都是乌烟瘴气，混乱黑暗。但当时顽固派煽动舆论来反对他，御史刘台弹劾他“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罪莫大焉，迫他辞职。但张居正到底是“大过人”，必有“大过人者”的非凡举动，他在父亲去世后，不循例丁忧三年，而是拒不辞职，坚守岗位，他更在《独漉篇》中大声怒道：“欲报君恩，岂恤人言！”按：这里的“君”，不仅指皇帝个人，而且是整个封建国家的象征。因为有了张居正“大过人”的改革，为晚明王朝延续了数十年的生命。后来在张居正死而万历皇帝亲政以后，一切与老师张居正对着干，凡是张居正的一切作为，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推翻。同时也就葬送了大明江山。亡明者，非清也，而是在“大过”之时坑害“大过人”的朱明王朝自己！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程颐从“举世不见知而不悔”的积极方面来理解“遁世无闷”，确是真知灼见。

从卦德看，下巽性为入，为驯顺，上兑德为悦，象征驯顺上行而入，而终获喜悦。处“大过”之时，一切都在动荡变化之中，主要毛病在于阳刚太盛而“过”，阴柔不胜负担，因而阴阳失去平衡。所以处此非常时期，如果不是有的放矢，则可能因“过”之“大”而败事。《彖传》所说的“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就是针对“大过”的特殊环境而言。这时办事，谨防阳刚之气太盛和急躁冒进，须济之以阴柔，从另一侧面积极强调阴柔方面的作用，以便刚柔相济，补救“大过”之时弊。所以下巽（☴）上兑（☱），都是阴卦，全卦以上下二阴爻为主，帮助中间四阳去刚去躁。犹如医生治病救人，不可滥用凶险之药，

而应顺其物性而药石以入，循序渐进而药到病除，病体康复，自然喜悦。刚柔相济，阴阳相通，为自然救“过”之验方，所以利有所往而“亨”也。

卦辞曰：“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卦辞是说，《大过》卦象征大为过甚，栋梁弯曲，不胜负载；利于有所前往，亨通。《大过》卦下巽上兑，据《说卦传》：“巽为木……为绳直，为工”，象征工人执绳直以锯木为栋梁，“兑……为毁折”，则有栋梁桡曲之象。所以卦辞据卦象而设喻，加以类比。从建筑学的角度看，建造房屋宫殿，栋梁非常重要，俗话所说的“上梁不正则下梁歪”，栋梁不正，已是严重的缺陷，威胁到屋顶的稳固，更何况是“栋桡”呢？栋梁弯曲，是超负荷而不胜其载的现象，该列为危险房屋，此所以为“大过”。又《大过》卦形，上下二阴爻，中间四阳爻，约四阳为一，保持初六、上六二阴，则约卦为坎（☵），坎象征险陷，也有毁灭之义。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栋桡”是包含了很大的凶险；但卦辞却偏说“利有攸往，亨”，凶中有吉，为什么？原来，“大过”则过（即罪过、错误）大，“栋桡”之毁，坎陷之难，危莫大焉，根本不允许人们停步不前。胆怯怕事，被灾难或过失所吓倒，不仅是无所作为，而且更严重的是将丧失宝贵的生机。比如，被困在发生火灾的房屋中，是坐以待毙，还是积极行动以救人自救？卦辞的“利有攸往，亨”，指的是补弊纠偏、挽危图存的积极行动，而不是肝胆俱丧、坐以待毙的消极等待。处“大过”之时，事物反常，亟待整治，没有积极的非凡气魄与过人之举，怎么行呢？所以王弼注说：“是君子有为之时也。”朱熹《周易本义》则据卦体具体指出“四阳虽过，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说（悦），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下面分析爻象爻辞。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jiè），以物衬垫。爻辞是说，初六，在祭礼时，用洁白的茅草来垫放祭品，必无咎害。从爻位看，初六阴处阳位失正，并非吉象，为什么偏获“无咎”呢？因为它是《大过》卦的初六，处“大过”始萌的非常时期，如果阳位得正而奋亢上行，一开始就向大有过错方向滑行，则将为后来者带来严重的灾祸。相反，初六阴处阳位，谦顺絜诚恭敬以从事，则将补过救失，兢兢业业，扭转方向，使事物沿“大过人者”的积极方向转化。《系辞传上》称引孔子解释初六爻辞的话：“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可用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见解精辟，启人至深。爻辞以祭祀用物为喻，因为祭祀在古代是很重要的事。而白茅，恰恰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微薄不值钱的常有之物。然而只要其心絜诚敬慎，所用恰到好处，那么以白茅垫放祭祀供品，不是起了重要作用了吗？在世界上，要纠正过失，挽救危难，并不是只依靠少数人就能成功的，而必须调动和发挥众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人的资质禀赋不同，所受教育各异，能力有大有小，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

个人不问能力大小，他对国家和民族所作的奉献是虔诚肃敬、洁白无瑕的，那么他就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孔子释爻辞，不可能有现在群众观点的意识，但却启发我们向这一积极方向去思考问题。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稊（tí）通“荑”，树木新生嫩芽。女妻，年青的妻子。爻辞是说，枯槁的杨树逢春发新芽，老头子娶了个年轻美貌的妻子，无不有利。爻辞中的两个比喻很生动。从爻位爻象看,九二阳处阴位失正，上与九五无应，该呈凶象，为什么爻辞反称“无不利”呢？关键在于《大过》是个颠倒阴阳的非常环境，所以《杂卦传》说“《大过》颠也。”阳虽为过，但处阴位而得谦柔之助，加以其位适中，与五无应而不急于上行，抑刚之躁而兼阴柔之性，下与初六阴阳互比，刚柔相济，所以有吉象。司马光《温公易说》称：“《大过》刚已过矣，正可济之以柔，而不可济之以刚也。故《大过》之阳，皆以居阴为吉，而不以得位为美也。”枯木逢春，重现生机,其“美”可知。又九二如“老夫”，初六似“女妻”，又是一桩美事，从现代眼光看，老夫少妻，实属不配。但古代社会以男子为中心，在贵族男子看来，“老夫得其女妻”，稚老匹配，以阴济阳，当然无往而不利了。如王弼所说：“老则过枯，少则过稚，以老分少，则稚者长；以稚分老，则枯者荣：过以相与之谓也。”也就是说，老年人成熟了，但思想容易被经验所限而偏于保守，青年人勇于怀疑与进取，但不成熟而易盲动躁进。现在老少相配，趋于中道，不刚不躁，稳于进取，所以行无不利。

九三，栋桡，凶。

爻辞是说，九三，栋梁弯折，有凶险。一个“凶”字。触目惊心。从爻位爻象看，九三处位虽正而不美。因为它居下巽之上，处上下卦位转化的位置，阳刚妄动躁进，急于上应上六，阳气太盛，过刚必折，在《大过》之时，违悖中道，拂于中心，而一味孤行，不呈凶象，可能吗？这犹如已无栋梁之才而强占其位，本弱而“栋桡”，将有屋塌人亡之灾，事出自然之势。如南宋宁宗朝开禧初年，宰相韩侂胄专政，欲以北伐收复失地以建非常之功，立万世之名，大方向当然还是正确的。但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加以当时如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兵部侍郎叶适等著名抗战派极力拥护，于是盲目兴师伐金，结果大败而归，如史弥远所称：“自兴兵以来，蜀口、汉、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胜计，公私之力大屈。”南宋朝廷不得不割地、赔款、函韩侂胄之首以谢金人，耻辱之盟，祸及子孙。抗战北伐，凛然正气，心志可嘉。但处“中原沦陷且百年”的“大过之时”，不是长久经营，而妄行侥幸，欲一日而坐收万世功名，刚猛过甚，本弱不胜负担，如九三之“栋桡”，结果身死名灭，史留恶名，岂不悲哉！所以《象传》说：“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即使有像辛弃疾、叶适这样的英才，因其不明“栋桡

之凶”不可以辅之训诫，同样在无意中促成了一出历史悲剧，又悲上加悲！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爻辞是说，九四，已经弯曲的栋梁因其隆起而趋平复，吉祥如意，反之则有遗憾。从爻位爻象看，九四是对于九三过失的纠正。九三以阳居阳，刚躁过烈而摧折；九四吸收这一历史教训，阳处阴位，以刚居柔，下应初六，以柔居刚，“刚柔相济，以成天下之务”（陈梦雷《周易浅述》），犹如已被压弯将折的栋梁，另加柱子支撑使其隆起，桡、隆相反而相成，栋梁复归正常，重新担当重任。所以爻辞称“吉”。我有一书橱，因书太多而木板弯垂不胜其载，后反置，以隆起之势承重，不久木板渐趋平复，一切如常，合乎矫枉过正的道理。这是受《大过》九四爻辞启发而采取的有效措施。爻辞称“有它，吝”，则是指违反这一相反相成的矛盾律，则将有吝惜遗憾。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爻辞是说，枯槁的杨树重新开花，老太婆嫁了个年青丈夫，虽无咎害，也没有什么好名声。九五阳处刚位得正，在“大过”之时反而不佳。九五变爻则上兑（☱）化为震（☳），据《杂卦传》，震有“蕅（fū）”象，“蕅”为花的通名。又震有植物“反生”之象。所以爻辞以“枯杨生华”这一“反生”现象为喻。枯树开花，并非正常，生机怎能长久？老妻少夫，也不正常，生活怎能和谐？所以《象传》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不过又因九五居全卦尊位，行乎中道，又可稍补其过刚之失，所以爻辞称“无咎无誉”。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爻辞是说，上六，涉水而不测深浅，有灭顶之灾，有凶险；但从另一角度看，又可说是无咎害。上六居《大过》全卦之极，虽以阴补阳，力救时弊，但因时世不利，形势已成，力柔弱而无可挽回，如涉水被淹一样有凶险。但企图救过补失，方向正确，心意诚笃，虽败犹荣，青史垂名，所以爻辞又称“无咎”。如宋末文天祥抗元，虽然慷慨就义，但其爱国精神、凛然正气，永远激励中华儿女！朱熹《周易本义》称：“处过极之地，才弱不足以济，然于义为无咎矣，盖杀身成仁之事。”又如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处极高之位，君主倚之以救“大过”之时，内有谗潜小人，外有强兵压境，能不危乎？诸葛亮为了救国，不顾与魏国力量对比的悬殊，六出祁山，北伐强魏，“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实际是以攻为守的策略，最后无功而退，长逝于北伐途中。不久，蜀国被灭，如有“灭顶”之凶。但诸葛亮“鞠躬尽瘁”，青史留名，于义可称“无咎”。

总之，“大过”之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失去平衡，社会人心也失去控制，如果不加补救，出现“大过人者”来干一番非凡的过人事业，则不足以挽危图强。面对“大过”的灭顶之灾，是消极坐等灭亡？还是积极挽狂澜于既倒？两种精神效果绝然相反。“大过之时”的大动荡年代，正是君子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之时，挽危图强须英才，这是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其次，《左传》宣公二年载士会语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有过失不可怕，可怕的是顽固坚持错误过失，如鲁迅所说，把身上发炎红肿的痈疽视为“艳若桃花”，这就无可救药，必然自取其咎。《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董卓死后，李傕、郭汜大战，生民涂炭。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司徒赵温）闻（李）傕欲移舆（按：即劫持皇帝一行），与傕书曰：‘公前托为董公（卓）报仇，然实属五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释也。今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仇，生民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祸乱……于《易》，一过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引《大过》上六“过涉灭顶”之言，以讽军阀李傕。但傕不思改过，终于成为历史的罪人。从正反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可知，改“过”归“正”，功业伟哉！这也就是孔子一再提倡“过则勿惮改”的精义所在。再次，针对“大过之时”刚强过甚的特殊性，道家老子提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的辩证思想。这不是否定富国强兵的必要，而是说不能因兵强而一味只知用兵而不知进退变化。这也颇富哲理意义。

坎

卦第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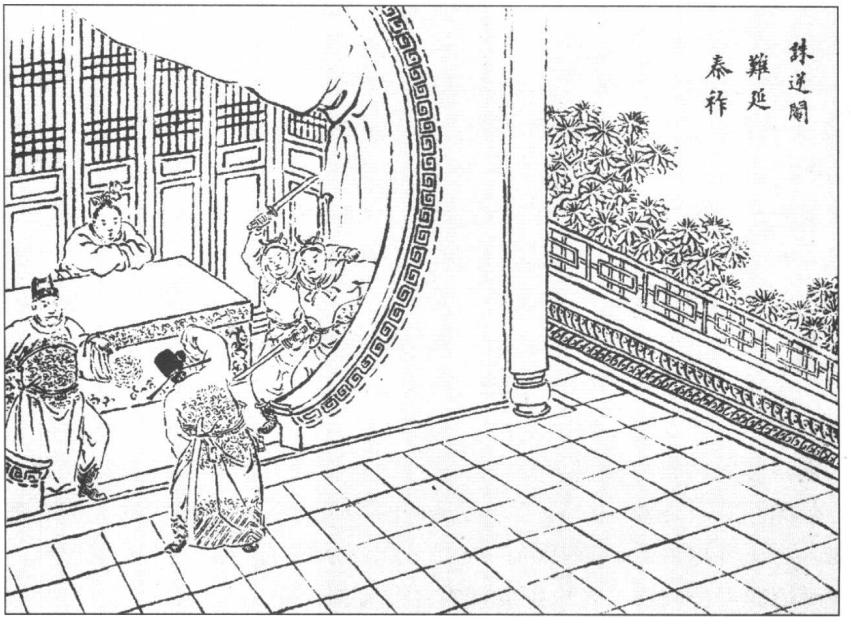
高歌正气越险道

《坎》卦第二十九，序次于《大过》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意思是说，事物的发展不能终久地过泰过甚，过极之后，必有险难，所以《大过》卦后自然就有《坎》卦，"坎"就是险陷的象征。不管是宇宙自然或社会人生，所谓"世世太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良好愿望。实际上，有风调雨顺的太平盛世，也就有了地动山摇的艰难险陷。如唐玄宗的盛唐之世，人们沉湎于盛世繁华之中，置身太平，早已忘掉战争的狼烟。如唐诗人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所称："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健儿庇旁妇，衰翁舐童孙。"一幅多么生动的太平社会的生活风俗图画。但是，曾几何时，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白居易《长恨歌》），统治阶级的"大过"，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苦难。太平时节，腐朽的统治者不知居安思危，兢兢业业，而是穷奢极欲，醉生梦死，必然会掉进险陷之中而不能自拔。只有正确对待，才能逢凶化吉，避免"大过"之后的坎陷。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谁能担保一世平安而无灾无难？关键在于端正态度，准备跨越坎陷，做到有备而无患。旧社会中的志士才人，常有哀吟悲唱："壮士志未伸，坎坷多辛酸。"（《三国志·刘劭传》裴注引《文章叙录》杜挚与毋丘俭诗）这是社会性质所决定，怀才不遇，常入坎陷，充满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即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也常有悲壮的颂歌激彻云霄。焦裕禄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献身，探溯河源的"黄漂"队员遇难……为了开拓美好的明天，人们不知跨越了多少激流险陷！因此，为了夺取胜利，迎接新的曙光，如何从坎陷中脱险，拯溺救难，成了人们经常讨论的人生问题。古人因此而有《坎》卦之设。

《坎》的卦形为䷜，上下都是坎（☵），象征险陷。坎的自然象征物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古人早已说过的。火刚猛燥热，人们知避其害；水性柔弱，人常狎玩之而丧命。所以《坎》的上下卦都是坎，意思是险之又险，危难迭至。所以《象传》说是“水洊至，习坎”。洊（jiàn），再也。习，重也。人狎玩于水中，水流滔滔而至，使人陷于重重的危险之中。《彖传》也说：“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水流不满坎陷，象征其深危莫测。人生有险，事出自然。但是处坎之时，待险之道，因人而异，效果不同，这是《坎》卦一再谆谆告诫的道理。

卦辞曰：“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尚，崇尚，崇拜。卦辞是说，《坎》卦象征迭至的险陷。但是面对险陷，只要心有诚信，胸怀大志，思想活跃而通畅，积极开动脑筋，想法排难脱险，这样毅然前行，就会被人视为先行的英雄而加以崇拜。面对险陷，因其立场、观点、方法、态度的不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待险之道：有的为挤人下水，以求踩别人的尸体渡险，结果成了人所不齿的无耻之尤，效果是害人又害己，如《红楼梦》所称“反算了卿卿性命”。秦末宦官赵高杀李斯，但是很快自己又被别人所杀，即是生动的例证。有的态度消极，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所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垂堂，即屋檐下。骑衡，两腿跨坐在楼殿边上的栏杆之上，似乎人们面对险陷的胆量，与所拥有的金钱财产成反比，越是有钱就越是怕死，连坐在堂檐下，也怕屋瓦突然掉下来打破了头；坐在栏杆上，也担心有摔坏身骨之难。这种人连树叶子掉在头上也会大吓一跳，感到只有躲在家里最最安全。但是这样一来，不就什

■子婴诛赵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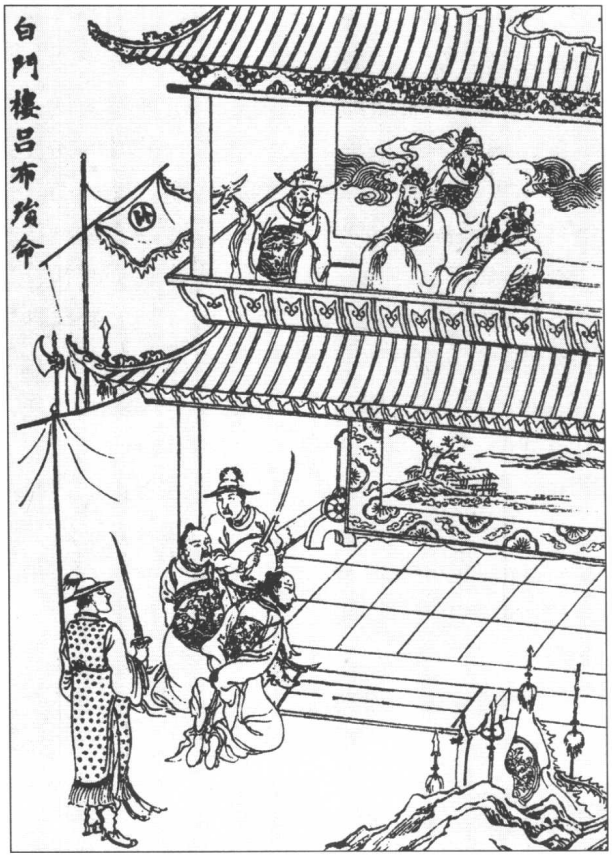


么事业也干不成了吗？人类怎么能不断进步呢？积极的态度是，勇敢地爬上屋顶和栏杆，努力整治一番，消除险情病灶，那么不管是千金之子或万金之子，坐在垂堂之下，不是一样安全无恙吗？记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对于同一件事（按：指险难之事），懦怯者，愚勇者与勇敢者所采取的态度各不相同。前两种人遇事不是不及就是太过，而后一种人能取其中。愚勇的人当危难未来之时，激昂急躁，情不自禁，而到危难之事临头时又销声匿迹，热血冰销；而勇敢的人在危难未来之时，虽然不动声色，而到危难之事临头时精神抖擞，勇往直前。"这一段精光闪烁的言语，与我国《易经》中的《坎》卦精神颇相吻合。所不同的是《易》卦的时代更早了数百年。陷于坎险之中，不勇往直前，积极思考与行动，有可能救人自救吗？人类文明，中西有许多共通之处，为什么不能相互借鉴，而一定要彼此排斥呢？真正的大智大勇，在艰险面前，"有孚"而"心亨"，心里思考，行动坦然，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他们前进呢？黄河在晋陕峡谷中奔腾，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卷走了十亿吨沃土泥沙，严重的水土流失，混浊厚重的黄河水，经常泛滥成灾，给神州大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苦痛。面对天灾人祸，中华儿女从未屈服。几千年前的大禹治水，辟壶口，凿龙门，中流砥柱，风雨屹立，疏导天上之水万里入海。《易林》（《坎》之《比》）诗曰："禹凿龙门，通利水源，东注沧海，民得安存。"虽然从今天的实际看，离开根治黄河水害相距甚远，但从精神上却永远鼓舞了中华民族，如何正确对待险陷之难。我们的祖先，曾经用最原始的工具加上双手，去开天辟地，终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华文明，雄踞于世界峰巅，令人敬仰。今天我们这些中华儿女，怎会甘居落后，而不奋起追赶？"越是艰险越向前"，铮铮誓言，激励我们跨越新的坎险，去开拓广阔的新天地。三门峡的黄河水道有个中流砥柱，古今骚人墨客千古传颂。为什么？因为它巍然屹立在急流险滩之中，雨横风狂，绝不退缩。它是战胜艰险的中华民族性格的象征，曾读邓伟志《站在中流砥柱上》一文，很有同感："我好不容易登上了中流砥柱……脚下，河水一泻千里；前后，惊涛骇浪；左右，骇浪惊涛；头上，一条长达数百米的水龙腾空而起。站在中流砥柱上，滴滴雾珠不时飘落在我脸上——这要是在别处，我也许会躲开，可是在中流砥柱上，我只觉得这是一种享受，享受这危中安，险中夷的壮丽，享受这动中静，流中止的和谐。"（《人民日报》1988年12月19日）生活需要不断的革新和创造，而开拓创造就意味着跨越新的坎陷。坎陷之前，寓藏着新的和谐，真正幸福的人，正是敢于面对坎陷而纵声歌唱的中华儿女！

下面分析爻象爻辞。

初六，入于坎窞，凶。

窞（dàn），深坑，爻辞是说，初六，陷于重重险难，有凶险。初六处全《坎》之下，位在坎坑的最深处，阴处阳位失正不中，本身阴柔乏力，又上与



■白门楼吕布殒命

六四无应，无人伸出救援之手，所以有凶象。爻位爻象启示人们，履险须秉刚正之气以行乎中道，初六违此至理，所以《象传》说："习坎入坎，失道凶也。"履险有道，而不能仅凭匹夫之勇而胡撞乱闯。《三国演义》写吕布为天下第一猛将，武艺高强，天下无敌，但身处乱世，履险无道，胡乱厮杀，最后被曹操擒斩于白门楼。合于初六"入于坎窞"的凶象。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爻辞是说，九二，坎陷中罹难，不放弃点滴机会以求脱险，必有收获。九二阳处阴位失正，又位在下坎之中，灾难深重，险陷正深，当然一时无法摆脱困境。但九二又居下坎中位，秉阳刚之气行乎中道，以诚信比于上下二阴，合于履险之道；又九二与六三、六四互卦为震（☳）；震足善动，可见九二爻象，已寓藏脱险之力，所须等待的只是时机，只要不放弃点滴机会，必有所获。现代武侠小说的名家，无不明于《易》理，常在"坎有险，求小得"上埋下伏线，大作文章，把英雄侠客的排难救险，写得波澜跌宕，很有生气。孟子曾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流水出坎陷之坑，不积流则不满，不满则不行，怎能出坑脱险而自由奔流呢？因此，在险中积滴水细流，不放弃微小生机，则将成其大业。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有一说明，析理颇为精当："明人陈仁锡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为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其外，然后为流水也。'《折中》引录此语，并指出：'说极是。凡人为学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虽涓涓而有源，乃行险之本也。'马其昶也认为：'二为泉源．因其未出中（按：即脱出险中），故求小得，积而后流，盈科而后进。未出中，未盈科也；求小得，积细流以成大川也。'（《重定费氏学》）诸说从九二阳居坎中，求小得大的行险之道，分析卦辞及《小象传》的意旨，似颇可取。"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枕，马其昶以为古文作“沈”，没也。爻辞是说，前后左右都处重险，在急流险滩中时浮时沉，被冲到深坑重陷之下，无所施其才能。六三阴处阳位，上又无应，有失中正，居下坎之上，下坎之险且止，而上坎之陷又到，前后左右，皆是险陷，故爻辞称“险且枕（沈）”也。比如陷于森林沼泽泥潭之中，愈是挣扎，陷没愈快，所以爻辞戒以“勿用”。但与初六之“凶”相比，初在重险之下，其“凶”难救；而三夹在二、五两阳之间，二阳中实，体水之德，有援溺救人的诚心，所以六三虽已“勿用”，而仍有被救出陷的一线生机。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簋（guǐ），盛黍稷之类的方形食器。缶，盛水的瓦。爻辞是说，六四，一杯淡酒，两盘素食，伴以瓦罐白水，通过明窗虔诚地奉献纳约，最终必无咎害。六四阴居阴位得正，已从下坎的深重险陷中脱出，虽处上坎之下，但上坎险陷较浅，自己力求脱险之心虔诚又不夹私心杂念，所以虽然杯酒淡食而白水以奉献，礼虽薄而心诚洁，如“纳约自牖”，上得九五阳刚之尊的鼎力相助，怎么会有咎害呢？所以《象传》解释说：“樽酒簋贰，刚柔际也。”刚柔交接，阴阳相济，从各方面全面培养与增强自己内在的脱险力量，总有一天，力量达到可以脱险而出，所以爻辞称“终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祇，《周易译注》以为当作“祇”，通“坻”，小山丘。爻辞是说，九五，水流进险陷之坑，尚未满盈前行，但前面阻挡前进的小山丘业已铲平，必无咎害。九五处坎之中，为上下阴虚所陷；又与六三、六四互卦为艮（☶），艮为止，象征流水不盈科而止于坎陷之中，有尚未出险之象，此爻辞所以称“不盈”。功力不到，自然一时难以完全摆脱困境而脱险。但是如果水盈科而继续前行，则必然脱出险陷。九五下虽无应，但上止一阴，所陷未深，压力不大，又是行将出险的兆象。加以居位中正，秉阳刚正气，内怀诚信而用力深厚，成一卦之主，为全卦脱险动力之所在，终能拯溺脱陷，救人自救，加以阻挡流水前进的小丘既然已经铲平，接着填坎出陷，则指日可待。所以爻辞称“无咎”。于此可见，全卦主旨，强调行乎中正，为履险之道。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徽纆（mò），《周易集解》曰：“马融曰：‘徽、纆，索也。’刘表云：‘三股为徽，二股为纆，皆索名，以系缚其罪人矣。’”丛棘，古代刑狱周围，常树荆棘以防囚犯逃亡。爻辞是说，上六，用绳索捆绑囚犯，关押在丛棘刑狱

之中，三年都不能获释，有凶险。上六处《坎》卦之极位，陷深险极，灾难深重，无法自脱，故有此象。按《说卦传》，“（坎）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阳刚在中，故坚多心，棘枣之属也。”枣棘有刺，因此《坎》卦有丛棘牢狱之象。又上六变阴为阳，则上坎化巽（☴），巽有绳索象，绳索用以捕系罪犯。故上六以“徽纆”及“丛棘”为喻。被捕入狱，置身坎陷，已呈凶象。加以三年不得获释出狱，则凶象毕露，性命不保。据《周礼·秋官》云：“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所谓“司圜”相当于现代劳教机构的长官。劳教三年还不思过悔改者，则刑而杀之，凶险无以复加。即使偶然逃出狱外，也为君子所“不齿”，如人类垃圾，虽生犹死。所以《象传》称“上六失道”，所谓“失道”，就是违反了秉阳刚中正之气以履险脱陷的正道。

总之，《坎》卦所称的履险之道，设险用险，意义重大。《彖传》说：“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邦。险之时用大矣哉！”有坎陷之险，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人的正确对待和运用。敌我双方，用险之道不同。对于敌人，则设置重重坎陷险难以困惑之，置之死地，加以消灭，以便完成保家卫国的神圣天职。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及根据地的抗战军民，发明了地雷战、地道战，千万颗地雷，千万条坑道，犹如习坎重险，诱敌于死地之中，电影《地雷战》和《地道战》，所宣传的正是《坎》卦的有形之险。但更重要的是，为敌人设置了肉眼看不见的无形之坎险。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所熟知。国土沦陷，敌人猖狂，凡我中华儿女，怎能不痛心疾首？因此，虽然土地被日军占领，但中华民族的良心并没有被吞没。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辨男女老少，人人同仇敌忾，处处杀声震天，敌人整天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精神压力，无形之险，威力更是强大无敌。如电影《平原游击队》，到处都报告出现了游击队长“李向阳”，无形之险，使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易》理中的《坎》卦精神，得到了完美的发挥与体现。设险用险，与拯溺救险辩证统一，学问很大，事关国家兴亡，怎能不加学习和研讨？而对于自己一方的履险之道，当然是力争尽快地顺利脱出坎险。但也有特殊情况，为了进步和发展，而甘冒新的风险。如果没有一点积极的冒险精神，在行动前已先为自己设置了种种无形的坎险，这个民族精神萎顿，当然没有什么希望。今天的摩托飞车、汽车拉力、雪山探险，种种冒险事业，并不一定直接指望有什么物质享受，一旦探险失败，弃尸荒原，能有什么享受？但它却鼓舞后人继续进取，不断前进，以完成前人未竟的遗愿。因此，它主要是象征精神上的“用险”。一个面对险难而毫不畏惧的国家与民族，必然大有希望。“险之时用大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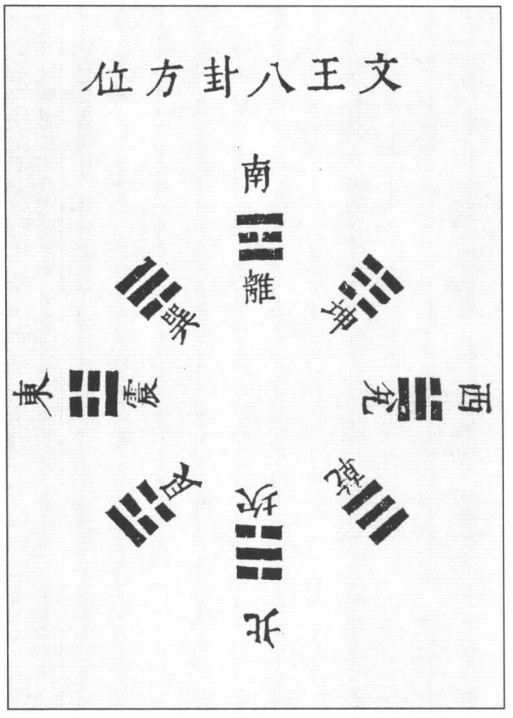
离

卦第三〇



养火以正成文明

《易》卦上经的最后一卦是《离》，序次第三十，在《坎》卦之后。《序卦传》说："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意思是说，事物陷于坎陷之中而力求脱难出险，就必须有所附丽，以待救援。"离"就是附丽。从上经看，《坎》《离》二卦在最后；但从六十四卦看，则处于上、下经卦的中位。这种卦序的编排设置是有道理的。《坎》的卦形是䷜，《离》的卦形是䷝。《离》之与《坎》，是爻画奇偶完全相反的正对卦（或称错卦），它们都是由纯阳卦《乾》与纯阴卦《坤》变化而来。《乾》（䷀）的二、五变阴则为《离》；也可说《离》之六二、六五二爻来自《坤》的中爻。《坤》卦的二、五化阳则为《坎》；也可说《坎》的九二、九五两主爻来自于《乾》之中爻。《坎》、《离》实为《乾》、《坤》的变卦。而六十四卦最后的《既济》与《未济》二卦，《既济》（䷾）是下离（☲）上坎（☵），《未济》（䷿）是下坎（☵）上离（☲），都是由坎、离二卦变化而来。所以《易》卦开篇《乾》《坤》二卦；中间为《坎》《离》二卦；最后是《既济》《未济》二卦，从在六十四卦中所占的位置看，六卦分三组，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起首《乾》《坤》开天辟地，阴阳震荡，生化万物；中间《坎》《离》，自《乾》《坤》二、五两个中爻变化而成，人称天地之心，造化之本。清陈梦雷分析说："天一生水而二生火，坎（☵）藏天地之阳中，受明为月；离（☲）丽地阴中，含明为日。坎为水而司寒，离为火而司暑。坎为月以司夜，离为日而司晨。"（《周易浅述》）天地万物的生命跳跃，怎么离得开日月水火昼夜寒暑的转接摩荡呢？又中医把人体比喻为一个小天地，以五脏器官分配属五行，肾属水脏，心属火脏。通过"水""火"，与《易》卦相联系，以火脏之心属离，水脏之



■后天八卦图

肾属坎。坎离相补，水火相济，人的生命得以繁殖、延续和发展，其功用何等重大！试想人的五脏中心肾何等重要，如天地之日月，运行不息；如水火相济，化育万物。医家称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所占地位不说而知。而肾则是“先天之本”（《医宗必读》），人的生命繁殖、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与之密切相关。但心肾水火，是矛盾的辩证统一，才能构成生命现象，如《医贯》所称：“肾中非独水也，命门之火并焉。”也就是说，肾坎虽主于水，但内寄心离之火，水火相济，刚柔转化，因而成为生命之门。由种种现象观察，《坎》、《离》所以上承《乾》、《坤》，而贯串于六十四卦之中，如经络中的血之于生命，奔流变幻，不可一日或息。而《既济》《未济》二卦，又是《坎》《离》的变卦，如果溯流探源，当然也是间接源自《乾》《坤》二卦，所以作为六十四卦的殿军压阵。于此又可见《易》卦序次，首尾呼应，中气联贯，开阖变化，自成系统。《坎》《离》二卦实是小《乾》、《坤》。因此在传统的八卦方位中，《先天八卦图》是乾南坤北，而发展至《后天八卦图》，则变为离南坎北，从二图方位移易的情况看，可知坎、离在六十四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离》的卦形是䷝，上离下离（☲），象征附丽与光明。与坎为水、为月相反，离的自然象征物为火、为日，日与火都是光明之源。上下两离即为重叠以明的意思。但是光明是怎样来的呢？光明为虚物，必须附着于一定的物质才能发出。明来知德《周易集注》说：“离者，丽也。一阴附丽于上下之阳，丽之义也；中虚（按，即离卦中爻为阴爻--），明之义也。离为火，火无常形，附物而明，邵子所谓火用以薪传是也……（离）火中虚而暗，以其阴也；（坎）水中实而明，以其阳也。有明必有暗，有昼必有夜，理之常也，所以次《坎》。”《离》卦之设，合于自然常理。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不管什么光明之源，本领有多大，如果没有一定的附丽关系，行吗？太阳之明，如果不在宇宙空间占据一定位置，依附天体运行，怎能形成太阳系呢？太阳即使有光，其光波光能又通过什么物质媒介传播到各个星球呢？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光芒万丈，威力无

穷。但是，如果火不依附于燃烧的物质如木头、石油之类，火源何在？其实何止太阳，火焰，世上万事万物各有其一定的附丽关系。所以《彖传》说："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则附丽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类永远无法揪住自己的头发，跳出自身所依附的地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仗剑横扫六合，叱咤风云，他们是时代融炉的精英，古代社会的骄子。"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即使是一代雄主，也随着一定时代和社会的消逝而消逝了。《彖传》释《离》有"重明"之说，这主要是从横向的空间角度伸展。夜间如果只有一盏路灯，则昏幽黑暗，但若所有路灯同时闪耀，则为"重明"，灯火通明如同白昼。从社会角度看，古代社会的安定，同样有待于君、臣、百姓上下皆"明"。共同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作贡献，这是"重明"。如果君明臣暗或臣明君暗，社会则依然黑暗。于此可见《离》卦"重明"的意义。又《象传》释《离》卦有"明两作"之说，这是从纵向的时间延续的角度立论。如果光芒一闪而逝，即使是天才，也很快丧失生命力，其所作所为是很有限的。正常的是，前明将烬，后明继之，如日落而月出东山之上，月沉而日升于东海之滨，交叉迭现，光照人间，永不熄灭。从人事论，就是缉熙不已，日新、日新又日新的意思。从社会的历史发展看，每个时代都有其闪光点，有其创造和贡献，点点闪光连贯成串，构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象传》解释说："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虽仅从统治者占领历史舞台的视角出发，缺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其历史局限，但以"继明"来谈历史，则所论不差。

卦辞曰："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牝牛，母牛。卦辞是说，《离》卦利于坚守正义，前途光明，道路通畅，如畜养母牛一样吉祥。在八卦中，离为火。火对于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原始人钻木取火，在文明的道路上跨出关键性的一步。如果原始人满足于温暖的气候，用野果果腹和茹毛饮血，人与动物就没有多大区别。谯周《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初作燧火，人始燔炙。"其实，火发明之后，岂止饮食文化的进步，简直成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动力和能源。所以《白虎通》说："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如果没有火，即使是处于西方殖民时代的鲁滨孙，也无法在海上孤岛生活下去。千万年的漫漫长夜，文明的人类怎能忍受？有火就有了光明与文化，但光明与文化必须有所附丽，古人说"薪尽火传"，就是精神文明依靠世代相传而延续和发展。从卦体看，《离》卦四阳二阴，阳爻多而阴爻少，正是火性刚猛燥烈于外的征象。但从矛盾的角度看，相反相成，二阴爻恰是使阳刚燥烈出于险陷的救星和希望。因此水性阴柔，但《坎》为阳卦；火性刚烈，而《离》为阴卦。《离》卦六五、六二两中爻皆主"吉"象，特别是六二，处位中正，尤为"元吉"。所以为全卦阴柔之主。以阴济阳，以柔救刚，使离火之明因其附丽而有所限制，不会肯日蔓延成灾，最终就能用之于有益之地而赐福人类。也就是

说，离火之明，必须养之以阴柔中正，才会至善大吉。火之养失正则成灾，明之养太过则失之苛察。如项羽率楚军“西屠（秦京）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焚书，还有某些节制；而项羽则肆无忌惮地一味烧杀。不仅财产损失，生命陨灭，就是人类文明也遭到一大劫难。如古代珍藏的图书典籍的损失，就永远无法弥补。楚火之毒，胜于秦火。又如汉明帝及唐德宗，其明之养失正，自以为才干过人，明察秋毫，结果流于苛察，朝廷人人惊慌无所措手足，还有谁愿说话或办事呢？这就很难形成上下交流，君臣互济的局面。阴阳失调，上下不通气，国家怎能不衰退？唐德宗几次被叛军包围，逐出京师，困于奉天，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与其苛察为明大失人心有关。反之，顺应自然规律，养之以阴柔中正，则离火之功为文明之始。这正反面的事例，生动地解释了卦辞“利贞，亨”的深邃含义。但卦辞为何又称“畜牝牛吉”呢？原来，《离》之中爻出于《坤》，《坤》有牛象，而《乾》为天；《坤》为妻，有女象，则《坤》又有母牛象。牛为阴柔之畜，母牛又为柔之柔者，任劳任怨，外刚强而内温顺。与《离》卦外阳刚而中阴虚的卦体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周易折中》胡炳文曰：“《坎》之明在内，以刚健而行之于外；《离》之明在外，当柔顺以养之于中。”所以卦辞以母牛为喻。

下面分析爻象爻辞。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行也。错，交错。然，语助词，无实义。爻辞是说，初九阳刚躁动，交错于胸，只有保持恭敬谨慎，才能免除咎害。来知德《周易集注》曰：“错然者，刚则躁，明则察，二者交错于胸中，未免东驰西走。惟敬以直，内则安静而不躁妄，主一而不过察。则敬者，医错之药也，故无咎。无咎者，刚非躁，明非察也。”从爻位爻象看，初九居《离》之初，刚明始动，炎火上升。就像一个有才华的贤者，一崭露头角就锋芒毕露，很容易招致俗妒。在附丽之初，寄人篱下，这样很可能莫明其妙地成为众矢之的，一开始就葬丧了自己的事业和前程。所以爻辞提倡以敬避害。冯当可曰：“祸福几微，每萌于初动之时，故戒其初。”赵彦肃也说：“能敬则动与物交，皆天理也；不能敬则役于物而生咎矣。日出而作，故发此象。”（见《周易折中》称引）又初九爻变阴，则下离变为艮（☶），艮有路径的象征，而路是人走出来的，所以《离》之初九爻辞称“履错然”，履者行路之事，爻辞与爻象相合。

六二，黄离，元吉。

黄，五色之中色，古人认为代表了最为尊贵的中和之美。所以帝王以为服色，禁止臣民服用，违则僭越有罪。爻辞是说，六二，附丽之物呈中正的黄色，至善大吉。从爻位爻象看，六二从《坤》之中爻变化而来，《坤》为土色黄，所以六二爻辞有“黄离”之象。又六二阴居下离的中正之位，为全卦之主。处附丽

之时，收敛上下阳刚躁烈之焰，以行中正之道。在全卦六爻中，爻称“元吉”，最为完美和祥。杨万里《诚斋易传》解释说：“六二当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谦柔之德体中正之道，此其所以获甚大之吉，为一卦之盛也。”他并以周公谦事成王以日新其业为例，加以历史的说明。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昃（zè），日西斜。缶，瓦器，古代民间常用作打击乐器。大耋（diē），极言人之年老。《诗·东邻》毛传：“耋，老也。八十曰耋。”爻辞是说，黄昏时刻，残阳附丽垂挂于西天，这时的老年人如果不击缶歌唱，自得其乐以鼓舞精神，而是对景伤情，叹老嗟病，兴日暮穷途之悲，那就会把人导入凶险之途。《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初为日出，二为日中，三为日昃。”所以九三爻辞以“日昃”立象为喻。从爻变看，九三变阴而下卦离化震（☳），震动躁妄，不耐日暮；又九三与九四、六五互卦为兑（☱），兑为“口舌”，有歌唱之象，所以爻辞以“鼓缶而歌”立象作喻。而从爻位看，九三处重离之间，上离之极，前明将尽，而后明当继之时。盛衰相继，本是自然之理。从积极方面思考，应该“鼓缶而歌”；而消极者则兴“大耋之嗟”，二者吉凶判然有别。《离》卦原是强调附丽之事应该柔顺守正以保持畅达亨通的人生哲学。但九三爻象爻辞以老年医学保健的生动例证，说明了老年人如何正确对待死生之道的生理变化和心理需求。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是，远期记忆甚为清晰，而近期记忆较差，一旦面对落日之景，容易产生人生易老来日无多的悲观心理，这又使人过早衰退，加速生命的老化和死亡。《易》卦作者认识这一道理，如果老年人不“鼓缶而歌”，生命之火就会过早熄灭。其实，所谓“鼓缶而歌”也是一个比喻而已，强调的是通过一切正常的有益活动来保持开朗活泼的心绪，有助于延年益寿。这在医学上就化消极为积极，值得借鉴与提倡。老年人喜欢回忆与思考，这并没错，但回忆应多想积极方面，而不要老是吊古伤今。古龙在《名剑风流·龙虎风云》一章说：“不错，人该有些欢乐的回忆，总是好的，否则又该如何去度过寂寞的晚年，寒冷的冬天？”所谓“欢乐的回忆”，也就是一种积极有益的“鼓缶而歌”。又《世说新语·言语》曾记载了谢安和王羲之的一段对话：“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以丝竹音乐来陶写性情，为延续生命之火添膏加油，同样是积极的“鼓缶而歌”。今天城市中众多的退休老工人，如果成天闷在家中，家务不做，书不能看，说是享福，实际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这是一种消极的“大耋之嗟”，只会损寿而失去享福的机会。其实何止是老年医学，即一般的自然与社会，盛衰变化，也是常理。但不管在何种衰飒环境中，保持一颗积极健康的心灵，非常重要。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如英国的培根引用的拉丁谚语：“晚秋的秋色是最美好的。”（《培根论人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如，语助辞，无实义。爻辞是说，九四，火炎上升，烈火燃烧，气焰突如其来，但很快薪烬火息，灰飞烟灭，迎来的是一片死的静寂，被人抛弃而不屑一顾。九四下互为巽（☴），据《说卦传》，巽发展至极为“躁卦”；上互为兑（☱），兑有“毁折”象。又从爻变看，九四变爻互初二、九三为坎（☵），坎有险陷之象，灾危之象藏乎其中。总之，所有爻象均呈凶险之象。而从爻位看，九四处下离火尽，上离之火猛发之初，阳据阴位，过中失正，上下无应，又直逼君位，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很不利。加以阳火燥烈妄动，凶险环生，事出自然。来知德分析说：“火性炎上，旧火既上于四，而不能回于其三，四之新火又发，五得中居尊，四之火不敢犯乎其五，上下两无所容，则火止于四而已，故必至于焚如死如成灰弃如而后已也。”火之于人，有利有害，就看人类如何运用了。如秦以严法酷刑治天下，秦始皇焚书坑儒，旧火虽息，而秦二世赵高新火暴兴，势非烧尽天下而不止。但玩火者自焚，其火虽猛，但其中心终乏充实能量，所以很快烟消云散，遗如弃灰。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平定管蔡叛乱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沱，滂沱。爻辞是说，泪涕滂沱而流，有忧戚嗟伤之貌，吉祥。从爻位爻象看，六五阴居阳位，处位不正，下又无应，下为四刚所逼，所以有流泪忧伤之貌。“出涕沱若”者，所见之色；“戚嗟若”者，所听之声，声色俱悲，足以动人。王弼注曰：“（六五）履非其位，不胜所履。以柔乘刚，不能制下。下刚而进，将来害己。忧伤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丽在尊，四为逆者。忧伤至深，众之所助，故‘沱’‘嗟’而获吉也。”按六五附丽于刚强之间，柔居尊位，恃中而守文明之德，所以虽为刚强所逼而有一时之忧嗟，但以其谦柔之行而获上九鼎力相助，所以终获吉祥。如周初成王

年幼，谣诼纷起，管叔蔡叔勾结殷之遗民叛乱，成王兢兢业业，有“闵予小子”之叹，后得周、召二公竭力扶佐，三年终平三监，国泰民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者，获匪其丑，无咎。

王，指六五居君位。用，指六五宠用上九而附丽之，以成其大业。嘉，美也，这里指出征之功。丑，小丑。爻辞是说，上九，被君王宠信，用其率师出征平叛，立下赫赫功勋，斩其魁首，俘获不及于被胁从的小丑，必无咎害。从爻变爻象看，离有兵戈之象，上九变爻而上离化震（☳），震，动也，兵戈震动，所以上九有兴师出兵之象。又从爻位看，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分析：上九“处《离》之极，离道既成，物皆亲附，当除去其匪类，以去民害。”汉代刘向曾上封事，云：“《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见《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向传》）上九勇于折首，仁及小丑，大仁大勇，邦国以正，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怎么会有咎害呢？

咸
卦第三一



无心之感阴阳和

西方报刊曾记载了几则有趣而又引人思考的故事。有一次，一支部队在行军，将要通过一座坚固的小桥时，观者如堵。为了显现军威，指挥官下令奏起那雄壮的军乐，连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配合了进行曲的强烈节奏，煞是威风，颇为壮观。但是好景不长，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小桥猛烈坍塌，惨剧的发生，出人意外，令观众一时惊呆了。究竟是为什么？一时疑云密布，猜测纷纷。但事后的调查结果证明，绝无人为破坏的因素，而是由于自然的感应——即共振现象在作祟。还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古代西方曾经专设了一座女子监狱。不久，狱中的女犯人相继患了一种莫明其妙的躁动不安症，其病根何在？将如何治疗？医生束手无策，因为查不出病因。后来，出于偶然原因，有一支军队常在女牢的围墙外操练，奇怪的是，天长日久，女犯人的怪病居然逐渐减轻，有的甚至不治自愈了。为什么这样？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事后研究，这也是由于自然界的一种无形的感应现象在帮忙。原来，人的生理或心理机制，必须阴阳相应才能正常生活、健康成长。女犯人单独囚禁于远离男人世界的地方，常年重阴闭痼，阴阳违和，怎能不病？而女牢外面的军队，则是充满了男性活力的世界，阳气旺盛，居然逾越了大墙，多少影响并促进了女犯人体内阴阳相应，因此怪病日渐好转。上面的故事说明，如果要预测未来，避凶趋吉，就不能忽视对于感应或共振现象的研究。感应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现代物理学称为共振、谐振或共鸣。中国古代缺乏这一科学术语，就泛称为阴阳相应，或同类相动、同声相和与同气相求（见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如声音以波的形式传播，发声的振动体在周期性变化的外力作用下，当外力的频率与发声振动体固有的频率相近或相同时，振幅急遽加大，其振动所产生的声音能量，也由分散而趋集中，形成一股巨

大的力量。而面对感应或共振现象，是否认真对待，则效果大不一样。如果注重并运用得好，可以逢凶化吉，造福人类。音乐中的弦乐器如提琴、二胡等，其琴筒、琴室就是通过共振而增大音量以提高音乐效果的共鸣器。人们常在欣赏小提琴或二胡独奏时如醉如痴，这里就有“感应先生”的一份功劳。反之，则化吉为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量。大的不说，小如机器的设计和安置，如果忽略其共振现象的测算，则常因其运转产生共振而毁坏机座。其实，不仅是自然界，人类生活中也存在形形色色的感应或共鸣现象，人们常说的“心心相印”，也就是一种常有的心灵感应；美学中的艺术共鸣，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心灵感应。人类的心灵感应一旦形成，将凝聚成为一股推动或破坏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易》经中的《咸》卦，主要就表现了中华古人对于心灵感应的一种信念和认识。

在六十四卦中，《咸》卦序列第三十一，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其实不然。《周易》古经的篇章，分为上下经。上经始《乾》至《离》共三十卦；下经始《咸》至《未济》，共三十四卦。从卦序看，《咸》卦处于下经的首位，是上、下经之间过渡和转变的关键，关系重大。古代有人说，上经专明天道，下经专明人事。这话不太准确，唐代的孔颖达就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以上经中的《讼》卦为例，说明饮食必争，争则讼起，讼必众聚，认为这是“兼于人事，不专天道”。所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过分机械。如用模糊理论来分析，从总体格局看，上经虽兼人事，但多言天道；下经则相反，虽论及天道，但重在人事，所论各有侧重，则古人所云大致不错。上经以《乾》《坤》二卦开篇，从宇宙玄黄、天地洪荒的本体根源开拓，言阴阳之道化生万物；下经则从《咸》卦始，由宇宙自然转入社会人事，从青年男女的无心感应，婚姻恋爱说起，叙述道德人伦社会秩序的发端。所以《序卦传》发挥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就从青年男女、成年夫妇的无心之感，深入一步讨论了天地阴阳和世事人伦的自然和谐，不仅富有深邃哲理，而且涉及了巩固社会统治秩序的大问题。由此可见，作为下经之首唱的《咸》卦，在六十四卦中的特殊地位。这一认识，不仅是儒家，连主张四大皆空，无欲无念的佛门理论家也承认。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殷荆州（仲堪）曾问远公（即释慧远）：‘《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所称“笑而不答”，就是既首肯殷仲堪的阴阳相应之论，同时又认为具体事例不必过分拘泥。原来殷氏称引的“铜山”“灵钟”的典故，来自《东方朔传》的故事：“（汉）孝武皇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诏问……东方朔，朔曰：‘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见《世说新语》刘注称引）山崩

钟鸣，地震感应，古人认为这是阴阳之气摩荡撞击相互感应的结果。而具体是否称铜为子，山为母，谓子母相应，则不必拘泥。于此可见远公的“笑而不答”，奥妙无穷。慧远是东晋的高僧，糅合儒释，精研《易》理，他以《咸》卦为典型，说明《易》理主要是讲感应变化的哲理的，《咸》卦在《易经》中的重要意义，非常明白。

《咸》的卦象为䷞，下艮（☶）上兑（☱），象征交感、通感或感应。为什么这样说？从文字学上看，《咸》卦的“咸”有数义。首先，“咸”是“感”的通假字，是无心之感，也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通气、共鸣和感应，而不是虚伪矫饰的人为之酬唱。其次，《杂卦传》说：“咸，速也。”这是说男女青年因为产生了异性相吸的无心之感，有感就很快会有应，自然产生了“一见钟情”的热烈效应，所以有“速”的意思。再次，《说文》释“咸”为“皆也，悉也”，说明男女情爱的无心之感不是特殊的事例，而是因其自然而普遍存在的现象，虽然时而有形，时而无迹，但却无所不在，因而更加值得研究。第四，据《诗·小雅·常棣》序笺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孔疏云：“咸，和也。”进一步说明男女无心之感是和谐的，是自然和谐与社会通泰的基础。四层意思，层层深入，构成《咸》卦的深刻内蕴。而从卦象看，因象征物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两种解释：一，下卦为艮，属阳卦，艮为止，为少男，象征男青年爱情诚挚，知有所止，谦恭有礼地诚挚追求女孩子；而上卦为兑，属阴卦，兑为悦，为少女，象征少女在上，爱情专一，下顺阳刚而感动喜悦，这是异性之间的“一见钟情”，情投意合，相互恋爱，无须旁人说三道四，一切是那么自然。二，下卦为艮，艮象征山，属阳刚；上卦为兑，兑象征泽，属阴柔，《正义》说：“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山辉水媚，相互滋润，阴阳二气上下交流，通感相应，共鸣和谐。这又进一步从社会人事扩大到天道自然，说明感应之道，无所不在。

卦辞说：“咸，亨，利贞，取女吉。”取，娶也。意思是说，《咸》卦象征感应，由感应而亨通，利于贞正无邪，这时娶妻吉祥如意。这不过是借男女婚姻为例，以男女通感结合作为人伦之首端，进一步又扩大到天道自然。所以《彖传》说：“咸，感也；柔上（上卦兑性阴柔）而刚下（下卦艮性阳刚），二气感应以相与（亲）。止而说，男下女……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由《咸》卦的共鸣感应，可以看到人特别是青年男女之情；而人体本身的构造，又有“小宇宙”之称，与天地自然存在某种同构关系，因此又可以通过人的感应，在一定程度上来窥测“天地万物之情”——也即宇宙自然的发生、发展的奥秘。

如果说卦象卦辞说明的是全卦在大环境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及其整体意义的话，那么爻位爻辞则是效法阴阳变动来说明避凶趋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通感这一特殊事物的各个侧面来加深说明全卦的意义，这也是古人运用《周易》卜卦

的实用目的之一。《咸》卦是一个效法阴阳而主动尚变的卦。爻位爻辞，不仅有阴阳之分，而且爻位变动有上下之别。宇宙万物不是静止的固定的，一旦通感就有变动，有变动就会有吉、凶、悔、吝的产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吉与凶是一对矛盾，相互否定，又辩证统一。从爻位的上下进退，人们可以窥见吉凶转化的蛛丝马迹。人们一旦及时地发现和把握这些时机，准确理解，正确判断，那么所谓“预知未来”、“逢凶化吉”也就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种科学的预测。这是我们分析爻位爻辞所企望的，至于结果如何，当然有待实践的检验了。

初六，咸其拇。

拇，大拇指，原不分手脚，但详其爻辞及卦义，这里特指脚拇指。感应首先发生在脚拇指上。这在生理上似乎并非实事，而是一种譬喻，显现事物发展由下而上，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开端，脚拇指没有主动性，必须听人指挥，随上而动。这是以异性青年男女追求、结合的生理和心理的过程来说明通感事物的初期发展阶段。初六阳位，现为阴爻所据，爻位不正，但阴柔而不躁进，所以虽有企图向外卦发展的感动，以上应九四，但欲动未动，所感尚浅，未知吉凶。爻辞虽对吉凶不置一辞，但这也是一种认识与判断。如方宗诚《读易笔记》所言：“将动之始，善与恶尚未定也；故但曰‘咸其拇’，使人存慎动谨幾之意。”朋友相交慎于始，很多人都有这一社会经验，因为相感相交之初，就有吉凶之幾潜伏其中。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féi），小腿肚。爻辞是说，感应已由脚拇指向上发展到小腿肚上，有凶险；但安静居守，则可化凶为吉。六二阴爻阴位，居中得正，又上应阳刚的九五，照理说该是大吉大利才是。但二与五应，中间为九三、九四两个阳爻所忌，障碍阻隔，安置陷阱。而小腿已非脚拇指，主动性增强，感乎物而躁于动，躁于动则事易败，所以呈现“凶”象。为此，作者勉励人们随顺六二的阴柔之情，静观其变，等待时机，这就是所称“居吉”的意思。弦外之音，鼓励青年男女的感应结合，不应该光凭一时热情的盲目冲动，而应该秉无邪正直之本性，防之以礼，随顺无害，则人伦完美，化险为夷，吉祥如意。封建社会中比较正直的士大夫教育子女，多有这种认识。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大腿。随，随上卦而妄动。九三处下卦之终，下卦发展到了极限，因而力求向上卦转化。九三阳位得正，又与上六阴爻相应，照理该是吉利之爻。但因下卦之艮的本性是静止，缺乏主动进取精神；而九三之阳亢盛躁动，摆动双腿，盲目随人。一方面希望上应一阴，同时又产生了下随二阴的强烈欲望，三心二意，见一个爱一个而不管双方是否都有感应的诚意，妄动躁进，当然情场失意，

处处碰壁，所以说是“往吝”。凶爻之象的产生，是由于所追求的理想和标准低下的必然结果。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憧憧（chōng），意不定貌。爻辞是说，九四坚持贞正无邪品格以获吉祥，悔恨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九四忧心憧憧地来回奔波，最后说服了朋友，终于顺随了心愿。九四的感应已由下卦的下体，逐步向上发展到了心。古时之所谓心，不是今天生理上主管血液循环的心脏，而是主思虑的心灵。这是由于科学水平所限。但古人所想像的心，已赋予了今天大脑的思维功能，则是千真万确的。九四爻位，已由下卦上升到上卦，处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心的位置，居于体中，在股之上，上下体始相交感，关键在于内在心灵对于爱情感应的认识。心灵守正无邪，当然爱情专一，所以“贞吉”而悔恨消失了。但心灵的认识随事物的发展而变化，考虑到种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一波三折，一唱三叹，所以有时忧心如焚，彻夜不眠。《诗经》开篇《关雎》说到男青年追求美丽少女时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把恋爱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描绘得惟妙惟肖，形象地说明了九四“憧憧往来”的涵义。最后由于心正意诚，终于如愿以偿，顽强不懈的追求和解释，终于实现了美好的愿望。所以“朋从尔思”，应该说是一个吉爻。爻辞实际上是古代婚姻礼制的简单总结。也就是说，爱情的感应应当无邪持正，约之以礼，如古人所说《诗经》的“国风好色而不淫”，这样才能爱情坚贞不渝，白头偕老。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méi），脊肥肉。脊肥肉在心之上，口之下。九五阳刚居中且正，处于尊位，下应下卦的六二，爻象原该是大获吉祥的。但因感应发展早已超越心灵的敏感点，脊背肉反应迟钝，性又孤僻，独守一处，自我封闭，少与外通，虽然因而减少了矛盾纠葛，但终难以产生震撼人心的感应与共鸣，没有什么发展，仅能获得“无悔”的结果。所以《象传》批评九五说：“志末也。”也就是说，缺乏随心而动的感应，处于被动状态，是由于理想不高、志气低下的原因。在生活中，一些社会地位尊贵的人，婚姻并不一定美满，夫妻生活未必和谐，原因很多，但本身内在的修养不高、缺乏热情，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虽然生活“无悔”，没有什么危险，却因缺少感情共鸣，无法激发出应有的生命活力。“无悔”之辞，已暗示了情感的风波。

上六，咸其辅、颊、舌。

辅，上牙床。牙床、脸颊和舌头，是人们说话的生理器官。爻辞是说，交感

停留在口头上。爻辞并没有预示吉凶。吉凶之兆，要看言语与心的关系而言。汉扬雄说："言为心声。"言语的感应如果表达了内心的专诚，就可由交感之速，转入下一《恒》卦的持久不渝、百年偕老的境界。相反，如果"巧言令色"，心口不一，这就不是"无心之感"，而是充满自私功利目的的"有心之感"，比如越剧《王魁负桂英》中的王魁，为了功名利禄，抛弃患难之交的结发妻子，重新追求相府小姐，这种巧舌如簧的"交感"，是一种丑恶表演，最后必然不能持久，落得可耻下场。这就是去吉趋凶的自我毁灭。《象传》说："咸其辅颊舌，滕（腾）口说也。"只依靠腾扬言辞，花言巧语，骗取共鸣，这样的感应是无法持久的。上六以阴爻居全卦之终，已处于转化的临界点，所以明来知德《周易集注》说："感极而反，其应徒在口头言语而已。"《诗·小雅·巧言》一章，曾形象地抨击了专"滕"口舌的无耻之尤，曰："蛇蛇（音移，安舒貌）硕言，出自口矣，巧舌如簧，颜之厚矣。""巧言令色"，小害个人，大祸国家，怎能不防呢？所以孔子曾予痛斥，并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揭穿言语感应骗局的办法，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只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则口舌言语是否真诚，感应能否持久，一经实践检验，自是昭然若揭，不辨自明。

对于《咸》卦，美国《易经》学会会长钟启禄先生曾从男女青年的生理和心理角度，作了精辟分析，他认为，异性男女之间的感应，有形感、口感与心感的不同。《咸》卦从人的下体交感始，逐渐上升到上体，下体初六、六二、九三的交感在脚拇指、小腿肚和股部，从生理上说明男女交合的初步阶段，这属形感，也即肉体的接触。在《咸》卦中，这不是主要的，因为下艮是随上兑而动的。上卦九四则是"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是心感，由诚挚贞一的心灵感应，指挥全部感应的过程。九五则为曲折，感而难通，仍回到形感阶段。上六则为口感阶段。口感包括了接吻与言语相悦的感应，这是吉凶未卜的转化阶段。这为《咸》卦的感应寻找了生理与心理的科学根据。他据此总结说："《易经》所处理的问题，多属人际关系的。而《咸》卦，乃系人伦之卦、它的用意，则在指出少男少女，感应相与的正当途径，指点如何去避凶就吉，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少男求之专止，与少女说顺的对应。像这样的感应，不仅有双方心弦之共鸣，且以两人彼时存在的总体，交互投入。"在讨论时，学生Y君也从青年学生的恋爱事实出发，指出学生恋爱，因为初恋腼腆，开始是暗中在课桌下踢脚，故爻称"咸其拇"，以后逐渐胆大，男女双方拍腿拍股，终于陷入苦恋相思阶段，如九四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最后则相恋成功，拥抱狂吻。这是青年男女恋爱全过程的缩影，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不敢掠美，录以备考。

当然，人类当中，不仅青年男女有心灵感应，成年社会也到处存在，它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各领域。如战国时孟子就提出了"与民

同乐”说，涉及了心灵感应社会效应的正面和负面。《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一则故事：

>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麀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以周文王的“与民偕乐”，及殷纣王的暴虐独乐为例，说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如果心心相印，彼此感应，并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则上下和谐，国泰民安；反之，与民不相感应，格格不入，视民为寇仇，加以压榨屠宰，则人民奋起反抗，诛独夫民贼，纣王身死国灭，万世唾骂。社会心灵感应的正负面如此明显，能不慎哉！研读《咸》卦，广开思路，于国于民，大有好处。

恒

卦第三二



锲而不舍恒久道

《恒》卦（䷟）第三十二，序列《咸》卦（䷞）之后。从卦体看到，《咸》《恒》二卦的上下卦形颠倒，彼此互为综卦。从卦形的变化已可窥其相承相续的密切关系。所以《序卦传》说："有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意思是说，《咸》卦所象征的阴阳交感、夫妇和谐的共鸣互应之道，为万物之必然，人伦之首唱，应是人们共同而长久坚守的伦理准则。由此生发，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所以《咸》之后必然继之以象征恒久之道的《恒》卦。恒，汉隶作"恆"。二字相通。《说文》作"恆"，云："恆，常也，从心、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段注云："上下，犹往复也。谓往复遥远而心以舟运旋，历久不变，恒之意也。"其实，段注所称"心以舟运旋"的说法过分复杂，可能超越了古人创字时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我们可据"恒"的字体结构来理解，犹如男女二人，同舟共济，努力一心，则险难可济而见天地长久之道。《尔雅·释诂上》和《说文》一样，释"恒"为"常也"，如用《易》学术语来说，"常"就是"不易"，这是"恒"的本义，是从天地万物不变的规律和原理方面来说的。但是，行有恒则事业光辉灿烂而可传之久远，所以"恒"又引申出"久也"之义，用《易》学术语说，"恒"又含有"不已"之义，锲而不舍，追求不已，恒久之道在时间的运行中千变万化而愈加生动丰富。所以，《序卦传》及《广雅·释诂三》均称："恒者久也。"综合言之，"恒"为常久之道，含有"不易"及"不已"二义：从静态位势而论，"不易"之常为规律、原理及反映天地之道的真理；而从动态方面言，则"不已"之久为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恒久之道并非拘泥于一招一式之框架或固定模式，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变化中焕发恒道之光辉。所以"恒"道又来自于人们

对于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创造。《易》卦的作者正是按照上述的理解来创设《恒》卦的，因此颇富矛盾运动的辩证观念。

卦辞曰："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意思是说，《恒》卦象征恒久之道。此卦之义，亨通吉祥，无有咎害，利于坚守正义和不断前进。卦辞从正面阐述了全卦意义。《彖传》解释说："《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按《彖》所释，卦辞总其卦义有四："刚上柔下，一也；雷动风应，二也；由顺而动，事乃可久，三也；刚柔相应，乃理之常，四也。"（见陈梦雷《周易浅述》，四库全书本）原来，《恒》卦（䷟）之体，上卦是震（☳），震象征雷，其性刚而动；下卦是巽（☴），巽象征风，其性柔而顺，沿物之隙，无所不入。卦象所示，刚雷动于上，而和风应于下，事物运动，顺遂物性而无所不入，所以事业辉煌而传之久远。又从卦形看，上下卦之间，阴阳之爻，各自共鸣互应，刚柔相济，阴阳和谐，这是事物发展的常理。因此，由卦辞看，"恒"之为道，"常"与"久"二义不可偏废，动与静必须刚柔相济，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来坚守并且发展公理与正义的。

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认为"《恒》，夫妇同居之卦也。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劫略或买卖以及其他不正当之婚姻，必不可久，不成为夫妇之道也。"所谓"劫略买卖"婚姻，在古代是平常之事，春秋时如晋献公伐骊戎，掠其男女而娶骊姬。但是，常见之事并非意味着亨通无咎的恒久之道。后来晋国因献公之宠骊姬而杀太子申生，驱逐重耳诸公子，结果国家大乱，其利安在哉？于此可见，《恒》卦辞所称的恒久之道，乃与持正致善相一致，而与偏邪沽恶相反。劫略买卖婚姻，皆为淫邪不正之事，所以婚姻必生变故而不可守恒致久。这一意旨，对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现象，对于现今广泛存在的嫖娼卖淫现象，可谓针戒药石，促人猛醒。当然，《恒》卦并不止讲夫妇之道，所以胡朴安先生又补充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天地之道，即人之道。天行健，地载物，恒久不已……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者……寒往暑来，暑往寒来，行乎四时而不已，曰变化。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圣人教民男力田，女持帚，久于恒之道，而天下之化成也。此儒家伦理的政治学所由起也。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所恒，天之道与人之道也。"可见《恒》卦所倡恒久之道，意义广大。又《彖传》云："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杨万里《诚斋易传》解释说："终始变化者，恒之道，所以久而不穷；立不易方者，恒之节，所以久而不变。"所论恒之道有变与不变二义，也有所见。君子之恒道，立不易方，正是来自对于变化发展事物的观察与体验，守"恒"之道，在历史的进程中，并无固定的模式，而有不易之原则。

与卦象卦辞不同，爻位爻象及爻辞，除了说明时间阶段的发展外，则更多的是从反面来说明恒久之道的追求及其意义。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周易集解》引虞翻之说："深也。"爻辞是说，初六深求致恒之道，操之过于急骤，反而会有凶险，应守正以避害，而不要冒险前往求利。初六上与九四阴阳相应，前往追求，原应大有利益。但是，初六又处下卦之初，在卦中爻位最下，上被九二、九三所隔阻，所以上求之道不畅通而生躁急求深的情绪，而且，初六阴居阳位而失正，柔暗而不善于审时度势，一味盲动，怎能不遇凶险？也就是说，求恒之心，虽属正常，但是事物致恒之道自有其发展规律，犹如蒸馒头，时间不到，火候未成，不可急于开锅品尝。不然则将夹生不熟而难以下咽。《易》卦爻位，象征事物在时间运行中的某一发展阶段，为人处事，正当有审时度势的自知之明。因此，初六爻辞"浚恒贞凶"之戒，是宝贵的人生经验的总结。社会人生，交际之道，应该由浅入深。那种仅凭一面之交，未知深浅而谬托知己的情况，常会上当受骗。现代商业社会中的许多不法之徒，正是利用了人们急于成交的"浚恒"特殊心理，以行其诈骗之奸。所以杨万里认为，始之相交以求乎上，如若操之过急，则求深反浅，"虽正亦凶，何利之有"？他又举汉代历史为例说："盖势利之途，犹万仞之渊，深则没，浅则出，君子疾趋而避之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贾捐之之荐杨兴为京兆，以杨兴之荐已于上前是也。不然，贾谊之说文帝、京房之说孝元，所谓虽正亦凶者与！"（《诚斋易传》卷九）原来，汉初国势初定，故老重臣掌权，贾谊急于改革，向汉文帝上《治安策》，描绘当时形势，有"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之言，慷慨激烈，抨击弊政，不仅抵忤权贵，而且矛头直指汉文帝。在形势不利之时，操之过急，终于沉沦郡国，郁郁而卒。事载《汉书·贾谊传》。又据《汉书·京房传》，汉元帝时，宦官石显擅乱国政，京房以《易》卦阴阳之筮进谏，劝上除石显，又暗谕汉元帝是"危亡之君"，云："齐桓公、秦二世亦尝……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言始出而惊朝廷，求上信任而不审时度势，反被奸人下狱致死。贾谊、京房之谏，"浚恒"之举，诚斋所谓"虽正亦凶"之事。又贾谊曾孙贾捐之，元帝初即位时即上疏言得失，但因宦官石显进谗而不得官。因与长安令杨兴相交，荐杨为京兆尹，又让杨荐捐之为尚书令，暗中共图石显，事发下狱论诛。事见《汉书·贾捐之传》。"浚恒"之初，"虽正亦凶"；更何况贾捐之行事，正邪相杂乎？诚斋之叹，颇有人生感慨。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九二，悔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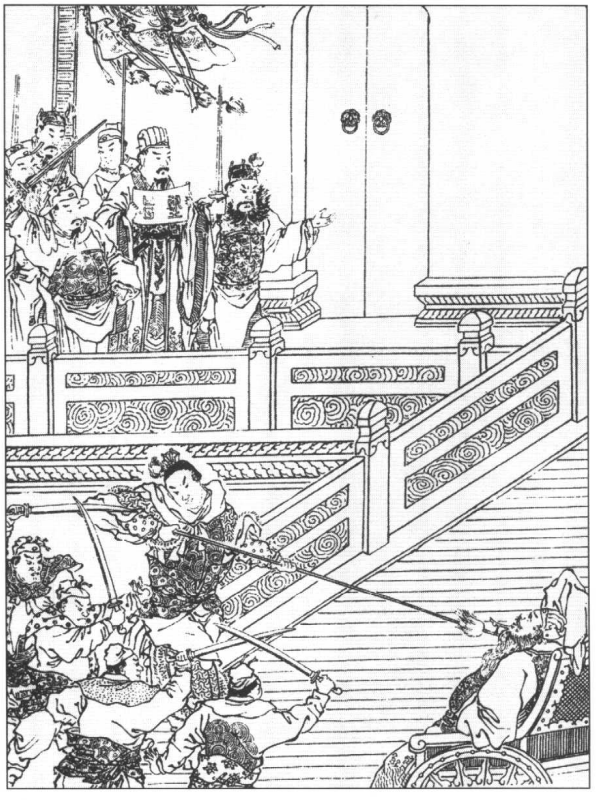
亡，既可解释为消亡；又同通"无"，无悔，就是无有悔吝。二义均通。九二为什么能悔吝消失呢？《象传》云："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九二阳爻居阴位失正，本当有悔。但是，九二又处下卦之中，上与六五阴阳相应，谨持中庸之道。《易》卦作者，重视"中"胜过于"正"。守持中道则能久于事业之恒，此所以"悔亡"也。后来儒经的《中庸》思想，明显可见《易》卦影响，故云：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比如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是颜回，他是近乎圣人的君子，所以孔子称赞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行乎中道，恒久其善而不失，岂非悔恨自然消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爻辞是说，九三处事，反复无常，二三其德，必然时或受到羞辱；应持正以避免遗憾。九三阳居阳位得正，又与上六阴阳相应，应该是吉爻。但据爻辞“贞吝”之言，却明显并非吉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九三处下卦巽体之上，虽位正而不中，又急于上求上六之欢，盲动躁进，急于从下卦巽体而企求升到上卦震体之中，不能久安其所，因而显露其二三其德而不能守恒之道的迹象，此其所以时时会受到羞辱也。社会中人，行为处事，如果缺乏自知之明，不知自己的能力和所处的位置，而盲目追求一己之私利，丧失了做人起码的道德准则，必然最后自招羞辱而致憾终身。比如三国时的吕布就是如此。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吕布武艺精通，“膂力过人，号为飞将”。他先投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大见亲待”。但董卓作乱时，诱布以利，“布斩原首诣卓，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后司徒王允密诛董卓，又厚接纳布，于是布“手刃刺卓”，进封温侯，与王允“共秉朝政”。李傕乱起，布败，投袁术，“术恶其反复，拒而不受”，自蒙其羞辱。又奔投刘备，旋即逐备而据其城池。最后为曹操所擒，又低声下气，乞降求生。曹操正犹豫间，刘备劝曹操说：“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与董太师乎！”于是杀布。吕布无视“恒”道，自取灭亡。

■吕布杀董卓



九四，田无禽。

爻辞表面不言吉凶。只是叙述九四外出田猎而一无所获。作者只讲故事，而吉凶之兆在其中。如孔颖达《正义》所说：“田者，田猎也，以譬有事；无禽者，田猎不获，以喻有事无功也。”有其事而徒

劳无功，凶象毕露，何必明言？从爻象爻位看，九四居大臣辅君之地，责任重大，但却阳处阴位而失正，又处上卦之初，虽下应于初六，但是过刚失中，不中不正，怎能久持恒德？不能守正持中，则与九三相似而反复无常，其人以私利为鹄的，岂能保其禄位而永远不败？所以《象传》说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比如战国时的苏秦，先西入关说秦连横之术，不合而去，东与六国高论合纵之理，取六国相位，联兵攻秦。一会连横，一会合纵，二三其心，最后遇刺身亡。正如九四之“田无禽”，终于一无所获，徒劳无功。《周易折中》引胡瑗之言：“常久之道，必本于中正。九四以阳居阴，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为治，则教化不能行，抚民则膏泽不能下，是犹田猎而无禽可获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爻辞是说，六五常保其阴柔美德，筮得此爻，对妇女来说是吉象，而对男人说是凶兆。为什么男女共此爻而吉凶判然有别？如《周易折中》引朱熹《朱子语类》所说：“所谓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视其德而有吉凶耳。”六五阴居全卦中位，实处君位，下应九二之中，如苏轼《东坡易传》卷四所释：“《恒》以阴从阳为正，六五下即二，则妇人之正也；九二上从五，则夫子之病也。”上古时代，男尊女卑，对于妇女来说，虽居尊位而以柔顺美德恭谦待下，用心专贞而夫唱妇随，合于奴隶及封建社会阶段之常礼恒道，此所以“妇人吉”。而对于男子汉来说，若居尊位而乏其阳刚之德，行不健则力不致，能久于其事乎？不能制义裁断，果敢负起领导国家责任，一味仰仗九二强臣之决事，能保其江山永固吗？此其所以“丈夫凶”也。史上之例，如春秋时鲁哀公，性柔弱而德暗，患于大夫势力强大而不能制，后被三桓所逐，奔邹逃越之不暇，最后客死于山氏。处君位而不听孔子之言，如妇人之屈顺于人，致使国乱身死，此为“丈夫凶”之例。至于《象传》所释，说是妇人“从一而终”之义，这是以后代封建礼制的观念来解释上古时代奴隶社会的婚姻关系，并非确切。上古三代，似乎较多保存了原始公社群婚制的残余，夫死改嫁，名正言顺，典籍有载。

上六，振恒，凶。

爻辞是说，上六积极兴作振动而背离了恒久之道，无法保持其位，有凶险。从爻象爻位看，上六处卦之极，同时又是上卦震之终，震为雷，性刚而动，所以有“振恒”之象。又上六处卦之终，物极必反。其时恒道已处在转变的阶段。在此关键时刻，上六不安其位而一味震动躁进，必然不能保其恒久之道。所以《象传》说是“振恒在上，大无功也”。王弼注曰：“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杨万里以东晋桓温枋头之役为例，云：“恒之世，当处静之时，为在上之

臣，宜镇以安静之治可也。今乃挟阴邪之资，居震动之极，必欲振而摇之者，志于要功而已。圣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原来，桓温在东晋王朝中，职兼文武，权倾朝野，威震国主，“以雄武专朝，窥觊非望”。他曾中夜抚枕起叹：“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于此可见其勃勃野心。为邀功固权计，他在东晋国家未振、形势仄蹙之际，于太和四年（公元369），不顾朝廷众议，率兵北伐，与慕容暐军战，先胜后败，枋头战役之中，敌军铁骑八千追击，“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以此朝野震动，国势日蹙。事载《晋书·桓温传》。“振恒”之凶，《恒》卦之戒，能不慎乎！

总之，持正致恒之道，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卦象卦形及卦辞所示，《恒》卦上震为雷，下巽为风，风雷相激，阴阳互应，以遇有合为常，所以和上面的《咸》卦一样，《恒》卦总体是个吉卦，这是从正面肯定恒久之道的意义。而爻象爻位及爻辞，则从反面来说明其遇未能相合时的历史教训。所以除了九二“悔亡”为非吉非凶之爻外，其余五爻，非凶则吝。可见在事物矛盾运动的历史变化之中，致“恒”不易，必须审时度势，适应变革，守正防凶。如苏轼《东坡易传》所说：“雷风，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雷风也。故君子法之，以能变为恒，立不易之方，而其道运矣。”又说：“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及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及其未穷也。”（卷四）致“恒”之道，君子立不易之方，其行有常，坚守原则；但这一切并不排斥因时适变之无常，“恒”道必然要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如天地运行之常，正来自于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转换，来自于风雷相激、日月交替的运行规律之中。无常之变，乃致“恒”的必经之路，合于生活的辩证法。所以《彖传》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全面地总结了《恒》卦的深刻意义。另外，天地之“恒”，客观存在，有规律可循。而对于人类来说，追求恒道，就要有“恒心”，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则事业大成而垂照千秋万代。《尚书·汤诰》有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心，克绥厥猷。”意思是说，只要人民有“恒心”，坚持正义，则必然最后战胜夏桀，而商汤以兴。又如孔子曾引当时俗语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论语·子路》）人若缺乏恒心，虽巫医寻常之事尚不可为，更何况是人伦道德、国家大事呢？孟子也有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按：通“网”，张罗陷害）民也。”（《孟子·梁惠王上》）致民于无恒产无恒心的艰难困境，事业怎能兴旺，国运怎能有常？圣哲之言，启迪至深，读者至此，自然悟入而有会心。

遁

卦第三三



遁世无闷俟时行

《遁》卦第三十三，次于《恒》后。《序卦传》说："恒者久也。事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由此可见，事物发展之道，恒久不易仅是其一端而已，因为世界的万事万物，总是在运动变化中前进而日趋成熟的。而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有进就必有退。就如《庄子·逍遥游》中那背负青天、海运南冥的鲲鹏，虽然有"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特殊功能，气势极其恢宏。但是庄子也不得不承认，高翔九万里即其极限，所以不说是九万零一里。如果鲲鹏肯日超越其体能极限，只知高翔而不欲下降，则将粉身碎骨而被那些控地而飞的蜩鸠之属所笑，又岂能抵达那千万里遥的南海？故"遁者退也"实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于人事亦然，就是本领再大的圣贤也无法回避。前进是事物发展的象征，退避也是事物发展之必然，犹如手心、手背是同一手掌的两个方面一样，其理至明。如果以前进是事物的阳刚属性，则退避是其阴柔德能。该进而前，应避而退，阴阳刚柔兼济互用，这样全面地看待事物的发展过程，就不会局限于一隅之偏见了。

《遁》卦（䷠），下体艮（☶）而上体乾（☰），卦辞云："遁：亨，小利贞。""贞"有二义，一作贞正，一作占卜问筮。在《周易》六十四卦中，二种用法，交迭使用，应视其具体情况而定。据此，卦辞可有二种理解。如以"贞"为正，则是说《遁》卦象征退隐避让，其道亨通，柔小者利于守正顺时。但如以"贞"为卜，则是说《遁》卦象征退避，占卜而得此卦者，顺时而行则其道亨通，但诫其只能获小利而不可大有作为。二说虽有不同，但强调该退之时则避，是应天顺时，其道亨通，意义重大，道理又是相通的。实际上，《遁》卦所象征的退避，是事物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般人以为事物发展向上向前为

吉，而以向下向后之退避为凶。这样并非全面地理解《易》理。如果该进之时而向前，当然是吉兆。但是，如果处在该退之时仍盲动前进，则由吉趋凶，自取其咎。相反，此时如能顺时而急流勇退，行遁之道，则又逢凶化吉，故卦辞所以称“亨”，也即退避是为将来的更大发展作铺垫，而打开了通向亨通之道的大门。所以《彖辞》释云：“与时行也……遁之时义大矣哉！”就以战争为例。清咸丰七年（公元1887），发生在安徽战场上的三河之役，在曾国藩父丧夺情复出之后，湘军急于进军安徽，以便切断太平军的生命线，完成包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市）的任务，因此派出大将李续宾率师攻皖，湘军七千人马，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地，掠足金银财宝，自以为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当时赵烈文即劝李续宾急速撤离三河而不攻，该退则避，但是，这时的湘军将领，利令智昏，只知进不知退，因而招致了一个全军覆没的巨大阴影悄悄袭来。原来，当时太平国的统帅陈玉成，采用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办法，在形势不利或大军尚未调集之时，主动撤退，连让四城以保存实力，然后在击破包围天京的清朝江南大营时，迅速挥师进皖，十几万人马在三河镇布下口袋陷阱，引诱李续宾的湘军来钻。这时太平军所发挥的恰恰就是《遁》卦的以退避为亨的道理。果然，湘军的骄兵悍将钻进口袋，十几万太平军立刻合围，湘军四面楚歌，主帅李续宾自杀，七千人马全部被歼。太平军的战役胜利，证明了该退则避，主动后撤是正确的，这为三河合围捕捉了时机，保存了有生力量，证明了《易经》所称“遁，亨”之理。而李续宾等湘军将领，则只知进而不知退，不明《遁》道，自取灭顶之灾。以上是就卦德卦性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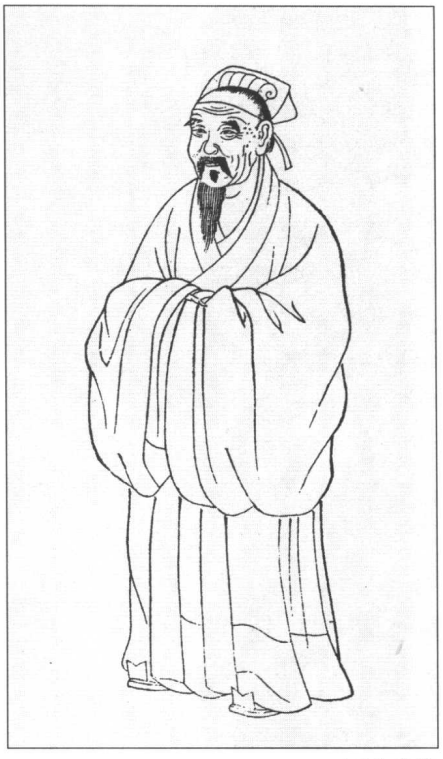
从卦形卦象来分析，《遁》下艮上乾，乾为天而艮为山，故《象传》云：“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乾象征天，而艮象征山。意即以天喻君子，以山况小人。艮三爻中有二阴，以喻小人浸长，如山之高逼云天而妨害君子，而天乾阳刚之气轻清而上飏，主动远离而山不能侵，如君子之远小人，在小人得势之时，贤人君子主动退避而不去针锋相对，小人虽然得意于一时，却也奈何不了正人君子。故《象传》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表现了君子隐遁退避的主动精神，是顺时而动，知幾远祸的明智之举。

从“天下有山”的卦形卦象看，还可有另一解释。艮性为止，意谓人知其止。天下之山，正是正人君子该退之时的隐逸之所。原始人类，原是生活在山林中，以采集果实为生。后来逐渐发展，建立了平原城市文明。但是，山林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已成为中华古人的潜意识。因此，一旦形势不利，无心政治，立即归隐山林，过着隐遁的生活。《遁》（䷠）的上卦之乾天，以喻秉阳刚正直之性；下卦之艮山，成为守正君子隐遁之处所。君子隐遁山林，可以远害而亨，在时非大有可为之际，诫人以“小利贞”，即守持贞正可获小利，一时不可有大作为。此时若有大行动大作为，必招小人之怨而自取祸灾。故卦辞一再告诫“遁亨”之“小利贞”，强调利之“小”，寓意精深。

再谈爻辞。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意思是说：初六，退遁的时刻刚到之际，避之不及，落在后面，这样就会有凶险，这时不适宜于继续前进了。初六处下艮之初，艮有止义，应是遁者知止。但初六以阴处阳位不正，上和六二，两阴浸长不知遁止，故诫之以“勿用有攸往”，往则有灾难凶险。比如《续资治通鉴》记载，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朝廷中韩侂胄擅政，台谏希风，专长事排击，乞斩（朱）熹以绝伪学，朝廷削秘阁修撰朱熹官。此为小人得势而君子行遁之时。但朱熹虽是《易》学大师，却也糊涂一时。史载：“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赵汝愚之冤。子弟诸生更迭进谏，以为必贾祸，熹不听。蔡元定请以蓍决之，遇《遁》之《同人》，熹默然，取稿焚之，遂上奏，力辞职名。”从《遁》卦（䷠）之《同人》（䷌），变爻是《遁》之初六化阴为阳以成《同人》之初九。《遁》之初六爻辞有“遁尾，厉，勿用有攸往”之诫。朱熹此时如果继续上封事而“用有攸往”，必遭韩侂胄等小人的镇压而历劫难。而《同人》初九爻辞则有云：“同人于门，无咎。”即家居讲学而与门生和同，必无咎害。这一正一反的道理，使朱熹觉悟，行遁之道，辞职家居讲学，一方面远小人而避祸，一方面又扬正气而不辍。但初六“遁尾”之“厉”，仍有影响，后来朱熹因此落职罢祠，而其门人蔡元定，也以“佐熹为妖”之罪，编窜道州，流死于外。



■朱熹像

又黄寿棋、张善文《周易译注》对初六有说明云：“《折中》引杨启新曰：‘卦中以二阴为小人，至爻中则均退避之君子，盖皆遁爻，则发遁义。’此说表明卦象主全卦大义，爻象言一爻旨趣，两者有异，当区别对待。”所论甚是，读《易》者于卦、爻之间，当具体而灵活地看待，而不可拘泥于一方。对于六二爻象爻辞，更应作如是观。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说，通脱。意谓六二，被黄牛皮绳捆绑牢固，无法解脱，难以行遁。原来，在《遁》卦中，初六与六二象征二阴小人，浸长逼迫阳刚君子。六二处下艮之

中，为成卦之主。但转换视角而观以爻象爻位，则六二仍为处遁思遁之君子。但六二阴处阴位得中得正，又上应九五阳刚之尊，志在辅时而不随波逐流，其位置态势，似欲行遁而不可得，犹如被黄牛皮绳所牢系而不可自解，其志可嘉可敬，故虽不言凶厉以明斥，但居遁之时而不能遁，其凶厉潜伏其中而随时可能作祟。下艮三爻不能及时行遁皆凶，而六二不明言疾厉者，哀其心志之忠诚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引侯果曰："殷之父师当此爻矣。"黄寿祺等以为"殷之父师"即指殷纣王时的箕子，云："其当殷衰之时不肯隐遁避祸，《尚书·微子》载箕子语'我不顾行遁'即是。以比喻六二爻义，似可切合。"（见《周易译注》）据《尚书·微子》篇，父师有云："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箕子在亡国之前，一再努力兴起挽危图存的热情，而不顾行遁隐居，但仍无法挽殷纣王亡国之灾。后来周武王灭商之后，从"统一战线"出发，封箕子于朝鲜。据《史记·宋微子世家》云："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你看，以《遁》之六二喻箕子，的确相似。明知国难当头，仍然因"父师"职责所在，无法行遁而心有所系，犹如被黄牛皮绳所系执而难以自脱。"我兴受其败"，其志可哀，其凶不免。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遁，指心有所系，留恋不舍而不能遁。爻辞意谓：九三，心有所系恋而不能及时远遁，必有病灾凶险；这时若能小心翼翼地畜养臣仆姬妾，则可致吉祥。原来，九三处下卦艮止之终，应该迅速远遁而脱离险境为是。因为下卦艮体二阴迫阳，卦之所由遁也。九三与二阴共处一体，不远遁又待何时？但九三仍处艮体之内，艮为止，止其所遁。又九三与上九阴阳无应，又与下面二阴相近，下比六二，心有所系而贪恋其阴阳之和，犹如君子一时为小人的花言巧语或物质引诱所惑，留恋爵禄而不能及时远遁，此必致大灾大难之凶兆。故爻辞不仅以单字之"疾"或"厉"称，而出之以合称之辞"有疾厉"，声色俱厉，严辞以诫。如晋之陆机，吴亡入洛之后，思有作为，而八王乱起之时，形势陡变，祸难未已，该及时遁去，而他却恋于禄位而致"系遁"之厉。和他同时的张翰，据《晋书》卷九二《文苑》翰传云："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政，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而归，着《首丘赋》……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机。"张翰之意，顾荣曾及时转告陆机及早遁还东吴以待时机，但机

心有系恋，不听而及难，不保首级。据《晋书》卷五四《陆机传》云："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不久即因兵败致谗而被成都王司马颖所诛。此"系遁"之疾厉，引人警醒。但为什么九三爻辞又称"畜臣妾吉"呢？因为处九三之时，虽因一时心有所系而不及遁，但只要内明《遁》理，仍可与臣妾之类的小人巧加周旋，以便避祸，待时而动。爻辞称"系"，是心系于人，是被动的；称"畜"，则畜养臣妾，是主动的，故系为凶而畜为吉。畜养臣妾小人，仍是不可大有作为之时，但却营造了凶险之中潜伏下来伺机复起的环境。比如东晋时谢安长期隐居东山，畜养声伎以自娱，形势一变，即出山执政，在淝水之战中致大功业，成一代名相。"畜臣妾"之"吉"，不仅在当时之远祸，更重在将来的成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爻辞意谓：九四，君子之遁，出于自觉的喜欢和爱好，吉；小人则伪遁而此路否塞不通。原来，九四已脱出内卦艮止的牵制，而升于外卦之乾初，秉阳刚之德性，又有知幾之明智，虽下与初六阴阳相应，但却在该遁之时自觉割舍，及时而退，故称好遁以吉。小人反是，留恋名利，怎忍割舍以遁？即使口中称遁，也因其心非诚，其行之伪，而致"素隐"之讥。故杨万里《诚斋易传》卷九六："遁而诚为好遁，隐而伪为素隐……素隐者如乡愿德之贼。隐而伪不若不隐而诚也。九四以乾之初，当遁之世，知遁之早，味遁之腴，宜其好遁之笃也。故圣人许其为君子，赞其为吉；又叹其非小人之所能为也。"如秦末商山四皓见幾而退，长期隐居，直到汉朝统一天下，才复出辅助汉高帝的太子。而"小人否"也是史有其例的。如东晋文学家孙绰，据《世说新语·晋语》第二则云："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刘孝标注引《遂初赋序》云："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其赋播于人口，名动一时，似乎真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隐逸之士。其实，终其一生，他却恰恰是个热衷于功名利禄之徒，言行不一，为世人所鄙。故《世说新语·品藻》第六一则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讥"绰婴纶世务"，又引《续晋阳秋》云："绰虽有文才，而诞纵多秽行，时人鄙之。"他后来在权臣桓温手下求富贵，却不得志，桓温要人转告孙绰云："致意兴公（绰字），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此即杨万里所讥情伪之"素隐"也。

九五，嘉遁，贞吉。

爻辞意谓：九五，及时而遁实为嘉言懿行，筮得此爻为吉祥。九五已处上乾，远离下艮二阴之逼，位居君位，处全卦之中，又阳刚正位，下与六二阴阳相应，故小人不能妨害其遁，所以爻辞称吉。有人说，如尧、舜的禅让，也是



■范蠡像

功成身退的“嘉遁”之事，成为千古美谈，其“吉”之义，于此可见。杨万里《诚斋易传》卷九云：“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当遁之世，其将焉遁？……圣人天也，天不能违时，况圣乎？故尧舜遁天历，伊周遁天经，孔孟遁天意，是六遁者，遁之至，嘉志之至正者欤！”

上九，肥遁，无不利。

肥，通蜚，也就是飞。爻辞是说，上九，高飞远遁，无所不利。从爻位爻象看，上九处上乾之上，《周易集解》引侯果曰：“最处外极，无应于内，心无疑恋，超世高举，果行育德，安时无闷，遁之肥也……颍滨巢许当此爻矣。”其实，如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兴国灭吴后，深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理，见幾而作，急流勇退，远走高飞，其遁人不知其所，故人不能害而无不利，如鸿飞冥冥，矰缴何及？而且，范氏之遁，又为其成为商贾之祖创造了成功的机会。遁于政而成于商，正见上九肥遁之无不利，又见全卦遁道之转化，《大壮》随其后，也就势在必然了。如刘安《淮南子·原道训》曰：“遁而能飞，吉孰大焉！”上九处在遁道矛盾转化之位，就更值得思考重视了，故张衡《思玄赋》有“利飞遁以保名”之称，“飞遁”之名，关系甚大。

综而言之，《遁》卦之理，对后世士大夫的隐逸精神有很大的启发。故中国二十四史中有《逸民传》《隐逸传》之设。“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俗坛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后汉书·逸民传序》）故《易》遁之道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值得认真研究。《乾·文言》称君子龙德，时不利时，“遁世无闷”，《大过·象辞》云：“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隐逸之遁，并非全然消极避

世，而是一种时不我与，避祸远害，俟时而动，以图来日潜龙飞天之亨通。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以隐居东山的谢安自况。在隐遁生活之中，一个挽危图存的大计正在酝酿之中。故其遁是一种在残酷的斗争中自我保护的明哲之举，是一种积聚潜能以待爆发之用，充分体现了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积极主动精神。在这一方面，后世的儒、道二家精神相通，故《老子》称"道隐无名"，《庄子·缮性》篇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隐藏有"待"之言，积聚潜能之时。道家何尝只是消极避世！

大壮

卦第三四



生气壮盛戒骄溢

《大壮》卦（䷡）第三十四，次《遁》卦（䷠）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颠倒的综卦，《序卦传》云："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受"是继承或继续发展的意思。《序卦传》是说，事物成长的过程中，也不能一味遁避，只遁避而不思进取，不就成了一事无成的缩头乌龟了么！事物的发展，实际是有遁就有进，有舍就有取，"遁"避之中已孕育了进取，自强不息，终于迎来了生机勃发、气象万千的盛大局面，所以《遁》卦之后，紧接而来的就是《大壮》卦。壮者，盛也。大壮即非常壮盛之谓。清陈梦雷《周易浅述》释云："遁为违去，壮为壮盛。消而复长，违去之后仍复壮盛。遁则必壮，《大壮》所以次《遁》也。"因此，《大壮》卦就是事物发展非常强盛的象征。以自然为例：夏收时节，小麦丰收，这在我国北方农村，大库满，小囤溢，粮食堆积如山，农民欢欣鼓舞，壮健盛大之气，形于言表之间。但如进一步追问，这样的"大壮"之喜，其气运从何而生？原来，小麦越冬之时，同样经历劫难而曾行"遁"道。寒冬霜雪覆盖，严重冰冻，灭杀害虫，而小麦种子则遁埋土地之中以避其酷寒之气，以免冻坏生命活力之所在的胚芽组织。只等来春蛰雷一响，麦苗破土，茁壮成长，这才有来年的丰收。宇宙自然，就是这样送往迎来，生气流转，由遁避而日趋壮盛。人们如能正确认识并驾驭这一自然规律，则有可能逢凶化吉，在经历劫难之后，终成其名垂千古的名山事业。自然如此，人事亦然。如公元前二百多年的楚汉战争。灭秦之前，项羽和义军诸侯共约，先入关中灭秦者即王关中。刘邦首先率兵破关而入，秦王子婴出降。但项羽自恃兵强马壮，于是违约食言，鸿门宴上，差点杀了刘邦，后来把刘邦放置于崇山峻岭围困的巴蜀汉中，改封汉王。据《汉书·高帝纪》云："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当时

刘邦火冒三丈，想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率兵与楚军决一死战，但萧何审时度势，力加谏止。另外，智囊张良也同时“说汉王烧绝栈道……视项羽无东意”，也就是说，以退为进，故意掩盖自己的战略意图，向项羽表示汉军无意东出以与楚军争夺中原。很明显，萧、张二人清醒地认识到，楚汉二军，当时实力悬殊，如为逞一时之快而决一死战，则汉军无异于以卵击石，必然粉身碎骨。所以他们力谏刘邦暂行遁道。项羽果然中计，视汉王之避遁汉中为怯弱。但汉军在楚军主力东撤之后，即重新部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很快占领关中三秦，并以关中为牢固的根据地，东出潼关而与楚军逐鹿中原，最后垓下一战，项羽自刎乌江。刘汉终于由遁弱而趋大壮，建立了强盛统一的西汉王朝。历史形象地描绘了《大壮》由《遁》而来的运行轨迹。



■张良像

《大壮》卦（䷡）下乾（☰）上震（☳），下乾为天，上震为雷，天上雷响震动，声威赫然盛壮，象征生机勃勃而处于非常壮盛阶段的事物。从卦性看，下乾刚健，上震雷动，汉荀爽云：“阳从下升，阳气大动，故壮也。”（见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这与《彖传》所称“刚以动，故壮”同一意思。而从卦体看，如前所述，它与《遁》互为综卦。须知，阴阳对转，《易》理重变，《大壮》卦形卦象，由《遁》卦发展变化而来，这就揭示了二卦之间的必然联系。就整体言，《大壮》该是个吉卦，故卦辞云：“大壮：利贞。”贞，在此作动词用，意指占筮。卦辞是说，《大壮》象征事物强盛壮大，占筮得此卦者，大为有利。但是，贞又可作“正”解。故卦辞之“利贞”，还可解释为培育正气、坚守正义，则大有利于事物的发展，从而达到“大壮”之境界。也就是说，持守正道，则阳刚君子正常升进而获利；反之，“大壮而不得其正，强猛为之耳，非君子之道壮盛也”（程颐《伊川易传》）。这样就会小人猖獗，君子不胜，故作《易》者以“贞正”戒其骄溢。杨万里《诚斋易传》明确指出：“惟正故大，惟大故正，正则举天下万物莫能加……舍正大何适矣！四阳强盛（按：指下面四阳爻），二阴（按：指上体五、上二阴爻）微灭，大者胜则小者衰，刚者动则柔者退，强者长则弱者消，理之自然也。”这又从卦形方面来分析全卦的阴阳矛盾变化，说明了持守正义、力戒骄溢才能获致真正意义的大壮。故《象传》释卦辞之“利贞”，有“君子非礼勿履”之语。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说教，而是对《大壮》卦义作

深入一层的阐释，对读者颇有启发。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爻辞是说，初九，足趾壮盛，盲动起行，相信必遇凶险。孚，信也。“有孚”，信其遇凶之必然。初九阳刚位正，原该是吉爻，为什么反而“征凶”呢？从爻位爻象看，初九阳刚初生，处于大壮的初级阶段，如人之行，始于脚动，所以爻辞以趾代脚，以喻其动之初始。但脚在下勇于行，必受在上身心的指挥，若其心偏不正又体力不支，则脚之壮于行为盲动，盲动者必败，故爻有“征凶有孚”之戒。如前不久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奥运会，在最为紧张激烈的男子百米赛中，世界第一飞人因不听信号而盲动抢跑，终致名落孙山之外。对于志在必得的世界纪录创造者来说，这不就是“壮于趾，征凶有孚”的形象写照吗？而从爻位来看，全卦阴阳六爻的运动变化，象征壮盛事物处于不同阶段的特殊情境。初九虽然阳位得正，在一般卦中，应属吉爻；但在《大壮》则不然。因为《大壮》是阳刚之气盛大的阳卦，而《易》理重变重转化，盛极必衰，是自然规律，故卦辞以“利贞”戒其盛骄之溢。因此，根据《大壮》卦的特殊情况，反而是以阳处阴、保持谦和精神为美。如宋代易被《周义总义》所说：“《易》之诸卦，阴阳贵乎得位。惟《大壮》之卦，阳刚或过，则以阳居阴者为吉。盖以虑其阳刚之过于壮者也。故二爻与四爻（按：指九二、九四）皆言贞吉。”读《易》会心，必须灵活，据实分析，方可得其要领。初九阳气初生，力不厚而德未积，恃盛生骄，盲目行动，急于求成，但上行又与九四同性相斥而乏其应援，此则欲速而不达，故遇“征凶”之险。以史为鉴，如汉初贾谊上疏文帝，急切要求兴利除弊，疏中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之语（《陈政事疏》，见《汉书·贾谊传》），揭露黑暗，抨击腐败，不遗余力。其用心良苦，一股阳刚正气，凛然而生。从客观条件看，当时贾谊年少官微，急于求成，上无应援，如《大壮》初九之“壮于趾”，虽勇于闯而不良于行，是动辄得咎，最终因权贵排陷，很快斥出朝廷。“征凶有孚”，实为经验之谈。初九“征凶”之兆，戒人慎始于行。

九二，贞吉。

九二之吉，理由如上述易被所言。二处下乾之中，以刚中之美质，处阴柔之位而不疑，谦和不骄，精神可嘉。又九二上与六五阴阳相应，得在上者之助，其行守中履谦而不亢躁盲动，谨慎行事，故爻有“贞吉”之美。人称“九二居大臣之位，为众阳之宗”（《诚斋易传》卷九），但处大壮时，则以持中居柔自戒，故致贞吉。如周公之辅成王，虽上有君主支持，仍然兢兢业业，履中守正，不亢不卑，慎始善终，故名垂青史。“贞吉”之谓，乃其必然之兆。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用壮，恃强蛮干。罔，通无。用罔，即无所用强、不仗势欺人之意。贞，此作动词，指占筮。羝羊，三岁壮羊。羸，拘累缠绕，喻被拘系遇险。厉，通“疠”，指传染病，泛指危病之事。爻辞是说，九三，小人恃其强盛而妄行，君子则虽强壮而不盛气凌人。占者得此爻则知其危病，犹如强壮公羊狠触藩篱栏杆，角为拘系而无法动弹一样。可见九三虽阳居阳位得正，但并非吉爻。从爻象看，九三、九四、六五上互之卦为兑（☱），兑有羊象，故爻以公羊抵藩为喻。如清陈梦雷《周易浅述》所释：“此恃壮轻进而取困者也。”而从爻位分析，九三处下卦乾体之上，阳刚至极，位又过中，急于升至上卦，但瞻此失彼，动辄得咎，进退维谷，故爻有“贞厉”之戒。如汉武帝时，将军灌夫上附魏其侯窦婴，和丞相田蚡相互倾轧，在势力不敌的情况下，使酒骂座，恃壮轻进，终致杀身之祸，其“厉”可知，此“小人用壮”之谓也。但今人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则另有其解，云：“小人用壮者，君子正当之生活，小人则利用之，如逾其墙垣，窃其马牛是也。君子用罔者，罔，即网……小人欲窃牛羊，君子用罔以防备之。”此解可另备参考。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舆，大车。輹，钩缚车轴以制动的零件，这里用以指代轮轴。爻辞是说，占得此爻者吉，悔恨消失。犹如公羊终于用角触破藩篱而摆脱困境一样，又像大车轮轴坚固而利于行进一样。因九四仍在上互兑卦之中，所以仍然用公羊作譬。决藩而胜，不仅不被拘系，而且为前进扫清了障碍，其“贞吉悔亡”以此。既要行进，于是又自然联系到古代的重要交通工具——大车，车轮盛固则其行速，可致千里而不败。故九四之爻，呈可进吉象。从爻位看，四处上震之始，震卦性动，故适于行。又四阳处阴位，谦慎以进，上承六五之君，阴阳相谐，所以能克服困难，触藩以进。这和九二仅言“贞吉”不同，九二上有三、四两阳隔阻，难以逾越以和合六五，阴阳和合的时机尚未到来，所以未能决藩，而无可进之象。故仅美其“贞吉”自守而已。又九四居大臣之位。如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冲破阻力，斥退宦官小人黄皓之流，犹公羊决藩以行。他把握时机，忠心辅君，劳于王事，六出祁山以伐魏，虽功败垂成，但无悔无恨，名传千古。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有关此爻，旧注多不可信。如朱熹《本义》云：“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或作疆场之‘场’，亦通。”亦通云者，因有违历史，实是未通。应以近人王国维、顾颉刚之说为是。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古史辨》第三册），根据王国维对于甲骨卜辞研究的发现，以为“易”即“有易”，古时易、狄通假，故“有易”即为“有狄”，是上古时代我国北方较为强盛的少

数民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山海经注》引《真本竹书纪年》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遂杀其君绵臣也。"六五爻辞是以殷商祖先的故事作喻。爻辞大意是说，殷王子亥寄于有狄，因其淫乱，被有狄之君绵臣所杀，并且夺其牛羊。人已被杀，为什么爻称"无悔"呢？因为前王已死，国人引以为鉴，殷之后王甲微励精图治，借师伐狄，杀绵臣以雪国耻，同时也壮大了殷商的力量。先失后得，何悔之有？故云。而从爻位看，六五阴居阳位失正，故有"丧羊"之灾。但阴柔居中，下应九二，阴阳和谐而得其强应，故其事业虽有失而后复得，故文称"无悔"，这是不吉之吉，以柔中保其大壮。由此可见，国之得丧，业之兴衰，事之成败，不可只看一时一地的局部，而应视其长远的全局。这是生活的辩证法。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爻辞是说，上六，公羊角抵藩篱，进不能决藩，退则被拘系，进退失据，行动必无所利。但如知其道艰，审时待变，则垂将来之吉。从爻位看，上六处震之末，居动之极，位壮之终，已临转化之际，整卦四阳之壮已过，所以上面二阴承之以柔自守，这是不进不退而无所利之象。但是，对于人类来说，这并非无所作为而坐以待毙之意，人们如能顺其规律，适时转化，上六一旦爻变为阳，则上卦由震而变离（☲），离为火，性光明；又从整卦看，将由《大壮》而变为《大有》（䷍），《大有》卦辞有"元亨"之吉，其上九爻辞又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言。如果我们读《易》能观其会通，联系卦变爻变来分析，则《大壮》上六爻辞"艰则吉"，也就是困难中见光明的意思。《易》卦重变，吉凶转化的关键，就在于养正于内，审时于外，度势而动，顺天以行。

综上所述，《大壮》为卦，因乾刚震动，阳气大动而生机勃发。全卦下面四阳盛壮寝长如君子，上面二阴衰退若小人，阳气上升逐渐斥退阴邪之气，则如君子道长而小人道消，这是全卦的总体精神。但如从具体的爻象爻位而言，则因事物所处具体时段和特殊情境，反而是阳居阳位者致"凶"或"厉"，而阳处阴位者力持谦和而致"贞吉"之美。如九四为成卦之主，虽处四阳最盛而致大壮，但其行进持谦守正，故有"贞吉悔亡"之誉。于此可见，处大壮之时，虽自感壮盛，但仍不可忘却历"遁"而壮的艰辛，更应养其正气，防骄戒溢，方能保其盛壮生机，促进事业蒸蒸日上。《易》卦作者，认为不用壮而弥壮，方才是真正的大壮。黄、张《周易译注》引马振彪《周易学说》云："匹夫之勇，不得谓大壮；自反而缩，理直气壮，乃所以为正也。天地有正气，可贯古今；君子有正气，可配道义。……不由道而胜，是小人之'用壮'，'亢龙有悔'也；由道而败，是君子之'用罔'，'潜龙勿用'也。《易》义多扶阳抑阴，而《乾》与《大壮》则

戒人用阳太过，推‘用罔’之义，殆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乎！”如北宋名臣范仲淹，即据《大壮》卦义而提倡“壮而有节”的精神。其《易义》卷五（四部丛刊本）云：“《大壮》，刚以震而阴摧，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刚严之时也。阳于阴为大也，阳进阴退，大者壮而小者丧也。夫雷在天上，万物以震，威行天下，万邦以恐（按：此据上下卦象而言），天地之壮见乎雷，圣人之壮见乎威，壮而不节于天下，暴矣！是以君子非礼勿履，以保其壮也。故九二、九四以阳居阴，体刚而处巽，乃复获贞吉。余爻不克全其壮也已。”在宋仁宗时，范仲淹借论《大壮》而推行庆历新政。所称“壮而有节”，既批判了暴政，又意在防止过分的封建专制，是其变法思想的具体体现，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大壮》卦义，史上还有另外的解释。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

>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矣，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姓之后，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杜预注：“乾下震上，《大壮》。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又曰：“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犹臣大强壮，若天上有雷。”）

史墨所称《大壮》之“雷乘乾”卦义，可能更符合原始《易》卦精神，而不同于战国《易传》以后的理解。首先，史墨强调《易》卦之变，具体联系社会人生，指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事实，就看你是否能顺天应人了。其次，指出震雷象征诸侯大臣，乾象征天子国君，雷乘凌乾上而大壮，犹如诸侯大臣强大而欺侮其君。这在秦汉以后的封建时代，是不忠之篡逆，罪莫大焉。但史墨却认为这样君臣易位，合于“自古以然”的天道，是一个自然规律，关键在于养其正气以致壮。史墨所谓正气，就在于君臣是否能够收拾民心，获得国人的支持和拥护。这就具有了某种古代素朴民主意识。养正而壮，人民拥护，臣取君位，仍属正义范畴的大壮之道。史墨所言，振聋发聩，启迪至深；但在后世封建卫道者看来，却是骇人听闻。如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云：“赵简子问于史墨……夫简子，晋之权臣，正犹鲁之季氏。为史墨者当斥季氏之无君，戒简子之效尤，乃盛称季氏而反咎鲁君，且以君臣无常位为言，则真助乱之邪说矣！君尊臣卑，比于上天下泽，何得以雷乘乾与陵谷之变，为君臣无常之比哉！”皮氏直斥史墨之无君，实不知《大壮》之所以为壮之真谛，迂腐之论，不足为训。作为春秋史官，史墨之解《大壮》，另具胜义，可资参考。

晋

卦第三五



柔顺进长著明德

《晋》卦（䷢）第三十五，序列《大壮》卦后。《序卦传》称：“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如人身体壮健，浑身是劲，能整天吃喝而无所事事吗？既壮必进，其道德学问或内在力量，一旦积累厚实，就一定希望干一番事业而实现其理想。不仅是政治、军事等领域，经济、学术界亦然。此所以《晋》次《大壮》之后。不过对于《序卦》“晋者进也”之言，要有正确认识而不能片面。既要前进，就必须有一定的方向和目标，不然，则南辕北辙，其“进”显属事与愿违的盲动。“晋”，《说文》作“”，谓“日出而万物进。从日从臸”。所以“晋”不仅有前进之义，而且有进而至于光明之义。合而言之，就是向光明的未来奋进的意思。从卦象看，上卦离（☲）象征日或火，下卦坤（坤）象征大地或众人，卦象显示了光明出现在地平线上，指引人类不断前进。故《彖》《象》二传均以“明出地上”释卦。这就意味，事物壮健，努力奋进，也必须以向往光明为目标。如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当初因苦役失期犯死罪而亡命江湖，如果只是为了活命而打家劫舍，盗贼其行，则名为“进”而实则“昧”，何明之有？但是，陈胜吴广不是这样，而是以推翻暴秦的黑暗统治为目标，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如《史记·陈涉世家》所说：“陈胜虽（兵败）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相亡秦，由涉首事也。”其目标光明正大，名标青史，如日月之垂丽千秋万代。《晋》卦之义大矣哉！

从卦形看，全卦六爻，下体三阴竞起以辅上离一阴，自然形成了六五卦主。《彖传》云：“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下卦坤为地，其性和顺；上离为日为火，其德光明普照。这又显示出《晋》进虽在大壮全盛之后，但其行动仍然必须谨慎柔顺。故《周易集解》引崔憬曰：“浑天之义，日从地出而

升于天，故曰明出地上。坤，臣道也；日，君德也。臣以功进，君以恩接，是以顺而丽乎大明。虽以卦名《晋》，而五爻为主，故言柔进而上行也。”《晋》之为卦，其上离二阳夹一阴，该属阳气盛壮之时。但《易》理窥测阴阳消息，重在居安思危，于阳壮盛旺之时，勿忘阴衰飒飒之日。故《晋》之道，见附阴柔以进之理。也就是说，事物即使已处生机勃勃的起跑线上，也不可亢阳躁进以邀功利，而必须兢兢业业，戒骄戒满，才能顺利前进并达到预定的目标。不过，《晋》之柔进并非胆怯畏行，而是审时度势、知难而进的顽强韧性。物过刚硬则易折，而韧性战斗则常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降临。

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常以封建伦理道德的君臣之道来说《晋》之卦义，也是时势使然，博识精深如王安石，其《卦名解》云：“明出地上，晋，臣进之卦也。明出地上，则方昼而未乎中，中则照天下。昼则进之盛不亢乎王者也。”以《晋》进乎明为朝曦之昼，而避开了象征君主的中天丽日，其释《晋》卦柔进，又别为一义。

卦辞云：“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黄、张《周易译注》译文如下：“《晋》卦象征晋长：尊贵的公侯蒙受天子赏赐众多车马，一天之内荣获三次接见。”这是根据古代《易》家之说作解，如《译注》引孔颖达《正义》云：“康者，美之名也；侯者，谓升进之臣也。臣既柔进，天子美之，赐以车马蕃多而众庶，故曰‘康侯用锡马蕃庶’也。”这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但《译注》又指出：“近人顾颉刚考周易卦爻辞中含有商、周史实，指出此卦‘康侯’即西周武王之弟卫康叔。”二说不同。我认为，顾氏之说有事实根据，可从。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扫传统成说，云：“王弼和孔颖达都说：‘康，美之名也。’孔更说：‘侯，谓升进之臣也。’至朱熹则直云：‘康侯，安国之侯也。’他们所以要这样解释，一来不知道周初有康侯其人，二来即使知道周初有康侯其人，但为要维持文王作卦爻辞的成说，也须藏起这个证据。”顾氏则取证于今存古青铜器《康侯鼎》铭文“康侯𠂤（封）作宝尊”，下断语云：“康侯，即卫康叔：因为他封于康，故曰‘康侯’，和伯禽的封于鲁而曰‘鲁侯’一样；又因他是武王之弟，故曰‘康叔’，和‘管叔’、‘蔡叔’们的名号一样……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久已失传。就本文看，当是封国之时，王有锡马，康侯善于畜牧，用以蕃庶……古代国家以畜牧为财富。”根据《易》卦爻辞中类似的故事，顾氏进一步指出：“《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那时没有儒家，没有他们道统的故事，所以它的作者只把商代和商、周之际的故事叙述在各卦爻中。”学术界有六经皆史之说，如此解读《易》卦，观念变化甚大，也可作为一种重要参考。但是，不管“康侯”是否史上实有其人，其为天子一日三见并给予大量赏赐，则说明了卦辞中那蒸蒸日上的奋发精神。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王安石像

如，语助词，无实义。摧，折退。罔，通无。罔孚，指不被信任。裕，宽裕优游之态。爻辞是说，初六，初出晋长之时即受挫，但坚守正义则可致吉；此时虽暂不被信任，但只要扪心无愧，宽裕待时，则可无咎。从爻位看，初六阴处阳位失正，上虽有九四相应，却被六二、六三两阴阻隔，初出茅庐，时不利兮，处地又不妙，所以虽然整卦精神是晋长，但初六却因时地两乖而只能守正待机，方可保无咎害。王安石曾以孔子“我待价者也”和“孟子久于齐”的故事为例，来说明初六的“晋如摧如”和“罔孚，裕无咎”，甚为生动。孔孟之行虽一时“摧如”，但其心则在晋长而无改其初衷。王安石《上蒋侍郎书》又云：“某尝读《易》，见《晋》之初六曰：‘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此谓离明在上，己往应之。然处卦之初，道未章（彰）者，上虽明而未之信，故摧如不进，宽裕以待时也……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不审而上必疑……由乎在下者动之不以时，干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也。”王安石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改革家，在宋仁宗时，朝廷大臣曾几次推荐他在京任要职，但他却推辞，而甘愿历任地方官，宽裕缓进，终于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实际知识，此其所谓“摧如不进，宽裕以待时”也。后来，他在宋神宗朝大力推行熙宁新政，即来自其摧如之裕。于此可见初六之“摧如”，并非只知退却，而是伺机待进之准备，故爻称“贞吉”“无咎”，与整卦晋长之义仍然保持一致。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介福，大福也。王母，程子释为祖母，以为指六五之爻；但尚秉和则以为指“下坤为母”。二说皆通。但据其爻位论，二、五同性相斥而五无位，故以尚说为优。爻辞是说，六二，前进中有忧愁，坚守正义可获吉祥。承此大福，是来自王母关怀。从爻位爻象看，六二阴处阴位得正，又居下坤中位，虽然上与六五无应，故前进之际，面带愁容；但六二又居下坤中位，下坤地德厚载，六二本身

既中且正，比较形势是优多于劣，故仍可受福而之吉。如东晋蔡谟（字道明），穆帝时迁侍中、司徒（按：晋之宰相）。别人为往上爬而费尽心机，蔡则反之，坚辞不拜，并对所亲云："我若为司徒，将为后代所哂，义不敢拜也。"东晋是个门阀贵族统治的时代，朝政分别为庾、桓、王、谢诸世家大族所控制，蔡谟若贪权拜相，必遭不测。所以蔡氏审时度势，量其德能而行。后来他因故被废为庶人，但皇太后下诏复其爵禄，他也是辞病而"不复朝见"，终于在东晋贵族尔虞我诈的乱世中保其晚节以终。事见《晋书》卷七七《蔡谟传》。在宦海浮沉中，人以升迁为喜。蔡谟却因通《易》理而明断形势，反以高升为忧，如六二之"晋如摧如"，终因其德行明识而获"王母"（皇太后）之介福致其贞吉。

六三，众允，悔亡。

允，信也。爻辞是说，六三，被大众信任，悔恨自会消失。从爻位爻象看，六三处下坤之上，阴处阳位失正过中，原该有悔。但其所居坤体，坤有众象；坤又性顺，依道而行，不争私利，为人信任，有允象；六三又居下坤之上，为众阴之长，上与上九阴阳有应，下与二阴俱升进以附丽上离之明，有众允信而悔亡之象。故六二虽既中且正却有"愁如"之忧，而六三失其中正反而有"悔亡"之吉，各爻之义，每视爻位爻象具体变化的实际情况而定，而不可拘于一律。杨万里《诚斋易传》据人事而发挥，说："六三以阴居阳，下不为六二之大臣，上不为九四之近臣，盖身退而德进，位卑而望高者欤！故其志上进以顺丽乎大明之君，志发乎此，众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下二阴皆顺上，故曰众允。"诚斋又以战国时郭隗入燕而群贤至为例加以说明。《史记·燕召公世家》云："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

■燕昭王像



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燕国殷富。”终于伐齐而雪耻。诚斋以为郭隗既非贤明大臣，又非亲昵近臣，以其登用而众人信任，终于群贤毕至而国以兴，其位虽非中正，却因得众允而自然悔亡无咎。故事之成败，虽在天时地利，同时也在人的主观努力。顺道众允，公忠体国，大众允信，同样可以涉川越险而取得事业的胜利。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鼫鼠，即硕鼠，专吃谷物的硕大田鼠。《诗·魏风》有《硕鼠》之篇，刺重敛也。于此可见古人眼中的鼫鼠，为贪得无厌的象征。又黄、张《译注》引蔡邕《劝学篇》，谓“鼫鼠五能，不成一伎术”，注曰：“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俗称梧鼠或五技鼠。于义亦通。九四与六二、六三互卦为艮（☶），艮有鼠象，故四取鼫鼠为喻。贞厉，戒辞也。厉，通疠，一种传染病。爻辞是说，六四，急于升进，如贪婪硕大的田鼠，见此象必须守正以防疾病。从爻位看，九四已升进于上离之下，但仍不知足，虽位不中正，却下压三阴，上欺谦和之君六五而超之越之，以便攀附上九，求致高位之颠。据非其位，贪得无厌，故以鼫鼠为喻，其疾疠立须可待。“贞厉”之戒，其可忘乎！故程子《伊川易传》云：“晋如鼫鼠，贪于非据，而存畏忌之心（按：指忌贤妒能），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贞厉者，开有改之道也。”以东晋一朝史实为例，如东晋初大将军王敦兵陷建康而逼宫，欲行篡逆，觊觎大位，旋即身败名裂而遗臭万年。继之者大司马桓温，权臣当道，争九锡而谋帝位，终如其所言而致千古骂名。不中不正，国势以蹙，北伐中原，统一祖国，岂非梦中！以硕鼠喻敦、温之流，形象极其生动。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恤，忧虑。勿恤，《周易折中》引胡炳文曰：“事有不必忧者，‘勿恤’，宽之之辞也。有不当忧者，‘勿恤’，戒之之辞也。此曰‘失得勿恤’，戒辞明矣。盖当晋之时，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于所当为，不当用其明于计功谋利之私也。”爻辞是说，六五，悔恨消亡，不应有患得患失的忧虑；大胆前进必获吉祥而无所不利。六五之爻，阴处阳位失正，下与六二难有呼应，本该有悔，这是事物的一面。但因其位既处上卦离明之中，又是整卦中位，柔主夹在九四、上九二阳盛刚之间，宜其纡尊屈贵，谦和待下，故下附顺而同心同德，因获众之支持拥护，群策群力而致“悔亡”，这又是同一事物的另一面。律之以史，有正、反之例在。如汉文帝刘恒，高祖庶子，在汉大臣共诛专政诸吕之后，因缘际会，登上大宝。他是上无在朝亲贵之依，下乏郡国

地方之基，力单势孤，故辞天子位再三。后虽即位为天子，但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唯恐有失，犹如《晋》卦六五之“柔主”。但是汉文帝并不因此而患得患失无所作为，相反，他牢牢把握住晋进机遇，以柔制刚，与民休息。他虽暂不接受年轻贾谊那急切激烈的建议，以免激起绛、灌诸重臣贵族的反对；但又暗中用贾谊之意，终于排除干扰，获众支持，很快恢复生产，经济日益发展，迎来了史称“文景之治”的大汉之光明。故《史记·孝文帝本纪》赞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反面之例，如西汉中期昌邑王刘贺。昭帝无嗣而崩，大将军霍光执政，征昌邑王贺为帝。贺在朝野毫无实力，堪称“柔主”。但他缺乏自知之明，只知进取而不言退让，即位后刚愎自用，骄奢淫乱，败乱朝纲，终于被废而身死国灭。于此可见，晋进之际，善于用“柔”而有正确认识，也与兴衰成败密切相关。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维，语助词，只表语气而无实义。用，助动词，宜也。咎，咎害。吝，吝惜遗憾。爻辞是说，晋长至极，如野兽亢奋而聚力于角，势在必发，此时宜自伐私邑以建功业，事虽危险，但行之可致吉祥而无咎害。但同时应坚持正义以防遗憾。从爻位爻象看，上九处上离之上，居全卦晋极，阳亢过中失正，进极则亢躁，明极则转昧，事物由晋长向相反方向转化之兆已露，故爻戒以“厉”。但爻又称“吉无咎”者谓何？原来，上九下与六三阴阳有应，其厚积阳刚之力，实来自下面之贡献，如因其力而善加引导，则将化厉为吉而致无咎。这就要从“伐邑”的解释说起。从卦象爻象看，上九应六三，三在下坤体中，坤为土，有邑象。而上离为甲胄兵戈而有征伐之象。此爻之邑，指的是诸侯私邑，而非四方之国。程颐《伊川易传》云：“伐四方，治外也；伐其居邑，治内也。言伐邑者，谓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愈固，进极则迁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则虽伤于厉而吉且无咎也。严厉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则有功也。”反之，上九若一味施其刚疾淫威，好大喜功而四面出击，企望借伐人之国来缓和内在危机，则必危上添危，雪上加霜，故爻有“贞吝”之戒。《诚斋易传》云：“明极者必穷物，刚极者必触物……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穷物，刚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挟其刚明而自以为贞固，圣人知其吝未光也。子玉刚而无礼，阳处父刚而干时，所以败也。”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子玉，春秋时楚军伐宋的统帅，晋师救宋，晋楚二国决战于城濮。当时晋文公首先率军退辟三舍（按：一舍三十里），以表礼让；但子玉置之不理，率师猛追，任刚使气，无礼之极。于是晋师上下敌忾，败楚主力，子玉自杀。刚进之极，不用于自治其内而矜伐其外，色厉内荏，子玉之败象已露，而合于《晋》卦上九之义。又如中唐德宗，即位之初，危机四伏，明显是一“柔主”。但他却不明就里，以明强自任而察察于政，急于扫平割据藩镇，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兵败蒙难，京师失守，被朱泚叛军包围于奉

天，差点被俘。其人其事，如上九“贞正”之戒。后来德宗听从陆贽建议，下罪己诏，犹如上九之自伐自省。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二，陆贽对德宗言：“陛下怀悔过之深诚，降非常之大号，所在宣扬之际，闻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涣之夫，削伪号以请罪；观衅首鼠之将，一纯诚以效勤。”据说罪己诏下，全国感愤，将士用命，因而转危为安，又延续了唐王朝的生命。上九刚进之极，或以之反省治内，或用之矜骄伐外，效果相反，史实俱在，启人深省。《易》理之微妙，岂可不加细察？

《晋》卦象征进长。但其所进及长，又有上、下之别。下坤三阴之进，因坤柔顺，故以阴附阳，以丽乎上离之明。封建社会中，在下人臣升进，必须以顺为性，为君为国而尽忠尽职为美；反之，若以阳刚暴力逼上而进，则视为逆而多留骂名。故初、二、三皆以阴柔之顺而致悔亡或获贞吉。在上者则以离明为性，六五柔主，为众阴所附丽，故其明非谓独照之明，更非君主不信任群臣的察察之明。如东晋元帝司马睿，以皇室远支，渡江开国，基础薄弱，更无实力，是典型的“柔主”。但他却自以为是，以察察为明，对江东民众及众臣，行法家之政，严刑峻法，长街刑场之上，血流飘杵，结果破坏了国民的团结，国家形势动荡，不久即有王敦之难，终于忧愤而崩。他因身居帝位，自以为聪明，实是愚昧之极。此察察独照之明所以有失也。独照而不照人，不给予关怀温暖，失去了在下臣民的拥护，不败待何？故《晋》之上离三爻，九四、上九以阳刚失位过中而有厉；而六五则因位中谦下而悔亡致吉，其前提条件是必须谦柔和众，光明普照，温暖人心，不自用其明，因信任臣下而用众明。独明，与用众明，孰明？不辨自明。在上者委物责成，群策群力，以致其成功，故曰“往吉无不利”。如汉高祖开国，军事任韩信，智谋听张良，而民政后勤赖萧何，因此而从柔到刚，愈战愈强，终于消灭了强大的西楚霸王，建立统一的大汉王朝。如《象传》所释：“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在上位者，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臣下民众，必须不断加强自我修养，严格要求，去蔽致知，自治自省以内养其德，然后出以公忠体国之心，成其普照天下之大明。如此“明德”，则万民欢庆，事必有成，其吉可知。读《晋》卦者，能不思乎？

明夷

卦第三六



黑暗之中见光明

《明夷》（䷣）第三十六，次《晋》卦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反转颠倒的综卦。从卦体之变，已可略窥二卦之间阴阳转化的消息。故《序卦传》云："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明夷》之卦，上坤为地，下离象日，日入于地中，洒下了一片夜幕的黑暗，而暂将光明隐去。"明夷"就是前进受阻、光明遮蔽之义。正如上经《泰》卦所示，泰极而否来，事物的前进发展，经由了壮健盛大的阶段之后，盛极必衰，明极转暗，就会矛盾转化，走向自己的反面。以此为据来思考《晋》与《明夷》的关系，作为治国安邦的领导，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光明时刻，既要考虑如何进一步促进发展，同时又要有超前意识，预见到光明也有受损而敛其光华的时刻，因此而合理调整经济发展速度，有效地控制基建规模，以便安全地渡过"明夷"的困难年代，为事物未来的新发展另觅光明与生机。汉京房《易传》有"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之言，贤者具预见性，所以能早作安排。其所谓"伤"，就是一种警惕精神。这样，当"明夷"夜幕笼罩大地之时，不致惊慌失措，而是仍然清醒而冷静地在摸索中前进不息。王安石《卦名解》云："明入地中，故为明夷。明者，伤于暗之名也。文王与纣当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这是从卦之二体为言。王氏具体以周文王及殷纣王来解释《明夷》上下卦，读者不必拘泥，只取其相类之喻即可。但论其卦形，下离为日为火，上坤是地而暗，明入地中，光明暂时为黑暗所遮蔽，其精神大致如此。而从六爻的运动变化来解释，如陈梦雷《周易浅述》所称："上一爻为暗君，下五爻皆为所伤。"因此，"明夷"是世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环境或特殊阶段，继续获得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对待。



■周文王像

《明夷》卦辞云：“明夷，利艰贞。”卦辞是说，《明夷》卦象征光明受损伤，利于君子艰苦奋斗以坚持正义之道。卦辞“利艰贞”云云，就是指示了君子应有的态度及立场。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则宜自艰，无干政事，以避小人之害也。”君子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行韬晦之计，不是无所事事的活命哲学，而是暂时退却来保存实力，以便时机一到，申张正义，准备迎接明日之辉煌。如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极端困境中，如不保存革命星火，又怎能有未来的燎原大火呢？试以殷商之史为例，周文王所代表的新兴民族，与殷纣王所代表的残暴统治，力量对比一度悬殊，故文王被拘羑里时，如矢直拼死，则周民族早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而不再会有后来周朝的兴盛建国和八百年的历史了。故当日周文王委屈自全，艰苦奋斗，远避暗主之害，终于成功地渡过了黑暗而迎来了光明的明天。由此可见，“利艰贞”不是一时的血气之勇，而是坚守正义之道的真正大智大勇。

不过，封建士大夫又从《明夷》卦中引申出一套统治艺术。如《象传》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与《彖传》的解释不同，《彖》之“晦其明”，是在困难的时间和环境中的一种被动的应变之法，是不得已的自救措施；而《象传》则明显化被动为主动，成为一种巧妙驭世的统治术。如黄、张《译注》所说：“《大象传》则从‘莅众’的角度，引申出‘晦明’施治、其明益显的普遍意义。这一点实为古代统治阶级总结出来的一种政治‘艺术’，本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王弼指出：‘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故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显明于外，巧所辟也。’孔颖达更举古代帝王仪饰为例，认为‘冕旒’象征‘蔽明’，‘黈纩’象征‘蔽聪’，指出：‘冕旒垂目，黈纩塞耳，无为清静，民化不欺。’此均为对《大象传》立意的精确理解。”比较《彖》《象》而言，《彖》之“晦其明”，应是《明夷》卦之本义，而《象》之“用晦而明”，明显是后人的引申义，读者当自细辨。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言，指责备之语。爻辞是说，初九如禽鸟，在黑暗中摸索飞翔，拍打着受伤的沉重翅膀；君子仓皇出行，已是饥肠辘辘，三天未食。此时有所前往，到处不被理解而备受主人责怪。这一爻象，后来苏东坡在诗中有形象的描画："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从爻位看，初九阳居阳位得正，上与六四有应，该是吉爻。但因《明夷》全卦处于光明殒伤、不利进长的困难时地，初九当然也无法摆脱这一大环境的困扰。所以上进之路为九三所阻而呼应失援，而只能单独而仓皇出行以避害。不过，暗主在上爻，初九离它最远，其害尚轻，故虽伤垂其翼，仍然勉力飞翔以避之。"君子于行"的顾虑，既在人，又在己。在己一方，不到万不得已，谁愿离开故国旧乡？如禽鸟之徘徊于飞，表现了对故枝的留恋不舍之意。在别人一方言，初九见机较早，预见颇深，其所行动，暂时不为一般人所理解，故所过之处，主人或啧啧有言。在与各地"主人"的对照中，正见出初九知幾之睿智——既不为自己恋旧之心所溺，也不为主人责言所动，排除一切物质和心理的阻力，坚决出行以远害。如西晋八王之乱将起之际，陈留人董养，升太学而兴叹，曰："奈何公卿议处，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斯起。"顾谓谢鲲、阮孚曰："《易》称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其所终。事载《世说新语·赏誉》第三十六则刘注。董养知幾早隐，如《明夷》初九的"君子于行"，与董养相比，谢鲲为有晋一代玄家清谈名士，其知幾之识，却不如董氏。他后来出任东晋初大将军王敦长史，敦率军叛，谢鲲苦谏不听，几乎不免于难。事载《晋书·谢鲲传》。一进一退，两相对照，效果相反，于此可味《易》卦之旨。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拯，举也，救也。爻辞是说，六二，光明已受损伤，左腿被伤，因乘马得以拯救而恢复壮健，可致吉祥。从爻位爻象看，六二阴居阴位得正，又处下离之中，是下体光明之主，其吉可知。但在整卦中，下离受上坤暗主压迫，光明入地而不见于外，又有受损伤之象。但爻称其"夷于左股"，又说明其伤不在上体，离心口要害之地尚远，伤在左腿，尚可勉力行动。为什么爻称伤在"左股"而不称右股呢？原来六二属大臣之位，受上面暗主压迫而外斥左迁，故言左而不称右，右则为助。《左传》襄公十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孔疏："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为右，不助者为左。"这是古代的习惯用法，伤右为重，伤左为轻，尚可行动而避害趋吉。为什么爻辞又称"拯马壮"呢？原来《易》理重变，二阴变阳，则下离化乾，而乾有马象，故六二因下体卦变，寓用马代步以自救而致壮之象。但所称之"吉"，杨

万里《诚斋易传》另有解释："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伤股矣，非凶乎？伤而获拯，非凶之吉乎？"古人以周文王之事殷纣王为例。纣王无道，囚文王于羑里，此于文王为伤股之凶。但文王之臣散宜生等，贿献纣王以美女名马，文王得脱难中，并重新部署对殷战略，因而转危为安，此由凶趋吉之象，故爻喻以伤左股、拯马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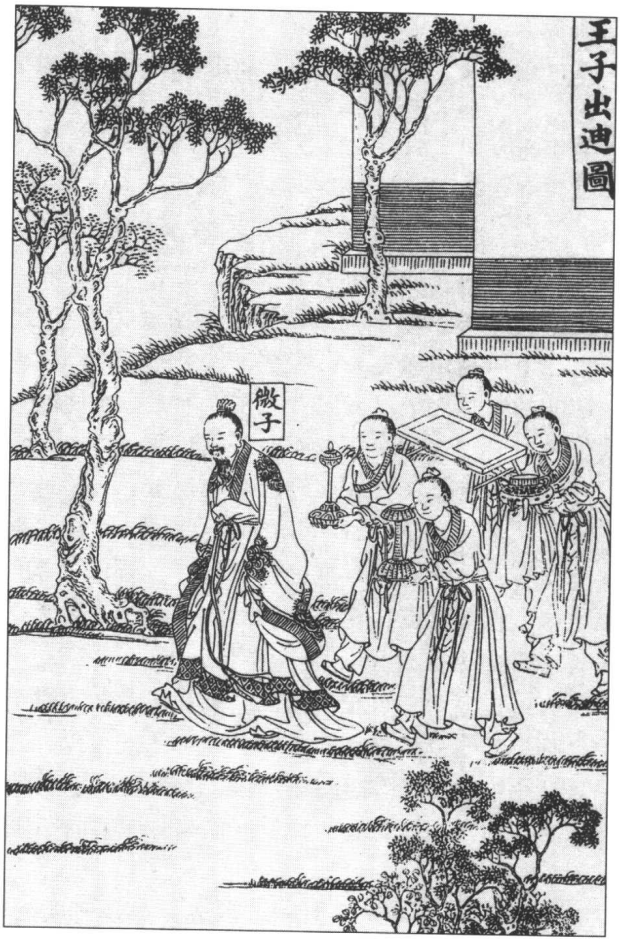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狩，巡狩，古时诸侯常是巡狩兼征伐。大首，首恶元凶。疾，速也。爻辞是说，光明损伤时南行巡狩，征伐不庭，获其首恶。但不可因胜生骄而操之过急，而应是志在申张正义。从爻位爻象看，九三居下离之上，离有兵戈之象，故以"南狩"征伐之事作譬。又九三阳处阳位得正，与上六阴阳有应，原该致吉。但因位过其中，居下离之上，明极而近上体坤暗，受暗主迫害，明集于内而未能光发于外，故爻未称吉。不过九三又下与六二内相承应，脱六二于难中，而九三谋方定，团结对外，故有南狩之事，以便自强自救。例如周民族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取殷而代，入主中原。但当时力量对比，是殷强周弱，故爻戒其"不可疾"，应耐心等待时机，守"贞"以待变。旧注大多认为九三所获之"大首"指殷纣王，衡以当时殷周形势，实无可能。当时殷居中原在东，周处陕西在西。周民族早先攻打殷商，常因强弱不敌而致败，故文王不免羑里之囚。而周之西南，则为戎狄一类少数民族杂居之地，与周相比，戎狄为弱，因而周民族多次南征兼并，既免后顾之忧，又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最后实现翦商的大计。周人据此史实作卦爻辞，故有"利西南，不利东北"（《蹇》卦辞）之言。"不利东北"，指始初伐殷之败；"利西南"，指征伐戎狄的胜利。请参考靳极苍《我与周易卦辞详解》一文，见《文史知识》1993年11期。《明夷》六三爻辞"南狩，得其大首"之言，正是"利西南"的具体写照。南征兼并戎狄，壮大周民族自身，正是为了将来对付强大的殷商暗主。迂回战略，时间虽长，但是守"贞"待时以申张正义之衷不变。不过今人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另有一解："明夷于南狩者，谋定而往，以田猎之事晦之也。得其大首者，首，禽兽之首也。田猎大有所获，知民众可用也，故《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不可疾贞者，民众虽可用，而不可亟其事也。"可另备参考。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爻辞是说，进入左腹之地，获悉明夷暗主的刻毒用心，于是毅然离开门庭以避害。从爻位看，六四已升至上坤暗体之下。六四近臣之位，以阴处阴柔顺得正，暂时不被上六暗主见疑，上面又隔六五，暗主之害还来不及实施，六四已因知其用心狠毒而毅然舍弃爵禄，出门远害。如殷商末年，殷纣暴虐，其庶兄微子谏之不听，他以天子宗室而知其用心，在纣杀比干之后，携祭器诣周，以便避纣

远害。微子之去暗主，如六四之“出于庭”而不顾。后周武王“复其位如故”，所以获血食祭祀于春秋宋国，事见《史记·宋微子世家》。相反，如晋初陆机，在八王乱中，曾一度被成都王颖任为大都督，统兵伐长沙王乂。陆机居近臣重臣之位，而不知进退，贪一时之爵禄，不听亲友劝告，无去位避害之意，终于被谗见杀，身赴刑场而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事载《世说新语·尤悔》及《晋书》本传。



■微子远行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史上实有其人，殷纣王诸父，时任太师，于殷商为三公，相当于后世之宰辅。其地位之近主上可知。诸《易》家或释“箕子”为“孩子”，谓“箕”、“孩”音通，并谓“孩子”明指殷纣王，见尚秉和《周易尚氏学》。或释“箕”为“其”，见焦循《易通释》。二说皆误，参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爻辞是说，六五，如殷太师箕子处于光明殒伤之时，其所作为，利于坚守正道。从爻位看，六五阴居阳位，柔顺处中，下与六二无应，上为上九所迫，位重而权轻，力弱而近害，最近暗主（上六）而处艰危之地，动辄得咎，故爻有“利贞”之戒。若其身心不正，或被暗主见疑而被害，或则助纣为虐，为暗主陪葬而遗臭万年，都在可能之中。但箕子于此甚明《易》理。如程颐《伊川易传》所说：“五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义，变动随时，上六处坤之上，而明夷之极，阴暗伤明之极者也。五切近之，圣人因以五为切近至暗之人以见处之之义，故不专以君位言。上六阴暗伤明之极，故以为明夷之主。五切近伤明之主，若显其明，则见伤害必矣。故当如箕子之自晦藏，则可以免于难……（箕子）故佯狂为奴以免于害，虽晦藏其明，而内守其正，所谓内难而正其志，所以谓之仁与明也。若箕子可谓贞矣！以五阴柔，故为之戒云‘利贞’，宜

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如箕子之贞固也。”分析详明而切近史实，可从。《象传》所谓“箕子之明，明不可息也”，正是从积极方面来理解明夷至艰至危之爻，自晦其明正是为将来的光明。这是生活的辩证法。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爻辞是说，上六，不知晦明变化之道；始如日之升天而自以为至明，终则日薄西山坠入地中而黑暗弥漫。从爻位爻象看，上六处坤体之上，居全卦之终，是明夷至极，不明而晦之象。下五爻以明而受夷伤，则上六宜其为晦而夷人者也。上居高位而夷人，有登于天之象，终则因伤人致众叛亲离而自取败丧，自坠深渊的黑暗之中。所以古人多以独夫民贼之殷纣王以况之。清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云：“晋时在上丽天，故照四国。今反在下（按：谓《晋》之上离反转于《明夷》下卦），故失则。坤为众国，入于地，谓昼变为夜，喻纣之昏暗，为乱世也。《盐铁论》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此爻商受当之。’”商受，即纣王也。物极必反，《易》理甚明。《明夷》之极，其上六一旦下坠为初六，余五爻皆升进一爻之位，则其卦变为《解》（䷧），当有“其来复吉”之福祥。而《明夷》上六一旦爻变为阳，则成《贲》（䷕），《贲》是象征化成天下的文明之卦，其明复登于天而光照四海。于此可见，《明夷》上六，未必无可救之药，卦爻之变的阴阳消息，已透露出一线生机。所以人处《明夷》之极，如能心明《易》理，不故意为非作歹，而是守正待时，则仍然有迎来恢复光明的日子。

《明夷》与《晋》相反相成，象征光明受损伤的黑暗降临之时。作为一个人，有谁不希望光明而喜欢黑暗呢？大概除了那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者，或是神经有毛病的人以外，都不会喜欢黑暗，更不会希望看到光明受到危害。但是，理想与现实并不是一回事。古代神话有“夸父追日”的故事（见《山海经·海外北经》），企盼能永久地留驻太阳的光辉，以便促进人类的发展。中华古人的勇敢、力量和气魄精神，值得赞颂。但“入日”的客观事实，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此可见，黑暗与光明是一对相互对待的矛盾，自古已然。有光明灿烂的时代，也必然会产生光明受损的黑暗时期，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害怕黑暗，畏忌明夷，想要如夸父那样，一次“革命”，永远地消灭黑暗而长驻光明，那是不可能的神话。人的一生长则百年，试问有哪几个人是永远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地成长壮大的呢？古人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的一天，既有昼明之作，也有黑夜之息；人的一生，从生到死，也同样有光明和黑暗。不仅是人生，政治经济亦然。比如目前的日本，是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前几年，因泡沫经济所带来的经济腾飞，也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国家财政不得不因此拨出大量钱财来弥补这一经济黑

洞。这时，日本人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这一经济“黑暗”的现实。事实说明，不喜欢黑暗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但若不敢面对黑暗，迎接挑战，则将成为一个落伍者而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人作《明夷》卦自有其事实根据及其道理。该卦之旨，重在教导人们如何勇敢地面对黑暗、正确对待、奋起迎接挑战，以便争取尽快实现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化。畏忌和害怕的恐怖心理，只会引发更快地坠入黑暗深渊之中。从卦形卦象已可逆料，黑暗之中仍然依稀可见一线的曙光。《明夷》与《晋》互为综卦，从《易》理重变角度言之，说明了有黑暗就会迎来光明。人处黑暗之中，不能只是灰心丧气而无所作为，或是守株待兔，等候光明的降临，而应是顺其自然，积聚力量，时机一到，则努力促进矛盾的转化。除上六外，下面五爻力避暗主之害，这一保存火种的行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天时、地利很重要，但人的主观努力，也是促使矛盾转化的一大关键。故爻辞多有“利艰贞”之言。不论处于任何黑暗之中，永远向往光明，坚贞其志，申张正义，就是在为战胜黑暗积极创造条件。如西周开国之主文王武王，面对殷纣的残暴统治，或“垂其翼”，或“夷左股”，均无改其解民倒悬的坚贞之志，故天下响应，推翻殷纣，建立了周朝，从而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卦爻辞中“利艰贞”云云，充分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矛盾转化中的重要性。相反，如若处明夷而“不明晦”，倒行逆施，则初有登天之明，后必生入地之暗。上六之灾以此。历史的正反经验，应予记取。如能“用晦而明”，则将逢凶化吉。

最后，应重提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除“垂其翼”为三言外，其结构多为四言句式，与后来《诗经》多四言整齐句式相似，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这大概是吸收古代歌谣片断以构成卦爻辞的缘故。歌谣前二句，以受伤的鸟儿艰难而沉重地拍打着双翼起兴，以引出后面君子不食、不已于行的诗句。表现了君子被逐，不忍离开故乡而迟迟其行的意思。飞鸟之疲惫垂翼，飞飞停停，这一景象与君子饥肠辘辘、因怀旧邦而迟迟其行的情景，十分和谐。后来《诗经》某些诗篇，其比兴艺术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如《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在语言句式、比兴艺术及诗歌情趣方面，爻辞与《诗》已大致相似，都表现了一种凄恻、哀惋的情调。虽然两相比较，由于时间的洗礼，《燕燕》之诗艺术水平更高，抒情写景更见圆熟而谙练，但论其基本表现手法和诗歌情景的一致性，则二者相承相续的痕迹宛然可见。上古诗人仍然从《周易》卦爻辞的歌谣中汲取了有益的艺术营养。于此可见，《易》卦爻辞的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它自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殷周古人的文学意识。

家人

卦第三七



家道贞正天下兴

《家人》卦（䷤）第三十七，次《明夷》后。《序卦传》说：“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人在社会立身处事，要与各种人打交道，其间有好人，也不乏坏蛋，其事业有时顺遂，有时屯蹇。处时代黑暗之际，遭打击报复而受“伤”，甚至是鲜血淋漓，也是常有之事。处明夷之中而受“伤”，如若心理脆弱，就会感到不被理解而处处作对，心情孤寂失落，极其苦闷。这时就想赶快回到家中，以作为逃难的避风港，寻求家中亲人来慰藉其滴血的灵魂，从而重新获得内在心理的安定。须知，最能了解自己的还是家人，故俗有“知子莫如父”之言。推之母亲、兄弟、夫妇、姐妹，都是如此。家人的爱，融化了黑暗与悲痛，让受伤的灵魂重新振作，奋发图强。故《明夷》卦后紧随着《家人》卦，很有道理。人既是活生生的个体，同时又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而家庭则是人所处的社会的基层细胞。因此，家庭不仅涉及个人生命，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简而言之，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治家即是齐国、平治天下的演习。因此，古代儒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明训。如《大学》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进一步关系到国家安危和天下盛衰。《家人》卦所言，即是儒家之前的上古人民对于齐家重要性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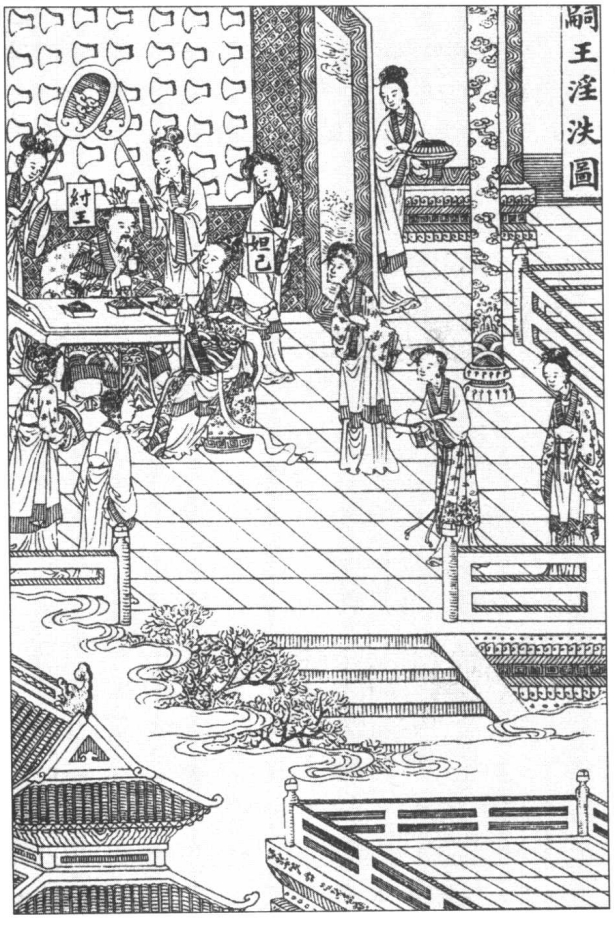
《家人》卦（䷤）所示，重在理家之道。就其上下卦象而言，下离为日为火，上巽为木为风，火由木生，风助火势；但在烈焰冲天之际，又自内而外，反过来火复生风，风火相长。作卦者以此作譬，以言家庭中父母子女之生生不息，并由内及外，因此而逐渐影响社会。故《象传》云：“风自火出，家人。”

卦辞云：“家人，利女贞。”意思是说，治家之道，首先利于妇人坚守贞

正之道。这是进入阶级社会的理论。据卦象，《家人》上巽（☴）象征长女，下离（☲）象征中女。与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不同，长女和中女大概多属已婚的中青年，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卦辞所称“女”，即卦中所示的长女和中女，均为有夫之妇。古人以为，女人守贞持正而不淫，是利国利家的大事。其实，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均为男人，原始公社母权制早已荡然无存，为什么又一谈到家庭，首先就要给女人套上一个“贞正”的枷锁呢？一个家庭甚至是社会，是由女人和男人共同组成的，其中，负责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男人又将负什么责任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卦辞是意在言外。既然顺从男人的女人有“利女贞”的必要，那么真正负有齐家责任的男人，就应该思考其伦理责任，卦辞巧妙地布下了语言空白，以便促人思考。《彖传》则直接道破此中奥秘：“《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下卦又称内卦，下离六二，阴处阴位而居中得正，故《彖》称“女正位乎内”；而上巽称外卦，九五阳处阳位居中得正，故《彖》又称“男正位乎外”。因六二、九五均以其中正之德，上下阴阳呼应，故生男女正位乎内外之说，由温柔驯顺的女人，引出刚健英发的男人。但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古代中国，是以男性为中心来组建家庭的社会。连封建仕女自己也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汉班昭《女诫》）女人的命运主宰在男人手中。因此，家庭之中，如果只要求女人贞正，而男则淫乱于外，则怎能有和睦的家庭？家庭之“贞正”，女人有责任，而男人的责任更重。故《彖传》由女人之贞正，引出了“男正位乎外”的重大话题，要求男子也须贞正，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家庭由男女双方共同组成，如有任何一方不守贞正之道，则家庭不睦，成天吵架，又怎能成为人们工作之余的安全避风港呢？特别是现代社会，工作节奏紧张，下班之后，骨头似乎散了架一样。这时，只想回家慢慢地品尝人生美酒，享受家庭的温馨，以忘却一天的疲劳。如果回家后吵闹不休，只有徒增烦恼而已。如果男人整天在外花天酒地，宿妓嫖娼，家中的妻儿老小怎能没意见呢？因此，《彖传》从“女正位乎内”，又自然引出了“男正位乎外”的告诫，是正确齐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其所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常被今人视为顽固的封建伦理教条。实际上，如能正确理解，可发现其中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因其合乎孔子的“正名”原则。名不正则言不顺。既然有父子、兄弟、夫妇各自的名分，就应该大像夫而妇像妇，男女双方各尽责任和义务，而不能只要求女人持守“贞正”，却允许男人在外淫荡。如果家中父不像父，夫不像夫，男人不能律己，焉能律人？须知，上梁不正则下梁歪。这样一来，必然家中大乱。故《象传》解释卦辞说：“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当然指的是负有齐家之责的正当男人。这就想到了更深一层，要求男人必须

进一步修身才能齐家。己身修而正，方可严于律人而正人。而修身之道，首先表现在自身的言行方面。如杨万里《诚斋易传》所说："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则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则伪。欺乎言，伪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要正人必先正己，于治家之道亦然。故《周易折中》引俞琰之言曰："齐家之道自修身始，此风自火出所以为《家人》之象也。君子知风之自，于是齐家以修身为本，而修身以言行为先。言必有物而无妄，行必有恒而不改。物谓事实，言而诚实则有物，不诚实则无物也。恒谓常度，行而常久则有恒，不常久则无恒也。"古人之言，清楚地说明了齐家之道，男人比女人责任更大，更应修身持正以为一家之表率。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就难了。因为这话不仅具有伦理意义，而且进一步具有实践意义。后来，清代古文桐城派始祖方苞，于此言略加修饰，以《易》之"言有物"和"言有序"，作为桐城古文之义法，见其《又书货殖列传后》。于此可见其理论影响从伦理道德又转向文学艺术，无不该遍。

■商纣宠妲己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防闲。爻辞是说，初九，刚组织家庭之始，首先就应注意防闲邪恶不正之心的侵蚀，这样家庭就会和美而悔恨消失。从爻位爻象看，如陈梦雷《周易浅述》云："离体中虚有家象，变艮为门为止，有防闲之象。凡事谨始。初之时当闲，而九之刚明能闲之。盖离则有先见之明，阳刚则有威如之吉。如男不入，女不出，皆所以闲之也。推此类，凡事闲之于初，悔可无矣。然能谨闲可免悔，不闲且如何哉！"初九居全卦之始，离明之下，是为家道的始初阶段。初九阳刚得正，新家甫立，就以严明治家，排除淫邪，防闲于未萌之始。如此言行，何悔之有？一般古代《易》家，多以为是

君子用严，以礼法防闲妇子。如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第二云："教妇初来，教儿婴孩。"新妇初嫁，必须接受公婆及丈夫的礼法教诲，此所谓"闲有家"，于古确是事实见在。故杨万里《诚斋易传》云："妇训始至，子训始稚……初九处《家人》之始初，而用阳刚之严治，有防闲之远虑，一日之正，终身之正也，何悔之有？"不过应加提醒，这是因古代以男性为中心的影响，产生了"女人祸水"的偏见所致。因女人是"祸"，故一入夫家则以礼法加以防"闲"。这公平吗？古人以为，殷商之末，纣王宠妲己而亡天下。如《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后周武王因其淫乱而兵入朝歌诛纣，又杀妲己以谢众。于是"女人祸水"之说，在士人脑中弥漫。贤如孔子，也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之叹。又《孟子·滕文公下》："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意思是男女"有家"之始，即应防之以礼法，这才是齐家之道。但是防闲对象，主要是妇女而非男人，事非公平，但在古代却无处不然。《诗·大雅·思齐》颂文王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谓文王礼法，内施于闺门妻小，至于兄弟，以齐家为国作则。反面之例，如唐高宗李治私通父妾武媚娘，初有室家即乱以礼法，未有防闲，故致家乱而几亡李唐王朝。其实，这都是后来封建士大夫的认识。作《易》之初，作者于初九防闲于未然，其对象兼指男女双方。天下阴阳男女，该是各宜室家。成家之后，则男女双方应向对方负责，各有其道德责任。天下俊男靓女何止万千，官高财厚者不乏其人，如果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而不闲习礼法，则风衰俗怨而致家人悔恨者多矣。故程颐《伊川易传》云："初，家道之始也。闲谓防闲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为之防闲，则不至于悔矣。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刚明之才，能闲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闲故亡耳。"虽是封

■武则天像



建“君子”口气，但其“闲”不仅对女，而且以之律男，以明齐家之责。如把伊川所闲之“法度”，去其封建说教，而改为今日的婚姻法，则为至理名言，可资今人参考借鉴。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遂，顺遂，成就。中馈，酒食，引申指古代妇女在家操持饮食家务之事。爻辞是说，六二，女人在家难有事业之成，只能负责一家饮食事务，持正则吉。从爻位爻象看，六二处下离之中，既中且正，又离性为明，故具自知之明，以礼法自恃，一心只干女人本分之事，在家照顾公婆、丈夫、兄弟、孩子的饮食家务。六二又上与九五阴阳有应，上巽性顺，故六二巽顺九五，如妇人之随顺丈夫。此即《彖传》所谓“女正位乎内”。黄、张《译注》说明云：“《象（按：疑为“彖”之讹）传》称‘女正乎内’，即指此爻；其喻象实为古代礼教所宣扬的‘妇德’典型。《诗·小雅·斯干》‘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郑笺》：‘妇人无所专于家事。有非，非妇人也；有善，亦非妇人也。妇人之事，惟议酒食尔。’……这种束缚、压迫女性的思想，是今天所必须批判的。”所论甚是。古人称“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能一心家务，照顾丈夫和老小。实际上，世界是阴阳男女，妇女半边天，排斥妇女，则人类文明发展必然受阻。但《易》卦影响甚巨，汉刘向《列女传》云：“邹阳母曰：《易》曰，‘在中馈，无攸遂’，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以妇女顺从封建礼法束缚的“三从”为“妇德”。后人又加以引申，以防止女人干预政治。如《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汉安帝时，宦官专政，安帝乳母与宦官集团相勾结，“外交庇托，扰乱天下”。于是杨震引经据典，上疏斥云：“《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其释《易》已由家之国，及于天下政事。其疏正气凛然，但其言却又潜伏了歧视妇女的意识。又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蠱，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仍是一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声浪。其偏见自古已然，陋习难改，悲夫！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众口怨尤之声。嘻嘻，骄逸笑闹之音。爻辞是说，九三，家人不满于治家之严明，众口愁怨，这样虽有一时的悔恨和疾痛，但最终必致其吉祥；如果是一味温情脉脉，纵容妇人小孩整天嬉闹，有失尊严，最终必致遗憾。如王弼《周易注》所分析：“（九三）以阳处阳，刚严者也。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者也。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宁过乎严。是以家人虽嗃嗃悔厉，犹得其道。妇子嘻嘻，乃失其节也。”其言简明，表明了封建士大夫的认识，也与上

古爻辞之意大致不差。如果说初九为家道之始，九三则已呈家道有成之象。成家已久，子女众多，故爻有“妇子”之喻。治家并非易事，因为众口难调。九三虽位处阳刚得正，但已过中，上又无应；又三与二、四互卦为坎（☵），坎有水险之象，故爻象潜伏了嗃嗃之悔厉。但九三居下离之上，为明之极，明则察远而虑深，以阳刚之严正，上下承比六二、六四而得阴阳和谐之合，故虽暂有悔厉，而终致吉祥。过去看一日本影片，描绘老狐狸在小狐狸成长过程中，硬是把子女逐出家门，任其独立谋生，小狐始有嗃嗃之怨，但终于成长壮大，在物种天择的生存竞争中，终有不被淘汰之吉。反之，温情治家，则终致吝惜之凶。爻辞是从正、反两方面言之。妇子嘻嘻，宜其室家，其乐陶陶，本是一家和睦的天伦之乐。但是，如果只有“嘻嘻”之乐，而乏严明之教，过分溺爱妇子而任其所好，要吃天上仙果则为之攀九天，欲戴海骊之珠则为之探龙窟，如此溺爱，名为爱之，实则害之，孩子怎能健康成长？《颜氏家训·教子篇》举例说：“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以为灵龟明鉴也。”据《三国志·袁绍传》：“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谋士审配）乃奉尚代绍位。”尚兄谭不服而兴兵争战，因其内乱而被曹操逐一征灭无遗类。而《刘表传》云：“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琮为嗣。”琮无能，举荆州之地以降曹，终受制于人。袁、刘溺爱妇子不以德才之贤，而以嘻嘻之昵，故其事业覆败时不旋踵。“终吝”之戒，史有明鉴。

六四，家富，大吉。

爻辞是说，六四，发家致富，大吉大利。六四爻位，已升至上巽体下，据《说卦传》：“（巽）为利市三倍。”可见六四精于盘算，在生产与流通中获利三倍，故爻有“家富”之言。另外，巽性随顺，六四阴处阴位得正，下应初九之阳，上顺九五之尊，全家上下，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故六四“家富”，也是自然之事。但《周易折中》则断言六四表现的是妻道，云：“四在他卦，臣道也。在《家人》卦则亦妻道也。夫主教一家者也，妇主养一家者也。《老子》所谓教父食母是也。自二之在中馈，进而至于四之富家，则内职举矣。”可另备一说。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周易集解》引陆绩云：“假，大也。”爻辞是说，九五，王大有家而天下为之正，故无忧虑而致其吉祥。从爻位爻象看，九五阳刚处中得正居君位，是一卦之主，下与六二阴阳相应，以中正之尊，下获广泛支持和拥护，故在家致富，能够发扬光大，推之于国家和天下。其职责已由六四之尽内职，而发展到九五之克尽外职。由齐家引申到治国平天下。家道之吉，以此爻为至盛。但是“王假有家”之“假”，又可训为感格之至。意为君王秉其阳刚中正之美德，感动臣民，以天下为家。其“勿恤”之吉，即来自君王内心之诚爱，和下面广大

臣民的感动和拥护。故《象传》释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家人》卦六二、九五、上下相孚，内外相爱，其象与《象》言合。陈梦雷《周易浅述》据此分释说："假，至也。九五刚健中正，应六二之柔顺中正，能修身以至于其家者，勿用忧恤，吉可知矣。初闲有家，家道之始。此有家，家道之成。中互坎为忧（按：指六二、九三、六四），此出坎外，故有勿恤之象。"又胡朴安《周易古史观》另有其解："王，谓（周）文王也。马融云：假，大也。言文王组织家庭之工作，告成而大有家也。人人皆有家，即文王大有家也。'勿恤吉'者，人皆有家，可勿忧而吉也。一家之家道立，一家之人交相爱；一国之家道立，一国之家交相爱；天下之家道立，天下之家交相爱。故《象》曰'交相爱'也。"所论视眼开阔，可参阅。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孚，信也。威如，威严之貌。爻辞是说，上九，心存诚信，威严作则，家道以成而终致吉祥。上九之爻，阳刚居卦之极，下与九三无应，已经显露矛盾转化的先兆。故兆称"终吉"，并非一般意义之吉祥，而是包含了戒词的味道，意谓如能保其"有孚"和"威如"之美德，严以律己，方能服众，以此虽历坎险而终可致吉。反之，不孚无威，众所不服而家道乱，何吉之有？《家人》九三、上九两阳爻，九三以刚居刚，故有"悔厉"及"终吝"之戒；上九以刚居柔，态度较为谦和，威孚相济而刚柔并用，故众人为之折服，故其戒言轻，而获"终吉"之美。《象传》释云："威如之吉，反身之谓。"反身，严于自律之意。也就是说，上九治家，不仅能以诚待众，而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家道化成。陈梦雷《周易浅述》说："阳爻实，有孚之象。以刚居上，有威如之象。有孚则至诚恻怛，可联一家之心而不至于离。威如则整齐严肃，可振一家之事而不至于渎。故长久得吉也。"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即其例。《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其上刘后主表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死后果如其言。诸葛治家，清廉自律，威孚交至，家道以兴，而家人终吉。

《家人》六爻，古人或有以上九为父，初九为子，九三、九五为夫，其中五为兄而三为弟，六二、六四为妇，以配兄弟，而一家长幼尊卑之序略备。先儒又以内卦明女子之事，外卦述男人之事，男女定位，内外有别，而刚柔始分。胡朴安《周易古史观》综合分析云："《家人》卦初爻，言家长能防闲其家也。二爻，言妇主中馈之事也。三爻，言处家不可失家节也。四爻，言各事其事而家富也。五爻，言家富而交相爱也。上爻，言家长当以身作则也。"读者当观其会通，而不必拘泥其言表之说。另外，《易》卦六十四，各卦之间都可能发生错综

复杂的关系。《象传》释《家人》卦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说明了《家人》与《恒》卦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美国《易经》学会会长钟启禄《易经十六讲》分析《家人》及其有关各卦的哲学含义，清楚地说明了《家人》所具有的"行有恒"的内在道德涵义。他说："那道德的原则，在《家人》来讲，第一是正名的原则，第二是诚的原则，第三是爱的原则。如一家之人能正之以名分，自诚以明，自明以诚，而且兼相爱，其家道必正。但正能久，又必以恒。"指出了《家人》卦所寓含的道德哲学意义。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因此，齐家也就是治国的演习。所以政治家又从"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来发掘《家人》卦的社会政治意义。家道正则国以安，国以安则天下太平。《家人》之意义岂可小觑哉！

睽卦第三八



求同存异济乎睽

《家人》卦后是《睽》卦（䷥）第三十八，彼此互为上下卦体翻转颠倒的综卦。从卦形的变化，已可窥二卦之间的关系，二卦之义呈相反相生之象。《睽》来自于《家人》卦内的阴阳矛盾运动。故《序卦传》云："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睽"字原有二目相背之象。二人相对又彼此不相视，可见心存芥蒂而心不相和，故训其义为睽违、乖异、背悖之意。如前所述，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社会组织之纽带，由小家庭而至大家庭，又繁殖发展至大家族，从而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小社会。大家庭中，人愈来愈多，成份也愈来愈复杂。他们在家族中各有其具体位置和特殊利益，所以虽然同属一家人，也不可能永远是同心同德。兄弟阋墙，经常为分财产而纷争打斗，甚至是对簿公堂，更何况是本无血缘关系的姑嫂妯娌呢！《家人》九三爻辞有"妇子嘻嘻终吝"之戒，元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释云："嘻嘻失节，心至荡检逾闲，而家道穷矣，穷则家人乖离。"又《睽》卦《彖》辞有"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之言，家中或婆媳反目，或姑嫂吵骂，或妯娌打闹，是世间常有之事。其实，不仅女人如此，男人亦然。家人不睦，常因利益不同而各行其是，这就是睽违的时期。小至家庭家族，大至国家民族，都是有合必有离，从亲如手足发展至相互睽违甚或彼此敌视，都是可能之事。故《序卦传》说是家道穷而乖睽至，此乃顺理成章的生活逻辑。只要是人，都有可能要面对"睽"违的现实，所以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然就会因为处理不当而带来事业的损失。如唐代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唐玄宗和肃宗父子二人互相猜疑睽背，唐肃宗又和永王璘兄弟兵戎相见，致使一时国有二主，指挥不一，兄弟相残，国力大耗，大大不利于平叛战争，并推迟了胜利的降临。相反，如能正视现实，面对睽违之时之地，求同存



■霸王别姬

异，同心同德，乃可成其济睽之道而迎接新的胜利。如楚汉战争中，刘邦的主力汉军，面对项羽骄悍的楚军，处于屡败屡战的局面。而汉军大将如韩信、彭越和英布，又各率师别出，形成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睽违之局，并以封王相逼迫，这使汉军极为被动。但刘邦听从智囊张良之计，封王拜印，毫不吝惜，存其异而求大同，和衷共济，以成其济睽之道，韩信、彭越、英布终于同意即时出兵击楚，因而战局陡变，反败为胜，围楚军数重于垓下，于是项羽霸王别姬，自刎乌江，从而胜利地建立了统一天下的大汉王朝，为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有声有色的新的一章。如果面对汉军各部睽违情况而束手无策，则刘邦死无葬身之地，历史也将重新改写。

《睽》（䷥）卦辞云：“睽，小事吉。”卦辞是说，《睽》卦象征睽违乖异，小心从事、柔顺待人则吉。何谓“小事”？古人有二解：一指细小之事。孔颖达《正义》云：“物情乖异，不可大事。”乖睽逆境之中，能免凶吝已属不易，又怎能有翻天覆地的大事之吉呢？这时若专心处理小事或可致吉。一指以阴柔驯顺为事。如黄、张《译注》引何楷曰：“业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驱迫之也；惟不为已甚，徐徐转移，此‘合睽’之善术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犹言以柔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谓。”衡以楚汉战争史实，当取后一说。当时刘邦虽贵为汉王，但面对内部睽违，只能暂时行柔济睽而不用其刚强。《史记·高祖本纪》：“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而《史记·项羽本纪》所述尤详：“汉五年……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

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击汉军，大破之……（刘邦）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汉王曰：‘善。’于是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附）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试想，当韩信求封王而拒不践约出兵时，汉王如逞其血气刚猛而率军以攻，内部自相残杀，其后果可想而知。张良之谋，劝刘邦行柔以济乎睽，此卦辞所称“小事吉”也。又《彖传》分析全卦云：“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象传》也说：“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原来，《睽》卦下兑（☱）上离（☲），离象征火，火性炎上；兑象征泽，泽水润下。阴阳之气，上自上而下自下，二者乖背而不相和合，此所以为睽。所称“二女”，据《说卦传》，兑为少女，离为中女。在《家人》卦中，上巽为长女，下离为中女。但在《家人》卦中，九五与六四、九三与六二是两对夫妇，长女中女年龄稍长而成婚在家。而在《睽》中，中女少女可能年龄偏小而尚未成家，故同处一家之中，二女同性相斥，故《彖》称“其志不同行”为“睽”。而从卦性卦德言之，下兑性和，上离性明；又六五阴柔居中上行为一卦之主，下与九二刚中之臣相应，以柔顺之道而小心处“睽”，下有九二得力之助，故《彖》称“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刚”，以说明卦辞的“小事吉”。至于天地、男女阴阳之异，世界万物自然性状不同，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天地以共同育载化生万物为己任，男女以阴阳和合而诞生人类文明，从不同方面共同呈现了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故《彖》有“睽之时用大矣哉”的盛叹。《象传》思考，是处“睽”之时，求同存异以济睽之意。实际上，《彖》《象》是从不同角度思考，却又共同论述了同异之间的矛盾统一规律。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爻辞是说，初九，悔恨消失：比如马匹失踪，不必追寻，静候其自动回家；又如见到恶人坏蛋，有备而巧加周旋，必脱其难而免咎害。从爻位爻象看，初九居下兑之初，当睽之始，虽阳居阳位得正，但位卑而无位，所以不敢刚猛使气，而以谦逊和悦的态度行其济睽之道。《周易折中》引王申子曰：“方睽之时，其睽未深，马之失也；未远恶人，睽间之情未甚也。失马逐之则愈远，恶人激之则愈激愈睽，故勿逐而听其自复，见之而可以免咎也。处睽之初，其道当如此。”比如孔子见阳货（即阳虎），即是如此。春秋时阳货以家臣干预鲁国政柄，孔子很不满意，不愿与之合作。阳货堪称恶人。但《论语·阳货》载：“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途）。”当时孔子如果痛斥阳货以激之怒之，则处境危险。他因而巧加周旋，但又坚持自己的正义立场，于阳货权势膨胀之时，并未出仕。无激恶人而逊接周旋，终无咎害。又

《易》的卦变中，称兑者语多“勿逐自复”之类，如《既济》（䷾）六二、九三爻变，则下离化兑，二爻辞有“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之语。《震》（䷲）六二爻变，则下震成兑，二爻辞有“亿丧贝……勿逐，七日得”之言。这是因八卦之兑其性为悦，故守静待机。处睽之时，镇定待时很重要。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主指六五爻。爻辞是说，九二，在巷中与主人巧合相遇，没有咎害。九二阳刚失位，本当有咎。但从另一面看，处睽之时，以刚居阴而行其谦柔之道，行不失中而上与六五阴阳正应，有化刚为柔、小心济睽之象，故可免于原该有的咎害。《象传》释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所谓“道”，指处睽之道。“未失”者，指九二刚中行柔，小心事上；六五虽然失位，但居中处尊，谦柔待下。二者皆出门求友，不期而遇，彼此会心，故爻有“遇主于巷”云云。“巷”是仄小委曲之途，原非会友待客之所，但不期而遇于此，正见其随意性，不强求合而能共同小心济睽，故其乖离之性自然消失而终无咎害。又九二、六三、九四互卦为离，故九二阳刚而潜藏离明之质，其上行所求之六五，又处上离之中，二、五皆明，不期而遇，心诚眼亮，求友得合，又何咎之有？但杨万里《诚斋易传》又称，九二与六五君臣相遇为阴阳正应，为什么不言“吉”而只曰“无咎”呢？杨氏以为因其具有“三不幸”的特殊条件所致：“当睽之时，一也；主弱二也；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周）平王晋文侯之事乎，此所谓小事吉也。不然，（殷）高宗得一傅说，（唐）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就其具体情景而论，甚是。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舆，车厢，泛指车。曳，拖拉。天，“而”之形讹；古代剃光头发的“髡”刑。参见胡瑗《周易口义》。劓，古代割鼻之刑。爻辞是说，六三被拖掣受阻，拉车的牛被制而难以前进，其感觉犹如人受髡刑、劓刑一样。起初乖睽难过，最后终因有所遇合而善其终。《象传》释云：“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描述了六三爻位爻象同时寓有凶与吉的两面性。从凶的方面说，六三阴处阳位有失中正，居下兑之极而软弱乏力，又六三、九四、六五上互之卦为坎（☵），坎性险陷，“其于舆也为多眚”（《说卦传》）。眚，灾也。坎上下俱阴，软弱无力之象；而中有一阳，其刚不足重载之象；故车行有灾。六三又乘凌九二之刚，上比九四之刚，前后二阳非其所应之主，故二在后曳其轮，四居前掣其牛，其有“无初”之凶，甚至身受酷刑，也是事属自然。但从吉的方面看，六三居下兑之极，具和悦柔顺之性，小心从事，以免麻烦；又六三与九二、九四下互为离（☲），离有日象，其性为明，面对自己的前途，所见甚明而早有准备；再加上应上九，阴阳和合，一切猜疑已消，故转危为安，而致“有终”之吉。这可从卦爻之变得知消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天子蒙难，晋文公

令人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为什么？因《睽》六三爻变则为《大有》九三，其爻辞云：“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可见《睽》六三潜藏了转凶为吉的特质，小人之害无所施其伎俩，而终享用于天子，故晋文公致“有终”令名，成春秋五霸之首。又如西汉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不仅上面得罪武帝，同时得罪朝臣权贵，故受腐刑，其《报任安书》云：“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颂美谀辞不绝于耳。但司马迁终因说真话而获罪，其受刑时，“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这和六三之“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相似。但司马迁忍辱负重，“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他活了下来，终于以其余生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成就其名山事业，这是爻称“无初有终”的形象写照。事载《汉书·司马迁传》。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元夫，指初九，阳大称“元”，犹言大丈夫。明来知德《周易集注》云：“元者大也，夫者人也。阳为大人，阴为小人。”爻辞是说，九四，处睽之时，孤寂苦闷，但终于与秉阳刚之德的大丈夫相遇会合，相交以诚，其间虽也曾出现危险，但最后必无咎害。从爻位爻象看，九四阳居阴位失正，前后承比之二阴，又各有所主而无应，故有“睽孤”之象。又四与三、五互卦为坎，坎性险陷，故四有“厉”疾之象。但换角度看，四以阳居阴，秉阳刚之德而行其谦柔，下与初九以诚相交，并因同德，而去其孤寂之苦，故能合力济睽而终致“无咎”。黄、张《译注》云：“初处下位，阳而能退；四居阴位，刚而能柔：两者均禀谦和之德，交相孚信，终能化‘睽’为‘合’。可见九四初九是以‘求同存异’的信念，履行济睽之志。”例之史事，唐初狄仁杰似之。据《新唐书》本传，狄仁杰处武后朝，刚正不阿，但其时酷吏横行，小人得志，狄氏处孤军奋斗困境，并曾为武三思、来俊臣诬构，几

■狄仁杰像



乎贬死。此爻所称“睽孤”之“厉”也。但他后来荐张柬之、姚崇等，以诚相交，同心兴唐，终开玄宗开元之治。此所谓“遇元夫，交孚”而“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厥，其也。宗，宗亲之臣。指九二。噬，咬啮。噬肤，皮肤柔脆而易于咬食；因九二处下兑之中，兑有口象，故以噬肤为喻。爻辞是说，六五，悔恨消失，下求遇合宗亲重臣以获强佐，如食带骨肉先吃皮一样容易，前往和合，何咎之有？从爻位爻象看，五与四、三互卦为坎，坎性险陷，故六五前途藏有凶险，此其“悔”之所宜生也。六五阴柔而当睽离尊位，柔而失位，原该有悔。然居中位，又下获九二刚直宗亲强佐之应、阴阳和合而可排除险难，故有“悔亡”之象。《周易折中》释云：“案睽之时，小事吉者，径情直行则难合，委曲巽入则易通也。如食物然，啮其体骨则难，啮其肤则易。九二遇我乎巷，是厥宗之来噬肤也，我往合之，睽者不睽矣。此其所以悔亡也，何咎之有？”六五虽阴柔之主，但居中而具离明之见，不为一时乖睽所折，小心下求刚二之强佐，合乎济睽之道。程子《伊川易传》以史例之，云：“以周成王之幼稚，而兴盛王之治；以刘禅之昏弱，而有中兴之势，盖由任圣贤之辅，而姬公（按：指周公旦）孔明（诸葛亮）所以入者深也。”周公、孔明，即九二之往合主也。六五柔主，依此而行，非但可免悔咎，而且如《象》所称，是“往有庆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脱）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豕，猪也。负涂，浑身是泥。弧，木弓，泛指弓箭。爻辞是说，上九，乖睽孤独之极，心中猜疑而生幻觉，好像见到了浑身污泥的猪群，又像见到一车丑恶的鬼怪，于是张弓欲射；后来疑释心定，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强盗，而是戴图腾面具来求婚的队伍，于是自然丢下弓箭。此时前往，但见阴阳和合，犹如久旱遇甘霖而致吉祥。以爻位爻象言，上九阳居阴位失正，下所应之六三有柔弱乏力之象；又六三前后为二、四两阳牵制，一时难于举步应上，故致上疑而心生幻影。下面自“见豕负涂”至“匪寇婚媾”，则是作者采用反映古代抢婚风俗的民间歌谣为喻。古有抢婚之俗，男方求亲队伍，面戴图腾面具，有的像浑身污泥的群猪，有的像面形丑陋的鬼怪，热热闹闹前来迎亲；这在疑心重重的上九看来，妄虚疑实，目为强盗，故而张弓欲射，而一旦清醒，则猜疑消释，知道是来求婚的亲善队伍，于是放下武器而热烈欢迎。爻辞虽短，却有后世小小说的形象之笔，心理描绘颇为细腻生动，一波三折：始因心理压抑而多疑，次则因多疑而出现如猪如鬼般的幻觉。试想，天下何来一车鬼怪？其虚妄可知。故欲济睽，必先去妄而加强其心理健康意识的锻炼。爻辞借婚姻事而喻阴阳和合以济睽，故有“遇雨”之占。下雨，在古人看来也是大自然阴阳和合的吉兆。如《解》卦

（䷧）上震下坎，震雷坎水，有“雷雨作”之象。《彖》云：“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阴阳二气和合化雨，利于世界万物的生长，遇之则吉可知。一般说来，《易》卦的上位，处卦极必具相反之势，故睽极而返于合，亦属理势之自然。但由睽而济乎合，有一定的条件和过程。上九急于济睽，故求六三和合之心甚切。但是六三因受前后二阳牵制而一时举步维艰，无法急应上九。上九爱之切而生疑，如《诚斋易传》所称：“然惟天下之至明，为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释天下之至疑。”上九居上离之极，有至明之象，至明生至疑，所以产生了变态心理，其见猪见鬼的幻象，即为苦恋未得的结局。但六三以诚相交，仍是克服困难，孜孜上应，终于冲破障碍而成其婚姻，上疑冰释，自然化睽为合而终致其吉。这就说明，正人必先正己，在上者心理不健康，必然对下疑神疑鬼，这样向下求合并要求其尽力，犹如南辕北辙，愈骛愈远。如唐德宗以至明自任，却处处猜疑不已，内疑朝臣，外疑将帅，结果是忠臣义士见逐，君臣上下难以遇合，故终其世而叛乱相继，国家板荡。德宗“至明”之疑，非济睽之道，而适足败事。这是反面之例。而从正面言之，如汉高帝刘邦之疑宰相萧何，曾系之于狱，但最终是君臣猜疑冰释，而关中以固，汉家以兴。故《象》称“群疑亡也”，乃是睽极复合的重要条件，在上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切实负起调整观念、健康心理的责任，以便上下同心，共济乎睽。

睽是因乖离而产生的一种逆境。但是世界自然，有离必有合。处睽之时，并非绝望，而应激发人们积极求合之心。所谓求合，不是凑合，而是一种走向新生的重新组合。对于社会来说，也就是促进历史发展的改革。宋范仲淹《易义》即借释《睽》旨而发挥其改革主张，云：“《睽》，火炎泽润，其性不同，炎从上，润从下，其道违而不接，物情睽异之时也……然则天地万物从何而亨乎？故睽之时义不可久也，必变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阴阳合焉（按：其体睽，其义合）；昼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礼义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会焉；万物睽也，而情类聚焉。夫未合之时，体乖志疑，动虞謇难，求援而济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极而通，则说（脱）弧遇雨，群疑亡也。”（四部丛刊《范文正公集》卷五）北宋中晚期，国家积贫积弱，内外交困，上下乖违，天下离心，处此睽违逆境，如若不思变革，则无出路。故志士仁人力成济睽之道以求其合。仁宗朝，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以改革求团结，如能“君臣会焉”，上下同心，何睽而不可济？国家要兴旺发达，就必须举国团结；而要团结，就必须消除“群疑”。这实际是要求皇帝和朝臣大力支持变革，同心济睽，以便富国强兵。可惜当时朝廷执政，冥顽不化，朋党说起，彼此争斗而睽异愈甚，故庆历新政很快失败。此非睽不可济，而是保守势力不明其理而守旧不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彖》称“睽之时用大矣哉”，从矛盾的对立统一方面立论，预见睽化为合，律以事实，确乎至理名言。

蹇卦第三九



和舟共济脱险难

《蹇》卦（䷦）第三十九，次《睽》卦后。《蹇》、《睽》二卦六爻阴阳相反，古称旁通之卦，明来知德则谓之错卦。从卦形六爻阴阳对应的变化来考察，已可窥其内在的相生相续的微妙关系，二卦俱是身处逆境而君子行其权宜之时。《睽》主六五以柔守中，只能获“小事吉”；而《蹇》主九五则因其阳刚中正，虽险不避，故为“利见大人”，以领导大众共济蹇险。《蹇》发展了《睽》卦济难的主动精神，显示了层层深入的哲学意蕴。《序卦传》云：“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小至家庭，大至国家民族，如若上下乖异，互不团结，此时要想摆脱睽违困境，必然动辄得咎，磨难丛生。小说《西游记》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上有佛祖庇荫，下有神祇呵护。但是，唐僧却因妖怪变化所惑，不信任火眼金睛的长徒孙悟空，加以猪八戒挑拨其间，致使师徒乖睽，意见冲突，故白骨精得以施其鬼蜮伎俩而致唐僧于难中。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可见摆脱困境、通往光明的道路何其艰辛！故《蹇》生《睽》后，顺理成章。“蹇”字亦作“謇”。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说：“行难为蹇，言难为謇。古不分也。”如《文选》卷二一谢宣远《张子房诗》有云：“四达虽平直，蹇步愧无良。”以“蹇步”喻举步维艰状。又白居易《读邓鲂诗》云：“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企望越蹇涉难以向光明，是古今通士的共同愿望，此《蹇》之所为作也。

《蹇》（䷦）卦辞云：“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什么叫“利西南不利东北”？古今《易》家之说多受《易传》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以八卦方位与五行相对应，谓艮为东北，东北多山为险；坤为西南，西南平地为利。但是《蹇》中并无八卦之坤（☷），旧《易》家附会纷纷，强为之解，

终难自圆其说。实际上，旧注所据之《易传》，产生于战国时代；而《易》卦爻辞的产生年代，是殷末周初；其作者虽为周人，但因年代之异而写作意识大不一样。殷末周初之周人，只具阴阳观念，而不见明确的五行概念，人们怎能根据产生于战国时代《易传》的阴阳五行思想，来具体解释卦爻辞呢？考察卦辞，应注意三种人的不同地位：一是在西南者，一是在东北者，一是占筮者自身。占筮者当然是周人之巫祝或史官，地处今之陕西渭水流域一带。其东北方向也即中原之殷商王朝，当时尚是“强大”的天下共主。而处于周民族西南方向则是戎狄一类的少数民族，在当时较周弱小落后。周民族处其中，起初想要一步“翦商”，往东北方向发展，攫取中原财富子女以自强自大。但在周殷之战的开始阶段，殷强周弱，力量不敌，多次败北，甚至是文王被拘于羑里，故卦称“不利东北”。这样周民族要发展，就不得不转移视角，向比自己弱小的西南方向戎狄所居的少数民族地区进发，战况顺利，兼并了许多小国，既巩固了后方，又壮大了周民族本身，从而逐渐形成了与中原共主殷商纣王一决雌雄的实力。这一史实，已为今天考古成果所证实。因此，《蹇》卦辞所称“利”与“不利”，有一定的立场，应是周民族入主中原以前的观念。参见今人靳极苍《我与周易卦辞详解》一文，见《文史知识》1993年11期。据此，所谓“大人”也应指王季或周文王一类领袖，他们识见过人，艰苦卓绝，率领周民族实现自弱到强的转化。卦辞是说，《蹇》卦象征前进中的艰难，周民族在奋斗中应先向西南方向发展才有利，若向东北进攻中原则不利；利于出现大人的正确领导，坚持正义之道必致吉祥。

从卦形卦德看，《蹇》上坎（☵）象征水，其性险陷；下艮（☶）象征山，其性为止。处蹇之时，见险而知止，而不盲目地暴虎冯河，是智者之所为。故《彖》云：“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智）矣哉！”但智者之止，并非畏险止步而不前，而是伺机而动，以便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一举济蹇越险。如周民族为行其翦商大计，开始战略错误，盲动进攻东北方的中原共主殷商王朝，致文王被囚，此蹇之极矣。若在此时逞其血气之勇，以求决战，则可能是周无遗类矣。但文王不这样做，他是见险知止，忍辱负重，待机而东山再起，终于八百诸侯来朝而集于其子武王麾下，成就周王朝八百年的江山。从卦象看，下艮为山，上坎为水，如《象》云：“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高山险峻，已难攀越；山上有水，险上加险，前有险陷，后有峻阻，进退维谷，此所以为蹇。但智者之处蹇，并非一味知止而裹足不前，而是“君子以反身修德”，加强自我反省以培养自身修养德望，以便作为榜样，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团结奋斗，共济蹇难。不过，济蹇有动与静二道，并无奥妙，但在所用何如耳。如能静而审，则其动必济。故君子智者之“静而审”，是济蹇的必要准备，非“反身修德”何能得之？

再从卦与卦的关系看。《蹇》是下艮山而上坎水，水山为蹇以见险难；而《蒙》（䷃）则山与水的位置对换，山在上而水在下，顺其自然而标志人类智

慧之启蒙，启蒙之后，学会思考，则知处蹇以济难越险。故由蹇难而进入生长启蒙，已可窥其成长的希望。而《蹇》上下卦体翻转，则互为综卦的是《解》（䷧），《解》象征蹇难消解。由此可见，蹇险在前而知止，此“止”并非因袭固陋而坐以待毙，相反，它是伺机待时，由静而动准备涉越蹇险的前奏曲。

下面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往蹇，来誉。

往来，犹言进退。爻辞是说，初六，前进则举步涉险而遇险难，后退守位待时则致美誉。从爻位爻象看，初六以阴居阳，上与六四同性而无应，位处下艮止卦之初，举足欲前，必然陷于上体坎险之中，故爻戒其“往蹇”。时不利兮，卑弱乏力，怎可盲动上行而冒难犯险呢？于是初六以其智者卓识，又因初位离蹇险尚远，故目睹其险而行知其止，退处其位以待时机。其智识远见超俗脱凡，故爻有“来誉”之称。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国家重臣。蹇蹇，难上加难；或谓当作“謇謇”，直言犯难以谏诤。于义亦通。爻辞是说，六二，身为国之重臣，勇于犯难冒险，这是公而忘私、鞠躬尽瘁的缘故。六二之爻，阴处阴位得其中正，虽处艮止之体，但上应九五之君，越险济难以应君召，于国于家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明知前行将遇上体坎险，但其身之忧已非所计，如屈原《离骚》云：“余固知蹇蹇以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诗人公忠爱国之心，凛然感动千古，激扬了民族正气，个人安危，又何惜哉！又如明代万历之初，宰相张居正大力推行变革，从而延续了明朝数十年寿命。虽然身死之后，受尽神宗及奸邪之人的报复，斥为权奸。但其蹇蹇之忠，垂誉青史，今日已成定评。当时个人利害，岂其所计乎？大政治家应有大气魄。故《象》云：“王臣蹇蹇，终无尤也。”这一爻辞的精神，已为正直士大夫所闲习，

■屈原像



从而激扬了民族正气。如《晋书》卷四一《李熹传》载，晋初，李熹为司隶，“当官正色，不惮强御，百僚震肃”，朝野称之。他曾上疏武帝，指斥权贵贪赃枉法，云：“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令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谥。”帝答诏云：“法者，天下取正，不避亲贵，然后行耳……《易》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以避二鲍’，岂其然乎！”晋初开国，武帝曾欲有所作为，尚能容忍蹇蹇王臣，君臣合作，所以能统一中国，澄清天下。但不久就骄奢淫逸，倒行逆施，连自己的亲兄弟齐王攸也不免贬死，更何况是蹇蹇王臣呢？故武帝死后尸骨未寒，八王纷争，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历史上正反之例，令人警醒。又《周易折中》引韩愈曰：“《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匪躬之节，《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矣。”因其具体时位而应变其旨，所论合乎生活辩证法。

九三，往蹇，来反。

爻辞是说，九三，前进则艰难遇险，所以退回原位以仔细观察。从爻位看，九三爻已过中，处下艮之上，而逼近了上体坎险，只要跨前一步，即入坎陷之中，故爻戒其“往蹇”。但九三阳居阳位得正，刚正不阿，为下面二阴所慕，若退归原位，必得其助，故爻称“来反”。如来知德《周易集注》所说：“来反者，来反而比于二也。六二忠贞之臣，但其才柔不能济蹇，蹇而又蹇，思刚明之人以协助之，乃其本心，所以喜其反也。”又九三与上六阴阳和应，上六虽以阴柔之弱，不足以助三济蹇，但是三与九为正应，三欲进虽曾遇陷知止，但从长远之计，始终抱济蹇之志以求上应，故爻称“来反”，并非倒退，而是面临蹇难，首先站稳脚跟，详加观察，积聚力量，待时而动，以便伺机越险。“来反”者，以退为进之战略也。如三国时赤壁之战前，曹兵数十万南平荆州，刘备抗曹，兵只数千，如若前往决战，必自陷于灭顶之灾。故军师诸葛亮劝刘退避，以免陷于蹇难之中，并且过江联合东吴，孙刘联兵，而有后来的火烧赤壁的胜利。刘备先“往蹇来反”而后致胜，全在诸葛妙算之中。

六四，往蹇，来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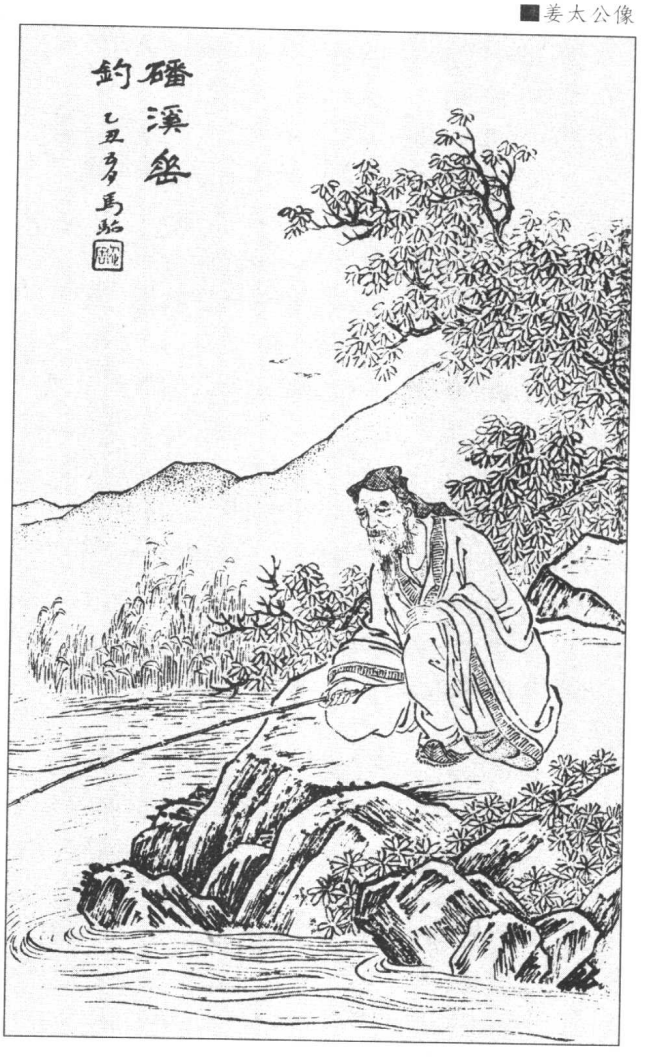
来连，指艰难接踵而至。爻辞是说，前进入于蹇险之中，退回原地又困难重重。六四爻位，已升至上坎之初，再前一步，立刻溺于坎陷“大蹇”之中，但若退回原位，与初六无应，又以阴柔乘凌九三阳刚，可说是处蹇之时，接连遭险历难，而举步维艰。《象》云：“往蹇来连，位当实也。”意谓六四之难，并非自惹麻烦，而是由其所处特定时位所决定的，个人不负重要责任。《文选》录班固

《幽通赋》云："纯屯邅与蹇连兮，何艰多而知寡。"李善注引固妹曹大家（即班昭）释曰："屯、蹇皆难也。《周易》曰'往蹇来连'。"可见《蹇》六四之"蹇连"，已经作为动辄得咎、四面险难的概念，印入古代士人脑海之中。

九五，大蹇，朋来。

大蹇，朱子《本义》曰："非常之蹇也。"程子《易传》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难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当蹇而又在险中，亦为大蹇。"爻辞是说，九五，前进之际遭遇巨大险难，幸亏有诸多朋友纷纷赶来相助。据爻位爻象，五居君位，为《蹇》之主，处上体坎陷之中，故《周易折中》引《朱子语类》云："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须人主当之。"因为九五之君，象征国家，故其处蹇之时，所有险难，尽集其身，其蹇非一而大，故谓之"大蹇"。又九五下与六二阴阳正应，二虽阴柔力弱，难助五济大蹇，但九三以其刚健之阳"来反"于六二，六四又"来连"于九三，这样，通过六二"王臣"，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共同助五济其大蹇。济蹇主要之责在九五，九五呼六二共济，六二又在自己的周围为济蹇之君团结了一大批生力军，故蹇难虽大，但对五来说，却是势在必济，故勇于赴难而不言其吉，而只称其"朋来"。这预示了济蹇过程是个长期而艰苦的斗争，非一朝一夕之功。读九五爻辞，对于济蹇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是否有心理准备，效果大不一样。正面之例，如程子《易传》所言："方在大蹇之中……自古圣王济天下之蹇，未有不由圣贤之臣为之助者，汤、武得伊、吕是也。"指的是商汤得伊尹，周武得太公吕望，

■姜太公像



故能伐夏桀诛殷纣，而商周以兴。反面之例，如唐代安史之乱后，肃、代、德宗三朝，均是急济蹇险，想要一举荡平反叛；下虽有应，但各地军政混乱，彼此猜忌，指挥不一，犹如“朋来”之后又不予信任，致使战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祸无已时，造成了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君主济蹇，不明其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效果适得其反。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硕，大也。爻辞是说，上六，前进必有艰难，归来则硕果累累，这是吉祥之兆，利于大人出现来领导大家同心济蹇。从爻位爻象看，上六阴柔处坎之终，尚在蹇险之中，力柔而欲单独冒难前进，其济蹇无益于事，故爻戒以“往蹇”。但上六又因阴居阴位得正，下应九三得其刚劲之助，又亲比于九五之尊，故《象》称其“志在内也”，回归正道，获三、五内助，越险之力陡增。又上六处《蹇》之极，据《易》理，该是蹇极运转的矛盾转化之时，已藏纾难解蹇的一线生机，故其内向而动，方向正确，适时利行，故终能助君济蹇而竟其功业。《周易折中》引《朱子语类》云：“诸爻皆不言吉，盖未离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来硕，吉’，却是蹇极有可济之理。”所论甚明。《蹇》至上六，已处矛盾转化的临界限，上下卦体一旦运动反转，则《蹇》化为《解》（䷧），象征险难消解，非吉而何？故《蹇》上六爻独占“来硕”之“吉”，也就不奇怪了。但爻又称“利见大人”，为什么？因为济蹇越难，斗争艰苦，《蹇》自初至五，皆无法出蹇以济，而上六则因其所处的特殊时位而致吉。不过卦画时位也明示上六阴柔乏力而难独济其蹇，而必须借助明智的清醒指挥，与强有力的支持，故爻称“利见大人”，大人指九五。这就说明，上六因矛盾转化而致硕果，但其建功立业之“吉”，非仅个人之功，而是上下大众同心济蹇的结果。犹如风雨同舟之众，须有舵手把握方向；同样，在时代风雨的济蹇越险斗争中，大人即领袖的正确领导与指明方向，也是必要的。不仅国家社会如此，现代企业亦然，特别是濒临破产的企业之能起死回生而逢凶化吉，即与“大人”把握时机而果敢决断有关。没有正确的领导，只是消极坐待矛盾转化时机的到来，常是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中去，因为时不我待，稍纵即逝。一旦丧失时机，上六何来出蹇之吉？

通观全卦，读《蹇》应注意以下几点启示：一、应注意到济蹇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发展过程，不可忽视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是如此。那种无视困难，凭血气之勇而暴虎冯河、投机冒险，必然欲速不达而自取咎殃。二、在济蹇斗争中，无论怎样艰难困苦，危险万分，都不能丧失勇气，而应透过逆境中的黑暗帷幕，看到化《蹇》为《解》的潜藏生机和希望之光。三、所谓“利见大人”，既见于上六爻辞，又写在卦辞之中，又说明了在济蹇的全过程中，必须坚持“大人”即领袖的正确领导。斗争成败，虽然主要来自于大众的同

心济蹇；但领袖的掌舵，其作用也不可低估。因此，这就对“大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坚持贞正之道，而非骄奢淫逸，这样的“大人”，才能具有凝聚力向心力，获得上下的支持和拥护，为同心济蹇积聚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有了上下一致的团结，于是就为济蹇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四、在斗争中，人们必须善于分析敌我强弱，知己知彼，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爻称“利西南，不利东北”，即是一种根据实践而来的经验总结。试想，当时的周民族，要想生存和发展，不分析周边国家的敌我形势，行吗？卦辞是古人经历了诸多失败与胜利的实践结晶，是宝贵的人生经验的历史总结，留给后世以有益的启迪。

有关《蹇》卦的精神，前人或有不同的理解。如今人胡朴安《周易古史观》云：“《蹇》，诸侯归向文王，就来决狱之卦也。《史记·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是其事也。乖必有难者，家道穷必乖，乖而不已必有难。《睽》上九群疑虽亡，不转瞬其乖更甚，至此家与彼家之乖，而有狱讼焉。《史记》：虞、芮之人，有狱不决。此虞、芮人之家，乖而有狱之难也。故受之以《蹇》者，《蹇》是诸侯皆来决平之卦，史第记虞、芮一事耳。《蹇》者难也者，蹇，是行之难与言之难，因决平言行之难，即谓之蹇，此《蹇》卦之义也。”我以为，胡先生所论，似乎太落实，理解有拘泥之迹。但如古人云：“《易》无达占。”故不妨见仁见智，录以备考。

解

卦第四〇



解难行道防隐患

《解》卦（䷧）第四十，紧随《蹇》卦之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反转的综卦。从《蹇》《解》之间的卦形变化，也可窥其相反相成的《易》理。故《序卦传》云："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解，缓解，舒解，进一步发展，具有从苦难中获得解脱和新生之义。世界万事万物，从个体来说，可能因蹇难压垮而消亡；但从自然界及整个人类社会看，则不可能永远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灾难终有缓解或消失的时候。蹇难是一种危机，而消解是一种转机，二者矛盾对待，但可以转化。没有危机，也就无所谓转机；没有蹇险，也就没有胜利。蹇难之中，已孕育了消解危机的可能和希望。比如中国上古时期，几度洪水滔天，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可谓灾难深重。于是尧命大禹治水，排除万难，一心为公，三过家门而不入，感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于是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终于导河入海，战胜了滔天洪水，胜利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当然，如前所述，化解蹇难，不能光是等待自然的恩惠垂怜，而应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孟子所说："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去排忧解难，以获新生。即使是自然生物，虽不具有人类意识，但在自然灾难的物种竞争中，如果要不被淘汰，就会主动应变，以调整内部的组织结构，如植物叶子的光合作用，野兽猛禽之坚其爪牙，沙漠中的骆驼草，干脆把枝叶的水分蒸发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以便在极其干旱的条件下，排除蹇难，获得生存并继续发展。但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困难，人们或可克服排解；但从矛盾对立的绝对意义上说，蹇难又必然是一个消失，一个又生，必须不断地加以克服和消解。因此，即使处在蹇难消解的大好形势下，也应以敏感的心灵、锐利的目光，去感觉并继续捕捉潜藏在新生

事物中的无形隐患——也即尚未发生而可预见的新生蹇难。于此可见，《易》卦作者的思想相当深刻，能洞察人之所未见。

《解》（䷧）卦辞云："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利西南，解释见前《蹇》卦爻辞。不同的是，同一"利西南"，《蹇》是周民族尚处于蹇难之中，其"利西南"是向西南方向的戎狄少数民族进行血与火的战争兼并，情况相当残酷；而《解》卦"利西南"虽然同一对象，仍是西南戎狄少数民族，但所处历史阶段不同，周民族蹇难已消解，血火之后，又逐渐带来了新的和平与繁荣，周民族也因兼并而日渐发展壮大。因此，不同卦中同样的"利西南"之辞，其具体含义也因具体卦画情景变化而有异，这就是古人所称"《易》无达占"之例。夙，原意为早，但黄、张《译注》引焦循《周易补疏》云："凡事早则速，速、夙音义皆通。"则夙又有速义。卦辞是说，《解》卦象征蹇难消解，如处于周之西南方的戎狄少数民族地区，经过兼并整顿，化干戈为玉帛，蹇难消解之后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和平景象，有利于周民族积聚力量并继续发展。因无灾祸，无须贸然前往解难，而应复归原位，静以观变，然后再作处理，这样必致吉祥。而一旦蹇难出现，观察准备，立刻迅速前往解除险难，同样可获吉祥。

从卦体卦象看，上震（☳）为雷，其性震动；下坎（☵）为水为雨，其性险陷。《象传》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这是就卦象言，上雷下雨，雷雨交作，以消解天地万物之屯难。从中又可看到《蹇》和《屯》（䷂）的联系。原来，《屯》是下震上坎，上坎为积雨之云，下震为雷声震动，雷震而雨不下，象征将雨未雨的屯难之时。而《屯》之下震升至上体，上坎降至下体，则化《屯》为《解》，雷雨顿作而万物复苏，可见《解》之消解《屯》难，也在事理之中。又《彖》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险以动"云者，险指下坎，动指上震，越险而动，出于险外而免于危厄，也就是蹇难的消解。"利西南"而"往得众"，则是周民族兼并西南戎狄地区以后，形势和平，颇孚民心，获得了该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故能形成伐殷去暴的实力。"其来复吉"，如孔颖达《正义》云："无难可解，退守静默，得理之中。""往有功"者，则是其难方生，就应不失时机地迅速赶去排险救危，如此果决，则能建功立业。"雷雨作"而难解，则是消解屯难，将雨未雨之屯蹇，顿时化作惊蛰雷雨。《屯》上坎雨云已化为《解》卦下坎雨水，万物复苏，苍生得济，于是花草树木萌芽绽蕾，大地一片欣欣向荣。故《彖》称"解之时大矣哉"，对《解》卦的伟大功效赞叹不已。但是，《象传》为什么在雷雨作后，有"君子以赦过宥罪"呢？我以为，蹇难消解之后，在和平环境之中，对于犯罪的人有条件也有可能进行改过自新的工作。牢狱囚犯过多，阴阳失和，怨谤丛生，不利于改造。因此，历朝历代，都曾

选择适当时机颁布大赦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后，也曾分期分批颁布对于战犯的特赦令，如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帅杜聿明，即在特赦之后改造为新人。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今为国家文史馆员。对全国来说，特赦的是小部分人，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不仅是犯人及其家属，而且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新政府改造旧世界的决心。战犯都能改造，况复其他！此“解”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心灵的一次开拓和解放。

初六，无咎。

爻辞至简，为什么？如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所说：“《恒》九二‘悔亡’，《大壮》九二‘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简，不复言也。”黄、张《译注》释曰：“本爻仅言‘无咎’二字，全爻喻义已在爻象之中。”爻象所示，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从消极方面看，初六居下坎之初，阴居阳位非正，此时虽处《解》卦之始，但其解难之力尚弱，故仅称“无咎”而难致大吉之功。而从积极方面视之，处《解》之初，以阴应阳，以柔济刚，阴阳和鸣而刚柔得宜，又何咎之有？如程子《易传》所云：“患难既解，安宁无事，唯自处得宜，则为无咎矣。方解之物，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辞寡，所以示意。”爻象之阴阳刚柔，所示甚明，故爻辞至简而不必多言。如汉初开国，结束了秦汉以来的战争，终于统一了中国，可说是蹇难既解而转危为安之时。但建国之始，犹如《解》初，当时历经兵火之灾，全国户口减半，民不聊生。当时君主，如想学秦始皇大兴土木，盛建陵墓，必然生灵涂炭，民无遗类。有鉴于此，丞相萧何为高帝刘邦设计国是，循道家言，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而不扰民，此时国家朝廷虽因力量柔弱而难致大吉之功，但与民休息、民生复苏又何咎之有？故爻称“无咎”以顺应自然。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田，作动词用，这里指古代的田猎。田猎之时，兵戈并举，实是一种特殊的练兵演习，与国家安全有关。狐，古人曰之为狡诈邪媚的不祥之物。如唐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中指斥武则天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以“狐媚”喻君王身边隐患。但是，为什么爻称“三狐”呢？朱熹《本义》以为卦凡四阴，除六五君位，余三阴比之三狐。我以为此说窒碍难通。从爻辞爻位看，初六“无咎”，上六“无不利”，又与狐媚小人何关？所以只能说是古人以“三”喻多，获三狐，即清除了许多潜伏隐患，而不必巧加附会。黄，色之中；矢，直也；以黄色箭矢喻其刚直中正之美德。爻辞是说，九二，在大规模的田猎行动中，因为得到了刚劲中直的黄色箭矢，所以能一举射获三只潜伏暗处的狡猾狐狸，此乃坚守正道必致之吉。从爻位爻象看，九二以阳居柔而处中位，上应六五，阴阳和谐而刚柔相济，作为刚健中正的王臣，其力足以解蹇济困，因而获得在上君主的宠信，其忠心国事，持守正义，必致吉祥大功。又九二与六三、

九四互卦为离（☲），离有兵戈之象，见《说卦传》，故爻以“得黄矢”、“获三狐”的田猎为喻。又九二处下体坎险之中，初六因力弱不足以解难，故守静待时而致“无咎”；但九二若不行动，则终难摆脱坎陷之困。故九二秉其阳刚中正厚实之德，借上应六五之机，而有较大的行动以建其功业。九二之动，是处解之时的一个切实的行动。故爻称“贞吉”，以颂其积极而主动的解难壮举，誉其任重而道远。此时虽然尚未脱出坎险，但实是从《蹇》之危机转化为《解》之生机的一个重大信号，也可说是力图消危解难而走向胜利的一个关键步骤。如中唐元和年间，河北三镇割据河北，淮西叛镇跋扈河南，朝廷不安，国家震荡。宪宗在上，虽有心统一天下，要求进行平叛战争，但因群臣反对而犹豫不决。此时宰相裴度等力排众议，上应宪宗，坚主出兵淮西以去其心腹之患。淮西讨平，河北三镇慑服，也次第奉土以归朝廷。裴度主张统一而率兵出征，义正辞严，光明正大，如爻称“得黄矢”；而荡平淮西及河北三镇次第复归，如“获三狐”；国家一时出现中兴局面，可谓之“贞吉”。故《象传》云：“九二贞吉，得中道也。”所言甚是，居中能自守正，守正又必去邪，以助在上者成其中兴大业。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爻辞是说，六三，小人背负沉重财宝，得意洋洋地登上大车，惑人注目而招致强盗抢劫；这时只有持守正道，才能避免遗憾。从爻位爻象看，六三阴据阳位，过中不正，又居下坎之上，高居坎险之极，危而又危，加以下面乘凌九二之刚，上挤九四之阳，如小人之窃高位而得意忘形，忘乎所以，故爻以“负且乘”为喻，其致寇之灾，实自取其咎。六三不仅身处下坎之极，而且又与九四、六五上互为坎而居其初，爻象说明了六三是一险未脱，而新险又至，凶险至极，故有致寇的兵戎之灾。六三与九二、九四下互为离，离有兵戈之象，同样有“致寇”抢劫之象。全卦四阴爻，就只有六三如小人而不吉致“吝”。《系辞传上》引孔子之言释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从孔子的解释，又可发现新问题，就是六三小人何能窃据高位而致害？所谓“上慢下暴”，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人君轻慢于上，不举贤授能，而是宠任奸佞小人，使小人窃据高位而肆暴于下，因其“负且乘”而致寇，虽说是自我引火烧身，但追究其始作俑者，则在上者不顾国家朝廷之名器，应负重要罪责。故六三隐患之害，不仅是小人生灾，而且祸连于国家与民族。如《周易折中》所云：“盖上亵其名器，则是上慢，如慢藏诲盗；下肆其贪窃，则是下暴，如冶容之诲淫。夫是以贼民兴而国家受其难，难又将何时而解乎？”如汉献帝末年，宦官擅政，外戚专权，军阀割据。为灭宦官，大将军何进借诏召西凉军阀董卓率兵进京，假以名位，结果是卓至而天下大乱，于是加速了汉朝的灭亡。故《象》

云：“负寇至，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何进引贼兵以解难，结果反而是难上加难，自致灭顶之灾。于此可见，《解》卦虽是蹇难的消解，但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又随时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和困难，甚或构成成功事业的新隐患。六三因处理不当而“负且乘”，自致寇盗，正是埋伏于解难过程中的一颗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因此，当人们因排除险难而欢呼雀跃之时，也应警惕是否还有潜伏的隐患。居安思危，这是中国的传统古训。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大拇趾，原来未分手或脚之大拇趾。但详察爻辞之意，“朋至”云云，乃脚行之至；加以上体为震（☳），按《说卦传》谓有“作足”之象，九四居震体之下，故应指脚大拇趾。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云：“（纡）斮朝涉之足，察其拇。”而，通尔，人称代词，指你。朋，指阴阳相应之初六。斯，介词，乃也。孚，信也。爻辞是说，九四，缓解了你那足拇趾的伤痛，出门欢迎朋友光临，彼此同心相应，待之以诚。从爻位爻象看，九四居位，已从下体坎陷之中脱出，升至上体震初，震性动，原应有所行动来排除险难。但九四阳居阴位不正，又非中正，故虽处解时，也有足拇之痛的小小磨难。故《象》云：“解而拇，未当位也。”在《易》卦中，二、四为王臣之位，至关重要。但在《解》中，九四有失中正，故虽处解而仍不免于难。九四与六三、六五互卦为坎，爻象已示其有处坎陷之难。但因九四阳刚壮健，居王臣位而责任重大，加以下与初六阴阳正应，上比六五有助，又处灾难消解的过程中，故足拇趾之痛一消，即刻行动，出门欢迎朋友初六的到来。上下同心，精诚团结，故爻称其“朋至斯孚”而共同排险。只要万众一心，何难而不可解？九四虽不言胜利之吉祥，但位在上震之始，已暗中为五、上的胜利排难作了必要的铺垫。如中唐大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叛乱时，率兵

■郭子仪像



收复二京，战功赫赫。但因此遭忌，小人谗毁日至，君主猜疑，有如足拇之疾，行动备受牵掣。郭子仪想要解除蹇难，建大功业，必先解除拇疾以获朝廷信任，他于此自有办法。《新唐书·郭子仪传》载："子仪事上诚，御下恕，赏罚必信。遭宰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富贵寿考，哀荣终始，人臣之道无缺焉。"内心诚孚，公忠体国，这就是他"解而拇"以获成功的重要步骤。在他统帅下，骄兵悍将有所收敛，朝廷威信大增。如本传称："（魏博镇）田承嗣傲很不轨，子仪尝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久矣，今为公拜。'"割据强藩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忠臣义士呢！此爻所称"朋至斯孚"也。因郭子仪的表率作用，其上下左右皆以诚相待，故为平叛战争的胜利，作了必要的铺垫。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维，语助词，无实义；但又可与"惟"通假，作思考解释，于义亦通。爻辞是说，六五，君子思考解难的方针策略并付诸行动，必致吉祥，其赤诚连小人也为之感愧，故退听其言而悉遵号令。五处解中，正当君位，又居上震之中，震性为动，正是切实付之行动的关键时刻。六五虽阴柔力弱不足以排难，但下有阳刚九二王臣之强助，又下比九四"解而拇"的刚健近臣，四与初为正应，故有"朋至斯孚"之象，其功坚强，得道多助，甚至连小人也感动出力，如王弼注云："居尊履中而应乎刚，可以有解而获吉矣。以君子之道解难释险，小人虽间，犹知服之而无怨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小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正人君子呢！可见此时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消解险难，去争取胜利。故《周易折中》释曰："盖'朋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乐于为善；小人信，故化而不为恶。往往国家有举错（按：如变法改革之事），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则枉者直，而不仁者远矣。"大至国家民族，小到公司企业，如有大的改革举措，一定要以诚相待，努力把自己的正确想法，通过宣传介绍，化为每个国民或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这样，国家民族必然大有希望，公司企业也定会兴旺发达。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公，指重命在身的王公大人。隼，泛指鹰鹞一类的贪残猛禽。墉，城墙。爻辞是说，上六，王公大人见猛禽恶鸟踞据高城之上，箭无虚发，获之而无不利。从爻位爻象看，上六阴处阴位得正，又处解终，居上震极，正是大解大动之时。又六三为"负且乘"的小人，成为全《解》集矢之的。但六三不甘失败，通过阴谋，窃据高位，犹如恶隼之集高城之上，妄图瞒上欺下以用其邪毒。但上六与之无应而斥，一眼洞穿其五脏六腑，积极协助君主六五采取果断措施，并且身

先士卒，用武器解除恶鸟之害。《系辞传下》引孔子言释之："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按：指无滞碍），是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孔颖达进一步发挥孔子之意云："言射隼之人既持弓矢，待隼可射之，动而射之，则不括结而有碍也；犹若君子藏善道于身，待可动之时而兴动，亦不滞碍而括结也。"孔子"成器而动"之语，发人深思。第一，六三小人如恶隼之跻登高墉，方可射击；如果六三藏而不露，则应关弓待发，时不至不动，时至则发，发则必中，此解难成功之法。第二，六三位处下体，但却能跻升高位，窃据要津，又说明了隐患的发展，旧患已解，新的隐患又可能在危险的部位重新出现。如癌症，肿块虽已切除，但隐患并未完全消除，癌细胞仍有可能通过血液淋巴大范围转移，从而致人死命。所以作为医生，应该"成器"在握，防患未然。消解危难之后，也不应忘记预防新隐患的产生和出现。那种以为一解而百病消，居安不思其危的天真想法，是危险的，可导致新的灾难和失败。只有"成器而动"，警钟长鸣，才能取得解难斗争的最后胜利。例之以史，如周公之伐管、蔡，据《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管、蔡、武庚等果然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征，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管蔡武庚之叛，如六三窃据高墉，周公东征，如爻称射隼"获之无不利"，消解了国之大难，故诸侯心服，天下太平。

综观《解》之全卦，二阳刚健有力，是解难重臣，由他们协助君主推行解道，正是其时。卦中凡四阴：六五以柔德居中为君，并获二、四劲力之助，因而成其解散患难之功，这是全卦团结之核心，上下交孚之共主，故天下归心，排除万难。初六以柔处刚，上应九四，刚柔相宜，虽力弱不足以排解大难，但处解之初的无难之时，待时静守又有何咎？上六则因处震终《解》极而建功，如《象》云："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如果说排解悖乱之谋出自六五，则上六是其最终实现解悖之人，功莫大焉。全卦四阴，初、五、上三爻皆为解悖君子，只有六三是"负且乘"而"致寇至"的小人，是悖乱之源，故为全卦解悖箭矢之所集。六三媚上乱下，钻营投机而窃据高位，即明示旧难虽解，而新难又萌之兆。行解之人，若不注意不断消除旧害新患，则祸难彼伏此起而无已时矣。这一启示，至关重要，合乎矛盾论。又六五爻"有孚于小人"，又说明弭灾解难，有待于上下一心团结，即使是"小人"，也必须善于做他们的转化工作，待之以诚，说之以理而动之以情。苏轼《东坡易传》云："夫欲毙所争而解交斗，惟不涉其党者能之，故高墉之隼，惟上六为能射而获也。"北宋末年，新旧党争激烈，其质已变，故其祸患莫解，而大难斯须立至。东坡有感而发，不幸言中，可悲可叹。

损

卦第四一



老实吃亏终致益

《损》卦（䷨）第四十一，次《解》卦（䷧）之后。《序卦传》云：“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如字面所示，其义为减损，在卦中甚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灾难业已缓解，暂时摆脱困境，虽说是一种解放；但人们不可因此而放松自己，甚或放纵行为，因为在较为宽松的和平顺境之中，如不严格要求，就很容易犯错误，从而损害自己，甚至会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损失。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的话加以解释：“宥罪缓死，失之于侥幸，有损于刑政，故言‘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也。”所举之例，过分落实而不灵活，但其总体精神却是大致不差的。人们在初脱困境之时，虽然险难暂时缓解，但千万不要以为已经是万事大吉而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百废待兴，新的建设之时，又会产生新的隐患和困难潜伏其中。犹如一场洪涝灾害之后，洪水已退，人已无生命之虞，但是房倒屋塌，道路破坏，老弱衣食无靠，饥儿嗷嗷待哺，正在着急地等待救济呢！在此情况下，只能损己益人，团结互助，共渡难关，以便共图恢复。不过，因为阶级局限，古代《易》家对于《损》卦的理解，多注目于损下以益上之意。如《周易折中》所说：“如人身之致身事主，百姓之服役奉公，皆损下益上之事也。必如此，然后上下交而志同。”在封建社会中，这一认识有一定的代表性，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明显有一定的片面性。我认为，古人所谓损下益上，只是《损》卦精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包含了损上益下的内容。如北宋时，实行茶榷专营，国家赋税收入增多，暂时缓解了国家财政亏空的危机；但是时久致疾，弊端百出，几乎是无官不贪，贿赂公行，敲剥百姓之事不断发生，因而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反对，为此，宋仁宗于嘉佑四年下达《罢茶榷诏》曰：“历世之弊一旦以除……损上益下，以休吾民。”（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七）据此，则《彖传》以“损下益上，其道上

行”统观全卦，认识并非全面。于此可见，对经典传注也不能盲目迷信，不能囿于往昔封建士大夫偏见，仅以刻剥下民为“损”之精神。《损》之为道大矣，不可片面理解。从卦体看，《损》（䷨）与《益》（䷩）互为上下卦形反转颠倒的综卦，已透露了损与益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损》卦虽以损下益上为主，但同时寓含了损上益下之兆；《益》卦以损上益下为主，同时益下即固本，固本不就是益上了么！所以，看问题不能只看事物的某一方面。

《损》（䷨）卦辞云：“损，有孚，元吉，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享。”损，减省。簋（guǐ），是一种盛行于殷周时期的食器，本作“毁”，圆口，圈足，青铜或陶制，用以盛食物。卦辞是说，《损》卦象征减损之道：必须心怀诚信，才能获致吉祥。在实行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正义之道，以利于人们前往。但是，用什么来体现减损之道呢？犹如供奉神灵祖先，只要二盘普通食物就可以表示诚心而致其享祭。从卦体卦象看，《损》卦上体艮（☶）象征山，其性为止；下体兑（☱）象征泽，其性喜悦。清陈梦雷《周易浅述》本程颐《伊川易传》加以解释发挥，说：“《损》卦下兑上艮，取损下益上之义。其说有四：山体高，泽体深，下深而上益高，一也；泽在山下，其气上通，润及草木，二也；下为兑说（悦），三爻皆上应，说以奉上，三也；损下乾刚而益柔，益上坤柔而成刚，四也。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谓之损。譬损墙上之土以培基，则安益也；取墙基之土以增其高，必危损矣！散君惠以结民心，益也；剥民以奉其上，损矣。”所言至为简明，认识比较全面。其实，按照物质不灭的自然规律，所谓损与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损之则必有所益，益之则必有所损，就看所损为何，所益为谁了。如果因时适变，损其所当损而益其所当益，则损与益无所不当；反之，不合时宜而变易阴阳，损其不当损而益其不当益，则损、益皆误，小将危及个人身家性命，大将危及国家民族和时局安危。损、益之为道，可不慎哉！所以卦辞首先提出“有孚”二字，以作为全卦的精神纲领，纲举则目张。在上古社会，在上的君主也即帝王，既是高高在上的个人，又是国家民族的象征，“朕即国家”应从上述两方面来理解。因此，损下以奉上，可以理解为剥削百姓以奉君上，供在上者过其奢靡生活，如唐韩愈《原道》篇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但是另一方面，韩愈所称君上即帝王，同时又可作为国家朝廷的象征。因为文明的进步，社会分工日趋明显，君上治理国家朝廷，百姓负责生产以供养国家朝廷，在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如果不损下益上，百姓不向国家朝廷交纳赋税，国家又将如何治理？遭到敌人侵略又将如何抵御呢？不论是经济的宏观调控，政治的秩序稳定，或是抗击外族入侵，这一切都与在上的国家朝廷密切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损下以益上并非尽是谬论，在健全国家，发展民族，推动文明进步的关键时刻，人民自会作出牺牲和奉献，下损个人利益以上增国家民族之生机；而一旦国家民族获得了健康发展，又将反过来增益在下之百姓，保护其安定生活，此

之谓反其损而益于下。因此，对于损下以益上，也不应只限于负面的消极理解，关键还在于“有孚”，只要心存诚信，在上者体察民心，在下者公忠体国，就是坚持减损之正道，循此前往，必然无咎而致元吉。反之，若乏诚信之心，尔虞我诈，非正而邪，则为损人利己，刻剥百姓，必然民怨沸腾，而何来无咎之吉呢？所以卦辞接着以“二簋可用享”之薄礼，来说明心诚则祭献多寡在所不计。故卦辞“有孚”之称，言简意约，寓有严肃的劝戒之意，主要是说给在上者听的。唐太宗就颇通这一卦理。当时贞观大治，臣子谀颂，建议封禅。须知，封禅之举，将花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必须惊动四方，极力损下以奉上。但唐太宗回答说：“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他明白表示：“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同上卷一九二）可见损下奉上之事，是特殊形势中的措施，事非得已。因此，不能以《损》卦之理，作为刻剥百姓的口实，这是应当予以提醒的。

以上是就物质生活方面之“损”而言；另外，还有精神生活方面的“损”道。如《象传》所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损》卦上艮又可象征少男，少男者，青年男子也，其人刚要踏上社会，缺少经验，又血气方刚，一不合乎心意，立即动怒，其忿之来如山摇地动，这不利于少男立足于社会，所以应当善加引导，适当损其血勇之气而惩窒其忿。惩者，惩于今而戒于后也，以保证其健康成长；又上艮如山而性止，忿而知惩则乱止。下体兑象征泽，其性喜悦，又可象征少女，少女之性，因缺乏社会经验，易上当受骗，现今社会所见比比皆是，见诸报端电台，更何况是上古社会！又因少女正好处于青春幻想阶段，悦则多欲，如若多欲而无适当节制，则如沉溺水泽，为保证少女健康成长，亦当窒防其盲动之欲。总之，观《损》卦山下有泽之象，除考虑物质之“损”外，更应从伦理道德方面考虑精神之“损”。该益则增，该损则减，“损”之为道，自然而然，并非尽是坏事，而是合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规律的。如杨万里《诚斋易传》所说：“此所谓损不善以益其善也。观兑之说，君子得之以惩其忿；观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静，如泽之清。其忿也，或触之；其欲也，或诱之，岂其性也！深戒其触之之端，逆闭其诱之之隙，损之又损，则忿欲销而一性复矣！”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东方西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贪污腐败现象，如日本因住专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韩国因韩宝贿赂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贪欲横流，社会动荡，人民深受其害。人们如能细味《损》卦之义，观兑以制其欲，观艮以惩其忿，一个无所妄求的大公无私者，则可因精神上自损不善而增其品格之美，清廉作风，窒塞腐败之源，从而保证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于此可见精神之“损”与物质之“损”一样重要，必须双管齐下。下论爻辞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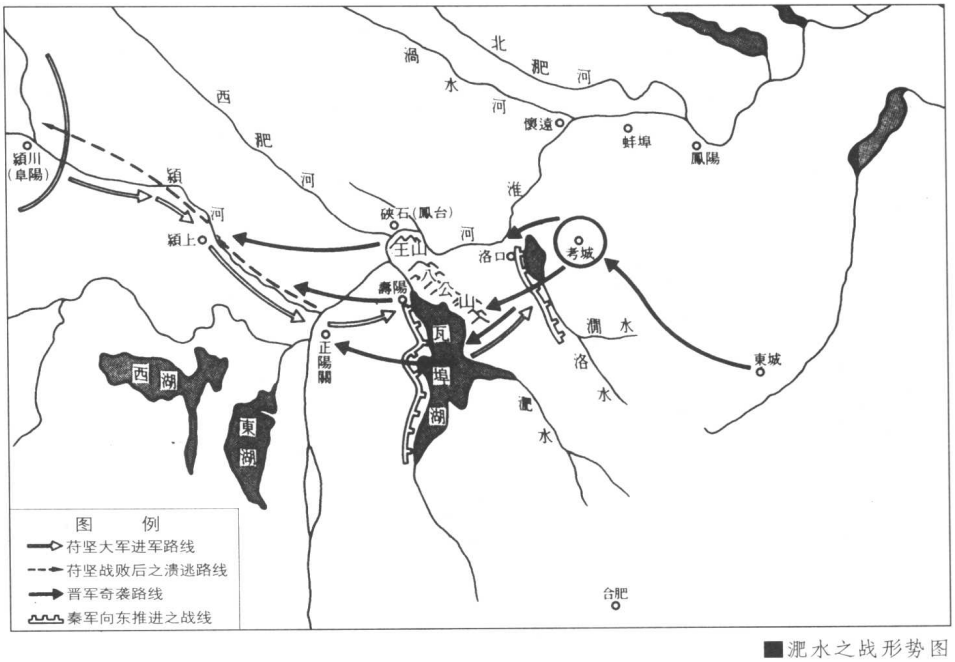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事，“事已”的倒装。遄，迅速，赶快。爻辞是说，初九，结束自己手中的事情，迅速前往辅助尊者，必然身无咎害；但其自损益上的行动，必须适当

估量形势，斟酌其深浅时宜，而不能莽撞行事。从爻位爻象看，初九处《损》初始，所损未多，阳刚盛壮之气正健，又以刚居阳而位正，处于有余之地，上与六四阴阳呼应，六四居近臣之位，但阴柔力弱，在上而亟待下之增益援助。而初九适居下兑之初，兑性悦，故欣然往上增益六四尊者。其时上下相应，阴阳和谐，损有余以补不足，何咎之有？故爻称“无咎”。六四的确急需在下者之出力辅佐，犹如战争的关键时刻，增援部队刻不容缓，故爻又有“遄往”之辞。但初九以阳居刚，虽欲自损益人，但气势太盛，则可能对上不够尊重，甚至气势凌人，其态度可令在上受援者（六四）颇感难堪，故爻辞又添“酌损”之戒。这实是来自生活的经验之谈。即使是帮助别人，不管是在上者或在下之人，同样不仅要有真心诚意，同时还要讲究方式方法。举一个反面之例，如《礼记·檀弓》下记载一则故事：“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屨，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在大饥荒年，富者黔敖自损以救灾，施食于饿者，原是行善积德之事。但却因其态度傲慢，语带轻蔑的“嗟来”之叱，激起饿者的自尊与反抗，坚决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初九“酌损”的重要性，外在的态度及方式方法，实是反映其内心之诚孚，严重的关系到人的生命及社会安危。在下的饿者尚不屑嗟来之食，更何况是在上的尊者？“酌损”之戒，事关“损”道之正，确是至关紧要。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爻辞是说，九二，利于坚持正义之道，妄进则有凶险；自我无损，即是益人。从爻位爻象看，九二阳刚居中而处阴柔之位，谦和待人而非傲慢，上与六五阴柔之君共鸣互应，刚柔适中，上下各以谦柔中道而各守其位。所谓“损”者，损有余以补不足，二为阳居柔中之地，刚柔适宜，而非有余之人；五则以柔居全卦之中，职守君位，亦是刚柔适中而非待人增益者也。上无须益而妄上益君，则有屈己谀人、剥下媚上之嫌，此君子所不为也。故爻辞戒其“征凶”而劝人守其“利贞”。二、五上下阴阳各守其中，无须自损，但其声气相通：二非损己，积存了益上的条件和资本，所以五虽自守，也已造成了虚受其益的有利形势。以战阵为例，六五为城守之君，是攻防的主力，在敌军并非特别强大而压城以薄的情况下，九二在城外要塞设险，成为掎角偏师，这时只要持中自守，主力与偏师遥相呼应，而无须盲目派兵入城增援。如若强行援城，则可能丧失要塞偏师，失其中而非益人，直接暴露了城防虚实于敌军，此之谓“征凶”。如东晋淝水之战，前秦苻坚百万大军直逼江南，当时，东晋驻节荆、襄的桓冲急于派兵增援朝廷，但宰相谢安分析敌我形势，婉谢桓冲好意，指示荆襄部队不可盲动援京，造成中、下游战阵的掎角之势，荆襄与京城建康遥相呼应，结果是淝水一战，晋军主力大获全胜。此爻辞所称“弗损，益之”之谓。黄、张《译注》引《周易玩辞》



■淝水之战形势图

云："损以有'过'与'不及'，故损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则既中矣，二非有余，五非不足：一有增损，则反失其中矣。"二、五"弗损"而各守其中，其声气呼应即是有益于人了。又九二与六三、六四互卦为震（☳），据《说卦传》，震之象征"为大途"、"为决躁"，也就是说，震有刚决躁动而急于上路之象，九二在互卦震下，正是躁动急进之始，故爻辞戒其"征凶"，与互卦之象不谋而合。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三人，指卦中三、四、五凡三阴爻。前句"一人"，指上九阳爻；后句"一人"，专指六三。爻辞是说，三人同行以求爱，则损害了共同所爱之一人；若是一人专心前往而诚意相求，则阴阳和合而感情永固。六三处下兑之上，悦极上求，情笃意诚，与上九阴阳呼应，以身徇上，自然和谐，故爻称"一人行则得其友"。但是，六三若意非专诚，而与六四、六五共求上九之一人，则三阴同性相斥，上九为众阴所乱，无可适从，而反受其害。现代小说、电视剧所写的三角恋爱似之，故爻称"三人行则损其一人"。此爻之义，实为《损》卦精神之所在。《彖传》引孔子之言："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清陈梦雷《周易浅述》发挥说："天地间阴阳对待，唯两而已，三则余其一而当损。盖两相与则专，三则杂而乱……夫子《系辞》以男女媾精言之。"又云："一人行而得一人为友，三则疑其所与，理当损去其余也。然细绎此爻取象，不过谓有余在当所

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损，损而得当，则为得友耳。夫子《系辞》以男女言之。盖阴阳对待，不容或过，犹男女有偶，不容或参。故道有宜损者耳。非谓取友者，有取于二而不容有三也。若以辞害意，则不可通矣。”这是从阴阳矛盾角度看问题，理解灵活而合乎对立统一的自然发展规律。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疾病，古人以为指“相思之疾”（孔颖达《正义》）。使遄，或谓六四主动接纳阳刚，似乎不妥；“使遄”是使动之词，应是指自身创造有利条件，促使初九迅速赶来会合。爻辞是说，六四，应该主动医治自己那因柔弱而造成的心灵创伤，减损其思恋之苦，并且创造条件，促使初九自愿赶来会合增益，这是可喜可贺之事，其行动必无咎害。六四已从下体升至上艮之始，艮性止，爻象示见了六四能够自我反省觉悟，行知止其所止。六四又与初九阴阳呼应，初九酌损其刚阳之余，则可补六四之不足。不过，六四虽然阴居阴位得正，但是质地柔弱，力有不足，因其苦恋得疾，又有不利于阴阳会合的一面。《易》理重变，多从运动角度看问题，六四一旦爻变化阳，则与六三、六五上互为坎，坎象险陷，有“心病”之象（见《说卦》）。心病若不及时治疗，则对六四弱质之体是雪上加霜，愈增其灾难。犹如一个大病初愈之人，气虚体亏，如果急于大补，则表面增益，而内里实是受损亏伤。据此，则其人只能先自调理内在生理机制和健全心理功能，自我减损病害，才有条件进一步进补受益而恢复健康。故《象传》解释说：“损其疾，亦可喜也。”程颐《伊川易传》也说：“四以阴柔……损不善以从善也。”一旦六四在生理、心理方面自我调整顺利，初九就会主动赶来增援，益以阳刚之正气，则将出现生机流转的可喜变化。所以，六四自“损其疾”，是接受增益、由弱到强，出现矛盾转化的条件。比如春秋时的郑国，国小力弱，夹在晋、楚、齐诸大国之间而见侮，子产执政，为改变这一不利状态，毅然推行系列改革措施，国人反响激烈，在乡校议论纷纷，讥诋执政，人或建议子产毁乡校以弭谤，子产答道：“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子产一席话，救了郑国。他把国人的意见和批评当作药石，主动治疗自身疾患，从而获得了增益。于是郑国赖之以强，不亢不卑地周旋于大国之间而无碍。“我闻忠善以损怨”，可作爻辞“损其疾”的生动注解；“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如爻辞称“使遄有喜”，故当时郑国一时人才济济，呈现勃然生机。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或”为不一之辞，说明益之者非仅一人，而是人心所向。朋，两贝为朋；

贝是上古时代通行的货币单位，“十朋”即二十贝。龟，中华古人因其寿长而视为宝贵灵物，或灼其龟甲以占卜决疑，或以作货币用称龟贝。十朋之龟，泛指价值昂贵的神灵宝龟。爻辞是说，六五，或有人进献价值二十贝的昂贵宝龟，无可推辞而受其增益，至为吉祥。从爻位爻象看，六五是“柔顺虚中以居尊位，当损之时，受天下之益者也……十朋之龟，大宝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辞，其吉可知”（朱熹《周易本义》）。所谓“弗克违”之益，是不知其益之所自来，是大众自觉自愿的进益与奉献，犹如百川之汇海，海不增其高而已受其益。爻辞所称“十朋之龟”，实是以决疑之筮占来比喻众才尽为其用，大众帮助国家已化为自觉行动，在上者尽得天人之助，故爻有“元吉”之誉。如《尚书·洪范》云：“汝（按：指君主）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人从，是之谓大同。”人心和顺，龟筮从之，何疑而不决？天人相谐，世趋“大同”，在上者虚受其益。这一美好愿望，虽多幻想成分，有待将来人们的努力，但有所追求总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损，益之”，旧注大多连读为“弗损益之”，释为上九居损之极，不用自损即可益下，如朱子《本义》所谓居上者“惠而不费”。此说费解。清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则云：“弗损，弗浚民以生。”此解较为合理。上九居《损》之极，已处由损转益的矛盾临界限上，损下益上已达极限，上九已成“有余”之人，何必再损下以自益不止呢？又上九下应六三，虽为阴阳正应，但三、上爻位皆非其正，上九如能损其有余之阳刚，以补六三阴柔之不足，则合之双美，故爻称“利有攸往”而“益之”。由此可见，应以“弗损，益之”断句为是，弗损和益之的对象，均指在下之阴爻。得臣，谓获得臣民的归心。无家，对下而言，不是说无家可归，而是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上损其有余以益下，在下臣民欢欣鼓舞，心悦诚服而一致拥护，而不限于一家一户。但对上而言，则又应理解为君主无私肥自家之心，而是以国为家，故称“无家”。二解皆通。据此把上九爻辞译为白话：上九，受益已极，不可再损下以益上，而应损上之有余以补在下之不足，这样行动必无咎害，坚持正义必致吉祥，利于前往会合在下臣民，这就将获得全国臣民的一致支持和拥护，而不限于一家一户。故《象传》云：“弗损，益之，大得志也。”宋杨万里《诚斋易传》又举例说明：“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饥，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冻老，汉文集书囊、罢露台而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实皆损之上九也。得臣，谓得天下臣之心。无家，谓无自私其家之益。”但古代统治者却常反《易》理而行，如《汉书·五行志》载：“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财力者及私奴客……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谷永曰：‘《易》称得臣无家’，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崇聚票据无谊（义）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数去南

面之尊，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积数年矣。昔虢公无道，有神降曰：赐尔土田。言将以庶人受土田也。诸侯梦土田，为国失祥，而况王者畜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汉成帝无限制地敲剥百姓，损下自肥，实违《损》卦之义。多行不义必自毙。因此，西汉王朝迅速转入衰乱末世，已在成帝时埋下先兆。

《损》卦象征减损。但旧注一般解为“损下益上”，此说有一定的片面性。当损之世而行损之道，这是自然规律。如上海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夏天绿荫宜人，冬天则剪去繁枝浓叶，这是该损则损，是为了来年开春更好地生长。人也一样不能只益不损。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云：“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愿自以为身残处秽（按：指因李陵事件受宫刑），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谁与语！”贤如司马迁，一样有“欲益反损”而无计相回避的时候。不过，《损》之为“损”，也并非尽是倒霉之事，观上九爻辞爻象所示可知。“得臣无家”，即是因损反益，是大得志于天下的贞正元吉。汉刘向《说苑·敬慎》引孔子曰：“《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之极而终受益。”当今世道，一般总以为老实吃亏受损。在生意场上，俗话说是“无商不奸”，谁肯做老实商人？因此伪劣假冒产品满天飞，昧尽良心，损人以肥己。实际上，就一时一事，可能老实人上当受骗，吃亏受损。但是，损人者能永远得意而不被他人所损吗？就以最近日本因住房问题引发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例，狡诈的资本家骗取非法巨额贷款，炒作过热的房地产以获一本万利，结果因泡沫经济而破产，实是损人而不利己，给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巨额黑洞，不得不动用国库，甚至是增税等手段来加以补救。相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则开始把利润的相当部分，用来搞教育，办科技开发，及支持公益事业，以回报社会，表面是企业减少利润受损，实际却是企业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而生机勃勃。如当今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在其《回归哲学》书中说：“他们想的是‘那个坏蛋赚了钱，那个老实人吃了亏’，认为纯真会吃亏。诚然，在短时期内，也许看起来坏人好似成功了，老实人好似吃了亏……但是，用20年、30年的幅度来看人的一生，坏家伙还是不得意的，诚实的人最后还是过着幸福的生活，你、我不都是这样吗！？”（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39页）肺腑之言，甚为生动。中国古代哲人，更把《损》《益》相反相生的要义，加以精神升华，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深沉哲学思考。如《后汉书·逸民传》云：“向长字子平……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读《易》至《损》《益》二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益

卦第四二



益下自损终自益

《益》卦（䷩）下震上巽，序次第四十二，跟在《损》卦（䷨）之后，彼此互为上下卦体反转的综卦。从卦形卦体变化，已透露了《益》自《损》来的迹象，也可窥见《损》《益》矛盾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宋王安石之父名益，其字损之，即据《易》理以命其名字。古人为子女起名，是很慎重的事，于此也可见损益之理通于人生之道，损之与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或是一个事物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故《序卦传》云："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损己利人，回头来又会受益于人。所论甚是。比如说救死扶伤，帮贫解困，损己益人，在势利者看来是呆瓜干傻事；实际不然。在他人受灾时援之以手，损己益人，此正义之举，必然人人感动而万众一心，振奋精神以共建家园。地方恢复如此，国家建设亦然。国势恢复，繁荣昌盛，利人益己，犹如大河满而小河淌。故若人人具损己益人精神，持之以恒，则必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向转化，人皆受益，灾区人民化悲为喜，重新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当然，抗震救灾之事不过是举例，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也莫不如此。北宋范仲淹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为推行其改革主张，著《天道益谦赋》，讨论了损益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说："原夫杳杳天枢，恢恢神造，损有余而必信，补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为政……岂不以谦者物之自损，益者时与之昌。龙蛇蛰而后震，草木落而还芳，于以见物理，于以见天常。月既亏而中盈，于时不昧；阳尽剥而求复，其义爰彰……盛衰之应也，惟变所适。苟守之以谦，必受之以益……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远？"于此可见，损益相反相生之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故古人作《易》，以《损》《益》相次，非偶然也。

《益》卦（䷩）卦辞云："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意思是说，《益》卦象征增益，利于前进兴建事业，利于抗风顶浪涉越大河险川。《益》之为卦，下震（☳）上巽（☴），下震象雷，其性动；上巽象风，其性顺；风雷激荡，威势相生，故用以比喻增益。从卦形卦象看，雷震动于下，而风巽顺于上，是上风之所向，随下雷而运动。故其所增益，已呈损上益下之象。故《彖传》云："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彖》释卦义，颇为详明。损益之道，乃适时应变，而非可执一而滥施。该损则损，如北方梧桐之越冬，去其枝叶，减损其营养和水分消耗，以保证来春的生长。该益则益，如人之饥餐渴饮，以保证其体力恢复而精神弥充。损益之道，不可拘之以方圆，而是根据实际需要，"与时偕行"而应变无方。如果说，《损》主损下益上之旨，则《益》回报以损上益下之义。从卦体看，《益》下震（☳）从坤体（☷）变来，其上体巽（☴）由乾体（☰）化生，也就是上乾下爻之一阳，益坤下爻之一阴，阴阳升降对转而成《益》。故《彖》称其"损上益下"。人主自损于上以惠泽下民，如灾年蠲免赋税，开仓赈灾，则民情欢悦拥戴。有了民众的支持，则江山稳固。故《彖》又称为"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卦九五之尊，与下面六二之臣，阴阳共鸣，中正其位，利于迅速会合，故《彖传》称"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君臣相孚以中正之道，何所往而不利？所以大可庆祝。又《易》理重变，六三若爻变为阳，则下互之卦为坎（☵），坎为水，有险陷之象。而上巽有木象，木可为舟，可用之浮河济海，故《彖传》称为"木道"。于此可见，《益》之君泽流惠增益于下，上下相孚，民悦无疆，则万众一心，何险而不可涉越？故《彖传》又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晋王弼注云："木者，以涉大川为常，而不溺者也；以'益'涉难，用乎木也。"但《象传》则改变视角，从社会伦理角度看问题，说："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引导人们观看《益》卦风雷相激之象，联系人事的改过迁善，从思想情操方面进行自我增益，如《周易折中》释云："雷者，动阳气者也，故人心奋发而勇于善者如之；风者，散阴气者也，故人心荡涤以消其恶者如之。"这是人类灵魂的净化与升华，是一种境界很高的精神食粮的增益。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爻辞是说，初九，处于增益之始，利于大干事业以获发展，至为吉祥，无所咎害。从爻位爻象看，初九处下震之始，阳气初生而位正，又上应六四，阴阳相和，震初始动，所以利于大有作为以获增益之功。处在该益则益之时，与时偕行而大干一场，当然必无咎害而致其"元吉"。《周易折中》认为全卦以损四益初为义，受益之极，故初九为成卦之主，其精神要义云："必大有益人之事，然后可以自受其益。非然则受大益者乃所以为大损矣。"如前所述，上乾下爻益下坤之初以成《益》，故《益》初九受其大益，受大益者必须大有作为以回报于

人，则人皆受益而至为“元吉”。反之，则将化益为损，故爻有“无咎”之戒。又爻辞所谓“大作”，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云：“《国语》曰：‘民之大事在农。’大作谓耕种，耒耨之利，善取诸此也。《震》二月卦，日中星鸟，敬授民时。震又为稼穑，益莫大于此。若能不厚劳于下民，不夺时于农畯，则大吉无咎。又《益》正月之卦，启蛰郊而祈谷，农事之始。”从周时农业社会重视农作方面作解，尤见细微，可另备一说。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帝，天帝，指天道自然之神。王用享于帝，言君王因六二在下获增益而欢欣鼓舞，以其成功告于上天神明。爻辞是说，六二，或有人赠送价值二十贝的神灵宝龟，难以推辞而大获增益，应长远坚守正义之道以致吉祥；君王也因六二获益，而以成功告于上天神明，则将吉祥如意。从爻位爻象看，六二臣位，阴居阴位得中，以中正之质，具谦恭之德，上与九五阴阳正应，因君王宠信而大获增益，故爻有“益之十朋之龟”之辞，这话在《损》六五为损下益上，在《益》六二则化为损上益下，时位变化，则损益对象各异。程颐《伊川易传》云：“六二处中正而体柔顺，有虚中之象。人处中正之道，虚其中以求益，而能顺从天下，谁不愿告而益之？”孟子曾对学生公孙丑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六二虚怀若谷，好善不已，则受人增益，不求而至。人若骄满，谁能益之？非惟无益，反而损之。于此可见，虚中受益，乃理势之自然。就是文学创作也是一理。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诗思空灵，受益无穷而浮想联翩，故其境界自高。反之，诗语太落实，则拘执一偏而失其诗趣。又苏轼《东坡易传》因《损》六五与《益》六二爻辞相似而探究其间关系，云：“《益》之六二，则《损》之六五也。六五所获之龟，则九二弗损之益也；六二所获之益，则九五惠心之益也……皆受益而不忘报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爻中二“用”字，用法分析如下：前“用”诸《易》家多作动词，如朱熹《本义》谓：“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不当益者也；然当益下之时，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盖警戒震动，乃所以益之也。”运用凶险之事来作益人之资，解释似乎牵强。实际上，此“用”当作介词，因也，由也，以也。如《礼记·礼运》：“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爻辞谓六三因面临凶险灾祸而获上增益之免难。后面“告公用圭”之“用”亦当作介词，如《一切经音义》卷七引《仓颉篇》云：“用，以也。”凶事，谓险阻盘错或灾难也。有孚，诚信也。中行，合于中道可行之事。圭，古代玉器，祭祀朝聘时用以表达诚信的礼器。爻辞是说，六三，因面临凶险灾难而获上救助增益，没有咎害；但必须内心诚信

而循行中道，如手执玉圭致诚敬于王公大人而获其信任一样。在《易》卦中，三之处位，因在下体之上而尚未升进上体，故其象多凶。《益》六三，阴居阳位，过中失正，若爻变为阳，则下互之卦为坎（☵），坎象水，性险陷，故爻戒以“凶事”，这是面临凶险之灾、处境艰难之象。但六三与上九阴阳正应，为获上救益之象；又六三与二、四互卦为坤（☷），坤象为众，其性顺，有获众助之象，故爻称“无咎”。但是，受人之益，不可如流氓无赖之强行乞索，而应出以诚信之心，获人信任而自愿救助。自损以救灾抢险的一方，与受益而克渡难关的一方，双方心竞相孚，万众一心，则何险不可越，何灾而不可渡？《左传》隐公六年云：“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输粮赈灾，合乎礼义，爻称“有孚中行”也。鲁饥之时，获齐救助；现京师人饥，鲁则救之。鲁之或损或益，虽然位置变化，但救人之心均出于至诚，则化凶为吉，各自受益无穷。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告公，指三告于四；从，则是四从于三。依，靠也。明来知德《周易集注》云：“凡迁国安民，必为其依而后迁，依其形胜也。依形胜即所以依民也。”如汉高祖定都长安，依关中形胜，三面阻守而东出潼关以争中原。依形胜迁都则国安，国安则民心安，故所“依”虽曰形胜，实依赖于民心向背。爻辞是说，六四，以中道可行之事上告于王公，公言听计从，利于依附君王迁都益民。六四近臣之位，阴处阴位得正，居上巽之始，受下震之动，其性驯顺，承靠九五而有益下之志。又《易》有约卦之称，《益》卦（䷩）九五、上九合为一阳，中间二、三、四众阴合为一阴，再加上初九一阳，则约卦成离（☲）。离象火，性为明，光明照耀而洞明事理，故其作为，当然就会合乎中道。又《益》卦之六三、六四，皆虚中自处，或受益或益人，故爻称“中行”而有迁国益民之举。如《象传》云：“告公从，以益志也。”以中行之道助上益下，收拾民心而获众拥护，国家稳固，其所谓“益志”，即得志于天下而民众受益。反之，在上若不听“中行”之言而倒行逆施，则害人害己而无所帮助。《左传》隐公六年云：“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桓王不听周公忠言，不依礼义以益郑，且无礼于郑，则是自我树敌，违正行逆，故诸侯轻之，已埋伏了东周灭亡之先兆。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爻辞是说，九五，君主惠民之心发自肺腑至诚，其至善大吉不问可知。同时受益臣民也报以赤诚之心，拥戴感谢上之恩惠。九五爻位，秉阳刚之德而居尊位，既中且正，又与下体中正六二阴阳互应，以施其益下之道，其诚恳中孚之

惠，万民拥护，何往而不利？故朱子《本义》云："上有信以惠于下，则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问而元吉可知。"如果说《损》六五因虚受天下供益以致元吉，则《益》九五以其刚正之德而益民，以损有余补不足而致元吉，时节不同，方法各异，但同致元吉。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损、益相反相成的内在关系。故宋吕祖谦发挥说："人君但诚心惠民，不须问民之感，如此然后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问民之感不感，是计功利，非诚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乐应乎？"这就从更高的精神境界，对统治者惠民之行，提出了一定的道德要求。言外之意，说明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其惠民多取居高临下的恩赐方式，非出至诚，则难孚众望，应予检讨或批判。又今宋祚胤《周易译注与辨义》，以为《益》九五爻辞，是从《尚书·高宗肜日》"天既孚命正厥德"句衍化而来。殷高宗为殷王盘庚之侄，在殷商时代声名赫赫。原来，盘庚死后，弟小辛、小乙依次继位，国势日衰。小乙死后，子武丁立，是为高宗。武丁少时曾行役于外，了解民间疾苦，因而大胆擢用平民政治家傅说为相，励精图治，惠益于民，国势日盛而殷商中兴。从历史角度立论，可备参考。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无也，不也。立心，居心。恒，常也，指安于正常。爻辞是说，上九，人们不仅不去增益他，而且有人乘机排击损害他，因其居心无常，诛求不厌，以此必遭不测之凶。从爻位爻象看，上九虽下应六三，但六三处下体而求益者，没有能力增益于人；而上九以阳刚亢盛居《益》之极，变损上益下的方针为损人利己之心，躁动强人益己而不已，何曾有惠益下民之心？无益于下，则在下者态度大变，不仅不应上九诛求，而且反取敌视态度而日加排击。故《象传》云："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上九诛求无度，于义何安？故《象》谓之一偏之辞，谁人听之而益？损人利己，必然树敌致怨，外来攻击不招而至，也在事理之中。故杨万里《诚斋易传》云："以善益己，己益而人不损；以利益己，人损而己不益。上九居《益》之极，位《益》之亢，而刚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争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岂惟莫肯益之，有击而夺之者矣。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当理，此其所以凶自外来也。中不偏，外敢来乎？鹿台、郿坞是已。"说明在上者诛敛百姓，敲剥无已，最终自取灭亡，打败自己的，表面上是外来之敌，而实际上还在于自己的偏利益己之心。鹿台，指殷纣王兵败自焚于聚宝之鹿台。郿坞，指汉末军阀董卓，一入中原京师，纵兵烧杀抢掠，贪得无厌，天下皆怨，故诸侯联兵击之，杀卓于藏宝之郿坞。其纣、卓之流，虽击自外来，而咎实自取，魏晋诗人阮籍《咏怀诗》（六十九）云："彼求飨太牢，我欲并一餐。损益生怨毒，咄咄复何言！"民众在一餐之饱而不可得的情况下，怨毒之损，岂可制遏？故统治者损人肥私，实是无益有害而自取败亡。

殷鉴不远，有史为证。其实，不仅政治军事如此，今天的经济生活亦然。如大型贸易集团公司，若想把一切产品利润集中于己，于是对生产厂家竭力杀价压低其应得利润，此为损人肥己；而对于消费者，则又尽量提高价格以获取暴利，又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样做，虽可能侥幸获一时暴利，但最终必然进货无来源，而商品又将积压销售不畅，谁也不信任，则贸易公司不是自讨苦吃而只能以破产关门了事吗？事实说明，阮籍所称“损益生怨毒”，实是至理名言。如若不明损益之道的生活辩证法，则咎由自取，夫复何言！

总之，损、益之道，分虽为二，合则为一，矛盾统一，相反相生，不可斯须相离。损此益彼，损东益西，是事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表现，也可说损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人们对于损益之道或许会形成某种偏见，以益为美而损则恶。其实不然。该损则损，当益则益，损益各得其宜，则损益皆为善事，事物发展朝气蓬勃；反之，损益皆入误区，不仅损之为害，益者也如一颗糖衣炮弹，实无益而有害。比如今天中国多独生子女，有的犹如小公主小皇帝，父母唯恐孩子缺乏营养，食之以各种保健食品及营养补药，名目繁多，结果是益之适足以害之，小孩多得肥胖症。这是不明损、益之间辩证关系所致。所以《周易折中》引熊良弼之言：“《损》《益》二卦，皆以损阳益阴为义。《损》自《泰》来者也（按：《泰》卦形䷊，其初九陟升上九，余爻各降一爻之位，则《泰》化《损》），《益》自《否》来者也（按：《否》卦形䷋，其上九下沉初位，余爻各升进一爻之位，则《否》化《益》）。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损而不益，益而不损者。故《泰》居上经十一卦，而《损》居下经十一卦，《泰》、《否》、《损》、《益》为上下经之对……其微意盖可识矣。”熊氏所论，眼界开阔，不仅看到损益之间的关系，还看到了与之相联系的泰否之间关系，进一步又指出了《周易》六十四卦的上下经之间的对应变化，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应在事物运动的发展中来揭示其精神要义。古人云，上经论天道自然，下经言社会人事。这是就其大概而言，实际上则天道与人事，密切相关。故天人之际，甚或天人感应，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的重要命题。有关损益之道，各家各派多有论述。道家《老子》云：“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以为。”这是从道家立场看问题，对古代社会中的统治者的虚伪矫饰加以批判，统治者所学之者，实是损人益己之道，此之谓“日益”而“日损”也。故道家提倡自然无为以相抗，认为对下不要过多干涉，则人们因任自然损益而获发展。后来封建社会的隐士逸民，多取道家之解。《后汉书·逸民传》云：“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二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现在一般人以死为损之极，但若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而言，古人不死，何有今人？在生生死死的历史长河中，人类自然损益，不断进步以获文明和新

生。损即所以为益，于人之生死亦然。而先秦儒家则从积极入世角度看问题。如汉刘安《淮南子·敬慎》云："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指满，则天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泰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欤……'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刘安汉初人，其思想折衷于儒、道，故引孔证《老》，以明损益之道。其所论言，颇富辩证观念，故其《淮南子·人间训》云："《益》、《损》者，其王者之事欤！"把人们对损益之道是否有正确认识，提高到"王者之事"，即治国理民的根本大事高度来加以阐述，独具只眼，启迪后昆。

夬

卦第四三



夬决除恶扬王庭

《夬》卦（䷪）第四十三，次《益》卦之后，《序卦传》解释说："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夬（guài）于古训有二义，一是满溢决溃之决，一是决断、果决之决。二义又互有联系。满盈溃决之后，只有采取果敢决断制止祸灾横流，才能重新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故晋韩康伯注《序卦传》云："益而不已则盈，故必决矣。"意思是说，增益本是好事，但应有分寸，如果增益不止而满盈，就会变好事为坏事。我们从观察卦象发现，《夬》（䷪）与《剥》（䷖）是互为诸爻阴阳相反的反卦（亦称错卦），彼此之间，情有旁通，如果不采取果敢决断，则其满盈之决，将导致复归于损剥的严重后果。方之自然，犹如江湖之水因暴雨增益不已，必致溃堤决坝之势，洪水横流而损剥人类，能无惧乎？这时就必须采取毅然决断予以决除，如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疏通洪水，导之入海，此所以《益》卦之后有《夬》卦。《夬》卦一方面有决溃之意，但更主要的是象征果敢决断、存善除恶之义。"益而不已必决"，方之人事亦然。魏之王弼，对此卦象作义理发挥云："《夬》与《剥》反者也。《剥》以柔变刚，至于刚几尽；《夬》以刚决柔，如《剥》之消刚。刚损则君子道消，柔消则小人道陨。"又如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诞生，生产力空前提高，在人们的物质财富大有增益之后，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于是掠夺财富、占有权势的欲望，在统治阶级中如瘟疫般地迅速蔓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造成了物欲横流的恶劣现象，为了赚钱，什么昧着良心的事都敢干，假货、欺诈、抢劫、杀人，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类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数量虽不多，却很有能量，破坏性极大，我们统称之为"小人"。对于小人，如果不加抑止，则将是官匪一家，造成黑社会势力的无法无

天。所以俗话说，该断不断，反受其害。对于恶贯满盈的小人，绝对不该手软，而应祛邪除恶，果断处置，如《夬》卦所示，才能获得新生。

《夬》卦之形，下乾（☰）上兑（☱），象征决断。从卦象看，下乾象征天，上兑象征泽，故如《象传》所释："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原来是水汽上升，在天上聚集凝结为大片雨云，到时遇冷必然决降成雨，犹如兑泽之性，下润天下万物而造福人类一般。《象传》又加以引申到社会人事，以恩泽润天下，譬喻在上君子之"施禄及下"。在上君子，德禄兼备，犹如天上厚厚的雨云，一旦条件成熟（如遇冷化雨），必决降下惠万民。反之，"居德则忌"。所谓"居"者，与"施"之义相反，囤积居奇而不施不决的意思。在历史上，可以用殷末周初之事加以作譬。"君子以施禄及下"，周文王之事也。如《史记·周本纪》所称"西伯阴行善"的故事，云："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其果决之断，犹如泽性润下，甘霖普降，利惠天下。反之，如殷纣王之造鹿台，刻剥万民，聚天下财，增益不已而又绝不决散利下，终为周武王所败，而自焚于鹿台之中。此所谓"居德则忌"，"忌"者忌讳、憎恶之义。殷纣王自以积财为德，又不决散惠下，此其所以为天下万民所忌恨而亡国亡天下也。而从卦形看，则又是另一视角，全卦五阳共决高高在上之一阴。据《易》例，阳爻多象征君子，阴爻多象征小人。《夬》卦之中，阴之小人高高在上，仍然一味聚敛不已，不知居高思危，不明矛盾转化之理，所以在下五阳之君子，共同果断下决心加以抨击驱逐，以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故《彖传》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阳爻为刚，阴爻为柔，五阳共决一阴，故称"刚决柔"。通过果敢决断，终于共同完成驱逐增敛不已之小人的任务，日益混乱的社会，又重新趋于团结稳定，故《彖》又称"健而说，决而和"。刚健果断的措施，导致人心大悦的大团结，从而克服困难，矛盾转化，从《夬》卦转向了《姤》卦（䷫），彼此成为上下卦六爻反转颠倒的反卦（或称综卦），于是又走向了事物发展的新征途（内容详于《姤》卦）。

《夬》卦辞云："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扬，越也，宣扬。孚，信也。号，号召。有厉，戒辞，即因其存在危厉之道而提高警惕。告，名词动词化，指颁布文告。大意是说，《夬》卦象征事物盈溢、溃决之后的果敢决断。在君主面前的朝廷之上宣告小人所犯的罪状，并以诚信之心号召人们，必须时刻警惕，防止危险和复辟。处置邪恶小人，应该发布文告，昭晓城邑诸民，使其明白这是为什么，以杜绝邪恶之途，而不利于动辄兴师征伐，武力制裁。因为百姓如果不明白为什么，今后邪恶仍然有机可乘。明白了上述道理，心中有了主张和决断，就利于继续前进。从上下卦象来说，上兑（☱）为口，有言说号召之象；又兑（☱）反变为艮（☶），据《说卦传》，艮有门阙之象，此言说号令于廷众之象也。下乾为天为君，又有王者之象；乾反变

为坤（☷），坤有众象，故其孚号，乃为大庭广众之王庭。又在十二月消息卦中，《夬》属春之三月，是阳气日盛之卦。故朱熹《本义》云："夬，决也，阳决阴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阳去一阴，决之而已。然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可见《易》理提醒人们，居安思危，虽五阳共决一阴，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以防灾祸之死灰复燃。与朱熹同时的杨万里，著《诚斋易传》，所论与朱子不谋而合，戒厉之心更为详尽，他以历史为例加以说明："夬以五阳而决去一阴，以五君子而决去一小人，此舜举十六相去四凶，周公与十夫去三监之时也，宜其甚易而无难矣，而圣人于此有惧心焉。谓勿专倚乾之健，必济以兑之说，然后小人可以决去，而天下国家可以和平而无伤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伤君子，不以去小人而伤国哉！汉之去宦官以袁绍，而汉亡亦以绍（按："袁绍"应是何进之误记）；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刚之大罪（按：《夬》之上六乘凌于五阳之上，故云），我是以声其罪而扬之于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机，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厉。"这就是说，以五阳共决一阴，兴师讨伐，武力制裁，事虽至易，但群众不明其理，则仍潜伏祸患之根苗，如森林大火，死灰复燃之例，比比皆是。所以杨氏感叹"去小人可易言哉"！为此，就应该"扬于王庭"，在大庭广众之中，诚信地给大家说明为什么要除恶的根本道理。其果敢之决，正来自于广大群众心悦诚服的自觉认识，而非君主圣贤一人之天才决断。

下面释爻辞爻象。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夬》卦下乾之体，具刚健果决之性。但具体到每一爻位爻象，则并非凡阳刚皆吉，这是《易》理辩证法所决定的。比如初九之爻，阳爻处阳位得正，照一般《易》例该是吉爻。但具体处于《夬》卦之初则不然。初九之阳壮，处于四阳之下，有足趾之象；而不待与上面四阳共断，决然讨伐上九一阴小人于四阳之先，其躁动冒进可知。犹如行军征伐，虽为正义之师以讨不仁，但孤军深入，无援而进，必然危险，无功而返已属侥幸。故爻辞云：初九，足趾强壮而急于前行征讨，其前往不仅没有胜利希望，而且反而自取其咎。如东晋穆帝永和末，北方石季龙死，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师北伐。意在恢复中原，当然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但殷浩不待条件成熟，不作充分准备，不与驻节荆州的征西将军桓温相互配合，各行其是，孤军北上，终为姚襄所败，损师折将，咎由自取。此例与《夬》初九爻辞"往不胜为咎"之理暗合。事载《晋书》卷七七《殷浩传》。故清马其昶《复位周易费氏学》引欧阳修之言以戒："圣人之用刚，常深戒于其初。"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莫，通“暮”。恤，忧虑也。爻辞是说，九二，警惕之心常存心中，时刻呼号以警戒大众，虽然夜间突然出现敌人而发生接触之战，但是因为早有准备而不必忧虑。从爻位爻象看，九二是阳处阴位不正，又若二之阳变为阴，则下乾化离（☲）。离有兵戈之象，所以爻辞比喻为暮夜来袭之敌；但是，九二处下卦之中位，又以阳刚之德，行谦逊之中道，时刻警惕戒备，又何害之有？故有“勿恤”无患之吉。所以《象传》解释说：“有戎勿恤，得中道也。”遇事出以公心而慎行中道，则有备而无患，或虽有一时侵犯，也必不能阴谋得逞。九二爻辞另有一种断句：“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其意义大同而小异，如苏轼《东坡易传》所释：“戎，上六也。惕号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静也。能静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qiú），颧也，即脸上颧骨。壮，盛也。夬夬，决而又决也。一般说来，《易》例称其尤者，一再重言而申发之，如“君子乾乾”、“王臣蹇蹇”之类是也；“君子夬夬”亦然，作者一再强调君子处夬之时，其果敢决断之坚定信念与非凡魄力，非寻常人可比拟。濡，湿也。愠，怒色也。爻辞是说，九三，刚毅盛壮以决除小人之心公开显露在颧骨颜色之上，易遭报复，必有凶险。君子下定决心，毅然决然，独自前进，遇雨而被淋湿，虽然受到怀疑而人有愠怒之色，但最终因其制裁小人而真相大白，故必无咎害。从爻位爻象看，九三居下体之上，居乾之极，性极健而处非中位，呈刚果毅决之象。故爻辞称“壮于頄”，批评其刚健过中之弊，易致凶险。又《夬》卦五阳，独九三与上六阴阳有应。而按《易》例，阴阳和合者多有以遇雨作譬者，如《睽》卦上九与六三阴阳有应，故上九爻辞有“往遇雨则吉”之句，《象传》谓其群疑消失而致吉。但《夬》九三之“遇雨”，因是独行而致疑；又上六乃公认之小人，其下之五阳，共决除之，故九三之独行上应，岂能不致疑于同类而君子有愠色形于颜面乎？但是，其他四阳之君子，一旦明白了九三巧与上六小人周旋，避其凶险，而又无改其祛邪除恶的君子之初衷时，九三之行，必然无咎无害。明来知德《周易集注》释云：“九三当夬之时，以刚居刚，又与上六为正应。圣人恐其不能决而和也，故为占者设其戒曰：决去小人，若壮见于面目，则事未成而幾先露，反噬之凶不免矣。惟其决小人之心，夬而又夬，而面目则不夬夬而与之相合，如遇雨有所湿濡，虽迹有可疑，不免为君子所愠，然从容以观其变，委曲以成其谋，终必能决小人也。占者能如是，可以免凶而无咎矣。”所论甚是。比如东晋初的开国功臣之一温峤，他曾任大将军王敦的幕僚。当王敦阴谋反叛朝廷、计划兵伐京师之时，温峤虽有讨叛之心，但当时他处于王敦势力的控制之下，如果他将自己君子除恶的夬夬之心，公开呈露颜色，必然遭受凶险而身首异处。其同僚郭璞，正因不同意

王敦乱臣贼子之叛逆，以《易》筮进谏，即遭王敦杀害。前车之鉴，记忆犹新。据《晋书》卷六七《温峤传》："峤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甚为王敦所忌，因请为左司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纵，峤谏……敦不纳。峤知其终不悟，于是谬为设敬，综其府事，干说密谋，以附其欲……（以计谋为丹杨尹而摆脱王敦控制）峤得还都，乃具奏敦之逆谋，请先为之备。"后来温峤果然因平定王敦叛乱而建立赫赫功勋。试想，当日温峤表面附和王敦，如爻辞所称之"独行遇雨若濡"，在朝君子岂无愠怒之者？然其除去小人的夬夬之心，终无改其初衷而为事实所证明，此爻辞所称"无咎"之明证也。不仅历史，现实也是如此。如今天的司法检察人员办案，对于贪污腐败案，如果案情牵涉到嫌疑案犯的亲属友朋，在逮捕法办之前，假如不与作为嫌疑犯的亲属友人周旋，而是怒形于色，必然因走漏风声而增加办案的难度。此九三爻辞所称"壮于頄，有凶"也。若巧与周旋，而又无改其除恶务尽的办案之初衷，则虽人们有一时误会而呈露愠色，终因案情大白而说明一切，如此"夬夬独行"，又何咎之有？古今无不然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次且（zījū），行而难进之貌。爻辞是说，九四，臀部失去肌肤，其行止极其狼狈艰难。但是，如能紧紧牵羊随群前行而存其务去小人之心，悔恨就会消亡。但遗憾的是，九四听了此言并不相信。从爻位爻象看，九四已从下体升到上体，处上兑之下，阳处阴位，不中不正，加以与初阴阳失应，过失颇多，故爻辞以"臀无肤"作譬，臀之位处人的上体之下，故云。九四处夬之时，阳刚欲进，但居阴柔之位，其性畏缩，欲居不安，欲进不能，进退维谷，犹豫不决，故以"其行次且"应前"臀无肤"之譬。又据《说卦传》，兑为口，又有羊象，口有言语功能，羊与"阳"谐音，故爻辞紧接着以羊和言说作譬。牵羊悔亡，指九四处位已失中正，力有不及，只能随着其他四阳前进的横向拉力，拉扯带动，才有办法前进并实现其清除小人的初衷。如果仅依自己，就会因其行动犹豫趑趄而有悔恨；反之，则悔恨消失。比如在我国开放改革的大潮中，有的地区因为地处西部贫困地区，感到难有作为而犹豫不决；这时，如能下决心投入潮流，随兄弟省分和地区开放改革的横向拉力一道前进，就能在潮流中逐渐转变观念，跟上步伐，齐头并进，如此之行，虽然有点勉强和被动，但终是无悔，故爻辞以"牵羊悔亡"作譬。最后，所谓"闻言不信"，则是作者对占者的戒辞，因为人们泥于传统陋习，加以心理因素作怪，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常是不相信人们的讨论和研究，从而坐失良机。良机稍纵即逝，故其失败立马可待。反面之例，验以史事，东晋名将刘牢之事当之。在淝水之战中，刘牢之为谢玄前锋，战功赫赫。后争名夺利，拥兵自重，三叛其主：先叛王恭；二叛司马元显，而降于桓玄；玄夺其兵权，复叛。其参军刘袭说得明白："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其佐吏散亡

殆尽，终于自杀。事载《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刘牢之为一己私利所惑，处事不行公心中道，故无决断，其行趑趄，从顺，顺者不纳；从逆，逆者见疑。既不得与君子为伍，又不得厕小人之列，进退失据，身死名裂，为天下笑，此之所谓“闻言不信”，失夬之先机也。

对于九四爻位爻象，古人据“《易》无达占”之说，另有他解。宋末刘辰翁《赠徐心易易数序》云：“丰城雷宜叔初赴殿之日，小于乡人胡易鉴，遇‘臀无肤，其行次且’，意殊恶。易鉴贺曰：‘魁兆也。臀从肉，无肤无肉，独殿巍然其上，非殿头何？惜其次且，在二三间。’既唱第，果然。”（见《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已变《易》解为拆字之戏，虽可另备一说，但并不符合《易》卦作者之本义。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古今人多释为草名，即今之马齿苋，“曝之难干，感阴气之多者也，而脆易折”（程颐《伊川易传》）。但《周易折中》引《朱子语类》云：“苋、陆是两物：苋者，马齿苋；陆者，草陆，一名商陆。皆感阴气多之物。”可备一说。《折中》又引郑汝谐曰：“苋陆，《本草》云一名商陆，其根至蔓，虽尽取之而旁根复生，小人之类难绝如是。”爻辞是说，九五，斩除阴物马齿苋，不能因其地上草茎脆弱易折，就马虎从事，因为如果不深挖其根蔓，则旁根复生，所以应当刚毅果断，决之又决，全力以赴，斩草除根。以此取象喻除小人，必须坚持中道中行，才能无有咎害。因为小人昵于人主，人主昵于近习，轻忽视之，以为易制，不忍严格治之，卒以败事者多矣。故孔子早有“小人为难养”之叹（《论语·阳货》）。又如唐肃宗宠信宦官头目李辅国，辅国原是一个家奴，后来却是号称尚父，权倾人主，恶贯满盈。虽然最终为唐代宗遣盗杀之，但宦官势力并未根除，以致形成中晚唐宦官擅政误国之痼疾。九五阳居阳位，又处夬卦之中，既中且正，是夬除阴邪的卦主。但如唐代宗，以九五之尊而谋李辅国，不公开扬之王庭，反而近比上六，行非中道，后患无穷。以故《易》卦作者戒之“夬夬”以行“中正”，方免其咎害。因此，《象传》释“中行无咎”为“中未光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

号，痛哭呼号。爻辞是说，上六，无须痛哭呼号，最终难逃厄运。从爻位爻象看，上兑有口象，故以呼号哭泣比喻上六。又上六阴处全卦之上，以阴邪凌越下面五阳之刚，象征小人之得意一时，虽然其下与九三阴阳有应，但九三“君子夬夬”而力拒之；又近比九五之尊，但九五又以其夬夬中行斥之，所以小人最终陷于绝对孤立无援的困境；又上六处夬之极，是矛盾解决的临界极限，故朱熹《本义》云：“阴柔小人，居穷极之时，党类已尽，无所号呼，终必有凶也。”

阴邪已决除，则阳健刚正之道获得了新生的希望。

读《夬》卦后，浮想联翩。首先，《益》后次《夬》，如《序卦传》所称，是盈益不已必决。在物质财富大大丰富之后，由于分配不均，如不同时建设精神文明，提倡为社会人类作奉献，痛下反贪除恶的决心，则将贪贿公行，物欲横流，增而不已，将冲垮人类文明的堤防。《夬》（䷪）与《剥》（䷖）反，卦象的运动转化已提示了这一毁灭文明的危机先兆。因此，面对贪邪罪恶，刚毅果决，不可缺少。其次，卦爻辞中，“夬夬”之称，并非浪言。贪邪犹如恶草，生于地表的茎叶容易铲除，但是地里根蔓则顽强得很，如苋陆（马齿苋）之旁根复生。因此，反腐倡廉，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直到现在，任何社会要文明进步，都必须痛下决心，长期作战，而不是一个口号、一个运动所能解决的。第三，除恶反贪，必须“扬于王庭”，增加社会透明度，让万民知道“为什么”。如唐代宗遣盗刺杀宦官头目李辅国，除邪虽然不错，但未曾“扬于王庭”，公开显暴其罪恶，故斩草未除根，后来继者不绝，构成了中晚唐宦官之祸，从而误国殃民。历史教训值得注意。第四，下定除恶的果决之心，必须出以公心中行，才能“利有攸往”而增其生命活力。

历史上，运用《夬》卦之理大讲政治者有之。清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深结朋党，引余杜国、汤斌等为同类，擅乱国政，为理学家李光地所疾。于是光地荐德格勒为翰林侍讲学士，借给皇帝讲学之机，批判明珠。据《清史稿》二八二《德格勒传》：“圣祖时，召见讲论经史。尝扈从巡行，大学士明珠柄政务，结纳士大夫，将馈金为治装。德格勒以装具固辞不受。会久旱，上命德格勒筮，遇《夬》，问其占，曰：‘泽在天上，将降矣！而卦义五阳决一阴，小人居鼎铉，故天屯膏，决去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德格勒遂以明珠对。明珠闻，大恶之。”从这一故事，可悟《易》卦政治哲学之奥妙及“《易》无达占”之理的灵活。

姤

卦第四四



阴阳遇合自有道

《姤》卦（䷫）第四十四，紧接《夬》卦（䷪）之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阴阳颠倒的反对卦，也称综卦。卦象的转变已预示了二卦之间的密切联系，《姤》初六一阴即从《夬》上六一阴运动转化而来。所以《序卦传》说："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晋韩康伯解释说："以正决邪，必有喜遇也。"意思是说，除去邪恶腐败，虽是来自上面的果敢决断；但是其决断能够得以迅速有效地全面实现，则是由于下面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这就说明，刚毅决断并不仅是在上者随心所欲的一己之主张，更重要的还应该有来自下面广大民众的自觉呼声。这样，毅然决然地除去邪恶小人之时，也就是正义力量大会师喜相逢的喜庆之日。此所以《夬》后有《姤》。姤，指的是阴阳谐和的正义中正之道的相遇相庆，而与不中不正的阴邪之道势不两立。无论是天地自然之道，或社会男女、君臣际遇，其遇合之时，都必须首先分清是正，还是邪。所以，《姤》之遇合有正与反两方面，并非凡阴阳遇合皆称吉祥，读者自能体悟细辨。同时，《姤》与《复》（䷗）又是六爻阴阳相反对应的错卦，故二卦之间，情有旁通。《姤》卦阴阳中正遇合之喜庆，也就意味着益阳祛阴、扶正除邪；这就有助于《复》卦初九一阳的渐生渐长，标志事物一线生机的发展。

下面谈卦辞卦象。"姤：女壮，勿用取女。"姤（ɡòu），有二义：一借为"媾"，指婚媾；一写作"遘"，指遇合。婚媾是一般遇合之事的具体化。《姤》卦辞是说：《姤》卦象征遇合。女人过分壮盛，气势盖过男人，则不宜娶为妻子。《姤》卦是以具体的婚媾之事，来比喻人生之遇合。《姤》卦上乾（☰）下巽（☴），上乾象征天，下巽象征风，故《象传》释云："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风行天下，经触万物，挠激之鸣，成其遇合之事。又全

卦五阳爻高高在上，而一阴爻始生于下，阴与阳合，故《彖传》称“姤，遇也，柔遇刚也”。柔指初六，刚指上面五阳。晋王弼注曰：“施之于人，即女遇男也。一女而遇五男，为壮至甚，故不可取（娶）也。”王弼认为，《易》卦作者从以下二方面看问题：一是以男女之婚媾来说明阴阳刚柔遇合之必然。另一方面，又因古代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事实，从统治阶级大男子主义出发，断言“女壮”则不宜为妻，因为阴盛阳衰，则将象征事物之衰落。从第一层意思来看，男女阴阳遇合是正常与必然，但双方必须合乎中正之道，此《彖传》所以由男女而推诸天地，进而化成万物，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品物，即万物。咸，皆也。章，通“彰”，显露也。这是从正面来肯定天地万物、阴阳男女之遇合的伟大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如前之《咸》卦所示；所以爻辞就撇开这一层人皆明白之义，专就其反面来立论，而以一个“壮女”争取上配五男的不正常之事，作为特殊事例来警醒人们。这是古代统治者男女偏见所致，但在当时，男女地位相差悬殊，男为天而女在地，男为主子，女为奴隶，在贵族男子眼里，女人多是泄欲及生育的工具；因而“女壮”而阴盛阳衰，就不是好现象。从《姤》卦象看，五阳压一阴，该是阳盛而阴衰才对。但古人有其立场，思考深入一层，如朱熹认为，“一阴而遇五阳，则女德不贞而壮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阳”（《周易本义》）。又程颐《伊川易传》云：“一阴始生，自是而长，渐以盛大，是女之将长壮也。阴长则阳消，女壮则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顺从以成家道，《姤》乃方进之阴渐壮而敌阳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渐壮则失男女之正，家道败矣。《姤》虽一阴甚微，然有渐壮之道，所以戒之也。”杨万里《诚斋易传》云：“然则相遇之道遂可废乎？曰：柔遇刚，不可长也。若天地相遇，刚且中正，何可废也！天地不相遇，则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道不行。五阳乾也，一阴坤也……不以一柔五刚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刚相遇之可戒，而废天地君臣之

■周幽王宠褒姒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

相遇，此《易》之贵于变也。”所论甚为辩证。可见《易》卦作者是从阴阳消长的《易》理角度来思考的，并非《姤》之初六一阴已成盖阳之壮，而是针对一种必然趋势，而加以警戒之辞。在古人看来，如殷纣王之宠妲己，周幽王之宠褒姒，各宠一阴邪之女人，渐至丧失理智，终因此而致亡国之祸。此乃古代“女人祸水”之论，原不足训，但论其思想端倪，已萌兆于《姤》卦辞“女壮，勿用取女”之戒辞中。但是，如果排除其男尊女卑的传统偏见，把“女壮”现象延申，就会发现在自然与社会中仍然存在许多阴邪之人与物，那么同样可以引人深思，因为君子与小人是矛盾对待，如果没有小人，也就无所谓君子，没有阴邪，何来阳刚中正之美？阴邪之人与事，必然长期存在，关键在于正确对待。坏人坏事虽然可能处于暂时的劣势，但其逐渐扩张发展的潜势力则不可忽视，应引起充分的注意与警惕。《象传》就此解释说：“后以施命诰四方。”后指古代君主。犹如风行天下，无不周布；君主也因其施令，从正、反两方面昭告万民，以保证其诸种遇合能在自觉执行的条件下，沿着中正轨道顺利前进。

以下谈爻象爻辞。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金柅（nǐ），金属做的刹车器。羸，瘦弱。豕（shǐ），猪。羸豕，旧注以为指牝猪，大概因为与牡猪相比，母猪身体及力量较为瘦弱的缘故。孚，通浮，指轻浮躁动。蹢躅（dí zhú），同踟躅，不安静貌。爻辞是说，初六，牢固地系结在金属刹车器上而不妄进，坚守正道，可获吉祥。若是轻举妄动，急于凑合，犹如母猪轻浮不安地乱求配偶一样，就会出现凶险。爻辞爻象是从非正求合的反面来立论的。初六阴居阳位失正非中，又处下巽之初，《说卦传》称巽有躁动之象，故初六之风始动，即急求与阳匹配，因而就近上承九二，而非上求九四阴阳正应，故爻辞有牝猪轻浮之讥，雌求雄而不以其道，必见凶险。如唐代安禄山当初求遇于唐玄宗，玄宗并无警惕，没有“系于金柅”，而是君臣调笑，非正无道。所以后来安史之乱，祸国殃民，并非偶然，其乱兆已萌于君臣之苟合。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通庖，指厨房。爻辞是说，九二，厨房里有一尾鱼，没有咎害；但不利于宾邻。从爻位爻象看，九二处下巽之中，虽然阳居阴位不正，不可能获大吉大利。但是，处于下体之中，比于初六，密切相遇。爻辞因鱼为阴物，所以用来比喻初六。初六因急于上行以求阴阳匹配，来不及等待正应之九四出现，一旦九二露面，立刻主动奉上求偶。九二之“包有鱼”以此。又以其行之“中”，行为并不过分，仍然合于阴阳遇合之礼，所以称“无咎”。但鱼只一尾，上阳有五，九二已经渔获其鱼，其他四阳虽然积极渔钓，也只能望鱼兴叹，故爻辞称“不利宾”。在历史上，秦末，反秦烽火急遽点燃，义军诸侯相约，先入关中者王。于是，刘邦率军先攻入关，并且根据属下建议，与关中民约法三章，民心大悦，其行合于中道，所以民众拥护。相反的是，项羽毁约以争天下，但最终楚汉

争战，楚败汉兴，项羽垓下自刎。秦之关中可喻为鱼，刘邦已先入关，以合中道而获鱼，项羽虽强，也无可奈何，此爻辞所称“不利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爻辞是说，臀部失去肌肤，行止艰难不前，有危厉，但若处理得当，最终可免重大咎害。九三处下巽之上，《说卦传》谓巽象征股，与人之下体相似，故以“臀”为喻。其爻阳居阳位，虽正而过刚不中，又与上无应，下又为二所阻隔而与初无应，其居其进，进退失据，而无所遇合；加以处下巽之上，在上下体之间，是一矛盾转化的界限。《易》理重变，九三若阳化为阴，则下巽化坎，坎象征水而性险陷。故爻辞以“臀无肤，其行次且”喻其行止，其处境险厉可知。但是，九三仍在巽体之中，巽有不终迷之象；又其位刚正，迷途知返，也在事理之中。故九三虽处姤之时，见初六一阴，曾萌其阴阳求合之心；但初已属二，则知错必改，如程颐《伊川易传》所云：“（九三）若知其不正，而怀危惧，不敢妄动，则可以无大咎也。非义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则不至于大也。”按：《姤》九三与《夬》九四，同有爻辞“臀无肤，其行次且”之言。但其意思有别，而祸福之象有异。《夬》之九四，其爻位处上巽之下，其位以阳居阴，失正过中，处夬（决）之时，柔弱不决，因本身缺陷严重，而失其有利时机，力有不足，却争决上位小人，又“闻言不信”，不与众阳同心同德而失助无援；加以其位与三、五互卦为乾，乾健性动而傲；又九四变阳为阴，则上巽化坎（☵），坎则情险。爻位爻象诸种情状，均极不利，故爻辞有“闻言不信”之戒，而乏“无咎”之祝福。相比之下，《姤》之九三则以阳位居正，虽一时求遇而失误，但却因其刚正之性，能够迷途知返，止而无争，故虽其行有次且之厉，却又能“无大咎”之弊。故二爻虽然辞同，而又因其所处具体卦爻之位之象而意义有异，以此可悟“《易》无达占”之妙。

九四，包无鱼，起凶。

爻辞是说，厨房不见鱼的踪影，因此而有凶险兴起。从爻位爻象看，九四已升至上乾之下，与三、五互卦也为乾，乾之又乾，乾健性动，刚而又刚，急于求初阴阳之应，而又不顾及具体困难，比如下为二、三两阳所阻隔，四离初相距遥远，力所不及；加以九四阳处阴位失正不中，行为不端。爻辞称“包无鱼”，仅是一个譬喻，争鱼不以正道得之，怎能悦人服众而上下遇合？破坏了健康力量（指《姤》卦五阳爻）内部的安定团结，轻者起争端，重者战争兴，后果极其严重，故爻辞有“起凶”之戒。如杨万里《诚斋易专》所称：“一卦五阳而一阴，五阳必争赴于一阴；一水众渔而一鱼，众渔必争于一鱼。初六之一鱼，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争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则初六之鱼，已为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后而必争，争则必伤，伤则欲进而不敢进，自危而不力争，能不进而自危，虽不得鱼，亦无后灾，故无大咎……九四非无刚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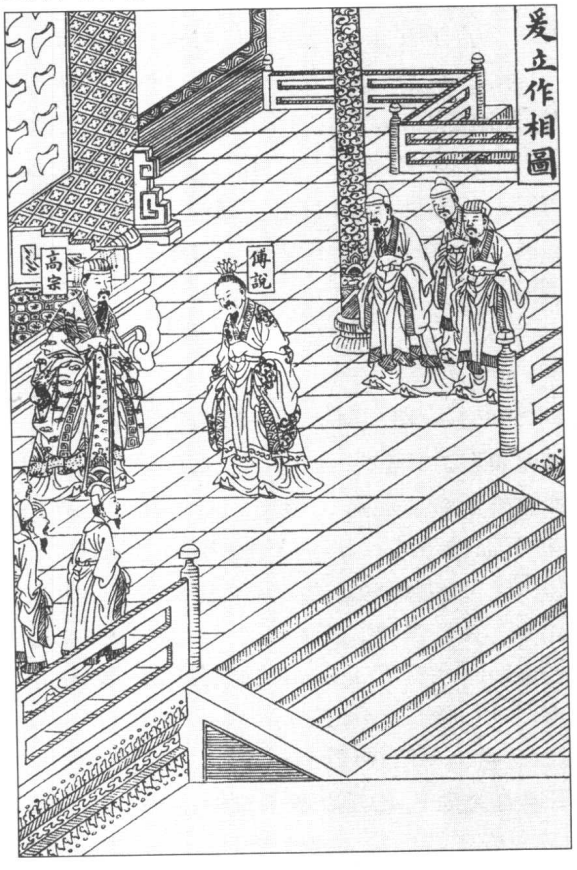
德以包纳初六，然包而无鱼者，四与初远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阳处阴，又无中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与初宜相应者也，宜应而不应，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临民而又远民，宜吾民之归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举事，安得不凶？”论九二、九三、九四之争初六一鱼，言简意赅，颇为生动。举个例说，三国时，如果谁想统一中国，就必须进一步争夺江东土地及其士民。江东土地士民犹如初六一鱼。而孙权、刘备、曹操，则如九二、九三、九四，三者皆为共争一鱼之渔夫。孙氏出身江东，世代经营，颇孚人望，加以天时地利，最近于初六之鱼，故捷足先登，据有江东，犹如九二之“包有鱼”，虽不利于九三（刘备）、九四（曹操）之宾邻，又何咎之有？在《隆中对》中，诸葛亮给刘备明白指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见《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当时，刘备依荆州刘表，屯于新野，正遭受曹操大军的严重压迫，身无尺寸之地，他怎能不想占有江东以兴霸业呢？但诸葛亮所言，句句在理，他除了接受，还能使出什么高招以钓江东之“大鱼”呢？此如九三之“臀无肤，其行次且”，刘备虽一时进退维艰，但终“无大咎”。不主动前去抢鱼，去其贪欲，无与人争，何咎之有？而曹操则不然，其性刚愎自用，其行健而又健，未能如诸葛亮那样作出全面科学的形势分析，就盲目率数十万大军直下江东，想要一口吞掉一条大鱼，以竟其统一中国之大业。他没想到，江东之鱼，并不好吃，不管是天时、地利或人和，曹军都是条件不成熟，但是曹操却缺乏自知之明，因而在孙（九二）、刘（九三）联军的抵抗下，吴军火烧赤壁，曹军大败而还。江东之“鱼”，仍然属于孙权。于此可见，曹操不仅失其“鱼”，而且同时又自致“起凶”之灾。所以《象传》解释九四爻辞云：“无鱼之凶，远民也。”所作之事，过中失正，远离下民，不合天意民心，其命运怎不凶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程颐《伊川易传》云：“高木而叶大，处高体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包，此与九二“包有鱼”、九四“包无鱼”之“包”为厨房之义不同，作动词用，是包裹、遮蔽的意思。含，含蓄内蕴。章，通彰，彰美。陨，降。爻辞是说，九五，杞树以其高大枝叶遮蔽庇护下面的甜瓜；其内蕴中正阳刚之美质，不彰自显，其美好理想之君臣遇合有如天降，最终必然实现。从爻位爻象看，九五以阳刚之德而居中正尊位，是全卦之主，其位其势，至高无上，但他却居高思危，在追求相互遇合的过程中，态度谦逊而礼贤下士，此爻辞有所谓“以杞包瓜”之喻。又《易》卦重变，九五变阴，则上乾化离（☲），离有光明之象。故爻辞用以喻其内在美质“含章”，犹如光明，不用宣传而自彰显。又下面九二比于初六，居下卦刚中之位，而含阴阳遇合之质，九五以谦下刚中之德，与二遇合，犹如其内在之志，中正之美，臣民自发支持拥护，故贤者不求自来相合，圣

君贤相之遇，所须等待的只是时间而已。从爻象看，一阴在初，虽不可求，但如《周易折中》引胡炳文云："九五阳刚中正，能含晦章美，静以待之，是虽阴阳消长，时运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也就是说，《姤》卦九五之"含章"，不是无所事事的全无作为，而是思维深邃，计划周密而不动声色；而狂呼叫嚣，老子天下第一，谁人服帖？故九五之"含章"，实是如俞琰所称，是一种"自有以消患于方萌"（见《折中》称引）的哲学思考。又九五以至诚而谦逊护下，礼贤下士，以其中正之道求贤，天下贤者进身有望，大可一展宏图，故自愿乐于为其所用，故程颐称，如"（殷）高宗感于梦寐，（周）文王遇于渔钓，皆由是道也"《（伊川易传》）。殷高宗，即帝武丁，其所梦贤人即傅说。《史记·殷本纪》云："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按：地名，险一作岩）。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而周文王贤遇太公望吕尚于渭滨的故事，见于《史记·齐太史世家》，妇孺皆知，故不称引。殷高宗之遇傅说于奴隶队伍之中，周文王遇吕尚于渔钓之时，二贤竭诚尽智、自觉自愿地相佐兴国，此爻辞所谓"有陨自天"也。故《象传》释爻辞云："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舍，违背。命，天命，这里指天的自然规律。意思是说，九五内在中正之美质，是其成功之关键，内因是理想和事业顺利的保证。而在认识和行为方法上，九五又能遵循自然之"天"的规律办事，此所谓"志不舍命"。

■武丁得傅说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爻辞是说，上九，"姤其角"，虽有吝惜，但却无大咎害。关于"姤其角"，因对"角"的解释不同，故常因人而异。如黄、张《译注》云："角，角落。此言上

九居《姤》之终，穷高极上，犹如遇见荒远空荡的‘角落’；虽然所遇无人而生‘吝’，但恬然不争，未遭阴邪之伤，故亦‘无咎’。”作者称引王弼注为证。但是，旧注多释为角触。因为从爻象看，上卦乾，乾象为龙，而龙有角，故以角喻。又上九阳变阴，则上乾化为兑（☱），兑有羊象，而羊也有角触藩篱之事。故取以为象，爻辞乃顺随自然。如《诚斋易传》：“遇其角，遇其触也。”又如程颐《伊川易传》云：“至刚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刚居上，故以角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从，和顺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刚极，人谁与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己则如是，人亡远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归咎。”其解释“无咎”，指他人而非上九自己。而《周易折中》于“无咎”另有其解，云：“此爻亦与《夬》（䷪）初反对，皆与阴绝远者也，不与阴遇，不能制阴，故可吝；然非其事任也，故无咎。如避世之士，不能救时，而亦身不与乱者也。”各种解释，各有所见，似异而又相通。《晋》上九之“晋其角”，言角在首之上，欲进而前无其地。此角之进，责任在己之主动。而《姤》上九“姤其角”，角触在彼，荒远空荡，难有所遇，非己主动所致之罪，乃矛盾即将转化之形势使然，故爻辞称有“吝”而却“无咎”。

《姤》卦象征遇合。遇合之道，非常重要，又极其复杂。阴阳相激，有分必有合，而分、合必以其时，其中奥妙，非一言可以说清。以孔子之圣贤，一生栖遑奔走于列国之间，而天下莫能容，其道无所遇，虽有吝惜，又何咎之有？又孟子之老于行，荀子之废于兰陵，莫不同一之理。但是，孔孟之道，虽不行于春秋战国之时，却大行于后来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其所遇合，是幸，还是不幸？因为孔、孟二位老先生，已从一介书生，转眼化为“至圣先师”及“亚圣”，孔子甚至被追封为千秋万代的文宣王。这该是有所遇合了吧？不过，近代“五四”风云一起，包括鲁迅等先进在内，都把孔孟之道列为天敌，视为洪水猛兽，恨不得打倒在地再踹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曾几何时，新儒家又兴起，虽其所论，并非尽合先秦原始儒家之道，但孔孟又被重新抬出而受到尊敬，总是事实。时至今日，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进行重新评价呢？这一重大课题，非本书之任务，故姑置之。但是，明白孔孟之遇合事实，却能引起深刻的人生反思。遇合之道，如《彖传》所称：“姤之时义大矣哉！”怎能不加研究？又从五阳共同求合于初六一阴来看，阴阳遇合，君臣际会，友朋挚交，都要掌握一定的火候和时机，而遇合之时机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必须及时把握。而且，凡称遇合，必有正、反二义。以交友而论，君子以义合，相遇以中正之道，故其遇合，终生不渝，如历史上柳宗元之托孤于韩愈；而小人以利合：“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姤》卦辞“勿用取女”从反面言，而九五爻辞“含章”中正之志则从正面论。正、反之遇，可不慎哉！

萃

卦第四五



修德服人说会聚

《萃》卦（䷬）第四十五，次《姤》之后。《序卦传》云："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注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言物相遇而后聚。"又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能招民聚物，使民归而聚己，故名为'萃'也。"诸解大意是说，在除去邪恶乌合而正义力量相遇之日，小人道消，则君子道长。而君子因其相遇而会聚一堂，团结成一股绳，从而形成了一股促进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伟大力量。故当萃聚之时，其前进之理势必然亨通。社会人生是如此，天地自然也莫不然。一旦将破坏阴阳和谐的邪恶之气清除，则天地和合交泰，风调雨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形成了健康的良性循环，然后群英璀璨，百花齐放，万物欣欣向荣。今天文化界所常用"萃英"一词，即从《萃》卦之义化出。

下面分析卦辞卦象。"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聚也。假，读如格，至也；古时格、至互训。卦辞第一个"亨"字，据《经典释文》，汉末马融、郑玄、陆绩诸本均无此字，而三国时王肃本有，王弼据之。但是，现代出土的汉代帛书《周易》亦无此"亨"字。故可能此"亨"为衍字。卦辞是说，《萃》卦象征荟萃聚集，亨通，君王发扬传统精神，感格祖先神灵而保有宗庙祭祀，利于大人出现，前进道路亨通无阻而利于保持正确方向；这时该用大牺牲来祭祀是吉利的，以利于继续有所前进。卦辞为什么以"王假有庙"来说明人文荟萃、兴旺发达呢？因为古代是一个以家族血统为纽带的社会，如《大学》所称，古人欲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最先行之的基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按：指地方诸侯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话说得很明白。所以，宗庙社稷是一个国家存亡兴衰的标志。古代的宗庙不仅是举行祭祀仪式大典的地方，而且常是宗族议事议政的地方，也

可说是团聚宗族的场所。不久前，我曾到安徽黄山脚下的呈坎村，参观了当地的罗氏宗祠，其宝纶阁大殿（罗东舒祠），仿孔庙大成殿，其建筑之美轮美奂，其规模之宏伟壮观，其雕刻之精美绝伦，堪称江南第一。祠堂中，族规条文明榜高悬，可见其重要性。民间祖祠宗庙是会聚团结族人的纽带，推之于国家朝廷，则君王之宗庙社稷自然更是会聚宗亲诸侯、团结全民百姓的重要地方。

从卦象卦德来看，《萃》卦（䷬）是由下坤（☷）上兑（☱）组合而成。上兑有羊象，下坤有牛象，上兑九四阳变阴则化为坎（☵），坎有豕（猪）象，故大有作为之时，丰盛祭祀，而卦辞称"用大牲吉"。以大牲畜来祭祖先社稷，表示其庆典之隆重及礼敬之虔诚，故其吉利自不待言。又上兑象征泽，下坤象征地，《象传》释云："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修治。意思是说，地上有大泽湖泊，众水会聚归之，湖泽有农田灌溉之利，因而万物生焉，农作兴盛。但是，君子观《萃》之象，应更深一层思考聚久必乱，故提前修治兵器，预防不测，以便保持长期会聚的安定和发展。这是从自然现象进一步体悟到的社会道理，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而《象传》则从卦德卦性来加分析，云："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萃》卦下坤（☷）性顺，而上兑（☱）性悦，故卦辞称"顺以悦"，人们会聚一堂，是欢欣鼓舞，精神愉快的。"刚中而应"则主要指九五之爻，具阳刚之健，居中正尊位，下与六二阴阳有应，因而形成了众星拱月的自然中心，人们自觉自愿地团结在其周围，奉献其至诚赤子之心，故能拧成一股绳，具有伟大的力量。

又《萃》（䷬）与《升》（䷭）互为综卦，即上下卦形颠倒反转的对卦，卦形之变，已可看出二卦之间的密切关系。荟萃聚集，积累到一定程度，则由量变到质变，无论是事或人都可能跃升到一个新高度。比如经商办企业，资金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如果要继续保持繁荣昌盛，就必须运用积聚的财力，扩大再生产，以跃升新高峰。从反面来看，明清时的徽州商派很有名，富甲天下，号称"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于此可见徽商积聚的财力。比如清代乾嘉时的徽商鲍至道，歙县棠樾村人，他经商致富，显赫一时，赛过王侯。但他在积聚巨大财富之后，不是像和他同时的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把相当比例的积累财富，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官商结合，造宗祠，建牌坊，置祀田，为烈女节妇请旌，花重金去维护封建礼教。因此，后来徽商衰落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是，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生产与流通不能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又《萃》与《大畜》（䷙）情有旁通，互为阴阳六爻全然相反的错卦，卦象也显示二卦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萃》之会聚，到《大畜》之象征大有畜聚，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爻辞是说，初六，心中诚信不能自持始终，其间因干扰而胡乱妄相聚会；这时，如果能呼号求助，就能上有正应，虽为小人所笑，但勿忧虑，大胆前往，必无咎害。这一解释，主要根据程颐及朱子之说。初六之爻，阴居阳位失正，虽上与九四阴阳有应，本该吉利，但上面为六二、六三两阴所阻隔，因而上比二阴，心有忧惧，动摇不定。故爻辞称其“有孚不终”，没有坚守自己的贞正信念。又初六处下坤之初，坤有众象，众者三阴相聚，失阴阳之和，其妄可知，故初六又有“乃乱乃萃”的妄聚之象。这是从事物的反面言之，并非意味着甫当萃聚之初，立即陷入绝境。而是预示会聚之途有其艰辛曲折的过程。因而从正面言之，如程颐《伊川易传》所云：“初若守正不从（按：指与二、三两阴之妄聚），号呼以求正应，则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语一团也，谓众以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从阳刚之正应，则无过咎。不然，则入小人之群也。”所称“一握为笑”，指以二、三两阴为代表的群小之人之嗤笑。但《周易折中》引钱志立云：“《萃》初与四应，曰‘有孚不终’者，有二阳焉，不终于四也。及此时而号以求萃，可以破涕为笑，《同人》‘先号咷而后笑’者是也。”所称“笑”为初六因求上面正应而发出的破涕为笑。虽然具体解释“笑”之含义及其主语不同，但二说于理皆通，而不可拘执一方。因求正应而为群小嗤笑，这是“笑”的反面价值；但是不顾俗众嗤笑而坚持求得正义的呼应，然后获得了胜利欢乐之笑，这是“笑”的正面意义，是同一过程的正反两个方面，由此及彼，并非自相矛盾。这就是“《易》无达占”的辩证法。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禴（yuè），同“礿”，古代宗庙四时祭之一，《诗·小雅·天保》毛传以为是夏祭，但孔颖达疏以为是殷春祭名。总之，其祭较薄，则是共同认识。又《汉书·郊祀志下》引作“瀹祭”，颜师古注云：“瀹煮新菜而祭。”“瀹”作动词用，但也指祭之薄者。爻辞是说。六二，受友人牵引前进，上应九五，则必然吉利而无所咎害，关键在于心存诚信，则其祭虽薄，也会获得鬼神的保佑。六二阴居下坤中正之位，上应九五刚健中正之德，本应一切吉祥如意。但其处下坤众阴群小之中，为俗众所忌，上应阻力不小，若心神不定，稍一偏向，则不成其正应矣。所以应该努力呼吁九五在上面，牵引带动，方可保其吉祥而无咎害。“引”，即“君子引而不发”之“引”。六二如若爻变为阳，则下坤化坎（☵），而全卦由《萃》变为《困》（䷮），《困》象征困穷。困穷之时，待人牵引救助，也是自然之势。又据《说卦传》，坎有弓轮之象。六二如欲上应九五，虽上下为阴阳和谐的中正之应，但如引弓射物必专其心，稍一走神，则不中鹄的。这是常识。故爻辞之“引”，除牵引带动之义外，还有要求专心诚信另一意义。故爻辞又称“孚乃利用禴”，强调求神赐福必须出之于至诚之心，说明诚信乃是萃聚之根本。不仅朝廷上下君臣遇合会聚是如此，凡天下万物之会聚

也必在其诚。当然，自然之物有的没有生命，缺乏意识，何诚之有？实际上，其“诚”指其内在自然本质而已。如日月星辰之相互吸引会聚，以及蜜蜂和蚂蚁之群聚，皆顺其天性自然，如此而已。此其真，也即诚，故世人常以“真诚”连称。如唐初魏徵之谏太宗，太宗极其难堪，有时恨得咬牙切齿，但他心知魏徵之真诚，终于开怀纳谏，成其贞观之治。他曾公开宣称：“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焉！”太宗之心之力，此所谓“引吉”也。唐太宗与魏徵，各出其真诚之心，以实行上下中正之应，阴阳和谐，当然是“吉”而无咎了，史称“贞观之治”，并非偶然！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有关此爻辞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程、朱以为三处位非正不中，求萃于人而无与应者，只能求于上六，如朱熹所云：“唯往从于上，可以无咎。”但一般人以为，三阴居阳位失正过中，与上六同阴相斥而无应，又皆处上、下卦转化之极位，其“无攸往”、其“小吝”是必然的，所以认为程、朱“往从上六”可以“无咎”之说，于理有碍。我们则据杨万里《诚斋易传》及《周易折中》引俞琰之说加以翻译。爻辞大意是说：六三，咨嗟感叹萃聚之难，无所得利。虽然前进并无大的咎害，但却有小的遗憾。俞琰曰：“萃之时，利见大人。三与五非应非比，而不得其萃，未免有嗟叹之声，则无攸利矣。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三与四比，则其往也，舍四可乎？三之从四，四亦巽而受之，故无咎。第无正应，而近比于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也。”原来，六三上与九四、九五，互卦为巽（☴），巽如风而易入。所以，六三虽处困境难聚之时，但一心前往，上比九四、九五，以“利见大人”。虽困难重重，但在巽体之中，如风之入，为四、五所接受。因为四、五同在巽体之中。又黄、张《译注》引马其昶《重定费氏学》云：“六爻唯三、上无应，又俱值穷位，一嗟一咨，求萃不得也，故‘无攸利’。然天命不可不顺，四、五为萃之主，合诸侯而发禁命事；三若比四以萃五，虽位不当‘小吝’，然当萃时，不能自外于会同之盟，故三与初皆曰‘往无咎’。”所言揭示诸爻关系及其利害变化，很有启发。

九四，大吉，无咎。

爻辞意思清楚。但是，“大吉”与“无咎”，二者之间有何联系？我认为，是因九四阳刚居阴位过中失正之故。四、五二阳爻，原是《萃》卦之主，五为正主之“大人”，四则副之，类似宰相大臣。九四下获三阴之萃聚，当然是“大吉”之事；但如若处置不当，则有功高震主之逼，如魏晋之际，司马氏之于魏，史上留下骂名。后来很快出现五胡乱华，八王之乱，司马氏之西晋很快灭亡，而皇族近亲大量被诛戮。故爻辞以戒而称“无咎”，必处之以正，出之以诚，方可



■曹操像

无咎而保其“大吉”。如曹操之于汉室，东征西讨，功勋卓著，又收天下贤才之心，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谓善于萃聚臣民而致“大吉”之利。但当孙权劝其称帝去汉时，曹操认为他不安好心，是要把自己放到火上烤，因此在条件不成熟时，仍以汉相执掌朝纲。曹操如若处置不当，则咎必随之。故“无咎”之称，实是一种具有深远预见性的戒辞。杨万里《诚斋易传》云：“圣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顺谦退如未居其位之时，有不敢当其位之意，则大吉而无咎矣，四幸而居阴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国，则害于家也。”故《象传》释爻辞云：“大吉无咎，位不当也。”指出九四获吉之大，必须出于公正之心，以免害人害己之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匪，通“非”。孚，信诚也。匪孚，谓天下之人，容有言曰：彼上之人，但以居尊位而萃人，其何德何能，我未知也！是其尚未归诚信服来荟萃者，疑其上以位而不以德。元，善之长也。永，久也。贞；正也，无邪也。指其中正道德之光明正大。爻辞是说，九五，阳刚中正而居荟萃天下之尊位，必然无有咎害；但是，若有尚未信服归附来聚会者，则当内修其德，外正其道，永恒贞固，通于神明而光被四海，则无思而不服，而后悔恨自然消失。此所谓“悔”，并非指已发生的具体威胁尊位的反叛之事，而是指居尊位者以德自衡，有慊于内、心有不安的自责。从爻位爻象看，九五以阳刚方正之道，居全卦中正之位，上下阴阳正应，是《萃》卦之主，全卦阴阳诸爻荟萃其身边，形成了以九五为核心的领导力量。九五居上卦之中，上卦为兑，兑性悦，则人皆自觉自愿而欢天喜地会聚一堂；又九五与九四、六三互卦为巽（☴），巽如风而无所不入，故如君子之风吹过而小人之草必偃一样。但“匪孚”云云，则不仅是从其居位中正角度看问题，而是从内修其德而正其道的更高方面来加要求。据说上古尧舜之时，僻处南方的少数民族三苗不服，没有自动前来朝贡会聚；于是舜“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史记·五帝本纪》）。中华各民族在舜帝高尚其德、中正其道

的感召下，终于欢聚一堂。又如周初，周公恐怕成王亲政之后“有所淫佚”，因此作《无逸》以戒之，文见今文《尚书》。当周公东征之后，周成王居九五尊位的形势并没有受到重大威胁，但周公却谆谆教导成王：“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也就是说，如果最高统治者不内修其德，恩泽下民，则人民怨恨，其统治怎能巩固？周公的确是一位思深虑远、很有眼光的政治家。作为最高统治者，权位固然重要，而内在道德之修则更重要。国人之荟萃臣服，如果仅因其权势之位而慑服，则战栗恐惧，稍有不安，立即叛去；如果是以德服人，人之臣服发自内心，自觉自愿，则团结成一股绳，力量无穷而战无不胜；国家将能长治而久安。二者之服之萃，孰优孰劣，大不相同，明眼人自能明辨。于此可见，九五爻辞“匪孚”之示，涉及长治久安之道，意义非同小可。



■舜帝像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赍（qí）咨，黄、张《译注》云：“迭韵连绵词，谓悲叹声。”洟，鼻涕。涕洟，谓痛哭流涕。爻辞是说，上六，如能咨嗟叹息、痛哭流涕地表示悔过，则可无咎害。从爻位爻象看，上六阴居全卦之极位，处矛盾转化之界而不自安，又下与六三阴阳无应，并以阴柔而凌越九五之尊，以此求萃，谁肯与之相聚？犹如小人之处高位，岂不危哉！但当萃之时，九五以中正之道而修德来人。此时上六如能及时悔过思尤，痛改前非，则九五将持“匪孚”之戒而予接纳，如此则上六可保无咎。《周易折中》引黄淳耀云：“上乃孤孽之臣子也，萃极将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君亲者。‘赍咨涕洟’四字，乃极言怨艾求情，故终得萃而无咎。”因为从全卦精神而言，卦辞有“利见大人”之言，实指中正九五之君，修其内德以服人，终能宽容接纳上六之检讨，故爻辞称“无咎”。其过在己，故有“涕洟”之痛；而其荟萃与否则在人，故仍须兢兢业业，以团结为心，

方可保其“无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论是自然生态之进化，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萃》卦所象征的会聚之道。众所周知，如蚂蚁、如蜜蜂，甚至是海洋中的鱼群，天空中的雁阵，森林中的象队，群聚而居，是其共同特点。群居荟萃，是世界万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方式，天经地义，自古已然。如若离群索居，则犹如离阵落伍之孤雁，声声哀鸣，难以为继，听之令人心酸。自然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如西方《鲁滨孙漂流记》所载，鲁滨孙远离人世而存活孤岛，如此之例，实极罕见。况且，这是小说家之言，岛上尚有吃人的野蛮人，及受其同化的奴仆礼拜五。鲁滨孙所使用的火枪斧头等工具，也是来自文明社会。鲁滨孙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类社会，他同样呼号于海上，希望早日回归社会群体的怀抱。于此可见，《萃》之时义大哉！人类之聚会，按古人说法，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以义会聚，小人则以利苟合。《萃》卦之聚，是重在清除邪恶的正义之聚会。故《彖传》释全卦精神，有“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之言。正义的聚会，也就是真正的团结，而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来自于刚中而应的正义和光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总要有其优良的传统和光荣的象征，以作为其国家、民族或社会的凝聚力。即如今天的华人，散居海外不少，也大多会自觉以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作为团结的纽带，俗语所谓“亲不亲，故乡人”，表现的正是爱我中华的文化心理，是一种合乎正义的无形的精神聚会。

不过，人们所期待的正义会聚，其诞生和发展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斗争，也有曲折。如《萃》卦象卦辞所示，从总体精神看，这是一个吉祥美好的卦。卦辞称“王假有庙”，这在古代是天大的事，极其重要。《礼记·郊特牲》云：“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由，用也。辟，弭灾消难之谓。又《国语·楚语下》记祭祀鬼神的重大作用，除弭灾祈福以外，另有“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的团结作用，以便巩固其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奴隶主的统治，在封建社会中，则因祭祀而团结国人，积极发展其封建统治。故卦辞又有“利见大人”之说，即要求形成一个以当时统治阶级中之君子为核心的会聚之道。但如从爻辞爻象角度来看，则阴阳六爻均有“无咎”之言，这是象征道路曲折、斗争复杂的严重戒辞。四阴求聚于阳，因条件各异，而有“无咎”之戒，较好理解；但作为全卦之主的九五之尊，阳刚中正，为什么也有“无咎”、“悔亡”之戒呢？《象传》释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就是说，九五虽因其自然之势而据有尊位，但是，如果其内在道德修养尚未完善，则人怀疑不信而未曾归顺萃聚，也属可能。故当修德以来人，使自己的理想日臻完美而发扬光大。故其“无咎”“悔亡”之戒，并非虚发；九五若不内修其德，则天命靡常，可能产生难保其位之“悔”，岂不殆哉！故《萃》虽吉占之卦，但占者仍须兢兢业业，对自己仍然不可有丝毫放松其严格要求的想法。

升

卦第四六



积小成大顺性升

《升》卦（䷭）第四十六，次《萃》卦后，二者互为上下卦形颠倒相对的综卦，已呈现二卦相承相续之兆端。如《序卦传》说："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不仅有攀高上升之义，而且兼有积聚而成大之意。南宋理学家张栻《南轩易说》释之云："天下之物，散之则小；合而聚之，则积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升也。"比如登山运动，如果运动员不是平时刻苦锻炼，提高身体素质，日积月累地积蓄了许多常人所不具备的本领和知识，以提高自己在风暴雪崩等恶劣环境中的应变能力，能够一蹴而就地登上号称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吗？《荀子·劝学》篇云："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人生之旅的攀登也是如此。谁不愿意自己的知识上升，技能上升，地位上升，待遇上升？但是，上升之路曲折而复杂，人们要有勇气正视现实，不畏艰难险阻地勇敢攀登高峰，也就是说，人们企望上升是正常的要求与愿望，无可厚非；但是，其上升要随顺自然之性而走正道，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攀越峰险。这从《升》与《无妄》（䷘）构成六爻阴阳相反的错卦（即反对卦）的关系中，也可看到上升必须坚持正道的启示。《无妄》象征着不妄为，其卦辞有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上升攀登不以正道，亦必然给人类社会或给个人自己带来灾难。而且，如攀登科学高峰之类的上升，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且和整个人类的文化环境、集体努力和知识因子的历史积淀密切相关。不仅是个人要奋发努力，而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积累，也必须达到相应的水平和程度，这就是古人所谓"积小以成其高大"的意思，读《升》卦可明其意。

《升》（䷭）卦辞云："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用"字，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作"利"，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亦云："本或作'利

见’。”“利见大人”，《易》卦常用之词。卦辞大意是说，《升》卦象征上升的事物，占筮者得此卦，元善亨通，利于会见大人君子，不必忧虑，往南方光明之地前进必然吉祥如意。为什么称“南征吉”？因为中国古人居屋，大多坐北向南，以采阳光而明亮居室。阳光温暖，实已成为人的生命活力的重要部分，故卦辞取以为喻。从卦象看，全卦下巽（☴）上坤（☷），巽为木而坤有地象，如《象传》云：“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程颐《伊川易传》也说：“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长而益高，为升之象。”树木当然是植根于大地土壤之中，但是出土以后，受日光雨露滋润，日渐高大上升，故以取为“升”之象。但是，《象传》作者由观察自然之象，又进一步悟出社会人生之理，故又有君子积小善以顺成其美德的说法，这是在为古代的统治者进行思想道德的设计。朱熹则进一步扩大延伸，明确指出：“木一日不长，便将枯瘁；学者之于学，不可一日少懈。”（《朱子语类》）观《升》卦象，可悟人生之升进努力，不可一日少懈，一旦丧失攀登上升的勇气，则其生命活力将日渐枯萎。这是《升》卦之象所示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故《荀子·劝学》全面发挥《升》卦所象征的丰富意义，云：“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按：半步也），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按：指十天路程），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人生学习，犹如登山，锲而不舍，则能攀上科学文化的险峰而阅尽人间风光；反之，志大才疏，锲而舍之，则朽木不折，徒然浪费生命资源而已。人生路上，是否敢于“升”，善于“升”，关系重大。

而《彖传》则从卦德卦性方面来分析其全卦的象征意义，云：“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柔以时升”，指处升之时，上卦坤与下卦巽均为阴柔之卦，它们及时地相互默契配合以求升进。其“升”适合时宜。“巽而顺”，指下巽德性和逊，上坤德性谦顺，阴柔逊顺而应合阳刚尊者以求提携升进，其“升”名正言顺，而非强求而致。“刚中而应”，主要指九二阳刚居下卦中位，以与在上的六五相互呼应，其“升”阴阳和谐。这三句话，分析全卦顺其自然本性而适时升进的必然性，故致“大亨”之福吉。“用见大人，勿恤”，是指升进之时，应以大人君子为榜样，学习典型，不忧否塞，必有福庆。“南征吉，志行也”，是说升进的方向，必须面向正义与光明。这就把“升”分为学习大人君子的光明之升进，与追求腐朽黑暗的小人之钻营升进，二种升进性质判然有异，而前途必然不同。此说杨万里《诚斋易传》已约略窥见：“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则足以行道，升德则足以进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于位由王公，升于德由圣贤。又曰：升位而见大人，故无附丽小人之失；升德而见大人，则日入于君子之途。南

征，前进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纣，亦大人也，能升飞廉（按：大恶之人）；孔子，大人也，能升颜子；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谨之。”所举史例，颇为生动，引人深思。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允升，大吉。

“允”的解释，有三说：一、“允，当也”（王弼注），即宜也（黄、张《译注》）；二、“允，施氏作‘陨’，《说文》同，云：‘陨，进也。’……兹曰‘陨升’，乃前进而升也，进遇阳，故大吉。”（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三、“允”，不必深究，仍作信允，‘允升’即其上二阳答应提携其一道升进。三说于义皆通，但以最后一说较为简明而符合实际。爻辞是说，初六，其上二阳已信任之并应允提携其一并上升前进，大为吉祥如意。从爻象看，初六处下巽之初，上与四阴阳无应，升进之力柔弱，本不为吉；但处事物当升之时，其上二阳，强而有力，足以升进，信其求升之心甚诚，允其提携上升，阴求允于阳而获升，故谓大吉。而《晋》卦（䷢）九三有“众允，悔亡”之辞，乃为下面二阴之众所允信，力较柔弱，故进长有限，故仅称“悔亡”。同为“允”进，因拉力来自上下阴阳强弱不同的方面，故《晋》六三仅有”悔亡”之占，悔恨消失，只是小吉，而《升》之初六却有“大吉”之筮。故《象传》释云：“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初为下巽之主，主动上附九二和九三，九二有刚中之德，上有正应，初附以升，上下阴阳志同道合而共升进，于升时为当然，于力言则有余，于道言则中正，故称大吉。这就好像初出茅庐，即旗开得胜。《周易折中》称引王申子曰：“初以柔居下，即木之升言之，乃木之根，故信其升之必达而获大吉也。”树木之根，虽深植土壤之中，但是，一旦获得地气的滋养，则其生养而升长，成其必然，故爻辞称“大吉”。这是从事物的发展趋势而言，深谋远虑，所见深入事物发展之本根。但是，初六所附之上，杨万里不认为是二、三诸阳，而是另有所指，其《诚斋易传》卷十二云：“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按：指下卦巽）与土（按：指上卦坤）相信而相得。则木之升也必锐。土与主相信而相得，则土之升也必达。故曰‘上合志也’。然则初六与谁合志哉？非六四而谁哉！初六与六四，正应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为文王岐山之事，则初六其吕望渭滨之事也。”杨氏以初木与四土为自然正应，于义亦通，可另备一说。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孚，诚信也。禴，通“礿”，其义参见《萃》六二爻辞注。爻辞是说，九二，因其心存诚信，上下沟通，相互理解，所以即使是用薄祭之礼祀鬼神，也必然获天地祖宗庇佑而致其无咎之福。九二处下巽之中，具刚中之德，又以阳处

阴位，虽失正而有谦逊之性，以此而上应六五阴柔之主，可见其心之诚信，而“无咎”之福，必然降临。《象传》释云：“九二之孚，有喜也。”《象传》为什么称“有喜”？因从爻位爻象看，九二与九三、六四互卦为兑（☱），兑性为喜悦，九二在兑体中，故云。关键在于一个“孚”字，有诚故喜，这是从事物之间的内在相互关系而言。宋理学家张载在解释《萃》六二爻辞时说：“凡言‘利用禴’，皆诚素著白于幽明之际。未孚而略礼，则神怒而民怨。”（见《横渠易说》卷二）但是，为什么初附二以升而言“大吉”，而二具刚中之德而仅言“无咎”呢？诸家之说，以程颐《伊川易传》为具体而明，其说云：“二阳刚而在下，五阴柔而居上……五虽阴柔，然居尊位；二虽刚阳，事上者也，当内存至诚，不假文饰于外，诚积于中，则自不事外饰，故曰‘利用禴’，谓尚诚敬也。自古刚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为矫饰者也。禴祭之简，质者也。云‘孚’，乃谓至孚乃宜，不用文辞，专以诚感通于上也。如是则得‘无咎’。以刚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当升之时，非诚意相交，其能免于咎乎？”其实，此一“孚”之至诚，不仅指九二，而且必须获得在上者的至诚相遇之心，方能免于咎害而有升进之喜。从爻象看，九二阳刚在下中实以为孚，六五阴柔在上虚中以诚待，如此上下虚实以孚诚相交，故保“无咎”。在历史上，如明万历初之名相张居正，公忠体国，专事改革，一心革除朝廷弊政，他对尚在少年时代的神宗皇帝，要求严格，身为帝师，对小皇帝之过错，动辄呵斥。其刚中之性，赤诚之心，天日可表，谓其事上至诚，实不为过。但明神宗不这么看，在严厉的张先生（居正）死后，他感到犹如搬掉了头上的泰山重压，他很快一反张居正之所为，全面否定张居正的变革。并且予以严厉贬斥，张氏子孙几无遗类。于此可见，上下不交至孚，虽有刚中之臣，具赤诚事国之心，又怎能保其“无咎”！当然，史上也有上下交孚的成功之例，如三国时蜀汉名相诸葛亮与后主刘禅，可称是上下相互信任，出于内心至诚。诸葛为相，治军严明，法制刚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刚中之臣而事上以孚；而刘禅为君于上，一心信任之，诸葛虽有街亭之败，而上表自贬，但刘禅信之如初，“总统如前”（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但相比之下，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中，失败之例多，而成功之例少，君权相权，矛盾斗争，愈演愈烈，发展到明太祖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之职而代之以内阁学士之制，大学士仅为私人秘书而供其差遣奔走。在古代社会中，君臣际遇，岂易言哉！

九三，升虚邑。

虚，一谓虚空；虚邑，即空旷无人之国邑。一谓虚，通“墟”，丘也。明来知德《周易集注》谓古代“四邑为丘，四丘为虚，非空虚也，乃丘虚（墟）也。”二说于义皆通，但古今人多取空虚之说。爻辞是说，九三，升进于空虚之境，勇往直前。从爻位爻象看，九三处下巽之上，已在上下卦彼此升转之位，又

阳处阳位得正，与上六阳阴正应，已呈示其果于升进的态度。下巽象征木，三处木之巅，破土生长，正是其时。而上坤为土地，为国邑。土壤乃树木生命之源，国邑乃国人生活之故土。按《易》卦之例，以阳为实，以阴为虚，九三阳实，上坤为虚，以阳入虚，其升进如入无人之境，通畅无阻。九三与九二、六四互卦为兑，兑有喜悦之象。故六二《象传》称其“有喜”；但是，与九二同处兑体之中的九三，为什么既不称“无咎”，又不称吉利“有喜”呢？原来，这与《升》卦总体精神有关。《彖传》分析上下卦后，得出了巽而顺，“柔以时升”的结论。以柔升进，则谦逊者多而易为在上者所接受，故可喜而吉；但若以刚升进，则有咄咄逼人之态而易遭时忌。九三之位，过刚不中，升进虽速，而潜藏祸端，故不称“有喜”，更无吉祥之言。如苏轼《东坡易传》所说：“九三以阳用阳，其升也果矣；六四以阴居阴，其避之也审矣……不言吉者，以至强克至弱，其为祸福未可知也，存乎人而已。”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亨，通“享”，祭祀也；一说，亨，宴享也。二说于义皆通，但今人多取前说。王，旧注多专指周文王，而今人顾颉刚则坚决否定，说：“但文王有岐山之会吗？在我们看得见的文籍里毫没有这件事的踪影。”因而据史考察，此“王”只能泛指周王，见其《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所论甚是。岐山，在陕西岐山县东北。周之居岐，从古公亶父算起，传到周文王已历经多代，其于岐山举行祭祀而会诸侯，可称是周民族的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周民族也由此经历了一个由弱趋强的上升发展过程。爻辞是说，周王在岐山举行祭祀宴享，吉祥如意，没有咎害。从爻位爻象看，六四已从下体而升至上坤之下，下面与初六虽然阴阳无应，但是阴居阴位得正，又接近六五尊体，四、五同处上坤一体之中，坤者性顺，各顺其自然之理势而上升，非吉而何？又六四与九三、六五上互为震（☳），震动而升进，自然之性。六四与九二、九三下互为兑（☱），兑有喜悦之象。但是爻辞为什么又有“无咎”之戒呢？程颐《伊川易传》是这样解释的：“四柔顺之才，上顺君之升，下顺下之进，己则其所焉，以阴居柔……四之才固自善矣，复有‘无咎’之辞，何也？曰：四之才虽善，而其位当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时，不可复升，升则凶，咎可知。故云……然处大臣之位，不得无事，于升当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贤，己则止其分焉。分虽当止，而德则当升也，道则当亨也。尽斯道者，其唯文王乎！”古时伴君如伴虎，故对六四近臣，发出“无咎”之戒，这是古人的经验之谈，能不慎乎！

六五，贞吉，升阶。

爻辞是说，坚持正义之道而致吉祥，循此可以步步升进而攀上高峰。从爻位爻象看，六五阴处阳位失正，本质阴柔，故爻辞于“吉”之前加冠词“贞”，

认为六五虽居尊位，然必守持贞正之道方能致吉。这就于顺利上升之时，暗寓作者居安思危之戒，颇富辩证观念。但从整卦来看，六五处坤体中位，坤性顺，顺其自然之性而致其必然之位，故爻辞称“升阶”，“升阶”云者，原是用古人举行典礼仪式作譬，以喻事物之升进，须顺其性而循序渐进，以此而致吉。又六五处全卦君位，下与九二阴阳正应，是《升》卦之主，于升之时，获得下面的刚健助力，有条件攀登高峰，此其所以为吉。故《象传》释云：“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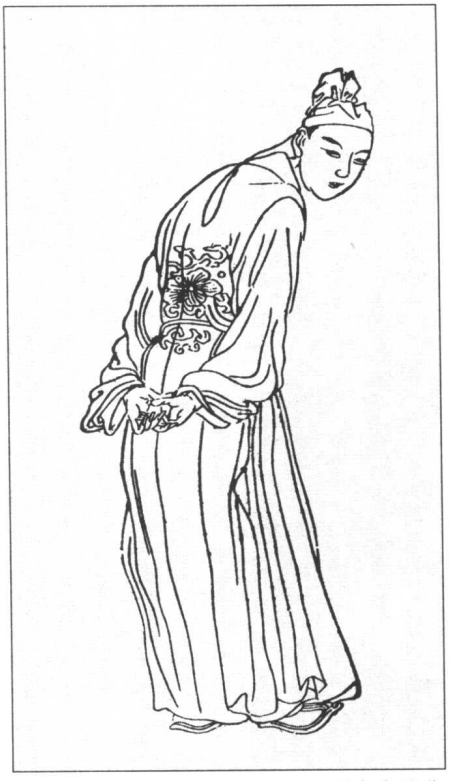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有昏暗、愚昧二义，爻辞合而用之。爻辞是说，上六，昏天黑地、愚昧无知地一味追求上升，只有永无止息地坚持正义之道才能化险为夷，以保利益。从爻位爻象看，上六处上坤之上，《升》卦之极，虽下与九三相应，但凌越六五之尊，继续盲目追求高升，说明了阴邪宵小一旦占据高位，贪得无厌，并不满足于已有利益，而是希望填饱其无底之欲壑，此之谓“冥升”，《易》卦作者仅用一个“冥”字，斥之为昏暗、愚蠢之行，很是传神。这说明了《升》卦之极，正是矛盾转化之时，如果不善处理，不是好自为之，而是不顾实际而继续盲目爬高攀升，则可能因其昏冥之升而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但是，古人占筮的目的，在于逢凶化吉、知幾而进退。故作者又从正面指点迷津，说明出路，爻辞因而有“利于不息之贞”的戒辞。虽对象是占据高位的阴邪小人，但只要改邪归正，幡然悔悟，顺其自然而走正道，则上天有好生之德，出路仍然是光明的。反之，只求高升而死不改悔，则将有灭顶之灾，何利之有？如西汉末年的王莽，作为外戚集团的首领，专擅国政，生杀予夺，视皇帝为傀儡，尚不满足；进一步凌越汉皇，托古改制，处处仿古，建置新朝，自立皇帝。此即《升》卦上六之所谓“冥升”也。结果呢？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史迹已昭示了上六“冥升”之利害，能不慎哉！所以爻辞有“利于不息之贞”的戒辞，并非出之随意的偶然之说，其中自有令人深味之处。《象传》谓“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正是此意。消与不富有一定的连带

■王莽像



关系，说的是上六之“冥升在上”，不仅不富，而且将日趋衰弱，直至消亡，岂不殆哉！



■李商隐像

总之，《升》卦充分显示了事物发展升进的丰富意义，其中初六因其力弱而处升之初，必须他人提携而后“允升”；九二则阳刚中正以应乎上，其心至诚，升进出于自然之性和公忠之心，故称“孚乃利用禴”，心香一瓣以祭，礼薄而诚，何咎之有？九三阳刚得位，准备升进于上面坤土之中，其升进之道通畅无阻，如入无人之境而获顺利发展。六四则阴柔得正，其升则上顺君道而下进贤者，故致其吉。而六五则阴柔处中而居尊位，虚怀若谷，谦虚待下，故因其下面多应而基础广大，致升之极品，这是依照自然规律循序渐进的必然结果，故称“升阶”。上六则显示矛盾转化之兆机。《易》卦重变，变则通，通则久。人生之中，升与降是一对矛盾，如称“宦海浮沉”，即是生动譬喻。《晋》卦象征进长，但《晋》卦之后有《明夷》，《明夷》卦象征光明受损。同样，《升》卦之后有《困》卦，象征困穷之时。只知升而不知降，必自致其困穷之厄。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另外，古人旧注常以君臣际遇譬喻升进，这样理解《升》卦内容过于狭隘。“积小以成其高大”，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诸方面。在事物不断升、降反复的实践过程中去理解《升》卦，则其升进所示之发展是一种活跃的生命动力，进步永无止境。如唐诗中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该是登上古诗艺术的峰巅了吧？但是，韩愈、李贺、李商隐又另辟蹊径，继续攀登诗的高峰；宋诗又走与唐诗发展不尽相似的道路，而自成高峰。人生犹如一首又一首优美动人的诗，必须具大无畏精神，永无止境地继续攀登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科学之路更是如此。顺其自然之性，永远坚持正义之道，则有攀登不尽的险峰在前面等待我们去勇敢地攀登。

困

卦第四七



努力脱困获新生

《困》卦（䷮）第四十七，次《升》之后，其次序是自然发展规律的总结，颇有道理。《序卦传》说："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卦是事物处于窘迫、穷困之时的象征。世界的万事万物，如果只知上升攀高，而不去看自己的实际才能和具体情况，则必自讨苦吃而困于坎险之中（按：下卦为坎，故云）。比如飞机的设计有一定的爬高限度，再先进的喷气飞机，也是受此规律制约，其升高达到其爬高极限以后，如果不顾其具体条件，仍然企图继续攀升，则其悲剧结果可以预料，一定是倒头栽了下来而机毁人亡。唐柳宗元有一篇寓言《蝜蝂传》（见《柳河东集》），写的是一种背涩善负而又好往高爬的小虫，"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最后是坠地死而后止。人类中也有这种人，贪财积货，刻薄聚敛，唯恐不厚；又"日思其高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而不知戒"，其智与蝜蝂小虫何其相似乃尔，悲夫！这是对《困》卦之义的一种形象揭示。积财不以其正，升官不以其道，贪心不止，最终必自入困境而难以自拔。如果能理解"困"是一种自然规律，正确对待，直面而无所畏惧，则君子虽一时身处其穷，但若能守志不移而道不穷，积极等待或创造条件，以便冲出坎陷而摆脱困境，则穷通而变，将迎来矛盾转化，重见天日而一展宏图的光明时刻。

《困》（䷮）卦辞云："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卦辞是说，《困》卦象征事物处于困穷的特殊阶段，君子处困而能不失其自通之道，故虽困而自有其亨通之路，但其吉祥如意只是对于大人君子而言，故称无有咎害，而此时如若侃侃而言，则常不见信于时人。从卦体卦象看，《困》下卦为坎（☵），象征水；上卦为兑（☱），象征泽。如果是泽上有水，则万物受其滋润

而农作物生长繁茂。但是，《困》卦恰恰相反，是水在泽下，犹如大型水库，其设计时不幸疏忽了地质水文资料的考察，结果水库地层泄漏而无法蓄水，水库长年见底，怎能以水库之水灌溉农作物呢？失掉生命之水，非困而何？十三陵水库之底可以牧羊，就是实例。故《象传》释云："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象传》作者思考较深，从自然之困而及于人事，认为正人君子身可穷困，而志不可穷，就是牺牲生命，也要为维护正义而斗争，为理想的实现而奉献。比如孔子周游列国之时，曾绝粮于陈，从者皆病而难以行动，这时子路问先生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不问是君子还是小人，人人都有穷困之时，但是，处困之道，却有性质的不同："君子固穷"，就是说君子处穷困时，贵在坚持，信守其正义之道以自救自济；而小人则不同，他们丧失了正义之心，没有原则，所以一旦处于困穷之境，立即张皇失措，胡作非为，无所不来，此所谓"滥"。这样，小人急于摆脱困境而不择手段，而效果适得其反，何能济困？非真穷而何？《困》卦辞及《象传》，虽是就君子处困而言"亨"，是一种正面的激励；但其中却也隐含了对于小人处困的严重警戒。《困》卦并非吉祥之卦，但是为什么卦辞一开始就指出了困而后"亨"之路呢？这是有其卦形依据的。《困》之下卦为坎（☵），坎性险陷，当然是处穷受困了；但"君子固穷"，处困而不失其正，持正守贞则能变穷困为通达，故上卦为兑（☱），兑性喜悦，困而后通，自济而喜，也是势出自然。

而《彖传》则从卦德卦性方面来全面分析《困》卦精神实质，云："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彖》辞大意是说：《困》卦象征困穷，是因为卦体中的阳刚居中之主九二与九五，被阴邪之爻所掩盖而难以发展，九二被初六与六三所包围而陷坎险之中，九五被上六欺凌盖压，故云。但是，若处险而不悲，虽困穷而能自得其乐，则虽处困境之中而自有其亨通之路可走，不过这只有大人君子才做得到。"险以说"，是说下卦坎（☵）性属险陷，而上卦兑（☱）性属喜悦，指的是阳刚君子，虽处坎险之中而不失其中正本性，故能坚持正义而不悲观失望，就像孔子称赞其得意门生颜渊一样，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样的正人君子，虽身处困境而不失其自身价值，坚守正义之志，则将来的道路必有亨通的前景。《周易折中》云："困亨者，非谓处困而能亨也，盖困穷者，所以动人之心，忍人之性，因困以致申，有必通之理也。"卦辞"贞，大人吉"，指的主要是九二与九五，特别是九五，是为阳刚中正之主，其内在本性光明正大，故其前进道路亨通吉利，内在素质是其致"吉"的主导因素。反过来，虽未明言小人，但却是对小人的一种隐约的严厉警戒。小人如果不去学习大人君子的榜样，一改其内在的阴邪宵小之本性，则永陷坎险之中而难以自拔，很

明显，“大人”守正而“吉”，而“小人”则非正而邪，何“吉”之有？何谓“有言不信”，这是戒辞。因上卦兑又有口舌之象（见《说卦传》），口舌主言辞，故以“言”为喻。如唐孔颖达所云：“处困求济，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饰辞，人所不信，则其道弥穷。故戒之以‘有言不信’也。”（见《周易折中》称引）于此可见，《彖传》认为，致诚守正，是济困之道。

在今天，作家贾平凹小说《废都》对《困》卦精神的正、反二义，也有自己的认识和说明，其说见后。身处困境，并非绝望，关键在于自己的妥善处理，好自为之。守诚持正，君子固穷，尚有一线生机；反之，小人则因其自作孽而致毙。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年不觌。

臀（tún），俗称屁股。株木，枯秃无枝叶之树木。觌（dí），见也。爻辞是说，初六，一屁股坐困枯株之下而发窘，无奈退入深山幽谷，三年不与世人见面。从爻象看，初六处于下卦之初，坎为水，性险陷，人初出道，即入困境而遇险难。初六以卑弱之身而阴处阳位，虽上与九四有应，但九四本身也是过中失正，难以救助，因而其困不解，而只能一屁股坐待枯株之下。人之体，行则脚为下，坐则臀为下，初六困而不能行，所以以臀喻坐困之始。按程颐之说，株木指九四之不能庇覆初六，云：“株木之下，不能荫覆于物……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谓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初六不安其居而受困，所以不得不退入深山幽谷的昏暗之所以待时济，因而爻称“三年不觌”，则是显示受困之时甚长，前途甚为暗淡。故帛书《周易》于“三岁不觌”后增一“凶”字，有一定的道理。但一般通行本并无“凶”字，也自有道理。因为初六如果只是株守其困，坐以待毙，当然其凶可知；但若顺困之性，学习君子而持守贞正以待时济，则困穷又自有生机，生机虽弱，但却是希望之所在。故爻辞虽知凶而不称凶，正可见作者的深刻思考。这是对人们的无言的激励。现代作家金庸大致就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初六的“三年不觌”的，其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写主人公段誉（大理国王子）被困太湖曼陀山庄种花，不见日夜思恋的小姐王语嫣，就想到读《易》时有“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一段，以为自己当时的困穷，合于《困》之初六，说是“三年都不见，真乃困之极矣”；但段誉又天性善良乐观，因而转念又想：“三年见不到，第四年便见到了。来日方长，何困之有？”（宝文堂书店版，第71页）

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关于“困于酒食”，程（颐）朱（熹）之说有异。程云：“酒食，人之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刚中之才，而处困之时，君子安其所遇，虽穷厄险难无所动其心，不恤其为困也；所困者，唯困于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泽天下之

民，济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为困于酒食也。”也就是说，君子因乏济民之难、救民饥乏的酒食之资而感困穷。“酒食”之设目的是为惠人，而非满足自己贪欲生活之资。朱子虽服膺于程，但并不盲从，而是时出己意以标新解，他说：“‘困于酒食’，厌饫苦恼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饱过宜，则是反为所困矣。”（见《周易本义》）后来清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即承朱子之说，云：“以燕以乐谓之需，既醉既饱谓之困。困者，厌饫之名。”日日酒足饭饱，超过人的消化能力，酒食反为病累，此之所以为困。二说于义皆通。但比较而言，朱说更具胜义，引人深思。如今之人，公关之世，日日酒食相征逐，没有一副好肠胃，谁吃得消？见“困于酒食”之爻，当引以为戒。绂（fú），古代作祭服的蔽膝；朱绂，尚秉和谓“贵人所服以祭宗庙者”，朱绂方来，“言将膺锡命也”（见黄、张《译注》称引）。爻辞大意是说，九二，因其地位而一时被酒食所伤困，但是在上者的信任仍在，并起用他主持祭祀典礼；在这处困之时，如果不顾条件而大步进取，必有凶险，反之，信诚持守刚中之道以待其时，则无咎害。从爻位爻象看，九二以阳刚居阴位失正而处下坎之中，坎象征险陷，故九二受初、三两阴包围而落陷阱，见其困穷之凶，是其自然态势所致。但从另一方面看，九二以阳居下卦之中位，以刚中之德而上应九五之尊，道同志合，同类相召，故爻辞有“朱绂方来，利用亨祀”之事，九二持守中道，以其刚健之力而求脱困境，并以至诚祭祀而通于神明，感天动地，谁不为助？己力合外力，足以冲击困境，得道多助，故爻辞称“无咎”，此君子身困而道不穷之谓也。不过，“困于酒食”之辞，明来知德《周易集注》则取程传之说，并举例以为九二如孔明之事。“‘困酒食者’者，卧南阳也；‘朱绂方来’者，刘备三顾也；‘利用亨祀’者，应刘备之聘也；‘征凶’者，死而后已也；‘无咎’者，君臣之义无咎也。”九二为辛臣之位，具刚中之德，故来知德以诸葛亮为喻，也符合历史实际。蜀汉坚守西南一隅，力量与曹魏之中原相距甚远，二者相争，蜀汉之困可知，但为复兴汉业，诸葛亮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国力消耗大半，最后身殁军中，其“征凶”之运，早在料中。但其公忠体国，鞠躬尽瘁，则感天动地，永垂千秋，又何咎之有？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蒺藜（jílí），也称“刺蒺藜”，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分为五个分果，被刺。这里用以泛指荆棘之刺。爻辞是说，上被坚石所困压，下又依据于带刺蒺藜之上，上下失据，进退维谷，不得不退回家中安居，但又不见持家的妻子，命运凶险。从爻位爻象看，六三居下坎之上，坎性陷，故是极险之位。六三与初六，曾狂妄包围九二于坎陷之中，欲以阴消阳。但阴阳消息循环，并非永远是小人得意。六三处险陷之极位，又反被上下邻近之劲健阳刚所掩蔽，其困急可知。六三以阴践阳位，不中又失正，力柔而性狂，如跛之行盲之视，非困而何？六三

处下体之上而急于升进上体之中，因势之困而求合四、五两阳，但九四、九五各有正应而不为六三阴邪小人甜言蜜语所动，如坚石之不可入。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二变正时，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按：二以阴位为正，故九二以阳化阴为变之正。六三与化阴之二及九四互卦为艮（☶），艮象为山，山多石，故虞翻有是言。六三上受石困，于是改变心机，又下求合于九二。但是，六三之阴邪下凌九二之刚中，九二岂甘同流合污？所以与九四同样，坚拒小人之求，故六三之于九二，如身依据于带刺蒺藜之上，辗转难安。从爻象看，六三位在下坎，《说卦传》云：坎"于木也为坚多心"，也即木坚硬多刺之象，故爻辞取蒺藜为喻。于是六三被迫重新返回其居室，以求合于其妻上六，但上为四、五两阳所阻，又与上六并非阴阳相和，其失可知，这有回家不见主家之妻之象，故家也难安。进退两难，家居不安，何处可避风浪？故《象传》释云："'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如孔子所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这是说，六三阴邪，以不善之德，居乘凌九二刚中的险陷极位，当困之时，自找其困又不善处困，上下进退都无安身立命之处，弄得众叛亲离，连常以为伴的妻子也背己而远去。如此之人之德，死期可以立待，故爻辞称"凶"。在历史上，西周初年，管叔、蔡叔流言谗害周公，又联合殷人反叛，结果是害人反害己，臭名流传，身死而为天下所笑。这与《困》卦六三的"凶"象非常相似。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按：即崔杼）。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按：齐丁公为崔杼之祖，姜姓），臣出自桓（按：齐桓公小白，东郭偃之祖，同姜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杜预注：坎为中男，故曰夫。变而为巽，故曰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杜注：风能陨落物者，变而陨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爻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杜注：坎为险为水，水之险者，石不可以动）；据于蒺藜，所恃伤也（杜注：坎为险，兑为泽，泽之生物而险者蒺藜，恃之则伤）；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杜注：今卜婚而遇此卦，六三失位无应，则丧其妻，失其所归也）。'崔子曰：'蒺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齐）庄公通焉。"后来，崔杼因此怨恨，并勾结庄公侍者贾举等弑之，于是齐国大乱，贻祸无穷。凡按：《困》（䷮）之《大过》（䷛），实因《困》卦六三之变正，故直取爻辞"困于石"云云。又《困》卦之《大过》卦，《大过》象征大为过甚，初六与上六两阴，犹如栋梁二端，柔弱不堪重负而易折断。其卦象也甚凶险。《左传》"史皆曰吉"，实是取媚于崔杼的不实之辞，还是陈文子的分析较为中肯。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来，据明来知德云："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来。"（《周易集注》）徐徐，迟疑貌。"徐徐"，李鼎祚《周易集解》作"荼荼"，引虞翻曰："荼荼，舒迟也。见险（按：指下坎陷）故来荼荼。"金车，旧注一般指九二，因下坎有舆车之象，九二阳刚健劲，故以坚固金车为喻。但也有相反之说，详下。爻辞是说，九四，犹豫地缓缓前行以应初六，但路中为坚固金车困阻，虽有一时吝惜，但是，最后必然有始有终而达到目的。从爻位爻象看，九四本身已脱出下体坎陷而升至上体兑卦之始，以阳居阴而位失其正，而且又有过中之嫌，所以虽与下面初六为阴阳正应，但是下临坎陷之险，力弱又怎能救济初六而脱离险境？一旦失误，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犹如济人之溺，自己又不会游泳，入水救人，岂能不迟疑犹豫？加以应初之路，中间又为九二金车所阻。九四与六三、九二互卦为离（☲），离有兵戈甲胄之象，动兵阻拦，前进道路之险陷可知，故爻辞称"吝"，这与爻象所示有关。不过，九四与初六终是阴阳正应，邪不胜正，只要坚持正义，顽强前进，则最终吝惜消除而达其呼应济人之目的。又九四居上兑之始，而兑卦德性喜悦，故九四最终是吝消而有喜，所以，爻辞称"有终"。不过，宋杨万里《诚斋易传》的解释颇有异同，他以为九二阳刚居中，德之善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断无阻人阴阳正应之理。所以他弃旧注而自创新解，云："气同则从，声比则应，各从其类也。《易》之相应，岂必以位哉！（按：此说批评了机械地以位相应的必然性）四与初应者，位也。《困》之九四，其应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类也。九四为上六所掩，其望九二之应。如乞师于邻国以解入郛之围也。而九二徐徐来者，隔于六三之阂，其前如金车之坚而不可却也（按：古人重车战，"金车"可理解为今日之坦克车装甲车之类，属重武器）。然阳进而不止，阴止而不进，吝于始，必通于终。盖四虽困于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则不渝也。二虽不当初之位，然二之与乎四，则必应也。当困之世，为君子者，类苟同矣，应不在近；志苟通矣，来不在速，期于终不为小所掩而已。（汉初）陈平交绛侯（周勃）以诛诸吕，（唐初狄）仁杰荐（张）柬之以诛二张，近乎《困》之九四矣。"于义亦通，可另备一说。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于祭祀。

劓（yì），古代割鼻重刑。刖（yuè），古代断足酷刑。赤绂，古代贵族祭服之饰，泛指九五之居尊位。说，通"脱"，谓摆脱困境。爻辞大意是说，九五，运用割鼻断足之严刑治国，高居尊位被众所孤立而颇致困扰；但是经过工作，逐渐为民众所理解而终于慢慢地摆脱困境，这时利于主持祭祀以团结民众，从而保其江山社稷。从爻位爻象看，九五居《困》卦君主之位，阳刚中正，本该吉爻。但因处困之特殊环境之中，上六乘凌其上，为阴邪所掩盖，虽下与九二相应，但又被六三所隔，犹如高高在上，脱离民众，加以其治严刑刚猛，一时不为

民众理解，故爻辞称“困于赤绂”。但九五又具中正之美德，下又有九二刚中之贤臣相应，志同道合，冲破险阻而徐来相应以共济天下，九五居上兑体中，兑性喜悦，故爻辞称“乃徐有说”，摆脱困境，当然喜不自胜。古时人君祭祀天地鬼神，是以诚孚感格祖先鬼神以团结臣民的大事，关系国家政权的稳固。《周易折中》引宋王应麟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谓虽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岂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独知之乎？”此即孔子所称“知我者其天乎”之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lěi）藤类植物。臲（niè）卼（wù），危险不安之状。动悔，动辄有咎而生悔受困之意。有悔，有所悔悟，知道纠正错误而回头是岸。爻辞是说，上六，困于葛类藤蔓的纠缠之中，难于前进而呈坠落不安之危；这时如能知误悔过，见机前进解困则必致吉祥。从爻位爻象看，上六处上兑之上，兑为泽，乃水草生长之区，故爻以葛藟喻六三之纠缠。上六又处《困》卦之极，是由困趋解的矛盾转化阶段，其以阴邪而乘凌于九五阳刚中正君主之上，下与六三无应，则其“臲卼”可知。但是，处困之极，矛盾即将转化。此时如能及时把握时机，以正克邪，回头是岸，动而知悔，则悔恨消失，前进必然吉祥如意。王弼注云：“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曰’者思之辞也。谋之所行，有隙则获。言将何以通至困乎？曰动悔，令生有悔，以征则济也。故曰‘动悔有悔，征吉’也。”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处困之时之境，动且有悔，但是，如果永远坐困待毙，则其悔愈大。这是由于人们只知动而有悔，而不知不动乃所以真正有悔也。从“动悔”到“有悔”，也就是认识“悔”之所来、探索处困之道的思维过程。“动悔有悔”句中的“有悔”，黄、张《译注》译为“赶快悔悟”，甚是。思想有认识，指路有方向，则可大胆前行以摆脱困况，非“征吉”而何谓也？

“升”与“困”是一对矛盾，有升就必有困。自然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不善处困之道，则将功亏一篑而一事无成。原始森林中密密麻麻的乔木林纷争阳光，拼命高长；而灌木藤蔓植物，则在其下铺列施展，藤蔓缠树，甚至直达树梢。人生亦然，竞争激烈，升困互易之态势，此起彼伏。因此，探索处困之道，实属人生大事，也是社会的重大问题。《困》卦正是古人对处困之道的一种朴素认识。其中三阳爻以其阳刚孚实中正，脱困无咎，有始有终；而三阴爻则因其阴邪不正罹困至极，如六三甚至有丧命之凶。但是，《易》卦作者同时又指出其出路在于学习君子，守正以行，则仍有脱困的希望。卦辞称“贞，大人吉”是从正面而言；但从反面看，则是对于小人不善处困的警戒与提醒，希望阴邪小人改邪归正，共济危困。如对上六，处困将解之时，指出其应及时把握“动悔有

悔”之机，则有征行之吉而自脱其困。

现代作家贾平凹，对《困》卦精神的认识颇为生动。他在《废都》中写作家庄之蝶请友人孟云房用《易》筮命，得《困》卦。孟问庄生辰八字为水命。孟云房以下一段分析很妙，他说：“你是水命，这还罢了。此事若要问的是物事，物为木，木在□内是困；若要问人事，人在□内为囚……人事虽是囚字，有牢狱或管制之灾。而可贵的是你为水命，囚有水则为泅，即你能浮游得救。但是，即便是浮游，恐怕游得好得救，游得不好就难说了。”（见《十月》1993年4期39页）《困》卦下坎（☵）上兑（☱），坎象征水，所以贾平凹生出了后面一段关于是否善于游水自救以脱困的绝妙好辞来。因此，脱困办法很多，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关键在于你是否善于处困之道。

井

卦第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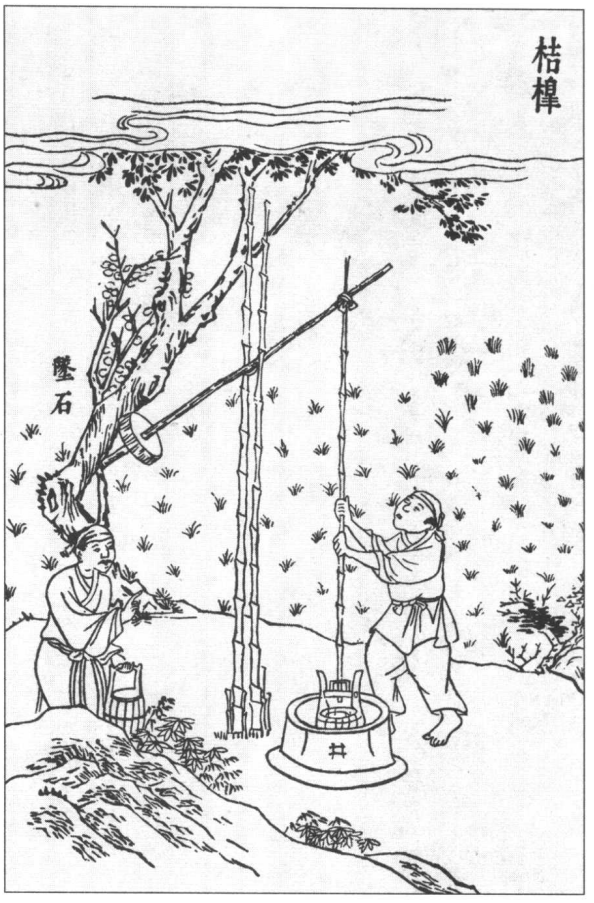


功德无量井泉养

《井》卦（䷯）第四十八，次《困》卦（䷮）后，彼此互为上下卦体颠倒的综卦，已呈其卦义相反相救之兆。《序卦传》说："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意思是说，人一旦困穷于上，就会汲取人生经验教训，其善者觉悟到贪欲无止、爬升无限的危险，于是正确面对，及时处理，而返归于下，改过自新，修德养人，以另图新的发展。因此，《升》《困》二卦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象征汲泉上升而养物不穷的《井》卦。空气和水是生命之源，有之则生，而无之则死。日前，人类飞船及探测器飞入火星，首先探测火星是否有水的迹象，然后再可以进一步研究火星是否曾存在过生命的现象。而在古代，中华民族多以凿井饮水聚邑而居。所以，北宋柳永的词到处流传，人们就说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井泉虽处地下，但是汲水上升，则养人养物，培育成长了众多生命而功德无量。因而人们有感于此，进一步运用人格化之"井"，以譬喻君子的自我修养。如东汉李尤《井铭》云："多取不损，少汲不盈。"（见《艺文类聚》）反之，如果小人违背正道以用"井"，则《井》的上卦为坎，象征险陷，则矛盾转化，活生生的养人之井，立刻变成一口害人性命的陷阱。清末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时，慈禧太后在仓皇出逃时，令太监总管李莲英推珍妃于宫中之井，养人之井立刻化为取人性命的屠宰场。这就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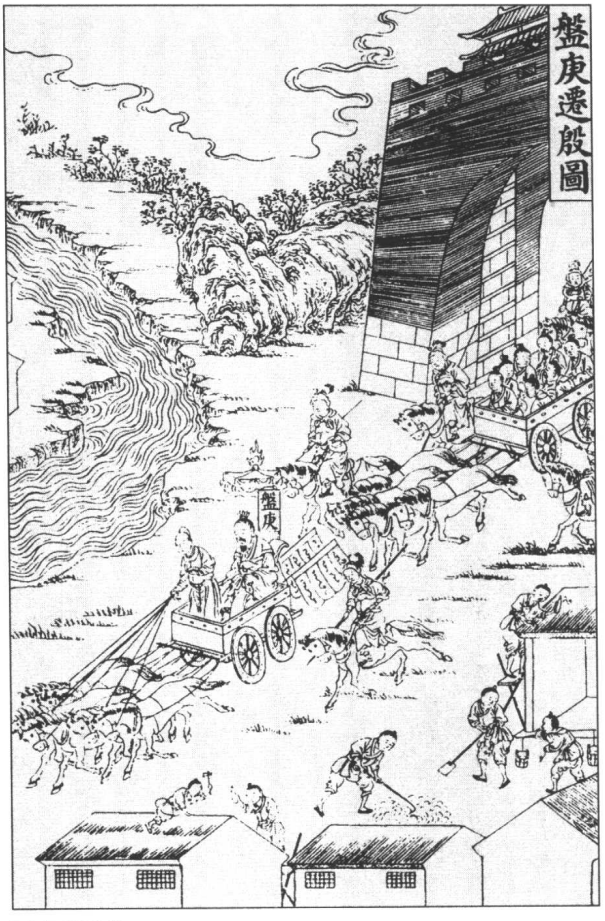
《井》（䷯）下巽（☴）上坎（☵）。巽象征木，又其德性为顺；坎象征水，水性养人。《象传》释云："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有关"木上有水"之象，古人解释不同。程颐《伊川易传》以为是"木承水而出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所称巽木指汲水之木桶。后人多尊承之。如杨万里《诚

斋易传》云："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着，此井之象也。"但是，朱熹不同意程子井桶之说而另着新解，他说："如草木之生，津润皆上行，露水直至树末，此即'木上有水'之义，虽至小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叶尾皆潮水珠，虽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当学生再问："井字之义，与'木上有水'何预？"朱熹又回答云："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来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见朱熹嫡长孙鉴所编撰《朱文公易说》卷八，《四库全书》本）《象传》所称"君子以劳民劝相"，是说君子观《井》卦之象，效法井德养人，因而慰问民众并劝其互助相养。不过，汉儒郑玄对《井》之卦象另有其说，云："坎，水也；巽，木，桔槔（jiégāo）也。互体离（按：指九三、六四、九五上互之卦）兑（按：指九二、九三、六四下互之卦）。离外坚中虚，瓶也；兑为暗泽，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见《周易集解》称引）则《井》之巽木，指"桔槔"。桔槔，古称"吊杆"，古人以横木支于木柱之上，一端挂汲水器，另一端系重物，通过杠杆原理上下运动以汲水（见黄、张《译注》）。郑、程、朱三说，大同而小异，于义皆可通。



■桔槔

以下分析卦辞。"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改邑不改井，这是古时常有的现象。殷周时代，因为自然灾害及民族冲突，整个民族实行大迁移的事例比比皆是。殷之祖先有盘庚之迁都，见载于《尚书·盘庚》篇中。周民族从古公亶父开始，也是几度大迁移，从周原到镐京，都是民族迁移留下的痕迹。民族村邑聚居，必然皆有水井以养人。但是，民族及城邑可以迁徙，而水井则无法迁徙，其养人之德，无有任何改变，不因人之变异而改其度。无丧无得，这是说井水汲之不尽，注之不满，



■盘庚迁殷

日汲日新，有其常德。井井，第一个“井”作动词，第二个“井”作名词，即“井其井”之意，指不断汲用井水之事。汔（qì），几也，即接近。繘（jú）又读（yù），绠也，这里指汲水桶之绳索。繘井，即桶绳尚未离开井口。一说繘通“（矞）”，矞，出也。矞井，即汲水器尚未升至井口。于义亦通。羸，衰败，毁坏，这里指汲水器之坏漏倾覆。卦辞大意是说，《井》卦象征水井养物，功德无量。村庄城邑可以迁徙，而水井屹立不动，不论谁来汲水都一样，汲之泉水日涌而不减少，注之泉水也不流溢，人们不断地汲水养生，以井为用。但是，若是汲水瓶尚未升离井口之时而毁坏损漏，则功败垂成，必有凶险。《彖传》从卦象卦德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卦辞所体现的全卦精神：“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井》卦下卦为巽（☴），巽性为顺；上卦为坎，坎象是水。上水，即汲水为用。“巽乎水而上水，井”，是说人们依顺水的渗透作用，依照规律而掘井以饮。古时若无水井，则难见聚居之村邑，井水是人的生命之源泉，故《彖》称“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以见井有常德，不因人而转移改变；这是指卦中九二及九五具刚中永恒之德。《井》与《困》为综卦，《困》之上兑下迁化为《井》之下巽，但九五转化为九二，其刚中之德不变；又《困》之下坎上升为《井》之上坎，九二化为九五，其刚中本性仍然保持并加发扬，故云。井以养人为功，但若汲水不出井口，则人何以受益？更严重的是，打破了汲水瓶，则前功尽弃，其凶险之象立现。《周易折中》的作者更加案语而推之人事，云：“然井能泽物，而汲之者器；政能养民，而行之者人。无器则水之功不能上行，无人则王者之泽不能下究。”亦可备一说。其实，不仅仅是统治者的统治，其他一切事物的因革沿

创，以及一切学问人事，无不贵得其宜，道理相通，无不可从《井）卦之精神而悟出某些人生哲理之奥妙。

以下谈爻辞爻象。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井，唐陆德明云："井以清洁为义。"（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称引《释文》）但初六之"井泥"则反其道而行之。爻辞是说，初六，井底污泥堆积，泉水腐臭而无法食用，该井年代已久，连禽鸟也高飞而不肯我顾。从爻位爻象看，初六处《井》卦之始，阴据阳位而失正，上又与六四阴阳无应，已呈"不食"、"无禽"不吉之兆。初六在《井》之底，故以井泥为喻。初六处下巽之底，巽有臭象（见《说卦传》），故腐臭淤泥堆积则污染泉水而不可食。井因其清洁泉水用以养人为德，无法食用，则初六必为人与禽（泛指一切生命之物）所共弃。如杨万里《诚斋易传》所称："居下流者归众恶，安旧习者绝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于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处幽阴之极，安于旧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饮可食，洁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洁，旧而不清，众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弃而不食，时之舍而不用，将谁尤乎？"诚斋由此获得启悟，进一步深入思考而下断语云："养人者必自养，用世者必可用。"也就是说，因初六自身不洁，人所共弃，而悟到事物自身的锻炼与改造，成败关键主要在其内因——即其内在之素质。故沽名钓誉者乏养人之德，其久暴露，必为时人共弃不齿。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井谷，旧注解释不一，黄、张《译注》称引《周易折中》云："井中出水之穴窍也。"比较明白。鲋（fù），有的说是泥鳅，有的说是鲫鱼，总之是普通的小鱼。一般鱼类必须积水深广方可存活，但是泥鳅或鲫鱼则不然，在烂泥坑洼中积少水沾濡而足。故可于井泥穴窍中生活。射鲋，即以弓矢射取小鱼。据说古有射鱼之法。《礼记·月令》云："冬季之月，令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先荐寝庙。"射鱼不在江海湖泽，而于井谷射取小鱼，可见射非其地，不合于礼。瓮，古代陶制的汲水瓶器。爻辞大意是说，九二，井穴之泉有小鱼，仅供射取小鱼作游戏，因为此时汲水器破漏，无法汲水以养人济物。从爻位爻象看，九二以阳刚之质而处下巽中位，虽失正却具刚中之德，故已从初六"井泥"中脱而升致"井谷"之地，井穴已有泉水涌出。但是，上与九五之应非正，上无强有力之援助汲引；又九二与九三、六四互卦为兑（☱），兑"为毁折"（《说卦传》），故又有"瓮敝漏"之象。井穴已出水，却无器可汲而出以养人，其济物之用不行，而只供人射鲋之戏，实在比"井泥"高明不了多少。事物的关系是复杂的，井穴出水在己，但以器汲水则在人，己之质与人之用相互配合，其功用方能见效。故《象传》感叹云："井谷射鲋，无与也。"无与，无人相应与援手，据

《易》例，二与五应，但《井》卦二、五俱阳，同性相斥，在下卦的九二缺乏在上者的汲引援用，所以，即使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贤才，也只能坐井观天而作慨然长叹。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xiè），淘去污泥。爻辞是说，井底污泥已淘浚干净，泉水清洁，却尚未被汲取饮用，使人心酸凄恻；但是，井水清沏可以汲用之象已明白呈现，只要在上君王贤明，必然及时汲用以养天下，因而君臣将一并蒙受福泽沾溉。从爻位爻象看，九三处下体之上，阳处阳位得正，与上六阴阳有应，该是吉爻，故有井泉已渫，清洁可食之象。但是，上六阴柔，应援乏力，必须求助于九五，而五应二，不专于三，加以九三处下巽之上，巽之为性，“其究为躁卦”（见《说卦传》），九三求九五，过分急躁，九五一时不明其德性而犹豫“不食”，也在情理之中，故其心中酸恻，也非偶然。以井泉之渫，已具养人之资，而欲求知于人而上汲食用，尚费如此之周折，更何况是国家之用贤人乎？不过，假如君王（指九五）圣明，终于发现九三之清洁可食，则君臣并受其福，九三井养之功可望有成。九三互六四、九五为离，离象为日，其性为明，有王明之象，而五非其正应，故爻辞称“王明”，说明必须等待君王的明察。天下并受井养之福，仍然是有条件的。古人更推之社会人事，如杨万里云：“九三以阳明之质，居井下之上，当一井之半，则泥者去，注者浮，浅者深，此渫治之井，甘洁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犹未出井之上也，淳可用之才，当在下之地，而枉其养人之才德，故为之恻然于心，而叹其上之不我烛也……此作《易》者所以非为井叹也，为有才德之君子不见用于上者叹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则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则如无贤。”在人类已经历的各类社会形式中，君臣上下际遇，谈何容易！空有满腹经纶之才华，却无声无息地埋没于草莱之中，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故黄、张《译注》称引《史记·屈原传》而加以发挥，说：“九三爻辞以充满希冀的情调，展示出井水已清，应当及时汲用的心境；其意是期盼‘尊者’能够‘思贤若渴’、‘举贤授能’。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有感于楚君弃逐贤臣至国败身亡的史实，藉此爻辞发论云：‘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六四，井甃，无咎。

甃（zhòu），治也，这里指修井壁井台。爻辞是说，六四，努力修治井壁井台，必无咎害。六四已从《井》卦下体升至上坎之始，坎象为水，则呈井泉上

涌之象。此时井泉之养已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修治水井本身，以防外部腐土污水的侵蚀。六四以阴居阴，其位得正，其德为柔，但与下无应，应援乏力，故当静修其内，防范于外，以待其用，而不可急躁妄取，所以爻辞有“井甃，无咎”之说。清陈梦雷的分析颇为简明：“初六不正在下，故为泥；六四正而在上，故为甃。甃所以御泥达泉，闲邪存诚之功。故曰修井。三之渫，修于内以致洁；四之甃，修于外以御污。内外交修，济物及人之本也。又四大臣近臣近君，修井以储九五之寒泉，能尽臣下之职，可因君以成井养之功矣。”这就是说，达到《井》六四之后，内外兼修，条件具备，井养之功已隐隐可见，故紧接着有九五之寒泉可汲食。井养之功，日渫月治，非一日之功明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liè），一谓寒冷貌，如《诗·曹风·下泉》：“冽彼下泉。”一谓“清洁也”（《周易集解》引崔憬之说）。在这里二说可以相通，井泉之清沏透明而令人生沏骨之寒的感觉。爻辞是说，九五，井水清凉明彻，洁净的寒泉可汲而食。九五居《井》卦之尊位，是一卦之主，具中正阳刚之德，人所共仰，功德无量。犹如经过内外修浚的井泉，洁净清沏，尽善尽美，已具养人之功，可以普济万物。故《象传》释云：“寒泉之食，中正也。”《周易折中》更称引易被之言，分析九五与九三之“食”与“不食”，云：“三与五皆泉之洁者，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言‘食’。”唐柳宗元有《井铭》（并序）一篇，直接称引九五爻辞以明其井养之义，其文云：“始州（按：指广西柳州）之人，各以罂瓶负江水，莫克井饮。崖岸峻厚，旱则水益远，人陟降大艰；雨多，涂则滑而颠，恒为咨嗟，怨惑讹言，终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为井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坚垍，其利悠久。其相者（按：指相度井穴泉窍之人），浮图谈康，诸军事牙将米景；凿者蒋晏。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寻有二尺。铭曰：盈以其神，其来不穷，惠我之后人。噫！畴肯似于政，其来日新。”寒食冽泉，凿井而饮，进一步提高了当时柳州人民的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收成，这里指井养之功已成而大有收获。幕，蔽覆也，覆盖井口之物，这里作动词用。爻辞是说，上六，井养之功已成而大有收获，无须覆盖井口；心存诚信，则必致大吉。上六虽非阳刚，但其位正，居上坎之上，坎口虚而不掩（--），故爻辞称有“井收勿幕”之象。在其井养已大功告成之际，善施济人泽物之甘泉，天下共受其福，故爻称“有孚，元吉”。按《易》之作卦，有取于坎水者，其他各卦之水，皆下流而汇聚，成其溺人之波，故卦多以险陷言之。唯独《井》卦则不然，井水上汲而食，冬温而夏凉，是其“有孚”天然之真性，古之

建国，必卜井而居，《井》之坎水，不同其他。又他卦之六，位终为极，皆为矛盾转化为变之征；而《井》之上六，却因夫井体之用，博施而有常，井水汲食而出于井口之上，其利无穷，其功至巨，故爻独称“元吉”。《易》之为例，千变万化，不可拘泥一方。

通观《井》之全卦，三阴爻指井体之事：初六位最底下又上无其应，如井泥之积滞，穴不出泉而有污染，故称“不食”。六四外修井体以御泥达泉，井体之功渐成，故爻称“无咎”。上六则内外之功已具，水已汲出井口而食人，故爻称“元吉”。三阳爻则指泉水之事：九二在下卦之中，爻曰“射鲋”，有鱼可射，可见已见始达之泉，但因下比初六井泥之污，只有小鱼可供射戏，离开汲食养人距离尚远，故爻称“瓮瓮漏”，汲水器破败，有等于无。九三之泉，经渫治已洁净可汲，但处位下卦又过其中，井台未修，不为人知，故爻称“不食”而令人“心恻”。九五则具阳刚中正之德，如寒冽之泉可以汲食而普济天下。总之，阳爻之泉，喻人内修其德；阴爻之井，喻人外治其用，修养与养人，二者缺一不可，必须齐头并进，方能显其无量功德。但是，《易》卦重变，井养之功，如果不持“其孚”之常，而以恩赐舍施骄人，则好事将变坏事，养人之井将一变而为害人陷阱。如明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菜根谈》所说：“仇边之弩易避，而恩里之戈难防；苦时之坎易逃，而乐处之阱难脱。”《井》上卦坎，故云。洪氏所言，富有生活辩证法。另外，古人常以《井》卦直接比喻治政。其实，《井》之精神可通于学。杨万里《诚斋易传》云：“治国欲新，为学欲新，进德欲新。”泉之渫与井之甃，其进德日新、为学日新之喻乎！故杨氏又云：“井一修则旧井为新井，德一修则旧学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于斯人乎！大哉，修之有功于斯井乎！”其言大有启迪意义。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如诚斋之反省深思，则其善谈《易》者乎！

革

卦第四九



革故布新顺天人

《革》卦（䷰）第四十九，紧接《井》后。《序卦传》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周易集解》称引晋韩康伯注解释说：“井久则浊秽，宜革易其故也。”笔者出生农村，少年之时，家贫无屋，父母借人废屋暂居度日，废屋前旧井一口，堙塞日久，哥哥带我下井淤浚，其井底淤泥，腐臭而不可闻。但是，污泥腐土、枯枝败叶一旦清除净尽，泉窍自见，铺上净沙，则清泉汩汩，清冽喜人。于此可见，旧井不革，何来清沏之泉？自然如此，人事亦然。《革》卦象征变革，紧随《井》后，自有一定道理，是自然规律所致。旧井如不及时修治变革，则其水腐臭，怎可汲食而养人济物？井水如此，他人他物又何独不然？《易》理重变，《革》卦更是强调及时扫清障碍的大胆变革。从社会人事角度看，如唐孔颖达《正义》所称：“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也。”此即《彖传》所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政治革命，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如果在上的剥削阶级，其统治腐败过甚，已达到逆天虐民的程度，则只有及时把握机会，以暴力革命的激烈对抗加以扫灭，如商汤之放夏桀，周武王之诛殷纣王，皆为顺天应人的正义的革命行动。故孟子发其石破天惊之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古代，即使贵为帝王，“朕即天下”，如果一旦倒行逆施，违背天心民意，那么在下的臣民就可行其“革”道，加以暴力清除。如《尚书·泰誓》所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古人究天人之际，以天人合一为理由，行其革旧布新之道，并非尽是落后的唯心之说。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在继承与发扬《革》卦的精神时焕发其动人的光彩。

《革》（䷰）之卦体，下离（☲）上兑（☱）。其卦辞云："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己日，《周易折中》引李简之说云："己日者，已可革之时也。先时而革，则人疑而罔孚，故己日乃孚。"据黄、张《译注》云："己日，古代以'十干'纪日，'己'正当前五数与后五数之中而交转相变之时，故有'转变'的象征意义；其后一数'庚'，则有'已变更'之义。"元亨利贞，见前《乾》卦辞释义。卦辞大意是说，《革》卦象征变革或革命，在利于转变的时机——己日来宣告变故革新，并以内心诚信来取信于民众，必然元亨利贞，至为吉祥，当然一切悔恨自然消亡。从卦象看，《革》卦下离（☲）象征火，火性炎上；上兑（☱）象征泽，泽水下注。《象传》云："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所谓"泽中有火"，指兑泽之水在上，而离明之火在下，水火相生又相息。比如森林大火之时。以桶水灭火，则水经高温火燥而汽化，生出氧气来助火势，促使森林大火转旺。但是，如果高压水龙之势极猛，则火敛其赫赫之威而逐渐息灭。这是水火相生相灭的实例。人们常说："势同水火。"说明水火不相容，如若共处一体，就到达了非变革以创造新形势的紧急时刻，其矛盾转化刻不容缓，关键就在善于顺水火自然之性而把握时机，正确处理，则将在经历艰难痛苦的变革之后，出现一种充满希望的全新前景。无论自然，抑或人事，无不尽然。所以程颐解释《象》辞云："水火相息为革，革，变也。君子观变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迁易，以治历数，明四时之序。"（《伊川易传》）治历明四时之序，实际也就是研究自然季节变化的规律。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作物的生长收获，与四时之序的交替变革密切相关，故《象》辞以此比喻自然的变革。而《彖传》则变换角度，更为全面地介绍了《革》卦的精神实质，云："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水火相息，解释如前。文明以悦，指下卦离性为日为明，故称文明；上卦兑也具喜悦之性。这是从卦德卦性方面来说明卦辞"元亨利贞"之义。只要坚持正义，革称其"当"，能够正确地推行变革，则何悔之有？不过，这是对卦辞的正面阐述。如从反面来理解，则《彖传》又有其言外之意，也就是告诫人们，革而不当，行而不正，则悔恨立生，可不慎哉！于此可见，《革》卦之义，既重"大亨以正"，也就是推行为国为民的勇敢变革，出于大公无私之心；同时又须准确把握变革之"时"——也即卦辞所称之"己日乃孚"，时机稍纵即逝，但如条件尚未成熟而提前行动，民心未孚而犹存怀疑之时，变革大多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如中唐顺宗贞元时，王叔文集团谋夺宦官及藩镇兵权，本是符合历史进步的好事，但革除弊政，却操之过急，不仅小人暴跳如雷，狼唳狗噬；就是较为正直的士大夫也同样犹豫观望，不敢支持，所以永贞改革很快失败。因此，《彖》称"革而当"，说明卦辞之"悔亡"，实是在"元亨利贞"的变革顺利的光环下，居安思危，并对人们提出了应该在顺利时警惕革而不当之"悔"。至理

名言，洞察生活的辩证法。又《彖》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仍然是从上下卦的关系看问题。下离于象为中女，上兑于象为少女（见《说卦传》）。以家庭为喻，中女，犹如今天的新婚少妇；少女，则在家中得父母百般宠爱的小姑。在封建社会中，姑嫂不睦，矛盾重重，早已司空见惯，这就在二女自然属性方面的同性相斥之外，更增添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其志不相得”，则其家庭，非“革”不可，要么休嫂，要么嫁姑，家庭才能有所变化而重新和合。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巩，原义为巩固，这里引申为牢固维系之意。黄，旧注谓“中色”，黄、张《译注》云：“黄，中之色，喻持中驯顺。”从阴阳五行的角度来分析黄为五色之中。但阴阳五行之说始起于战国，如此解释似乎不太合乎实际。因此，“黄牛”按字面直解即可。爻辞是说，初九，用黄牛的皮绳加以坚牢维系，以免盲目变革。原来，初九处《革》卦之始，其性阳刚躁急，虽然阳处阳位得正，但上无九四之应，前进乏助而内无实力，又处下离之初，离象为火为电，急于前进变革而又不顾条件是否成熟，这就容易使变革之事胎死腹中。因此，必须用坚实的黄牛皮革加以牢固拴系，以免盲动躁进而自致咎害，贻误整个变革大计。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于是在变革条件远未具备之时，大力推行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犹如《革》卦初九的阳刚躁进，其用心似乎良苦，但其效果却极其严重，不久即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大衰退，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而毫无抗灾能力，满目萧条，令人心酸！这从反面说明并非一切变革都是好的，美好的愿望一定要和实际效果相适应。人无远虑，则有近忧，变革之事更是如此。所以《象传》发挥爻义云：“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在条件尚不成熟、人们思想犹豫怀疑而不可以有为之时，如果盲目推行变革，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巩用黄牛之革”，正是对于刚劲过头的躁进者的严重警戒。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爻辞是说，六二，在矛盾即将转变的适当时机——己日，努力推行变革，前进必致吉祥而无咎害。六二阴居阴位得正，上与九五之君阴阳相应，又处下离之中，离象为日、离中之象，如日中天，正是推行变革条件逐渐成熟完备的标志。因此，选择适当变革的时机——己日，勇敢推行变革，必然功德圆满，吉祥如意而无咎害。故《象传》称“己日革之，行有佳也。”行有嘉庆，与变革条件成熟而及时把握时机有关。但并非条件成熟，就可盲动胡来，而是仍然应当审时度势，故爻辞称“己日乃革之”，“乃”者缓辞也，审时度势、处理好变革中的上下左右各种复杂关系的一种新说法也。在全卦中，六二居大臣、宰相之位。六二以中正文明（按：下离有文明之象）之臣，上遇九五阳刚中正之君，君臣际遇，

阴阳呼应，似乎应是前程似锦。但在旧社会中，推行变革时的实际人事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心怀诚信而正大光明，上有神宗皇帝的宠信，但是，熙宁变法的全面推开，仍然碰到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这与荆公不善处理各种复杂关系而又刚愎自用有某种必然联系（当然不是其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此时之王荆公，虽然他读《易》颇有心得，但于《革》卦九二"己日乃革"之"乃"，有所疏忽，未能很好地审时度势。杨万里《诚斋易传》云："乃者，缓辞也，后而不先之辞也。中正文明而济之以阴柔故也。惟其缓而审，故以征则吉，以行则庆。故季孙问二邑之叛，然后孔子可以陈堕费之言。"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贞厉，黄、张《译注》以为"守持正固防备危险"；但《周易折中》称引龚焕之说："九三以过刚之才，躁动以往则凶；处当革之时，贞固自守则厉。惟于改革之言，详审三就，既无躁动之凶，又无固守之厉，得其时宜，所以可革也。"二说于义皆通，但比较而言，龚说为胜。革，指有关推行变革的计划和议论。就，成也。爻辞是说，九三，急于前进以求改革，必有凶险；但在该当变革之时，只思自保而仅个人守持贞固，则也同样是危厉之道。要推行改革，就要有耐心，以诚信态度来详细审察变革计划，一而再，再而三，直至民众信任而行之不疑。从爻位爻象看，九三阳处阳位得正，又与上六阴阳有应，该是一个吉爻，为什么反而有"征凶""贞厉"之象呢？原来，看爻位爻象不能只看其一而不及其余。九三与上六有应，上六位处上兑之口，有民众纷纷议论之象，故称"革言三就"。九三在全卦中，已升至下离之上，离有明象，正是革事小有成就之际。但九三以阳刚不中而又自谓其明而躁动急进，民众对变革计划尚有犹疑，怎能不生重重阻力而致"征凶"之难？九三不患不刚，患在太刚；不患不明，患在自以为明，是刚明而过中之象，而不把民众的"革言"看在眼里，这样的变革，即使出于好心，也会事与愿违。反之，只是一味退缩持贞自守，同样无法防其不思变革的危厉。因为下离之三，已处变革之事小有成就的阶段，怎能因暂时的困难而不思继续前进呢？故明来知德《周易集注》云："革言者，革之议论也。正应兑为口言之象也……就者，成也。三就得，商度其革之利害可否至再至三，而革之议论定也。离居三，三就之象也……当革之时，不容不革，故必详审其利害可否至于三就，则人信而相孚，可以革矣！"从这角度看，九三也非凶爻，如善处理，获民众信任、支持和拥护，则可致变革之吉。故爻辞称"有孚"，实是要求推行变法时必须大造舆论，家喻户晓，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那么，一旦掌握了民众的自觉支持，则为下一步的深化改革的成功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革也；改命，即革命。爻辞是说，九四，悔恨消亡，以诚正的态度实行

革命，必致吉祥如意。从爻位爻象看，九四已从下卦升至上体之初，是从革的小有所成，将要取得大有所成的微妙转化阶段。九四以过中之阳处阴位失正，又与下无应，宜其有悔。但当革之时，却能以阳刚之质而行其谦柔之道，具乾乾之德而自强不息（按：九四与九三、九五互卦为乾，故云），革而有当，宜其悔恨消失也，故爻辞称“悔亡”。从全卦看，下体三爻不轻言革，必三议三就致其孚而始言革；四则脱离下体而升至上卦，处水火之际，乃革道大行之时，故进一步而深一层，言其有孚而始言“改命”——也即奏响了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序曲。所以《象传》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也就是说，革命的理想将要实现。宋朱鉴《朱文公易说》卷五称引朱熹师生问答之言，云：“问：《革》下三爻有谨重难改之意，上三爻则革而善，盖事有新故，革者变故而为新也。下三爻则故事也。未变之时，必当谨审于其先；上三爻则变而为新事矣，故渐渐好。先生云：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谓乾道乃革也，是到这处方变了。”又：九四是近君大臣之位，例之以史，如伊尹之辅商汤放夏桀，吕尚之助周王而诛殷纣，此乃顺天应人、“有孚改命”之吉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虎变，《象传》说是“其文炳也”，是从虎皮斑纹，文章彪炳，其变日新着眼；而《周易集解》称引马融之言曰：“大人虎变，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二说皆通，可加糅合而灵活运用。爻辞是说，九五，大人就像猛虎一样，斑纹彪炳，文章日新，人所共仰，并以其猛虎般的尊严威势，果决地推行变革，其事业是水到渠成，光辉日新，不用占筮问疑，人皆知其心存诚信而无不敬服。从爻位爻象看，九五阳刚中正居尊位而为《革》卦之主，又九五下互三、四为乾（☰），乾有大人之象，按《易》例，龙虎又为大人之象，故爻辞以“大人虎变”为喻。大人以其阳刚之才，中正之德，公忠体国，以民为心，当革之时，毅然推行变革之道，事无不当，人无不信服，故又称“未占有孚”。《革》卦以孚信为主，不仅要有孚于内，而且须有孚于众，所以九三、九四皆以“有孚”为言。直升至九五，革道大成，则有未言而信之事，“有孚”之美，至此无以复加，故爻辞称“未占有孚”。故宋郑汝谐《易翼传》曰：“革之道，久而后信。五与上，其革之成！五阳刚中正居尊而说体（按：上卦兑，兑性喜悦，故云），尽革之美，是以未占而有孚也。凡革之初，虽圣智者难之。盖事功未见其成，而人情难与虑始，信之者寡矣。五，革之成也，其文晓然见于天下，道德威望而可信。舜之法度彰礼乐著，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太平。”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豹变，《周易集解》称引陆绩曰：“兑之阳爻称虎，阴爻称豹。豹，虎类而

小者也。君子小于大人，故曰豹变其文蔚也。”（按：上卦为兑，故云）清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卷六进一步解释：“豹似虎而小，面白毛赤，黄圆文，有黑如钱，又如艾叶，居山隐雾，泽其毛衣。言豹多称玄豹，以黑文多也。”小人革面，程颐云：“小人昏愚难迁者，虽未能心化，则亦革其面以从上之教令也。”（《伊川易传》）据此，则谓小人面顺而心不革。但《周易折中》案语则不同，云：“革面者，亦非但革其面而不能革其心之谓……王道之行，则仁义成俗，而心亦无不革矣！”二说相较，《折中》之说为胜。世界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若不心服，世界何能太平？则其所谓“革”者，徒扰民耳！故《革》再三称“有孚”，则是受民众（按：统治者谓之“小人”）信任之谓，心如不服，何来“有孚”？爻辞是说，上六，君子如斑豹奋威而大力帮助变革，就是小人也皆洗心革面，此时革道已就，如若继续前进就有凶险，而居守正道巩固已有变革成果则吉。上六位居《革》卦之极，处矛盾转化之际，在革道已成之时，继续盲目推行另一套，则经九五虎变而获得的已有变革成果，将因此而丧失殆尽。于此可见，变革是有目的、有分寸的，要看具体的条件而定，超越阶段，则一切已有的变革成果将化为乌有。如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互助组、少数自发的初级农业社，适应当时农村经济、政治变革的需要，农村的国民经济恢复很快。但后来在1958年，人为地强行人民公社化制度，亩产数十万斤的天方夜谭终于出现，一下子把农村甚至是全国推入饥寒困迫之境，不仅是已经取得的变革成果丧失殆尽，而且将中国经济拖后了数十年。上六“征凶”之戒，能不引起人们警惕？这从反面说明了“居贞”守正是深化改革的必要过程。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也是如此，一味的高速度，每年国民经济提高百分之十几，则可能逐渐形成泡沫经济，如不适当加以宏观调控，也将产生严重后果。变革过程中的宏观调控，必不可少，此犹上六之“居贞吉”也。

变革之道，不仅是自然规律，同时也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就以农作物的品种来说，种子如不改良，就会退化，比如西瓜的甜份越来越差，苹果则愈来愈酸，但一经变革，优化品种，则重新成为人人喜爱的水果。人也一样，必须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与探索，不断地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

现代作家刘心武对《革》卦的认识颇生动，其长篇小说《风过耳》，写王逸居士受人之托，为女士陈梦新用《易》筮算命，“王逸占出的，是从‘泽火革’经过三爻变化而达到‘泽雷随’的一副卦象，他解释说：‘《革》卦的卦辞是：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简而言之，这是个好卦，意味着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估计那位陈梦新女士，经历过这一回的丧父之痛，反而能够使她的生活，来一次革新。但变爻是‘九三’，‘九三’的爻辞是：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简而言之，就是这位陈女士虽有可能革新她的生活，但她的行动，将会遇

到险阻，她所坚持的原则，也会受到挑战，她必须反复争取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开创出一个新局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总之，《革》卦六爻的变化发展，实际是对变革过程的模糊概括，如《周易折中》称引龚焕之言云：“初言巩用黄牛，未可有革者也；二言己日乃革，不可遽革者也；三言革言三就，谨审以为革者也。——皆革道之未成也。四言有孚致命，则事革矣；五言大人虎变，则为圣人之神化矣；上言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则天下为之丕变，而革道大成矣！”

鼎

卦第五〇



鼎食以烹在新人

《鼎》卦（䷱）第五十，次《革》卦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反转颠倒的综卦，已示其相生相续的兆象。《序卦传》说："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故布新，可以取喻的物象很多，为什么《周易》作者偏独取鼎以入卦呢？原来，在古人眼中，鼎为非常之物，予以特别的重视。烹饪煮食，化生为熟，化腥为甘，化硬为软，直接养人而成其生命。如杨万里所说："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勋。革洪荒而新万法，孰为革故取新之初乎？孰有大于革茹毛为火化之初乎？一初既立，而万法类从也。"故独取鼎之合水火、调生熟、和阴阳以革而其新功之义；又鼎作为古代一种象征国家社稷权力象征的法器，相传古代夏禹定九州而铸九鼎，此后数千百年，九鼎三迁，夏命革而鼎迁于商，殷商亡而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所在。后秦灭东周并六国而鼎亡。据《左传》宣公三年，楚子观兵于周，周成王使王孙满劳师，"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于此可见，鼎在古代，又是天命所在、国家兴亡的法权象征。从今天所存的青铜器看，勒铭于鼎，事极慎重。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更以铸刑鼎而出名，明文之法，借铭鼎来公布，以便举国遵照执行。所以晋韩康伯注云："革去故，鼎取新。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齐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见《周易集解》称引）因此，中国成语就有"革故鼎新"之言：《革》是猛烈奋其威势而推行改革；《鼎》则是革而有成，自新新人，从而建构了一副新的社会秩序和人生风貌。

《鼎》（䷱），下巽（☴）上离（☲）。卦辞云："鼎：元吉，亨。"或称卦辞"吉，衍文也"（如朱熹《周易本义》、陈梦雷《周易浅述》），可备

一说。卦辞是说，《鼎》卦象征鼎新之义，至善至吉，道路亨通，前景美好。《鼎》卦之体，下巽（☴）象征木，上离象征火，故《象传》云："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凝，聚止也，取其安重之义。《象》辞是说，用木柴烧火来煮食，象征鼎新；君子因观鼎象，效法鼎之居正安重，端居正位、忠于职守并严肃地颁布全体遵行的法令。原来，在古代，鼎为重要法器，其形端正，其体安重，不倾不倚，具端正肃穆之象。所以《象》取以为喻。《论语》载孔子有"席不正不坐"之言，有"非礼勿视"之语，说明古代儒家以"正位凝命"的君子自居。从《革》到《鼎》有个自然发展过程：《革》是改命，重去故，重变革，发现不妥，立即改变，这是由静趋动；而至《鼎》则为定命，同样是改革的运动，但其基本趋势，是由动而趋静，也就是建立稳固的新秩序新法制。所以，鼎革相继，仅知变革而不知定鼎，则将疲于奔命而国无宁日矣。故《周易折中》称引房乔之说："鼎者，神器至大至重。正位凝命，法其重大不可迁移也。"所谓"不可迁移"，不是鼓吹保守，坚持旧陋，相反，它是"定鼎"的标志，是历经痛苦变革之后所获得的稳定成果。而《彖传》则从卦德卦性方面，对《鼎》卦的精神要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析，云："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是的，《鼎》卦直接取鼎器为象以喻，其卦下巽为木，其性巽顺而入，上离为火，木柴燃烧以顺火性，用来烹饪鼎中的食物。这是从鼎的功用而非鼎体本身来加以说明的。如果说《革》之变革是过程，是手段，而实现鼎的功用，以烹饪食物养人，则是改革的丰硕果实。鼎革之间具有连续性，而不可机械孤立地加以割裂。"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鼎有二大功能：一是祭祀天地鬼神，一是奉养贤圣。古代祭祀天地祖先鬼神，是很重要的仪典，所谓"祭惟寡人"，说明祭祀仪典象征了社稷宗庙的存在，但祭上帝以孚，只要心存诚信即可，即使是溪涧边上的野菜也可以用来享荐上帝，如《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当时君子之言，云："苟有明

■鼎



信，涧溪沼址之毛，蘋蘩溞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祭天之上帝，仪典虽然隆重，但其用牲重质，所以《彖》辞只称“亨”；而奉养贤圣，则由虚入实，糟糠不可以养贤才，所以必须烹饪众多美味食品，来养育众多贤才，故《彖》称“大亨”，大即多之谓。于此可见，定鼎布新，也非贤才莫属，不然，何必“大亨”以待？“巽而耳目聪明”，指的是《鼎》卦下体为巽，其性逊顺，上体离为明，内逊顺而外文明，所以称耳聪目明。烹煮食物以养育贤才，使其以逊顺之性，辅助圣明君主，以完成鼎新定命之重任。“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这是从卦主角度来立论，六五以谦虚柔顺的态度对待众贤，上行而居尊，处其中位，而下应九二刚中贤能之臣，犹如鼎之烹物，化生为熟，养育贤人，任用不疑，无为于上，而自新新人。有了新人新面貌，则至善亨通，其吉祥如意自不待言。清陈梦雷《周易浅述》分析《鼎》卦取象，甚为简明，其言云：“《鼎》卦，下巽上离，取其象，亦取其义。取象有二：以全体言之，下植为足（按：初六二断为足），中实为腹（按：指二、三、四均为一画之阳爻），对峙于上为耳（按：六五二断似两耳对称），横亘于上为铉（按：上九一阳横画如鼎杠）。以二体言之，中虚在上，下有足承之，皆鼎象也。取义则以木从火，烹饪之义，故为鼎。”在六十四卦中，《颐》、《井》、《鼎》皆有“养”之义。《颐》卦泛论以言其大概，故《彖》辞称有“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之言；《井》《鼎》则由虚入实；井养于邑里村镇之间，往来行汲者众，是为养民之象；鼎则庙堂之器，尽祭祀燕飨之用，则为朝廷养贤是其注目的重点所在。三卦皆言“养”，但各养其所养，读者自当细辨。又，从卦形的变化关系看，《鼎》（䷱）与《屯》（䷂）是六爻阴阳完全相反的错卦，彼此反对。《屯》卦是云雷为屯，象征事物初生之屯难。从《鼎》《屯》的密切关系，也暗寓定命鼎新来之不易的意思，必须极其慎重地“正位凝命”，才能致其元吉。反之，以为新秩序一建立，就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则有可能转化，重新陷入新的屯难之中而不自知。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倒也。否，病也，这里指废物。爻辞是说，初六，鼎足颠倒反转，对于倾倒废物有利；就像娶了媵妾而生得贵子一般，也就没有咎害。初六以阴处阳位失正，有妾之象；又居《鼎》之最下，阴虚二断如足，其负担最重而又力弱不胜其任，故有“鼎颠趾”之象。但是，上有九四阳刚之应，援助有力，所以逢凶化吉，犹如鼎足颠倒而利于倾倒废物，以便重新纳物烹饪；又如娶妾非正，但可因生子而贵则扶正，故爻辞称“无咎”。这是因败立功，以贱致贵之占，关键就在善于观察矛盾并促其由不利向好的方向转化。又初六处下巽始，巽有长女之象，长女为妾而非正室，原为可卑之事；但《易》卦重变，巽之错卦为震（☳），震

为长男，妾生长子以主鼎器，此所以为妾以子贵而得扶正之兆。又震为足，好动，鼎足动而不稳则覆，故又有“鼎颠趾”之象。有人据此爻辞爻象，以为“凡事须用与他翻转了却能致利”，这是误会《易》卦之变，故作翻案之语。朱熹批评说：“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祸致福，所谓不幸中之幸。盖鼎颠趾本是不好，却因颠倾出鼎中恶秽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转鼎趾而求利也。”（朱鉴《朱文公易说》卷五）初六之“无咎”，逢凶化吉，因其处鼎新特殊环境之中，脱离此境，则何能无咎？宋杨万里《诚斋易传》于爻辞爻象有精妙的分析，云：“去恶不尽，良庖无洁清之鼎；去敝不尽，圣人无新美之治。是故不有倾写（泻），不可以尽去一鼎之恶；不有涤荡，不可以尽去一世之弊。《鼎》之初六，天下草昧阴闭之初，犹宿昔滓浊之鼎也。将欲去其故以取其新，可不倾写涤荡使无一毫之不尽乎！故为鼎者，颠覆其趾以尽出其否恶；为治者，涤荡其旧以尽彻其晦冥。否恶尽而贵珍之膳来，晦冥彻而阳光之治起。汤之革夏，必代虐以宽；（汉）高祖之入关，必除秦之苛，布汉之宽也。初在下故为趾，六阴而虚故颠覆，巽为长女而初六居下故为妾。”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实，这里指食物。仇，匹对也，一说在此指上应之六五（如王弼注）；一说是下比于初六（如程颐《伊川易传》）；一说泛称一般忌贤妒能之群小，如《周易折中》云：“此‘疾’字是妒害之义，所谓入朝见疾是也。夫相妒害则相远而不相即矣。然小人之害人也，必托为亲爱以伺其隙，故必不恶而严，使之不我能即而后无隙之可乘也。此只据九二刚中能自守而取此象，不必定指一爻为我仇也。”三义之中，以《折中》之说为胜。即，就也，接近。爻辞是说，九二，鼎中煮有丰富的食物，引起群小的忌妒，但九二持其阳质，刚中自守，严正以对，使群小不能接近我，更无法染指鼎中之实，所以吉祥如意。《象传》解释说：“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从爻位爻象看，九二阳刚居中位，《易》例阳实而阴虚，此鼎在吐故之后，又新纳实物以烹之象。又九二与六五，以中而上下相应，故爻辞称“吉”。但是，鼎之所重，不在其器，而在鼎中之实，上可以荐诸上帝鬼神，中可以育贤圣君子，下可以养万民。九二以刚中之才德，具大臣之正位，上遇合于离明谦柔之主，此鼎有美食之象。但是，鼎中美食，可养君子，也可食小人，奉献给谁？人所关心。因此鼎中美食同时也引起了群小的馋涎，乘隙接近不得而生疾妒之心，也在自然情势之中。但九二以其笃实光辉之德，具不动之志，小人无隙可乘，此所谓“不我能即”也，美食上奉圣贤而下养万民，而独不分食于小人，有此决心、则如攻城而城无不克，建功而功无不树，此所以致其“吉”也。杨万里以充满感情的笔墨来推之人事，并举例以明：“大哉，九二之实德乎！壮哉，九二之不动乎……一心不可动则万议息。故流言不能动周公，刺客不能动裴度（按：裴度，中唐宪宗朝宰相，元和中，力主

平淮西叛镇，叛镇遣刺客刀劈其首落马重伤，裴度仍坚守其伐叛之议，亲率天子之师，平蔡凯旋而归，号称元和中兴），而周、唐遂安。慎所之者，言谨审而不动也。我一有所之，彼斯乘之矣。惟慎所之，故吉，而终无尤也。”（《诚斋易传》）而从反面看，如以今日经济项目为例，企业经济项目，犹如鼎中之美食，如能审慎所之，公忠体国，民众获益，则利国利民而大吉大利；反之，贪商人之贿赂，或为外国公司蝇头小利所惑，比如所谓帮其子女出国深造等等，项目主持者贪小失大，盲目签约，致使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这是小人乘隙而贪我鼎中美食，小人即我，非凶而何？九二爻辞虽未言其凶，只从正面称“吉”；但《象传》作者所称“惟慎所之”，却又从反面提醒了人们，鼎中美食，何去何从，应该深思，慎而又慎，稍有不慎，则小人无孔不入而抢夺改革成果，必致凶险环生而降灾国家和人民。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革，可向好的方向变化，也可向坏的方向变化，此“革”义取后者，即扭曲变异而非变革。雉（zhì），野鸡。雉膏，黄、张《译注》以为是“野鸡羹”，泛指美味食物。亏，消损也。方，将也。爻辞是说，九三，鼎耳变异扭曲，鼎杠插不进去而无法举以运行，前进道路堵塞，因而人们无法享受鼎中美食；但是，即将降落的阴阳和合之雨，将消除一切悔恨，最终可致吉祥。从爻位爻象看，九三阳刚居鼎腹，阳爻实，故以鼎中食物为喻。但是，九三与上九阴阳无应而失助，改求六五相援，六五又忙于变革以应二，不理三之求，六五为鼎耳，故爻辞称“鼎耳革，其行塞”，九三前进道路颇为艰难，面对鼎中雉膏美食而只能望洋兴叹。上卦离有雉象（见《说卦传》），又三若爻变为阴，则三、四、五互卦为坎（☵），坎有膏象。故爻以雉膏美食为喻。不过，坎又有雨水象，在《易》例中，雨一般取其阴阳和合之义，如《睽》上九爻辞“往遇雨则吉”，《小畜》上九爻辞“既雨既处，尚德载”之类可证。九三虽因上下无应而举止艰难，暂有“雉膏不美”之苦，但其居位，阳刚得正，内质甚美；又三处位，在上下卦之间，具有矛盾转化的契机，所以，终有阴阳和合、解决矛盾的一天，犹如大旱之后必有甘霖，故爻称“方雨亏悔”而“终吉”也。朱熹曾与学生讨论九三之义：“问：《鼎》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按：即朱子）云：他与五不相应，五是鼎耳，鼎无耳动不得。革是变化之义。他在上下之间，与五不相当，是鼎耳变革了，不可举移，虽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阳爻，阴阳终必和，故有方雨之吉。”（见朱鉴《朱文公易说》卷五）说甚简明，可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餗（sù），指鼎中和米的肉羹等美食，孔颖达云：“餗者，糁也，八珍之膳，鼎之实也。”糁（sǎn），以米和羹。其形渥，有不同的解释：一、王弼

云："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体（按：指鼎体）为沾濡。知小谋大，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灾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二、受程颐《伊川易传》影响，朱震云："其形渥，羞赧之象，泽流被面沾濡其体也。"三、朱熹《周易本义》称引晁说之说，云："形渥，诸本作'刑剭'，谓重刑也。"其实，早于晁、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本作"刑剭"，渥、剭二字通假，并引《九家易》曰："渥者，厚大。言罪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罪，刑罚当加，无可如何也。"黄、张《译注》又称引贾公彦疏作"刑屋"，及郑玄注作"屋中刑之"，以为佐证。汉帛书《周易》也作"刑屋"。据此，虽然一、二说于义皆通，但只能略备一说；今以第三说"刑剭"为准，因为义通，而且有其古代版本根据。爻辞是说，九四，鼎足毁折，倾覆了王公所设的美食，因其罪孽深重而受刑罚，前途凶险。从爻位爻象看，《鼎》卦二、三、四爻位居鼎腹，而阳爻为实，故爻辞以"公餗"鼎实为喻，而四之阳实，适当其极，鼎中食极而盈，则有溢出倾覆之患。又九四正从下体升至上体，其位近五，实居大臣近臣之位，权任极重。但是，九四阳处阴位而过中失正，上不亲比六五圣明之君，却是反而下应非正之初六，按《易》例，凡九四下应初六，皆有损无益而非吉象。如《大过》（䷛）九四，因下应初六而生"吝"，《姤》（䷫）九四之应初起"凶"，《小过》（䷽）九四因下应初六而有"往厉"之戒。《鼎》之九四亦然。其应之初，同样不正其位。又初在下，有足象，而四若爻变为阴，则二、四、五互卦为震（☳），震也有足象，其性为动；而九三、九四、六五上互为兑（☱），兑卦有毁折之象（《说卦传》）。种种迹象表明，九四如公庭庙堂之上正在烹煮美食的鼎器，鼎足动而毁折，倾覆王公用以享上帝养圣贤之美食，罪重受刑，故爻称"刑剭"致凶。天作孽，犹可救，自作孽，则谁也无可奈何了。明来知德《周易集注》云："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者，但我本不中不正，而又下应初六之阴柔，则委任亦非其人，不能胜大臣之任矣，卒至倾覆国家，故有此象。占者得此，败国杀身，凶可知矣。"但是，一卦之中，九四"鼎折足"而凶，初六则"鼎颠趾"而无咎，同样折足而吉凶异象，这是为什么？我看，应与其具体处位及其作用有关，如《周易折中》引胡炳文之说："初未有鼎实，故因颠趾而出否；四已有鼎食，故折足而覆餗。"九四之凶，不仅涉及个人命运，而且事关国家民族之兴衰。所以引起人们的警惧。如《汉书·彭宣传》称传主上书皇帝，云："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美食。"彭宣治《易》师事张禹，而禹受之施雠。又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称引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曰："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闻也。"又《宋史》卷二九四《杨安国传》称："（安国）尝讲《易》至《鼎》卦，帝（按：指宋仁宗）问：'九四象如何？'安国对：'九四上承至尊，下应初爻，任重非据，故

折足覆餗。亦犹任得其人，则虽重可胜；非其人，必有颠覆之患。’帝称善。”比如在稍后推行新法的变革过程中，神宗之用吕惠卿为相，徽宗之任蔡京为相，上下党同伐异，朝廷用非其人，新法之败，原因很多，除王安石外，所任非贤，也是重要因素。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金，金属，坚刚之物。铉（tuàn），举鼎的器具，此指可以横贯两耳以移举鼎器的鼎杠。金铉，金属鼎杠，坚刚而鼎无不举矣。爻辞是说，六五，鼎器之两耳色黄而生辉，鼎铉坚刚而无不可举，利于守持正固。六五处全卦之中而居尊位，是一卦之主。阴处君位，态度谦柔以待众贤。以鼎为喻，耳在鼎上，则五位为耳。一鼎之主在于耳，六五虚中，有耳象，如《周易折中》引王申子之说：“耳不虚中，则鼎虽有铉而无所施。故《鼎》之六五，虚其中以纳上九阳刚之助，而后一鼎之实得以利及天下，犹鼎黄耳得金铉耳。”以为金铉指上九阳刚之助。但程、朱注以为指六五与九二阴阳之应。二说于义皆通，以六五谦柔虚中之主，下应刚中笃实之九二，上比坚刚阳实之上九，君明臣贤，则事无不就，犹如耳虚铉实，鼎无不可举矣。鼎可举移，则上可享上帝，下可养圣贤，而恩泽被于万民。又六五处上离之中，离为火，为日，有天下文明之象，故鼎耳以光辉的黄色为喻。不过，因六五以阴居阳，位非其正，所以爻辞又有“利贞”之戒。说明鼎之功效，尤重德之贞正，六五持贞守正，则泽被天下矣。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爻辞是说，上九，鼎耳上贯有刚柔相济的玉杠，大为吉祥，无所不利。从爻位爻象看，举鼎在铉，铉必贯耳方可举移，所以上九有铉之象。在其他卦，上位一般是矛盾激化而转变之极端，并非吉爻。但《鼎》与《井》卦相似，井泉以上汲养人致用，鼎食以取出育贤见功，二卦上爻，正汲出取食以毕其功用之象，所以《井》上六称“元吉”，《鼎》上九谓“大吉”。又《井》之上六，以阴虚勿盖井口而可汲出利人；《鼎》之食人则以阳食为足，故上九阳实致吉。《井》《鼎》二卦之上位，虽皆致吉，但一虚一实，又不可混二为一也。还有，玉铉之设，在生活中，似有不通，玉非铜铁，脆而易折，实际上不可以用来搬运重鼎。这就说明，《易》之为例，取象有所不拘。鼎食之功，贵其五味调和；铉之为玉，不过取其温润而阴阳和合之象，以助鼎实之功。这是古代礼制荐神享人之玉，而非今人眼中之玉。读《易》者千万不可拘泥字面而读死书。

《鼎》之为卦，意义重大，古往今来，影响颇巨。在政治斗争中，古代士大夫常加称引运用。《汉书·楚元王交传》记载，西汉末刘向《上封事》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人

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这是提醒刘汉皇帝，警惕外戚王氏集团之篡夺朝政。所以又说：“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刘向以阴阳五行之说附合人事斗争，以天之“谴告”来解释《易》卦精神，借以讽刺朝政。其理解虽属片面，有迷信成分。但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为拯弊救亡，祭起《易》卦法器，又不是江湖术士的胡言乱语，而自有一定的历史的进步意义。

又如北宋梅尧臣写有《客至诗》云：“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梅尧臣为什么化用《鼎》卦九四以入诗呢？据《蔡居厚诗史》有“梅圣俞述苏子美（按：即苏舜饮）谪官事”一则故事，云：苏子美监进奏院，因赛神召馆中同舍。是时江南人李中舍，因梅圣俞（尧臣）谒子美，且愿预此会。圣俞以为言。子美曰：“食中不设蒸馒饼夹，坐上安有闰舍虞台？”李衔之，遂暴其事于言语，为刘元瑜所弹，子美坐谪，故梅尧臣有诗云云（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小人覆鼎，非仅害己，更是害人不浅。

另外，古人更据“《易》无达占”的原则，对《鼎》卦的认识和理解愈见其生动而深入，可说是多姿多彩，甚至有“断章取义”者。元代林坤（字载卿）《诚斋杂记》卷上云：“孔子使子贡，久而不来。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曰：‘无足不来。’子曰：‘回也哂，谓赐来乎？’对曰：‘无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见明刊毛晋汲古阁本）以舟行无足而至之利，称述“鼎折足”之言，实为断章取义之举，不合《易》卦原有精神，但春秋时的《易》筮，此风颇为流行。如王充《论衡·卜筮》篇载：

> 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逆中必有吉，犹鼎折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贡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诡论之材，故睹非常之兆，不能审也。

子贡析《易》，拘泥字面，死于句下，只知凶之为凶，这是读死书；而孔子则进一步，深入思考其逢凶化吉矛盾转化辩证之理。是否合乎《易》卦本意是一回事，但从思维发展历程看，则孔子之说，更为辩证而灵活，更有可能切合当时形势的实际需要。

震卦第五一



震惧修省拓亨途

《震》卦（䷲）第五十一，次《鼎》之后。《序卦传》云："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因为按照古人易说，八卦之震（☳）象征雷，性为动；在家庭中又可象征长子。古代是以农为本的宗法社会，非常重视血缘继承关系，多以嫡长子为继承人。《周易集解》引崔憬注云："鼎所以烹饪，享于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嫡以为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长子'也。"不过我认为，这一说法恐怕不一定完全合乎《周易》经卦时代的事实，而多是一种后人断章取义的发挥。因为在上古三代，史实可证，并未建立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据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卷十）考证，殷商以前，或兄弟相传，或父子相继，并无固定法制。"传子之法，实自周（公）始……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实际上，即在西周以后，嫡长子制也未必完全得以贯彻实行，如《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诸子争国、兄弟夺位的现象屡见不鲜，更何况是殷周之际的《易》卦时代！这与秦汉以后的封建时代有所区别。倒是《周易集解》引郑玄注云："震为雷，雷动物之气也，雷之发声，犹人君出政教以动中国之人也，故谓之《震》。"比较符合《震》卦的原始精神，在上者雷震奋动，在下者凛然遵行，其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在"朕即天下"的时代，统治者之雷震"发声"，影响极大，其言正则家国以安，其语暴则下民怨叛。于此可见，雷震发声，出言行令，能不慎乎？后来，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每出一言，思虑再三，因为君坐于上，"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贞观政要·君道》）。这是从《震》卦精神所悟到的治国兴邦政治经验的智慧结晶。至于《序卦传》所称的震为嫡长子主祭器之说，虽然可

以参考，但大多是后人根据其所在时代的需要而加以发挥的一种阐释，与古代奴隶制及封建制国家的政权承转制度有关。此不赘述。

《震》（䷲）卦下震（☳）上震（☳），二震重叠，震而又震，而惊雷连响。卦辞云："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虩（xì）虩，恐惧惊顾之貌。哑哑，状声词，言笑自如之声态。匕，勺、匙一类取食的用具。鬯（chàng），祭祀时用的香酒。王弼注："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二者都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物，原来用以泛指宗庙祭祀。震惊百里，黄、张《译注》云："百里，喻地域之广，兼指古代诸侯国以'百里'为封地，荀悦《汉纪·哀帝纪论》：'古者诸侯之国，百里而已，故《易》曰震惊百里，以象诸侯之国也。'"卦辞是说，《震》卦象征声威雷动，前途亨通。当炸雷迭发震响之时，万物惶恐而为之整肃，人自警惕戒惧，人心无愧于内，所以能保其福泽而言笑自如；雷震响动百里，犹如君主政令遍行于诸侯之国，以保其宗庙祭祀而国祚绵延。《象传》从卦象方面来分析，云："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洊（jiàn），通"荐"，再，一次又一次地接连不断，王弼注《坎》所谓"相乃而至"也。《象传》分析《震》卦上下体皆震而为雷之象，说是巨雷炸响而迭连不断，象征雷声震动。君子观此卦象，惶恐戒惧而自我反省，从而避免失误而安命保福。胡炳文发挥说："恐惧作于心，修省见于事，修克治之功，省审察之力。"（《周易折中》称引）而《彖传》的分析发挥则更全面而深入，云："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万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据《说卦传》："震一索（按：即初为阳爻）而得男，故谓之长男。"《易传》成于战国年间，长子继位以主祭之说流行，故《彖》有"守宗庙……为祭主"之说。但是，不论是《彖》辞"恐致福也"之言，或是《象》辞"君子以恐惧修省"，其理解大致相似，皆有居安思危的深入思考，应该说是基本上符合于《易》卦作者的原始精神。从卦体言，《震》初一阳为一卦之主，其初、四两阳爻分处上下卦之始，虽暂居下，但阳刚气清而上升，象征新生之气逐渐上行，而充溢生命活力。所以，《震》体卦画，正呈其因恐而致福之兆瑞，故卦辞于雷震惊惧之后，而有"不丧匕鬯"的福吉之象，诚非虚语。又从卦形看，《震》（䷲）之下震上震，与《艮》（䷳）之下艮上艮，二者互为上下卦体颠倒的综卦，关系相当密切，《艮》象征抑止，雷震而动，则知止其所当止，非福吉而何？据说现在美军正在研究一种着眼于城市战争的先进步兵武器，枪弹附有自动导向的计算器系统，枪一震响之后，子弹自能识别敌我而跟踪追击、矢集敌人，犹如震而后艮、止其所当止之象，敌人惊慌而己方欢笑，故卦辞称"笑言哑哑"的胜利欢乐，非浪言也。由《震》而之《艮》，一动一静，很有生活的辩证法。又《震》的错卦为《巽》（䷸），巽象风，性为入，《巽》卦象征逊顺而无所不入。从《震》之《巽》，六爻阴阳全然相反，而从《易》例看，相反所以相成，二卦之间的关


■范仲淹像

系，同样体现了雷震于上而巽顺于下的精神，雷震而风发，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震》之以巨雷"惊远而惧迩"，借其赫赫声威来改造臣民使顺服君子之政，以巩固其统治，这在统治阶级看来，当然是"震惊百里"而又"不丧匕鬯"的吉祥之兆了。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啞啞，吉。

爻辞是说，当惊雷炸响之后而能自警惕戒惧，慎其所始而保其福泽，必有欢声笑语的场面出现，吉祥如意。初九处全卦之始。和其他卦不同而与《复》卦（䷗）相似，初九一阳虽处位最下，但却阳刚得正，生机勃发于下，并日渐升进于上，以至于充满了生命活力。所以，《震》与《复》卦一样，初九成为成卦之主。因此，卦辞所取之言，即以初九爻辞为其主体组成部分，故其占相似，爻之"吉"即卦辞之"亨"也。胡炳文曰："初九在内卦之内，震之主也，故辞与卦同。盖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为震之主也。"宋范仲淹《易义》云："震雷相从而兴，威动万物，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惧之时也。万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惧于心也，思虑必慎其始，则百志弗违于道；惧于身也，进退不履于违，则百行弗罹于祸。故初九震来而致福，慎于始也。"初震以威达德，功显无穷，影响深远，能不深思再三而慎其所始乎？范仲淹是改革家，所言实中肯綮。但对初九爻辞，晋干宝的具体解释稍有不同，《周易集解》称引其言云："得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来虩虩'，（周文王）羑里之厄也；'笑言啞啞'，后受方国也。"可另备一说。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厉，有二义，一谓危也，一谓猛也，这里糅合二义而用之，如程颐所说："（初）九震之主，震刚动而上，孰能御之？厉，猛也，危也，彼来既猛，则己处危也。"亿，其义有三解：一谓数词之大者，如郑玄谓"十万曰亿"（《经典释文》引），"亿丧贝"则为大失其货贝；一作动词，如《周易折中》引郑汝谐之说："亿，度也，度宝货之可丧而丧之。"引蒋悌生之说曰："亿，度也，事

未至未若，而先谋度之谓亿。”一作感叹语气词，如《周易集解》引虞翻之说：“亿，惜辞也。”引干宝之说：“亿，叹辞也。”亿通于“噫”。三说于义皆可通。但据同卦六五爻辞有“亿无丧”之言，意谓大无所丧，也即万无一失的意思。所以三义比较而言，似乎应取数词之“大”的第一义。跻，升也，登也。九陵，山之极高者，“九”以喻其极，如“九天”、“九泉”、“九霄”之类。逐，追取也。七日得，参前《复》卦辞之注释及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见《观堂集林》）。爻辞是说，六二，初阳雷震骤发，声威猛烈，御之则有危厉；因此而大有损失而丧其货贝，故跻升于高山之上以远避其害，不再去追逐已经丧失的钱财，过了七日（按：指一定周期）自然会失而复得。《震》卦六爻，二阳四阴，初、四二阳为震之源，二、三、五、六诸阴则受震之爻。初为成震之卦主，其震之发，猛烈骤发，声威赫赫，孰能御之？而六二上无应于五而乏助，又最近于初而凌其刚劲，故有“亿丧贝”之危厉，占者其象如此。二若阴化为阳而互三、四，则变互之卦为离（☲），离有蚌贝之象，故爻辞以“丧贝”为喻。又二、二、四正互之卦为艮（☶），艮有山象，故爻称“跻于九陵”。但六二处下震之中，阴居位正，以其阴柔谦退中正之德，宜其能够坚持中正自守，无视财货之丧，知幾而远避震害，此善处震之大方者，所以能逢凶化吉，“勿逐”而“七日得”也。如始则因势之危厉，堕甑担而弗顾；终则因刚险之动势已消致吉，而有去珠复还之利。得之与失，与险之与易，实相反而相成。故杨万里《诚斋易传》云：“时有险易，则势有诎伸，故天下无常险，亦无常诎，险过则易，诎甚则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刚，险也；以六二之静，应初九之动，诎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厉，勃然而动，骇然而来，何可当也！六二才与位俱柔，若不胜其愤，起而逐之，奚而不丧？惟能以柔避刚，以静驯动；远避而勿逐，俟之久而刚自衰，则吾无丧而有得矣。险者易，诎者伸，非有得乎？（汉）高祖避项（羽）而入汉中，光武避正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义矣！”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其义旧注有歧解：一谓“苏苏，神气缓散自失之状”（程颐《伊川易传》，朱熹因之），人的精神一失，则虽活而实处半死之态；一谓“死而复生称苏”（《周易集解》引虞翻之语），明来知德《周易集注》因之而发挥：“阴为阳所震动，三去初虽远，而比四则近，故下初之震动将尽，而上四之震动复生，上苏下苏，故曰苏苏”；一谓苏苏为“不安”之貌，如《经典释文》引郑玄之说，王弼注谓“故惧苏苏也”，实承郑说而为言。三解于义皆通。但考《象传》云：“震苏苏，位不当也。”则“苏苏”明显是贬义，“死而复生”之说应予排除；又据爻辞“震行无眚”之言，则六三又非凶丧之极，故程、朱“神气缓散自失”也可排除；比较之下，又“不安”之貌较为妥帖。爻辞是说，雷动之时，震惊不安，但若因震警戒前行而去其不正，则又可避免灾祸。从爻位爻象

看，六三阴居阳位失正不中，貌若自失，故雷发之时呈“震苏苏”之象，关键在其内质阴柔不正。又六三与九四、六五互卦为坎（☵），坎性险陷而有“多眚”之象（《说卦传》），前行必生灾难。但是，六三若能阴化为阳而变正，则上互之卦由坎变兑（☱），兑性喜悦，则三因变正而致悦，故爻称“震行无眚”。《周易折中》引杨启新语云：“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图也，此恐惧所以修省也。”于此可见，六三爻辞爻象提醒我们，人因其自身内在的缺陷而致病眚，但是，若能在事物发展的运动中，自觉改过就新，贞正自持，则可能消灾弭难，逢凶化吉，关键还在于因势利导而行归中正。己非邪而内贞正，则处变不惊，何眚之有？以汉史为例，沛公刘邦先入关中，见秦宫室帷帐子女之美，心欲安之以犯项羽，若果行此非中非正之私，则失天下心，以之抗楚，如以卵击石，必陷坎险，非“眚”而何？但是，他终于听从张良、萧何诸贤之计，居关中公布“约法三章”而孚民心，又以强弱不敌，因“震行”而入汉中以避项氏，其所作为，日趋于正，故灾难自消而有“无眚”之悦，为日后汉兴楚亡奠定了根基。

九四，震遂泥。

遂，一谓“无反之意”（程颐《伊川易传》、朱熹《周易本义》），一谓“遂”通假于“队”，即坠也（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二说于义皆通，小异而大同。爻辞是说，九四，雷震之时，惶惧不安，失陷于泥泞之途而无法自拔。从爻位爻象看，《震》卦二阳分居上下卦之初，为什么初九致其福吉，而九四却有“遂泥”不能自拔之陷呢？一吉一凶，其象何来？原来，初九在二阴之下，动得震之本象，为震卦之主而见震之用，此其所以致吉。九四虽亦在五、六两阴之下，但其位已由下卦升至上卦，下面又有二、三两阴夹击，以一阳而居于四阴夹击之中而有处处成坎之象，坎有泥水之象，震行陷坎，则如坠泥泞之中而不反也，故其凶险可知。但是，九四“遂泥”之凶，是由其内在本质所决定，阳处阴位而失正过中，其凶象尽露，如程颐所云：“居震动之时，不中不正，处柔失刚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阴之间，不能自震奋者也……以不正之阳，而上下重阴，安能免于泥乎……处震惧则莫能守也，欲震动则莫能奋也，震道亡矣，岂复能光亨也？”故《象传》批评九四是“未光也”，九四以其不正过中之德，而失震之道，“身既不安，岂能安众”（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引《史征口诀义》载汉郑众之语），又怎能把自己那阳刚劲健的理想加以发扬光大呢？《汉书·五行志》载春秋事，鲁庄公十七年冬，“是时，庄公将取齐之淫女，其象先见，天戒若曰，勿取齐女，淫而迷国，庄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叔（按：指庆父和叔牙），终皆诛死，几亡社稷……京房《易传》曰：‘废正作淫，大不明，国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国多麋。’”《汉书》李奇注曰：“从三至五，有坎象。坎为水，四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于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为溺于淫女，故其妖多麋。

麋，迷也。”

六五，震来往，厉；亿无丧，有事。

来往，谓当震动之时，忙忽于上下往来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往谓乘阳（按：指六五乘凌九四之阳刚），来谓应阴（按：指下与六二同阴相斥而无应，或指与上六的关系），失位乘刚，故往来厉也。”亿无丧，即大无所丧，无所丧失之义，参六二爻辞注。有事，“谓有事于宗庙社稷也”（《折中》引俞琰语），按，春秋时祭祀皆曰有事，故云。爻辞是说，六五，当震而雷动之时，忙于上下交通往来，危险非常；但若坚守其谦柔中道，则无所丧失，而能保其宗庙祭祀。六五之厉，就是震之恐惧。六五虽然以阴处阳而非正，忙于上下往来则有凶厉；但其位又居震中，是为尊位，以柔居刚，是谦柔虚中之德，若能去其非正而持守中道，则不仅能免于震厉，而且合震之道而保其“无丧有事”。在《易》卦中，“中”与“正”这两个概念，古人似乎重“中”超过于“正”。如程颐所分析：“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伊川易传》）〔又如《艮》卦（䷳）六五，其六五明显是居中而非正，但《象传》却称：“艮其辅，以中正也。”这是因其“中”可兼“正”的缘故。〕故《象传》称其“其事在中，大无丧也”，在天下纷乱震动之际，六五之才虽不足以济变，但守其谦中之德则仍可保其祖宗基业。如明来知德所分析：“天命未去，人心未离，国势未至瓦解也。有事者，犹可补偏救弊以有为也……占者不失其中，则虽危无丧矣。”如唐玄宗，虽居九五之尊，内而穷奢极欲而沉湎美色，外则穷兵黩武而战事频兴，当风雷震荡之际，极其上下往来，行非其正，故致安史之乱，其凶厉立见；但叛事起后，又罪己守中，惩前毖后，而着眼于平叛之事，人心未离而国家不亡，故与其子肃宗，终平大乱而保其唐室之江山社稷，此乃不幸中之万幸，虽危无丧，是爻辞所称“无丧有事”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程颐以为“消索不存之状”（《伊川易传》），陈梦雷因之，以为“神气不存也”（《周易浅述》）；黄、张《译注》则引郑玄曰：“犹‘缩缩’，足不正也。”形容惧极而双足畏缩难行。二解于义皆通，但是比较而言，似以郑玄之说为胜。因为震性动而勇于行。当震之时，行则畏缩，视则彷徨，从不同角度，形容上六的惊恐不安之貌。矍矍，彷徨不安之状。爻辞是说，上六，雷震惊惧之时，行步畏缩不前，视瞻惶惑不安，前进必致凶险。但是，若能在震灾方才降临邻居而尚未及己之时，瞻前顾后，提前预防，以自警戒，则可无咎害。此时假如要求过高，勉强追求阴阳和合之婚姻，必生争吵怨言。从爻

位爻象看，上六以阴柔之质，而升至震之极，下无其应而乏助力，则不胜其任，而偏当震极之际，下临五爻之汹动，宜其一时惊惧惶恐而不知所措，犹如立己千仞悬崖之岗，追兵四至，仍欲前行以避敌，往前一步，则粉身碎骨，非“征凶”乎！上六处震极，震“为决躁”（《说卦》），性刚决而躁动于行，故有不顾危凶而盲目前进之象。又上六爻变为阳，则上卦由震化离，离为明，有目视之象，故爻辞以“视矍矍”为喻。又离一阴居中为中女，震处上卦一阳居下为长男，男女相遇，故爻以婚媾为喻。又六三、九四、六五互卦为坎，而六居震极，来知德据《易》例分析说：“凡震遇坎水，皆言婚媾。”验之诸卦，信然。如《贲》卦（䷕）之六四，其二、三、四下互之卦为坎（☵），三、四、五上互之卦为震（☳），震坎相遇，故六四爻辞有“匪寇，婚媾”之言；《屯》（䷂）下震上坎，其六二爻辞“匪寇，婚媾”，六四爻辞“乘马班如，求婚媾”；《睽》卦（䷥）上九爻辞称“匪寇，婚媾”，上九变阴则上卦由离化震，而六三、九四、六五则上互之卦为坎，仍然有震雷遇坎水之象。但在《震》卦上九，则因震极将变，矛盾激化，故虽有婚媾而难以和谐，故爻辞称“有言”，即男女婚姻之事，矛盾很深而互有怨言，终不能见“笑言哑哑”而相安无事也。但是，爻辞言外之意，不仅有批判，而且又指明其出路，如杨万里《诚斋易传》所言：“然圣人一则以惊，一则以安：曰征凶，言往则凶，惊之之辞也；曰无咎，安之之辞也……然圣人虽安之，而终再以三警之，曰：汝虽无咎，而邻之苏苏，亦可不畏不戒也？天下之祸，莫大乎于其邻，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邻者必玩也。虞受晋宝以灭虢，不知乃所以自灭；楚（怀王）听秦赂以伐齐，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吴亡而晋国吊，其知所谓虽无咎，而畏邻戒者。”杨氏所见，颇为中肯而启人深思。

写作此卦，正当雷雨暴作之时，九霄惊雷，响彻天地，威力无穷，遇之则无坚而不摧，谁能御之？此时居守屋内，尚且不安，更何况是征行在外者，能不惶惑惊惧乎？但只有惊恐不安，或愚不知危而盲目前进，则一切无济于事而必致“征凶”之难；惟有居安思危，及早预防，因震惧于外而内自修省，知幾而兴作，则或可免其灾眚而致无咎，如《象传》所言，“君子以恐惧修省”，是善于处震之道而促使矛盾转化的关键。震惧之时，并非绝望，其希望之曙光，在于自己的争取，即持其中正之道而行。如震初阳刚之正，而有“笑言哑哑”之吉；六二中正而有失而复得之象；六五具其谦柔虚中之德，而能“无丧”而保其宗庙之祭祀。逢凶化吉，不是因其正，就是来自中，于人于事，莫不如此。反之，则自取咎亡之道也。《汉书·五行志》载：“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透过古代“天人感应”的迷幕，可从反面给人以启迪。

艮

卦第五二



时止则止光明行

震者动也，理所当行，动之时也，于是当行则行，雷动风发，惊天动地而大力推动变革。但是，运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果长跑运动员一直跑个不停，动不知止，则运动不仅无益于养生，而且有损于生命。就是奥运会的马拉松赛冠军，长跑耐力世界第一，也不可能漫无休止地一直坚持跑个不停。所以，有动则有静，有行必有止，这就是天理之自然。因而六十四卦在《震》之后，就是《艮》（䷳）第五十二。《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意思是说，雷动奋发，虽然可能大有作为，但是，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不可能永无休止地鼓劲大干，只劳不逸，只做事不休息，什么人吃得消？就是铁打的汉子也要倒下。故《礼记·杂记下》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但汉武帝不懂"文武之道"，他统治数十年，大肆开疆拓土，年年征战不休，结果是几乎耗尽国库积累，民生凋敝，百姓流亡，国力大损，种下了祸根。这是在上者雷动不息，好大喜功，震发万民而疲于奔命之故，应引以为戒。所以《序卦传》说是雷动震奋的激烈运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必须紧跟着《艮》卦出来加以适当的抑止。因为艮卦象征山，山体厚重镇静，其性为止。不过，《艮》之抑止，其目的在于制止盲动及胡作非为，而不是禁止一切合理的行动和行为。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人无作为，哪还有像人的样子呢？故《彖传》云："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意思是说，艮卦之义在抑止，所谓"止"，是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无论是运动或静止，都是顺其自然之理，合乎运动规律而不失其时。所以抑止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抑止之道，前途是光明灿烂的，其所谓"止"，不是生命的结束，而

是新生命的加油站。《彖》辞已揭示了行止动静之间的矛盾及其辩证关系。

《艮》卦（䷳）上艮（☶）下艮，是纯八卦重叠之一。全卦六爻，三、六同阳而对，初二与四、五同阴相斥，总之，六爻皆阴阳无应，不利于上行前进，而有知止不行之象。其卦辞云："艮（按：原无此"艮"字，今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据《易》例而校增，是）：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据旧注，艮，止也。卦辞是说，"《艮》卦象征抑止：抑止于背后以避免被觉察，不让身体直接面向应当被抑止的私欲；譬如行走在庭院里也两两相背，互相不见对方被抑止的邪恶，必无咎害"（黄、张《译注》）。《象传》从卦象方面释卦义云："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卦下艮上艮，是纯艮之卦，艮象为山，其性静止，《艮》卦两山重叠，故称"兼山"，抑止之道，一山已可抑止，更何况是二山重叠地加以抑止呢？"兼山"之止，止义弥大，从而引起人们对于生活的深刻哲学思考。而从卦形卦体看，八卦之艮，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阳居二阴之上，阳爻性动，上进而至于上极，则自然而知止，并以此而镇静下面二阴而使之知止。故朱熹《周易本义》云："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自下升，极上而止也。其象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状，亦止于极而不进之意也。"原来，坤（☷）三变正而化阳，则是艮（☶），坤象为地，地上有阳，则隆而为山，山巅之极，无可以上升之地，人之攀行，至此自然知止其步，故朱子云。又《艮》卦和《咸》卦一样，是以人的身体自下而上诸器官以为喻。古人以为，身与背一前一后，身之前有耳目口鼻，都是有知有欲的器官，而背之后则什么也没有，无视无欲。爻辞"艮其背，不获其身"，是静之止，这不是抑止其背、不许动弹之义；而是取其背后不见可欲，即预先加以抑止之义，也就是防患于未萌之际，止得其所的意思。"行其庭，不见其人"，是动之止，即行而知其所止之义。据《说卦传》，艮卦有"为门阙"之象，故爻辞以门庭为喻。如果说静之止是"艮其背"而无我的话，那么行庭院中、目不斜视而不见外人，也就是动之止。小小庭院之中，人们行走其间，怎么可能不见其人呢？实际上，就是强调抑止私欲之后，大公无私，心中无物，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扰，因而虽见如其未见，犹如视而不见，心中忘我而无物，故称"不见其人"。如宋陆九渊所说："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杨万里更具体举例说："君子观贞之象，于是得忘我之学；观悔之象，于是得忘物之学。忘我则中不出，忘物则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艮其背不获其身'也。堂马数仞，食前方丈，侍妾数百，得志而弗为，'行其庭不见其人'也。"对于宋儒之所谓人欲观，如果去其封建说教的伦理糟粕，而取其净化灵魂廓然大公的道德精华，则其论《艮》止之道，颇有启迪。如杨万里云："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为止也。时止则止，止也；时行则行，亦止也。非行之为止也，时乎当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虽行，然止乎道也。时乎当止，道乎可止，吾斯止，非吾止，亦止乎道也。"

（《诚斋易传》）这就从哲学高度，更深一层地思考艮止之道。行止皆合于道，则《艮》之卦义，不仅是重视个人自我修养的提高，同时也是用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爻辞是说，初六，脚趾甫动，即加抑止，必然没有咎害，如能长期坚守贞正之道则必致其利。从爻位爻象看，震有足象；又初六处下艮之初，全卦最下，如以人的身体器官为喻，则取于身下之脚趾。脚者主于行走，因而当艮止之时，脚趾一动，马上预见其妄动之态而加抑制，以防止初六犯错误。因初六能防患于萌芽状态之中，当止则止，不失其正。按：初不犯错误，当然也就不会有咎害产生，故爻辞称“无咎”。但是，作《易》者又因初六阴柔难以固守止道，所以又加提醒勉励，故爻辞有“利永贞”之言。止不善之机，必在其初始之时。故胡炳文曰：“事当止者，当于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于始，犹惧不能止于路，而况不能止于始者乎？初六阴柔，惧其始之不能终也，故戒以‘利永贞’，欲常久而贞固也。”这也就是作事之时，必须虑其始而善其终之意。以史为例，汉文帝即位之初，因为喜爱上林苑虎圈啬夫（按：如今动物园之主养虎的饲养员）利口辩捷，于是下诏张释之拜该啬夫为上林令（按：主管皇宫苑囿的官员），释之因此而谏曰：“夫绛侯（按：周勃）、东阳侯（按：张相如）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学此啬夫喋喋（按：原作“谍谍”，据《汉书》校改）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故，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文帝称善，于是在自己犯错误的初始之时，即予纠正，停止了拜啬夫为上林令的诏命。事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治国安邦之道，与口齿伶俐不是一回事，汉文帝因其个人一时喜爱而赐官，实出于私欲而非至公。故张释之极言其害，止其君不善于初始者也，然后文帝最终成其文景之治而青史留芳。张释之谏而文帝止始以善终，如《艮》卦初六之“利永贞”。初六爻义，精神至为重要。

■汉文帝像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腓，小腿肚。拯，有二解，一谓承也，举也，不拯其随，即“不能举步上承本应随从的人”（黄、张《译注》）；一谓救也，如程颐《伊川易传》释不拯其随云：“动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爻辞是说，六二，小腿的运动已加抑止，无法上行拯救过刚不中之九三，而不去勉强追随，所以内心矛盾痛苦而不欢畅。从爻位爻象看，六二居下卦中位，虽上无其应，但在艮止之时，这是全卦各爻皆失其阴阳之应的共同问题。六二该因其中正于止道而致吉祥才是，为什么反而会有“其心不快”的结果呢？原来，二之位，在人身部位说来，该在趾上而限（按：指腰）下，其位为腓，即小腿肚，与股腿之动相比，小腿肚只有随股而动的份儿，而缺乏行动的自由。但从总体位置看来，六二之腓，阴柔质弱又缺乏自我主宰的自由，欲上比九三而随从之，偏是九三过刚而失其中道，已致裂腰熏心之厄，二虽既中且正，但在艮止之时，不可行动，又何补于事？九三因其刚猛傲慢，又怎肯下听六二之忠言？故《象》辞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六二不能救其可止，忠言无人退听，止非其所，因此而处两难之地，产生了矛盾的痛苦心理，也很自然。又六二、九三、六四互卦为坎（☵），坎之象“为心病”（《说卦传》），故爻有“其心不快”之辞。爻称“不拯”，不是不肯拯救，而是救之无益于事。以殷商末年史事为例，比干因忠谏而被暴君纣王所杀，此拯而不随也。又如春秋时孔孟谏君，其道不行，不听则去，而不去勉强追随，此“不拯其随”又一例也。程颐所称“勉而随之”之解，宋潘时举已非之，其师朱熹则肯定潘说而非程说（见《朱文公易说》卷六）。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其心。

限，界限，这里因九三处上、下卦之间而称“限”，并用以比喻人身上下体之间的腰胯部分。列，通“裂”，断裂。夤（yín），虞翻谓“脊肉”（《周易集解》称引），王弼注也以为是“当中脊之肉也”。厉，危也。爻辞是说，九三，因强行制止腰部运动而致中脊肌肉断裂，痛彻肺腑而生熏心之痛。九三已升至下艮之极，离上体只差一步之遥，处艮止之时而急于升进，施止不得其所而咎由自取，其内质之过刚不中而具刚愎之性，应负一定的责任。但是，九三阳居阳位得正，为什么有此危厉呢？原来，九三上互六四、六五得震卦，三位在震初为震主，当艮止之时，却反艮止而主于震动，是违背自然的逆天行事，非凶而何？比如腰部未做任何准备动作，而突然加以激烈运动而扭转其腰肌，继而猛烈刹车而不许腰肌完成其动作，这怎能不致腰肌断裂损伤呢？裂腰之痛，当然就会痛彻心肝了。又九三下互六二、六四得坎卦，三处坎实之中，坎性险陷，三在其中，当然其位陷于凶险而难以自拔。如清陈梦雷云：“九三上下卦之间，有限之象，人身荣卫上下流通，则身舒而心泰。九三以刚限于上下二柔之间，止而不动，如腰脊中强，上下荣卫隔绝，百骸不属，危惧惊心，故有‘艮其限，列其夤’而危厉

熏心之象。”

六四，艮其身，无咎。

身，胡瑗曰：“人之体，统而言之，则谓之一身；分而言之，则腰足而上谓之身。”（见《周易折中》引）爻辞是说，六四，抑止上身不使运动，没有咎害。从爻位爻象看，四已从下体升至上体之始，以人体而论，上体则谓之身，故云。在全卦中，六四处于近君（指五）的大臣之位，应该是职责重大，但他上面不遇阳刚之君，下面缺乏初阳生气之应，在处艮止之时，只能洁身自好，不能止物，犹如乡邻有争斗而闭户，只求自保而难有作为，所以程颐很不满意地批评说：“在上位而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伊川易传》）这也就是所谓占据要津却无所作为的意思。但是，六四既然不称其职，为什么又能保其“无咎”呢？那是因为从总的形势论，处艮止之时，并非奋发作为的时刻；加以六四阴居阴位得正，能正自身而没有私心，能自止于正，而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样，在时不我利之际，安静韬晦，此爻辞所以称“无咎”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辅车，上牙床也。因五位在上卦之中，与人体口牙位置相当，故取以为喻。爻辞是说，控制口舌运动而不使胡言乱语，力求做到发言有条理而秩序井然，这样悔恨就会消失。从爻位爻象看，六五阴处君位失正，柔弱于位，难止群动；又其上互之卦为震（☳），五在震上，震者动也，处艮止之时而反其道而动，故生悔象。但《易》例重中过于正，六五居全卦之中的君尊之位，处中不偏，外虽非正而内实趋正，故《象传》云：“艮其辅，以中正也。”言其因中趋于正也，这是指将来式的发展趋势而言，此所以悔恨会消失也。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人的一言一行与其吉凶悔咎密切相关。《系辞传》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从反面来看，则俗有“祸从口出”之言。古人曾夸张言语的正反面的作用，说是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亡国。与其言而未善，则宁肯“艮其辅”而暂不发言，因此，当处艮止不宜行动之时，能不慎其所言乎？故爻有“艮其辅”之语。但是所谓“艮其辅”，并不是禁人说话，缄默其口，而实是指言不妄发，发则必中。杨万里以史为例云：“故（汤）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齐）威王三年不鸣，一鸣而齐国震惊。”故爻于“艮其辅”后，紧接着就有“言有序”之言。人之所言，若轻发妄言而漫无其序，则悔恨随之；反之，言而有序，则发必当理，悔恨自然无从以生，故爻称“悔亡”也，虽为正面之辞，但味其言外之意，则实际包含了妄言必致其悔的严重警戒。作《易》卦者，思维活泼，正反两方面的意思都考虑到了。但宋理学大师朱熹对六五爻辞的理解，极其严格而近于酷，《朱文公易说》卷六云：“熹尝说贾谊固有才，文章亦雄伟，只是言语急迫，失进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齐说了。宜乎绛、灌之徒不

悦，而文帝谦让未遑也。且如一间破屋，教自家修，须有先后缓急之序，不成一齐拆下，杂然并修，看它会做事底人便别。如韩信、邓禹、诸葛孔明辈，无不有一定之规模，渐渐做将去，所以所为皆卓然有成。这样人方是有定力，会做事，如贾谊胸次，终是闹着事，不得有些事在心中，尽要进出来，只管跳踯爆趠不已，如乘生驹相似，制御它未下，所以言语无序而不能有所为也。《易》曰‘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圣人之意可见。”朱子所释，并非尽对，但作为一家之言，也可作参考，从多方面去打破思维定势。后来清代桐城派文家，又因《易·家人》卦《象传》“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及《艮》卦六五爻辞“艮其辅，言有序，悔亡”之言，重新加以发挥：“言有物”指语言要切合事物实际，内容诚正，毫无虚情矫饰；“言有序”是说语言组织必须讲求条理逻辑，语言紊乱必将影响情志表达，严重者会致其悔恨之祸。孔子主张，“文质彬彬”（《论语·雍也》），“言有物”相当其“质”，“言有序”则宜其“文”。方苞合而为桐城古文之“义法”，其《又书货殖传后》云：“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成文之体。”这又从人事政教，进一步延伸到文学领域，扩大了《易》卦的影响，并且生动地讨论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给人以新的启迪。

上九，敦艮，吉。

敦，厚重笃实也，此指人之道德敦厚朴实。爻辞是说，上九，以敦实忠厚之德来抑止不正当的言行邪念，吉祥如意。在《艮》卦中，三、六两阳爻是抑止阴邪之主力，但因九三处上下卦之交，难止其所当止，故有裂腰熏心之危厉；而上九升至上体处全卦之极位，为成卦之主，王弼注云：“居止之极，极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为人之难，难在善始而善终，很多英雄名流，或晚节不保，令人痛惜悲叹。而上九以阳刚居止之极，上艮之体，由坤隆其实而成，上九一阳，坤（☷）地高隆笃实之极也，其敦厚于艮止之道，自始至终一于公理而无改其初衷，此其止于至善之道也。以人事喻，则疾风知劲草，乱世见忠臣，其高风亮节，如泰山之巅，其厚重之止，岂可以动摇乎？又阳爻高高在上而不为众阴所掩盖，故《彖》称“其道光明”。

总之，《艮》之为卦，以重艮为“兼山”之象，八卦之艮，一阳而居二阴之上，阳动于极则知其所止，阴性则静而安其下位，上止下静，故为艮。观《艮》之全卦，二阳乃止阴者，而四阴则被艮止者。六爻之间，又因时位升降而异其吉凶：九三有裂腰熏心之厉，是因位处上下体间，三之上互为震（☳），当艮止之时，而具震动之性，反其道而行之，是虽欲止人又不能自止，又三之下互为坎（☵），三为坎实，又明显自溺于坎陷之中，故其凶厉可知。上九则因其居止极而自止其所，为全卦表率，以一卦之主致吉。四阴爻中，以被动态度而艮止于下，其所止非出于

自觉之行动，故爻无吉象，而最佳者也仅“悔亡”、“无咎”或“利永贞”，皆寓有作者的劝戒之惧。此全卦六爻阴阳吉凶之大概也。又《艮》为体，从《震》而来，二者互为上下卦体颠反的综卦，故其卦主之吉凶也各异其位。《震》之吉在初，一阳生气逐渐上升而流贯全卦，是为动之主。《艮》之为卦乃《震》之反，故其吉在上九，一阳以其敦厚之实抑止于终而致吉。观《易》六十四，彼此之间，关系复杂，自有规律而奥妙无穷。

《艮》卦精神，内容丰富复杂，读者据“《易》无达占”之理，常可见仁见智，各异其趣。宋儒道学先生以之说“理”，如周敦颐精通佛典《法华经》，他就说过：“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卦可了。”（见《二程集》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8页）糅合儒释二家之“理”以说《易》卦精神。宋理学中的心学先驱陆九渊也是妙语解颐。据其《年谱》载：“复斋尝于窗下读《程易》（按：指《伊川易传》），至‘艮其背’四句，反复诵读不已。（象山）先生偶而过其前。复斋问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终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复斋大喜。”按：程颐以释家“止观”之学来拈出“忘我”之理；陆象山则又进一步提出了“无我”、“无物”，也即物我两忘之境。在思想哲学上颇见精妙。而宋儒中的政治家，又可以运用《艮》卦精神来推行其变革思想，如范仲淹《易义》云：

艮，山相当而各止其所，内外不相与（按：指六爻阴阳皆无其应），上下静止之时也……今其正者，君子理不可动之时也……然止之为道，必因时而存之，若夫时不可进，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纵，斯止矣。止得其时，何咎之有？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与于此乎？（见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卷五）

这是范仲淹为其庆历新政作思想舆论宣传的一部分。“时止则止”云云，从另一方面提出了“时行则行”的变革，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便防止因犯错误而致失败。如“欲不可纵”之止，对于现代社会的反腐倡廉，仍然有其启发意义。

还有，小说家也曾把《艮》卦写进了小说中，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金庸《天龙八部》，写大理国王子段誉误入江南太湖边上的曼陀山庄，被庄主王夫人抓住，几乎处死，后因其善识茶花名品，释为种花之奴，当段誉种完茶花后，非常想见朝思暮想的小姐王语嫣（按：王夫人的女儿），于是他就用《周易》来算命，“把草右手交左手，左手交右手的卜算，一卜之下，得了个艮上艮下的《艮》卦，心道，‘艮其背……无咎’，这卦可灵得很哪，虽然不见，终究无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风波和恩恩怨怨，由“艮其背”一卦开始，展开了一幕又一幕生动的生活画图。作家的如珠妙语，不离《易》卦精神，而又令人捧腹而忍俊不禁。

渐

卦第五三



循序渐进竟其功

《渐》卦（䷴）第五十三，次《艮》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意思是说，事物不可能一直受到抑止而不发展，必然要冲破框框和阻力而继续循序渐进，所以《艮》卦之后就承之以《渐》卦。其所谓“渐”，就是循序渐进的意思。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来看，《序卦》的解释是基本合理的。盲动的确不利于事物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必要时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加以抑止。但是，艮止之道并非永恒，有静必有动，有止必有进，艮止之道是有一定“火候”的——也即一定的时间、环境等特殊条件。如果超越“火候”而久加抑止，也同样违背自然而不利于事物的健康发展。因此，在艮止之后，就必须引导事物向新的光明目标坚定前进。《艮》卦《彖传》早有“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之言，已预示了循序渐进同样是“动静不失其时”的奔向光明之道的必经历程。从哲学上看，事物的发展既有渐变，也有突变。但是，突然的质的飞跃，正是来自日积月累的量变渐进过程。简而言之，“渐”就是循序渐进，是事物健康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故孔颖达《周易正义》云：“渐是不速之名也，凡物有变，移除徐而不速谓之渐。”《孟子·公孙丑上》有宋人“揠苗助长”的寓言故事，拔苗助长，表面看来是禾苗迅猛生长，实际上却因违反了循序生长的渐进规律，这样做“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再以儿童的启蒙教育为例，人们是否有可能往蒙稚未开的幼小孩童的脑袋中，一下子猛然灌输一大堆高深难懂的科学知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比如数学，不让孩子先学加减乘除等基本方法，而要求儿童一下子就掌握开方或微积分，这办得到吗？教育和学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大家公认的客观规律。教育和学习如此，他事又何尝不然？

《渐》卦（䷴）下艮（☶）上巽（☴），下艮象征山，上巽象征木，故《象传》释云："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易》中另有《升》卦（䷭），下巽为木，上坤为地，《象传》据其卦象云："地中有木，升。"《升》卦的地中有木，是说树木萌芽生根而离开地面，开始生长，枝条骤长，日新月异，生长速度很快，所以用以比喻事物发展的迅速上升。而《渐》卦的"山上有木"之象，说的是树木经过迅猛生长之后。"及既高大，则自拱把而合抱，自捋手而干霄，必须逾年积岁"（《周易折中》），用以比喻事物发展必须循序渐进的另一过程。在事物的生长过程中，"升"与"渐"虽然都是生长进步，但却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可混为一谈。程颐释《彖》云："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渐之义也，君子观渐之象，以居贤美之德，化美于风俗。人之进于贤德，心有其渐习而后能安，非可陵节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于人，不以渐其能入乎？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渐也。"这就把《渐》卦精神，从自然世界的生长发展，推衍到社会人事的文明进步，"渐"之时义大矣哉！

《渐》卦辞云："渐：女归吉，利贞。"归，古代女子婚嫁归于夫家之称。卦辞是说，《渐》卦象征循序渐进，就好像女子出嫁，按部就班，循礼渐行必致吉祥，守正持固必然有利。无论是自然世界或人类生活，循序渐进以求生长发展的事物很多，为什么卦辞偏独以"女归"为象呢？这是因为，古人以为天、地、人谓之三才，三才之中，人处天地之中而加以交流，人就是一个自成天地的小乾坤。因此，由解剖人类本身，就可窥天地阴阳变化之道。而人事之中，男女之道为万事之先，人类种族的生存繁衍，社会风俗的文明进步，都与男女婚姻之事密切相关。而在古代，婚礼非常重要，如《礼记·昏（婚）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礼繁多，过程漫长，据《仪礼·士昏礼》明确规定，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大礼节。创作《易》卦的殷周之际，婚礼是否一定如此，因史料不详，难以确定。但以古代三《礼》上推，大概也是殷鉴不远了。《易》中有关男女婚姻之卦，也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一现象。《渐》卦象征渐进，以女子出嫁作比喻，就像女子出嫁按照礼仪要求，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依序渐进，这样就可获得吉祥。在婚姻过程中，非常强调人，特别是女人的持守贞正之道，也就是要求男女必须以礼为正。为什么？《周易折中》引胡瑗云："天下万事，莫不有渐。然于女子，尤须有渐。何则？女子处于闺门之内，必须男子之家问名、纳采、请期，以至于亲迎，其礼必备，然后乃成其礼而正夫妇之道。"这里说明，女子之嫁，必须守贞持正，等待男人以礼来求，这样才是符合正道的婚姻，否则即为私奔。"进之渐者，无若女之归。女归不以渐则奔也。渐者为归，速者为奔。故女归以渐为吉。"（《周易折中》引郭雍说）比如《诗·召南·行露》之诗："谁谓雀无角（噣）？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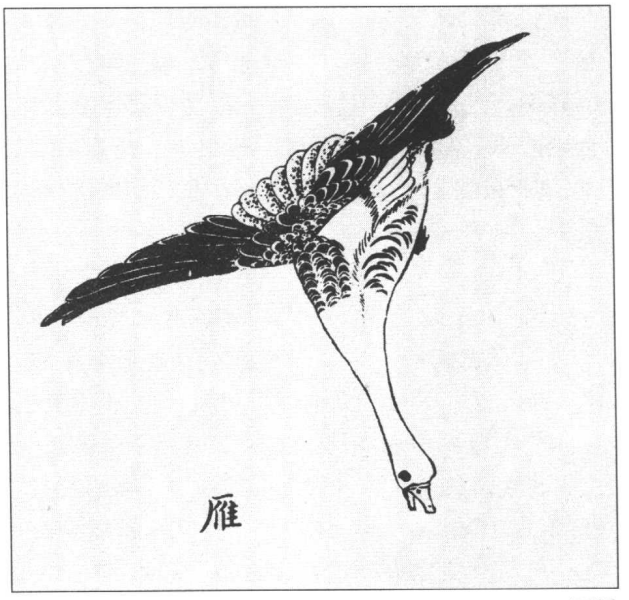
女（汝）从！”一个豪强贵要男子，硬要强娶一个年青女子，女子以其非礼而坚决拒绝。于是该强横男子罗织罪名，致之于狱，但是年青女子“贞壹修容”，以礼自防，并作诗明志，决不后悔。汉刘向《列女传》因之称颂曰：“作诗明意，后世称道。”拒绝不合礼制的婚姻，同样是持守贞正之道而致吉祥。“利贞”之道，并非仅是被动的固持古代礼教内容，有时也可利用礼制规定来反抗男子非礼的强暴。所以《彖传》解释说：“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原来《渐》卦从二爻至五爻，其居位皆正，犹如女子出嫁，循礼渐行，各项礼仪依序展开。坚持礼制，在古代就是明为典型、安邦治国的大事。又六二前进至九五，其位既中且正，皆为美爻。但比较二言，九五为《渐》卦之主，因为古代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男子仍然是一家之严主。故卦辞“刚中”及“往有功”云云，主要是就九五之爻来述卦义。而“止而巽”之言，则是就上下卦体之间的关系来述其卦德的，下艮（☶）性为止，上巽性和顺，顺逊而知其所止，则其行为必然谨慎，依礼而行，其进唯渐，故程颐《伊川易传》云：“内艮止外巽顺，止为安静之象，巽为和顺之义。人之进也，若以欲心之动，则躁而不得其渐，故有困穷。在渐之义，内止静而外巽顺，故其进动不有困穷也。”这就把《渐》卦“女归吉”云云，从单纯的女子婚姻之喻，推广到修心养性的思想锻炼，及兴邦治国的大事上来了，意义可谓重大。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虞翻曰：“大雁也。”（《周易集解》引）干，水涯河边。小子，指初六。爻辞是说，初六，犹如鸿雁飞行渐进徘徊于水边，犹豫地选择栖身之所，一时不得安宁。就像傻小子蒙受诋毁之言，虽有一时危厉，但最终因其坚持循序渐进而没有造成咎害。从爻象爻位看，初六处下艮之初，全《渐》之始，阴居阳位失正，上无其应，阴柔以进而力弱难行。所以取象鸿渐于干，徘徊水涯而不安其所，喻其渐进起飞时的困难；又初六处下体艮中，《易》重变，故艮错为震（☳），震性为动，前进之貌。而二、三、四互卦为坎（☵），坎为水而性险陷，初六震动前进而必陷于前面坎中，故爻称“有言”而致“厉”，其有凶险显而易见。但是，不管是人是事，大抵凡始进之者，未有一蹴而就便能安居其业，始初大多人未之信，谣诼纷起而致“有言”之厉，这似乎是一般规律或必经过程，只要任事者能贵在坚持，循序渐进，日渐披露心扉于群众，则众者久后必因其诚心而见信，众见信则团结一心而力量大增，故爻辞又称“无咎”。又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始进未得显位，易致陵辱，则是危于‘小子’，而被毁于谤言，故曰‘小子厉，有言’，小人之言，未伤君子之义，故曰‘无咎’也。”

但是，卦辞称“女归吉”，以女子婚嫁为象作比；而六条爻辞却皆取“鸿渐”为喻，“女归”与“鸿渐”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原来，古代大夫执贽



■雁

用雁，婚礼亦用雁。李鼎祚《周易集解》释九四《象》辞时说："鸿，随阳鸟，唯女从夫，卦明渐义，爻皆称焉。"可见鸿雁是作为婚礼中的一样必不可少的礼具，在古代早已具有相对确定的特殊内涵。《仪礼·士昏礼》云："下达纳采，用雁。"这是说男子娶妻，首先要向女方致礼，其礼有六，第一礼就是"纳采，用雁"。为什么拿雁作礼品来举行婚礼的第一道手续呢？《仪礼》郑玄注云："礼用雁为挚者，取其顺阴阳往来。"贾公彦进一步疏解道："顺阴阳往来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为阳，妇为阴，今用雁者，亦取妇人从夫之义。"《诗·小雅·鸿雁》郑玄笺也说："鸿雁，知辟（避）阴阳寒暑。"于此可见，古人对于雁的生活规律很清楚，鸿雁是一种避寒从暑的候鸟，常随季节气候的转换而成群迁徙。在古人认识中，寒属阴，暑为阳，所以说鸿雁是"随阳鸟"，喻之于人，则是妇从夫。在古人眼中，鸿雁成了一个以情感物，能够沟通主、客体的艺术象征。虽然上述对于鸿雁的诸多解释，皆晚于《周易》时代，但是，操斧伐柯，取则不远，相信在《周易》时代，也大致有了上述的含蕴。所以《渐》卦爻辞取以比喻"女归"之事。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通"盘"，马融曰："山中石盘纡，故称磐。"（孔颖达《正义》引）指纡回层迭的山石。衎（kàn）衎，和乐貌。爻辞是说，鸿雁飞翔渐进而盘桓在山石之上，安享饮食而和平快乐，吉祥如意。从爻位爻象看，六二阴居阴位得正，又处下艮之中，上与九五之君阴阳相应，能尽臣道而获上援助，故爻辞有"饮食衎衎"之言，呈现了一片安乐和平景象。爻之称"吉"，是来自六二自身内部所具有中正美质，用自己忠于臣职的劳动，换来了九五之尊所赐的禄食，故《象传》云："饮食衎衎，不素饱也。""素饱"，也就是"素餐"，如《诗·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今人余冠英《诗经选》注云："素餐，言不劳而食。素就是白，就是空，就是有其

名而无其实。上文‘不稼不穑’四句，正是说那‘君子’不劳而食，这里‘不素餐’是以反语为讥刺。”但《易·渐》六二《象》辞之“不素饱”，虽受《诗》的影响，却是正面讴歌之辞，而非反语。故胡炳文云：“艮为石，故有磐象。鸿食则呼众，饮食衎衎和鸣。初之小子厉有言，危而伤也；二饮食衎衎，安且乐矣，时使之然也。在初则无应，在二则柔顺中正而上有九五之应也。”（《周易折中》引）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陆，虞翻曰：“高平称陆。”也就是平顶小山包。爻辞是说，九三，鸿雁渐飞至于小山顶上，就像丈夫出征一去而不复还，又像女人怀孕而难以养育，皆有凶险之象；但若能持刚守正，则利于防御盗寇。从爻位爻象看，九三处下艮之上，艮由坤变而来，上之一阳为地之高隆者，艮有山象，故此爻谓之陆。九三虽然刚处阳位得正，但上失其应，又因其居位在上下卦之间，刚锐而急于高飞上进，上无其应则盲动求合于六四，而不问六四之美丑贞节之如何，犹如离群之孤雁，一去而不还，其凶险可立待。而所谓“妇孕不育”，则指三所求合之四，失贞而比附于三，而失夫妇相亲相爱之道，故虽孕而难育。“不孕”二字可有三解：一是因失贞正而无颜生育；一是指分娩时无人照顾以致难产；三是指生下孩子后因其私生而无法抚养教育。其所解释虽然具体有异，但前途凶险则如出一辙。二、三、四互卦为坎（☵），坎性险陷，三处坎陷之中，实实在在，当然凶象尽呈。但是，《易》卦作者的高明之处，就是让人处凶险时也不绝望，所以作者有“利御寇”之戒，指出占者逢凶化吉的一线生机。九三以其过刚过中之资，当渐进之时，却要在上无应援的不利条件下，犯难高翔，如此德行，能不凶险乎？故作者严厉以戒，征、孕皆凶，不可进也；而其利则在止诲邪以利御寇。又三、四、五上互之卦为离（☲），离有光明之象，所以九三要跳出坎陷，奔向光明，希望还是有的，关键还在自己守正渐进。故《周易折中》云：“上下之交，必有谗邪间于其间，所谓寇也。惟能谨慎自守，使寇无所乘，则可以救其过刚之失而利。”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jué），原指房屋上的椽方，这里引申指“横平之柯”，即平整的枝条。爻辞是说，六四，鸿雁逐渐飞歇于山包的树木之上，或者觅到平整的枝条安栖休息，没有咎害。六四处上下卦之间，下艮为山，上巽为木，故以鸿雁飞行渐进止息于山顶高树为喻。六四已从下卦升到上卦之始，位过其中，又凌乘于九三阳刚之上，皆有咎害之象；但是阴处阴位得正，下虽与初无应，而四处大臣近臣之位，上亲比于九五阳刚之君，所以又不乏应援之助。犹如鸿雁，渐行休息于山包高树之上，鸿雁水鸟，栖非其所，又雁趾相连而成蹼，不善握枝，此象原该有

咎，故四下互六二、九三成坎（☵），坎性险陷。不过六四与九三不同，九三阳实而落坎卦陷阱之中，实实在在有凶险之象，而六四则升至坎上，虚受其陷而呈即将脱离之象，故于高木之上又能觅得横柯平枝以暂止歇；加以六四上互九三、九五为离（☲），离象为火、为日，有文明之象，四居离中，而充实其光辉，此所以爻称“无咎”也。《象传》释爻辞云：“或得其桷，顺以巽也。”六四处上卦巽初，巽性为顺，故六四能温顺地上承五、上二阳，得道多助，此又加强其渐进脱险的力量，再次有力地说明了爻辞所称“无咎”的必然性。故《周易折中》案语云：“六四亦无应者也。然六四承九五，例皆吉者，以阴承阳，合于女归之义矣。顺以事上，高而不危，故有集木得桷之象。”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丘陵、高阜。爻辞是说，九五，鸿雁飞翔渐进于山陵之上，犹如妇女因与夫别离三年，长期守空房，当然不能怀孕；但九五永葆其刚中之正，外邪终难侵扰其身心，这样必致吉祥。九五已升至上卦之中，超越下艮之山，所以有“鸿渐于陵”之象。九五居尊位，既中且正，而下与中正之六二阴阳相应，在它卦马上就是事业大有所成而升至光辉灿烂的顶点。但是《渐》之九五，则因处渐进之时，遽则非所以为利。而在事业的渐进过程中，又因其内外矛盾现象的存在，其发展必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其迂回曲折，故爻辞以“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为喻。鸿飞栖于陵阜，位虽高昂而只是暂时休息的落脚点。九五与六二阴阳相应，故又有夫妻和合的妇孕之言。但五与二虽为正应，却是下隔四、三，或阴或阳，皆不满于二、五之合，从而成为阻力，从二至五，其间隔三位，所以爻辞“妇三岁不孕”，以“三岁”象征渐进过程中的阻力或困扰。不过，五、二终为中正之应，九五本身又具中正美德而居尊位，只要秉其中正内质，持之以恒，进之以渐，克服急躁情绪，则最终必然克服一切阻力，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爻之所以又称“吉”也。但据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终莫之胜吉”其“吉”字上连而不另外断开，这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解释，他说：“莫之胜吉，言不胜其吉也。三年始孕，贞静不淫之女，故吉。三聘之后，尹不却汤；三顾之余，亮不辞备。”这也可备一说，说明爻称妇孕，其象不过是一种比喻，任何相似的事物，皆可举类设譬以见义，释《易》卦者不应当拘泥于一象一义，而应取象连类以灵活释义，才能见其卦义爻义之精神实质。杨万里《诚斋易传》曾举例加以说明：“功业之高……岂一日之致哉？亦三岁之渐而至也。渐于陵，非进于位之渐也，进于功业之渐也。故文皇之治不见于贞观之初，而见于三年之后，开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艰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期年而化，或者不妄，则易妄矣！”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一说：“此处当指高山顶，比九三之‘陆’为高，在‘陵’之上。”（黄、张《译注》）一说以为是“逵”的通假字，如朱熹据程颐《易传》云：“胡氏（瑗）、程氏（颐）皆‘陆’当作‘逵’，谓云路也。今以韵读之良是。”二说皆通，今暂从程朱旧注之说。仪，仪饰。爻辞是说，上九，鸿雁逐渐腾飞翱翔于虚空云路之上，其洁净毛羽闪闪发亮，引人注目，而堪作仪饰，吉祥如意。上六处全卦最高位，渐进之序达于极限，《渐》之为卦，下艮为山，上巽为木，循序由山木而腾空，乃理数之自然。故由山巅而升空，取“鸿渐于陆（逵）”之象。上六虽下无其应，但是阴居阴位得正，又下亲比于九五之君，说明渐进之功已成，故爻称“吉”。陈梦雷《周易浅述》云：“上九无位。然渐进至此已极其高，犹贤达君子高蹈远去，而其进退去就，可为当世仪表，非无用者也。故有其羽可用为仪之象。占者如是则吉矣。”孔颖达《周易正义》曾称达上九之仪表“可贵可法”，王安石以其改革家的眼光，进一步解释说：“其进也以渐而不失时，其翔也以群而不失序，所谓进退可法者也。”（《周易折中》称引）

《渐》之为卦，重在说明事物的发展应当循序渐进的规律。卦辞卦象取“女归”之象设譬，是因为古代女子婚嫁，是一件不仅涉及个人归属及其家庭幸福之事，而且是否依礼而行、循序渐进，又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风俗。男女淫奔苟合，则风俗浇薄；反之，循礼渐行，则风气凛然以正。古人强调欲平治天下，首先要以修身齐家为基础，“女归吉”三字，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同时也是当时统治思想的一种反映。“女归”循礼，他事亦然。《渐》之爻辞爻象，则多取鸿雁为喻。六爻之辞，从文学家的眼光来看，犹如一组优美的组诗。歌谣用鸿雁起兴。如上所述，古代的鸿雁是一种具有相对确定象征内涵的物象。《易》卦作者，取鸿雁之兴象以入诗，诸爻之辞便有了浓郁的抒情意味和相对深厚一些的表义抒情含量。六爻组诗完整地展现了一个形象生动的全景：鸿雁渐次和缓地飞翔，经历了河岸（干）、水边磐石、陆地、树木与山陵，直至腾飞翱翔于虚空云路之上。鸿雁似乎又有雌雄之分。雄鸿自水边飞至陆地山巅，自下渐进而上；雌雁则从高山飞至山下，自上而下与雄鸿会合。雌雄之鸿相互追逐，高升下落，时翔时栖，潜含着追求男女情爱、家庭和谐的象征意义。其中有欢畅的宴乐——“饮食”，有艰辛的操持——“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又有苦苦的等待——“妇三岁不孕”，还有和美家庭的欢乐——“其羽可用为仪”。恩爱夫妻成为人们羡慕学习的典型。作者以鸿雁起兴，引出了这一幕幕悠扬又不无苦涩的情景，使得爱情组诗在清晰之中，蕴含着悠长的情味，让人体会无穷而回味不尽。于此可见，卦辞之“女归”与爻辞的鸿雁，二象之间并非脱节，而是有其精神相通的内在必然联系。应透过语言文字背后去作深入的挖掘。请参考我和李笑野合著《周易要义》一书的有关章节。



■陆游像

当然，对于《渐》卦精神的理解很多。比如周代诗人从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获得启示，创作了《诗·小雅·鸿雁》之诗，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则由家庭推向社会，丰富了鸿雁的形象及其意义。另外，又有人就把鸿渐之象，因其自由飞翔，可上可下，可进可退，比喻为德行高洁的退隐之士。比如在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枢密事赵汝愚与知阁门事韩侂胄合作，废掉不得人心的宋光宗赵惇，改立宁宗赵扩。但不久赵、韩矛盾，赵汝愚及朱熹等因此被罢官，陆游和朱熹关系较好，从此希望脱离政治漩涡中心而隐居，故闭居山阴，作《夜坐闻湖中渔歌》诗云：“渔家袅袅起三更，哀而不怨非凡声。明星已高声未已，疑是湖上隐君子。”（《剑南诗稿》卷三二）此位湖中隐士，不断在其作品中再现，究竟是谁？其友杨万里《再答陆务观郎中书》指出，这是诗人的狡狯之笔，正是陆游所想像的自己。杨说：“斯人也，何人也！非所谓‘不夷不惠’者耶？非所谓‘出乎其类’‘游方之外’者耶？非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者耶？公欲知其姓名乎？请索琼茅为公卦之，其繇曰：‘鸿渐之筮，实维我氏，不知其字，视元宾之名（按：唐李观，字元宾）；不知其名，视言偃之字（按：言偃，字子游）。’既得是占，颇欲自秘，又非闻善相告之义，公其无谓龟策诚不能知事。”（《诚斋集》卷六八）以鸿渐之象，比喻陆游为湖上的高隐君子。

归妹

卦第五四



血泪淋漓论婚嫁

《归妹》卦（䷵）第五十四，跟在《渐》卦之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颠倒的综卦，又是六爻阴阳相反的错卦，这已呈示了二卦相成相续的征兆。《序卦传》说："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妹，古代对少女的称呼。如果说《渐》卦辞"女归吉"，说的是夫家娶妇的过程；那么《归妹》则是描述女家嫁女之事，并以之为喻，说明男婚女嫁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必然归宿。孔颖达《正义》释《渐》卦辞"女归"之"归"云："归，嫁也。女人生有外成之义，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也。"《白虎通》亦曰："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嫁"字按语云："自家而出谓之嫁，至夫之家曰归。"在史前原始公社的母系社会中，当然无所谓以夫家为依归之事。但转入父系社会以后，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外嫁至于夫家，就是女人必然的归宿。古代成婚就意味着成人，应挑起家庭的责任。不仅是主外事的男人，作为妻子，也有其主"中馈"之事（参见《家人》六二爻辞）。《周易》六十四卦，有许多卦爻各以其独特的方式，来议论古代阴阳男女的恋爱婚姻及组织家庭之事。这说明以夫妻（按：包括媵妾）为核心的家庭，作为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它在中国上古刚一走出野蛮时代，便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婚恋与家庭，不仅涉及传宗接代，繁衍种族的问题，而且有其祭祀祖先宗庙的重大社会责任。因此，家庭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安乐窝，而且同时是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也可以断言，古代的统治阶级，把家庭组织视为政治的一个基点，天下风俗与秩序，无不与之密切相关。后来儒教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大概也多少受到《周易》中诸如《咸》《恒》《渐》及《归妹》诸卦精神的启悟。不过，上述诸卦同是议论男女阴阳之事，但着重点各有不同，

如程颐《伊川易传》所分析说："卦有男女配合者四：《咸》《恒》《渐》《归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气感应，止而说（悦），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顺而动，阴阳皆相应，是男女居室夫妇唱随之常道。《渐》，女归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静而巽顺，其进有渐，男女配合得其道也。《归妹》，女之嫁归也，男上女下，女从男也，而有说少之义，以说而动，动以说，则不得其正矣。"同叙男女之事，而四卦之中，前三卦皆"吉"或"无咎"而"利有攸往"，惟独《归妹》呈"征凶，无攸利"之险象，这是为什么？大概因为《易》卦作者，多为奴隶主贵族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当时统治阶级的立场，特别要求女方具有贞正操守，依礼而行则吉。前三卦之女人，皆有"利贞"之德，如《咸》卦的少男追求少女，两情相感，真诚相应，所谓"说而止"，也就是说，男女愉悦，止于礼义，而非忘乎所以。如孔子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那种为了爱情而抛弃礼义，进而发疯发狂之事，不合乎《易》卦作者的口味。而《归妹》恰恰是少女在下动情而主动追求在上的长男。在今人看来，不管是男求女，或女求男，只要爱情真挚，男女双方谁主动都是一样。但在古代士人眼里，男求女尚可容忍，女求男则为淫奔。如朱熹《诗集传》就是这一态度。《归妹》少女之主动，今天虽然以为符合人之常情；但古代士人却认为是非礼，不合女人的贞正之道，所以说是"说而动"。女人结婚而有其生活归宿并没有错，但情动不合乎礼义贞正的要求，盲目追求，忘乎所以，则违背了当时统治思想的伦理规范，所以一定会受非议甚至谴责，作为女人，人性真情必然受到沉重的压迫，故如卦所示，尽是凶象。古代妇女身上的枷锁，比男人更沉重，发出了阵阵的悲鸣，今天我们读《归妹》卦，也可感染到一些浓厚的悲剧气氛。

下谈卦辞卦象。《归妹》（䷵）下兑（☱）上震（☳），其卦辞云："归妹：征凶，无攸利。"意思是说，《归妹》卦以嫁出少女为象征，盲动前进必有凶险，不可能有任何利益。古代嫁少女之事很多，如《咸》卦因少女之婚致吉，为什么《归妹》少女出嫁却是险象环生呢？朱熹曾说："《归妹》未有不好，只是说（悦）以动带累它。"（见朱鉴《朱文公易说》卷六）这就是说，少女情窦初开，如果能以礼自防，出嫁静守家中以主"中馈"，则具贞正美德而"未有不好"；但若任凭初开情窦泛滥，主动追求情爱，则是"说以动"，就会把少女拖入泥坑而带来罪恶，影响社会风俗。从卦象看，《归妹》下兑（☱）为泽，上震（☳）为雷，故《象传》据象而释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大泽之水，随天上雷声震响而波翻浪涌，兑泽性阴，震雷属阳，所以程颐说是"阳动于上，阴说而从，女从男之象也"（《伊川易传》）。因为以人伦关系而论，兑象征少女，震象征长男，故程颐称之为"女从男"。君子观此卦象，悟出了阴阳和合的男女永久之道，并进一步警戒说，千万不可以因一时寻欢贪爱而敝坏夫妻正道。故程颐《伊川易传》说："永终，谓生息嗣续永久其传也；知敝，

谓知物有敝坏而为相继之道也。女归则有生息，故有永终之义；又夫妻之道当常永有终，必知其有敝坏之理而戒慎之。敝坏谓离隙。《归妹》说以动者也，异乎《恒》之巽（顺）而动，《渐》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说，情之感动，动则失正，非夫妇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坏，知其必敝，则当思永其终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终者也，不独夫妇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终有敝，莫不有可继可久之道。观《归妹》则当思永终之戒。”这就把男女之事，更推之天下之事，使卦义内容更为丰富而深刻。而《彖传》则从卦体卦德方面来阐述卦义，云：“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有关阴阳男女、饮食夫妻之大义，《彖传》在释《咸》卦时已有明白的理论阐述，同时又在释《归妹》时进一步加以发挥。《咸·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与《归妹·彖》“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从正、反两方面来阐述同一意思，可相互参阅。阴阳既合，男女婚配，乃是天地之大义，人伦之终始。《易》卦作者毫无轻视归妹的意思。相反，正因为作者很重视，所以除了正面阐述外，更多的是从反面提出了人生的警戒之言。所谓“说而动”，是因下卦兑象征少女，其性为悦；其上卦震象征长男，其性为动。少女情动，正处于青春期心理骚动的微妙阶段，出嫁以寻找人生必然依归，原也无可厚非。但《易》卦作者为什么又有“征凶”“无攸利”的严重警戒呢？《彖传》作者解释说，是因为其居位不正、以柔乘刚的缘故。这是古代士人的认识。《归妹》上下六爻，从二至五，皆为居位不正；而初、上居位虽正，却又是阳下阴上，二、五虽然处中而阴阳相应，但同样是阳下而阴上，男人阳刚之气显得疲软而被动；又三、五之阴爻，又皆乘凌于九二、九四阳刚之上，犹如女人悍妒，而男人无能，这在古代常常成为人们讥嘲的内容。总之，归妹不以其正，而只是任凭情爱感情冲动的激荡，是《易》卦及《彖传》作者所忌讳的，因而提出“征凶”、“无攸利”的警戒，以期改“邪”归“正”，走上新生之路。《周易折中》分析说：“《归妹》所失者有二：一则不待取（娶）而自归，失婚姻之礼，以卦象，女先于男，与《咸》之男下女相反；一则以少女归长男，失婚姻之时，与《咸》两少之交相反也，故不曰‘妹归’，而曰‘归妹’，以明其失礼；不曰‘归女’，而曰‘归妹’，以见其失时。”此可略备一说以供参考。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dì），对姐而言为女弟，即妹妹；对妻而言为侧室，是媵妾；古时习俗，姐姐出嫁为人妻，常以其妹陪嫁为媵妾。《诗·大雅·奕》毛传云：“诸娣，众妾也。”可为佐证。爻辞是说，初九，少女出嫁为人媵妾，犹如脚虽跛而努力于行，前进必致吉祥。从爻位爻象看，初九在少女婚配之时，处位最下又上无其应，力弱而无外力相助，所以只能随姐出嫁以为媵妾，身份卑贱令人心伤；但从另一角度看，初九以阳刚之质而居阳位得正，犹有位虽偏而心向于正的良好愿望，故爻辞以“跛能履”为喻，孔颖达《正义》解释说：“妹而继姊为娣，

虽非正配，不失常道，譬犹跛人之足然，虽不正，不废能履，故曰‘跛能履’也。”所以初九爻有“征吉”之兆。古代名义上实行一夫一妻制，实际上这是专对女人而言，只能忠于丈夫，从一而终。妻指嫡夫人。但对男人来说，则同时实行媵妾制度，也就是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所以孔颖达认为嫁人作妾也是“不失常道”，是很正常的事。不过在名分和地位方面，媵妾不能与嫡妻相比。古人婚姻有两大功能：一是广孕嗣，一是事宗庙。如《礼记·昏义》云：“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但这是嫡妻的事。至于媵妾，则功能不全，“上以事宗庙”的荣耀，与之无缘，而只具有应接君子以生男育女的责任，也就是说，满足男人的性欲要求而广孕嗣，是其唯一的任务。媵妾的婚姻功能不全，虽不能事宗庙，但照样可以生男女而传宗接代，所以爻称“跛能履”（按：九二爻辞“眇能视”，大同小异），努力依礼而行，侍奉丈夫，也可以致吉祥。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miǎo），“偏盲也，一目明一目不明，或目邪皆谓之眇。”（来知德《周易集注》）爻辞是说，九二，虽然眼睛有疾，但仍勉强看得见，对于淡泊其志幽静自守的人来说，坚持贞正之道方有其利。九二阳居阴位，虽中非正，但却与居中之六五为正应，而五质阴柔，匹配非良，应援乏力，爻象原非吉兆，故爻以“眇能视”为喻，谓其虽然能视，但不能及远，难以大有作为以竟其内助之功。九二与六三、九四互卦为离（☲），离有目象故以目视为喻。又九二所处下卦为兑，兑有毁折之象（《说卦》），故下卦三爻均蒙其咎，初九“足跛”，九二“目眇”，六三“反归以娣”——继位为嫡的希望破灭。但与六三不同，初、二皆为阳爻，如程颐《伊川易传》所称：“阳刚在妇人为贤贞之德而处卑顺，娣之贤正者也。”九二又具刚中美德，尤为其佼佼者。但在时不我利之位，也只能幽静贞正以自严操守而已。故朱熹《周易本义》云：“女贤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故为‘眇能视’之象，而其占则利幽人之贞也。幽人亦抱道守而不偶者也。”与初九相比，九二之贤，阳刚居中上有正应，优于初之居下又无其应，地位应有所改善，但遗憾的是六五之应阴柔而非正，此所谓匹配非良也。但在古代，嫁于人父母主之，而身之守自我持之。九二不因其夫之不良而改其刚中美德，此爻所称“利幽人之贞”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者，待也；但黄、张《译注》又开列三种不同的解释以备参考，现转录如下：（一）《释文》曰：“荀、陆作‘嬃’，陆云‘妾也’。”今查帛书《周易》亦称“嬃”；（二）朱熹引或说，释“须”为“贱女”，谓：“须，女之贱者。”（《本义》）此本《史记·天官书》“婺女”张守节《正义》：“须女，

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三）尚（秉和）先生据《易林》等资料，以为“须”当释为“面毛”，指六三面长须长，形容可怖，故反嫁为娣（《周易尚氏学》）。爻辞是说，六三，待嫁少女翘首以望佳期，但是没有想到反而只能嫁作媵妾。六三居位，既失正又过中，下面乘凌九二阳刚，同时又上无其应，处下兑之极，在上下卦之间，下体之兑（☱）有毁折之象，种种迹象显示，六三处境大为不妙。但六三偏是缺乏自知之明，作为下兑之主，以其少女之傲，情悦而动极，主动追求男人，善为容悦以争嫡宠，结果是事与愿违，因其行为不当，失礼非正，而被嫁作侍妾。故《象传》释云：“归妹以须，未当也。”指责六三品行不端而不顾身份，也即《彖传》所称卦辞的“征凶，位不当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愆（qiān）期，超过期限，过了日子，如《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爻辞是说，九四，少女待字闺中，但是婚期却因故一再被推延，只能耐心等待时机，相信最终美满婚嫁有时。九四爻位，已从下卦脱出而处上震之初，震性为动，原该是积极准备以迎接婚期的兆象。九四阳爻，比喻妇女则是有贤德者。但九四阳居阴位，不正又失中，下无其应，其象又有不佳的一面。又九四与二、三下互为离，离卦有日象，九四与三、五上互为坎，坎卦有月象，归妹之时而数日月，则为婚期之象征。但因其失正过中又无阴阳之应，所以爻辞以“愆期”为喻。不过，九四终为贤贞少女，故《象传》释云：“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与下兑少女情动喜悦而盲行征凶不同，九四居高之位有贤德者，在上震该行之时，虽因时不我利而未能成行，却能无改其贞操而静待其时，愆期者一时之数，有时者乃理势之自然。九四日光深远，所以爻称“迟归有时”也。《周易折中》引胡瑗曰：“以刚阳之质，居阴柔之位，不为躁进，故待其礼之全备，俟其年之长大，然后归于君子，斯得其时也。迟，待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商代国王，殷纣王之父，在位时国势日趋衰落，而周民族却日渐强大，据说帝乙时始制帝女下嫁之礼。君，黄、张《译注》引《正字通》云：“夫称妇曰‘君’。”按：古时诸侯之妻称“小君”，封建时代官宦之妻称“县君”，可见是地位尊高的贵族嫡妻正室。袂（mèi），原指衣袖，这里泛指服饰。良，美好。月几望，月将圆满之时。爻辞是说，六五，帝乙下嫁王家少女，作为诸侯的嫡妻正室，但王女出嫁的服饰，反而不如随其陪嫁媵妾的服饰华美。其品德堪为典范，犹如月亮将圆又不满盈，这样必然吉祥如意。从爻位爻象看，六五居上震中爻，震有足象，其性为动，正是归妹举行婚姻大礼之时。又五以阴柔居全卦中位，是《归妹》一卦之主，有王女之象，下与九二阴阳正应，又有王女下嫁之象，故爻以“帝乙归妹”为喻。六五下嫁诸侯为女君，其众多陪嫁之媵

妾，以容色服侍男人，故以华美服饰来自我包装，炫其美色，而与嫡妻争宠夺爱。而六五虽贵为帝女，却以其柔中美德，屈尊纡贵，谦降从礼，以明男女婚姻大礼，贵不骄人，不失其贤德妇女的柔巽之道。其美在德而不在容，故不尚饰以见其真挚之情，故爻辞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爻辞“月几望，吉”者，如程颐所释：“月望，阴之盈也，盈则敌阳矣；几望，未至于盈也。五之贵高，常不至于盈极，则不亢其夫，乃为吉也。女之处尊贵之道也。”六五之吉，正来自其内在谦中之美德。但张载《横渠易说》的思考比程子更深一层，他认为“月几望”之辞是“为之戒也，以其贵行，故戒其满以几望”。从全卦精神考虑，卦辞称“归妹征凶无攸利”，因此，即使六五之吉也不可能满盈而骄人，所以张载的戒辞之说更深刻更符合实际，正可见《易》卦作者思想中的辩证观念。六五处上互坎卦之极，坎性险陷，六五之嫁王姬，能无惧乎？

上述诸解，大多以“帝乙归妹”泛指一般尊贵的王姬下嫁之事。但是，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则以为在历史上实有其事。殷商帝乙及其子帝纣，与周文王同时。“归妹”原是商代嫁女之称，在殷商大国衰落、周民族日渐强大的时刻，帝乙下嫁王女于周文王（按：当时文王为诸侯），并引《诗·大雅·大明》篇为证：“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这是周人娶商女，太任为王季妻、文王母。《大明》又云：“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王嘉祥，亲迎于渭。造舟其梁，不显其光。”俔（qiàn），譬喻，好似。“大邦之子，俔天之妹”，是说这个来自大国的少女，就像从天而降的仙女一般。大邦即指殷商。如《尚书·召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那么帝乙为什么要归妹与周文王呢？顾先生解释说：“自从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鲁颂·閟宫》）以来，商日受周的压迫，不得不用和亲之策以为缓和之计，像汉之与匈奴一般。所以王季的妻就从殷商嫁来，虽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内的诸侯之女。至帝乙归妹，《诗》称‘俔天之妹’，当是王族之女了……周本是专与姜姓通婚的，而在这一段‘翦商’期间，却常娶东方民族的女子了。这在商是不得已的亲善，而在周则以西夷高攀诸夏，正是他们民族沾沾自喜之事呢。”顾氏之说，言之有据，史有实事之说，似可成立。但“帝乙归妹”的故事，一被《易》卦作者所吸收，一再使用（如《泰》六五爻辞），恐怕就产生了一个由实入虚的转化过程，而逐渐扩大其泛称而非实指的象征性意义了。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刲（kuī），割杀，割取。爻辞是说，上六，女子手捧安放祭品的竹筐，但是筐中空无其实；男人宰羊献祭，却刀不见血。说明夫妇和合的祭祀仪式无法举行，因此一无所利。从爻位爻象看，上六居卦之终，穷极而无所适，下与六三义

是阴阳无应，处于事物矛盾转化、穷极将变的临界线。由六五归妹之吉，而向婚变“无攸利”的方向转化。从全卦精神来考察上六之“女”，很可能也是侄娣媵妾身份。《释名》云：“妾，接也，以贱见接幸也。”郑玄据《士昏礼》以为“妇入三月而后祭行”，“宗庙之礼，主妇奉筐米”（黄、张《译注》引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主祭的“妇”指正室嫡妻，而媵妾则因其位贱而不可奉宗庙，这就意味着侄娣媵妾并不被视为家族的正式成员，没有资格参加家族的重要活动。如今人金景芳教授《周易讲座》所说：“筐、血，都是讲的祭祀的事。可是这个筐没有实，里面没有盛东西，是空筐。羊没有血。这都说明不能进行祭祀……奉祭祀只能由嫡，即夫人做，侄娣不能奉祭祀。”侄娣媵妾也是人，与嫡夫人同是女人，却在许多重要方面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可悲可叹！

《归妹》之卦，以嫁女喻人事，所嫁少女，有身份高贵的帝王之女，也有身份低贱的侄娣媵妾，卦爻之象从多方面反映了殷周之际古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后来，古人婚配之时多取以为占。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爻曰：士刲羊，亦无衁（按：衁，血也）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按：相,助也）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按：《归妹》上卦为震，《睽》卦上体为离，震象雷，离象电，故有雷火之说），为嬴败姬（按：嬴为秦姓，晋为姬姓，雷火反害娘家，故云）。”但晋献不听史苏之谏，违占而行，不久晋秦大战，晋国大败，晋惠公（按：献公子）被俘。《左传》又云：“及惠公在秦（按：被俘囚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当时韩简在旁侍奉，他不同意晋惠公之言，而是进一步由《易》卦之筮的性质，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按：指晋献公）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以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可见古人认为，阐释《易》卦精神要义，不仅要从象数所示的天意入手，同时也应顾及生民之意。如晋献公之所作所为，常致丧败之德，及今言之，罪恶累累，可一二数之乎？其丧败不仅由于违《易》之占，同时更因其违背了民心。由释《归妹》而推衍《易》卦性质，精见卓识，令人叹服。

《归妹》卦辞之“归妹：征凶无攸利”，如果具体分析爻辞爻象，结论是同样的。除六五爻“帝乙归妹”致“吉”外，余五爻皆以媵妾为喻。就其内在逻辑而言，初、二、三、四、上诸爻爻辞爻象，以其连续画面反映了上古时代关于媵妾现象的同一件事。从文学歌谣角度看，它对媵妾现象形诸吟咏，表达了相当含量的情感因素，致使今天我们读来，仍然感到它不仅仅是对当时媵妾现象的一种展现，而且也感受到了在语言文字之外涌动着的动人情感。如果将这五个片断统一起来，作为一组完整歌谣来反复涵咏，则不难看出它对“归妹以娣”这一全过

程的叙述，并在其叙述中，自然流贯着那种无法回避的哀婉、怅惘和绵长无尽的幽怨悲伤。总之，《归妹》的卦爻辞，虽然时隔数千年，但仍依稀可见其血泪浸透的历史痕迹。

丰

卦第五五



明动相资见“丰”大

《丰》卦（䷶）第五十五，次《归妹》卦之后。《序卦传》说：“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丰，丰盛、丰硕、丰满、盛大之义。意思是说，天地阴阳和合，事物得其所归，则人类子孙蕃殖，积德浑厚而聚财丰盛，使用无碍，前途亨通，所以《归妹》之后为《丰》卦。“丰”意义为“大”，此“大”包含了盛多之义。不过这卦的丰大，不仅指物质财富之所归聚，而且具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兼指精神财富方面的人心向背，也即德义之所归。所以，在钱多物丰的情况下，并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干的。比如在现今商海大潮中，不论是西方或东方，都有人高唱“能赚钱就是好”，以为一旦占有了大量的金钱，那么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包括玩弄女性，也可以依靠金钱的神通，来畅所欲为，并认为这就是幸福。因此，他们只知赚钱，不讲任何道德和良心，能骗则骗，只讲牟利，而不讲信用，别人生死干我屁事。因此人们愤怒地谴责他们是“为富不仁”的商家败类。这样的人，虽然物质财富是丰足富裕的，但却精神坠落，而不合《丰》卦的精神要义。而人的精神一旦坠入魔鬼之道，则将成为千夫所指，留下万古骂名，其事业必然涣然解体。所以《丰》卦又与《涣》卦（䷺）构成了六爻阴阳完全相反的错卦，卦象之变，已呈示了这一精神现象，值得人们注意。按照《丰》卦辞象所示，在物质丰富之后，人们必须在正确的精神原则指导下，为事业的健康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光景日新而不断发扬光大。丰者大，大则有满盈之虞，所以《彖传》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之诫。盛极必衰，天地日月尚不可以过中过满，更何况是人，又岂能长保其富贵满盈乎？

《丰》卦（䷶），下离（☲）上震（☳），卦辞云：“丰：亨，王假之；

勿忧，宜日中。”假，至，达。卦辞是说，《丰》卦象征丰盈硕大，道路亨通，这是有德君王应该达到的境界；人们不必忧虑，犹如丽日中天，光辉四照一样。从卦象看，下卦离为电，上卦震为雷（见《说卦传》），所以《象传》云：“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按照古人的解释，雷响则天威震动，电闪则天光明耀。雷电俱至，就生“威明备足”之象，此所以为“丰”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君子观此卦象，进一步悟出许多道理，雷震之威，宜于折狱；闪电之明，公允评断。在社会人事中，“折狱致刑”是严重之事，都能借雷震电闪之威明而予公平合理地解决，则严重矛盾化解，致上下一心而万民和洽，从而塑造了国家治政“丰”大之象，故云。而《彖传》则从卦性卦德方面来解释全卦的精神要义，云：“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原来。《丰》之下离有日象，其性明，上震为雷，又有足象，故其性动，所以卦德有明而后动、动而能明之义，非明无以烛照幽隐，非动无以果敢实行，动而无明则为盲动，此自取陷溺之道；明而无动则虚照无益，而与昏暗相同。所以必须明动相资而成其致“丰”至大之道。如果从“明以动”的反面来看，人的事业，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或医疗卫生各个方面，其事业之设计和建设，都必须方向明确，才能有效地指挥行动；反之，则为盲动躁进，失去了光明方向与远大目标，盲目行动而乱成一团，又怎能健康发展而达到事业“丰”大的美好境地呢？好大喜功而失去了明确方向，其“动”愈烈，则国家与百姓蒙受其害愈深。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兢兢业业地建设四化，方向明，目标远，决心大，所以行动坚决，举国上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而奋斗，因此而获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此《彖》所称“动以明”而致其“丰”大之盛也。古人受当时统治意识限制，常以“王”代表国家，国家繁荣昌盛，也就是事业的发扬光大，所以《彖》称“王假之，尚大也”。但是，《易》卦尚“变”，讲的是阴阳对转的矛盾辩证法，“满招损，谦受益”，人们一旦因其事业之“丰”大而自骄自满，就会逐步走向“丰”大的反面，陷入泥坑之中而难以自拔。《丰》的下卦为离，离之错卦变为坎（☵），坎象为陷阱，其性险陷。而《丰》之上卦为震，震象足，其性动，则有前进而落于陷阱之象，因此，《丰》的卦象中也已隐含了走向反面的内在因素。所以《彖》又据卦象所示而发出了“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的警戒，日过其中必然有其西斜沉山之时，月圆盈满则将有其亏蚀的时刻，这是合乎阴阳消息的理数之自然。所以《彖》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无论是人或自然万物，都在这一客观规律中运行。但是，古人有的把《丰》之卦义理解为爵禄之“丰”厚，汉末三国初徐幹《中论·爵禄》篇云：“《易》曰：‘丰，亨，无咎（按：今本《易·丰》卦此阙“无咎”二字），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谓也。斯事也，圣

人之所务也。虽然，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谓有命矣……道之不遇也，岂一世哉，岂一世哉！”虽然其对卦义精神的认识较为褊狭而欠全面，但他总结历史经验，注意到“丰”大之道有遇有不遇，发现了其喜中有悲的悲剧性社会内容，却又思考深刻，值得肯定。后来的封建士人改革家，就很注意这一点，并且希望引起警惕以便避免满盈致败的历史悲剧的重演。如北宋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时更论《丰》卦精神云：“文明以动，无往不亨，王道开大之时也。夫雷电之至，隐者彰而否者亨，圣贤之造，困者通而幽者显。”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因“丰”之时，文明以动，举贤授能，革除弊政而方向明确。但他同时又注意到徐幹所称“‘丰’大之道有遇有不遇”的悲剧意识，于是大声疾呼，希望引起君主的警醒，所以接下去又说：“然则日之动也（按：下离日象，上震性动），丰于正中焉，文明之动也，丰于皇极焉；过乎正中，日斯昃矣；过乎皇极，文明亏矣。故曰：宜日中进于大，而戒于盈也，丕哉！”（《易义》，见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卷五）

以下论爻辞爻象。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相匹配之人，但《丰》与他卦不同，不取阴阳婚姻为喻，其喻义犹如今天工作项目中的“搭档”，二者共同负责。旬，王弼注：“均也。”《管子·侈靡》“旬身行”，其注亦云：“旬，均也。”按：有关“配主”与“旬”之义，旧注有不同解释，今转录黄、张《译注》称引二说以备参考：（一）郑玄、虞翻训“旬”为十日。《折中》引胡瑗曰：“旬者，十日也，谓数之盈满也。言初与四其德相符，虽居盈满盛大之时，可以无咎。”（二）尚先生认为“配主”指六二，初与二阴阳相配，则“往有尚”；并谓“二五为卦主”，故二称“配主”，五称“夷主”（《尚氏学》）。尚，程颐《易传》谓“嘉尚也”。爻辞是说，初九，前往与搭档之主相配合，虽然二者同具阳刚之性，但是同心合力、合德共济以共辅其上，这样处事必然没有咎害，其前进的行为高尚而值得嘉许。从爻位爻象看，初九居《丰》之始，下离之初，“丰”之大道远未实现，所以爻辞中不见丰大之称，这是时势使然。初九阳居阳位而得正，处下离之初，离象为日为火，其性光明，故初九实具阳刚之明德，心胸光明磊落而端方自正。其上与九四相应，虽然同具阳刚之性，按一般《易》例，该是同性相斥而阴阳失和，此乃不吉有凶之兆，为什么爻称“遇其配主”而无咎害呢？清陈梦雷《周易浅述》云：“凡卦爻取刚柔相应，此则取明动相资。盖全卦以五为‘丰’之主，五方柔暗，欲得刚明之臣以自辅。初远于五而与四应。四，初之配也，故有遇其配主之象。旬，均也。初、四皆阳，均敌非应之正；然同有阳刚之德，明、动相资，故虽旬而无咎，同德共事，往以辅五，必有功矣。故曰‘往有尚’。”原来，读《易》不能过分呆滞拘泥，而应视具体情景条件而论。《丰》之为道，主要取“明以动”之义，以明、动相资相成而致其丰大之吉。初九为离明之始，九四为

震动之始，先有明照而后果决其行，必致其丰大而后止，如程颐《易传》所论云："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相资而成用。同舟则胡、越一心，其难则仇怨协力，事势使然也，往而相从则能成其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卦主六五阴柔软弱而居尊位，亟待刚明之臣合力相助而成其丰大之道，故初、四同心相助，以刚济阴而共襄大事，所以初九前进不仅是"虽旬无咎"，而且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嘉尚。但《象传》的分释思考更深一层，云："虽旬无咎，过旬灾也。"杨万里《诚斋易传》举史实例以阐释其义，既生动形象又颇见卓识，云："然幸未久而灾至者何也？时虽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远臣，与九四在上之迩臣，安能以己之昭昭，启君之昏昏乎？故四老（按：指商山四皓）能从子房（按：即张良）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刘更生（按：即刘向）、张猛、周堪能从（肖）望之以傅元帝，而不能开元帝之暗。诸君子岂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则灾于国，小则灾于身。故汉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矣！故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蔀（bù，又读pǒu），遮蔽，虞翻曰："日蔽云中称蔀。"（《周易集解》引）斗，指北斗七星。日中见斗，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云："昼晦之象。"若，语助词，无实义。爻辞是说，六二，蔽日的乌云不断扩大，明亮的白天突然昏暗一片，依稀可见夜晚才现的斗星，这时前往相应，容易引起主人的疑心病而被人猜忌；但是，只要自己坚守其赤诚之心并加以发表，最终必然获得信任而致吉祥。从爻位爻象看，六二阴居阴位得正，又处下离之中，既中且正，是下体离卦之主，该是至明之爻；但是，六二上应六五，六五处上震之中，是为动主，阴柔居中而非正，其力柔阴暗而难于行动，下面六二之明，难救上面六五之行，明动不能相资成事，所以六二之明因其所应不足与，不能竟其丰大事业而丧其明用之功，丧其明功，则犹如昏暗无异，故爻以"丰其蔀，日中见斗"为喻。或以君臣人事而论，以六二为大臣，六五为君主，二五皆阴，君主昏暗，积暗成疑，积疑成疾，猜忌不已，此时六二前往应君，己虽明而君以为暗，则危乎其危。故爻称"往得疑疾"。时机不利，则不宜盲动。比如中唐时代的宰相陆贽之于德宗皇帝，德宗为昏暗之君，虽陆贽尽忠极谏，一心为国，但德宗以刻薄察察为强明，所以终贬忠臣，而陆贽死于贬所忠州。爻称"往得疑疾"，与唐德宗之猜忌，何其相似！但是，六二若能改变方法，不急于上应，而是秉其既中且正的内在美质，向人坦开心扉而披露其一片赤诚忠心，最后一定会被人理解，受到信任、支持和拥护，而终于到达吉祥如意之境。如程颐《伊川易传》云："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则尽其至诚以感发其志意而已。苟诚意能动，则虽昏蒙可开也，虽柔弱可辅也，虽不正可正也。"六二最终致吉，道理在此。比如说，诸

葛亮与刘后主，后主虽然昏蒙柔弱而时有不正之行，但是诸葛仍然守其赤诚，忠心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而诸葛亮在世之时，蜀国以治。此爻所以称“吉”之实例。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昧，折其右肱，无咎。

沛，通“旆”，幡幔也。昧，通“昧”，程颐《易传》云：“昧，星之微小无名数者。”右肱，右臂。爻辞是说，九三，遮蔽光明的旗帜帐幕日益丰大，犹如丽日中天之时而出现了暮夜之星，天空一片昏暗，此时上应昏蒙之主，必无所用，犹如折断右臂而无能为矣，但慎守其阳刚美德之正，则最终没有咎害。从爻位爻象看，九三阳居阳位得正，又处下离之终，离为日为火，离终之爻则有极明之象，原该是吉爻。但因处“丰”之时，《丰》卦之道，必上下相须、明动相资而致其成。九三之所应上六，在他卦是上下阴阳呼应而有致吉之象，在《丰》则不然。因上六处上卦震极，震极则动止矣，上六为震体中之无法行动者，又怎能下与九三相应呢？下虽明而上不动，与丧其明功一样，而有不见用之象。爻中之“昧”，是夜晚方才能见的无名小星；“日中见昧”，则可见其昏暗之甚。上昏暗而下明，无所用矣，故爻称“折其右肱”以喻。一般的人，习惯于使用右手，右臂折断，则无能为也。所以《象传》解释说：“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若九三爻变为阴，则二、三、四互卦为艮（☶），艮有手象（《说卦传》）；又三、四、五上互为兑（☱），兑有毁折之象。故爻以折其右臂喻其灾难。但是，九三虽有“折其右肱”之灾，并非一病不起而无救之象，若能一贯慎守其阳刚美德之贞正，则失其所用之误，罪责在上昏蒙，而非己之不明，内心无愧，胸怀坦荡，又何咎之有？爻称“无咎”，来自于九三阳刚贞正之美质。人之用与不用在人，有时机问题，君明臣贤，上下遇合，则大有可为，事业丰大；臣虽明而君昏蒙，则上下背悖而贤臣失其所用，这是因古代制度造成的社会悲剧，非一二贤明有识之士所能改变。但是，修养自身的内在美质以保“无咎”，则在己而不在人。读九三爻辞爻象，所得启悟至多。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平也，等也；夷主，德位相等的搭档之人。按：初九在下，上应九四，以下偶上，故称配主；而四视初，虽然同为相应，但却是降上就下，故称夷主。爻辞是说，九四，蔽日的乌云不断扩大，天空昏暗一片，依稀可见夜晚方才显现的斗星；这时下行前往求其阳德均等的初九相应，二阳合力而共辅柔弱暗主，以便促成其丰大之业，必致吉祥如意。从爻位爻象看，九四阳居阴位，过中不正，并非吉爻；又三、四、五互卦为兑（☱），兑有毁折之象，象征事业有所挫折，故爻称“丰其蔀，日中见斗”，乌云蔽日，天地昏暗。而九四处震体之始，为震动之主，又非动不可，此时前进行动，当然会呈现凶险之象。但如前述，处

“丰”之时，明以动也，明动相资以成其丰大之业。九四上承六五虽为暗弱之主，但其下应初九，同具均等的阳刚之德，合力共辅六五弱主，以初之离明，济四之震动，其助力倍增，起了质的飞跃，因而有条件共竞其业，以成其丰大之道，此所以爻又称“吉”也。如杨万里《诚斋易传》所分析：“九四居近君之地，处动卦之初（按：上震性动），有阳刚之德，此亦君子之刚而有为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掩六五之暗主，而不可以有为乎？六二之大臣，且不能发其蔽而启其明也，而况九四乎？然犹幸其下有初九之贤来主于我，而我为之主，吾道其庶几可行乎！故曰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章，文明灿烂而见其文章。爻辞是说，六五，谦柔待下，屈尊招贤，众贤毕至而共相辅助，则举国文明焕发而章采灿烂，福庆既集，佳誉流布，吉祥如意。据爻位爻象，六五以阴虚居阳尊之位，虽处中而非正，原为暗弱主象，非能成其丰大盛明之事业者。这是六五不利的一面。但它同时又具有利的另一面：六五以柔处刚位而居君位，贵为一卦之主，却有屈己待贤、态度谦虚之象，而无刚愎自用、独裁自尊之弊，所以利于团结在下的臣民大众；从爻象看，六五虽是阴爻，但处上震体中，震象雷动，又暗寓其雷刚之质，故有虽柔而实刚之象。六五居君位具雷动之声势，下又有光明佐电之贤臣（按：指下离为电其性明），故六五虽暗于一时而终能够复趋于光明。这是因为《丰》卦特点是明、动相资以成其丰大的缘故，而与其他卦中的六五性质有异，读《易》不可拘于典要而只取其阴阳相应之一说。杨万里具体分析说：“（六五）舍己之刚，用人之刚，即己之刚；舍己之明，用人之明，即己之明也。其小犹为齐威王，而况不为威王者乎？然则其致丰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群贤辅一柔暗之君，犹足以致丰大之庆誉；况得刚明果断聪明勇智之君而事之，其所就岂小哉！”辅助六五暗弱君主的群贤，主要指与五相应的中正之六二，二处下离之中，文明光辉的象征，故爻称“来章”。又初九应九四以共辅六五，初远臣、四近臣，同秉阳刚之德，可以共济五之柔暗；加以九三以其阳刚之德，志在致君泽民，虽因之折肱而不顾，其公忠体国，慷慨激昂。合而言之，在下众贤毕至而共辅其主，天下何事而不可为？其丰大盛明之吉，乃在必然之中。举贤授能，上下一心，全国团结，是六五致其丰吉的关键，而非仅为君主一人之力量。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无人，三岁不觌，凶。

蔀，遮蔽。窥，窥视。阒（qù），寂静。觌（dí），见也。爻辞是说，房舍丰大，但却设置了重重遮掩障蔽而不让人见，通过窗户缝隙窥视，发现屋中寂无人迹，三年不见主人露面，必致凶险。从爻位爻象看，上六虽然下与九三阴阳有应，但是，一来《丰》卦所论为明、动相须，而非阴阳之应；二来九三已“折

其右肱”，又志在致君泽民，而无暇于上，所以上六之孤立可见。上六居位，处上震之终，是为动极，是动而该止之时；又居全卦之终，是《丰》卦盛大盈满而达到极限的矛盾转化阶段。但是上六无视现实，更乏远见，仍然继续丰大自己，高高在上而不接近群众。故爻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汉王充《论衡·艺增》篇解释说：“《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也，非其无人也，无贤人也。”上六之屋，广厦栋连，聚敛钱财，如此“丰”大，为的是个人奢移淫靡的享受，而非为国家民族考虑，更不会为养贤招贤设想。所以王充所说的“无人”，并非真是没人，而是没有贤人，怕让贤人窥见自己的财产享受等隐私，故意“丰其屋，蔀其家”，把自己遮掩得严严实实，以免罪恶外露。虽是“三年不觌”，长久深藏不露，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久终必真相大白，而为天下人所不齿，此其所以而终见“凶”也。不识形势，高丰其屋而又脱离群众，其凶险衰败是自我罪过造成的。明来知德《周易集注》云：“上六以柔暗之质，居明动丰亨之极，承平既久，奢移日盛，故有‘丰其屋’之象。然势极则反者，理数也。故离之明极必反其暗，有草塞其家而暗之象；震之动极必反其静，有‘阒其无人，三年不觌’之象，占得此凶可知矣。”《左传》宣公六年载：“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这是取《丰》卦上六爻变而为言。颜师古注云：“言无道德而大其屋，不过三岁，必灭亡也。”事实确是如此，无德贪人，见此象能无惧乎！

对于《丰》卦不同于他卦的特点，《周易折中》引熊良弼氏之言云：“《丰》六爻以不应为善：初、四皆阳，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二、五皆阴，二曰‘有孚发若，吉’，五曰‘来章，有庆誉，吉’；三与上为正应，三不免于折肱，而上则甚凶。当丰大之时，以同德相辅为善，不取阴阳之应也。”概括论述六爻进退特点，颇为简明，可资参考。总之，《彖传》发挥卦义，提出了“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说法，颇富辩证思想因素，对后人很有启发。律之以史，实事凿凿，令人惊心。《宋史》卷四七二《奸臣·蔡京传》载：“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享《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帝（按：指宋徽宗）尝大晏（宴），出玉琖、玉卮示辅臣，曰：‘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京曰：‘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琖，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徽宗乃畏人言）……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任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两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倜然自以为稷、契、周、召

也。又欲广宫室求上宠媚，召童贯辈五人，风以禁中偪侧之状。贯俱听命，各视力所致，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而延福宫、景龙江之役起，浸淫及于艮岳（按：即万岁山）矣。”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九《蔡京擅国》条所载事实相似，但又载左司谏黄葆光与京不合，“蔡京怒其异己，密白帝降内批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省之计，徙为符宝郎。’”继又谪边鄙昭州。后来，北宋旋即灭亡。南宋宁宗嘉泰八年（公元1215），真德秀上疏论政宣时致祸之由十条，首及蔡京《丰》亨《豫》大之说。从币财盈溢的“丰”大，迅速推向了灭亡，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企业家庭，无不皆然，历史的教训，的确值得注意！

当然，古时“《易》无达诂”，《丰》卦所示，以上所述并非囊括无遗。从科技方面，也能有所发现。如六二爻辞：“丰其部，日中见斗，往而得疑。”九三爻辞：“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所谓“日中见斗”，直译为日升中天之时，却突然昏暗而见斗星；“日中见沫”，直译为中天之日而出现暮夜之星，同样是昏暗蔽明之象。一片光明景象的中天之日突然消失，为什么？据黄显功《东方智慧的圣火》一文说，这是古人有关天象观测的反映。据研究，“《周易·丰卦》中的‘日中见斗’和‘日中见沫’，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时间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此外，《周易》还具有以星象来比附人事，用人事来润色星象，使星象人格化的特点。”（见《周易十日谈》第94页）古代有关天文星象的观测，对当时农业、畜牧业及经商活动有重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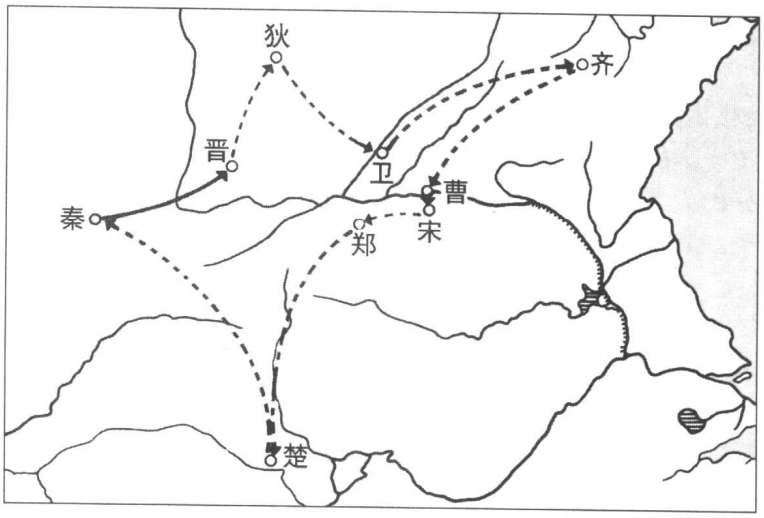
旅

卦第五六



行旅风霜说辛酸

《旅》卦（䷷）第五十六，次《丰》卦之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反转颠倒的综卦，卦象变化已兆示其事物相反相续的发展关系。《序卦传》说："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意思是说，人处丰大盛明的社会之中，常是无限制地追求无穷的享受，因而得意忘形，遗忘了"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的警诫，为其"丰大"而忘乎所以，他们汲汲富贵，欲壑难填，这样必然没日没夜地在外闯荡天下，从而丧失了安居乐业之趣，所以《丰》卦之后就紧接着象征羁旅在外的《旅》卦。又丰大者常因人忌而成为众矢之的，获罪故里故国，被迫羁旅避难。还有，古代士人为生活和事业而南北奔波，忘其室家，不遑安处，也是常有之事。如《诗·魏风·陟岵》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行役征夫，登上荒山野岭，瞻望故乡，思念亲人，想像家中父母兄弟对自己的叮嘱：赶快回家吧，不要在外死无葬身之地啊！古时之"旅"，于今之旅游大异其趣，多么可悲可叹！不过，羁旅之行也并非尽是苦辛与悲痛，苦尽而甘来，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比如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拓生活视野，投身现实激流，又有许多文学家因此而打通了成功之路。如晚唐宰相郑綮，他原是诗人，当他在京华官位日盛、生活丰裕之时，有人问他说："相国近有新诗否？"他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见孙光宪《北梦琐言》）所谓"灞桥风雪驴子上"，指的是羁旅行役的生活，是"诗思"涌泉之穴窍。宋代诗人于此有深切的体会。如陆游云："君诗处妙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其《与杜思恭书》又说："大抵此业（按：指诗歌创作）在道途则愈工，虽前辈负大名者，往往如此。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超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文学家获得成功的



■重耳流亡路线图

原因很多，但是，行万里路的羁旅行役生涯，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文学如此，他事又何独不然！所以元人梁寅《周易参义》说："诸侯之寄寓（按：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年轻时遭迫害流亡于列国间），大夫之去乱（按：如春秋时伍子胥离楚之吴），圣贤之周游（按：如孔、孟之周游列国），皆是。"如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因骊姬之乱，遭谗去国，开始时他只是一个胸无大志、苟且过活的贵族青年，十足的公子哥儿。但他在流亡过程中，备尝人生艰辛，了解各诸侯国之间复杂关系，锻炼了其外交与政治才智，流亡十九年的羁旅生活，把一个庸俗平凡的贵公子，锻炼成一个功业赫赫的时代枭雄，领导了历史的潮流。这是历史的事实。又如孔子的周游列国，在行旅途中，他与学生是饥饱参半，险难丛集，但他终于走出国境，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先师先圣之称，岂是虚名而已哉！所以，《旅》卦内容丰富，如象所示，吉凶在人，关键还在于正确对待，故卦辞有"旅贞吉"之言。

《旅》卦（䷷）下艮（☶）上离（☲），象征行旅之事。卦辞云："旅：小亨，旅贞吉。"小亨，有二解：（一）如程颐《易传》云："其占可以小亨。"陈梦雷《周易浅述》云："处'旅'本无大通，虽亨亦小。"以为小亨是亨通之小者，而非道路大为畅通。（二）黄、张《译注》云："谦柔小心可致亨通"，"小，指阴柔弱小者，又指行事小心谦顺。"二说于义皆通，但比较之下，余取后一说为准，因为"旅"外之亨，可大可小，如春秋时郑国商人弦高犒秦师以救国，其旅外之功，可谓大亨而非小者，故据事实而从黄、张，而不顺旧注诸解。卦辞是说，《旅》卦象征羁旅行役，旅途风霜，谦柔小心则道路亨通，行旅之时不宜苟且，而应时刻坚持贞正原则，则可致其吉祥。从卦象看，《旅》之下卦为艮，艮象为山，上卦为离，离象为火，故《象传》加以解释发挥，说："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山是静止不动的，犹如旅馆，供旅客暂时

栖宿；山上之火则高高在上，照明行旅之路，示人继续前进，犹如今之指路明灯，故《象》称“山上有火”为“旅”。但赵汝楳的解释略有小异，他说：“火炀则宅于灶，冶则宅于炉，在山则野烧之暂，犹旅寓耳，故为旅之象。离虚为明（按：指上卦），艮止为谨（按：指下卦，这是改换视角，而从卦性卦德方面来分析）。君子体之，明谨于用刑而不留狱。盖狱者，人之所旅也。不留狱，不使久留其中也。”张清子也说：“明则无遁情，慎则无滥罚，明慎既尽，断决随之，圣人取象于《旅》，正恐其留狱也。”（赵、张之解皆见于《周易折中》称引）

以下论爻辞爻象。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鄙猥贪吝之貌。斯，此也；帛书《周易》“斯”作“此”。爻辞是说，初六，开始旅行生涯，行为举止鄙猥琐细，以其卑贱之志而自取灾害。但是，尚秉和先生据《释言》训“斯，离也”，因而爻辞断句不同，应读作“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斯其所，即初六急于离开所处之地而上求九四之应（见《周易尚氏学》，转引自黄、张《译注》）可另备一说。初六处下艮之初，阴柔力弱而居位卑贱，但它却不顾艮止之性，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立即出门旅行，急于攀求九四，以望高升，其志卑贱，其行猥琐，为人所鄙，四虽欲应，也因其树敌太多而无能为力，此所以自取其灾。召祸取灾之责，不在别人，而主要是其内在的劣质。所以《象传》说：“旅琐琐，志穷灾也。”其所谓“志穷”，正指初六的贪吝鄙贱之心。从爻象看，上离为火，为兵戈，有灾害之象；而初六所处之下艮，有手象（见《说卦传》），手有取物功能，故爻辞称自取其灾。如春秋时齐大夫庆封（字子家），与崔杼合力弑齐庄公，立景公，为相，后为齐景公所逐，奔吴，封于朱方，旧态复萌，善封殖致富，楚灵王伐吴，俘庆封，戮之于诸侯之前。庆封奔吴，处旅之困，但他上不能如孔子之困陈而弦歌不绝，下不能如楚人钟离囚晋而不忘楚吟，其在朱方，仍然琐细经营鄙事，以封殖致富，因其贪吝之心而自取灭族之灾。但是，处旅之初，困窘之极，只要其志贞正，则仍可伺机复起，关键还在人们的正确对待。如三国时刘备，在权相曹操面前，专心种菜，似乎不关心政事而为琐琐之事。实际则不然，其志不穷，旅困待时，一旦时机到来，则如蛟龙出水，建国蜀汉，而畅其所游矣！故《象传》称“旅之时义大矣哉”！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即，就也。次，舍也。即次，即就其旅舍而得安歇。爻辞是说，六二，旅行途中安抵旅舍休息安歇，身怀钱财，旅资充裕，并且身边有忠诚童仆相助，只要自己坚守贞正之道，就能顺利达到目标。从爻位爻象看，六二阴柔处下艮之中，居中又位正，是一美爻。据《说卦传》，下艮有门阙之象，旅舍必有门阙，

六二中正而处艮止之中，此所以入门就居而有安息之象。又六二互九三、九四为巽（☴），巽“为近利市三倍”（《说卦传》），出外旅行，常为经商奔波，其利三倍，可见广积资财，而旅资充裕于用。人们常说：“穷路不穷盘。”旅途之穷，则因无亲友熟人帮助而徒唤奈何。现在六二富怀其资，无后顾之忧。再加以艮三索而得少男，有得童仆之象，旅途孤寂，得到忠贞童仆之助，排忧解难，非吉而何？但爻辞不直称“吉”者，因为处旅之时，境况特殊，古时旅行，交通不便，抗灾能力低下，因而凶险很多，所以出门旅行，只求无灾无祸就是福，又何敢奢求以称其“吉”？六二具中正柔顺之美德，处旅之时，尚不称“吉”以自警醒，更何况其他爻乎！杨万里《诚斋易传》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来比喻六二，他说：“晋文公之奔也，见秦伯则拜，见野人亦拜，不曰柔顺以下人乎？文而有礼，好学而不贰，凡十九年，守志弥笃，不曰中正以立己乎？广而俭怀，安而通迁，不曰怀其资而不露乎？其贞正如此，故至楚，楚飨之，楚送之至齐秦，齐秦妻之，秦纳而归之，可谓旅即次矣。腹心则子犯子余，股肱则魏犨贾佗，纪纲则秦之三千人，可谓童仆矣。岂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归而霸，孰御焉！”所以，六二在《旅》中虽不称吉而实具吉象。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爻辞是说，九三，旅行途中，所寓旅舍失火被焚，童仆离心而逃遁，应该守其贞正以防危害。从爻位爻象看，九三处下艮之上，有不甘于艮止之象。三之位已接近上体，上体离有火象，盲动上行而致火灾，故爻称“旅焚其次”；而艮又有山象。九三在艮上，阳刚高亢而性躁，高高在上而无视上下，其位又过中失正，此所以出现下有离心外逃的童仆，上又招致君主的疑忌，前途极其凶险，故爻称“丧其童仆”。上下离心，罪戾在于九三自身的非义之行，失正之心。故《象传》云：“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处旅之时，丧其正义廉耻之心，而一味刚亢盲取其利，能无灾乎？故爻有“贞厉”之戒。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处，暂时栖宿的处所，与六二安居之“次”性质有异。资，资财。斧，斧头。爻辞是说，九四，旅途惶惶，暂觅一处栖身，虽然同时获得了钱财和利斧，但心中却总是存有异样的不快感觉。从爻位爻象看，九四已脱出下艮之止，而进到上离之下，以阳居阴，其性虽刚却又谦柔待人，是一柔而能上之人。因此性质，处旅之时，虽然并非大路畅通，但总算觅得暂时栖身之所，以便消除疲劳而继续旅行，故爻以“旅于处”象之。但因九四之位过中失正，所以栖息称“处”，而不是像六二那样安居称“次”。从互卦看，九四与九三、六二下互为巽（☴），巽之象“为近利市三倍”，故爻称“得其资”，旅费有了着落。又巽有木象。九四与九三、六五上互为兑，兑为金。而九四处上离之下，离（☲）有

兵戈之象。巽木贯兑金而成兵戈，有利斧之象。故爻称“得其斧”。古时旅途，并非尽是康庄大道，又无直通隧道。当时交通不便，翻山越岭，荆棘丛生，可用利斧开山劈路；山间险路，又常有剪径强人在杀人越货，资用利斧则足以自卫。但是，九四居近臣之位，有近侍君主以宠其用的刚明之质，却因处旅之时而被外放，处于多惧之地，这主要是因其位失正又过中，怀抱利器而不能抒展才用，理想一直难以实现，故心情郁闷，而爻称“我心不快”。如《周易折中》所云：“案四居位非正，故不曰‘即次’而曰‘于处’，在旅而处多惧之地，故虽得资与六二同，而未免加斧以自防卫，其未忘戒心可知，安得快然而安乐乎！”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这一爻辞的解释，旧注颇有歧义，特别是有关“亡”字的解释，程颐《伊川易传》云：“离（☲）为雉，文明之物，射雉，谓取则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发无不中，则终能致誉命也。”所谓“亡”，指矢中而雉亡，猎获之雉成为古代士人相见时的见面礼品。但朱熹、来知德等则不同意程颐之见，以为不必曲折附会，而应按字面释“亡”为亡失。朱熹说：“‘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遗镞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说。《易》中凡言‘终吉’者，皆是初不甚好。”（见朱鉴《朱文公易说》卷六）相比之下，朱子综观全《易》来作解释，比程子之说更为合理，故取以为准。爻辞是说，六五，猎取野鸡，亡失了射出的一支利箭，虽有一些损失，但无碍大局，最终获得了美好的声誉和天命赐福。从爻位爻象看，六五以阴柔而居全卦中位，处上离之中，离象为火、为日，是文明之卦。六五为离中爻，柔顺文明而顺乎上下之阳刚，所以《彖传》说：“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而离又有雉象。雉，野鸡，象征文明之物。古代士人相见时所执的礼物。《周礼·春官宗伯》有“大夫执雁，士执雉”之言，《仪礼·士相见礼》云：“士相见之礼挚，冬用雉，夏用腒。”爻称“射雉”，是为了获得相见时的文明礼物。一矢亡，说明事情初非顺利，一矢不中而忘失利箭，虽略有损失，但紧接着第二矢则中雉

■雄雉



而取之，故无伤大局，“一矢亡”以见事态发展之曲折而已。又六五下互九四、九三为兑（☱），兑为口而性悦，则有众口悦人而致誉之象；而六五应二，六二与九三、九四下互为巽，巽为命，所以六五又因其下臣民之和应而获得上天的赐福以号令天下。观爻位爻象，六五是始凶而终吉之爻。六五所处，本是君位，但是爻辞为什么不取君义呢？程颐《伊川易传》强为之辞，云：“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则失位，故不取君义。”杨万里、来知德诸人皆不同意程说，而各以史实另作新解。如来知德《周易集注》卷十一云：“如（唐）玄宗幸蜀，及肃宗即位于外，德宗幸奉天，皆天子为旅也，可谓矰飞矢亡矣。后得郭子仪诸臣，恢复故物，终得其誉，又得命令于天下，如建中之诏是也。”唐德宗建中之诏，实际是当时的翰林学士陆贽起草，《资治通鉴》卷二二九载：“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按：即皇帝被迫离开京师而旅居在外），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诏书，虽骄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皇帝天子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其中也必然会有处“旅”之时而流亡在外之人。杨万里更进一步据史实而论兴亡，他著《庸言》，断言唐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亦旅也”，“然则程子谓君无旅，何也？曰：固是作《易》者与说《易》者所讳也，非讳也，不忍言也”（见《诚斋易传》卷九一）。他又说：“故有德则少康宣王，自旅人而为天子；无德则太康厉王，自天子而为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惧乎！”（《诚斋易传》卷十五）可见《易》变之理，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自然规律，绝不会因天子帝王而改其度。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号咷（táo）、大哭貌。易，通“埸”，黄、张《译注》云：“即田畔，此指荒远的田畔，喻上九居穷极之地。但近人顾颉刚则释“有易”为史有实事的古民族名，其说详后。爻辞是说，高高在上的鸟巢被烧个干净，旅客开始受到良好的招待而居高位，所以先是开怀大笑，后又因遭忌而受害，落得悲伤痛哭的下场；又如在荒远之地丧失了牛群，有凶险。从爻位看，上九居全卦之极，处矛盾转化阶段，却仍然不知进退之义，一味往上高攀，这和《乾》卦上九“亢龙有悔”相似，虽曾获得“先笑”之乐，但结果下场却极其可悲，故爻有“后号咷”之喻。从爻象看，上九处离之极，离象为火；又有雉象，雉为飞鸟；又据《说卦传》，离之象“其于木也为科上槁”，则又有鸟巢之象。鸟巢筑于枯木高枝之上，自以为寄旅之安，所以有“先笑”之乐；但枯木易受离火之灾，旅者不知，肯日乐观而受其害，致“焚其巢”之大灾，此爻所以称“后号咷”也。又离中爻从坤变易而来，坤（☷）象牛，故离又有牝牛之象。《经典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即称离为牝牛。爻辞后半段以丧牛为喻，也有一定卦象根据。上古游牧民

族，逐水草而居，过着“旅”人的生活，丧其牛，大牲畜尽皆亡失，则其资财丧失殆尽，又将如何生活？故爻称“凶”，是很自然的。但近人顾颉刚另据史实考据而作新解。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根据《山海经·大荒东经》“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结合郭璞《山海经注》引《真本竹书纪年》及《楚辞·天问》，勾画出殷先祖王亥旅居有易被杀的历史故事。顾颉刚则根据王国维的考据新成果，断言《易·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无悔”，及《旅》上九“丧牛于易，凶”，所述是同一历史故事的前后过程，他说：“想来他（殷王亥）初到有易的时候曾经过着很安乐的日子，后来家破人亡，一齐失掉了，所以爻辞中有‘先笑后号咷’的话。如果爻辞的作者加上‘无悔’和‘凶’对于本项故事为有意义的，那么可以说，王亥在丧羊时尚无大损失，直到丧牛时才碰着危险。”（《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王、顾的考据史实，颇多启迪。《周易》卦爻辞，虽多为口头传说，但却各有其认识的价值。但是，王国维有关甲骨卜辞及殷周先王故事的研究成果，是近代的事，古代注《易》诸家皆无幸一见殷商甲骨卜辞，所以一般仍持旧说，以影响后世。如《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鼓（yuán，鸢也）焚其巢。男子孙通等……往视，见巢灺，尽坠地中，有三鼓觳烧死。树大四周，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闻……（鼓）贪虐之类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泰山、岱宗，五岳之长，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也。天戒若曰：勿近贪虐之人，听其贼谋，将生焚巢自害其子绝世易姓之祸。其后赵蟲（飞）燕得幸，立为皇后，弟为昭仪，姐妹专宠。闻后宫许美人、曹伟能生皇子也，昭仪大怒，令上夺取而杀之，皆并杀其母。成帝崩，昭仪自杀，事乃发觉，赵后坐诛。此焚巢杀子后号咷之应也。一曰：王莽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祸云。京房《易传》曰：‘人君暴虐，鸟焚其舍。’”如果我们弃其天人感应的迷信内容，则可窥见《易·旅》上九爻辞之精神。

《旅》之为卦，以人生寄寓行旅为喻。其卦六爻的阴阳对应关系，似乎与一般的卦不同。一般的卦，上下卦六爻取阴阳应和为佳。但是《旅》卦则不尽然。初六与九四虽然阴阳有应，但初琐琐而“取灾”，四则“我心不快”，均有遗憾。六二与六五同为阴爻，照理应该同性相斥，但处“旅”之时，却因其谦柔居中而获吉，如二之“怀其资，得童仆，贞”，五之“终以誉命”。而九三、上九则因其阳刚而居上下卦之极位，亢阳盲取而致灾，三有焚次丧仆之厉，上有号咷丧牛之凶。由此可见，阴阳相应之爻，只是一般原则，特殊情境之中，可以另外原则代替。比如《旅》卦，因古代交通不便，出门旅行，多非得已，前途颇多辛酸与风险，构成了人生道路中的一道道难关。比如汉《古诗十九首》首标：“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还有“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

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说不尽人生行旅的孤寂与悲凉。又如曹植《杂诗》云：“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止。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又另添一段政治风波所掀起的深沉人生慨叹。古人外出谋生或发展事业，既不得已，又非易事。一旦离别故土，踏入异地他乡，就是进入别人的势力范围。俗话说：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行旅之中，势孤力单，绝非逞其刚强之时，因此，当然是以谦柔中道为上了。《旅》之六二与六五，正因其阴柔得中而致吉。反之，如九三、上九，则因擅逞其阳刚高亢之气而致凶厉。这是历史的教训。现代社会的情况和条件，虽有极大的变化，但是人们出国，侨居异国他乡，还是应该谦虚谨慎，与侨居地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帮助，互相交流，并且彼此促进为佳，这就是《旅》卦谦柔得中的立场。那种自持先进强国，出门盛气凌人，对侨居国的人民，怎么看也不顺眼，视为下等人的“刚强”态度，犹如《旅》之九三、上九，最终必然因树敌太多，自找倒霉，逃脱不了凶厉的可悲下场。《彖》称“旅之时义大矣哉”，岂是浪言，能不慎乎！

巽

卦第五七



顺入人心秉刚正

《巽（xùn）》卦（䷸）第五十七，次《旅》卦之后。《序卦传》说："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八卦之巽（☴），其基本象征物是风，风顺沿缝隙而无所不入，其性为顺。而六十四卦的《巽》，则为两巽重叠，是一上下卦体相同的纯卦。旅人之事，外出谋生或求开拓事业，在异土他乡，在他人的势力范围内，必须态度谦逊、顺沿人情，方能无所不容。《序卦传》据此义而发挥，说是人们终日羁旅行役，在外奔波，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糊口，最终必须有一定的方向和目标，因而达到一定的目的地时，巽顺以入，被在上者（如君主之类）所留用，居有定所，事业有成，所以《旅》卦之后有《巽》卦，象征谦顺以成事，比如阴顺阳，柔顺刚，下从上之类。总之，居巽顺之时，巽下者以谦顺为体，以容入为用。所以卦辞有"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之语；《象传》据卦象以解释卦义，又有"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之言。所谓"随风"，指的是两巽（☴）相迭而成六十四卦之《巽》（䷸），就像和风一阵又一阵，无所不入。风之所以能"入"，就因为它顺沿一定的孔道隙缝，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后来人们据此加以发挥而论政，故《象传》有"君子以申命行事"之说。因为人们习惯于把君子之德比喻为无所不入而感化百姓的"风"。比如《论语·颜渊》，季康子问为政，孔子云："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于此可见，君子观《巽》卦象，体会到教化人民，就像和风阵阵，深入民心，君主借此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并非粗暴武断，甚或专制独裁，这不合《巽》卦原则；谦顺服从，也要讲究一定的道德原则，此"风"必须是"君子之风"，坚持正义的立场，无论上下都应如此，然后和"风"才能顺正以入而无所不化，新的事业才能获得顺利的健康发展。这就如宋郭雍《郭氏传家易说》所称："君子之德，风也；有风之德，而下无不从，然后其重巽之义。"

《巽》（䷸）卦下巽（☴）上巽（☴），是纯巽之卦。巽象为风，其性为顺。此“风”非狂飙暴风，致人于命；而是熏风南来，激扬生机。有德之巽风，犹如春风阵阵，沐浴其中，令人陶醉，自然化入而无不驯顺。卦辞云：“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卦辞是说，《巽》卦象征谦顺；谦虚小心适势顺人则可保证道路的畅通，利于人们前进，利于大人君子的出现。古人释“巽”，多以卑巽（顺）为说，实际上卑顺与谦顺意义有异。巽者，顺也。但《巽》卦之“顺”有多义，并非只是一味地卑躬屈膝，更不是只有一副臣从主子的奴才相。巽顺当然有其依顺、顺从的一面，这是态度谦顺者所具有的美德。但是，依顺并非盲目而无原则，比如殷纣王之杀人取乐，傲天祸民，其命令能盲目卑顺地执行吗？又如子孝其父，传统美德，儿子对父亲的遗命，是否应一味卑恭承顺、不折不扣地加以实行呢？也不尽然，而应分清父命是否合于道德之正。如《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按：武子之子）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春秋之时，属于奴隶社会的晚期乱世，奴隶主贵族要杀一婢妾，犹如踩死一只蚂蚁，根本不当一回事。因此，魏武子临死之前，有以爱妾殉葬的遗命。在重孝道的古代，遗命有极大的影响，一般视为必须遵奉执行的金科玉律。但是，其子魏颗却坚持巽顺贞正之道，拒绝以活人殉葬，而嫁其父妾，挽救了一个活人的生命。所以，魏颗之于武子，虽仍然尽其子孝之道，态度谦顺，但并非盲目卑顺地执行其父之遗命。因此，从理论上分析，“顺”与“逆”是一对相对存在的矛盾概念，有顺则有逆，如果不合巽顺之正，则逆而行之不为背悖。这就是《巽》卦所象征的“谦顺”，而不是无原则盲目遵从的“卑顺”。另外，《巽》顺之道，还另有顺沿之义，也就是说，如风之入室，要顺沿门窗或缝隙而入，要遵循一定的客观道路。于此可见，谦顺为人，也为一定的客观情境所制约而遵行，也是人生旅途中的某种客观需要。最后，巽“顺”之人或事物，如能尊奉谦顺正道，又合客观形势需要，则“顺”又有顺遂心愿、理想实现、道路通顺之义。巽“顺”之三义，应该综合、辩证地予以全面的分析，而不应该只是执其盲目“卑顺”之一端。如明人蔡清《易经·蒙引》就认为程颐《伊川易说》只说“顺然”不妥，“‘巽’字与‘顺’字有辨矣”。所论虽未展开，但已见其端倪。后来《周易折中》引而申之以总结卦象卦义，云：“巽，入也。从来说者皆以为一阴入于二阳之下，非也。盖一阴伏于内，阳必入而散之，阴性凝滞，必散而后与阳合德也。其在造化，则吹浮云散积阴者也；其在人心，则察幾微穷隐伏者也；其在国家，则除奸慝厘弊事者也。三者皆非入不能，卦之所以名巽者以此。亨之所以小者，如《蛊》则坏极而更新之，故其亨大；《巽》则但修弊举废而已。观卦爻‘庚甲’之义可见也。天下之事既察知之，则必见之于行，故曰‘利有攸往’；非有刚德之人不能济也，故又曰‘利见大人’。”以下讨论爻辞爻象。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爻辞是说，初六，进退犹豫不决，是由于其卑顺的态度、患得患失的心理造成的，应该像坚强勇敢的武士那样，勇于坚守自己的正义原则。原来，据《说卦传》，巽之象“为进退，为不果”。巽象为风，又为股，故有因风而脚随进退之象。初六处于重巽之下，为阴柔无力之象，以此欲上行以人，有求于人，当然会出现犹豫不决的现象，故爻辞称“进退”，实是其患得患失心理的形象写照。初六阴居阳位不中失正，又上与六四阴阳无应，从爻位爻象看，怎能不处于进退两难之地呢？《周易折中》引俞琰之说云：“巽，申命行事之卦也（按：巽象为风，古人以为“风者天之号令”，故云）。令出则务在必行，岂宜或进或退？初六卑巽而不中，柔德而不武，故或进或退而不能自决也。若以武人处之，则贞固足以干事矣，故曰‘利武人之贞’。”《易》理重变，初六若以阴化阳，则位贞正，又初六阴化阳后，则卦象下巽化乾（☰），乾有刚健武人之象，其性刚正不阿，故爻称“利武人之贞”。有关初六小人之“进退”，后来唐韩愈散文名篇《送李愿归盘谷序》有形象生动的描绘可资参考：“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按：行不进貌），口将言而嗫嚅（按：欲言而止貌）。”其所“进退”，可悲可叹。但是，人生进退自有其道，就看所用如何。天下之理，可进则进而不为躁，可退则退而不为怯，关键在其持正不阿。故如杨万里《诚斋易传》所释：“（初六）阴柔一也，弱者用之为邪，强者用之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为谄，勇者用之为谦。故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韩信之师广武，谦而非谄，师资之大义也。以谦恭柔逊之德，而御其刚强武勇之气，此其贞而利。与《易》穷则变，变则通，顾用之何如耳。”初六之巽顺进退，并非只是奴颜卑膝而自取吝凶一种前途，只要持其贞正，处理妥当，则其“进退”之犹豫，可化为谦顺之正途，并有可能因此而开拓亨通的康庄大道。初六将可能成为一个新起点，就看你如何运用了。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史巫，上古之时巫史性质相近，皆为沟通人与天帝鬼神的中间媒体，史多作策告于神明，巫则歌舞以娱神明。纷若，盛多貌，若为语气助辞，无实义。爻辞是说，九二，谦顺地拜见尊者于床下，犹如巫史以虔诚之心敬事神明，必致纷然多吉而无咎害。按巽顺之道，善则为谦虚恭逊，过则为奴颜之谄媚。九二阳刚而居阴柔之位，上无其应，故有过卑之嫌，故爻称“巽在床下”。古时尊者据床而坐，所谓“胡床”，即近于今之交椅。尊者坐于床上，而卑者则拜于床下，乃自然之态势。但九二居大臣之位，却卑拜床下，失其阳刚之质，行其阴柔之道，犹如国之大臣而不敢犯颜直谏，只是一味阿顺乎上，虽当巽时，但也过分卑顺，故爻有“巽在床下”之戒。但九二又居下巽之中。《易》卦最重中道，中则不亢不谄，大方向正确。故二虽失正而卑，但还不致过分谄媚取容，只要能自我振作，

如巫史事神，一心虔诚，则又能重新获得纷若之吉。九二与九三、六四互卦为兑（☱），兑为口，为言说之象，犹如巫史事神时口中念念有词，故爻以“用史巫纷若吉”为喻。巫史以虔诚感格神明。同样，九二若能致其虔诚忠心，达于上之九五尊者，则其上虽有九三、六四之隔阻，最后必能上达天听而被理解和接受。关键还在于以正取顺，而非一副奴婢之相。故《象传》释云：“纷若之吉，得中也。”得中之顺，则不为谄而见其诚乎。故爻称“无咎”。

九三，频巽，吝。

频，王弼《周易注》云：“频，频蹙不乐，穷不得已之谓。”据此，频，通颦，蹙也。蹙眉，忧郁之貌；但程、朱旧注皆训频为屡次。如朱熹《本义》：“（九三）过刚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也。勉为屡失，吝之道也。”又如宋赵汝楳曰：“频巽者，既巽复巽，犹频复也。”二义皆通，今据爻变之象，九三化阴，则与初六、九二组成坎卦（☵），坎为险陷而有忧愁之象，九三所以临险而蹙眉致忧也，故取前一说。爻辞是说，九三，临难而忧愁蹙眉，勉强承顺他人，乃为致吝之道。从爻位爻象看，九三虽阳居阳位得正，但有失中道，并且上无其应，又以阳刚之质而处下巽之上，刚亢而难以柔顺。但居巽之时，处上下二巽之间，环境形势具巽之义巽的重巽之态，于此特殊情景，能不顺服于人乎？如六四凌其阳刚，困其处下巽之体，九三也不得不顺受其压，但是貌承顺而心不甘，此所以爻称“频（颦）巽”，其顺从非出于内心的自觉认识，所以容易反复变卦，形势不利又反复无常，当然只能自取其吝了。从初至四爻的约卦为坎（☵）来看，九二、九三约为坎中之阳，实是陷于险难之中，脱险无方，非吝而何？故《象传》云：“频巽之吝，志穷也。”处巽之时，缺乏远大的理想，又不能提出具体的有效办法，躁急而无断，因其“志穷”而致吝，也是势在必然了。如《周易折中》所云：“巽者入也……德之制若不能断制，则其入深者，徒使弊益以滋，而奸无所畏，非惟无益，而又害之也……九三、上九皆过于中，则是蓄疑以败谋，多思而少断。然三未如上九之甚也，故但为‘频巽’之象，而占曰吝。”但是，释频为数也，谓“频巽”为“屡巽屡失，故有吝道”也能自圆其说，如陈梦雷《周易浅述》更比较《复》卦六三爻辞“频复，厉无咎”，分析云：“《复》之六在频复曰无咎，则此吝者，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屡失屡复，复在失后，故虽厉无咎。频巽频失，失在巽后，故吝。又巽与复不同，复则天心之来，心本难纯，故以频复为无咎。巽不过卑巽之一节而已，乃不出于中心，失而复改，改而复失，故为可吝。”反复无常，小人之行，中不诚信，致吝之道。陈氏所释，启悟颇多，可备参考。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田，泛指田猎。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穀梁传》曰：“春猎曰田，夏曰

苗，秋曰搜，冬曰狩。”三品，有不同的解释：《周易集解》引翟玄曰：“田获三品，下三爻也，谓初巽为鸡，二兑为羊，三离雉也。”胡朴安《周易古史观》曰：“田获三品者，会猎聚众而入。三品，田猎所得禽之数。”但一般注家则不以为然，如黄、张《译注》引《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肉，一为宾客，一为充君之庖。”应以后说为是。从爻象看，六四上互九三、九五为离（☲），离卦有兵戈之象。古时君主诸侯田猎，亦属武事，故云。初六、六四两阴爻，初“利武人之贞”，四又有田猎武事，可见当巽之时，阳刚之气必不可少，并非一味卑顺。爻辞是说，六四，悔恨的消失，是因为它在君主举行的田猎活动中获得了“三品”礼物作贡献。六四质阴柔而下无应，承上乘下皆是刚健之爻，本身又有过中之弊，原该有悔才是。但从另一角度看，六四阴居阴位而得巽正，又四之处位，在上下体之间，已跃升至上体之下，能巽顺其上之状，又巽临下体，态度谦顺以待其下，上下阳刚因其巽顺而皆大欢喜，此其善处人处事之象，因而减少矛盾，所以爻辞有“悔亡”之言。故《象传》释曰：“田获三品，有功也。”又如程颐《伊川易传》所说：“四能巽于上下之阳，如田之获三品，谓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处之至善，故悔亡而复有功。天下之事，苟善处则悔之事可以为功也。”所论精深而启人思维。逢凶化吉，人之所愿，不过是否善处其事，也是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无初有终，程颐云：“命令之出有所变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终，更之始善也。”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中国古代以天干计数，在十个天干数目中，戊五己六，居天干之中数，庚则第七，在己之后，超戊己之数则是过中，过中之庚，则为动荡变更之数的开始，故以庚日象征除旧布新的变更之始。先庚三日，是说变旧布新很重要，提早时日讨论准备，是慎重思变的意思；后庚三日，是说公布变旧布新的命令后，又根据具体形势变化而加以调整。是思终以考其成的意思。爻辞是说，九五，坚持正义以致吉，悔恨就会消失，所往无所不利；发布变旧布新命令，开始民心未服，命令的执行并非顺畅，但后来大家逐渐认识到变革的重要，因此最后命令入人之心而顺利实现；在象征变旧布新的庚前三日就先公布变革草案，引起臣民热烈讨论，加以补充修订；又在庚后三日考察庚日变革命令是否合乎实际而加以适当调整，这样就会上下巽顺而获吉祥如意。九五当巽之时而刚健果毅，原疑有悔之事，但其居全卦尊位，又有权申喻命令以领导全国，九五阳刚中正，其行其令，并非仅为个人，而是坚持正义之道，为国家民族而思考，出于一片公忠体国之心，此所以爻称有贞以致吉而无不利之象。但更重要的是，当巽之时，应当利用上下巽顺的有利时机，以申喻命令，果敢而又细致地推行变革，除旧布新，以使变革之正道，深入人心，以便促进全国人民的思考，从不自

觉而逐渐自觉。九五之巽，并非一味顺从守旧之众，对于留恋落后旧传统者，虽然庚日变革之令，开始并不理解，但经讨论并在实行调整变更，终于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此爻所以称“无初有终”而获吉祥如意也。比如明代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变法，当时守旧官僚大加反对，但居正借助明神宗而宣令，开始强制推行，结果衰弱的明王朝，又逐渐恢复其生机，因张居正变法国家兴盛，从而又延续了数十年的生命。杨万里很明白这层意义，其《诚斋易传》云：“一贞立而百顺随。”关键是在上者必持贞正之德，方能令人巽顺信服。他又说：“无初者，非守常，乃应变也。事有不得已而变更者，民未孚上意，必未从上之令也，圣人其敢求民之骤从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详；事之既更，复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晓然知利害之实，则欣然顺上之令而乐从之矣，是以有终。故盘庚迁都，先之以上篇之书，后之以中篇下篇之书（按：盘庚是殷商王朝中期的帝王。今本《尚书》存有《盘庚》上中下三篇）。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诰》《洛诰》，后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后庚之义也。甲者事之始（按：《蛊》卦辞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之语），庚者事之更。”国之变更，事关重大，能不慎乎！按：从爻变卦变角度看，五阳化阴，则互九三、六四为震（☳），巽象风，震象雷，雷以动之，风以入之，风雷相薄，“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故九五有变更之象。又九五互六四、九三为离，离有文明之象，象征巽顺之变有所成就之象。故爻有“庚”日之喻。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资，资财；斧，利斧，用以开路斩伐荆棘或旅途自卫，参《旅》卦九四译注。巽在床下，参前九二爻辞译注。爻辞是说，上九，跪在床下，谦恭卑顺地拜见尊者，犹如丧失了钱财和利斧。只有坚守正义才有可能防止凶险。九二与上九爻辞，同有“巽在床下”之言，为什么二致“纷若吉”，而上却是“凶”呢？这是因为其处位及爻象不同的缘故。九二在下体之中，虔诚谦顺地敬事神明，以其中正之诚信而致吉。相反，上九则以阳居阴，位非中正，下失其应，又升至上体之上，居全卦之极，是巽穷之时地，以其阳刚过中亢躁之质，而在巽极矛盾转化之时，却不知其变，而仍然一味奴颜卑顺，丧其武人阳刚之质，故与初六“利武人之贞”相反，而丧其刚武自卫之利斧。而从爻变看，上九化阴，则上体为坎（☵），坎为险陷，则上九有险陷之凶象。陈梦雷《周易浅述》又把《巽》上九与《旅》九四作比较，说：“《旅》九四以阳居阴，得其资斧；此上九亦以刚居柔，丧其资斧，何也？旅道宜柔，故刚居柔者得；巽戒过柔，巽之极而居柔，失所断矣。又《旅》四离体为戈兵，《巽》上九在互离之外，故有丧资斧之象，虽贞亦凶，况不贞乎？”所论甚明。从历史的角度看，九二之“巽在床下”，是合乎中道之谦顺，故吉无咎。而上九之“巽在床下”，巽为躁卦（见《说卦传》），上九以阳刚居巽之极而失中正之道，内心实躁急取利，但外为卑顺而

已，而非出于内心至诚，所以实是奸邪小人。上九之凶，早见于班固《汉书·王莽传》："司徒（王）寻初发长安，宿霸昌厩，亡其黄钺。寻士房杨素狂直，乃哭曰：'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自劾去。""丧其齐斧"，即《巽》上九爻辞。又如唐德宗时代的宰相卢杞，阿媚取容承顺德宗皇帝，以其小人险恶之心，而陷害忠良，从危害国家，到自己最后贬死于澧州别驾，其卑顺乃害人之利斧，为保其资财权势，置国家民族危亡而不顾，最后是害人害己，同样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载唐德宗与宰相李泌论卢杞，云："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按：宰相，著名理财专家），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但是，德宗仍然为卢杞之奸回护："上曰：'朕好与人较量理体……杨炎论事亦有可采，而气色粗傲，难之辄勃然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忿发。余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也。'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卢杞之奸，违悖贞正之道，虽可能得意于一时，但最终仍是媚人害己，自致凶道，而落得千古骂名的可悲下场！又杨万里《诚斋易传》，比上九为奸邪之顺，云："上九位极乎人臣，身极乎崇高，爱其所有之富贵权势，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极其巽顺阿谀以保其所有。不知顺愈过而身愈危也。故小则丧其资用，大则丧其权势，虽正亦凶，况不正乎？李斯忧蒙恬之代其相，则顺赵高废立之邪谋，惧失其爵禄而求容，则顺二世之欲而劝之以逸乐……故司马迁论之曰：'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可谓洞见其肺肝矣。"历史的教训，既生动，又深刻，值得人们反省

综观《巽》之为卦，巽顺以入，其总体精神是外谦顺内刚正。谦虚待人，则上下无所不容，其入人之心易而深；严正待己，则秉其阳刚中正之美德，除奸就义，正能胜邪，内心诚信淳正，所以不管是其顺人或顺于人，皆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故《系辞传下》称"巽以行权"，权变之顺，为公而不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因而不改其内在的中正之阳质。所以巽顺之道，实是内具阳性刚健之德，是谦顺，而非一味的奴颜卑顺。全卦以二、五为吉。九二之巽顺，柔中有刚，内心诚信，因其得中而致吉；九五则阳刚中正而为一卦巽顺之主，因其为国为家而变革获吉，可见刚健中正是巽顺精神的主心骨。有关这一点，其余四爻吉凶可资佐证。初、四阴柔，是卦之所以为巽之爻，初居最下失位，过分卑顺柔弱，缺乏阳刚之气，故爻称"利武人之贞"而"进退"犹豫；四居得位，但居上巽之下，有过中的缺陷，同样缺乏阳刚之气，故虽升至上体而位正，但也仅致"悔亡"而不言吉。九三居下卦之上，过刚失中而致吝；上九则居

全卦之上，穷极过中失正，宜其有凶。另外，巽顺之义，并非只是下顺乎上，同时，也有上顺乎下的精神存乎其中，虽然作者并非加以强调突出，但却因其包含一定的“民主”因素而不容忽视，如九五爻辞“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是在变革前后，与臣民共同商议，顺乎下情，以把变革化为广大臣民的自觉行动。有了这一“民主”精神因素，可以促进变革的迅速发展与不断深化，国家改革是如此，企业改革亦然，应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

兑

卦第五八



欢悦以道远邪媚

《兑》卦（䷹）第五十八，紧接于《巽》卦之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颠倒的综卦，而呈彼此相承相续之兆象。《序卦传》云："入而后说（悦）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通悦。《序卦》所称"兑者说也"，"兑"是一种无言之悦，也就是说，其所相悦，是一种不必用言语来传达的内在心灵感应。八卦之兑（☱），从坎水变化而来，坎（☵）之初六化阳成兑，犹如坎水下流堵实（按：《易》理阴虚而阳实），水流蓄积而成湖泽。故兑卦象征泽，泽水有利农田灌溉，柔顺滋润万物，一派喜人形势，故其义主喜悦。八卦之兑两相重叠，成为六十四卦之《兑》，愈见其欣欣然喜上加喜的欢悦。《序卦传》是说，人们上下彼此之间，相互容入为用，故其事业有成，皆大欢喜。因此在巽顺入人之后，必有《兑》悦。施以人事，如《彖传》所称："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但是，顺天理而应人心，是以愉悦广大民众为先决条件的，自有其客观规律和一定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不仅有物质享受方面满足以后的欢欣，更有精神享受方面满足以后的喜悦。所以《象传》就突出地强调其主要的精神欢悦方面，从卦象来加以分析，认为两泽相附丽，交相浸润滋益，而有"君子以朋友讲习"为兑悦之言。清陈梦雷《周易浅述》解释云："然天下之至可说（悦）者，亦莫如朋友讲习：讲者，资友讲之以究其理；习者，自我习之以践其事。习而不讲，则精义不出，昏而无得；讲而不习，则至理不入，殆而不安。朋友讲习之余，心与理洽，天下之说，莫过乎此！"但是，在六十四卦中，《豫》卦（䷏）也象征欢乐，其卦义似与《兑》卦欢悦相近，而在细加比较之后，发现二卦之欢乐欣悦，不仅有程度的不同，更有因其性质有别而出现的差异：在六十四卦所分的上、下经中，《豫》卦

属于上经部分，偏于自然之事，象征物质丰收以后的欢乐；而《兑》卦则属下经部分，古人认为下经偏重于议论人事，所以重在人类精神的愉悦，经过了由实而虚、从物质到精神的抽象和升华。二卦精义有别，读者自当细辨其味。以下论卦辞卦象。

《兑》卦（䷹），下兑（☱）上兑（☱），卦辞云："兑：亨，利贞。"（按：也可断句为"兑：亨、利、贞。"）卦辞是说，《兑》卦象征欢悦，前途光明亨通，坚持正义之道，必然获得利益。其卦象为下兑上兑，兑为泽，上下两泽相迭，如《象传》所云："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就是二泽相互附丽，交相滋润。古代是宗法农业社会，湖泽之水的灌溉，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成熟和丰收至关重要，所以《易》卦作者取以为喻，故《说卦传》云："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世界万物的生命，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泽水于人，沾溉生命，致人欢悦，谁也离不开它，人的细胞，一旦失水时间太长，就会死亡。不过，人们由此更深一层，观《兑》两泽相迭之象，进一步悟到了"君子以朋友讲习"的精神愉悦，其要义正如上言。又如杨万里云："天下之可说（悦）者，莫小于声色臭味，而莫大于义理……两泽相丽，则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讲，则义理相益而不穷，而况九泽与众友乎！是以君子说之。"（《诚斋易传》卷十五）如果把儒家的"义理"进一步扩大，泛指一般健康的精神生活，则所论更为深刻。《彖传》进一步从卦德卦性方面来分析全卦的精神要义，云："兑，说（悦）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彖传》所说的"刚中而柔外"："刚中"指的是九二、特别是九五的阳刚中正，是《兑》卦之所以欢悦的关键所在，"刚中"是兑悦之体；"柔外"则指上、下卦中的二阴爻，各居其卦之上，指的是六三与上六。"刚中"以正己，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反之，君子具刚中之美德，严格要求自己，自然成为民之楷模，大家学习效仿。因此，"刚中"是兑之体，是健康正义的欢悦；而"柔外"是兑之用，指的是悦下以行事，民心欢悦。天下国家，并非只是君主一人之天下国家，如果在下臣民离开其君主，何来天下国家？就是《尚书·皋陶谟》于此也已有模糊的认识，所以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之言。故《兑》卦之"柔外"与"刚中"，分之为体用，合之实一物，己正民悦则天悦，惟不肥己而思利其民，又因利于民故民悦。这无论是对得位的君主或无位的君子圣贤，都是一种极高的道德要求，虽然真正实行者寥寥可数，但是，《易》卦作者（包括《易传》）却坚持高标准，为中华民族树立一个永放光芒的精神支柱，影响了千秋万世。如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所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撰《范公神道碑铭》有具体生动的描绘，云："公（按：指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这就是《彖传》所称的"顺乎天而应乎

人”。劳苦之事，先于民而尝之；犯难冒险之事，如果必要，先于民而行之，大义凛然，临危而不乱。危苦之事，身先士卒；享乐之事，处处让人，人民有了这样的领导和榜样，于是心悦诚服，发出由衷的欢呼，并且积极支持和拥护。如大禹治水，为民除害，先天下之忧而忧，“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故百姓积极参加治水而忘其劳苦，最后消除洪水之患而民欢乐。又如战争，白刃相加，性命相搏。但是成汤之伐暴，人民却积极拥护，如《孟子·滕文公下》所称：“（葛伯残暴虐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征而西夷怨，南面征而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这是“说以犯难，民忘其死”之例。杨万里就此加以发挥，云：“好逸恶劳，好生恶死，人之情也。劳而忘劳，死而忘死……说（悦）而不自知其劳且死也。曷为而说也？知圣人劳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说而自劝也。劝民与民自劝，相去远矣！”（《诚斋易传》卷十五）惟己正利民而民悦，人心悦则“民自劝”，其参与化为自觉的行动，是出自内心的欢悦。有了这样的自觉之民，则何事而不成？天大的困难，也会被自觉而欢乐的人民所战胜。一度滔天的洪水，不是被大禹所率领的百姓劳动大军所战胜了么！故《彖》称“说之大，民劝矣”，道出了《兑》卦精义之所在。

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九，和兑，吉。

爻辞是说，初九，与大家和睦相处，共享欢悦，吉祥如意。初九以阳居兑悦之初，质刚而位正，处兑悦之时，上无专一之应，又远离阴爻而不比于柔，得悦之正而不谄，其与众同欢，有君子和而不流之象，故致其吉。《周易折中》引赵玉泉曰：“阳刚则无邪媚之嫌，居下则无上求之念，无应又无私系之累，其说（悦）也不谄，不渎中节而无乖戾，和兑之象如是，则说得其正矣。”故《象传》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心正而履行于正，悦不为谄，何疑之有？

九二，孚兑，吉，悔亡。

爻辞是说，心怀诚信地与众同悦，吉祥如意，悔恨定然消失。从全卦角度视之，《兑》之欢悦为吉卦。但从具体爻位爻变的运动发展来看，则又多悔吝凶之戒。《易》之作者，思考周密，卦与爻从不同角度考察，从而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合乎实际的精神。另外，八卦重叠的纯卦，上下皆无阴阳呼应，所以大多从邻近上下的阴阳承比角度来分析吉凶吝咎。《兑》卦也是如此。九二上面承比于六三。而《易》卦多以阴爻为佞媚之小人。九二阳居阴位失正，又承比六三小人而悦，本该有悔；但是，九二又以阳刚居中而现其美德，孚信内充，虽承比于小人，是形势地位所致，出于不得已，故又能自守其中正之道而不失其贞节，此所以爻称悔亡而致吉也。王宗传释云：“六三阴柔而不正，所谓非道而以说者也。



■周敦颐像

而二比之，疑于有悔矣。然二以刚中诚实之德，充足于内，故虽与三同体，而无失己之嫌，此其悔所以亡也。”君子与小人相对而立，无小人则无所谓君子，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不可能完全不与小人相处，关键在于是君子改造小人，或是小人影响君子。北宋周敦颐撰《爱莲说》一文，称莲花是“花之君子者也”，云：“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九二刚中之德，受人爱悦，与莲花那“中通外直”的高贵品格何其相似！

六三，来兑，凶。

按《易》理，自内（卦）至外（卦）为往，自外至内为来。六三处上下卦之间，在矛盾转化之地，但尚属内卦，故称“来”。爻辞是说，六三，主动前来追求欢悦，必有凶险。原来，六三阴居阳位，失正不中，又处下兑之终，于欢悦之事，日思夜想，达到极点。因此，六三为下兑之主，志在于悦，凡是外物之可

大壮背明卖家人睽疑阻遇其旁 蹇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悦者，皆想方设法感而来之，以求悦为目的，而不问求悦的方式手段是否卑劣，更不管所求之悦是否合乎中正之道。此其所以致凶也。故明来知德云："说之不以其道，岂能说哉？求亲而反疏矣。如宏霸尝元忠之粪，彭孙濯李宪之足，丁谓拂莱公之须，皆为人所贱，而至今有遗羞焉，岂不凶？"又云："三阴柔不中正……自卑以求悦于人，不知有礼义者矣，故其占凶。"所举史例颇为生动，切中要害，而令人反省三思。做人还是要有点骨气，而千万不可无原则谄媚于人而致"来兑"之凶。故《象传》云："来兑之凶，位不当也。"指责九三过中失正而有失悦道之中正。悦之过中失正，谄媚入邪，岂非自贱？其自取凶，势在必然，但这是最后的结果。而在此之前的长长过程中。谄佞小人之处高位，则会一呼百诺，万佞来集，从其发展趋势言之，不仅祸害个人，而且更是祸害国家民族。如西汉末年元帝时代的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以柔佞媚悦于帝，遂委以政。又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党营私而致宠，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此一佞得势而万佞集也。后来，朝廷事无巨细，"因显白决，贵幸倾朝……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后谗杀国之栋梁萧望之，贬周堪、刘更生（尚）等，继又杀京房、贾捐之等，自是朝臣"重足一迹"，结舌而不敢言。后石显在成帝时虽然免官忧死，但西汉王朝元气大伤，不久即有王莽之乱而亡国。事载《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犹如六三以悦而来，来而致凶其国其家，能不引起人的警惕吗？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对于《巽》《兑》之卦爻辞，朱熹自称许多读不太懂，云："《兑》《巽》卦爻辞，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剥》卦之类，皆确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兑'、'商兑'之类，皆不甚亲切。为复是解书到末梢，会懒了看不仔细；为复是圣人别有意义？但先儒解亦皆如此无理会。"（见《四库》本《朱子语类》卷七十三）因此，对于此类爻辞，只要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必过分拘泥字面形迹。比如"介"，可释为间隔；介疾，即隔断疾邪不使传染。但"介"又可通"芥"，细微纤小之称；介疾，即小毛病，小毛病对人的身体健康，构不成威胁，当然可称"有喜"了。二说皆通。但若把"介疾有喜"置于卦爻位置升降的运动变化中去考虑，应释"介"为间隔阻绝。九四是近臣之位，邻于九五，责任重大。六三则为阴邪小人一心欲上求媚悦取容于九五，六三可能成为九五的膏肓之疾，因而九四秉其阳刚之质，力加隔绝，为九五免其阴邪传染作努力，阴邪媚悦之不入，则为君子之有喜。爻辞是说，九四，在欢悦中不忘忧危，反复思考商量而心潮难平，决计隔绝邪妄之疾，而终于致其喜庆。又爻辞之"疾"，旧注多解为疾恶如仇之义，似是而非。《易》中之"疾"，多与"喜"对举，如《无妄》九五爻辞之"无妄之疾，勿药有喜"，疾解为疾病，是。九四已从下兑升至

上兑之初，其以阳处阴位而失正过中，宜其有疾之象。九四与六三、九五上互为巽（☴）卦，《说卦传》称巽于义“为进退，为不果”，近臣责任重大，决策影响非同一般，因此在作出决策时，犹豫彷徨，故爻称“商兑未宁”。但九四处上下兑之间，有介然隔绝之象。又九四与六三、九二下互为离卦（☲），离象文明。九四以其阳刚本质，虽邻六三之媚悦，但介然自守而隔绝之，不使邪佞之疾侵蚀九五，其业绩辉煌有文明之象，故爻称“介疾有喜”。如杨万里《诚斋易传》云：“兑说一也，而所以说者二：有事君容说者，有以安社稷为说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于兑说之时，彷徨焉，踌躇焉，商确而谨择焉，其心安得而自宁也，何也？惟容说之小人，有以妄说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忧乱，彼病之以燕乐；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敛；君心静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来兑’，即容说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刚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于九五，其不为疾者鲜矣！六三，君心之膏肓也；九四，君心之箴规也……九四之私喜，天下国家之大庆也。故魏徵用而封伦沮，李绛入而承璀去。”九四之“介疾有喜”，史事甚明。

九五，孚于剥，有厉。

剥，消剥腐蚀，指上六剥阳之阴邪也。爻辞是说，九五，以其诚朴宠任而消剥阳刚的小人，必致危厉。九五阳刚中正，下与九二同德，本该是个吉爻。但是，处兑之时，九五欢悦忘形，内怀诚信而一心邻比上六。上六为兑悦之主，虚悦尊者，下无系应而专说乎五，以妄说来消剥九五之阳，故爻称九五有孚于剥而致危厉之象。邪佞欢悦之感人，实在令人害怕。九五之君，狃于小人之悦，喜其巧言令色，后果极其严重。如陈梦雷《周易浅述》所说：“（九五）恃一己之刚明，值国家之宴安，以小人为不足畏而过信之，则蛊惑心志，紊乱是非，无所不至矣。”来知德举史实以为例，云：“以人事论，如（唐）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卢杞，皆以阴柔容悦剥乎阳者也。”（见《周易集注》卷十一）唐朝安史之乱及建中之乱，天子播迁，李唐王朝由盛转衰，原因很多，但与李林甫、卢杞等当朝宰相之妄说专权有关，则是肯定的。

上六，引兑。

引，引诱，《周易折中》引毛璞曰：“所以为兑者，三与上也，三为内卦故曰来，上为外卦故曰引。”爻辞是说，上六，用物欲享受的欢悦来引诱众人落其圈套之中。上六居位，不仅是上兑之主，而且是整《兑》的成卦之主，阴居兑极，穷不知变，而一味贪图欢悦享受，其下又无应，只能用物欲横流来引诱他人上当，其所欢悦，取之不以其正，为小人无耻之极的表现。如刘牧所说：“执德不固，见诱则从，故称引兑。”（《周易折中》称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六原该下与六三来兑联手共诱他人犯错误。此所谓臭气相投也。但六三来兑，已

为九四所隔绝而不得接近九五，更无法联合上六。因此，上六改变战略，以寻欢贪爱来引诱其下四、五二阳，消剥其正体，而附以阴邪之气。如西汉末年宦官石显，极尽其佞谄手段，讨汉元帝的欢心，又引诱御史大夫贡禹，在皇帝面前说禹好话，以便获得朝臣的支持来固其宠禄，西汉王朝以此国政日衰，直至灭亡。贡禹与汉元帝，犹如被诱上当的九四、九五二阳，阳气消剥，则气数将尽，等待他们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前途的暗淡无光。故《象传》释云："上六引兑，未光也。"指出上六作为成卦之主，把兑悦之道引向了邪路。从爻象来看，上六处于兑上，二断之画，犹如开口说话，兑于象"为口舌"，以其巧言令色取容人主之象。又兑有羊象，上互之卦为巽（☴），巽有绳象，以绳牵羊为引，故爻称"引兑"。《周易折中》云："三与上皆以阴柔为说主；来兑者，物感我而来，《孟子》所谓'蔽于物'……引兑者，物引我而去，《孟子》所谓'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始于来，终于引，此人心动乎欲之浅深也。"按：孟子之言见于《孟子·告子上》。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成为大人，有的成为小人？坚持正义之道，欢悦则与民同乐，这是坚从大体而不为物欲所诱，此所以为大人君子；反之，诱于物欲享受，追求穷奢极乐，从其小体而媚其私心，此所以为邪佞小人。于此可见，是否能坚持正义立场，拒绝诱惑，是真正达到与民共同欢悦的康庄大道。故五九爻有"危厉"之戒，能不慎之又慎乎！

综观全卦，《兑》悦之义，无论自然或人事，皆有以相合者。程、朱理学，只从社会伦理道德、国家教化方面来讲述，似乎并不完整。如《周易折中》云："地有积湿，春气至则润升于上；人身有血，阳气盛则腴敷于色。此兑为泽为说之义。盖说虽缘阴（按：指三、上两阴爻为兑成卦之主），而所以用阴者阳也。人有柔和之质，而非以忠直之心行之，则失正而入于邪矣，故利贞。"大自然的世界中，一切动植物生命活力的激扬，都是一种兑悦之道。但是比较而言，兑悦之道的高级形式，则在于人类社会。所以程、朱二子之论，虽非全面，但其主体精神大致不差。从全卦看，《兑》之欢悦，是刚中柔外，是个吉祥之卦。这是从正面来阐述《兑》卦的总体精神。但《易》卦作者，具有辩证思想因素，其所思考更深入一层，所以对于爻象爻辞，又以兑悦的反面来见其义。如卦辞卦象中，"柔外"为兑说之主，是吉象。但在爻辞爻象中，二阴虽为成卦之主，却皆为作者所不取而致讥。说至上而极，二介于二说（按：指六三与上六）之间而未宁，九五以近上六而致危厉，与卦义"柔外"之吉相反相成，从不同的视角，来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兑》悦的精神要义。至于阳刚诸爻，则视其与三、上两阴爻的关系而见其吉凶。初九远于佞媚之阴而有和兑之吉。九二虽邻六三而心不系之，一心上孚九五，故称悔亡而致吉。九四隔绝六三来兑之凶，故爻称"介疾有喜"。九五则因心系上六，受阴邪媚悦的引诱而"有厉"。由此可见，在作者眼中，阴柔说人似糖衣炮弹，或如白粉毒品，君子远之惟恐不及。故蒋悌生曰：

“当说之时，刚则有节，柔则无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刚阳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阴柔而致凶。”（《周易折中》引）又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三亦云：“若不是刚中，便成邪媚。下面许多道理，都从这个刚中柔外来……顺天应人，《革》卦就革命上说，《兑》卦就说（悦）上说。”虽然具体分析，尚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但大体精神确是如此。欢悦于人，谁不好之？没有欢悦，人生就会变得暗淡而无意义。但欢悦之来，致之有道，得之以正，则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反之，则如阴邪小人之悦人，如毒品之于人，吸之上瘾而不可救药，能不慎乎？这是《易》卦作者从反面来立戒。而从《兑》卦的正面意义来看，卦辞“利贞”之亨，启人思维。贞者正也，欢悦人之所爱，但取之必合正道。欢悦之事，有物质方面的，有精神方面的。物质方面的欢悦，已成《豫》卦之象征；而精神方面的欢悦，则由《兑》卦来完成。故《象传》加以发挥说：“君子以朋友讲习。”王仁俊曾称引汉郑众之说，分辨精神欢悦与物质享乐的不同，云：“乐耽于酒，则有沈酗之凶；志累于乐，则有伤性之患。所以君子乐之美者，莫过于《尚书》《诗》，敦习道义，教之盛矣，乐在斯焉。”（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兑悦之道，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其乐无穷。如果把郑众所称儒家经典的《诗》《书》，扩大为泛指一般健康的精神食粮，则所论甚是。学习与实践，是人们获得终生的精神欢悦的必经途径。故宋俞琰曰：“讲者讲其所未明，讲多则义理明矣；习者，习其所未熟，习久则践履熟矣。此朋友讲习所以为有滋益，而如两泽之相丽也。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论语》以学之不讲为忧，以学而时习之为说，以有朋自远方来为乐。”此说可与《兑》卦欢悦之道相互发明。（按：孔子之语，均见于《论语》，《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涣

卦第五九



风行水上现至文

《涣》卦（䷺）第五十九，在《兑》卦之后。《序卦传》说："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意思是说，人心气忧则结聚，悦则舒散而轻松愉快。所以，人们在身心愉悦之后，就应该推己及人，舒散四方加以推广，从而形成一张文理涣然的文明网络。所以《兑》后有《涣》卦，涣是离散推之于四方之义。涣散之"离"，不是如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而是围绕一个中心而向四方辐射之离散，就像车轮的辐条，虽然辐射四方，但是最终都围绕着轴心旋转。另外，《涣》卦之"离"，从卦象看，分而言之，上巽象征风，下坎象征水，风行水上，有水波荡漾、离披解散而文理璨然之貌；合而言之，涣离之义，可用散文创作的"形散而神不散"为喻，其文理自然，光灿动人，与《涣》卦同理，已成为后世的重要美学原则。又如我们在讲述第五十五卦《丰》时所述，《涣》（䷺）与《丰》（䷶）为阴阳六爻完全相反的错卦（按：三国时虞翻称为旁通），卦象之变，已预示事物的发展可由涣散而达到丰大的境界，是否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矛盾转化，关键还在于人们是否能正确理解"涣"的精神，并且顺其离散规律而行事。《易》卦之"涣"，并非四处逃散的分崩离析，而是推己及人的分享愉悦快乐，排除险难而散之广漠的艰辛斗争，没有经历排难的艰苦，又何来推己及人的愉悦？生活的辩证法说明，离散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自然过程，涣散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萃聚而致其丰大，所以虽"涣"而自有其无形的中心存在。

《涣》卦（䷺）第五十九，下坎（☵）上巽（☴）。卦辞云："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假，感格而至之意。卦辞大意是说，《涣》卦象征事物之涣散，道路亨通，君王以其内心之虔诚，感动神灵而降集宗庙，从而把涣散了的国人重新加以团聚，群德群力，就有能力排除险难，利于共济大江大河，

利于坚持正义之道。值得一提的是，“王假有庙”的卦辞，不仅《涣》卦有，而且《萃》卦也有，而《萃》卦的象征事物却是萃聚，涣散之于萃聚，正是一对相反的事物，为什么卦辞又有其相似之处呢？于此可见，《涣》之与《萃》，表面是矛盾相反的卦，实际上二卦的卦义精神又有其暗中相通的一面。读者前后联系，自可理会。从卦象分析，《涣》的下卦是坎（☵），坎为水为川，上卦是巽，巽为风为木，故《象传》说：“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风行水上，水上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涟漪，向四处离披扩散，象征了事物处于涣散之时的自然状态。因为世界万事万物，有聚必有散。犹如人们常说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又说是千里送君，终须一别。就是《西厢记》的崔莺莺，再舍不得张君瑞离开，但为了今后生活，张生于新婚燕尔之际，被老夫人逼迫离别娇妻而上京赴考，十里长亭，红染霜林，“总是离人泪”，但不管如何回首怅望，终有一别。这“别”不就是一种生活的离散么！有生活的地方，也就必然有聚又有散。这是任何人（包括君主圣贤在内）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研究《涣》卦，很有启悟意义。正因为涣散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必然历程，因此，古人极其重视，因观《涣》卦风行水上之象，更深一层地悟到了事物从聚到散，又从散而萃的自然道理。但是，从涣散到萃聚，是有条件的，不仅是物质利益的诱惑力在起作用，而且更应具有精神方面的向心力和感染力，令涣散之民，自觉聚拢，团结一致，则如跋涉大川而和衷共济，能够顺利地排险前进，因而心想事成，事业理想就能顺利地开

■莺莺张生伤离别



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展。古人观此卦象，又深一层悟到了从散可以通聚的道理，于是进一步想到了萃聚臣民、团结群众的精神力量之象征——享天帝而立祖庙，以天地鬼神及祖宗神灵来作号召，成为由涣而聚的一个精神中心。故《象传》又有“先王以享于帝立庙”之言，这是针对上古时代巫风弥漫的实际情况而观物取象以为喻的。《彖传》则从卦体卦德方面来总论《涣》卦的精神要义，云：“‘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所谓“刚来”，指的是下卦九二，以阳居阴，与五无应，故阳刚居中，秉刚中之德而与初、三、四诸阴爻阴阳相应，来往不穷；所谓“柔得位乎外”，指的是上卦之六四虽下与初无应，但得位以正，上承五、上而阴阳和鸣。无论是九二或六四，其所应若专于一阴或一阳，专临一阳一阴则多陷，若应二阴或二阳者则多示公而不私，故通。故卦辞有“涣，亨”之言，阴阳和应，排险共济，何路而不亨通？故云。《彖传》所称“王假有庙，王乃在中”，指的是九五居全卦之尊位，秉其中正之德，诚信之心，感动神灵，来享于庙，以聚国人。所谓“乘木有功”，则是从上下卦象而言，下坎象征川，济川有险；上巽象征木，木可为舟，舟可济川渡险，故卦辞有“利涉大川”之言，描述众人同心，共济险难，以便恢复涣中有萃的健康发展状态。而从文字训诂方面看，涣，《说文》：“散流（按：一作“流散”）也，从水，奂声。”形容水流分披离散之貌。又《杂卦传》云：“涣，离也。”与《序卦传》所说一致。而所谓“离”，据《经典释文》云：“离，丽也；丽，着也。”也就是说，“涣”又有“离”之义，而“离”有附着之义，则“涣”除离散之义外，又另有附着之义，也即附着于某一中心而由散而聚的意思。因此，理解《涣》卦精神，要有散与聚相反相生的辩证眼光。如朱熹论《涣》卦的精神有几层意义云：“涣是散底意思。物事有当散底：号令当散，积聚当散，群队当散”，“《涣》卦亦不可晓，只以大意看，则人之当涣者莫甚于己私；其次须便涣散其小小群队，合成其大；其次便涣散其号令与其居积，以用于人；其次便涣去患害。”（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三）所论不泥不滞，层次清晰，较为全面，可参阅。

初六，用拯马壮吉。

拯，拯济，拯救。爻辞是说，初六，借助于壮健之马以济难涉险，可致吉祥。初六处涣之初始，涣散之弊尚未堆积而易救之时，初六阴处阳位不正，上无其应，阴柔力弱原是不足以拯涣；但初六上承九二刚中之德，与二阴阳合力而应，并借助其壮健之力以救弊，故虽处涣之时，却也不致离散，故爻称“吉”。程颐《伊川易传》云：“六爻独初不云‘涣’者，离散之势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则不至于涣也，为教深矣。”从爻位爻象看，初处下坎之下，坎为川，性险陷，故爻有“拯”险之辞。又坎之象，“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说卦传》），骏美之马，心躁思动，健壮于行，故有借壮马之力以拯济险难之象，占者则吉。方之以史，比如汉初诸吕危汉，陈平交接太尉周勃，勃入军中左袒以安

天下，因而重新平定诸吕而兴汉。陈平定计之早，又上有太尉周勃之助，如爻称“用拯马壮吉”云云。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机，通“几”，几案也，程颐《易传》谓“俯凭以为安者也”；朱熹云：“奔其机，只是几来做二，人事上说时，是来就那安处。”（《朱子语类》卷七十三）爻辞是说，当处涣散之时，播迁而获安居之所，悔恨自会消亡。从爻位爻象看，九二阳居阴位，上无其应，又处下坎之中，落于险陷之中，又居位不正，宜其有悔。又九二互三、四为震卦（☳），震象为足而性动，动于川险之中，故爻称其“悔”。但从另一角度看，震足之动，又有勇于奔行而求其所安之象。加以九二秉其刚中之德，下比初六，阴阳相济，犹如急行而就其所安而居，故能脱险自救，不至穷困而能济其涣矣，故爻又称“悔亡”。于此可见，《易》卦作者思想颇有辩证因素，是两点论而非执一简单之言。程颐《易传》具体指出：“二自初为‘机’，初谓二为‘马’。”初之“吉”，二之“悔亡”，与其上下承比的刚柔相济、阴阳和应有关，彼此相助，或为“马壮”，或为伏“几”，非仅利己，同时实也利人，故能济其所涣。故《周易折中》云：“聚涣者先固其本，（九二）以刚中居内，固本之象也。机者所以凭而坐也，有所凭依而安居，然后可以动而不穷矣。”

六三，涣其躬，无悔。

爻辞是说，涣散其自身之险难，必无悔恨。从爻位爻象看，六三以阴处阳，其位非正不中，本当有悔。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六三又处下坎之上，已显露其逐渐脱出险陷的机会。正好三与上阴阳有应，如《周易折中》所说：“《易》中六三应上九，少有吉义；惟当涣时，则有应于上者，忘身徇上之象也。《蹇》之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亦当蹇难之时而与五相应。此爻之义同之。”又从爻变看，六三化阴为阳，则下坎化巽（☴），巽象为风，三处坎险郁结之时，风徐吹而险难舒散，故爻称“涣其躬”而“无悔”。朱骏声证之以史，云：“此范蠡泛舟五湖之象。”范蠡深知越王勾践，故功成身退，散其危难，而免遭文种杀身之祸。他泛舟四海，从事经商，则财货会聚，成为商家之祖。可见其政治上的“涣其躬”，正为其经商财货之会聚创造新的条件。故《周易折中》引王申子曰：“此上四爻，皆因涣以拯涣者，谓涣其所当涣，则不当涣者聚矣。”王氏所论，言及涣中有聚，颇为深刻。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群者，众也，这里指人群中的小团体或朋党之类。丘，孔安国《尚书序》云：“丘，聚也。”故程颐《伊川易传》发挥说：“丘，聚之大也。”夷，平

地，这里指平常。爻辞是说，六四，涣散私心结聚的朋党或小团体，至善大吉；通过涣散小宗派而聚合成山丘般高大的至公大群，其功德伟大，实在不是平常人所能想像的。从爻位爻象看，六四已脱出下卦的坎陷之外，入于上巽济涣的君子队伍之中，其功业已隐约可见。六四阴居阴位得正，上承阳刚中正之九五，阴阳相和出于至理之自然，又下无其私应，可见其公正无私，是群而不党的济涣君子，故爻有“涣其群”之辞，去其私心，涣散朋党，合小以为大，合大以为一，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团结，是事业走向胜利的新起点，所以爻辞又有“元吉”之美誉。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三引老苏（洵）之说释六四，云：“夫群者，圣人之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说虽《程传》有所不及……盖当人心涣散之时，各相朋党，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苏天资高，又善为文章，故此等说话皆达其意。大抵《涣》卦上三爻是以涣济涣也。”又曾称引《东坡易传》，云：“涣其群，言散小群做大群，如将小物事几把解来合做一大把。东坡说这一爻最好，缘他会做文字，理会得文势，故说得合。”平常人的思维，只考虑《涣》卦是离散之时，怎么想到散中有聚的道理？因此爻辞有“匪夷所思”之称，这实是一种叹美之辞，此中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历史上，不少奸人合朋党以为自固之术，但这是以私相结，以势相附，并非真正合乎公道人心的自觉萃聚。所以奸人之小群，一旦面临蝇头小利的诱惑，常是立即反目成仇，顷刻冰释涣散而瓦解。惟有无私无畏的正义公道之聚，才能合小群为大群，团结全民，混天下以为一，犹如高山仰止，令人崇敬。故《象传》云：“涣其群元吉，光大也。”六四居近臣之位，上辅中正明君，绝无私心杂念，一心为公，堪当济涣重任，故君臣相须而共成济涣之大业，其品德确是正大光明，辉耀人世。但《吕氏春秋》另有解说，其《恃君览·召类》篇曰：“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窘，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以涣为贤佐团结成群，事必至善元吉。其解另备一说，可参考。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大号，盛大的号令。王居，君王居积的储蓄，多指财物。涣王居，如陆贽（唐德宗的宰相）所谓散小储为大储之意。爻辞是说，九五，发出盛大号令，犹如涣散一身淋漓大汗那样出而不反，坚决执行，同时又把君王平日所积蓄的财物，主动散济四方民众，义无反顾，这样必无咎窘。从爻位看，当涣之时，九五阳刚中正居君位，下与三、四亲比无间，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君臣相须而成其济涣之大业，君王又主动涣散其王宫所储之财物，用之于民，济民于险难之中，故下民因受其恩泽沾溉，而衷心拥护，君王据此而发布其盛大号令，四方之民热

烈执行而义无反顾。故《象传》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从爻象看，五居上巽之中，居君位而巽有号令之象（据朱熹《周易本义》）；又巽有风象，号令由风作媒介而迅速传向四方，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以此为象而喻其号令之盛大实行；又九五居尊位领导全卦，而《涣》的下卦为坎（☵），坎象为水，有汗水之象，故爻以"涣汗"为喻。散人之疾而使之病愈者，汗也，在中医看来，发汗散热解毒，大有益于人的健康；而解天下之险难使归之于安者，更新号令也。散汗与散发号令，于人有益，有其内在的相似与关联。故爻辞以"涣汗其大号"为喻。而九五与三、四上互之卦为艮（☶），据《说卦传》，艮于象"为门阙……为阍寺"，有王宫之象，故爻辞又以"涣王居"为喻。朱熹曾以其义理教导学生云："涣汗其大号，号令当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窍中，迸散出来……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又云："涣汗其大号，圣人当初就人身上说一'汗'字为象，不为无意。盖人君之号令，当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远，虽至幽至远之处，无不被而及之。亦犹人身之汗，出于中而浹于四体也。"所论极其生动形象而令人信服。所谓"大号"不仅是登基时新颁政令，一切有益于国家治政之令，均在其象征范围之内。如周武王克商时的《武成》诸篇，唐德宗播迁奉天时陆贽代拟的罪己之诏，皆是。又如杨万里所说："排大险难者，非大号则难不散。何谓大号？发号施令必大焉，先小者碎者虽多无补也。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贪，散财发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约法三章之令一下而万民悦。大者举矣，何必多乎哉！"所论甚是。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通"恤"，忧虑也；或直接以"血"泛指伤害，二义皆通。逖，如逖逖，忧惧貌，见《楚辞·悲回风》"悼来者之逖逖"王逸注；但是，《帛书周易》或作"汤"，疑为"惕"之形讹，故朱熹《周易本义》直接释云："逖当作'惕'，与《小畜》六四同。"惕，也有忧惧之义。爻辞是说，上九，（居涣之极，即将出涣而重新凝聚），于是远离伤害和忧惧，必无咎害。上九以阳居阴，下应六三，上下之位皆非其正，原该有咎；又三以阴柔而处下坎，故求上九阳刚有力的应援；上九如下应阴柔之三，则是重新落于险陷之中；故三应上为阴阳和谐之"无悔"，上应三则是虎落平阳，将会遇险有咎，上下处位不同，一脱险，一遇难，效果不同。所以对于上九来说，居于《涣》卦之极，处于由涣而聚的矛盾转化阶段，即将脱出涣难之外，所以必须远害离惧，以为涣极而聚作准备，故爻称涣告成功而"无咎"。所谓"无咎"，则离开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只差一步之遥了。按《易》卦讲变，上九处于矛盾转化阶段，如若阳化为阴，则上巽化为坎（☵）；又上应在三，三在坎中；坎之象"为血卦""其于人为加忧"（《说卦传》），有伤害忧惧之象，故爻以"血"为喻；又坎又可"为隐伏"（同上），有窜遁远方之象。故爻又称"血去逖出"。但上九爻辞，如依《象传》，

则断句不同，应是“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意思大同而小异。涣其血，涣散其伤害也。但“逖”则依字面训为远，如来知德《周易集注》所说：“当涣之时，干戈扰攘，生民涂炭，民之逃移而去乡土者多矣。去逖出者，言去远方者得出离其远方而还也。”可备参考。在历史上，封建士人曾运用《涣》上九爻辞为武器，参与政治斗争，积极干预现实生活。如西汉刘向曾因当时朝廷的政治腐败而给皇帝上封事曰：“《易》曰‘涣汗其大号’者，言号令如汗出而不反者也。”抨击朝廷为保护当时新贵集团的特权阶层利益而朝令夕改的现象（见《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向传》引）。又如唐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见《贞观政要·赦令》）于此可见，封建政治家中的有识之士，认为政府号令并非某个独裁者随心所欲的要求，而是要慎之又慎，根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反复议论然后定，一旦定下之后，就坚决执行，如汗之出而不复也。《易》卦《易》理与古代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综观全卦，“涣”与“萃”（聚）是一对矛盾，二者相反相生，对待而立。《涣》之为卦，虽然象征事物涣散之时，但卦辞却以聚涣立言，“王假有庙”作为全国全民的凝聚中心而存在；“利涉大川”，则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以救涣之事。全卦名虽为“涣”，实兼涣与聚二义，而要皆归之于中与正。全卦六爻，初与二皆欲脱险以聚涣为义。虽然国家、民族乃至家庭个人，有萃必有涣，有兴必有衰，但是，国势虽衰而人心不可涣散，所以要高举“聚涣”大旗来号召人们加强团结以抗强敌。如北宋灭亡，而士夫慷慨，民心激烈，故有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以为“聚涣”之号召，并建立了南宋朝廷以与金兵相抗。此初六之“用拯马壮吉”及九二之“涣奔其机”而“悔亡”也。不过，虽然国家民心不可涣。但是朋党私心之类影响团结的事，却不可不涣，君主贵族所聚敛的不义之财也不可不散，这些祸害如不涣散净尽，则国家民族乃至家庭个人，永远脱不出坎险之难，故脱险济涣之道，极其重要。所以自三以上之四爻，其言皆为以涣济涣之义。三“涣其躬”之难而“无悔”；五为济涣之君，四为尽心辅君济涣之臣，君臣相得益彰，故其济涣，建“匪夷所思”之功而“无咎”，皆因持其中正之道而然。至于上九之爻，则因居涣极之位而能出乎涣者，故远其害“血去逖出”而“无咎”。隐约之中，实已见涣极转化为萃聚的曙光。此一卦六爻运动发展之大义。

当然，《涣》卦精义难以尽言，哲学家有哲学家的理解，但美学家文学家也因卦象启悟而另有说法。宋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一文，其释《涣》之言，曾令理学大师朱熹叹为观止，今节录以飨读者：

> 洵读《易》至《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圣人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盖余仲兄名涣，而字公群。则是以圣人之所欲解散浑荡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无为我易之。洵曰：

唯。既而曰：请以文甫易之，如何？

且兄尝见夫水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渟渟泗汪洋，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然而发乎太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纡余委蛇，蜿蜒沦涟，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云，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徐而如徊……殊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

这是由《涣》卦“风行水上涣”之象的启悟，而生发的一篇有关天人凑泊、自然至文的绝妙好辞，在美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水泽比喻创作的源泉，以风来比喻创作冲动和那不能自已于言的激情迸发的状态，如风起之而水形之，两相凑泊，而极天下文章自然之伟观。后来其子苏轼的文学创作，颇见乃父之风，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即从“风行水上”之卦理生发出来。于此可见，自然至文之“涣”，并非散乱不可收拾，而是自有其形散而神不散的文心在焉。并因此而见其文理灿然之真美，而不见半点虚假做作之态，一切出于中心自然之真。清薛雪《一瓢诗话》发挥说：“《易》云：‘风行水上，涣。’乃天下之大文也。起伏顿挫之中，尽抑扬反复之义，行乎所当行，止乎所当止，一波一澜，各有自然之妙，不为法转，亦不为法缚。”其实，《易》卦之理，其影响何止于文学艺术，其余一切事物，同样无不蒙受其沾溉而见其影响。

节

卦第六〇



甘节苦节吉凶别

《节》卦（䷻）第六十，次《涣》卦之后，二者互为上下卦体颠倒的综卦，卦形之变，已显示二卦精神有其相承相续的一面。《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意思是说，处涣之后，物既离散，但终须有一定的节制，才不致于分崩离析，比如国家有难，人们纷纷远离京师而四处避乱；但在乱平之后，就急忙派使者四出各地宣传朝廷意旨，以让各地人民共同分享欢乐愉悦；事实说明，暂时的离散无法阻止人民维护国家民族团结的决心。也就是说，涣散之道，不可终行，如果永远离散而又不可复聚，则将因其失去中心而天下大乱，所以应当加以一定限度的节制，以便重新凝聚向心力，达到"形散而神不散"的目的。因此，《涣》卦之后《节》卦就自然跟随着出现。《节》象征适度的节制，而非盲目的涣散，以防止绝对自由的离心力的出现。不过，所谓"节"又有"甘"与"苦"之别："甘节"——即适度而又不忘人民实际利益的节制，以启发人们的自觉遵守和执行；而"苦节"——则是强制压迫人们执行而不顾人们生存利益的超限度的节制。《节》卦所提倡的是促进人们自觉的"甘节"，而坚决反对压迫人民的"苦节"。因为"苦节"常会引起矛盾激化，不仅无法迅速制止其离散现象，而且效果适得其反，加速了不良的离心倾向的出现。《节》卦精神启人深思。

《节》卦（䷻）下兑（☱）上坎（☵）。卦辞云："节：亨，苦节不可贞。"贞，正常也。卦辞是说，《节》卦象征节制和限止。凡事有节，自然前进道路亨通，但是不可以实行"苦节"，因为强制实行的超限度的节制，是不正常的。否定"苦节"，是整个《节》卦的精神。《节》卦下体为兑（☱），象征泽；上体为坎，象征水，故《象传》发挥说："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

议德行。”湖泽之上，又有天上雨云化水，源源不断地自天而降，湖泽的容量有限，如果不修堤坝水闸以加节制，增其排泄功能，则湖水将泛滥成灾。故朱震云：“泽之容水固有限量，虚则纳之，满则泄之，水以泽为节也。”君子观此卦象，由自然世界而进一步想到人类社会，人的思想感情或行为，如果任其私欲恶性膨胀，也将泛滥社会，荼毒人类，所以应该加以适当的节制：制订礼法制度以节民，制订伦理道德以节身。无论是天道自然或人类社会，“节”的精神不可少。而《彖传》则从卦德卦性方面来分析，云：“‘节，亨’，则柔分而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所称“节亨”，指的是下兑卦性阴柔，上坎卦性阳刚，上下卦体的阴阳卦分，犹如男女有别，是因有九二、九五刚中之主为之节制，适度而不过分，合乎中正原则，所以道路亨通。所称“苦节不可贞”，是说“苦节”不可守以为常也，言外之意，则是提倡“甘节”精神；所说“苦节”道穷，指的是上六穷极于上而不知变，不能适应矛盾的转化，其道凶险，当然就是“道穷”了。所称“说以行险”云云，指的是下兑性说（悦），上坎性险，人们因悦而行，又因见上坎险而知止，这就是自我节制；又上卦六四阴居阴位得正，九五阳刚中正而为一卦之主，四、五二爻居位或中或正，成为全卦指挥中枢，以此而调整节制，则人们自然见险知止，悦守其正而不逾中道，故为吉祥安亨之象而有“中正以通”之言。“天地节而四时成”诸语云者，则从宇宙自然的四时气候之节，进一步讨论人类社会的制度之节，如孔颖达所说：“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功成之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周易正义》）在社会人事方面，“节”有其道，能够有益于民的，则合乎中正而安亨吉祥。而吴慎更深入一层而论因革，云：“《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此曰‘天地节而四时成’，限止之谓‘节’，改易之谓‘革’，节浅而革深，节先而革后。四时举其大者言之。天地之化，刻刻相节，时时相革。”比较《革》《节》二卦精神之异同，启人颇多。另外，从卦象之变来看，《旅》（䷷）与《节》二卦是卦体六爻阴阳完全相反的错卦，已显露二卦之间相反相生的复杂关系。人因其处丰大盛明之时而忘乎所以，就会因此犯错误，被迫羁旅在外而四处奔波；但是，人在长期的羁旅行役生活中，又会不断地总结人生经验，悦而后行，见险知止，有所节制，以求生存和发展。人之所悦，欲望无限，若是一味追求享受，而不问前面是否会有坎水险陷，无限的私欲膨胀冲昏了头脑，则又将由“节”而处“旅”——再度尝尽羁旅行役的人生辛酸，这就不是“天作孽，犹可救”；而是“自作孽，不可救”了。如何处“节”，同样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程。

下面分析爻辞爻象。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爻辞是说，初九处“节”之初，节制自守而不出门胡乱旅行，没有咎害。

爻辞意思浅显，并无晦涩之处，但若要正确理解其精神实质，还必须追究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初九“不出户庭”就能“无咎”呢？《象传》揭秘云：“不出户庭，知通塞也。”也就是说，如若道路畅通，则迈步前进；如若道路堵塞，则见险知止。关键是必须“识其通塞之所由”（陆机《文赋》）。从爻位爻象看，初九阳刚位正，又上与六四阴阳有应，在一般卦中，当是吉爻。但因其所处《节》卦的特殊环境，阳刚位正而有应，则将勇于出门前行而不知节制，而上卦是坎之险陷，见险不知其止，则其凶险有咎可知；又初在全卦处位最下，虽秉阳刚之质，但时不我利，力量虚弱而不足以救上之险，而且又有九二之阳劝阻于前，如若一味孤行，必然自取其咎。不过从爻象之变来看，初处下兑之下，而兑可由坎（☵）下由阴化阳而成，如《周易折中》引徐在汉之说：“坎变下一画为兑，象止坎下流，户以节人之出入，泽以节水之出入。初不出户庭，以极其慎密而不出，此其所以无咎。”坎化为兑，化险为悦，初之爻变功不可没。故作《易》卦者虽然严肃戒初之咎，但只要初“不出户庭”，则其咎何由而兴？故爻称“无咎”。所谓“不出户庭”，只是喻象，不可拘泥字面，认为只是足不出户的生活小事，其实，它可包寓丰富的内容。《系辞传》上引孔子的话来加以发挥：“‘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幾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从爻象看，初九位在兑下，而兑于象“为口舌”、“为毁折”（见《说卦传》），有因议论而言语败事之象。处“节”之初，居无位之地，如若急于出门议政，则可能因言语失慎泄露机密而致祸。故作者戒之“不出户庭”则可保其“无咎”。又杨万里云：“君子将有以节天下，必始于节一家，节一家必始于节一身。颜子之节，非求之外也，节性而已。不迁怒，喜怒节矣，不贰过，过愆节矣；一箪食，奉养节矣；不出户庭之间，而制数度、议德行、不伤财、不害民，节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则行之户庭而准，通则行之四海而准，而况为邦乎？初九穷而在下，故不出户庭。”于此可见，不出户庭，不是什么事也不干，而是在为实行“节”道作必要的酝酿准备。

九二，不出门庭，凶。

爻辞意思浅显明白，无须翻译。从爻象之变来看，《节》之六三、六四与九五组成上互之卦艮（☶），艮于象“为门阙”。但初九与九二均在上互艮卦之下，从爻象来看，即均在门庭之内，故爻称“不出户庭”或“不出门庭”。但初九当“节”之初，因时塞而宜止则止，故以不出户庭为无咎。而九二则情况变化，阳居中位具刚中之德，居大臣之位，已有一定的力量；又九二与六三、六四下互之卦为震（☳），震于象为足，性为动，有破门而出之象，故九二于时通之际，应该秉其刚中之德，勇于跨出门庭而大踏步前进。但九二却反其道而行之，时可行矣，乃因其阳居阴位失正无应而自寻烦恼，犹豫不决，止而不行，此所谓

表面知“节”而实不知通变之蔽也。所以《象传》释云：“不出门庭，失时极也。”极，虞翻曰：“中也。”所称“失时极也”，就是丧失了适当进取的有利时机。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也说：“（九）二比重阴（按：指六三、六四），阳遇阴则通；通则利往，乃竟不出，是失时也，故凶。”从象数易学立论，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初九与九二，同样是“不出户（门）庭”，为什么初为“无咎”而二为“凶”呢？这就是因为时机不同，则应有不同的处理，但二却与初采取同样方法对待，不合时宜，怎能不自取其凶？全卦六爻皆以泽与水二体取象。泽虽为节水之物，但同时也是排水之具。泽水虽以节止为义，却仍然是以通行于无穷而为其节亨之道，“节”之时义大矣！《周易折中》引钱志立云：“泽所以锺水也，水始至则增其防以潴之，初九是也；水渐盛则启其窦以泄之，九二是也。二与初同道，则失其节矣。”故初处节塞之时，“不出户庭”为慎密而“无咎”；九二处节通之时，时不应塞而“不出门庭”，是自我禁锢的绝物自废，非凶而何？初与二吉凶之别，关键在于一个“时”字。如朱熹云：“若以道理言之，则有可为之时，乃不出而为之，这便是凶之道，不是别更有凶。”又曰：“时乎时，不再来，如何可失！”（《朱子语类》卷七十三）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若，语助辞，无实义。嗟，悲叹声。无咎，有二种解释：黄、张《译注》据张载《横渠易说》，按字面词义直译为“可免咎害”，又译《象传》“又谁咎也”为“又有谁会施加咎害呢”？但旧注一般释“无咎”为自作自受的“无所归咎”（如王弼注及程颐《伊川易传》）。二说于义皆通。但细加勘比，似乎王弼及程子之说为优，《解》卦六三《象传》有“自我致成，又谁咎也”之言，可为旁证。爻辞是说，六三，自我放纵而不加节制，则将有嗟叹悲伤，其严重后果，又将归咎于谁呢？六三阴处阳位失正过中，质带阴邪之气，上无呼应，又乘凌初、二两阳，已呈凶象。加以其居位又在下兑之极，兑性悦，于象“为口舌”，有悦极而胡说八道之象；而其上行又近上体之坎，坎之象“其于人也为加忧”（见《说卦》）；综观爻位爻象，六三是兑悦之极，纵情肆欲，不知节制，而有自陷坎险之行，所以结果是乐极生悲而嗟悔莫及，其严重后果是自我作孽的自作自受，又将归咎于谁呢？杨万里《诚斋易传》云：“六三以兑说阴柔之极，而在人上，挟其说豫充盈之势，极侈汰以自奉而不知节，至于人恶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声，然后戚嗟慨叹，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谁咎哉！郑伯有、晋石崇是已，全见逐于国人，追诵于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泽之极，故溢而不节。”伯有，春秋时郑国大夫，其为人被子产称为“伯有侈而愎”。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后被攻而奔许，“伯有死于羊肆”。晋朝石崇与王恺夸比豪富，酒宴之上滥杀无辜侍女，最后被仇敌孙秀报复，与友人潘岳同时刑戮，潘吟“白首同所归”之诗，这些故事，明

白载于《世说新语》，人所稔熟，不必再说。诚斋以伯有及石崇喻六三之“不节若，则嗟若”，于史颇为贴切。

六四，安节，亨。

爻辞是说，六四安顺泰然地实行节止之道，前进道路亨通。六四居大臣之位，阴处阴位得正，上承九五中正之君，以己之正，安顺九五中正之节，君臣相得益彰，“节”道得以实施贯彻。又六四已从下兑上升至上坎之下，坎象为水，兑象为泽，泽水上溢则为灾，泽水下流则有节，六四下与初九为正应，正是泽水下流而有节之象。六四之行，正而有节，泰然处之而心安理得，故爻称“安节，亨”。《周易折中》云：“六四以柔正承五，故曰安节。‘安’与‘勉’对。盖凡其制节谨度皆循乎而安行之，非勉强以为节者也。于象居坎之下，水之下流也。柔正为水流平地安澜之象。”比如新加坡为了保护环境，严禁随地吐痰，不许在公共场所抽烟，违者重罚。新加坡居民对此制度节止，安之若素，极少犯禁，这是我在新加坡亲目所见。此即六四之所谓“安节”，其制度法令之节止，已化为全国人民自觉遵行的意识，所以新加坡环境之清洁优美饮誉世界，此乃爻所称道路亨通也。故《象传》所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所谓“承”，并非上级领导部门强制推行的制节，而是应该逐步化为人民自觉节制的意识，并加以具体的实行。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甘，甜美也，《周易折中》引赵汝楳云：“咸、苦、酸、辛，味之偏；甘，味之中也。甘受和，和者节味之偏而适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节之吉也。”尚，尊尚、尊重。爻辞是说，九五，实施正确适中的节制，使人心头感到甜美而自觉遵行，吉祥如意；循此前进，必然受到人们的尊敬。九五居全卦之中，秉其阳刚中正之德，以调整节止全卦，是节之所以为卦之主。此所谓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故爻称“甘节”，又称“往有尚”也。又五以阳实于坎水之中，犹如活水源头，水行下流而泽斯万民，而受五水之实惠，如《周易折中》所云：“水之止者苦，积泽为卤是也；其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五为坎主，水之源也，在井为冽，取其不泥也，在节为甘，取其不苦也。”朱熹曾比较六四“安节”与九五“苦节”精神之异同，云：“‘安节’是安稳自在，‘甘节’是不辛苦吃力底意思。甘便对那苦。‘甘节’与礼之用、和为贵相似，不成人君得甘节吉时，也要节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个当节底。”（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三）大抵人过心劳形皆为苦，人感其苦则是强制之节，勉力而强制行之，其节止何能坚持长久？反之，甘之如饴，自觉实行，则其法令制度可行之长久，此之谓“甘节”；长久之道通，则九五之节，非为一人而安，是与天下共其安康之吉而惠泽万民。又九五与三、四互卦为艮（☶），艮有山象，五为山之顶峰，犹

如九五之节，功与山齐，人所共仰，有“高山仰止”之象，故爻称“往有尚”，其受人尊敬，乃其必然。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贞，正常也。爻辞是说，上六，苦苦地自我节制，如若作为正常之道要求常人遵守执行，必有悔咎凶险；但是，如果从个人修身养性角度来看，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又是值得肯定的，不必因事之成败而内心自责，所以爻辞说是悔恨消亡。上六以阴居阴，位当而正，是严格要求而自行节制之象，其所行事，原不该有悔的。但是，从全卦看，其居《节》卦之极，过节之中下无其应，虽已达矛盾转化之地，却仍不知灵活变化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而是过分地压抑自己，苦行僧式地谨守戒律而不敢稍有改变，其自我节制，已达到不近情理的地步，令人无法忍受而产生抵抗心理，故爻称“苦节”而致“凶”。比如春秋时期的墨子，他要求自己，刻苦而严格，同时他也希望一般世人甚至是国君贵族，也要像他那样摩顶放踵，日夜劳作，直到“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地步，辛苦奔波，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得一根也不剩，并且“以自苦为极”（见《庄子·天下篇》），这样自我节制，严格要求，其节虽苦，虽然比那自我纵欲贪赃之徒的无节败行要好得多，此爻所称“悔亡”也；但是，如果以墨家之苦节来要求常人，希望世代遵行，行吗？当然不可能。比如说墨子有《非乐》篇，因反对儒家礼乐，进一步否定一切文学艺术，甚至连劳动人民平日的劳逸结合，击缶而歌的文娱活动都在批判之列，这就滑向了“苦节”而无法实行了。庄子在《天下篇》中批评说：“今墨子独生不歌……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而果类乎……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子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天下之人，不堪其苦，因而反其道而行之，非凶而何？故《象传》云：“苦节贞凶，其道穷也。”《礼记·杂记下》有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正常的文娱活动，有利于精神愉悦，松弛劳苦的身心，有什么不好？比较而言，还是儒者之论合乎事物发展的常理，所以其说传之久远。反之，墨家为万民之利而汲汲辛劳，其用心良苦，天下皆知；但与儒家相比，墨家思想日趋式微，影响转淡，则与其违背客观自然事理的“苦节”观念有关。好心而做坏事，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墨子像



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综而言之，《节》之为卦，以位之中正而言其甘苦吉凶。在他卦中可兼正，但在《节》则除“中”之外，尚有位“正”的严格要求。卦中六爻，吉凶两两相对。初与二比，同为“不出户庭”，初无咎而二为凶，为什么？因为初位正，二则虽中而失正。三与四比，四柔得正为“安节”，三则过中失正而“嗟若”。五与上比，五因中正而致其“甘节”之吉，是为尽善之美，而上则过中无应、不知穷极为节之苦而致凶。又《周易折中》则从卦象关系来分析全卦精神，云：“下卦为泽为止，故初与二皆曰‘不出’，三则泽之止而溢也。上卦为水为流，故四曰‘安’而五曰‘甘’，上则水之流而竭也。通塞甘苦，皆从泽水取义。”而从精神义理方面看，《节》之为义，内涵颇丰，并不仅仅是修身用财之节，比如从教学言，有尊师爱生之节；从礼义言，有典制节文之节；从财政言，有节用爱民之节；从制度言，有剖符为信之节；在道德言，有高尚人格之节……宋末刘辰翁，作为南宋遗民，有感于亡国之恨，则又把一般意义的节止，拓展到爱国主义的节概，其《节斋记》明白地说：“节之为象取于《易》。”又云：“节盖论其大者：则天地四时，岂谓一事之信，一物之嗇，一小忍之顷哉！……节无大小，方一介之不当取也则一介为大。他时系千驷，受天下，犹一介也。当洒扫应对，则洒扫应对为大。他时虽使四方，临战阵，守宗庙社稷，与今日洒扫应对一也。视小节为大，则视大节犹细，彼谓观大节必于其细者，观人者之见也。节无大小，以能守为大。”从个人之生活节止，推引至国家社会，而论及民族气节，意义更为丰富而深刻。这大概应属于读《易》有心得的一种精神再创造吧！

不仅是社会人事，我们还可以从生理卫生的医学方面来论《节》卦精神。卦爻中的“甘节”与“苦节”之言，应予特别注意。对于疑心过重，易致精神疾病患者，《节》卦所示，利于情绪的疏导宣泄，有益心理的健康。《节》卦象征节制疏导，上坎（☵）为水，下兑（☱）为泽，水上加水，大泽四溢，则将有洪水泛滥成灾，怎可不加节制和预防呢？其象征意义非常深刻。为防水灾，利于灌溉，筑堤修闸之类，是早该预防及积极筹备之事。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心理的堤防和闸门也一样起到了节制疏导的作用。不过节制疏导又自有其道，节不以正，超过适中的限度，成为强制性的“苦节”，则效果适得其反。故《节》卦辞称“苦节不可贞”。贞为正常之谓。王弼《周易注》云：“为节过苦，物所不堪也；物不能堪，不可复正也。”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其心理情绪，利于疏导而不利于压抑。因此，即使是偏激怨愤之情，也必须为它寻找一个突破口加以宣泄，方能恢复健康正常。反之，过分克制和压抑，闷在心中而不与人通，则容易导致心理变态或其他精神残疾。故卦辞“苦节不可贞”，实为至理名言，合乎自然规律。二十世纪初流行于西方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以大量的病例事实，充分证明了压抑与变态心理的必然联系。但是，《易》卦作者早在几千年前，已有“苦节”致“凶”的论断，实已暗合今之科学精神。“苦”与“甘”是一对矛盾，二者相反相成。如明末东林党领袖左光斗云：“凡过心过形皆苦，

去其太甚则甘。”（马其昶《重定周易费氏学》引）《周易》因势利导，提倡顺应自然的“甘节”。甘者，甜美之谓也。自觉自愿地加以节制，而非强暴压迫的节制，才有甘美可言。这是启发自觉，提倡适当疏导，以便解放那久被压抑的情感和要求。故九五爻称“甘节”致吉。节之“甘”与“苦”，一吉一凶，两相比较，作者提倡什么、否定什么，一目了然。汉淮南王刘安曾说：“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淮南子·原道训》）又说：“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声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也。”（《淮南子·齐俗训》）感情不能强行压制不使发作，而应启发自觉，积极疏导，适当宣泄，以取得内在的心理平衡。相反，有的封建卫道者摆出一副“以礼乐自防”的虚伪面孔，主张“苦节”与禁欲，实是男盗女娼，造成了强烈的内心压抑，导致了严重的情绪混乱和心理变态，形成了心理残疾和精神病患。刘安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这些伪君子，说：“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而说（悦）之，两者心战。”于是勉强“迫性闭欲”，故意“雕琢其性，矫拂其情，以与世交。故日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外束其形，内总其德，绀阴阳之和，而通性命之情，故终身为悲人。”（《淮南子·精神训》）刘安从正、反两方面，形象地描绘了《节》卦提倡“甘节”、反对“苦节”的道理，很有说服力。强制推行“苦节”禁欲主义，压抑情绪，“心战”于内，失衡于外，造成精神堤防的总崩溃。寻根究源，社会精神病患及心理疾病大量增加，原因当然很多，但与禁欲、压抑的“苦节”也直接有关。心理失衡，进一步引起了内分泌系统的失调，人能不生病吗？所论发人深省，不仅对防病治病的心理医生有借鉴作用，而且对于安邦治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于创造财富的经济企业家，也多有启悟。

中孚

卦第六一



诚信之道感天地

《中孚》卦（䷼）第六十一，次《节》卦之后。《序卦传》云："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所谓"中孚"，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三说"中孚是诚信之义"，又说："伊川（程颐）云：'存于中为孚，见于事为信。'说得极好。因举《字说》：孚字从爪、从子，如鸟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边从孚，盖中所抱者实有物也。中间实有物，所以人自信之。"以为《中孚》卦象征"中心诚信"，程朱之说可从。《序卦传》的意思是说，适当的节制必须以中心诚信为本，中心诚信，则人们心服口服，铭感于内，自觉遵行，上下同心协力，也就天下无难事了。所以《节》卦之后就跟着《中孚》卦。所谓"见于事"之"信"，原是一种客观自然规律。如《吕氏春秋·离俗览·贵信》篇云："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按：不开，谓气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但与天地之信时至而然不同，人之信有待乎心中之诚，也就是程朱所称"存于中为孚"的意思。如杨万里，专就社会人事方面来解释"中孚"之义理，云："中有玉者外必辉，中有诚者外必孚，孚之为言，此感于彼，彼信于此之谓也。是故中孚之所发，上行之则顺，下信之则说（悦）。"杨氏从诚信立本、彼此思想感情共鸣互应加以推衍。古人极其重视内中诚信，《诗·王风·大车》载诗人"谓予不信，有如皎日"之誓，《论语·颜渊》记孔子有"民无信不立"之言，《管子·枢言》有"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之论，诚信是团结天下万民的纽带，所称皆与《中孚》

卦旨相互发明。

《中孚》卦（䷼）下体兑（☱）上体巽（☴），卦辞云："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豚，小猪。程颐云："豚躁鱼冥，物之难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鱼，则无不至矣。"卦辞大意是说：《中孚》卦象征心中诚信，甚至可以感动冥顽小猪及无知鱼虾，占祥如意，利于大家和衷共济以涉越大川之险，利于坚持正义而不松懈。《中孚》下卦兑象征泽，上卦巽象征风，故《象传》释云："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这是从《中孚》卦象来加以发挥。泽上和风阵阵，与泽水相感相激，水体虚，风能入而震撼之，犹如人心虚而物能入而感动之，故程颐谓"风之动乎泽，犹物之感于中，故为中孚之象"（见《伊川易传》）。人们观《中孚》卦象，感悟到只要人们心中诚信，则其所感无所不至而无所不入，甚至小猪小鱼之类冥顽无知之物都可感动，更何况是有意识的犯人乎？人皆有恻隐仁恕之心，于狱讼之事，判人生死，尤须慎重，故《象》称"君子以议狱缓死"，以见其内在中孚之诚信。而《彖传》则从卦体卦德方面加以发挥，云："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从全卦的六爻而言，中间的三与四两阴爻处内，初、二、五、上诸阳爻处于上下之外，有中虚而无私主之象，故称"柔在内"，也就是说，内心之中，谦虚待人而柔顺于物；而从上下二体分而言之，则九二、九五皆秉刚中之德而中实为信，故《彖》称"刚得中"。中虚而孚，外实而信，见"中孚"之义。所谓"说而巽"，则指下卦兑（☱）性为悦，上卦巽性为顺，上顺下说，如程颐所说："为上至诚以顺巽于下，下有孚以从其上。"君臣上下孚诚相感而驯顺以悦，这是一种自觉的共鸣感应，其感化的力量是伟大的，故《彖》称"孚乃化邦也"。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诚信连敌国之人都可感化，更何况是本邦之人呢？"豚鱼吉"，如程朱所注，诚信可感动无知之物，何况是人！谓其中孚无所不至也。又从上下卦体看，下兑为泽水，上巽为木为舟，有舟在泽中，而畅通无阻之象，犹如诚信感人，则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则何险而不可涉？故称"利涉大川"而"乘木舟虚"也。中心诚信而合乎正义之道，则与天地之德相映成趣，值得人们颂美称誉，故《彖》称"应乎天"也。关于《彖传》所称《中孚》卦"柔于内"的中虚，及"刚得中"之中实，朱子有其妙解，云："'柔在内，刚得中'，这个是就全体看，则中虚；就二体看，则中实，他都见得有孚信之意，故唤作'中孚'。"（《朱子语类》卷七十三）又说："问：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如何？曰：只看虚实字便见本质之异，中虚是无事时虚而无物，故曰中虚；自中虚中发出来，皆是实理，所以曰中实。""一念之间中无私主，便谓之虚。事皆不妄，便谓之实。不是两件事。"（见《周易折

中》引）探索中孚诚信的哲学生成形态，启人颇多。至于卦辞“利贞”之言，如来知德《周易集注》所释：“利贞者，利于正也。若盗贼相约，男女相私，岂不彼此有孚？然非天理之正矣，故‘利贞’。”比如唐韩愈散文名篇《柳子厚墓志铭》曾形象地描绘了世俗小人之信誓云：“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小人之信誓，有识之士反见其矫饰虚伪之心肠。故中孚之信必以正义为基础。

对于卦辞断句，《周易折中》引吴慎的话，以为“不可以‘豚鱼吉’三字为句，当以‘中孚豚鱼’为读”。其实吴氏断句虽然有异，但信及豚鱼之意与旧注同。又“豚鱼”之解，明来知德《周易集注》及清陈梦雷《周易浅述》，也有不同的解释：来知德云：“豚鱼生于大泽之中，将生风则先出，拜乃信之，自然无所勉强者也。唐诗云‘河豚吹浪夜还风’是也。信如豚鱼则吉矣。本卦上风下泽，豚鱼生于泽知风，故象之。鹤知秋，鸡知旦，三物皆信，故卦爻皆象之。”又陈梦雷云：“豚鱼，江豚，至则有风，信之可必者。泽上有风，有豚鱼之象；木在泽上，外实内虚，舟楫之象。诚信之至如豚鱼则吉。”指“豚鱼”为生活中实有的节候动物，也可另备一说附考。

以下分析爻象爻辞。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旧注一般释虞为安，燕亦安也，释“它”则据字面理解为其他。故黄、张《译注》据之译云：“初九，安守（诚信）可获吉祥，别有它求则不得安宁。”但是王弼注则训“虞”为“专”，云：“为信之始，而应在四，得乎专吉者也。”于义亦通。但是，我则另有一解：虞，指古人所称仁兽驺虞也，《诗经·召南》有《驺虞》之篇，《毛传》云：“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它，有的本子作“他”，误。甲骨卜辞作“”，有“”与“无”，系甲骨卜辞中常见之词。它，篆作，《说文》云：“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它或从虫。”它即今之蛇也。古代原始之民穴居而处，杂草丛生，故视蛇为大敌，常被蛇所咬伤，祸大莫甚于此。于是甲骨文中“祸”字即作“”，是被蛇咬伤脚的样子。故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释“”为灾害。据此，可见由龟卜到占筮，文字训诂相承的痕迹。爻辞“不燕”，即不安，试想，有蛇咬啮其足，人能安乎？现试译初九爻辞如下：初九，如驺虞仁兽信守其中心之诚孚，则将吉祥如意；如果像咬人致祸的蛇那样游走草间、变幻不定，则是灾祸丛生而令人不安。爻辞“虞吉”是正面的叙述，因为初九阳居阳爻，当位得正，又处下兑之下，兑卦性悦，故初九实为悦之初始，其喜悦发自内心之实诚，故借驺虞仁兽以美其诚信之德。中孚之德，慎始于初之正，

故称“虞吉”。但《易》卦作者，具辩证思想因素，所以又从另一角度来看，初处无位之地，其内中之诚，尚未见信于人，人未之信，一旦有小人挑拨其间，则将悦消而祸患随至，故爻辞从反面，戒其“有它不燕”，应时刻警惕蛇蝎小人的兴风作浪而坏其诚信。这样，一开始就从正、反两方面来展开《中孚》卦义的阐述。生活是复杂的，诚信君子，易被小人欺之以方，读初九爻辞，该有所悟。

九二，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鹤，以秋为信之鸟，据传鹤于八月霜降则鸣，兑卦于节候为正秋，故云。又兑有口舌之象，故以鹤鸣为喻。阴，山之背面，也可指山中幽深之处。子，这里并非指儿子，而是指同类。爵，古代酒器名，引申指代酒。好爵，指代佳酿美酒。靡之，共享之。爻辞是说，鹤在山阴深处啼鸣，引发了同类遥相呼应的美妙酬唱；我这里有佳酿美酒，将和大家同饮偕乐。九二阳处阴位虽非其正，但居下兑之中，以刚履柔而秉其刚中之德，笃实诚信于中而见诸实践，其美名令誉声闻遐迩，所以能感动同类，引发了上下左右的共鸣互应，从而形成了一股团结一心共越大川、战胜险难的力量。《诗经·小雅》可能受爻辞影响，而兴《鹤鸣》之诗，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句，兴象与爻辞相似。但《中孚》九二居位在三、四两个重阴之下，有处地幽深之象，又上无其应，实无意于求人，而人自应之。故《周易折中》引郑汝谐云：“二独无应，若未信于人，而爻之最吉者莫二若也。自耀者其实丧，自晦者其德彰，无心于感物，而物无不感者，至诚之道也。二以刚履柔，其居得中，且伏于二阴之下，盖静晦而无求者，无求而物自应，故‘鹤鸣在阴，其子和之’者，感以天也。”所谓“子”，旧注或实指初九，或实指九五，过分拘泥而难有确解；其实，作者只是以之泛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类，二与初、五同德，虽表面无应，而精神却有灵犀一点之通途。所以宋知德《周易集注》云：“物之相爱者，若子母之同心；人之所慕者，莫如好爵之可贵。鹤鸣子和者，天机之自动也；好爵尔靡者，天理之自孚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罢，通“疲”，疲惫不堪的样子。爻辞是说，六三，在战场面临劲敌，或擂响战鼓发动进攻，因胜利而欢呼歌唱；或疲惫溃退，因失败而伤心哭泣。《象传》解释云：“或鼓或罢，位不当也。”原来，六三阴居阳位，以柔践刚，失位不正，有过中之弊，又与诚信已穷的上九相应，明显已有“罢”“泣”的不祥之象。又六三处于下体兑极，兑卦性悦，已生悦极悲来之象。加以六三又处上下卦体之间，正在矛盾不同阶段界上，故企望跳越下体而虚望上体，心无主张，游移不定，所以爻有或进或退之辞。接敌之时，事极严重，怎可心神不定地进退失据呢？而从互卦看，六三与九二、六四下互为震（☳），震象为足而性动，有前进之象；但六三又与六四、九五上互为艮（☶），艮象为山而性止，有静止不



■苏秦像

进之象；或动或止，进退失据，所以爻有或进或退之辞。“或”者，不定之词，指三、四爻自树其敌也。又六三处下兑之极，象征泽水之流，故以眼泪为喻；而兑又有口舌象，所以又以开口歌哭喻之。上述弊病，是因六三不中不正、内乏诚信造成的。杨万里云：“水之为物，深则静，浅则动，深则融，浅则结。六三，泽水之最上，浅而未深之水也。今夫泽水之遇风也，其上则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浅则冰，其深未必冰。何则？浅则易摇，深则难挠也。六三为泽水之浅，居柔说之极，故一与物遇，鼓之则动，罢之则止，结之则泣，融之则歌，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后人信之。六三己且不自信，又何孚于人？”比如战国纵横策士苏秦，挂六国相印，或歌或泣，何所不至？最后遇刺惨死。这一悲剧实是他自找的，反复无义而唯利是瞻，中无诚信而变幻欺人，谁人信之？人不之信，必败无疑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几望，月亮将要满盈而尚未圆之时。匹，匹配也，又两马一色为匹，犹对也。爻辞是说，六四，月亮将圆而未盈，此时马儿失其匹配，没有咎害。从爻位爻象看，六四已从下体升至上体，摆脱了六三无位过中的困境，以阴居阴，当位得正，上承九五阳刚中正之君，是诚恳办事、公忠体国的大臣。古人经常把君主比喻为普照之日，月则与日相对，月借日光而成其光采，月从乎阳，犹如大臣之承君而重，故爻辞以“月几望”为称。明来知德《周易集注》释云：“本卦下体兑，中爻震，震东兑西，日月相对……因四阴爻近五阳爻，故有此日月之象。”古人以为，月至满至圆，盛极即衰；大臣之位，盛极则有逼君之嫌；故爻称“月几望”，将圆而未满，如大臣之诚孚于中，不敢有私，故君不忌而宠信之，此则长盛之道也。从爻位看，六四与初九阴阳有应，该是美事。但在《中孚》卦中，四若应初，则承五为不专，三心二意于君，何以称其中心之诚信呢？所以四只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

能舍己之私，绝初之应，专心承五，以表现其忠诚于国家和民族的决心。爻辞所称“马匹亡”，就是公而忘私之喻。原来，六四与六三、九二下互之卦为震（☳），震象为马；但《易》重变，阳阴一旦转化，六四阴化为阳，则下互之震化离（☲），则马化为牛，有马儿亡其匹对之象。又下互之卦震为马，上卦巽象为缰绳，下兑又有毁折之象，震马惊奔，脱缰而逸，也同为“马匹亡”之象。但是，六四之亡失于初，却因此而得重于五，从大道理看，公忠体国而亡其私利，利国利民，何咎之有？故爻又称其“无咎”。《周易折中》据此更进一步论《易》例云：“《易》中六四应初九而义有取焉者，皆上不遇九五者也。如六四遇九五，则以从上为义，而应非所论，《易》例皆然。而此爻尤明，盖孚不容于有二，况居大臣之位者乎！”读者如重温《涣》卦六四爻辞爻象，自可明白。而千万不可一味只讲上下阴阳之应。《易》理灵活，须观其具体而特殊的情境而言其是非。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挛，用手牵连状，引申为维系，推而广之，则为心心相印。如，语气助词，无实义。有孚挛如，可参见《小畜》九五爻辞译注。爻辞是说，九五，以自己发自内中的诚信，来维系广大臣民的利益，以便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如此措施必无咎害。九五以其阳刚中正之德，居全卦尊位，是《中孚》卦主，下与九二表面阴阳无应，但九二同秉刚中之德，二、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实是一种无须专应、发自内中诚孚的无心之应，也即因其必然的自然之应，故爻称“有孚挛如”。挛者系也，绳为相系之具，上巽有绳象，而九五与六四、六三上互之卦为艮（☶），艮有手象，绳系手牵，有挛如之象。如郭雍所说：“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于固结挛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无私应之累（按：指无专应于二），故直曰‘有孚挛如’而已。”（《周易折中》称引）全卦六爻不直接提“孚”，只有九五爻辞才称言之，因为九五是《中孚》之主，其诚孚激发于中，而化感万民，故《彖》称“孚乃化邦也”。为什么？因为人君在上之诚孚，与臣民在下之诚孚，因其地位之异而影响不同，在下者中有实德而不迁于外即可，但在上者其诚孚则须以天下为心，孚动天地，感化万民，然后才能固系天下于一心而江山永固，方可保其无咎。又《小畜》九五爻辞也有“有孚挛如”之言，《周易折中》对其异同加以比较云：“此爻义与《小畜》之九五同，其为臣者‘月几望’亦同，但彼主于君臣相畜，而此主于君臣相孚尔。要之‘富以其邻’（按：《小畜》九五爻辞）者，即‘孚化乃邦’之说，而‘君子征凶’（按：《小畜》上九爻辞）者，亦即‘马匹亡’之意。”于此可见六十四卦之间，相互联系之密。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高飞。翰音，有二说：一指飞音，即向高空飞扬的声音，王弼注云："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一指古代祭祀用的鸡，《礼记·曲礼下》云："鸡曰翰音。"贞，一般旧注解释为正，但这里则是作动词用，占筮之意。但是根据九二爻辞"鹤鸣在阴"之言，并非指鸡，故以王弼之注为是。爻辞是说，上九，飞鸟在高空中得意鸣叫，声彻于天，筮问者占得此象，必有凶险。按九二居下兑泽中，故有"鹤鸣在阴"之象；上九居上巽之极，随巽风而高飞远扬之象，故爻有"翰音登于天"之言。《周易折中》引胡瑗云："翰者鸟羽之高飞也。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穷极之地，是无纯诚之心笃实之道，徒务其虚声外饰以矫伪为尚，如鸟之飞登于天，徒闻其虚声而已。"苏轼《东坡易传》更进一步联系九二爻辞来加以批评云："处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飞而求显、鸣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阴而子和，上九飞鸣而登天，其道盖相反也。"生活中"翰音登于天"——有名无实的虚情矫饰比比皆是，在市场上，叫卖声喊得最响的并不一定是价真货实的商品，它常常是假货劣品的华美包装而已，人们千万要警惕而不可受其迷惑。历史上亦然。如晋初清谈家王衍，内无中孚之实，而妄为虚声以求名，挟其善鸣，下欲动众，上以动君，躐取高位而登三台执朝政，与乃弟澄、敦之流定下狡兔三窟之计以利家弃国，此实是妄而盗真、诈而盗诚，以哗众取宠者，如上九居穷极而不知变，最后矛盾爆发，身死国亡，落得万世唾骂之恶名。事见《晋书·王衍传》。"翰音登天"已成为历史教训，人所稔熟。如《世说新语·言语》第三十八则云："郗太尉（按：名鉴）拜司空，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据《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载，朱博是汉哀帝建平二年拜相，其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而不宜相，内无治国之才，以其虚声取相位，后来果然因过自杀，自取其虚声闻天之咎，所以《世说新语》中郗鉴以"朱博翰音"为戒。据《太平御览》卷二〇七引《晋中兴书》，郗鉴"家本书生，后因丧乱，解巾从戎，非其本愿，常怀慨然"，实是淡泊利禄而具书生本色，所以能以"朱博翰音"为戒，"虽在公位，冲心愈约"，而成其治国理民之政。这一正一反的历史教训，说明了上九不中不正、居穷丧诚而不知变，虚声取宠于众，实是欺人而终自欺，其悲剧正是咎由自取，故爻有"贞凶"之戒，能不慎乎！

《中孚》以内中的诚信为卦，《彖》称"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该是个至为吉祥的卦。但这是从整卦来说，而且是对正人君子而言。在其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六爻周流变化，则又是有吉也有凶。如陈梦雷《周易浅述》所分析："全卦以诚信在中，则可以涉险难，然皆利于得正。六爻在他卦皆取阴阳相应，此独取二、五中实之德为孚。盖中可兼正，即卦之贞也。四亦以正而无咎。初以正而吉而戒其有他。至三、上则不中不正，失所谓贞，即失所谓孚矣。"此全卦六爻进退变化之大概。

人生之道，同于自然。草木之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草木有信，气候有节，何况人乎？“诚”与“信”二字，乃人生之大节。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孟子也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诚信”之道，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几乎触及社会人生的各个角落，其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借用《毛诗序》的话来说，是“感天地，动鬼神”，移风俗，莫善于斯。汉刘向《新序》卷四《杂事》曾举例说：“钟子期夜闻击磬声者而悲……钟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于心而木石应之，以至诚故也。人君苟能至诚动于内，万民必心应而感移。尧舜之诚感于万国，动于天地，故荒外从风，凤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鱼吉。”此之谓也。’”所论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而有夸大溢美之辞；但他也提醒我们，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无诚失信尚不可立国，而何况是一般人呢！只要把“诚信”之道，提到造福人类、推进文明的回归哲学的高度来看问题，则孔孟夫子之教，于今仍有其启示意义。

小过

卦第六二



矫枉过正致大吉

《小过》卦（䷽）第六十二，次《中孚》后，彼此互为上下六爻阴阳相反的错卦，卦象的错综变化，已呈现了矛盾相反相成的征兆。《序卦传》说："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卦中之所谓"过"，当然也包含了过失错误的意思，但它更多是指过越、过分、过常、过人之处。《序卦传》的意思是说，因为心存诚信，立稳行正，自恃孚信，以为人所不疑，所以行事果断，毫不犹豫。这样立身办事，有时就会小有过越，时或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所以《中孚》之后有《小过》卦。程颐《伊川易传》解释说："过者，过其常也，若矫枉而过正，过所以就正也。事有时而当然有待，过而后能亨者，故小过自有亨义。"正如卦旨所揭示的，小事可以矫枉过正，故称"小过"。因为所"过"之小，仍在可以矫正之列，可塑性强，由"过"趋正，继续健康成长，实属可能，此所以"《小过》亨"也。但若是大事之过，则为大过，天翻地覆，岂是人力所能矫正！无法矫正之时，只能顺之以鼎革之变，激烈变革以正其非，此则非《小过》所遵行之道矣。另外，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三又从卦象方面来解释说："《中孚》有卵之象。《小过》中间二画是鸟腹，上下四阴为鸟翼之象。鸟出乎卵，此《小过》所以次《中孚》也。"阐述前后二卦的关系，也可另备一说。

《小过》（䷽）下卦艮（☶）上卦震（☳）。卦辞曰："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事，指百姓日用常行之事；大事，指关系国家民族之事。卦辞大意是说，《小过》卦象征小有过常的现象：前进道路亨通，利于坚持正义的理想；但是处在"小过"的特殊环境中，其所作为只适宜于施办生活中的平常小事，而不可以专注治国理民的大事来

大干特干一番；犹如飞鸟悲鸣留其音，不宜向上高飞而不息，而适宜于下行安栖休养生息，识时务者顺势而行必然大获吉祥。从卦象来看，此卦上下四个阴爻包围了中间两个阳爻，外虚而内实，内实譬如鸟身，外虚则如鼓动两翅，故有飞鸟之象。又阴过于阳，而按《易》例，阳为大而阴为小，所以此卦有“小过”之象。又阴居尊位，阳失其位而不中，也同样是反常之小过。而从约卦来看，上下四阴约为二阴，中间二阳约为一阳，因而《小过》又寓有坎（☵）象，坎性险陷，人们自信而行于坎陷之中，谁能保其无过？孔子，古时公认的圣贤，尚且在周游列国中，干七十余君而不能用，曾经惶惶如丧家之犬。圣如孔子，尚且不能无过，何况寻常人家？另以驾驶汽车为喻，再高明的驾驶员，也无法永驰于中道之上，一左一右，驾驶盘不这样转动，行吗？这一左一右的旋转，犹如有小过是为了恢复其中道行驶也。因此，小过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必须正确对待。处小过之时，若干大事，容易铸成根本性的重大失误而无可救药，此之谓大过，所以爻称“不可大事”以警戒之。但若是尝试于施办小事，则一旦发现过常的小失小误，很容易随时纠正，矫枉过正，不失为正，则为理想和事业的成功积累了经验，打开了新的通途，所以卦辞有“可小事”而亨之言。《象传》就卦象解释说：“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小过》下体艮（☶）象为山，上体震（☳）象为雷，这是山上有雷之象。按《易》卦中之震雷，多含有警戒震惕之意。《周易折中》解释说：“案雷出地则声方发达而大，及至山上，则声渐收敛而微，故有平地风雷大作，而高山之上不觉者，此小过之义也。”君子观山上有雷之象，悟到处小过之时，可行矫枉过正之道，也就是自己退后一步，以自贬损来启悟人们改过自新之意。《周易折中》引陆铨云：“君子虽行贵得中，事期当可，然势有极重，时须损余以补缺，事必矫枉而后平，即夫子所谓‘宁俭’‘宁戚’之意。理所当过，即是时中。”孔子曾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小过也是过，也是一种缺陷或失误。但孔子又曾说：“过则勿惮改。”改过趋正，不又是一位“好同志”了么！春秋之时，晏子作为齐国宰相，却常是粗食弊裘，一般世人视以为刻薄自己的过俭，似乎有点做作；但对于骄奢淫逸之俗，同样可以起到矫枉过正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晏子之小过，只要正确对待，同样可通于亨通之途。《彖传》则从卦德卦性方面来分析卦旨，云：“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偕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彖》辞大意是说，处于小过之时，小有过常并不妨碍其达于通途。但是，矫正小过以恢复正道而不妄为，才可获利，以保证与时代发展同进步。卦中阴爻居中，阴柔和顺而乏劲健阳刚之气，因此只能处理小事而致其吉祥。卦中阳爻则或失位或过中。处穷约之时，力所不逮，所以不可以野心勃勃想就天下之事大干一场。《小过》卦形有飞鸟之象：“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充分说明了野心勃发逆势上行违背了事理，而依势

眼睛向下而从办小事实事入手，则可致安顺之境。《彖》称“柔得中”云者，指六二、六五居上下卦体中位，《易》重阳祛阴，阴柔居中，也就只能办小事而致吉了。“刚失位而不中”，刚指的是九三、九四，三虽阳当其位，但处下艮之上，该止之时，却不明形势，刚健欲上行其志，不中之弊甚明；四则既失位又失中，不中不正，又野心勃发，上不正则下梁歪，这又怎能成其大事呢？故称“不可大事也”。《彖》中“有飞鸟之象焉”一句，观其文辞，与《彖传》不类，似如程颐《易传》所云，是后世“解者之辞误入《彖》中”。至于《彖》之末尾，以飞鸟遗音的宜下不宜上，形容“上逆而下顺”之旨：上逆，指六五居上体之中而乘凌九四阳刚，阴邪骄矜于上，而下无其应，其勃勃野心又怎能实现？故卦称“不宜上”；下顺，指的是六二阴居阴位得正，又处下体之中而上承九三阳刚，态度谦和，眼光向下，柔以行事，顺水行舟，则坎险可济而小事可成。故卦称“宜下”。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云：“飞鸟声哀以求处，过上则愈无所适，过下则不失其安，譬君子处过差之时，为过矫之行，顺则执卑守下，逆则犯君陵上，故以顺逆类鸟之上下也。”这就把卦辞借飞鸟以言人事的精神说得很明白了。以下析爻辞爻象。

初六，飞鸟以凶。

以，因也，言初六因飞而致其凶也。爻辞是说，初六，飞鸟逆风而上，其势必致凶险。《小过》之卦，跟在《中孚》之后，《中孚》上九有飞鸟“翰音登于天”之辞；而《小过》卦形外阴虚而内阳实，如鸟身舒展其二翼之象。所以《小过》初九承接《中孚》上九之辞，继续以飞鸟为喻。又《大过》卦有栋桡象，栋之用在其中部，故于三、四借栋为喻；《小过》卦以鸟设象，鸟之飞在两翼，初、二、五、上四阴爻居外，犹如飞鸟展其两翅，而初与上二爻又在翼外，犹如翼上翰羽，致飞之力因之而起，故初、上皆以飞鸟为喻。从爻位看，初九阴居阳而失位不中，又处下艮之初，居“小过”之始，此时形势，宜艮止之静，宜下息而不宜上行；但初因上面与九四阴阳有应，就不顾所处“小过”的特殊环境，不自量力，急于上行以应，意欲实施其治国安邦的抱负，犹如飞鸟激飞于无穷苍溟，却不知向下求其栖息，最后必然是有去无回，致其凶险。按九四处上震之下，震卦性动，初与四应，则动而不止，故有鸟飞之象。初之应四，在它卦为吉，在《小过》则反之，因其上飞而致凶，犹如小人急于进躐高位，因其趋势阿附权贵而自取其祸。故《象传》慨叹说：“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也就是说，初六之凶，是自我作孽，咎由自取，谁也无可奈何。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祖父。妣，祖母。这一爻辞很难理解，有关祖妣之解，应如《周易折中》引张振渊所说：“祖妣只作阴阳象，阳亢而阴顺也。过祖遇妣，是去阳而就阴，去亢而从顺，如此则不陵及于君，适当臣道之常矣。‘不及其君遇其臣’，

宜下宜顺也。”按：九三喻父，九四喻祖，而六五以妣为譬。如果我们不泥于字面，则爻辞大意是说：六二，超越了祖父而遇见祖母，不敢凌越于君，国君因此而得知六二是安顺于下的忠臣，无有咎害。从爻位爻象看，六二阴居柔而当位得中，既中且正，秉其柔中之德，爻象已经显示“无咎”之象。又六二处下艮之中，艮性为止，其上与六五阴阳无应，按照一般的卦，则宜静不宜动。但我们应注意到，这是处于“小过”的特殊环境之中，该止而动，属反常现象，是以称“过”，但超越了三、四两个阳爻以后，自动示下而不敢凌越六五柔中之君，则又是过而知止，是为小过，不及其君，是为不及，当过而过之，当不及而不及，可见六二能适应形势、权衡变化而行其中道，于是终于避免了“过犹不及”的弊病。故《象传》云：“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六五虽柔，但居尊位，六二臣位，君臣各有正常的名分，即在“小过”的特殊环境中，名分纲常也不可以随便超越，而应同样秉其中正之德，决心加以尊重。也就是说，六二之行，其过小而不过其甚：事有可过者，虽过而仍持其恭顺安下之体；事之不可过者，则谦柔守其中正而安于名分之常。六二“无咎”为全卦六爻最佳之爻，道理在此。但是，杨万里《诚斋易传》解释与此相反，直斥六二云：“六二以阴柔之小人，居大臣之高位，常有过其分之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彷徨而不敢进，窥觎而不得僭者，有二阳以振其前也。过其一又遇其一，进则九四御其腹，退则九三要其背，故其僭不及于六五之君。非不及也，遇二臣之振，已不可越而过也。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九三以阳居阳故称祖，九四以阳居阴故称妣。”其解虽新，但似乎有违乎六二中正之德的事实，又以九四称为阴性之“妣”，也属不伦，违反《易》例，故其说只能备参考，而不取以为解。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戕（qiāng），残害，杀害。从，从而。爻辞是说，九三，当过之时，不加防范，从而因此而受到伤害，必有凶险。从爻位爻象看，九三阳刚得正，与上六阴阳相应，在它卦该是吉爻，但在《小过》，因其特殊环境反而致凶。如朱熹《周易本义》所说：“小过之时，时每当过，然后得中。九三以刚居正，众阴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刚，不肯为之备，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过防之，则可以免矣。”常言道，有备无患。处过之时，事有反常，怎可不为之备？小过之时，阴盛于阳，三位最正，目标极大。但是九三偏是不识大局，自恃刚正而一无所备，故《象传》云：“从或戕之，凶如何也！”九三为众阴所窥所忌，其凶险是多么严重啊！这是因为刚正与阴邪不两立的缘故。而九三却偏偏一点儿也不觉悟。又九三爻象，处艮止之极，一奇横亘于上，显其提防之象，对于上体之震（☳）原该有所防备才是。但二、三、四下互之卦为巽（☴），巽象为风，有风入而从之象；三、四、五上互之卦为兑（☱），兑象为口舌，“为毁折”；合上下互卦综而考之，众阴巧言佞辞如风之入人，九三因悦其言而信从之，自撤堤防



■荀彧像

而不为之备，所以一旦受到阴邪戕害，立致毁败而见凶险。又《易》卦重变，三若阳变为阴，则上互之卦由兑（☱）之坎（☵），坎于象为险陷，同样呈现凶象。杨万里《诚斋易传》云："君子之进不可过，惟防小人不可不过，防之不过，有时不幸而从之矣，非必升其堂哜其胾……不防而信之，斯为从之矣。从之，斯受其戕贼之祸矣。国人皆知白公将为乱，以告子西，而子西独不信。曹操之篡汉，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独不疑，至九锡而始有异议，故皆受其祸……故圣人戒九三之迫切如此也。"按曹操荀彧事，人所稔熟，但以阴邪小人譬曹操，比喻欠妥。而春秋末期楚国的子西、白公事，见载《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西为楚惠王执政卿士，白公胜是楚太子建之子，白公流亡在吴，是子西一手卵翼提拔。但白公一旦羽翼已成，则称兵乱楚，其将乱时，人以告子西，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不之信，更无防备。于是白公称兵作乱以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诚斋以九三之凶喻子西之死，似矣。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爻辞是说，九四，没有咎害，只要自己不要过分施逞刚强，则下与初六可以自然相遇而平安无事。反之，如若自恃震动之性而盲目上求，则灾厉自生而必须戒止，因处小过之时，千万不可逞强施能而大干一场，而应永远持守其正义的立场。从爻位爻象看，四已脱离下艮之止，而升至上震躁动之体，内存躁烈盲动之性。而处小过之时，又是宜下而不宜上，宜静观其变、后发而应之，方能防过而保其无咎。故爻多戒辞。又四以刚居柔，位不正当，表面上似应有咎。但其谦恭下人，又是过乎恭者，这在小过之时，又如《彖》辞所称，是"过以利贞，与时偕行"，适时应变而妥帖得体，又何咎之有呢？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弋，用绳系在箭上以射取猎物。爻辞是说，阴云密布而暂不下雨，浓厚云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

团来自我们城邑的西郊。王公努力射猎隐藏洞穴中的野兽害虫。按古人以云为阴物。而从方位来说，东与北为阳方，西和南为阴方。“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与《小畜》卦辞同，可参阅。浓云密布而不雨，正说明阴气方盛而阳气不足，缺乏阴阳交汇的机会，所以虽多积雨云团却仍不下雨以润泽大地、普济苍生。这是因处小过之时，隐患未解，阳气未能上升而和合阴气之故。这一隐患必须除去，所以爻辞又以王公率众弋猎隐藏在洞穴中的猛兽害虫为喻。六五阴处尊位，故不以君主而以王公为喻。又五处上震之中，震卦性动，所以又以弋猎隐害的积极行动设譬。这就说明了，处小过之时，虽然不宜大事，但并非守株待兔，什么事情也不干；下体艮止，宜静不宜动，但是五已处上震之中，卦辞有“小事吉”之训，《易》重变，积小则可成其大，故适时而动，矫枉过正，以争取矛盾转化，由小过趋正常而可致吉。“公弋取彼在穴”，就是除去隐忧的适当运动，是在为促使矛盾转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从爻象看，《小过》约卦为坎（☵），坎为水，有雨象。六五为一卦之主，以阴柔居尊位，阴过其阳，处小过之时，虽然意欲有为，又岂能竟其大功？故爻又以“密云不雨”为喻。关于六五爻辞爻象，古人说法甚多，如姚舜牧云：“时值小过，宜下不宜上，阴至于五，过甚矣！其所居者尊位也，挟势自亢，泽不下究，云虽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当此之时，欲沛膏泽于生民，必须下求岩穴之士以为辅乃可也，故又戒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贤。”（见《周易折中》引）于义亦通，可另备一说。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弗遇，指下与九三阴阳之应，九三自恃刚强之过而致凶，上六失去所能遇合之阳，故云。过之，指上六居全卦穷极之地，高亢不下，早已越过了阳刚，失去了一切阴阳遇合的机会。离，通“罹”，遭难也；《诗·邶风·新台》有“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指飞鸟自投罗网，与上九“飞鸟离之”相似。眚（shěng），原为眼睛生翳之疾，引申泛指疾病祸患或过失。爻辞是说，上六，不仅未能遇合阳刚，而且早已超越一切阳刚，亢极而未能自已，犹如飞鸟动极忘返，离于缯缴，终于成了餐桌上的野味佳肴，这就叫做灾难啊！从爻位爻象看，上六处上卦震体之上，性亢而躁动；又居全卦过极之穷位，只知往上爬，而不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处小过之时，却偏又不识时务，实是违背常理至甚至极，早已超越了过之小者的范围。这样矛盾就会迅速转化，由小过之不安，发展到大过之毁败，矛盾产生了质的变化。所以爻称“飞鸟离之凶”。天灾自外而至，人祸则生于自身，内外夹攻，怎不败亡！故《小过》大约之卦为坎（☵），坎性险陷，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矛盾并且善于引导转化，则可能由小过渐积而至于大过，自溺坎水险陷之中，而取灭顶之灾，这就是爻辞所称的“是谓灾眚”了。灾祸凶险之降，却仍茫茫然于天理人事，不识形势，穷极而奢欲不止，犹如飞鸟高亢而不知回头，穿空不已，自己的体能能达得到吗？此其一；高飞招摇而不知安栖，则又将成为

猎人射猎的活动靶子，此其二；危在旦夕，却不知就里，过而不止，并由小过而趋大过，乃至危之道，此其三。由此可见，上六灾眚之凶，实乃咎由自取，圣人之戒，惊心动魄！从卦体看，初九上六处外阴之外，有飞鸟两翼翰羽之象，故爻以飞鸟为喻。从爻变看，上六阴若化阳，则上体由震化离（☲），“离为雉”（《说卦传》），有飞鸟之象。又上卦震，震性动；下体艮，“艮为手”；离又有兵戈之象；合而言之，则有手持弓箭以弋取飞鸟之象。故宋儒胡瑗云：“上六过而不已，若鸟之高翔，不知所止，以至穷极而离于凶祸，不能反于下以图其所安，犹人之不近人情，亢己而行，故外来之灾、自招之损，皆有之也。”（《周易折中》引）

无论天理自然，抑或社会人事，只要处在矛盾运动之中，就不可能永远持中就正而无一丝一毫的过失反常，有过失反常的现象存在，是一种客观规律。“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确对待。圣人尚不能无过，更何况是一般世俗之人？历史上英名盖世的帝王，无论秦皇汉武，或是唐宗宋祖，哪个丝毫无“过”？史册俱在，载之历历。但是，“过则勿惮改”，终于建国兴邦，天下必安，成就了一代英名。比如唐代魏徵之于唐太宗，魏徵曾多次上疏，犯颜直谏，批评唐太宗的过失，其《谏太宗十思疏》，指出人君若纵情傲物，不积德义，就会失去民心，并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其《十渐不克终疏》，则直截了当地批评唐太宗的诸多过失，针对性强。据传太宗曾因魏徵之谏，恨得咬牙切齿而意欲诛之，如《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载：“上（唐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但细细思其“载舟覆舟”之戒，令人惧惕，所以又大多接受批评，并声称“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又下诏曰：“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诏载《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魏徵所谏十事，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来看，仍属日常小过，但唐太宗却因其纳谏改过，而开其贞观之治，利国利民，而成其一代英名。小过必改，积小成大，而终趋于正，小事之吉，功不可没。大过则不然。如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唐太宗之征高丽，群臣谏莫能听，双方死伤惨重，大伤国家元气。故贞观二十二年宰相房玄龄疾笃，遗表谏曰：“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侥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此过之害，直至高宗武后年代而未息。唐初征高丽事，正可与《小过》“可小事，不可大事”卦辞相发

明；同时也可从纳谏改过开创盛世之事，印证了卦辞“不宜上，宜下，大吉”之言。唐太宗贞观之治是盛世，尚且不能无视其过，更何况是一般的暗弱之世呢！如杨万里所说：“小过之世，何时也？用静吉、用作凶之时也。曷为静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按：指六五与九三、九四），一也；上动而下止，上作而下不应（按：指上体震性动，下体艮性止），二也；阴盛而阳孤，邪众而正寡，小人长而君子消（按：指四阴裹闱二阳），三也；可以不静而轻作乎哉？当是之时，君臣必也自揆其才，互量其力，而安处其时，小有所过，则可，大有所过则不可，卑有所就则宜，高有所举则不宜，如飞鸟焉，有所飞必有所归也，飞而无归，凶孰大焉！是故飞有山可栖，则不可以排空而飞也。若下舍其艮之山，而欲上穷乎震之太空，至于无归而遗音哀鸣，则何及矣！是以圣人首戒之曰：‘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过则亨则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为则不可也，犹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时宜而轻动也。又戒之曰：‘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言无若飞鸟薄山栖、羡云飞，始乎躁，卒乎悔也。维卑飞则吉则顺则宜，高举则逆则不宜也，周平王之伐郑，鲁昭公之伐季氏，东晋之北伐，石晋之挑契丹是已……”（《诚斋易传》）杨氏比较全面而形象地介绍了《小过》卦旨卦象，可参阅。

既济

卦第六三



思患预防济其功

《既济》卦（䷾）第六十三，次《小过》卦后。《序卦传》说：“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意思是说，正人君子行为有所过常，用以矫枉过正，矫世厉俗，这样办事必然有所成就，所以《小过》之后接着的是《既济》卦。《既济》卦象上坎（☵）为水，下离（☲）为火，阴阳相交，水火相济，各得其用，何所不成其事？阴阳相交而天地和谐，这一《易》理人所稔熟；而水与生命紧密联系，没有水与空气，又怎能诞生生命？火则与人类文明相互关联，火就是能量与光明的象征。故水火相济，则大功告成。又《既济》卦六爻阴阳各当其位，刚柔相推，彼呼此应，也是事情成功之兆。所以《既济》象征事情成功，业已告一段落。但是，大功告成，并非事物发展的终了，而是标志了又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古人又以为守成为难，所谓马上征战得天下不易，而马下兴文治天下更难。《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载唐太宗君臣对话云：“上谓侍臣曰：‘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徵对曰：‘臣闻战胜易，守胜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从卦象看，水能生人，亦能溺人；火能济人，亦能焚人；水火无情之危厉，已隐伏于卦象之中。故卦辞又有“初吉终乱”之言，又预示着某一事业成功之后，新的矛盾又将产生。所以《象传》有言：“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这是有识之士的危明危盛之言，颇有辩证思想因素。因为历史发展的实际说明，治乱相因，盛衰相继，此乃出于理势之自然。

《既济》卦（䷾）下体离（☲）上体坎（☵），卦辞云：“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既济，以渡河越险为喻，言“事之既成也”（程颐《伊川易传》）。卦辞以“亨小”断句，是取虞翻之说（见《周易集解》），指六二“柔得中故亨”。亨小，即“小亨”之倒装，小者指阴柔弱小之爻。卦辞大意是说，

《既济》卦象征事业成功，此时此刻，连阴柔弱小者也同样是前途亨通，不过只利于坚持正义的立场，如若不然，最初出现的成功吉祥，终将陷入穷乱的困境。《象传》从卦象角度来分析卦旨云："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原来《既济》卦的下体离（☲），其象为火，上体坎（☵），其象为水，"水在火上"，就如人类的"炊爨之象，饮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济"（孔颖达《周易正义》）。水和食物在上，火在下加热煮熟，养育人类，竟其事业，所以用来象征"既济"之事。君子观此卦象，就从成功的现在，进一步深思迎接未来的新挑战。如《周易折中》引龚焕所说："水上火下，虽相为用，然水决则火灭，火炎则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机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能防在乎豫，能预在乎思。"从卦象见出义理，所言甚为生动深刻。再从卦象之变来看，《既济》（䷾）卦是由《泰》卦（䷊）的五之二变化而来，说明二卦之间的密切关系，事业既济之后，则天下升平安泰，故《既济》卦辞称"初吉"。但是，如进一步追究，《泰》与《否》（䷋）反，互为综、错之卦，则由安泰之于否塞，所谓乐极生悲，泰极否来，也是理数之自然。这样，如果不深思熟虑，防患于未来，则可由《既济》经由安《泰》而致其《否》乱，卦象之变令君子惧惕，所以观此象而发为"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人生慨叹，"初吉终乱"乃是人生常有之事。而《彖传》则从卦体卦德方面来分析卦义，云："'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彖》辞解释"既济亨"，是说连阴柔弱小者也一样道路亨通，更何况是阳刚正大者呢？这就是说，处在既济之时，万事万物尽皆道路亨通，而无论其阴阳小大。"利贞"，也理解为"贞利"的倒装，就是因持守正义而必致吉祥之意，《彖》的解释是因其全卦六爻阴阳各当正位的缘故。今考《周易》六十四卦中，阴阳六爻其位皆正者，唯《既济》一卦而已，所以《彖传》特别予以指出并作典型。"初吉"，《彖》以六二之"柔得中"为解，实是兼指九五之刚中而言，如黄、张《周易译注》所释："此卦二、五刚柔俱得正得中，《彖传》只称'柔得中'者，实举柔包刚，谓柔者尚能持中，何况刚者？其义当与卦辞言'亨小'兼指'刚柔大小'同。《正义》谓'以柔小者尚得其中，则刚大之理皆获其济'，似含此意。"所论甚明。"终止则乱，其道穷也"云者，《彖传》之意是忧患于未来，而不是实指既济的现在。其所谓"止"，非指其既竟之事，而实指人们功成之后而产生的怠懈止息之心。人生之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心一旦怠懈而不思复进，则乱由之而起；反之，若处艰难之世而生戒心，有戒心则如临渊履冰，兢兢业业而不敢稍有松懈，此则治之所由而兴起。《彖》称"终止则乱"，实寓圣贤之深戒，同时也对未来寄托了止乱新生的美好希望。而所谓"其道穷也"，如明来知德《周易集注》云："其道穷者：以人事言之，怠胜敬则凶，此人道以理而穷也；以天运言之，盛极则必衰，此天道以数而穷也；以卦体言之，水在上终必润下，火在下终必炎上，此卦体以势而穷也。

今当既济之后，止心既生，岂不终乱，故曰‘其道穷’。”以下分析爻象爻辞。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曳（yè），牵掣，拖。曳其轮，拖扯车轮不使急行。濡（rú），渍也，沾湿。濡其尾，渡河时尾巴被河水浸渍沾湿。不过这是何种动物在涉水以济呢？爻辞未加说明，但《既济》与《未济》，二卦紧密相联，而《未济》卦辞有“小狐汔济濡其尾”之言，知是小狐狸在渡河时尾巴被水所湿而不能速济之貌。爻辞是说，初九，拖曳车轮不使急行，又象小狐狸渡河之时尾巴浸在水里一样，必然无有咎害。从爻位爻象看，初九阳刚位正，上与六四阴阳正应，又处下离（☲）之体，离卦象火，火性炎上，光明磊落，有上行以济的充分资本，这是一方面的条件。但是初九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它具一定的远见，顾及另一方面的条件，即《既济》卦所处的大环境。初处既济之始，事功已成之后，而众皆竞济之时，得意忘形而未能防患于未然；所以初九反其道而然，谨守其正而持慎以行，为了不使自己贸然冒险前行，于是曳其轮而不使急进，又如小狐之济，濡尾不掉以阻其速行，兢兢业业地摸着石子过河，这样小心谨慎，当然必无咎害。按六二、九三与六四下互之卦为坎（☵），又上卦也为坎，坎性险陷，可见既济功成之后，又有新的坎险隐伏其中，就看人们如何正确对待。所以初九“曳轮”、“濡尾”之行，并非胆小怕事，或多此一举，而是目光洞察深远，已预见到未来隐伏之坎险。据《说卦传》，坎于象“为弓轮……其于舆也为多眚”。初九在下，则曳其轮而不使急行，以免陷于前面隐伏的坎险之中而避开新的灾祸。又初在下离（☲）之下，据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卷八云：“离为文雉，亦为文狐，狐火畜也。”初九在下在后，《易》以上为角，以下为尾，故爻又以小狐濡尾为象。初九虽有坎险在前，但正确对待而“曳轮”、“濡尾”，又阳刚位正而上有正应，所以于义虽危而无咎。但是，宋杨万里《诚斋易传》解释与众不同，云：“初九，济难之初，将去危乱而之吉亨也。惟初九以刚居刚，有济难之才，又能竭济难之力，如良马焉，驾大车涉大川，川将离而未离，岸将登而未登，自非竭力以曳其轮，至于濡尾而不之恤，何以能济乎？宜其无咎也。此周公东征之事乎？”虽然于义亦通，可备参考，但如考虑全卦“初吉终乱”的精神要旨，及其思患预防之意，比较而言，仍取前面一般旧注的解释为佳。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fú），遮蔽之物饰；《诗·卫风·硕人》有“翟茀以朝”之句，孔颖达疏云：“茀，车蔽也，妇人乘车不露见，车之前后设障以自隐蔽谓之茀。”七日得，谓七日之后，失而复得；据王国维《生霸死霸考》，我国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保留有一种现存文献失载的周初纪日法，即按月亮盈亏规律，每月分为四期，每期七日，从月初至月末依序取名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七日正为日序周期转化之数。参前《复》卦辞之说明及黄、张《周

易译注》。爻辞是说，六二，妇女将出门时，因丧失其车辆蔽饰而难以成行，不必专门寻找，过七日的周期就会失而复得。按六二阴居阴而处位中正，上应九五阳刚中正之君，该是大为吉祥才是。但处“既济”的特殊时间和环境，九五又有日中则昃的中满之象，似含未能下贤之隐忧，程颐明确指出：“自古既济而能用人者鲜矣，以唐太宗之用贤，尚怠于终，况其下者乎？”五处上体坎（☵）中，已有坎险在前之象。又二、三、四下互之卦也为坎，故有六二处险不前之象。而六二居下卦离中，离于象为中女，二阴柔有妇象；离又有兵戈之象，此盗非无由起。而坎于象为舆，“其于舆也为多眚”（《说卦传》），而坎又有盗贼之象（同前），故六二有车辆蔽饰失盗之灾。但是正如《象传》所云：“七日得，以中道也。”六二处位既中且正，光明磊落，具文明之德，人所共见，其体柔顺而应和五，阴阳和谐，又何咎之有？故爻称“七日得”。杨万里举史例加以说明，云：“躁而竞者，胜负未可知；静而俟者，不久而自定，故曰‘勿逐，七日得’。然非以中道自处而不躁，安能如此？故曰‘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谤周公，公不辩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潜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名武丁，殷商中期以后的国王，在位五十九年，是盘庚弟小乙之子，少年时落难于民间，即位后重用傅说等平民出身的人执政，殷称中兴，曾伐边鄙鬼方诸族。鬼方，我国上古少数民族，如王国维据古器铭文及考古所得，撰《鬼方昆夷獫狁考》一文称：“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而文化程度不及诸夏远甚……随世异名，因地殊号……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獫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观堂集林》卷十三）关于殷高宗伐鬼方之事，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见《古史辨》第三册），以为历史实有其事。云：“商的势力早已远被西北民族。到高宗时，伐鬼方至三年之久而后克之，可称是古代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作爻辞的人用为成功的象征。”爻辞大意是说，殷高宗武丁讨伐地处西北远方的鬼方，经过三年的长期征战，方才取得胜利；此事说明，反复无常、用事不专的小人是不可信用的。从爻位爻象看，九三以阳居刚，遥应上六，上六处上体坎卦之极，是至远至险之地，故爻以远居西北的鬼方为喻。又三居下离之极，离卦有兵戈之象；又三爻变则下体由离化为震（☳），震卦性动；兵戈震耀之极事即为兴兵征战，故爻以征伐鬼方设象为喻。三年克之，只是泛指胜之不易，“三年”言其事之难济，其成功之艰巨也。如顾颉刚所说，在《易》卦爻辞中，“三为较多之数，十为甚多之数”，“三”非确实之数，如《师》卦“王三锡命”、《比》卦“王用三驱”、《坎》卦“三岁不得”、《革》卦“革言三就”……九三在既济之时取得了应有的成功与胜利，但智者远虑，君子已有思患

豫防以善始善终之虑，故《周易折中》引沈该之说："《既济》初吉，锐于始也；终止则乱，怠于终也。中兴之业既就，远方之伐既成，而使小人预于其间，贪功逞欲，惫民不息，则必以乱终，不可不戒，是以'小人勿用'。"如若胜利之后，利令智昏而重用小人，则一乱除而新乱又生，初吉而无善终，这就由既济而滑向了否塞，终于陷入了"终乱"的危机与灾难。故圣人戒以"小人勿用"，是在事业既济之后，而应常存未济之忧，于此可见《易》卦爻辞作者思深虑远，富有辩证因素。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rú），古代丝帛织品，即彩色的缯或细密的罗之类。袽（rú），旧絮、破布之类。爻辞是说，六四，华美的衣服终将化为弊衣败絮，所以君子终日警惧以戒备祸难。这是一种解释。但另一解则据王弼、程颐、朱熹诸人之注，以"繻"当作"濡"，渭渗漏也。程颐《伊川易传》云："四在济卦而水体（按：指四在上坎之下），故取舟为义……舟有罅漏，则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备濡漏。"据此，则爻辞大意是说，为了预防渡河时船漏，准备了堵塞漏洞的弊衣旧絮，君子因此心中思虑深远，警钟长鸣，常备不懈，终日戒备祸患。于义亦通。二解相较，以王、程之说为佳，因为从卦象济川、爻象坎水方面来作解释，更符合卦旨，如苏轼《东坡易传》所云："衣袽所以备舟隙也。卦以济为事，故取于舟。"从爻位爻象看，四居上体坎下，犹如舟已入水。又四阴柔位正，近于九五之君而居近臣之位，辅君施治，责任重大，所以时时警惧而不敢稍有怠懈，故济渡之时，常备衣袽以防濡漏。《周易折中》引张清子之说："六四出离入坎，此济道将革之时也。济道将革，则罅漏必生。四坎体也，故取漏舟为戒。终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备，常若坐弊舟而水骤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所言甚是。《既济》上体三爻，已从下离光明趋至坎险之中，故上坎三爻多历艰难。于"既济"中见其"未济"之艰，《易》卦辩证思想，何其深刻！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禴（yuè）祭，指薄祭，参前《萃》六二爻辞注。东邻西邻，程朱以为东阳西阴，故东邻指九五，西邻指六二。但《周易折中》引潘士藻言，以为"东西者彼此之词，不以五与二对言"，《折中》进一步发挥潘说，以为爻称东西，"皆就本爻设戒尔，若以西邻为六二，则受福为六二受福，《易》无此例"。其说可取。爻辞是说，九五，东邻杀牛举行丰盛祭典，却不如西邻出以虔诚孚信之心的薄祭，更能实在地迎来神灵祖先的赐福。从爻位爻象看，九五阳刚中正居尊位，是《既济》一卦之主，在事业竟功之后，该是坐享其成之时，但同时也是既济盛极，易萌骄奢淫逸的危险时刻，所以作卦者因禴祭，而戒以诚敬惜时之语。古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九三伐鬼方而克之，是

征战而后平定；九五祀天而祭，是告其成功于神明。但祭在诚乎，而不在与祭品丰盛与否。古时牛为大牲，东邻杀牛以祀，祭品丰盛之极；而西邻薄祭，明德馨香沼毛以奠，出之以诚敬，却胜于东邻厚祭而鬼享神佑，实受降福。东邻西邻之祭，成了一正一反之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启悟。故《象传》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合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鬼神无常享，惟德厚者以临，故诚敬合时，则吉祥将源源而降。

上六，濡其首，厉。

爻辞是说，上六，如小狐狸渡河，连颈部也被河水浸濡，实在危险至极！从爻位看，上六居既济之极，是济极终乱的矛盾急剧转化之时。故《象传》戒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相传狐狸渡河，必高揭其尾以济，但小狐则无力高举其尾，故初有"濡其尾"之辞；而发展到上六极限之时，爻辞首尾相应，以关合卦名，故仍以狐渡为喻，此时汹涌波浪已淹没小狐之首，但是小狐却不知险难而回头是岸，于是自然就出现了灭顶之灾。"何可久也"，也即意味不久即厉，戒惧之意明白。《周易折中》引胡瑗之说："物盛则衰，治极必乱，理之常也。上六处既济之终，其道穷极至于衰乱，如涉险而濡溺其首，是危厉之极也。皆由治不思乱，安不虑危，以至穷极而反于未济也。"比较而言，初九"濡其尾"，有后顾之意；而上六之"濡其首"，则因既济而志气盈满，所以不虑前险而惟知其涉，故自取其咎而致濡首没顶之祸。上六处上坎之极，是坎水极深极险之地，故爻有"濡其首"之象，以应卦辞"初吉终乱"之语，清楚说明了作者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既济》六爻不言吉者，而多见戒辞，其义皎然，引人深省而惧惕。

《既济》为卦，虽是象征事业之成功，但无论卦爻辞或卦爻象，皆有危惧之戒，大多从成功的反面来立义，如卦辞所称"初吉终乱"，六四之"终日戒"，上六濡首之厉，所言多是成功之中寓藏危乱的意思。从上下卦体看，下体离卦（☲）见其成功之光明，上体坎卦（☵）表现了前进道路中所隐伏的险陷及危机。所以下体内三爻皆有既济之象：初九濡尾以济而"无咎"，六二丧茀却失而复得，九三伐远三年而克，三爻皆有济渡已成之象，或因其阳刚正位而致胜，或因其阴柔中正和顺而复得，此即《象传》所谓"初吉"也。但上体外三爻则不然，似有渐入于未济之象，六四因心有所疑而"终日戒"，九五杀牛隆重以祭却反不如西邻之薄祭，上六处既济之极而有濡首灭顶之厉，此即《象传》所称"终乱"也。此全卦六爻上下进退之大旨。据卦爻象所示，成功非易，而守成更难。前面所述唐太宗与魏徵诸侍臣的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精神。宋杨万里《诚斋易传》引史实来加以论证云："如济川焉，舍川而陆，舍舟而毂，危者安，险者济，何忧之有？然人皆有敌于洪流，莫或敌于夷涂，人皆惧于覆舟，莫

或惧于覆车，是以初吉而终乱也。秦灭六国而秦自灭，晋平吴乱而晋自乱，隋取亡陈而隋自亡。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此鄢陵之胜，范文子所以忧晋之必祸也，盖人之常情，多难则戒，戒则忧，忧则治；无难则骄，骄则怠，怠则乱。圣人见其初吉而探其终乱，惟能守之以贞固而不移，持之以忧勤而不息，则可以免终乱而不穷矣。故戒之曰‘利贞’，又曰‘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所论《既济》卦旨精微，颇为形象。卦中处处可见警戒之辞和惧惕之象，因为天道的泰否相因相续，实出于理势之自然。所以卦中充溢了居安思危、治不忘乱之言，于此可见作《易》者对于世界的深刻认识和辩证思维；同时，作者也没有忘记显示了从“既济”到“未济”的发展线索。所以朱熹在讲学中和学生一道讨论，《朱子语类》卷七十三有一段记载：“问：‘《既济》上三爻皆渐渐不好去。盖出明（按：指下卦离）而入险（按：指上卦坎），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杀牛，则已自过盛；上濡首，则极而乱矣；不知如何？’曰：‘然，时运到那里都过了。康节（按：指邵雍）所谓饮酒酩酊、开花离披时节，所以有这样不好底意思出来。’”于此可见，《既济》之后是《未济》，并以之作为六十四卦的总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未济

卦第六四



曙光在前新征途

《未济》卦（䷿）第六十四，是《周易》六十四卦的压轴戏。它紧跟在《既济》卦之后，彼此既是综卦，同时又为错卦，可见其矛盾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序卦传》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穷，穷尽、至极而到顶之意。《序卦传》的意思是说，事物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既济》卦所显示的成功只是事物发展告一段落的总结，但它同时意味着新的事业的开始，已隐含了"未济"的因素，所以《未济》卦就象征着事业尚未完全成功。正因为事业尚未成功，所以如孙中山《总理遗嘱》所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终止，而是标志了中国新时代的开始，革命的志士仁人又重新走向了新的艰难征途。不然的话，为什么又有那震惊世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呢？《易》卦之理重在一个"变"字，一旦主事者以其成功为至善至美，达于穷尽之境而止步不前，拒绝发展和进步，这时就会使矛盾向相反方向转化，由"既济"而重新陷入"未济"的坎险之中。反之，如果明白《易》理，知道《既济》之中已含"未济"之理，则将继续发展进步，永远生机勃勃地腾跃向前。所以《未济》卦预示了新一轮艰难征途新纪元的开创。万事开头难，开创纵有千难万险，又何足畏哉！因为开创中又充满了对于光明未来的美好憧憬，创新中自有无限的欢乐！《未济》卦中有其致亨之理，故程颐《伊川易传》云："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天地乾坤以始，而止于《既济》《未济》之卦，又重新鼓荡阴阳之气而生生不息。作《易》者的深心，于此可见。伊川之言，言简而意赅，基本符合了宇宙自然及社会人生的发展辩证法。

《未济》（䷿）的下卦为坎（☵），上卦为离（☲），其卦辞云："未济：

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汔（ｑｉ），接近，庶几。卦辞大意是说，《未济》卦象征了事业尚未完全成功，但其中仍隐伏了通往胜利的亨通之道，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正确处理；如若像小狐那样勉强涉水过河，虽然已接近了河的对岸，但终因尾巴被河水浸湿，负担太重，功亏一篑而未能成渡，这就会处于进退维谷的不利境地之中了。所以《象传》据上下卦形解释说：“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方，地方，处所。原来，《未济》与《既济》上下卦形及六爻阴阳全部颠倒：《既济》是“水在火上”，以火烧水供人饮食，象征事业的成功；但是《未济》则反了过来，上离（☲）象征火，下坎（☵）象征水，成了“火在水上”之象。火可燃物煮水以济人生活，则此火是文明与进步；反之，如像《未济》之“火在水上”，则水火未能相须而用，而是火自火而水自水，阴阳不交而相背悖，火不烧水煮食以养人，则将由利趋害，由文明进步转而化为祸源，因为火性炎上，如果无水可烧，或乏水以救，则火将上烧房屋、森林，成为火灾。所以“火在水上”，从卦象就可看出事业未济之艰难。水火于人，都是须臾不能离开的有用之物，就看你如何驾驭配合以交相为用了。君子观此卦象，悟出了审慎辨识不同事物，以便让它们各安其位以尽其用的道理。因为上体之离象征火，火能烛照万物而具文明之性，所以人们借火之明以洞见诸物，自能“慎辨物”而无碍；又下体坎象征水，古人居住之地必须有水才能生活，如无江河湖泊，则必定掘井而饮，聚邑以居，因此，《象传》所称“居方”如水之聚人。水火为物虽异，但若能洞见其性，相须以用，则又如王弼注所说：“辨物居方，令物各当其所也。”这就说明，未济之时，虽存既济之亨，而有求济之心，但戒济者慎处而谨渡，则“未济”云者，非不济也，而是慎处待机以济其新功，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开始酝酿新的长征。而《彖传》则更多从卦德卦性方面来分析，云：“‘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位虽不当，刚柔应也。”为什么“未济”之时却寓有亨通之道呢？如果说，前卦《既济》之亨，指的是已然之吉，是实现了的成功欢乐；而《未济》之亨，则是指未然之吉，是尚未实现而有待努力的美好未来，只是一种希望。处在《未济》的特殊情境中，六五以阴柔谦虚之德而居中位，能够主动容纳上下、团结阳刚而和衷共济，人们常说，“君子同心，其利断金”，只要万众一心，则何险而不可济？故来知德《周易集注》云：“言未济终于必济，故亨。”又曰：“亨者，言时至则济矣，特俟其时耳，故亨也。”这是从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来分析《未济》卦性，只要谨慎求济，则有致亨之道，与《象传》所称“慎辨物居方”同一精神。但从另一方面看，“小狐汔济”，因其未能谨慎而正确地处理问题，所以《彖》有“未出中也”之言。“未出中”指九二处下体坎险之中，有溺水之危而不知。按照程颐的解释，“汔”作“仡”，“壮勇之状”。程说于义亦通，因为九二阳刚居中，失位非正，有勇锐之气而果于行之状，而二又为下坎之中，是实在的险陷之地。据说老狐狸多疑，履冰而听，惧其

陷也。但小狐则缺乏生活经历，不知坎险在前而谨慎以待，果勇于济，终濡其尾而未成其济。但是朱熹并不完全同意程子之说，而是更深一层，他说："未出坎中，不独是说九二爻，通一卦之体，皆是未出乎坎险，所以未济。"比较而言，朱子之说更深刻更全面。这就指出了"未济"之时的艰险，要求大家提高警惕，正确处理，方可有备以济其功；反之，盲目而鼓其匹夫之勇，则自陷坎险而溺于水中，这就自找苦吃了。所以《彖》辞在"未出中也"之后，又有"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之戒。但是，生活的教训促使人们日渐成熟，锐进速退而未竟其济之弊，让人汲取教训而猛省，反思之后，自会谨慎以处，"慎辨物居方"，则又终将济其渡而竟新功。从爻位进退变化来看，六爻阴阳皆非当位而失正，此所以称"未济"；但《易》卦重变，《未济》六爻阴阳刚柔相应以共济，又是为事物从"未济"向"既济"转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故《彖》称"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正是不仅注重于现在的艰难，同时又看到了未来"既济"的希望。故陈梦雷《周易浅述》云："既济物之穷，穷无不变易者，变易不穷，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生生不绝矣。"以下分析爻辞爻象。

初六，濡其尾，吝。

爻辞是说，初六，就像小狐狸涉河，被水濡湿其尾巴而无法成渡一样，必然有所遗憾。初六阴居阳位失正，处"未济"之初，居下坎陷之始，才弱力小，又急于上应九四阴阳之应，犯险而躁进，但九四同样是居位失正过中，其力不足以援初以竟济，故初六犹如小狐涉水，有尾濡不济之象，此其所以有吝惜也。但是，为什么《既济》初九同样是小狐"濡其尾"，而有"无咎"之象，而《未济》初六却有吝惜遗憾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二卦所处的具体时间和环境不同所致。故如陈梦雷《周易浅述》所云："《既济》濡尾无咎，此则吝者：《既济》阳刚得正，离明之体，当既济之时，知缓急而不轻进，故无咎；此则才柔不正，坎险之下，又当未济之时，冒险躁进，则至于濡尾而不能济矣，故吝。然《彖》言'无攸利'，而此但言'吝'，则以卦之初，失尚未远也。"宋杨万里《诚斋易传》举史以明，云："桓温至洛阳而复败，刘裕得关中而复失，初六之濡尾也。"东晋中后期的桓刘北伐，并非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更未曾全面地具体分析敌我形势，而是见其一面，不及其余，以北伐来为自己掌权篡位树威，其新进喜事急于求济，犹如小狐之躁进濡尾，反而不济，其吝者以此。如太和四年（公元369），桓温率东晋主力伐燕，兵强马壮，北燕朝野震骇，但其司徒左长史申胤却神色自若，断言温之北伐必然无功而返，他说："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又，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军深入，值可乘之会，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果然，不幸申胤言中，而温有枋头之败，"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事载《资治通

鉴》卷一〇二。故《象传》评初六曰："濡其尾，亦不知其极也。"极，终极。如程颐《伊川易传》所释："不度其才力而进，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爻辞是说，九二，拖扯车轮不使急进，若能坚守正道则吉。据《说卦传》，下体之坎（☵），不仅有"轮"象，而且"其于舆也为多眚"，九二之轮，处此灾眚之地，能不惕然而惧乎？从好的方面看，九二以阳处阴，虽然非当其位，但却居下卦中位，阳刚劲健而具济渡之才，原可急进以上应六五阴阳之应，这是从其才能本质方面来看；但从另一角度视之，九二处下体坎中，遇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险陷之地，而且又处"未济"下体，时机不利，如若自恃阳刚之才而急进轻济，必有覆舟之危。可喜的是，九二认识清醒，中正以行，守时俟机，绝不轻举妄动，犹如"曳其轮"而防备祸患，这就有可能在适当的时机，脱险以济，从下体坎险之中，奔向上体离卦的光明之路。故《象传》云："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从全卦来看，"未济"是事业尚未成功的艰难之时，六五以柔处中，虽为君主，力弱而待九二之拯助。不过，九二虽居大臣辅相之位，但在时地不利的坎陷之中，若恃刚急进以应，就可能事与愿违，自溺于水又怎能援上？因此九二倒曳其轮，杀其势而缓其进，审时度势而相机以进，忍一时之屈而取终身之吉。如来知德《周易集注》所说："坎为轮，曳其轮者，不遽然而进也。凡济渡必识其才力，量其浅深，不遽于济方可得济。不然，必濡其尾矣！贞者得济之正道也，吉者终得以济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爻辞是说，六三，才力柔弱而未能成济，前进必有凶险；但利于涉越大江大河。爻辞前后，似乎自相矛盾，既然前行"征凶"，为什么又"利涉大川"呢？朱熹《周易本义》曾作一假设，云："盖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陆走。"这与后世术士江湖占术相似。故《周易折中》叹道："此爻之义，最为难明。"朱子深思反省之后，于是又说："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爻辞如作"不利涉大川"，则前后言语一致，应是最佳选择。但是非常遗憾，至今未见版本根据，所以只能存以待考。目前，仍然只能按照旧注作解并译为白话。六三以其阴柔之质，而占据了阳刚之位，处位早已过其中。由此可见，六三的爻位爻象，已呈凶象，这是因为六三虽处坎险之地，而其本质才力柔弱不足以脱险自救。此时缺乏自知之明，鼓勇前行，必然遇险而陷溺其中，故爻称"未济，征凶"。但从另一视角来看，六三已处坎险之上，已近脱险之时，又可见未济之中已隐伏了可济之理，此时若能积极上应刚健之上九，和衷共济，共同努力，则仍有出险以济的机会和可能，故爻称"利涉大川"。总之，六三处于将济可济之时，却乏济险之德之才，故有"征凶"之难。明来知德《周易集注》则以爻变之象来解释爻

辞，云：“未济者，言出坎险可以济矣，然犹未济也，故曰‘未济’。利涉大川者，正卦为坎（☵），变卦为巽（☴），木在水上（按：六三变阳则下体由坎化巽，巽象为木，坎象为水，木可为舟而行于水上，故云），乘木有功，故利涉大川。征者行也。初‘濡其尾’，行而未济也；二‘曳其轮’，不行也；坎至于三，则坎之极，水益深矣，故必赖木以渡之，方可济也，若不赖木而直行，则濡其尾而凶矣。”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此爻之“贞”，似应作动词用，也即占筮之意。伐鬼方，殷高宗时史有实事，参见《既济》九三爻辞注释。爻辞是说，九四，占筮得此爻者有吉祥之兆，悔恨消亡。殷高宗时震赫其师，远伐鬼方，以其成功，三年而赏赐将帅以大国诸侯之位。从爻位爻象看，九四已脱出下体坎险之地，而处上体离明之中。四爻变则二、三、四互卦为震，震性为动，与《既济》之世利用静不同，一样取伐鬼方事，但《未济》之世利用动，故震赫王师而致吉。但九四又以阳居阴，秉刚健能济之才，而行其谦柔谨惧之德，为什么？因为四为大臣近臣之位，居多惧之地，太刚而能则有逼主之嫌，故以刚行柔，竭忠辅上，以亲比于六五之君。又上卦为离，离有兵戈之象，震动兵戈，故爻以三年伐鬼方为喻。大战而至三年，方有赏赐，其战争之严酷惨烈可见一斑，君子能不惧乎？爻称“三年”者，实是戒占者之词，虽曰未济之世利于动，但其动必须谨之慎之，然后有可济而竟功之理。九四之“贞吉”，来之不易。杨万里《诚斋易传》云：“临难而坐观，履险而不欲济，无志者也。有志矣，患无才；有才矣，患无位。有志而无才者，欲济而不能济；有才而无位者，能济而不得济。备斯三者，其惟《未济》之九四乎！怀刚正之资，其志立矣；奋震动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亲且重矣。是惟无动，动而用之，以伐远夷，则有大功，受大赏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矣。”诚斋又以后来周宣王拨乱反正而获中兴的战事为例以说明之，如“吉甫伐玁狁、召虎伐淮夷、方叔伐蛮荆，《未济》之九四以之”。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爻辞是说，六五，占筮得此爻者吉祥如意，必无悔恨。犹如君子光辉照耀，因其内怀诚信而致吉祥一样。从爻位爻象看，六五居上离之中，离象为光明；又五为君位，为《未济》一卦之主，是从未济之世向既济之世转化的核心动力之所在，故爻以“君子之光”为喻。六五早已从下体坎险之中脱出，处上离中，而自焕发其文明光辉，不仅自明其视，而且以其内在诚信，感格大众，外发其光而普照天下，指明道路，以免重蹈覆辙而再陷坎险之中。六五之德，自济济人，充分显示了《未济》卦中有可济致亨之理，此爻所以称为“贞吉无悔”也。六五虚中于上，用人无疑于下，光辉诚实而感动大众，引发共鸣而大众尽其心力，则何险

而不可济？所等待的，只是英明君主的一声令下，故爻又以“有孚吉”为喻。上下交孚，必然建立在相互信任、团结一心的基础上，故可于未济将济之时，排除险难以共济成功的彼岸。如杨万里《诚斋易传》云：“盖《未济》之六五，其体离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日与火虽柔犹刚，虽弱犹强。故日之在夏，暍之益热；火之在夜，宿之弥壮。六五文明之至盛，而养之以晦；刚烈之至猛，而掩之以柔；方且虚其中以临照百官，正其身以一正天下，坚其诚以信任群才……安得不一扫大难为无难之世，一变未济为既济之时乎？备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其汤、武、高帝之创业，少康、宣王、光武之中兴事耶？”诚斋之言，如若去其封建君臣等级观念，而取其举国上下之民族团结，着眼诚信于民的谦顺英明之领导核心，则所论颇多启迪。这是从正面立论。反之，则如秦政之以暴治民，上下何“孚”之有？故秦政身死未及三载，而秦王朝社稷丘墟，随之覆灭。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濡其首，朱熹以小狐渡河而濡没其首作解；而杨万里诸人，据《象传》“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之言，释为逸乐放纵、埋头饮酒为解。二义皆通，但如不拘泥于六爻首尾以狐为喻的篇章之应，而从卦义精神来看，则可据诚斋之说，作埋头饮酒而纵乐解释为佳。是，此也，指代上述饮酒作乐之事。爻辞是说，上九，心怀诚信，相互信任，自在地饮酒作乐，必无咎害。但是，如果过分放纵逸乐，只知埋头喝酒而沉湎其中，则丧失了上下之间彼此相互信任的基础。从爻位爻象看，上九以刚健之性，居离明之极，处《未济》之路，是即将转化为既济之世的大好时机，其前景之光明，是因上九所居的有利时间和特殊环境所决定的。实际上，六五之吉而又吉，已标志了从未济向既济的转化，上九不过是沿其既定方向作惯性运动而已，因此，上九以其内在诚信，辅助六五之君完成竟济大业，彼此信任，致其成功，以此而饮酒欢庆，何咎之有？故爻称“有孚于饮酒，无咎”为喻。在未济时看到既济的光明，这是与《未济》全卦的精神相一致的，是上九爻义的主要方面。但《易》卦作者，深明变易的辩证法，如果像《象传》所批评的那样，“饮酒濡首”而不知自我节制，则“无咎”祥云将烟消云散而有大祸临头，已经出现的既济曙光立刻逆转息灭，而重新失陷于未济的坎险黑暗之中。《周易折中》引丘富国曰：“既言饮酒之无咎，复言饮酒濡首之失，何也？盖饮酒可也，耽饮而至于濡首，则昔之有孚者，今失于是矣。”在日常生活中，朋友快乐饮酒，喝上几杯，畅叙人生，倾泻胸怀，得其酒趣，是相互信任的“有孚”表现。人生在世，有了信任，才有真心的互助，这样生活，快乐无咎，可以共济成功的彼岸。但饮酒之乐，也有个节制，任何事物，超越分寸，则好事将变为坏事。比如唐玄宗的初期，与姚（崇）宋（璟）等贤相，上下交孚，共济危难，因其成功而饮酒庆祝，成其名垂青史的开元之治；但其晚期天宝年间，奸相

李林甫、杨国忠当政，上下相忌，人人自危，又何孚之有？但玄宗纵乐于上，犹如濡首饮酒而不知危难将至。因而一旦“渔阳鼙鼓动地来”，惊慌失措，京城失陷于安史之乱，全国生民涂炭。这一血的教训，已载入史册。又如《史记·殷本纪》载：“（殷纣王）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殷纣王濡首酒池而为长夜饮，何节之有？无道淫乐，又何孚之有？人而无信，又何以为人？人而无节，又何以立国？无信无节，以此济难，又何以成济？因此，纣王国灭身死，信其必然。但是，《既济》上六也有“濡其首，厉”之言，与《未济》上九之“濡其首”，有何异同？如杨万里《诚斋易传》所说：“《既济》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济》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以及其天下国家。故洚水之害，小于仪狄之酒，禹恶旨酒之功，大于平洚水。”当然，爻辞中的“饮酒”濡首之称，我们不能拘泥于酒，而作机械的理解，实际上，是以濡首饮酒泛指一切纵乐无节的荒唐行为，下至个人言行，上至治国齐邦，眼看成功在即而逸乐狂欢，则如《老子》所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大难即将重新降临，能无惧乎？爻中濡首饮酒之戒，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阵沉重而响亮的警钟。

综观全卦，处于“未济”的特殊时间和环境之中，事业虽然尚未成功，但是曙光在前，只要同志努力，万众一心，又自有可济之理，故卦辞有致“亨”之言。但“未济”之中虽寓可济之理，若因此而不知自节而轻济以进，则不仅无所利，而且将有溺水自毙之灾，故六爻之中，初六言称“濡其尾”，而上九则“濡其首”，濡尾为慎戒其始，濡首则警惧其终，古人警惧之心，犹如警钟长鸣，令人时时刻刻，日日振奋，而不敢因从未济而转为既济而稍怠松懈。六爻首尾，慎始戒终，把卦辞致“亨”之旨的错综复杂内容，明白揭示。其余二、三、四、五诸爻，则大抵下卦之爻，因所处时段问题，陷于坎险之中，准备济渡之具尚未完备，所以爻位爻象显示，是皆未可急于轻进，九二“曳其轮”方保贞吉，已是万幸，六三则直言急济“征凶”，严重其戒。而上卦之爻，则已跳出坎险之外，而处该进以济之时，故迅速行动而又不失时机，如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方才见功，经过顽强拼搏的重大牺牲，终于赢来了“有赏于大国”的贞吉之亨；六五则因其合于中道而发“君子之光”，故致“有孚”之吉。发展至此，六五已是居中应刚，成为一卦的文明之主（按：指居上离之中），实际上已从未济困境中脱出，转而界临既济之界域，故爻称“贞吉”之亨，也是时势之必然。如《周易折中》引郑汝谐云：“《既济》初吉终乱，《未济》则初乱终吉，以卦之体言之，《既济》则出明而之险（按：指下离明而上坎险），《未济》则出险而之明（按：指下坎险而上离明）；以卦之义言之，济于始者必乱于终，乱于始者必济于终。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而《易》重变化，若从卦变角度视之，则

《泰》（䷊）上下卦之中爻阴阳爻变为《既济》，而《否》（䷋）上下卦之中爻阴阳爻变为《未济》，似乎显示了《既济》为泰为吉，《未济》为否为凶。但是，《易》卦作者心中牢记祸福相依的矛盾转化之事，明白泰极否来而乐极生悲之理，所以又顺其发展规律，清楚地揭示了《既济》爻辞多凶，而《未济》反而爻辞多吉的客观现象。因为《泰》《否》二卦揭示了事物治乱之理，而《既济》《未济》则又充分显示了泰、否矛盾转化之渐。不过，《未济》之吉也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当其上九纵酒逸乐而坐享既济成果之时，又会重新推入未济的坎陷之中，故爻称有“濡其首”之失。可见事物发展到《既济》《未济》，并非发展的终结，而只能说是事物发展告一段落的终结，但却是新阶段运动的开始。《易》之为道，生生不息，于是在完成了“既济”大功之后，又经“未济”而重新走向了更高一层的新征途，这就是天道自然之理，合乎人类社会的生活辩证法，沾溉、启迪了千秋万代。

在读《易》解《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程颐《伊川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作为儒家的教科书，成为科举的敲门砖，在封建社会中因其功利所在，虽然读者趋之若鹜，但是能明其然，又能明其所以然者，寥寥无几。实际上，朱熹尊重程颐，但并不亦步亦趋，其《本义》与伊川《易传》，多有出入而另创新义。不过，朱熹《本义》因是讲解儒家经典的简明教科书，限于说教之体，不能不一以贯之，因此，个别地方也有附会勉强之弊。实际上，作为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学者，而非道貌岸然的经师，他很明白，读《易》必须运用“《易》无达占”之法，灵活地解读，方能更符合古代《易》理的实际，才有可能进一步揭示那隐藏于语言文字及卦画符号表象背后的精神本质。因此，如果能够参考其《朱子语类》中的说《易》部分，则可见其会心微妙，非常人所能及。如云：“《易》不是杀底物事，只可轻轻地说，若是确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扬子云《太玄》了，《易》不恁地。两卦（按：指《既济》《未济》）各自说濡尾、濡首，不必拘说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概《既济》是那日中衙晡时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济》是五更初时，只是向明去。圣人当初见这个爻里有这个意思，便说出这一爻来。或是从阴阳上说，或是从卦位上说。他这个说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他这个说得疏，到他密时，盛水不漏；到他疏时，疏得无理会。若只要名义上求他，便是今人说《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三）所论不仅具体有利于说明《既济》《未济》二卦旨义，更重要的是他的读《易》研《易》的独特心得体会，和其灵活以力求合乎《易》理实际的读书方法。读《朱子语类》虽然繁而细，但我认为，可以更清楚地揭示一代宗师所走的治学之路，因此对我们读《易》解《易》，更有帮助和启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演说
作者=蒋凡著
页数=446
SS号=11918138
出版日期=2007.7

前言
目录
乾卦第一　乾龙飞天处处踪
坤卦第二　大地母亲胸怀广
屯卦第三　万物初生步维艰
蒙卦第四　启蒙发智树根本
需卦第五　“需待”道畅茁壮长
讼卦第六　止讼息争杜根源
师卦第七　正义之战仁义师
比卦第八　团结亲附仁者心
小畜卦第九　养聚知止求小康
履卦第十　如履虎尾致元吉
泰卦第十一　心气交通天地泰
否卦第十二　否泰兴亡关人事
同人卦第十三　天下为公世大同
大有卦第十四　精神物质双丰收
谦卦第十五　谦虚受益骄必败
豫卦第十六　后天下之乐而乐
随卦第十七　相随而从止于善
蛊卦第十八　匡救父弊治蛊乱
临卦第十九　古代的领导艺术
观卦第二十　万国观光见盛德
噬嗑卦第二十一　秉公持正利用狱
贲卦第二十二　文质彬彬致“贲”道
剥卦第二十三　剥丧横流觅生机
复卦第二十四　迷暗知复透微曦
无妄卦第二十五　以正祛邪归“无妄”
大畜卦第二十六　蓄德养贤路通天
颐卦第二十七　颐养以正颂声兴
大过卦第二十八　“大过”乱世育英才
坎卦第二十九　高歌正气越险道
离卦第三十　养火以正成文明
咸卦第三十一　无心之感阴阳和
恒卦第三十二　锲而不舍恒久道
遁卦第三十三　遁世无闷俟时行
大壮卦第三十四　生气壮盛戒骄溢
晋卦第三十五　柔顺进长著明德
明夷卦第三十六　黑暗之中见光明
家人卦第三十七　家道贞正天下兴
睽卦第三十八　求同存异济乎睽

蹇卦第三十九　和舟共济脱险难
解卦第四十　解难行道防隐患
损卦第四十一　老实吃亏终致益
益卦第四十二　益下自损终自益
夬卦第四十三　夬决除恶扬王庭
姤卦第四十四　阴阳遇合自有道
萃卦第四十五　修德服人说会聚
升卦第四十六　积小成大顺性升
困卦第四十七　努力脱困获新生
井卦第四十八　功德无量井泉养
革卦第四十九　革故布新顺天人
鼎卦第五十　鼎食以烹在新人
震卦第五十一　震惧修省拓亨途
艮卦第五十二　时止则止光明行
渐卦第五十三　循序渐进竟其功
归妹卦第五十四　血泪淋漓论婚嫁
丰卦第五十五　明动相资见“丰”大
旅卦第五十六　行旅风霜说辛酸
巽卦第五十七　顺入人心秉刚正
兑卦第五十八　欢悦以道远邪媚
涣卦第五十九　风行水上现至文
节卦第六十　甘节苦节吉凶别
中孚卦第六十一　诚信之道感天地
小过卦第六十二　矫枉过正致大吉
既济卦第六十三　思患预防济其功
未济卦第六十四　曙光在前新征途